

# 對時文

自由主義者與中國現局……………程程

中國政府關於對日和會的態度……………范承祥

改革幣制之謎……………林滄白

金融管理之分析……………郭大力

九龍事件……………曹孟白

論「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丁楓華

劉伯承與林彪……………柳逢仙

# 16

國立南京圖書館

## 卷二第

雜文 喪志症……………商翼  
巴夫洛夫的狗……………

北美重遊(二)……………陳達

戰火燒到湖南米倉……………黃非

宋子文·建軍·分區綏靖……………于人

新陪都的新新聞……………凌華

暹羅的「苦迭達」……………復康





### 九龍事件

曹孟白

英國強迫九龍居民拆屋，激起廣州民衆燒燬英領事館，這是中英邦交上很不愉快的事件。

英國根據道光、咸豐及光緒時代和我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佔香港九龍，迄今拒不歸還，這固然是中國的恥辱，同時也是英國的 *disgrace*。英國在今日還動用武力，對付華人，又充分暴露了老牌帝國主義者的真面目，並顯示出唐寧街勞工貴族們對於時代認識的錯誤。

不過，外侮之來，也並非偶然。因為有清政府的懼外、軟弱、腐化、愚昧與無能，這才有英國的侵略。試問今日情形，比之當時如何？況且我們正在熱心打着內戰，甚至不惜引用外援來殘殺同胞，喪權辱國之事正多着呢，英國拆屋一舉，不過是趁火打劫而已。

俗話說：「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英國人總還記得徐廣縉、陳友仁辦外交時中國民衆所表現的力量吧。這次九龍事件，也希望英國能夠知難而退，更希望其他錯誤時代的人們，認識今日中國，勿謂中國人缺乏民族精神與反抗力量。

### 論「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丁楓華

現在又開始注重政治了，說：政治重於軍事，應該七分政治，三分軍事。這當然是從冷酷現實中得來的一點教訓，於是加強地方自衛力量與組織民衆之類的辦法又成套的搬將出來。北方倚畀傅作義

將軍，南方重用白崇禧將軍，恐怕除因人事方面的考慮而覺得有此需要之外，還含着上述政策方面的意思。此為以牙還牙的做法，要想以子之盾，防子之矛。

道理雖對，却沒有摸到竅門。歷來治術不脫四個大字：管、教、養、衛；以為順序經過管民、教民、養民的訓政三部曲之後，自然可以衛民或使人民「自衛」。然而也有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的：先是養民，如實行土地政策之類，解決了人民的生活問題，次一步纔對人民施以管教，人民便自然而然有了自衛的力量，進一步做到互衛。所以養民乃是根本，管教皆為枝葉，衛民則是果實。

繼續內戰，明明是殘民而不能養民；繼續獨裁專政，則是愚民而非教民；繼續官僚統制，更是驅民而不是管民。殘民愚民而且驅民之餘，何來衛民？於是人民率性「自衛」去了。

### 劉伯承與林彪

柳逢仙

官方報紙檢討過去一年間的內戰軍事，曾選擇七月爲界，劃爲截然不同的前後兩期，很妙。情形是這樣的：去年七月中旬，政府發佈了正式的勳員令，並開始向美國正式呼籲援助；就在美國派遺魏德邁來華調查的時際，政府在山東戰場上佈置並執行了一次規模宏大的攻勢，用意在於佔領煙台，肅清膠東，打通津浦線，殲滅共軍主力，以使南北聯成一氣，便好鞏固華北，保衛東北。這一場山東戰役及其帶來的後果，實在是意義重大的，太重大了。這可以從三方面來說明。第一，由今日看去，政府的那次攻勢，是最近一次（如果不是最後）攻勢，其後則不復能攻了；其後各線皆處於守勢，不是主動地由攻勢戰略改變爲守勢戰略，而是被動地逼處於守勢地位。即以目前的華中戰場而論，政府只在戰術方面勉強可算居於攻的一方，在戰略上講，毋寧說是防衛性質的，以免劉伯承不時威脅晉京漢和長江航運，甚或渡江南下。我們可以說：去年七月的山東之戰乃是一場劃時代之戰。第二，國軍雖

然拿下了煙台，却依然掌握不住膠東，津浦線除濟浦一段勉強通車之外，其他部份猶在共軍手裏；打通津浦的計劃可說落空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政府因集重兵於山東，後防便空虛單薄了，替劉伯承鋪了一條便於橫衝直撞的康莊大道，讓他馳騁中原腹地，威脅京漢，妨礙長江航路，最後且使平漢南段與北段同一命運。

我早有一比喻，把劉伯承的南下比作象棋中的小卒過河。怎麼說呢？一，乘隙而過；二，本身威力本不太大；三，作用却是極大，可以吸住對方甚多兵力，使其進擊隊伍變爲後防隊伍；四，每前進一步，即當括目相看；五，一卒既過，可能引來其他小卒，所以繼劉伯承之後，陳毅陳賡所部也都活潑起來。等到小卒們串同一氣，玩出合縱連橫的把戲，就個個都成了車馬砲了。

從此之後，兩陳一劉之外，聶榮臻、彭德懷；每個都成了活棋，相互守望，你攻我打。幾個月來，國軍方面南北無數城市吃盡了苦頭，乃至演出石門淩水一類的「全武行」。

這且不說，遠處還有一個林彪，真正的車馬砲。萬一共軍佔領了東北全部，對它真有數說不盡的好處。東西北三面都是鄰國，它可以一心一意地規劃坐北向南的「建國」宏圖，此其一；軍事告一段落後，它可以埋首在東北從事建設，一下子重造它已失去了的延安（「政治中心和精神總樞」）、沂蒙山區（「軍械製造和軍需物資儲藏的總庫」）和煙台（「海上對外的交通補給線」），此其二；林彪的勁旅可以入關長征，此其三。這最後一點，對政府尤其是個直接的威脅。我們暫時只見劉伯承與陳賡陳毅兩人合作，那時則是他與林彪的攜手。若果如此，他又添了一項「過河小卒」的任務：伺機而動，可能直薄士相而向將軍示威。

國軍之所以決心死守東北，準備在遼西走廊背城一戰，就是爲了防止共軍那着猛棋的到來。國軍之所以竭精殫慮地佈置着六省聯防，同樣是爲了預防共軍那着猛棋的到來。

# 自由主義者與中國現局

程 程

1

自由主義成爲一股偉大而不可抵制的勢力，始自美法革命。法國革命時代的口號便是「自由、平等、博愛」。除自由與平等之外，更要求博愛，足見革命者並不服膺所謂恨的哲學，但因路易十四除掉愛「朕」之外別無所愛，於是革命者才設計了斷頭臺。一到此一關頭，自由主義者的口號就又是「不自由、毋寧死」了，換言之，即要跟專制魔王拚一個你死我活。所以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應把「自由」放在第一，把「和平」放在第二；也可以說，自由主義者不到最後關頭決不放棄和平，一到最後關頭就必定毅然放棄了它。

歷史上的自由主義者有其破壞的一面，亦有其建設的一面。本來建設得好的，兩三百年來却逐漸發生了毛病，並且毛病一日重似一日。須知不建築在「平等」基礎之上的「自由」，必定是片面的自由。路易十四時代的一個「朕」，現在化身爲無數的「朕」了，也是除「朕」之外一無所愛，對外成了帝國主義者，對內成了獨佔資本家，取得了侵略剝削的片面自由。如果死死抱住這三百年前自由主義者的老大建設，以爲這就是自由主義的精髓，因而千方百計的使它一成不變，那其實是僞自由主義者，成爲真正自由主義者又一次破壞運動的對象物。

準此而論，自由主義者有其實在的原始的精神，亦有其外在的繼生的新軀殼，忠誠的自由主義者當然珍視前者，鄙夷後者。逆而行之，就是冒牌。若用這個標準來衡度，則五四時代的胡適先生確實是貨真價實的自由主義者，今日的他便算不上了；保皇黨時代的梁啟超先生也是冒牌，但到了反對洪憲帝制時候，他却是貨真價實的了；英國的貝文外相，就其主張擴大國營事業而論，何嘗不是一塊真料，不幸就其主張鞏固大英帝國來說，他又成了「麥其淋」。自由主義之成其爲自由主義，必須竭力保持自由主義傳統的舊精神，一面則讓它生出新血肉來。——並藉此以防冒牌。

2

自由主義者當然應該就是進步份子 (Progressives)。所謂進步，乃是從後一步跨到前一步。保守份子 (Conservatives) 專朝後面看，站住不動，只顧維持現狀，反對改革，故爲自由主義者所不取。進步份子又與激烈份子 (Radicals) 有別。激烈份子專朝前面看，一脚騰空，只顧朝前猛衝，不踏實地，故有時又非自由主義者所願盲從瞎追。自由主義者在保守份子一成不變的最後關頭，便

「毋寧死」了；在激烈份子一脚騰空的當口，則把步伐收穩，不速而達。他有理想，也有步驟。

自由主義者有他的文化觀：文化是逐漸積累而成的，是有賴於不斷綿延的。惟其如此，他固然珍惜一部份舊的，却更憧憬於新的。自由主義者有常也有變，戀舊亦愛新，舍其舊而惡者，取其新而善者，擇其舊而善者存之，識其新而惡者去之。

因此，自由主義者似乎對世間事物更飢渴地要求透澈的瞭解，以定其善惡取舍。他是嫉惡如仇的，好善如好色的，而善惡是非之間，宜乎慎察明辨。一句話：情感之外也重理智。他是崇高理性的。

中國措上五千年的古老文化，早被壓得透不出氣來，衡以今日時勢，尤其顯得落後腐朽，故急求有變，全盤的變，澈底的變，趕快的變。

如果說民主社會主義便等於民主主義加社會主義，那末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者也就不妨稱爲民主社會主義者。中國需要二者一齊來，建造一個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共存共榮的新文化。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似乎對歐洲三百年來的民主制度還有所戀眷，認爲歷史即使發展到地球之上無國界、社會之間無階級的極境，也仍然迫切需要民主制度與民主風尚的承續。

也就因爲需要對於內外古今明辨善惡，慎決去留，自由主義者一面應該是勇敢的建設大師，另一面往往又是謹慎的破壞能手。他有崇高的目的，却不能疏忽應擇的手段。他是有爲亦有守的。

3

目前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對「政協決議」特別懷着一股幽情，是油然的。英國會有一次「光榮革命」，就因爲那回革命的成功竟以不流血的手段而取得。革命已是一種光榮，不流血的革命其實是雙料的光榮。自由主義者向後看一眼，惋惜政協之流產，遂不免有此「幽情」，但是畢竟深知那是「懷古」，於是在認清了撕毀者的面貌之後，又正視前方，放步趕路了。

此時會有一路問題之討論，理論上先來一番澄清工作，我認爲非常有益。自由主義者研究事物，是不厭求詳的。關於應以全力求得民主實現的一點，這是確定了的。然而剩下來却還有大堆問題待解決：時候是刀槍箭弩的時候，自由主義者縱令不走「中間」的途徑，但單憑疲舌焦唇和一枝破筆，實在已遠落在「民主路綫」的中途了，此其一。建築民主大廈的議案是被通過了，可是圖案如何設計，骨架如何拼攏，裝置如何進行……却仍懸而未決，此其二。對方的面貌並不模糊，然而老百姓却無辜成了犧牲品，這不能不是塗抹

不掉的遺憾；所以民主之及早實現與和平之及早恢復，仍是自由主義者夢寐以求的，那末應有什麼具體可行的辦法？此其三。政治是複雜之極的一樣東西，人們除擇善固執而外，也應該以現實的眼光權衡利害得失與內外微妙的萬端變化，此其四。

自由主義者在其實際奮鬥工作的過程中，又須對此四點時時體察，妥善把握。

大公報認為「自由主義者既無意奪取政權，所以也談不到施政綱領」（該報一月八日社論：自由主義者的信念）。這實在近乎說笑話。自由主義者誠然不必先天存着「取而代之」的雄心，可是在必須挺身而出，担負神聖使命的時候，却不能畏葸不前，見義不為。自由主義者也可以有他們的施政綱領。因為既

## 中國政府關於對日和會的態度

范承祥

### 一、強硬

自去年八月初美國提議召開十一國對日和約初步會議以來，中國政府關於這個問題的態度，有過三次的變化。

最初，中國政府的態度是基於以下的兩個原則的：一、不願撇開蘇聯而單獨對日媾和，亦即打破美國若干方面亟圖進行的「不願蘇聯參加與否，美國決意行發出召集和會之邀請書」的想頭；二、不願放棄棄否決權，亦即不擬贊成美國所提英國贊助的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制，但對這一點却還要看別的國家如何主張。

中國政府的這種態度，首見於王外長世杰出國前的談話（九月五日），他說：

「本年七月，中國政府曾就美國關於召開對日和約預備會議之建議，聲明對於該項會議內所適用之否決權，如其他各國均能贊同，則中國政府願作若干讓步；但中國曾明白聲明，如蘇聯政府拒絕參加美國所提議之會議，則中國將對此事重新考慮其立場。現在有人談論「單獨媾和」，中國認為我們不可輕作放棄某些國家之合作而單獨與日本媾和之擬議。吾人努力之目的，應該是訂立利於全體盟國而且為全體盟國所共同支持之和約，兩惟有此種和約始能使吾人充份享受和平之益。」——（九月六日滬各報）。

九月十九日，王外長在紐約接見合衆社記者，又一度地申明這個立場說：「如美國邀請十一國立即舉行對日和會，中國將與蘇聯一致加以拒絕。」——（九月廿日合衆社紐約電）。

王外長這個態度是充份得到行政院張院長的支持的。九月七日，張院長在國府紀念週演說，表示「中國不擬參加無蘇聯出席的對日和會」——（合衆社

然成爲一種主義，就可能產生賴以聯繫信託的共同組織；「自由」並不排擠組織，自由主義者也並未喪失結社自由。自由主義者的命運，不容註定僅僅充當招標者的角色，他也可以是個投標人。

4

凡是從政或論政的自由主義者，還有二忌：一是忌空心，二是忌空頭。在提出主張之時，忌空心，應該完全站在「人民本位」，從正義出發，以大衆福利爲依歸，否則便是前文所述的冒牌；在認識事物之時，忌空頭，應該力求冷靜，發揮理智，否則也不過一時優遊於「烏托邦」的夢境而已。

一月十九日，深夜。

華盛頓九月十日電。過了兩個星期（九月廿五日），張院長在北平演說，又這樣指出：「以對日和約爲例，美國主張早日由遠東委員會起草和約，多數通過後即可成立；我國則認爲十一國中須有三分之二國家贊同，且此三分之二國家中須包括中英美蘇四國。蘇聯主張由中英美蘇四國起草和約，而中國則認爲十一國共同起草亦無不可，惟十一國中必須有蘇聯參加。」——（九月廿六日滬各報）。

由上面所引張王兩氏的言論，可知中國政府在這一個階級中的態度，着重在打擊「美國擬發出請柬與聯合國大會同時舉行十一國對日和約預備會議的意向」——（合衆社九月十九日華盛頓電），所以一再強調「必須訂立利於全體盟國且爲全體盟國所共同支持之和約」。至對否決權的保留問題，直到王外長抵達紐約以後纔被作爲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 *Sine qua non* 事實上，王氏在出國之前還曾準備「對否決權作若干讓步」（參閱前引九月五日談話）；在九月九日他抵達舊金山時對外籍記者的談話中，也只重申「吾人之目標爲一受衆人支持之全體和約」，而不會特別提到否決權。他第一次把否決權與全體性和約聯在一起，見於他九月十九日對合衆社的解釋中：「中國之所以不能接受美國邀請，其理由與蘇聯相同，即美國建議中不包括四強之否決權」。中國政府的這個態度直維持到十一月中旬爲止。

### 二、軟化

十一月初，王外長由美返國，道經日本。抵達國門後，立即發表談話，對麥克阿瑟促成日本民主化的工作和成績，贊揚備至，同時並勸告中國人士應多到日本去看看，免得爲某些傳說所誤。這段談話正暗示了中國政府勢將改變其關於對日和會態度的可能性。



十一月十七日，中國政府向英美蘇三國提出如下的建議：「一、由遠東委員會所有會員國組成對日和約預備會議，該會議應由中美英蘇從早商定日期予以召開；二、該會議之表決均以該會議全體會員國之多數為之，但該項多數須包括中美英蘇四國之同意票」。路透社評論這個建議說：「中國原已接受美國之邀請，後於蘇聯持反對意見後，又變更其態度，亦表示贊成由外長會議之基礎討論遠東和約。今茲所提照會則似又重新同意美國之召開十一國會議之原則，惟在程序方面則主張採用遠東委員會之議事程序，似係代表美蘇間之折衷意見」。中國這一新行動是對美國的一個極重大讓步；這樣一來，問題的重心便由「全體性和約」轉到「否決權上面」了。

蘇聯對中國建議的答覆，仍然堅持其一貫的態度，主張一九四八年一月在中國召開四外長特別會議，考慮與對日和約有關的各問題。十二月七日，外次葉公超發表申明，答覆蘇聯建議說：「中國政府認為無論在組織方面或表決程序方面，對日和約預備會議均須與業經十一個會員國一致贊同之遠東委員會所採之原則相違異」。同月十三日，英政府也對中蘇建議分別提出答覆，「坦率加以拒絕；並且反對中國主張由遠東委員會國家參加對日和約的意見，而要求「凡對於擊敗日本有所貢獻，對於日本侵略會蒙損失以及對於太平洋區域未來和平發展具有生存攸關利益之一切特別有關國家，均應參予」——（倫敦十二月十三日廣播）。

### 中國政府高級官員就英國覆文發表如左的評論：

「一、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中從未使用否決權，並一向反對濫用否決權，但中國為對日作戰最久之國家，故對於管制日本武力再起而侵略一點極端關切，並亟冀獲得保證，而否決權之存在乃此種保證之最佳形式，惟中國之目的乃在獲得保證。二、中國認為在目前形勢上，對日和約欲求有效，必須蘇聯參加，故中國之希望蘇聯參加，乃為尋求使對日和約趨於有效之途徑，一面乃為信守中蘇條約之規定（第二條）。三、中國對於民主和平之日本並無任何歧視或偏見，惟中國希望日本此後非但在政治上，且在經濟上亦不致危害中國之利益。四、總之，中國希望對日和約早日圓滿完成，且能切實而有效的實施，使中國之安全獲得保障；中國政府深切明瞭美國早日結束佔領任務之願望，並對麥克阿瑟將軍所執行之對日寬大政策，只要其無害於中國之政治經濟利益，並無任何成見或反感」——（新聞報南京十四日專電）。

同月十五日，東南日報南京專電報導外交界人士所透露的確息，說「中國政府認為如不能保持否決權，則我國可能拒絕出席任何有關和約之會議」。

根據上面這些來分析這一階段的中國政府態度，可以清楚看到問題重心的移轉。美國雖然仍在考慮是否撤開蘇聯進行召集對日和約的問題，但中國政府却已沒有了過去那樣十分強調蘇聯不出席，中國也不出席的強硬態度，而僅含糊地表示希望蘇聯出席而已。此外，對於日本的想法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已經

公開承認日本是「民主和平的日本」，並且明白贊同麥克阿瑟的對日寬大政策了。凡此種種，都可看作是中國態度已經開始軟化的表現。

### 三、轉變

十二月十五日倫敦四外長會議的最後破裂，把中國政府的對日和約態度，帶上了一個新的，也就是第三階段。

在倫敦會議宣告破裂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六日），駐美大使顧維鈞訪晤助理國務卿阿摩爾，商討援華及對日和約問題。事後，顧氏談稱：「若中國對日本和會之折衷建議不為蘇聯及英美所接受，則吾人將不得不慎重考慮吾人之立場——（合衆社華盛頓十六日電）。十八日，王世杰外長又約美國司徒雷登大使「作一小時半的重要談話」，對世界及遠東大局作深刻檢討，再盼美國「支持我對日和約立場」。這兩個消息，暗示中國的對日和約態度又有了更進一步轉變的預兆了。而最能作為中國外交可能有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指標的，是大公報南京四日的專電：

「據可靠方面最近得到的消息，美國在倫敦外長會議失敗以後，對於召開對日和約問題，不僅研究中國的建議，並且重新作全盤的考慮，所以一直沒有答覆我國。美國正考慮：一、還有沒有方法可以促成蘇聯能參加的和會；二、召集沒有蘇聯參加的和會。但是中國建議原則上要有蘇聯，如此必先疏通中國。美國方面近來對不單獨對日媾和一點，有一種新解釋。不單獨對日媾和，是單獨對軍國主義的日本政府媾和。現在停戰多時，日本新憲法訂定剷除軍國主義，且為十一國所承認，單獨媾和有何不可？這一觀點預料不久要表面化。中國方面對日和約問題大致要等美國覆照到達之後，再從長計議。」

這個專電的見解，是在蘇聯第二次對中國提出照會，再作讓步，建議「遠東委員會其他會員國可參加外長會議依照對德和約工作先例而可能設立的各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工作以及關於情報磋商之會議」之後約五天。蘇聯這建議，在一般英美觀察家看來，是「迫令中國對這個問題究竟附和英美抑或附和蘇聯，明白攤牌的」。這一點相當值得注意。

接着在十一月十日，新聞報又發表了一篇題名「關於對日和約的兩大問題——否決權與單獨媾和」的社論，把大公報專電加以更詳細的引伸。其關於否決權的一段說：

「我們痛定思痛，在從事議和工作時，非堅持有相當的保障不可。一部份盟國或謂彼等利益大致與我們一致，我們沒有保留否決權的必要。但是我國國民受創過重，如果沒有這項保證，講和時的心理實在感到不安。我國歷來在國際會議席上，向探理智態度，決不濫用此項權力。而且各盟邦利益既與我無衝突，則對於我們行使此項權力，無須憂慮，不必反對我們所要求的心理保障」。

關於「單獨媾和」的一段，它說：

「最近有人以為我國與蘇聯訂有同盟條約，蘇聯如不参加和會，我國也未便參加

。其實，中國政府的考慮只有政治而不在法律方面。就政治方面言，對日和會如無蘇聯參加，其結果將不能圓滿徹底，若干問題將無從解決。至就法律方面論，中蘇兩國亦如其他盟國一樣，對於媾和或締結和約，享有相同的自由，並無特殊的約束可言。蓋就單獨媾和言，現時已無所謂對日單獨媾和，因中蘇英美等盟國已一致接受日本之投降書。就訂結和約而言，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雖規定中蘇兩國不得與「現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棄一切侵略企圖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權」締結和約，但中蘇條約訂立時之日本政府既已推翻，而且多數正交付審判，其現在政府亦已於其新憲法中明白聲明，「永遠放棄國家有從事戰爭之權力，並不以武力之使用或威脅為解決國際紛爭之工具」，而該憲法並廢除遠東委員會十一國一致核准，故中蘇條約第二條實已沒有適用的餘地」。

以目前大新聞兩報與政府關係之深切，可知縱使上面兩段話不一定能正式代表官方最近關於這個問題的新態度，但至少是暗示官方確有這種新態度存在着，而且是十二分有力地存在着。這新態度可以說是基於兩個原則的：第一、中國所要求的否決權只是一種名義的否決權，中國可以保證決不加以使用（或者說「濫用」吧），各盟邦應該讓中國保持這個名義的否決權，給中國一個下台的機會；第二、中國已準備在法律上放棄中蘇條約中「不單獨媾和」的約束，但在實際政治上則必須以美國明確保證援華為代價。

拿這新態度同半年之前中國政府的態度相較，僅僅幾個月工夫，由堅持否決權退到僅僅只要保持名義上的否決權，由不擬參加無蘇聯之對日和會退到明白表示法律上中蘇條約不單獨媾和條款無適用餘地，這變化該多麼大啊！

#### 四、皮球

為什麼會有這樣劇烈的變化呢？

這就必須指出，中國政府態度的變化，是與所謂美國援華問題的變化與發展，有着密切關係的。說得直率難聽些，對日和會問題被用來作為爭取美援的一種外交皮球。

當對日和會問題甫由華盛頓發動之際，正魏德邁訪華行將告一段落之時。由魏氏對蔣主席的談話中，由魏氏離華申明中，可以看出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態度非常嚴峻，非常不滿。當時一般政府官員不是感到當面被人吐口水，面子上實在下不去，就是感到美國對華可能僅予極少援助，而却要求過鉅代價（如希臘式的監督）。因此，一方面為了挽回政府的面子，一方面也是為了要挾美國改變援華態度，所以中國政府纔在對日和會問題上給美國一個嚴厲的反擊，並且由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氏親自出馬，兩次發表「中國將重新考慮親美或親蘇」的談話，以為配合。

中國政府這一階段的作法，被若干官方報紙譽之為「主動外交的運用」，又被另一些外國人詆之為「幼稚天真的敲竹槓手段」。但不論怎樣，却的確發揮了相當的效力。第一、據說「自中國決定與蘇聯採取同一立場堅持對日和

會中應保持大國否決權後，美國擬發出請東與聯合國大會同時舉行此十一國會議之意向，已告打消。美國本擬在數日內發出請東，然中國之立場在過去一週中已趨強硬，故有舉行中美商談以寬取對於此問題之協議之必要，因為「無蘇聯參加，美國仍願召開和會，但無中蘇兩國參加，則不能進行」——（合衆九月十九日電）。這就是說，中國手裏搞到一張可以同美國討價還價的王牌了。第二、自中國在對日和會問題採強硬態度之後，美國的援華冷淡空氣逐漸有些轉變，「若干官員以為，美國在戰爭甫過之際，不應關切中國之政局，而應立行採取步驟以增強中國之經濟」。

憑着這張王牌，王外長飛往美國，分別與杜魯門馬歇爾會談，發現「以美國對蘇一般政策而論，美政府的有意棄置中國現政府，將是一件極難想像的事情」。而美國方面，一些親中國政府派的要角如魯斯等人，也發動了大規模的援華運動（如蒲立特報告書，周以德不斷演說之類），來盡力把冷淡中國的空氣搞得熱鬧起來。中美之間自魏德邁臨別申明發表以來的蹙眉空氣，於是大大呈現轉機。接着，就傳出來「我本年內獲得美貸之希望漸濃，其數額不如希望之高，且有可能分為幾小部份陸續付給」（大公報十月廿五日），「美陸軍顧問團將擴大」（同日新聞報），「美國援華在原則上已決無問題，待決者厥為具體行動之方式與時期」（廿九日申報），「中美救濟協定簽字」，「中美換文由中國政府請求美軍繼續駐紮中國」等等一連串的消息。美國援華，在原則上可說完全確定了，雖然實現還有所待。

在這一階段中，中國政府既礙於面子，不能出爾反爾，立即同意美國召開和會的主張，而在實際上美援既未真正到來，也樂得再把這隻對日和會的外交皮球踢上一踢，所以，其一切表示都是外呈強硬而內實動搖。她一面以美蘇之間的調停折衷者自居，一面則把責任推向蘇聯身上。如合衆社華盛頓十二月三日電就說：「中國之所以採取目前態度，由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會規定中蘇均不得單獨與日本媾和。如中國應英美之邀請參加和會，而蘇聯拒不出席，蘇將認中國違反友好條約，而將該約全部取消。然如和約問題延而不決，為日過久，則中國最後將冒險接受英美邀請，參加不用否決權之和會」。事實上，中國雖然提出折衷的建議，但「正與倫敦及華盛頓方面有所諮商，同時亦擬同意目前倫敦秘密會議中所將產生之任何計劃之廣泛細目」——（中央社東京九日台衆電）。

等到倫敦四外長會議破裂之後，全世界向兩極分化。這時合衆社南京十六日透露中國政府在對日和會上的新動向是：「倫敦會議之破裂，並無值得驚異之處。若干官員以為此乃美國在反共戰鬥中加緊援助國民政府之信號。如倫敦會議之失敗使美國放棄與蘇修好之努力，則美國對於援華將不再踴躍不進。外交方面指出，由於美國對中國援助至今無定局，中國處境危急，故中國外交政策為折衷美蘇見解，尤其關於對日和會程序一節。由於外長會議決裂，美蘇

間裂痕擴大，中國必重行擬定外交政策，預料中國外交部將密切注視英美下一次之行動以決定其方針。如西方國家在歐戰進行締結和約並宣佈將以同一方針處理日本，則中國與英美之合作將取決於兩項因素：一、西方國家保證中國之主要要求；二、如中國在締結對日和約後與蘇聯發生糾紛，由美國明確保證協助中國。除非美國繼續援華一無疑問，中國當不致率爾參加對日和會。

由這一段電訊所反映出來的中國政府這一階段的外交運用，是原則上已站在英美一邊，但在手法上仍然要把對日和會問題當作皮球踢一踢，希望踢出「美國明確保證繼續援助中國」的結果來。而前面第三節中所引大報專電和新聞報社論，都是踢皮球的姿態之一，其目的在替中英美對日單獨媾和開路。

## 五、錯誤

站在一個純國民的立場來評論中國政府關於對日和會問題的態度，我認為它不僅錯誤，而且危險。

拿對日和會這樣一個攸關國家百年命運的大問題，來作為爭取美援的外交皮球，而這美援的目的又是為了進行內戰，這在基本上就是錯誤的。關於這一點，此地且不去說它。

中國外交的另一錯誤，在於自己放棄八年抗戰所辛苦締造的世界領導國家之一的地位。

許多批評家把對日和會的僵局擬結，分成兩組爭執：一個是四外長會議主持起草抑召開十一國會議起草；一個是四國一致同意抑三分之二通過。這分別是不錯的。但他們認為十一國與四國之爭不關重要，重要的在否決權；這就完全錯了。因為在事實上，這兩個爭執是一個問題的兩面——不可分割的兩面，破壞其一就必然破壞其二，擁護其一也就必然要擁護其二，斷無只贊成一而反對或不要另一個的可能。

如所週知，在大戰還沒有結束的時候，盟國領袖們就已經為戰後世界安排下兩個基本制度，也就是所謂開羅——雅爾達——波茨坦路線：一是四強領導（後來加上法國），一是四強一致。前者的具體表現便是四外長會議（後來加上法國）的設立，一切戰爭期間以及戰後的重重大問題都歸這個機構來解決；歐亞兩洲的和約締結工作，因為關係到今後多年的歐亞政治歷史，所以尤為外長會議所注意。後者的具體表現便是所謂否決權，也就是任何重大事情的解決，都必須先行取得四強一致的同意。為了維持四強領導制度的有效，就須四強能夠真正團結；而為了維持四強的團結，就必須四強能夠一致。所以也可以說，後一原則是以前一原則為基礎的。假如不是「四強領導」，而是「一強領導」，那四強一致的原則當然就沒有保存的可能；假如一面承認「一強領導」，一面又要隨時保留對這個一強反對或否決之權，那怎麼行得通呢？

中國在對日和會問題上所作的折衷建議，不幸得很，就陷在這個錯誤裏。

原來從戰爭結束的一天起，美國就已有不願在遠東維持四強領導和四強一致制度的意向。不過由於戰爭剛纔結束，對人民方面無法交待，所以不能不勉強維持這個開羅——雅爾達——波茨坦路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中，關於遠東委員會與麥克阿瑟總部之間權限劃分問題的爭執雖然激烈，最後打底還是依循四強一致原則組織成立，其故在此。到了一九四六年春，李普曼——邱吉爾等的「英美核心同盟領導世界」之說突佔勢力，終於逐步逐步地代替了戰時的「四強領導世界」的原則，於是開始處處與蘇聯發生衝突，戰後這兩年的全部世界鬥爭，也可說就是「四強領導，四強一致」路線對「英美核心同盟稱霸世界」路線的鬥爭。在這種情形之下，四外長主持對日和約起草工作與十一國會議共同起草對日和約，就不是一個程序性的爭執，而是一個原則性的爭執了。美國的片面召開十一國對日和約初步會議，就是表示美國不承認「四強領導制度」在遠東尚有適用的餘地；蘇聯的堅持必須先舉行四外長會議，就是表示蘇聯堅決要求一定要在遠東也適用「四強領導制度」。美國的企圖如彼，自然不能讓任何國家保持否決權，因為十一國中除中蘇兩國外，絕大部份都是英美集團的兄弟兒女，英美兩國宛如家長，如何能够讓外人在自己的兄弟兒女面前丟自己的臉？蘇聯的要求如此，自然也不願稍為放鬆一點，因為如果在原則上偶一放鬆，就等於自己破壞了戰爭中賴以贏得勝利的制度。

這是兩個極端，非揚即墨，非白即黑，其間絕少調和折衷的餘地。然而中國却偏偏提出了折衷建議。中國反對四外長先行集會主持和約起草工作，表示中國已經心甘願地放棄了四強領導制度，自願退而接受英美集團的領導；但這放棄又放棄得勉強，放棄得拖泥帶水，因為她還想保持否決權，準備在萬一的時候對英美集團的領導權來一下反抗。這樣基本上對英美集團遷就，表面上還要作出一付只選就一半的樣子，充分暴露了中國外交的無立場，無原則與軟弱性，當然難怪美國報紙要耐不住性子，斥責中國政府「雖然依賴着美國的援助，但仍拒絕和西方強國採取同一立場」，「中國政策背後存在着卑鄙的詭計」。中國外交運用上的這種錯誤，使中國政府受到很大的侮辱，這是很足以令人憤慨惋惜的。

## 六、危險

當然，中國政府的這種折衷態度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實際上，種種徵象說明中國的態度最後極有可能向「對英美集團完全屈服，隨同英美集團單獨對日媾和」的危險方向轉化。

若干報刊在單獨媾和的法律方面，已在替政府開路，說什麼單獨不單獨媾和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這種解脫的辦法，實在太牽強了，難於令中國人民心服。試問，日本憲法上僅僅提過一句「放棄武力及從事戰爭之權力」，

而實際上則軍國主義仍然存在，軍事與經濟武裝亦未澈底解除，我們就可以承認這個日本是已經「明白放棄了一切侵略企圖」的日本，而與之單獨媾和麼？這樣的單獨媾和，恐怕不是身經八年苦戰的中國人民所能够同意和承認的。

再說，美國的對日政策目前正向積極恢復日本戰爭潛力的途途邁進。這一點，一月六日的美陸軍部長羅雅爾廣播辭已經很明白坦率地昭示天下了。他說：「我們固然不能讓日本保持其作戰機構，但也不能不顧慮到將來在遠東另有發動極端主義戰爭的可能」；換句話也就是說，爲了一扶持日本使足以抵擋這個可能的戰爭威脅，美國將幫助日本建設，使成爲強盛、安定、自給自足的國家。我們當然不反對日本安定、強盛、自給自足，但在日本法西斯依然存在並且相當強大的現狀之下，一個強盛的日本對於中國和遠東和平的威脅該多麼

## 改革幣制之謎

最近很多可笑的理論，例如：平抑物價，端賴銀根抽緊，而抽緊銀根祇有停止工資。不幸這種理論作爲當局施政的依據，而結果怎麼樣呢？物價反見狂漲，另方面工業界因資金週轉困難，蒙受重大的打擊，頻於破產的危境，迫得上海與華北的工業界紛紛請願。這不是當局自己招來的麻煩？而且也正式宣告這種理論的破產了。

現在，惟一幣制改革萬能一的理論，從幾方面喊出來了。首先是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黃元彬氏，認爲「截至去年十月底止法幣發行總額爲二十八萬億，約爲戰前之一萬倍，而物價則漲至十萬倍，是物價高漲之原因，法幣數量佔十分之一，所餘十分之九，全在人民不信仰法幣，人人從事投機，貨幣流通速度過速所致」，因此，主張祇有改革幣制，纔能解救當前的經濟問題。另有金融日報一月十日的社論說：「我們目前又遭遇到了新的危機，如果這個危機不能在短期內獲致美國足額需要的援助借款，其後果將不僅是軍事上無戰鬥士氣，恐怕整個國民經濟將走向崩潰之路」，一旦美援如果成功，則「吾人主張首先要利用以改革幣制，使幣值穩定」。至於新聞報則更坦白的說：「我們認爲改革幣制是必須實行的，而且，已到了不可再緩的時候」。以學者專家的資格發表主張的有劉大中教授，「在更換新幣的時候，政府可以借用這箇機會用種種方法去穩定幣值，更換新幣本身就可以是穩定幣值的一種手段，蘇聯便是最近使用這種方法的一個國家」（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公報）。因此，劉教授認爲蘇聯可以做到，我們何嘗不可以呢？在牢獄中悠閒自得的周逆佛海，也趕上這個改革幣制聲浪的熱鬧，著有「解決當前經濟問題及改革幣制」一書，約五萬字，而且，有關當局已以之作爲參考了。（見正言報）

在各種改革幣制的獻策中，以恢復銀本位的說法，最爲具體，也最爲響亮

大。美國這種對日政策，我們如何能盲目追隨？美國爲了要實現這個政策並使之合法化而召集的對日和會，我們又如何能貿然參加？

此外，單獨對德日媾和之說，一年來在美國已經有胡佛等人不斷提倡過，但迄今爲止美國尙且還須慎重，始終不敢單獨對德日媾和，可見美國也還在再三估計單獨媾和所可能造成的嚴重結果。看今天的情形，無論對德對日，單獨媾和恐怕都不是短期內可能實現的事情，恐怕都還有一個相當時期的猶豫。爲世界與遠東的和平，爲中國本身的利益，我以爲，中國政府只應該竭力阻止世界分裂的行進，而不應附和着人家分裂世界，甚至還用一願意單獨媾和一的暗示來鼓勵別人分裂世界。這後一作法實在太危險了，太違反中國人民的利益了！

卅七，一，十七。

林滄白

例如：國務會議的特種小組會議，最近就會經強調恢復幣制的必要，另據自美國考察回來的政府某要員談，「美國民間一般輿論對援華問題，咸主張借大量白銀與中國，蓋其國內白銀過剩，若干礦廠均因之停工，據渠等估計，借三億盎司白銀與中國，即可改革幣制，此項白銀約值美金三億元」，而最近派遣出國的貝祖貽氏所攜帶的方案，據聯合社電傳，其中改革計劃之一，即爲改用銀本位。

這說法較爲可靠，因爲政府當局可能有這樣的想法，就是在法幣政策以前使用銀元的時代，那時，不也是東征西伐，內戰頻仍，但那時的物價沒有成爲問題，萬惡的通貨膨脹，連影踪都沒有，何況民間對於銀幣信用極高，至今還是有着好感，因此，對於銀幣就不禁神往，認爲祇要改革幣制，實行銀幣，今天的經濟危局就可以起死回生了。而實行銀幣的計劃，向美國提出，也可能較爲順利的得到結果，因爲，如所週知，美國有「白銀議員」，這些議員祇要白銀有出路，就會贊成加以支持，前次來華的美議員裘德（亦有譯名爲周以德者），就會經向政府這麼暗示過：美對華經濟援助可有較好的藉口，可向美國提出此項計劃，而裘德在其國內和「白銀議員」，也不無關係，如此一來，幣制改革不就可以順利完成了嗎？至少，以改革幣制爲名而得到借款，不正是達到目的了嗎？依「幣制改革萬能」者的見解，國內一切經濟問題不就可以解決了嗎？

這種「幣制改革萬能」的理論，是不是像第一節所說的那種可笑的理論一樣，終有一天會宣告破產？現在不從理論上來加以批判，特提出幾個事實問題來說明實行後後果的嚴重，來作爲研究者的參考：

第一，誰都曉得，目前中國的改革幣制，決不同於蘇聯最近這次的幣制改



革，蘇聯這次幣制改革，是其戰後二年建設成功的結果，是財政平衡，生產與消費平衡的成果。在戰後新五年計劃中，曾有如此規定：「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期間，其他商品的配給制度亦擬取消，在廢止配給制度和不斷減低物價的基礎上，開展蘇聯商業，鞏固貨幣的流通並大大增加蘇聯盧布在國家全部經濟生活中的意義」，一九四六年農產歉收，蘇聯的歐洲部份旱災，西伯利亞則淫雨，所以，史達林宣布配給制度將在一九四七年才能取消。一九四七年豐收，因此，就在這年的最後一月，配合配給制的取消，為改進人民，尤其是工農的生活，就實行了這一改革。另一方面，蘇聯的財政收支，一九四六年支出總額為三一·九·三（單位十億盧布），收入總額為三三·三·〇（單位同上），一九四七年收入超出支出，更為顯著；支出總額三七·一·四（單位同上），收入總額四〇·一·七（單位同上），一九四七年歲入比歲出超過二百億盧布，因此財政已恢復了平衡。至生產則更有極迅速的增加，一九四七年秋，食物比去年同期增百分之四十，七月間宣佈一九四七年穀物豐收，已打破一九四七年的紀錄。農民向國家繳出穀物超出限額，輕工業品一九四七年七月的生產量比去年同期超過百分之五十，棉織品比去年同期超過百分之四十五，靴鞋增百分之五十一，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已經完成五年計劃中本年九月份的標準。蘇聯現在擁有黃金，值一百七十億美元，比美國少五十億美元，黃金準備至少在一億二千萬兩。在這樣的情況下，蘇聯實行幣制改革，也才有可能，「更換新幣本身就可以是穩定幣制的一種手段」，這一點，想必劉大中教授是知道的。那末，中國目前不能像蘇聯一樣來一次幣制改革呢？

第二，如果幣制改革了，而且是恢復銀本位，那末，白銀在中國為貨幣，而在國外則為商品，以這種雙重性格的白銀作為貨幣，則這種幣制將充滿波動性，毫無自主的氣味。在銀本位時代，如果金貴銀賤，則我國的國際支出（尤其是賠款），必須加倍的支付，如果金賤銀貴，則又有白銀外流的危險，這種進退兩難的苦痛，至今記憶猶新，怎麼就可以置之不顧了呢？如果認為銀本位時代，雖年年內戰，而物價不見上漲，也沒有通貨膨脹，因此就主張改革幣制，則真是漠視了那時工商業的艱危，人民生活的痛苦，而且，那時的中國，也不同於現在的中國啊！

第三，財政的收支平衡，至少有平衡的可能，實是改革幣制的先決條件，可是以目前的情勢來衡量，實在看不出有走向平衡的趨勢。三十六年度的財政收支，即使照政府當局的報告，支出四十萬餘億元，為原來預算九萬三千億元的四倍半，收入僅十三萬億元，赤字亦達三十餘萬億元之多（另據經濟週報六卷一期的估計，則至少在四十萬億元以上）。三十七年度上半年的預算，預計收入總額為五十八萬億元，同期支出總額則達九十六萬億元，赤字亦近四十萬億元之鉅，這鉅額赤字以歷年為例，祇有靠發鈔票，在這樣的情形下來改革幣制，豈不是冒險之舉？論者認為只要改革幣制，幣值即可穩定，甚或可以達到

財政收支的平衡，這是騙人的鬼話，其結果必致改革幣制以後，過不了許久，而新的貨幣又在貶值，新的貨幣再失去了信用後，物價上漲的速率將反而更增加。當勝利後的第一年，政府兌換偽幣，物價僅在極短促的期間一度下降，但不久即又回升，而且升得很快，這理由很簡單，就是由於因內戰需要，財政無法平衡，而急速的通貨膨脹則使幣值貶低。這慘痛的教訓，怎麼可以不記住呢？

第四，換發新幣，無異是政府向人民賴一次債，把已經發出的紙幣，硬來打個折扣使用，這對人民的損失多大！新舊幣的折合率是否公平，是否能顧到極大多數人的利益這點姑不具論外，如在上述財政無法平衡的情形下改革幣制，則新幣不久就變成舊幣，再加上折合率的不合理，那不是又一次的財富再分配，便宜了若干人，苦了若干人，把社會的財富更向少數人集中？這點，我們要特別提出來的。為了支援內戰財政而改革的幣制，受損害的將是最大多數的人民，這包括工業家，銀行家，企業家，正當商人，以及薪資勞動者，及農民。如銀本位實行一時無成效後，再度改革幣制，將予國民經濟的禍害多麼巨大！

在今天的情形下來改革幣制，將是弊多利少，肥了少數人，害了多數人，予國民經濟巨大的摧殘，這是可以預見的，然而，正如金融日報的社論所說：「目前又遭遇到新的危機」，如果這危機不加以克服，則「後果將不僅是軍事上無戰鬥士氣，恐怕整個國民經濟將走向崩潰之路」，這正像一位游泳者在極端危急的時候，僅祇是一顆小草也得拚命拉住，「幣制改革萬能」者之所以認為改革幣制可以解決經濟上一切問題，也正和這種情形相仿。須知經濟危機是政治危機的反映，不從這方面努力，其結果如何，是可以預見的。

在今天，改革幣制雖然有種種弊害，但由於當局主觀願望的迫切，也未始沒有實現的可能。至於什麼時候實現，這是很難說的，大約須視下列兩件事而定：

第一，看美貸何時成功及數目多少。目前改革幣制，自不能以紙幣調換紙幣，而必須要有準備，因此，不論當局所擬議的金本位制度，或者銀本位制度，都需美貸的支持，而且，這筆美貸，至少在三億美元以上。以金本位說，即金匯兌制，也叫做虛金本位制，其運用的原則，即法幣對內價值（購買力）用對外價值（匯率）來維持，這做法就需要一筆鉅款的外匯平準基金作為調節的用途。銀本位則須美貸來買白銀，鑄製新的銀幣，同時，對外價值為避免波動，也需要外匯平準基金來維持。所以，何時改革幣制，要看美貸何時成功及數目是否在三億美元以上。

第二，依據法幣兌換偽幣的經驗，以及觀察當局者的打算，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改革幣制的計劃還沒有成熟，則依我們的想像，政府會以改革幣制作為神聖的武器，來支持法幣免趨崩潰，所以，就會出現新舊幣折合率非常之



低的宣傳，以抬高法幣的身價。如果，一旦到了改革計劃成熟，將立即實現的時候，則低幣值的宣傳將改為高幣值了，因為新舊幣折合率高，則舊幣的身價愈低，新幣的身價就愈高，這可以幫助新幣的穩固，而對政府有利。而且，這

## 金融管理之分析

郭大力

一月十六日。

十一月猛烈的物價漲風，留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結果：金融管理。金融管理的公開的目的，是要「防止各地金融機關之投機及非法活動」。它不僅要負責審查檢舉「國家行局及其信託部或其附屬機構之放款匯款投資及其他交易」，並且要負責審查檢舉「省市銀行，中外商業銀行錢莊，信託公司，保險公司，信用合作社及其附屬機構，或其他經營金融業務之行號之放款匯款投資及其他交易」。照它的組織規程看去，它是要實行一個全面的管制，想由此達到「安定市場」的目的；因為，那不只把一切金融機關，官營的和商營的，包括在內，並且把金融業的全部業務包括在內了。它的第一個方案是限制匯款，第二個方案是收縮信用。

如所週知，這一次漲風，是有一些特別的原因可以指出的。資金益益向他們認為安全的地帶集中。華北華中的緊張局面，在驅使大量資金向中國的東南角流。內地農村的不安，也正促使農村上層社會，驅他們所有的資金，向大都市流。

但這只是資金逃離的第一步。當資金益益集中到大都市來時，逃離的第二個步驟就成了必然的。他們不只要政治的安全，而且要經濟的安全。化成黃金或外國貨幣，在這些逃離者看來，自然是最簡易也最確實的方法了。大概就是爲了這個理由，所以在這次漲風中，黃金和色紙始終是最凸出的，其他物價暫時並沒有能夠趕上。

這樣，當金融管理規程要予匯兌一種限制時，它自然不是毫無目的。投機

的存在，是不容否認的。資金是在逃避。  
但這顯然只看到事實的一個表面。資金會從內地流向都市，再由都市流向更遠的避難所（比方說香港），那是資金求安全的心理的必然表現。在政治局面和經濟局面如此不安的今日，要以限制匯兌的方法，來阻止資金逃離的趨勢，自然是不易收效的。並且，即使收效了，結果也不必有利的。資金被強迫留在農村內地了。這樣被強留在農村內地的資金，將會做什麼呢？那是會提早使農產物的價格激漲起來的。

金融管理的別一個方案，審查並且檢舉金融機關的放款和投資，不外就是要由信用緊縮，來挽救當前通貨膨脹的危機。

以信用緊縮的方法來救治通貨膨脹，不是什麼新奇的理論。反過來，那寧

個時候可能有更大票面額的紙幣出現，以及政府的大量收購物資。留意這些現象的變化，對於幣制何時改革的了解，可以有幫助的。

說是近世極爲普通的銀行政策。現代一部分貨幣理論家提出這個理論時，是把注意寄在十九世紀以來苦了無數人頭腦的商業循環上面。他們看到商業繁榮的結局只是恐慌，物價上漲的結局只是物價暴落時，才想到繁榮和物價上漲的原因，而以爲那是通貨膨脹。當他們再知道這樣的通貨膨脹實際就是信用膨脹時，他們並沒有想要從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說明信用膨脹何以會週期的發生，而只想要以時的信用緊縮，來防止那在結局上會引起物價暴落的通貨膨脹。真理只是這樣：當繁榮由一次恐慌來結束時，那是由一次強迫性爆發性的信用緊縮，來結束暫時的繁榮；當他們要由及時的信用緊縮來防止恐慌時，無組織的資本主義社會，就被視爲是有組織的了。

所以，這個預防方法也包含一種幻想。  
但這個包含幻想的方案，至少在外表上沒有任何可笑的地方。這樣的通貨膨脹，原來和信用膨脹只是一件事。它雖然沒有把握住通貨膨脹或信用膨脹的原因，但至少摸着了通貨膨脹的一個外表。如果真能及時停止信用膨脹，信用緊縮的爆發性形態——恐慌——的爆發性，是會更小的。

然若把這種方法，不加選擇的，應用到別一種通貨膨脹上來，那就不僅會是無效果的，並且會是可笑的。這裏我說別一種，因爲當一個國家在戰爭或革命的危機中陷於異常的財政困難中時，通貨膨脹會依全然不同的形態來發生。那就是，使紙幣成爲不能兌換金屬，也不能兌換有十足價值的外國貨幣，但同時又超過必要量，來異常增加它的發行。

把兩種截然不同的通貨膨脹混在一起，會在理論上，尤其在實踐上引起迷惑，是當然的。實則，要分別這樣的通貨膨脹和那表現爲商業繁榮的通貨膨脹，是再容易也沒有的。這一種通貨膨脹的發生，是因爲政府有了異常的支出，但礙於形勢，既不能消滅引起異常支出的原因，也不能採用增加收入的方法，而只能採用人爲創造購買力的方法，即增發紙幣，來彌補財政的不足。所以，停止兌換金屬或兌換外幣，將會是這種通貨膨脹發展到一個階段以後的必然結果。因爲，繼續代表十足價值的紙幣的增發，必致促成金屬的外流，或促起外匯基金的枯竭。

兌換金屬或兌換外國貨幣的規定一經停止，通貨膨脹在沒有人爲限制的場合，就會成爲毫無限制的。因之，如果前一種通貨膨脹在一個時期之後必致引

起通貨緊縮，這一種通貨膨脹是不會自動有這種反應的。

不僅如此。這一種通貨膨脹雖然只由於財政困難，但財政困難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必致加強財政困難的程度。這就像人們常說的，不斷的通貨膨脹會減低財政收入的購買力。通貨膨脹規定要引起進一步的通貨膨脹。

在這裏提起這樣的說明，其實是不必要的。每一個現代中國人，都已經有豐富的經驗中，體認了通貨膨脹的全部原理了。我這裏要提出這一點來，不過要說明，這樣的通貨膨脹和信用膨脹絲毫沒有關係。事實上，我們也發覺，在通貨這樣膨脹時，商人間的貨幣借貸將會減少，利息率將會提高。所以，在市場上，如我們要指出通貨膨脹與信用膨脹的關係，我們必須進入一個超於私人的領域，那就是國家銀行的領域。

在信用的給予上，國家銀行和一般的銀行，有如下的區別：後者主要是實行商業放款，前者則主要是政府的信用給予者。事實上，在中央銀行有其獨立權限的國家，如果說通貨膨脹是由信用膨脹引起，那只是由於一種特殊的信用膨脹。政府以其所發行的公債券，換取銀行券；銀行則被授權，以新公債券，作為準備，而發行更大額的銀行券。（當然，就目前中國的情形而言，這一種手續也早被省免了）。

所以，這時候，面對着通貨膨脹危機而要以收縮信用方法來挽救的政府，所應當做的，決不是聲言要審查並且檢舉金融機關的信用活動，卻只是反身自問，審查一下自己的財政狀況，看為什麼自己的財政收入，會不敷應付支出。問題不在信用膨脹，而只在本身的支出如何會這樣大大超過收入。那就是，反過來問一下，為什麼自己的財政力量會如此削弱。金融管理規程所要求的信用緊縮，當然和這一種情形，是全然不相干的。

然則，金融管理規程要由信用緊縮來挽救通貨膨脹的危機時，它能做一些什麼呢？

第一，在這種已經和政府完全結為一體的國家行局上面，原來就有種種私利害關係寄生着。在這裏且不說國家行局的公開的舉措，是否與國家的真正利益相一致。但不能不注意，這背後種種的祕密投機活動，就是在這種寄生狀態中，滋生繁殖起來的。

其次，在官營事業形成統治局面的今日，官營事業的維持，主要也是靠了國家行局的支持。國家行局與官營事業的一體化，才使流弊滋多的官營事業，還能在表面上，表現得異常繁榮。

金融管理規程會伸到祕密的以國家行局為支點的投機活動和公開的以國家行局為支點的官營事業上麼？

如果這是很少可能的，則由信用緊縮來挽救通貨膨脹危機的政策的意思，就只能發揮在普通的金融業務上了。

對於普通的金融業務，政府的直接干涉，可以出於經濟警察。不待說，那

是經濟自由的縮小。但這種縮小，對於公衆，不見會有何種利益。超經濟壓力的增大，將獲得何種結果呢？不過使各種經濟活動，更加要以超經濟力量為庇護罷了。

政府的間接干涉，是藉手於信用緊縮。這種間接的干涉所以可能，是因為在目前的階段，一切商業銀行不能不依賴國家行局來支持。銀行托拉斯，是由一種特殊的方法形成了。失去國家行局的支持，任一個商業銀行都會立即倒下來。這就是說，任一個商業銀行，都須依賴國家行局所給予的信用來支持。實在說，在目前，商業銀行所以能給一般社會以信用，不過因為有一種上級銀行，在給它們以信用。因之，當信用緊縮政策被採取時，即使直接受限制的，只是國家行局對一般商業銀行的信用，一般商業銀行對一般社會所給予的信用，也一定會立即受到限制。一般銀行業者將被迫採取自衛的方法：拒絕放款，或拒絕放款的轉期。結果會和恐慌襲來時的情形完全一樣。強迫性的售賣，使物價下落。

當物價紛紛下落時，我們的管理者就洋洋得意了。他們將會誇稱，信用緊縮政策已經收得了美滿的成果。因為，在他們看來，物價下落就是通貨膨脹已經停止的最確實的證據。

不過，這種下落，也不必就是有利的。當暫時的財政困難，使政府不得不增發紙幣，以爭取財政狀況改良的時間，因之，通貨一度膨脹之後，不致再繼以膨脹時，這樣的信用緊縮可能招致一些有利的後果。它雖不能消滅通貨膨脹的禍害，卻無疑有一種作用，可以抵消通貨膨脹的禍害的一部分。物價上漲的程度將會減小。由物價上漲而起的禍害，也將會減小。

不過，如果情形不是如此，如果財政危機是由於足以致命的原因，以致即使有了小小的抵消力量，也不能挽救通貨膨脹的危機，則信用緊縮將不會帶來福音，而只會帶來更大的災禍。

要說明這一點是不難的。許多生產事業，本來要靠信用的取得來維持。信用的緊縮會打擊他們，是毫無可疑的。

但更重要的一點是，通貨膨脹既然沒有制止，物價在一個短期的靜止之後將會再以瘋狂的姿態向上跳，也是無可置疑的。

如果通貨膨脹是促成財富再分配的手段，通貨膨脹中的信用緊縮會更加如此。如果通貨膨脹是人劫奪人的好機會，通貨膨脹中的信用緊縮，就是人劫奪人的更好的機會了。

這就是不分別通貨膨脹的性質與原因但要實行信用緊縮以為補救的政策必然結果。

## 本刊經理部啟事

自一月廿三日起，本社經理部辦公時間改為每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五時，星期日休息。  
又自下期開始，本刊在上海大公報所登之廣告，由第一版移至第五版（教育）廣告欄內，每逢星期六刊出，敬希公鑒。

# 政治的心理談

商翼

## 喪志症

喪志症 (Abulia) 是一種精神病。患這種毛病的人，老覺得心神不定，萬事躊躇。東抓一把，西抓一把，自己也不知忙個什麼。可是碰個窮鬼，弄弄勿討借，結果鬧得搭里搭漿，真像蘇州人所謂「牛吃蟹」。例如一個主婦患了這病，她一天不知要數多少次碗筷，疊多少次被褥；隔五分錢就去洗一次手，隔三分鐘就對鏡梳梳頭；……如此這般，她似乎忙得不可開交，其實却什麼事情也不會做。而結果呢，碗打碎了一隻，梳子折斷了幾個齒，自己還在門檻邊栽了個跟斗。

喪志是所謂喪失意志。現在的心理學家不大喜歡談意志，代替它的，是心向或決定趨勢。一個正常的人作事，總有一種確定的心向以指導行為。心向於看電影，則出門，上街，雇車，買票，……心向於寫文章，則坐下，鋪紙，握筆，構思，……所有這些行為，總有其一貫的決定的趨勢。而喪志症患者，却缺乏這一貫性，所以行為雜亂無章。一般專家相信，這是由於意願不能實現，目的不能達到，患者老覺得當前情境複雜，不知如何下手，因此心緒煩亂，無有主宰了。

我們這病複雜的國家或政府，在作者看來，也很有點喪志症的病象。——論法令，早一道，晚一道。論方案，左一個，右一個。會開不完的開，客請不完的請。可是你問在忙個什麼呢？恐怕當軸者自己已答不出所以然來。如此東抓西抓，朝令夕改，今天談話，明天否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同沒頭蒼蠅似的，嗡嗡亂飛，團團打轉，只苦了一般引領期望的小百姓。而碰到要緊事呢？却又躊躇不決，裹足不前了。英國人在我們的土地上進行大屠殺，在機關槍和催淚彈下，是我們的同胞，在呼喊，在痛哭，在流血！可是聽不見一句強硬的話，一個強硬的字，更不用說以牙還牙了。敢於以牙還牙的是廣州的老百姓。但老百姓只應靜候政府循外交途徑作和平解決，豈可擅自開口說話？於是「暴動」被鎮壓，「暴動領袖」就被上了腳鐐，手鐐，外加一頂紅帽子。這真是古聖人所謂「本亂而未治」，「所厚者薄，所薄者厚」，是非混淆，黑白顛倒，栽了跟斗不知爬起，挨了巴掌還叫道「好」。

病象如上，病源又何在呢？聰明的讀者都知道：我們的政府有一個不可動搖的目的，異常偉大的意願，那就是要求「天下定於一」。只是這個意願和現實的情境之間頗有距離，這個目的和達到目的的方法之間隔有鴻溝，於是形成一種「心結」，變得心向不定，趨勢不穩。「萬變不離其宗」，現在此「宗」既遙遠不可期，自然只剩下「萬變」了。至於拿臭水潑人，用武裝鎮壓之類，也是喪志症患者應有的現象。「不遷怒，不貳過」，惟願子能夠做到。我們的當軸者，比起亞聖來，到底略遜一籌。在攻其端而不得其法，斥邪說而不得其門之際，老百姓當然是最好的出氣筒，免不了常常給當作嫩豆腐吃的。

但是這病症能不能醫治呢？如果能治，應該吃什麼藥，打什麼針呢？作者不敢肯定答復，也不敢亂開藥方！又何況患者還不見得肯相信本文的診斷哩。

## 巴夫洛夫的狗

六畜之中，多才多藝，數狗第一。眼睛尖，鼻子靈，叫起來聲音洪亮，跑起來奔逸絕塵。而最難得的，是善體主人之意

，能用尾巴表示喜，用牙齒表示怒。養得一匹好狗，不但肉骨頭不致浪費，叫化子和玩皮的孩子，也自然遠遠的避開你的鐵柵門了。

鄉下人有個射狗的謎語說：「小小將軍，八面威風。後面搖旗，前面放銃。一搖旗而又放銃，則儼然如城隍老爺出巡，警察局長下鄉，小民自該肅靜迴避，以免碰着它的爪牙。」但這也最容易迴避。最是有等神出鬼沒的狗，其來也無蹤，其散捷也如風。沒等你拔步，沒等你喊一聲「啊呀」，它早已攔住你的喉管，把你的皮片片的撕下去了。

狗之多能，由此可見。而另一方面，對於它的主子，上司，皇上，太上皇或外國爸爸等，却又俯首貼耳，一心一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種盡忠盡孝的美德，真可與天地比壽，日月齊光，應該付國史館立傳，交麒麟閣畫像；至少，也得立根旗竿，暨座牌坊，築一個規模偉大的「義犬之塚」。

言歸正傳。在心理學的領域中，狗也早已出足風頭，坐定第一把交椅了。牛馬雞豕，比起狗來，真望塵莫及。——這是歸為巴夫洛夫 (Pavlov) 作了一套有名的實驗，那完全是關於狗的。

巴夫洛夫養了許多狗，並不是叫它們看家或打獵，而是要測量它們的唾液的分泌量與速度。他發現：這些狗的唾液，不僅當食物到口時流出來很多很快；而且當看見食物時，或當看見盛食物的盤子時，或當當給食物的人走近來時，也會流出很多很快。於是他設計了一個實驗：給狗送食物之前，先響電鈴。電鈴聲與食物相繼發作，反復若干次。後來就不給食物，只電鈴一響，狗馬上也分泌唾液了。用心理學的術語說，由食物刺激起唾液的分泌，稱為反射或反應，這是自然的。而由鈴聲，盤子，或送食物的人而引起唾液，却不是自然的。這種非自然的反應，稱為交替

反應。——交替反應的理論，就是巴夫洛夫建立的。

這理論其實並不新穎。中國有個古老的笑話，說許多人在一起談論酒：甲說他喝一滴就醉了，乙說他看見酒就醉了，丙說不用酒，他聞酒糟就醉了。另外幾個人拉得更遠，一個說酒麵，一個說麵粉，一個說饅頭，最後一個甚至說，他一見和尚頭就醉倒。——這個笑話，也就道出交替反應的真理了。

但是巴夫洛夫以狗實驗，似別具深意。從此之後，我們明白了：除了眼睛尖，鼻子靈，以至「一事上」以尾，「使下」以齒等等之外，狗們以及似狗的人們，還有一種很重要的德性，就是善於交替反應。所以正如一聽鈴聲就口涎欲滴：聽說埃尼威托克島上又要試驗原子彈，便馬上舉手加額，以為第三次大戰就要爆發。雞尾酒會上，以為第三次大戰就要爆發。即喜形於色，以為三億甚至三億以上的款，已經在伸手打招呼，轉眼就要跳進我們的荷包裏來。——關於這等三億甚至三億以上的款，上海有幾家小報稱之為「吊胃口」的把戲，倒也頗有道理。胃口而

被吊，怎能不垂涎三尺？不過「錢子打釘子，釘子吃木頭」，既被美國人吊了胃口，自亦可如法泡製，反過來吊老百姓的小公務員。什麼行憲呀，什麼獎券和生產貸款呀，什麼按指數發薪呀，什麼定北平為陪都呀……豈止是巴夫洛夫按電鈴，簡直電光閃閃，雷聲隆隆，眼見時雨即要傾盆下降。這樣的空排場，其實也是交替反應的理論的應用。只可惜中國的老百姓多半缺乏狗的美德，不見得因此就起流口水反應吧。

由此可見交替反應四字，真是微上徹下的政治原理。別以為一見和尚頭就醉倒，是句笑話，善於作交替反應的，儘可以風馬牛不相及，把相差十萬八千里的拉在一起。廣州大騷動，我們都覺得很簡單，是對於九龍事件的憤怒的抗議。可是有種特別嗅覺的人，如某省主席，却以為這是異黨主使的暴動，必須彈壓，必須嚴懲。上海學生的遊行，雖然沒有出什麼亂子，也被指為有陰謀分子從中鼓動了。

# 北美重遊 (二)

陳達

## 銀葉樹 (三六, 四, 二十)

國會的西邊，有許多樹木，我往往由圖書館出來在樹蔭下休息。某日我正在樹邊行走時，忽然背後有人高聲曰：「君是否由古爾來的？」余曰：「然。」他就招手勸余前進，指一棵銀葉樹，對余曰：「此樹葉大而多，一般人都羨慕其樹蔭，葉亦頗大，「貴國人食其葉乎？」。余曰：「然」。此人張其嘴，良久不言，蓋甚詫異也。彼曰：「這些葉熟後墮地，汽車經過時，往往為葉壳扎破車胎，甚討人厭耳。」余曰：「在中國，葉未熟時即採下，置於缸內，加以石灰水，外皮爛去，僅存其內部硬壳，色白，謂之白葉。白葉用烈火炒之，味甚香。銀葉係日本名詞，此樹係由日本傳入」。此人才悟中國人並不吃葉皮而吃其核；核在硬壳的裏面，非特無臭味如菓皮然，且頗香甜。

## 櫻花 (三六, 四, 二十)

我第一次到華盛頓時正值櫻花盛開。某日晨在勞工統計局有一個談話完畢，即到 Tidal Basin 參觀櫻花。據說這是多年以前東京市的贈品。每年的櫻花節，有許多美國人，從各地來此看花。記得我在國會圖書館準備博士論文時，接到哥倫比亞大學的通知，囑返校參加口試，我於是抽閒溫習舊書。時值陽春四月，日暖風和，數千櫻櫻花怒放。我夾了一本書，在一木樓坐下，花香撲鼻，蜜蜂亂飛，久了站起身來。迎頭就是百花滿枝的一棵樹。我就隨手折了一枝，夾入書中，懶洋洋的向電車道走去，數分鐘之內，騎自行車一人自後方追至。令余啟書取出櫻花，曰「與中國公使館有關係乎？」余曰「否」。彼乃取出郵政明信片一張，填好日期。余視之知為警察法庭，乃告之曰「必到庭，但請將日期提早，因數日後即離華盛頓市」。彼曰：「君不知法律禁止折花耶？」余曰「否」。彼即取明信片，余亦乘電車歸寓。

## 美國勞工統計局 (三六, 四, 二十)

目前的勞工統計局，已經遷移了新地址。從前該局在華盛頓市西北區第十七街，青年會隔壁，今已為設計局所用，我參觀勞工局時，局中舉行了一個座談會，我順便說

些今日我國勞工的狀況，並簡述抗戰期間及抗戰以後我在昆明重慶與上海關於勞工生活的研究，引起了若干耐人尋味的問題。是日參加討論者，局中人與局外人俱有。最難得的是 Philip B. Sullivan，以前曾在上海約翰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目前服務於美國外交部國際勞工組。另有一位女職員，提出些移民運動對於南華鄉村勞工的影響，手執一書，淺綠色布面。後知為余著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一九四〇年在紐約出版，余前此未曾見過。

## 美國工會聯合會 (三六, 四, 二十一)

Miss Florence Thorne 擔任研究主任，並主編一種定期刊物，名曰 *The Federationist*，據女士的談話，此種出版物，多年來並未改變內容的性質，所有各種研究工作，亦依舊注重勞工及其家庭的生活，其主張實係貫徹前任會長 Gompers 氏一生的理想，此人雖已作古，其精神尚為一般同事所崇敬。

Robert Watts 告訴我：在中國抗戰期間，該會與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會經捐一筆大款與中國勞動協會，盼望該會舉辦多方面的福利事業。以後事實證明，似乎該款的用途不大得當，用於福利者少，用於非急需的事業者多，後者包括勞動協會的會所等，最初討論這筆捐款時，有人提議組織委員會以資監督用途，委員中須有美國人一人，Watts 當時並不如此主張，追想此事，他認為這是疏忽。此人對於我國出席國際勞工大會的工界代表，有深刻的印象，他認為這些人對於我國勞工的生活，大致缺乏概括而透切的了解，他疑心他們不是由勞工階級出身。我說據我所知他們確實是工人或曾經做過工的問題，不過有些人因教育與經驗俱欠豐富，所以對於勞工界的問題，未有深刻的了解。

我以後聽人說，Watts 赴歐出席會議，返美時，因心病發，歿於輪中。

## 山東問題與美國上議院 (三六, 四, 二十二)

我在國會圖書館研究室工作時，往往抽閒去參觀上下議院，想起我從前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正值美國國會討論

國際聯盟問題，威爾遜總統方自歐洲歸國，贊成美國加入國際聯盟，這是民主黨的立場，共和黨處於反對的地位。因為要討論國際聯盟及世界和平諸問題，上議院時常連帶討論山東及膠州問題，我往往赴上議院去旁聽，有時亦訪問上議院議員，供給些關於山東問題的材料，我所訪問的有 William E. Borah, George Norris, Sheldon Spencer 等。Borah 是愛伊達虎省的著名律師，身幹魁偉，聲音宏亮，是聞名的雄辯家，Spencer 在耶魯大學肄業時，與我國當時駐美公使館參事容揆先生為同學，Norris 是一位老練的政客，認為民主黨在巴黎和會席上把膠州讓給日本，實際是不公平的，這一點該黨有些分子也深深感覺，知道難以辯護，亦不打算在上議院來和共和黨爭論。有一日我到上議院旁聽時，意利諾省的 Sherman 氏正在演講，他的聽覺不靈，一直是帶上聽機說話，這種情形在那時尚是不多見的。另一次辯論的主講人是米蘇里省的 Reed，他說：你看，我們今日討論山東問題，這是世界和平的主要項目之一，但是參加的人數，自辯論進行以後逐漸減少，在這個時候，本黨僅有六人，反對黨僅有四人。不過我是要繼續下去的，不願意散會，接着他把一些重要參考資料，交書記當眾宣讀，以便載入國會紀事錄 (*Congressional Record*)，他自己寫好紙條，派人拿些點心與咖啡，在他座位上用十分鐘的工夫吃完，繼續演說，這一日他繼續不斷的說話，共約六小時。

上議院外交委員會，有一次舉行會議，我就去旁聽，正是加利福尼亞省的 Johnson 氏說話，坐在我旁邊的是耶蘇教義言報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的女記者，我們兩人就攀談起來，我供給些關於山東的材料並我自己畫好的一張簡明地圖，表示山東半島，膠州灣，及東三省與台灣，以示日本如得了膠州，可以伸張勢力於東亞，包括對於東三省及台灣的關係，這地圖，為該言報所採用。一九一九年自七月七日起，該報關於山東問題有時每日有記載，有時候隔一日發表文字，發表文字時必附以此圖，如是者約一月有半，當上議院討論山東問題時，我國留美學生會及其他學生團體，為愛國心所驅使，往往派代表訪問國會議員或公開發表言論，以喚起美國的輿論，對



於這些活動我亦往往參加。一九一九年八月九日的聲音報關於山東問題有宣言一篇，曰China's Claim for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turn of Koochow，具名者有六學生團體的代表，即 Chinese National Defense League, Chinese Student Alliance-Chinese Students of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Chinese Welfare Society of California, Chinese Patriotic Society of New York，我即是末一團體的代表。宣言的主要意思，認為（一）我國人心激昂，對於日本決不屈服。（二）德國僅借膠州而非割讓。中國既與德國宣戰，膠州自應退還中國，德國不能讓給日本。（三）膠州原為中國領土，一八九八年三月的條約是有明文的。（四）日本無得膠州之權，因中日在此大戰爭既為同盟國，日本不能向同盟國攫奪土地。（五）美國應反駁日本的要求，因這些要求與威爾遜總統所提的十四點是抵觸的。

### 電話工人罷工（三六、四、二十二）

美國有數大市的電話工人，業已罷工若干日。東部有許多大市，除自動電話外，一概不通電話。我於訪問工會及工廠時，對於美國一般勞工的待遇，認為頗優，但勞資糾紛尚時發生。電話工人罷工，據說有延長時間的可能。今日細求柔省長，已得到相當大的權力，因該省議會業已通過限制罷工的法律，省長今日簽字。罷工工人領袖三人因此被捕，但罷工依舊進行。今日在紐約市某電話公司門口，有糾察隊男女工人十四人，兩肩掛有長方紙牌。其標語之一，曰：「工業賺錢幾百萬圓，勞工們分文無着（Millions to Industry; Nothing to Workers）」，我從前在蘇聯遊歷時，認為他們最長於標語的技術，但今日在此所見者，實惹起了我對於工業有憤憤不平的念頭。

按此次工潮，共約維持四星期。工潮的大部份於五月八日解決，每人每小時增資一角五分，或每星期加資四元。在未罷工前，普通電話工人，每人每月可得二百六十元。

### 留美學生季報（三六、四、三十六）

哥校舊圖書館 (Low Memorial Library) 現為各專門圖書室及特種圖書室之用，就中文圖書室所存的留美學生季報，僅有四卷。除第四卷完全無缺外，第五卷第十一及第十二各卷，僅各存一部份而已。第六卷以蔡正（競平）兄為總編輯，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競平兄在第四卷內留

字云，囑下屆總編輯認裝好的季報為「公物」移交下屆的總編輯，留存編輯部備查。按留美學生會，初僅刊印年報一種，以國文記載一年中所經過之事。至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留美學界同人中，有賀慶慶那契華朱起等，議以年報擴充為季報。此議是年在東部夏令會通過，以朱起等為總編輯，賀慶慶為總幹事，由上海中華書局刊行。其目的在（一）聯絡留美學生聲氣（二）介紹西洋文化於祖國。所以此種刊物據侯德榜氏所云（留美中國學生季報創辦歷史及其歷來辦理情形，一九一八年第四號）有二特點：即（一）不含營業性質（二）不附和於祖國任何政黨。

一九一八年九月三日至十一日，東部留美學生在紐約省北部西立古司 (Syracuse) 大學舉行夏令會，到會者男女學生約一百三十人。據王國鈞兄（一九一八年第四號）所述，那時我參加中英文演說競賽，結果如下：中文演說以趙泉為第一，題目東亞和平之基礎，我列第二，題目中國留美學生與中美外交之關係，蔡雄列第三，題目東亞無形之戰爭。英文演說以唐慶詒為第一，題目中國與新教育。蔡雄為第二，題目煤鐵與中國之前途。我悉列第三名，題目我們應改良種族之理由及方法。

抗戰前三年（一九三三）有一日我往燕京大學去，遇着一位面熟而不知其名的朋友，迎面而來。他直呼余名曰「一九一八年秋，我們兩人同坐火車由紐約市赴西立古司夏令會，下車後天已昏黑，失路，那時君手中尚提網球拍子」，所述瑣事，宛如昨日的情景，記憶力之強有如此者。

### 留美學生月報（三六、四、二十六）

留美學生月報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自一九〇四年開始，第十五卷（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至次年六月）以林振彬君為新聞編輯，其任務在報告各大學學生會及個人的消息。一九二〇年四月號載一段關於我的新聞，說是在紐約市內大學世界俱樂部之公開討論會，與日本宣傳家爭辯膠州問題，頗能伸訴中國人的苦衷，博得美國人的同情。第十六卷（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至次年六月）以何傑才君為總編輯，孫克基兄為總幹事。第一號載新聞一則，述及我在哥校社會學系文化班上參加一次考試，成績甚優，吉庭史 (K. H. Giddings) 教授認為係五年以來最佳的作品。第二號記述我在哥校獲得社會學榮譽學員 (University Fellow) 並得獎金七百五十圓。第四號提到我於耶蘇聖誕節，在大西洋市參加美國社會學社年會。關於末一點我記得是在一個著名的旅館舉行，並與烏格朋 (W. F. O'Sburn) 教授同一臥室，一日戲謂余曰「此市是一個很講究的避暑場所，夏日遊人甚多，各物昂貴，教育界同人大致認為太貴。冬天旅客較少，物價稍微便宜些，正合我們的胃口呢。」

在哥校研究院肄業時，我有時照著寫作，偶爾發表論文，據留美學生月報所載，略述數則於下：

1. The Famine in China and Her Population Problems,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 16, No. 7, 1920-21
2. Birth Control and Population, Birth Control Review, N. Y. B. March 1921.
3. Positive Checks and China's Population, Birth Control Review, May, June, 1921
4. Japanese Immigrants in China and Their Economic Status,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 17 No. 4 1918-19

### 勞工問題的研究（三六、四、二十七）

我在哥校研究院，以社會學為主修課，以勞工問題為副修科。除選習勞工問題外，余又在新聞學院選修一課曰雜誌論文的寫作，這門功課的主要結處是練習我的英文，但亦連帶的加增我對於研究勞工問題的興趣。班上的學員俱是美國人，大部份是有相當經驗的男女記者及作家。教授認為比較優良的作品，在教室裏選出來宣讀，由大家批評，這些批評大致由作者彙集，修正論文然後向新聞紙或雜誌投稿。已發表的論文，教授隨時報告，以資鼓勵。我的論文雖亦有由教授當眾宣讀者，但第一學期內從未有發表的機會。教授以為我的寫作，一般的格調與布局及行文等，大致不適宜於新聞紙，因我喜歡討論並分析問題，趨重於研究，不太注重文字的潤飾，因此不易引起普通讀者的興趣。我於投稿時往往稿子寄出不久，即被退還。有一日教授約我談話，曰「君所選的題目及題材往往表示有判斷的能力。英文雖有時露出外國人的本色，但決不是退稿的主因。我們還須研究，如何可以使你有發表的機會。」

有一日我接到華盛頓勞工統計局局長司徒 (Ethelbert Stewart) 先生的信，他說暫住紐約市聖弗郎哥司 (St. Francis Hotel) 旅館，在市西四十七街第一百二十四號，勸我於課間時往訪。某日下午校中無課，我即去訪問，方在客房坐下，彼曰「君不知何事乎？」余心惴惴，以為又要遭遇不愉快之事，彼將要退還我的投稿。司徒先生曰「中



「國內勞工狀況」一文，不久以前已在勞工月刊發表(The Labor Situation in China, Monthly Labor Review, Dec. 1920)此文發表之後，頗惹起若干刊物的注意。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的編輯，於一九二一年三月號，用全面的地位來介紹這篇文章，這可算是非常之事，介紹詞有云：「即或在以往沒有變遷的中國，勞工階級已經開始要脫離歷史悠久的束縛」。不但如此，倫敦的勞工月刊(Labor Gazette)於同年三月號亦用平面的地位來介紹並批評這篇文章，你是一個少年，應該對於這個問題不斷的努力，因這是有光明的前途的」。

果然，自那時起，余對於我國勞工問題更悉心研究，隨時將研究結果作為論文，往往在勞工月刊裏發表。自一九二〇年以後十餘年間，余在該雜誌所發表的論文，不下十餘篇，今擇其要者列上：(1) Labor unrest in China, Aug. 1921; (2) Wages and hours of labor in five Chinese cities, Aug. 1921; (3) The cost of living in Japan and China since the world war, Dec. 1921; (4) Shipping strike in Hong Kong, May, 1922; (5) Working women in China, Dec. 1922; (6) Labor conditions in China, Nov. 1924; (7) Analysis of strikes in China from 1918 to 1925, Oct. 1926; (8) Labor in China during the civil wars, July, 1930; (9) Labor conditions in Japan, Nov. 1925; (10) Labor situation in Korea, Nov. 1930

最初所登載的文字，俱為關於我國勞工問題的討論，以後漸及日本及高麗等國。勞工統計局如有關於遠東諸國的勞工文獻及材料往往諮詢我的意見。我記得很清楚，日本著名經濟學者慶應大學福田德三博士和我係文字之交，交誼的開始由於我在勞工月刊介紹他的著作。

我當時正在華盛頓準備博士論文，時常往來於國會圖書館，人口局及勞工統計局。司徒局長因與余交誼漸深，決定在局中勻出小房一間，並供給繪圖員打字員各一人。博士論文完成之後，即由該局刊行，作為叢刊之一，名曰「中國海外遷民運動與勞工狀況的關係」(Chinese Migran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 Bulletin no. 34) 於一九二三年出版。我得津貼金五百圓。又此書頗適合美國當時的需要，不久下議院又加印一版，作為該院文告第十九種(House Documents no. 19, 68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司徒局長與余的交誼，歷久不變，據局中人云：每年到耶誕節，余必寄去賀片，一

九三一年春，局長在檀香山主持勞工狀況的調查時余在夏威夷大學作學術演講。李紹昌教授某日招宴，局長對余曰：「如果一個母親不幸喪子，她在掩埋時所說的話即是宗教，因那時可以盡量發揮她的情感」，那是他對我的末次的談話，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三日局長病故，享年七十九歲，其女Margaret寄余遺像一幀，並云其父以生前不能遊歷中國為憾。此次余再到勞工統計局時，知其另一女 Stella 在局中服務有年，去歲不幸於局中。舊時服務人員中，我所認識者僅有一書記 Miss Tibolt，見面時，愴然曰：「在中國抗戰期間曾數次想念，今知無恙，於心慰矣。」

(上接第二十頁)  
男女女數十人，當被暹羅警察捉住時，有些人獻出了外交護照，始得免於究辦。政變前夕，這些人和乃寬的往還尤引起暹羅政府的注意。政變之日，他們忙碌異常，政變成功後并喜形於色。

### 十一月八日以後

十一月八日深夜，變披汶所領導的軍人政變團，乘人不備，趕走了乃比里。只是在乃比里的公館門前，放了幾槍，此外就沒有聽過槍聲，自然，變披汶是誇耀這不流血的政變的，事後他也曾和乃寬互相舉杯慶祝的。

政變後的暹羅政府，變披汶握軍權，在幕後活動，乃寬組閣，任國務院長。同時，變披汶立刻向新聞記者表示：他現在不像過去了。他叫中國僑民不要害怕，叫暹羅人民服從。敏感的新聞記者，也很能了解變披汶這一個意思。就是說，三年以前，變披汶是同日本人做事，現在是換了主人了。新主人

政府所喜的華僑在內呢？暹羅當局本身，現在須待解決的，是英美兩國承認新政府的問題。至於中國承認與否，似乎不太考慮，因為暹羅人對中國的一獨立外交很能瞭解。英國認為變披汶是戰爭罪犯，乃比里是合法的，它允許乃比里現時留在新加坡，要求乃寬政府賠償當日日本時代英僑在暹的一切損失，這就是一個明確的答覆。上面我會說過，英國不是不知道美國人想在暹羅生根，英國在暹羅的歷史既比美國悠久，貿易事業做得大，人也多，暹羅這塊地方，四通八達，影響新加坡及香港，英國怎肯放手給美國？前此暹羅加入英鎊集團，英國贏了一大步，現在美國扶起了變披汶，想獨佔暹羅，英國輸了一大步，由此可知英美的明爭暗鬥，今後只有更加尖銳。

政變發生後，美國迫於世界輿論，也說變披汶不應該掌握暹羅的軍政大權，現政府暫時不能承認，這是美國的一面做法。但是，另一面做法呢？美國計劃將實際援助變披汶了。這種援助，據美國人辦的英文「曼谷郵報」說，包括的地區有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緬甸，暹羅，及馬來。杜魯門主義者正擬就類似馬歇爾計劃的方案，在東南亞洲實行經濟擴張，而暹羅則將是其起點。

總而言之，暹羅這次政變，美國人在此做得很技巧，中國人做得很笨，暹羅人民却從這次變亂中，得到一個寶貴的教訓——法西斯的殘餘勢力，必須徹底消滅，如果不徹底，那後患無窮，死灰將會復燃起來。目前暹羅，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平靜無事，但實際上帝國主義彼此間在此的矛盾，和殖民地人民同帝國主義的衝突，是一天一天在擴大着。(一九四八年元月自曼谷)

### 時與文改訂價目

本刊自二卷十六期起改售每冊一萬元，合訂本第一冊，第二冊，各售八萬元，第三冊，各售十萬元。訂閱價目調整如下：

訂閱價目		國外		國內	
三個月	十二期	平寄	十萬元	掛號	十四萬元
半年	全年	平寄	二十萬元	掛號	十五萬元
全年	全年	平寄	四十萬元	掛號	十八萬元

外寄一律半美金  
二元半

# 戰火燒到湖南米倉

黃非

日本投降了，烽火却沒有熄滅，抗戰變為內戰，湖南則由前綫變為後方。然而內戰一日不終止，人民一日莫想獲得安全保障；全國在戰火中灼燒，湖南也莫想永遠例外。劉伯誠部南下，出進大別山區，直接威脅了湖北，間接威脅着湖南；廣東治安早成問題，更從後部威脅到湖南的安全。夾在華中、華南這兩個戰場中，湖南早已戰戰兢兢，喘息不安。最近共軍的觸鬚終於於去年十二月下旬伸展到這地方來了。內戰與飢饉結着不解之緣，二者相繼襲擊着豐足的洞庭米倉。

## 湘南傳來警報

警報是先從湘南傳來的。原先盤踞在湘粵贛邊境崇義縣（贛屬）的「慣匪」劉雄虎、陳白毛等部，共人槍約五六百，配有機槍十數挺，號稱為「五嶺軍區人民解放軍湘贛支隊」，分成三大隊，由政治指揮員李金統率，於十九日抵達汝城（湘贛邊境之大高峯，常晚進入桂東（湘屬）東平中和兩鄉交界的淇洞地方，即在該處散發傳單宣言及共黨書報，並正式操演，有進窺縣城

模樣。當下人心惶惶，紛紛逃走，桂東縣之省銀行即撤退至資興辦公，鄰縣鄱縣汝城之省銀行亦撤退。桂東縣劉縣長一面向各方告急，一面調集各分駐所的警察，集中保衛縣城，並令各鄉結集民槍組織自衛隊。共軍在淇洞駐紮了兩日後，又於廿一日深夜分兩部分別向東平鄉公所及距縣城僅二十里之流圍進攻，與民兵集結之自衛隊十數人小接觸後，即進入目的地，獲得步槍三十餘枝，手槍十餘枝，並俘虜東平鄉鄉長郭俊信。二十二日分別出動向各保衛隊民槍，得六十餘枝，並徵集壯丁，似有煽動之企圖。又在沙田設卡，收取行商捐稅，並以十八萬元之低價售出各鄉賦谷。二十三日桂東電訊中斷，「情況不明」。

又劉部與萬洋山之土匪配合，進攻鄱縣，該縣已入「混亂狀態」。共軍連陷兩城，情勢已十分緊張了。原駐汝城之保警第二大隊，幾次出擊，均「撤回原防」。現警保處已派新任三區專員杜駿伯前往督戰。據中央社報導：匪勢並不嚴重，一俟湘贛粵三省會剿軍事佈置完成，即可將殘匪肅滅。大家都在引領等

待着軍事佈置的完成。

## 湘北狼烟又起

禍好像真是從不單行的。緊接着湘南傳來警報，湘北又起狼烟了。

自劉伯誠部一部分南下大洪山，越襄河，直抵長江邊岸，長江上游防務即告吃緊。李先念「殘部」十二縱隊及張健獨立旅抵達湖北鐘祥及京山以北之三陽店。二十五日羅福（德）厚獨立旅由岳口經天門沔陽抵達潛江之新溝咀（監利縣北，以上各地均在長江北岸湖北境內一帶。又洪湖「著匪」張威，亦率數百人，於二十五日陷監利東之朱河；監利縣府等機關人員及士紳均向華容（湘屬）撤退，監利情況不明，華容吃緊。賴有武漢行轅於二十七日派遣海軍軍艦游弋長江，封鎖上游諸渡口，並送來部隊若干，登陸進剿，共軍始未得渡江。省府方面也已派遺駐守常德之保警第一大隊馳赴華容堵剿。據今日報載，長江上游已成立總指揮部，加緊長江防務。這想必是蔣主席此次出巡武漢的一番部署。

這一方面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監利之張健獨立旅

今年三月間曾與李人林王定烈兩支隊合作，在湘西沅陵一帶，打了「越游擊」這大捷土軍來，熟悉地形，或者更有若干潛留的勢力響應，亦未可知。

## 醞釀組織「湘勇」

前面說過，這只是共軍的觸鬚，伸過來試試探探的。看樣子，目前共軍也不會拋出大量的兵力，一上一下右提左聚來夾攻湖南。並且，據說共軍大半是些烏合之衆，沒有多少訓練；「沒有吃沒有穿，只有那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砲，敵人和我們造」。所以，如果有一支勁旅在握，湖南的安全仍然可保無虞。可惜的就是沒有這麼一支勁旅。

戰爭愈打愈烈，戰區愈來愈廣。東北華北華中幾個大戰場，已經吸住了國軍軍力，所有可以調動的軍隊都已調到前方去了，那裏還有剩餘的勁旅駐守「大後方」的湖南呢？實力既然空虛，所以共軍之來犯如入無兵之境，沒有遭到多少抵抗。於是便有人大聲疾呼，要組織民衆自衛武力，發揚「湘勇」傳統精神了。「湘勇」在昔日救平太平天國之役裏，確實建了不少功勳。

這就使三湘父老追憶昔日風，心曠神怡，一個個都想以曾國藩第二自命。

二十四日經省參議會通過了「自衛武力編組方案」，約而言之，有下列兩點：一、整理原有保警隊；暫先增設湖南警備兩旅（六團），名額由各縣徵集。二、經費來源：附加鹽稅、煙酒稅……；舉辦特種遺產稅。（增設兩旅年需一千九百萬元，附加鹽稅每石十萬元，每年可收入一千八百萬元。）這指省級的自衛部門，縣級的不贅述。

方案是很好的，只不知道這樣組織成功的民衆武力是否有救；即使有救，恐怕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發揮力量的。

## 出現戰時體制

然而大概是忙於過年去了吧，連日報紙的記載都是「匪情無甚變化」。北平友人來函，說是聽說共軍已進逼常德了；這其實倒是謠言。不過，共黨潛入是有可能的，元旦日，常德就破獲了。此外，各地的土匪都蠢蠢欲動。平（江）瀏（陽）間早已風傳有什麼「爬山隊」、「打虎隊」出沒。大庸、石首、龍山一帶湘西山地的土匪也活躍起來。隔安鄉三十里餘的黃溝咀一帶，最近又聚集了許多土匪，通

知安鄉縣商會，限期送來鉅款；這本是歲暮年尾一年一度的老把戲，但今天是有點不同了，因為他們都穿上了西吃緊，共軍想渡江南下的時候？

爲了要應付這動亂的局面，王主席在元旦日便喊出了「戡亂第一」的口號來。從本年元月起，湖南又改爲戰時編制了。遵照六省聯防的規章，成立湖南保安司令部，司令由主席自兼。又成立長沙警備區警備司令部，司令是蔣伏生。

元月四日王主席應宋子文之邀，赴廣東商量湘粵合作事宜。第一便是軍事合作。據說，可能最近在曲江成立湘粵贛剿匪司令部，主要任務之一是在會剿三省邊區的「人民解放軍」，更主要的是保衛粵漢路南段的安全。此外，據說還會在湘贛鄂邊地的咸寧成立第十六綏靖司令部，司令有由蔣揆章担任之說。

配合着軍事配置，從元旦起的一週內發動思想戰亂宣傳，有座談會，講演比賽，論文比賽，如「由美蘇必戰論戰亂策略」等，不一而足。省政府又從今年起，添置新聞處。其目的，可以應用長江日報的標題說明：「立此存照：省府成立新聞局，非統治新聞，不阻礙採訪

「。套一句時髦話便是「新開戰亂」。

月內長沙又會舉行戶口總檢查，以防止共黨潛伏份子。又據一晚報透露，政府即將在長沙捕未自首之共黨份子，以敵方間諜罪名處理。此舉的目的當然是在「安定人心」的，但不知收到的會是正面的效果呢，抑是反面的效果。

### 湘米交換粵鹽

湘粵合作的主要方面倒不在軍事而在經濟。湖南方面希望T.V.宋趕快來幫助湖南工業化。合作計劃內關於湖南部份的有：完成城陵磯（洞庭湖入長江處）建港，完成沉資水利規劃，開發寶興、狗牙洞等地湖南的煤礦（王主席順便又到了一次香港，目的是和美商潘尼公司商量投資開發湖南事宜）。羅巧資源委員會副委員長孫越崎來湘視察工礦事業，於是建設新湖南、工業化湖南之聲，甚囂塵上，據說還是魏德邁建議的什麼「華南經濟建設」的一部份。有人便說，這是一面戰亂，一面建設，正如原先的一面抗戰，一面建國一樣。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至於廣東向湖南要求的呢，不外乎米，米，米。於是，成立了什麼粵鹽湘米互市辦法，約言之，就是廣東

每運四石鹽到湖南，湖南就運十二石米到廣東。

湘米又要出境了。這對於老百姓真是致命傷。不錯的，湖南是產米區，但究竟能有多少米糧可以輸出呢？從沒有正確的統計數字。據國民日報某篇社論說，自給尚感不足。即算道不可靠，但湖南沒有多少米可以輸出是正確的。

我們且看看三十六年度湖南人民所負擔的數字：  
征實 三百萬石（谷）  
征借 一百二十萬石  
省縣級公糧 一百〇二萬石  
附加積谷及築路谷約一百萬石  
一次捐款 一百萬石

總共七百數十萬石，較之三十五年度將近三百萬石。而且中央第一次派購米二十三萬二千五百大包，第二次五萬五千大包，最近又說要派購一百萬石，還不會計算在內。而秋收後湘糧一度開禁，糧食向廣東湖北水一樣的流出，如今又要運米到廣西去了。左一根右一根的抽血管，硬要抽盡湖南人民的血而後已。

至於鹽呢，上文說過，組織「湘勇」的經費來源第一項就是「鹽稅附加」，而且比重大，幾乎佔全部經費的百分之九十五。鹽是每個人都要吃的，這筆負擔又加到一般人民身上來了。徵糧、徵購、正餉、附加，還

有各式各樣的「樂捐」與攤派，一道一道的繩索一步一緊的勒着人民的喉頭。許許多多無法生活下去的人民，都被逼得而走險。幾乎全省沒有那一處沒有搶劫、綁票、謀財……的事件發生。社會秩序已紊亂到極點了。「貧窮、飢餓永遠是共產黨的溫床」，看這樣子，要殺人

### 飢餓與反飢餓

在長沙，為了徵收碼墜捐，有些戶頭竟被攤派到幾十萬甚至百把萬元。湖南大學五教授聯名上書王主席，

## 宋子文·建軍·分區綏靖

主要的是「剿匪問題」

事隔T.V.宋南來主政，發表「治安第一」的告民眾書後三個月，被共軍目為「游擊區」與粵省當局認為「綏靖區」的廣東境內「匪患」的嚴重性便與時俱增了。過去的「治安問題」已由現執政者改為「剿匪問題」。宋氏在今年元旦大會上說：「主要的是剿匪問題，如果剿匪能成功，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如果不能成功，那一切就成爲空談」。同時，往昔一向諱莫如深的「

病陳民間疾苦，請求政府爲人民留下最後一條生路。文章洋洋灑灑，鏗鏘可誦，各報競相開欄登載。但第二天報上又出現了一條消息，說碼墜捐限期收齊，違者嚴處不貸云云。對於人民的陳訴請願和抗議，政府是索性不理了。

過了年，河谷由二十幾萬跳到三十幾萬，至今還在不斷上漲。凡非貪官污吏富商大賈，誰都感到飢餓的壓迫了。因此，感覺最靈敏的青年學生便首先喊出反飢餓的呼聲。

先是去年年底，湖南大學新生中自費同學及半公費

同學提出要求，要「爭回被剝奪去的公費」，後來由校方每人發款十萬元了事。今年元月四日，湖大司法組同學又響應各地各大學，抗議政府停發該組同學的公費，準備罷課三天，經教授勸導乃止。這幾天，湖大又成立了「自費學生申請貸金運動大會」。他們的理由是：「我們這羣自費同學只有束緊褲帶渡日了。但是漫無止境的通貨膨脹，瘋狂的物價上漲，一次兇似一次的逼迫着我們，使我們的褲帶來到已經無法再緊下去了。我們應用的書籍衣服和物件，甚至我們的鋪蓋，幾乎已經賣光

……天寒炭價昂貴，我們可以咬緊牙關挨凍；衣服襤褸，我們只求蔽體；衣服襤褸了自己洗，破了自己補，我們的生活費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用於「吃」的一項，仍不免於飢餓的恐怖。……月中旬，爲了籌備伙食費，真費盡了無數心血，暗地裏不知灑了多少眼淚。……他們發出了「反飢餓」的呼聲，提出兩項具體的要求：（一）請教部立即恢復戰時的貸金制度，救濟全國各大學的自費學生，貸金數額與全公費同；（二）請教育部即收半公費爲全公費。（一月十二日寄自長沙）

## 于 人

、欽縣，及桂境的橫縣與十萬大山，及廉江化縣遂溪等地，人數約萬餘。

（三）東江——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司令部會生、副司令王作堯，轄屬七個支隊（一個北江支隊），約有七千餘人，散佈於東江各縣。

（四）北江——由王作堯率領的「北江縱隊」人數約千餘，另有「粵贛湘邊區人民解放委員會」，政委爲張華，政治主任爲陳中天，下有「粵贛湘邊區雄庾人民自救團」，「雄庾人民自救義勇總隊」及「雄仁邊區區人

民自救團」等，團長劉雄虎，人數約千餘。

（五）韓江——廣東人民抗日自衛隊韓江縱隊司令部黃聲，統有三個大隊，主力在普寧大南山附近，人數二千餘。

（六）西江——廣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梁鴻鈞，轄下七個團，人數約一千六百，大部集中在雲浮新興一帶山地。

（七）中區——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珠江縱隊司令部林雲鏞，副司令趙彬，統率兩個支隊約二千人，結集于廣寧、恩平、台山、南海

三水各地，主力在廣寧。  
根據上述官方導報，在粵省的共黨武裝人員約有三萬餘人。

### 「一保一人一槍」政策

宋氏既然負有重大的綏靖使命，便必須解決幾個問題：第一是錢，第二是人，第三為實施計劃。憑他個人與中樞的密切關係，錢是易於解決的，何況還有一「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老辦法。上次他由京返粵後，在兩廣綏靖會議中曾拍胸脯保證經費不成問題。至於附帶在「錢」的範圍內的槍械及彈藥等設備，當本月十三日黃鎮球由京返粵之時，也說「不成問題」。關於人的問題，宋氏却頗費心思。他上任不久，便首先拉了前行轅副主任徐景唐當省府民政廳長；之後，在他上次上京時，又物色了佐蔣軍人黃鎮球做他的副手。黃鎮球是從武漢時代第二方面軍收編的中央新系人物，正符合「中央化」的條件。徐景唐是與粵中軍政人物具有深長歷史關係的老將。在粵軍一師、第四軍、第五軍及建設廳等時代均曾建立了不少人事關係。他與鄧仲元、李濟、陳濟棠、余漢謀、陳濟棠及陳銘樞等人有「同袍」或「同朝」之誼。論人事關係，他具有優越的條件。於嶼中央假

手宋氏建立華南武力準備長期綏靖的決策，便由宋氏的佐蔣軍人黃鎮球和民政廳長徐景唐兩人協力推行了。

### 首先標示出來的辦法

是徐景唐的「一保一人一槍」政策，就是統一各縣地方武力，將各縣以往組織之民衆自衛隊、聯防隊、義勇警察等地方武力全部撤銷，另行成立「各縣民衆自衛隊」，由各清剿區司令統轄指揮，而以「人不離槍，槍不離人」為原則。各清剿區除設一直屬大隊外，每縣設一至九個中隊，一至三個大隊，固定駐紮本地。另增加五個警保總隊（連前十個共十五個總隊），說是採用運動戰術，集中力量作運動式的強有力的攻擊。並在各縣組織「綏靖設計委員會」和「救亂建國勳員委員會」，而實行「軍政合一」。清剿區的設立，也是徐景唐二十年前一度試行過的老辦法。民國十七年時，李濟曾訂了一個「分區綏靖」制度，當時將廣東劃成四個善後區，徐景唐即擔任西區的綏靖工作。

### 老軍人「分區綏靖」

去年底，粵省當局經數度會議，決定就原有行政區劃分為九個綏靖區，由各綏靖區指揮官兼任各區行政督察專員。後來因其與正在烽火滿天中的別省綏靖區同名

，又將「綏靖區指揮部」改為「清剿區司令部」。人選方面，通過了徐景唐的關係，起用了一些廣東軍界的老人物：

### 第一（中區）清剿區司令何形

第一（中區）清剿區司令何形——一區所屬順德縣人，是本區名望甚高的退伍軍人。戰時在粵省做了多年的民政廳長，履新之前充任粵省參議會副議長。李濟琛主粵時，任第二軍兼「廣東地方武裝團體人員訓練班」教育長。

### 第二（北江）清剿區司令葉肇

第二（北江）清剿區司令葉肇——曾以六十六軍起家，是老軍人。在「八一三」之戰後成名，便一直爬到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與三十七集團軍總司令的高峯。後以在桂南北戰役中一敗塗地，為最高統帥不滿，險些送了命。此後，他便「淡泊」起來了。論派系，他走過吳奇偉路線，也走過薛岳路線，可說是屬於陳誠系的老軍人。

### 第三（西江）清剿區司令陳文

第三（西江）清剿區司令陳文——原任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是一個在粵當了近二十年軍職的湖南人，曾任清遠縣的警備司令，也做過公路處處長和驛運管理處長，可謂「軍政合一」的人物。

### 第四（東江）清剿區司令張光瓊

第四（東江）清剿區司令張光瓊——海南文昌人，任一八七師師長時，被稱為「殺人王」，是一個熟識廣東內情的角色。年前一八七師北調，才被解除兵柄。

### 第五（韓江）清剿區司令喻英奇

第五（韓江）清剿區司令喻英奇——也是一位在廣東幹了多年槍桿生涯的湖南人，戰時曾以保衛南京而出名。後來，又率領獨立二十旅及獨九旅馳騁于東江一帶，對東江地形甚為熟識，是一位純粹槍桿人物。

### 第六（東江）清剿區司令曾舉

第六（東江）清剿區司令曾舉——在廣東本鄉時間不

衛長沙的數次戰役中的健兒，曾任薛岳的參謀長，也當過國防部的中將階級的部員。論派系，他一直是薛岳路線的。薛岳當團長時，他當軍需長；薛岳當省主席，他便做省府顧問，又在薛任戰區司令官期內充當兵站總監，可說是薛岳的管家。一直到他南返，鎮撫粵南邊境時，才離開了薛岳。據說辦兵役是他的拿手好戲。

### 第七（南路）清剿區司令劉其寬

第七（南路）清剿區司令劉其寬——與行轅副主任鄧龍光是南路同鄉。鄧任三五集團軍總司令時，他常參謀長。戰時曾在西江一帶作戰，在廣東軍界是不大聞名的。

### 第八（南路）清剿區司令張瑞貴

第八（南路）清剿區司令張瑞貴——是本區欽縣人，余漢謀部的一名虎將，有「生張飛」之稱，原係陳濟棠手下基層幹部，後來「易主」，但仍與陳濟棠有最深切的關係。戰時以保衛增城前線見稱。

### 第九（瓊崖）清剿區司令韓漢英

第九（瓊崖）清剿區司令韓漢英——海南文昌人，保定系，歷任團長、參謀長、五十九師師長，以及一六〇軍軍長。據說與宋氏還有點「血緣」哩。

### 在宋子文的「分區綏靖」計劃中

在宋子文的「分區綏靖」計劃中，還包括原有的粵桂南區清剿總指揮部，由八區的張瑞貴兼任；而行將成立的粵贛湘邊區剿匪總指揮部，也將由二區的葉肇兼任；至粵贛閩邊區的清剿工作，則由六區的曾舉直兼顧。從黃旭初與王東原的相繼南來以及綏靖計劃的部署與實施等種種跡象來看，T V的雄心不僅限於廣東，似乎連廣西湖南及福建等省也是他心目中的軍事、政治、經濟的「大後方」。他的建軍也像是做效曾國藩辦團練，不過其形式和內容則與他前期的「稅警團」迥異罷了。（一月十五日寄自廣州）

## 新陪都的新新聞

### 傅作義折了兩員大將

三十七年一月十五日北平報紙所載張水大戰的消息，是由華北剿匪總部發表的。傅作義就任總司令的時候，曾經向新聞記者談及歡迎共軍來攻，認為如此便可以解決共軍主力。同時他又告

### 知各地地方政府，希望地方武力此後可以維持當地治安

知各地地方政府，希望地方武力此後可以維持當地治安，國軍則專門從事於「捕捉共軍主力」。冀東方面，各縣縣長都接到通知：務必放棄以往依賴國軍之心理。那麼，這一次張水之戰既是傅部第一次與共軍的接觸，自然是很受重視的。華北剿匪

### 總部的消息稱：

「十一日夜，匪首榮臻部傾全力猛犯張水，……某軍長（這位軍長大概就是魯英廉，十六日報載業已故世）記者：親自率領兩部國軍分兩路馳援，……將匪全部殲滅，……俘匪甚衆，……將來犯之匪擊退，……子

### 以迎頭痛擊，……殲滅匪部二十八團另外一個營。

「入夜，匪陸續增援，以兩個旅率制高洛地區援軍，並以八個旅的兵力，附砲兵兩個營，向北義安莊町地區國軍瘋狂進攻，……激戰兩晝夜，匪死亡枕藉，國軍傷亡亦衆。於十三日午後，

### 凌華



國軍因寒暑驟殊，彈援稍缺，戰事愈演愈烈，部隊長李銘鼎（少將師長）指揮該部兵力，始終在莊村作戰，不幸身負重傷，並以任務達成，臥為匪俘，壯烈以手榴彈拉火自殺。其以下官兵除少數犧牲外，大部已突圍到後方某處集結。……

一月十六日北平世界日報又載消息稱：「此次涿水的戰，殘共受創至鉅，我軍殲滅其主力，約達萬人，我方將領，因奮勇作戰以致壯烈犧牲者，除昨報載師長李銘鼎外，尚有暫編第三軍軍長魯英、陳氏。聞李魯均為傅作義部名將，雖達成任務，為國增光，但傅氏眷念袍澤，不勝痛悼。……」

這「不勝痛悼」云云，我們如以前報載傅作義處境問的事一加印證，就可知並非官樣文章了。因之，十六日世界日報社論又在大陸疾呼：「政府應從速增強華北國軍兵力」，又說：「目前華北軍事的全盤局勢，兩軍還不能即時完全採取主動的攻勢，不能在陣容一新之後，使戰局頓改舊觀。」

該報認為傅作義「巧婦難為無米炊」，「他既非三頭六臂，也不能撒豆成兵，又如何能將華北嚴重的危機挽救過來？」對於大沽告警，鹹水沽、葛沽、小站的一再陷落，該報且說「連華北東北唯一孔道自津浦之間亦傳警訊，怎能教我們這些耳聞目擊，寄生命於此的人不感到焦慮？」

司徒雷登大使從南京回燕園來過聖誕。去年四五月間，他從南京北來，演了兩次講，不久就起了五月學潮，事雖巧合，但敏感的人總以為有打氣作用。這一次回來，首先對大公報記者開了一砲，說：「中國問題不是武力所能解決的，戰爭不會長久，當另有正當途徑解決。」這「砲」很引起了知識份子的幻想，當時記者自己也以為要出什麼新鮮花樣了。過了兩天，司徒大使又對新聞記者說：「中國局勢，自己恢復和談已不可能，當靠外來因素解決。有的新聞記者問：『不是不是美國嗎？』答曰：『美國還要聯合其他國家。』」據另一報紙記載，則司徒說：「一月間美國議會中除了經濟援華，還有政治舉措；『以馬歇爾在國內的威望』，接華計劃『難要經過相當辯論，也必可通過』。還有一家報紙這樣登著司徒的談話——

### 司徒大使論和戰

司徒雷登大使從南京回燕園來過聖誕。去年四五月間，他從南京北來，演了兩次講，不久就起了五月學潮，事雖巧合，但敏感的人總以為有打氣作用。這一次回來，首先對大公報記者開了一砲，說：「中國問題不是武力所能解決的，戰爭不會長久，當另有正當途徑解決。」這「砲」很引起了知識份子的幻想，當時記者自己也以為要出什麼新鮮花樣了。過了兩天，司徒大使又對新聞記者說：「中國局勢，自己恢復和談已不可能，當靠外來因素解決。有的新聞記者問：『不是不是美國嗎？』答曰：『美國還要聯合其他國家。』」據另一報紙記載，則司徒說：「一月間美國議會中除了經濟援華，還有政治舉措；『以馬歇爾在國內的威望』，接華計劃『難要經過相當辯論，也必可通過』。還有一家報紙這樣登著司徒的談話——

「司徒大使以私人身份稱：目前解決中國問題之積極辦法有三：（一）人民應該行使自己的權利，民主不是政府可以單獨負責的。單靠政府，一定要腐化；知識

界，尤其是學生，應該喚起民衆，履行公民的責任，看見政府不對，可以反抗或批評。（二）美國各種專家和援助繼續來華，以補助和刺激政府，使他們覺得有存在的希望，才能進行改革。要政府自動改革，在現狀下是不可能的。（三）政府進行革新。政府中也有自由份子，不過常遭受壓迫，這些人應該得到大家的贊助，以便有所作為。大使說：這些話看着像空洞，實際上全看人做不做。大使最後仍強調國共問題非武力所可解決，但和談現已無望，只有用這種積極的辦法試一試。大使的和平信念仍未動搖。他在燕大的聖餐禮拜中講演，認為基督教的信心與希望，不應因環境而轉移，耶穌遭遇那麼多的阻礙，到死也沒有放棄他的信念。」

我曾聽以「美國還要聯合其他國家」的問題與某自由主義教授討論。他說：目前美蘇是否能合作調處？蘇聯是否接受，共方是否接受？這都大成問題。他認為司徒就任大使以來，說的話都不着邊際，如提倡「新革命運動」之類，不過表示他自己的幻想而已，說了出來，可以讓知識份子與之一同幻想。

「司徒大使以私人身份稱：目前解決中國問題之積極辦法有三：（一）人民應該行使自己的權利，民主不是政府可以單獨負責的。單靠政府，一定要腐化；知識

### 石家莊一役的故事新聞

由司徒而想到馬歇爾，由馬歇爾而想到他是愛讀偵探小說的。有一家報紙記載石家莊戰役中的瑣事，寫偽裝的間諜，活像偵探故事：「這時市內晚間已經到處看到偽裝活動的信號彈和槍彈在重武器地帶飛舞，國軍的重武器和陣地差不多都在偽裝信號彈指標之下，被匪軍砲轟的毀滅破壞了。X司令官守在電台上一面向平保軍援軍，對於當前的局面竟沒有一點處置，軍法和辦法都從他的腦子裏脫逃了，只有聽其自然的演變下去。十一日晚間二道壕的東北第八號哨卡遭到八次的猛撲，但以我軍士兵們的英勇反擊，匪野戰一旅全部被消滅。在滄州而正在這個片面的勝利當中，九十六團的張團長從誤會中，竟被友軍擊斃，這所謂誤會無疑的是友軍中的偽裝喪心病狂的勾當。同時突圍的命令由保定飛來，接着是八號哨卡因無支援，致守軍犧牲殆盡，而失陷的時候，「混亂」的根從此便生芽長葉突飛猛進的發展到最高峯，這也就是報紙上所僅能看到的「陷於混亂」、「情況不明」、和突圍的時候了。二道壕被侵入後，各部隊和核心都陷於孤立了，「子彈為什麼從司令部朝咱們打？排長！」這是一個不識偽裝內應的糊塗士兵在當時向他的排長發問的話，而石莊市也就是這樣在十一月十二日結束了他的「繁華」和「險要」。

偽裝的間諜除使防禦者自相殘殺，自行趨於混亂之外，還有一齣「獻地圖」的把戲。同報的消息寫「奸謀大活躍」的一段，道：「和X師弟兄們先後

共患難的，還有第X師的戰士們。大約是十月二十號，這個部隊奉到命令「增援保定」，這支同樣滿不在乎的部隊從容自在的清理了兩天的私人手續，扣獲了比他們的隊伍所需要的長兩倍的大車，為他們的太太行裝作運輸……給敵人奉送人一支大財源。而其特務營的羅營長竟裝，全部行軍計劃被他繪了圖送給了共軍，當軍隊走進清風店的時候，數倍以上的匪軍便縮桶似地把他包圍了個水洩不通。兩日夜的激烈戰之後，偽裝的內應搗亂了指揮部，一場混戰，斷送了全師的命運，搬家式的救援軍竟被全部解決，成了共匪財源的輸送隊。這個消息傳進X師的官長耳朵裏，竟沒有被值得警惕，而淡然的過去了。所以偽裝份子不到二十天的時間，在石莊大膽的佈置了個活動網，策應了石莊的攻戰，斷送了石莊重鎮的命運。」（一月十七日，北平。）

## 暹羅的「苦迭達」

### 變披汶東山再起

暹羅政變，外間多不知其內情。記者耳聞目見，可以告訴讀者：究竟誰要暹羅

變，誰不滿意那個比較開明的舊政府，改變後的新政府又在做些什麼呢？

有一個傍晚，我同幾個華僑聊天，無線電照例在這

個時候傳來使人昏昏欲睡的暹羅音樂。我聽不懂這些音樂，但看見華僑面上的表情突轉變不安；其中一位且說：「變披汶獨裁，回到五

### 復康

年前的情形了。原來自政變後，暹羅的國家電台經常廣播着一個擁護領袖的歌。這個歌的大意是：領袖說什麼，你說什麼；領袖叫你到



那兒，你到那兒，領袖叫你活着，你就活着；領袖叫你死，你就死——一切必須服從領袖。這像歌，正是暹羅過去排華時代的寫照，聞其聲音，令人猶有餘悸，華僑尤感其痛。

變波汶是個軍人，同日本軍閥的交情頗深，也許是學習中國的階級，他喜歡下手，無論大小事情，決於一個紙條。變波汶的生殺予奪，影響着暹羅人的喜懼哀樂，這個紙條，慣例裝在黃邊的信封內，而黃邊的信封，會蓋着以許變波汶特有，也只有他敢用。日本投降後，作爲戰爭罪犯的變波汶算是倒台了，但曾幾何時，他又捲土重來，黃邊的信封又要出現。暹羅人談虎色變，驚呼着世局的變幻莫測。

### 美國人的活動

戰前的南洋是歐美殖民帝國的樂土。從東南看起，菲律賓是美國的市場，東印度羣島是荷蘭的「穀倉」，越南是法國的富源，馬來亞是英荷美帝國的一環，暹羅則爲英法兩國所控制。戰爭期間，這些地方，曾爲日本所佔領，戰後的形勢，已大有改變。菲律賓正式變爲美國壟斷資本家的附庸國，東印度羣島突起了一個居民族獨立自決而奮鬥的印度尼西亞政府，越南也有胡志明

領導的越盟政府，他們和荷蘭或法蘭西帝國主義者猛烈鬥爭着。馬來亞和緬甸，雖說英國政府另有新的統治辦法，但是人民的耳目並沒有被蒙蔽。暹羅呢？暹羅人民並不是沒有民族精神，而是暹羅的環境更複雜，奮鬥也更艱苦。戰後法國在暹羅的勢力已不存在，但鑽進來一個美國，企圖控制東南亞，拿暹羅當作一個基地。美國的壟斷資本家們，在此同英國的矛盾既多，而對人民力量的生長，也更害怕。

正因爲美國在暹羅是新老，又不甘寂寞，所以他們急於想瞭解暹羅。當去年年初，有位美國議員偕航空界的重要人員，跑來暹羅觀光，他們自然是看中了曼谷這塊地方，在東南亞是重要的交通地點，觀光之後，即與暹羅當局，商談航空技術、開闢航空路綫等問題。見諸報端而最具體的是：美運自曼谷到美加利尼亞亞爾關了一條太平洋海外航空綫，機上的駕駛員和地下的技術人員，都是美國人。這件事在華文報紙上，似乎不太注重，但美國人的眼睛却是很敏銳的。

暹羅是魚米之鄉。農民耕種的方法，都很古老。美國人看到了這個缺點，也可以說是暹羅的落後之點，於是又有所謂農業考察團派來暹羅。在這個考察團內，包

括些什麼人物呢？只有美國自己心裏知道。他們在暹羅內地繞了一圈，說要爲暹羅在湄南河中部安置一個水閘。暹羅政府也準備花去六千萬，購置美國的水閘，同時，在暹羅北部山清水秀，出產最富的地方——青邁，美國準備於一九四八年在此創辦一所頗具規模的基督教大學。有些智識份子，當他們同我談起美國這套計劃和行動之後，便很警惕地說：「戰後美國不僅在瞭解暹羅，而且積極地在爭取暹羅了。」

去年五月底，美國記者考察團來到暹羅，有美聯社、合衆社，以及洛倫斯時報等八家通訊社和報館的記者。他們在暹羅的日子雖說不太久，但特地跑去農村，據說是爲了瞭解農村的經濟狀況。這羣美國記者在曼谷時也曾訪問過暹共負責人。隨即在紐約的報紙上發表文章（「曼谷郵報」曾經轉載），指稱曼谷如何如何的充滿共產恐怖，至於他們在暹羅農村調查了些什麼，却隻字未提，敏銳的暹羅智識份子，就已經不難猜出華盛頓的意向了。

大概是當這羣神秘的新聞記者回國不久的時候，從東京來了一位美國官員。這位官員就是麥克爾德的法律顧問勃勒少校，攜帶數萬美元，說要在暹羅投資，

與暹羅商會及民會主席辦了一頓交涉。以後美國駐暹大使館，向暹羅外交部索取財政、實業、農務、交通、商務、教育等等的施政記錄，說將根據這些調查，擬訂貿易計劃，給暹羅政府以物資和美金的幫助。一面經營，一面利誘，美國人當時既想從英國人的手裏把暹羅奪過去，故據政府稍開明了一點。

去年春天，報載：東京戰犯檢察官陸軍上尉巴爾山氏（美國軍官）即將來暹審訊法西斯戰犯變波汶，這消息傳出，當時曼谷的空氣爲之一新，都以爲變波汶的潛勢力雖然已經了暹羅的進步，但這次既將公開加以審訊，那麼乃比里政府也可藉此壓壓這個獨裁者了。可是，東京戰犯檢察官在暹羅的事實表現怎樣呢？他來到曼谷，確曾見過變波汶，但不是審訊，而是訪問，秘密懇談之後，飛去緬甸了，從此無消息。曼谷的報紙再也不見提起審訊變波汶之事。只是反對黨領袖乃寬（現政府的國務院長）在國會中

，慷慨激昂的攻擊政府，又有政府將辭職或改組之說。所謂審訊變波汶戰犯的問題，很顯然的是有一種陰謀把它沖淡了。

直至五月十四日，華文報紙始有這一段記載：變波汶自倒台後，深居家園，從事農作，爲期已二年之久，在此期間，渠不過問世事，更不接見賓客，一般人皆以爲渠從此將不再過問政治，而以家園爲樂土，然自本年春，東京盟軍戰犯法庭檢察官巴山氏突然飛暹羅，疑審問變波汶而又匆匆走後，變波汶之名即引起注意，而往拜訪者日衆。變波汶最近并向記者發表其談話，表示欲東山再起，參加政治活動，躍躍欲試之心，溢於言表。據本報記者從暹通方面獲得消息，變波汶東山再起之說，確非空言，且準備付諸實踐。現渠已決定報名參加本京第六區人民代表之競選。

變波汶以前，美國人在此的活動，發展到這個地步，已經是很露骨了。我曾問過幾個新聞記者，「美國

會不會企圖獨佔暹羅而扶起變波汶呢？」他們似乎有着同樣的感覺。

前面記者曾經提到，政變之前的舊政府，時而說辭職，時而說改組，在此盪動不安的情形之下，反對黨領袖乃寬，在國會中發言最多，攻擊政府不遺餘力，但及至是什麼人物呢？他所領導的是民主黨，包括暹羅貴族、大資本家、地主官僚。在日本佔領暹羅時代，曾和變波汶合作，日本投降了，隨着變波汶同時下台。此間中國官方人士和乃寬交往密切，談得很投機，他們對暹羅舊政府同表不滿。而舊政府對於中國某些人也很頭痛。

十月三日，暹羅警察破獲一宗大規模偽造安南硬幣的機關，這件事引起了曼谷。偽造安南硬幣的計是前海外部駐暹負責人薩××，李××兩人。不久以後，暹羅警察又在一個僑領的家裏，搜查了一宗大賭案，男

政變者的有關方面

（下接第十五頁）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四一八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時文  
刊週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發行人 程博  
編輯者 時與文週刊編輯部  
經理部 上海姑蘇路三三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 新華日報

美援與中國.....梅碧華

評大公報對於自由主義的看法.....杜明

言論與資本.....張嘯虎

農民在官僚政治下

的社會經濟生活.....王亞南

短論「民意機關」勿出賣民意.....李之顯

論從「西歐聯盟」說起.....周至誠

# 17

館書圖京南

## 卷二第

雜文  
論甘地先生餓飯  
競選呢？還是徵婚？.....白芩  
所謂「調整」待遇

北美重遊(三).....陳達

通  
王東原報聘宋子文.....呈熾

浙大學生被毆·罷課與休罷

的詳細經過.....周禾生

訊  
閻傅之間.....靜之

致讀者.....編者





### 願「民意機關」勿出賣民意 李之顯

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會審查今年上半年度中央政府的總預算案之時，「深體國家當前困難」，「故不擬……作任何挑剔，亦不擬削減其支出數字」，却附帶通過了一個「審查報告」，其中有如此一段文字：

「政府不得已以武力戡亂，以致支出龐大，預算難以平衡，此應為國民所能諒解，但國軍有優良之武器，數倍之兵員，又在英美空軍協助之下，何以不能迅速擊潰叛軍，未始非由軍事積弊太甚之故。」（凡引號中的語句，都直接從該「審查報告」徵引，見中央社十九日南京電，載二十日上海各報。）

接者便提出兩點積弊來，一是「吃空額」，二是軍事機構太龐大。

「吃空額」的結果，兵的数量大打折扣；軍事機構太龐大，則命令推行的效率必然低劣。這當然都是「不能迅速擊潰叛軍」的原因，不必申論。然而這又祇是部份的原因，其餘純粹軍事方面的錯誤還有許多，軍事之外的經濟政治原因更是數說不盡。此處不能一一數說，更不能一一解釋，因其牽涉到理論。

想過，不但公婆兩方心中無數，我們老百姓也都看得明明白白，「若野人不知，除非已莫為。」

如果真是「不得已」，國民或能「諒解」；否則另當別論，爽快一點的說，硬是不諒解。而國民究竟是諒解了呢，還是不能諒解？那就同樣是個事實問題。而且後一事實是跟着前一事實走的，我們很可以從國民對政府的「諒解」或「不諒解」的事實，推究到政府「武力戡亂」的「不得已」或「得已」的事實上去。

如果真是「諒解」了的（政府果然是「不得已」以武力戡亂的），那末駐委會確實可算就事論事，講了實話；反之，則另當別論，爽快一點的說，駐委會纔真正是豈有此理，因為它抹煞了事實，歪曲了事實。

這還是其小也者。駐委會說：「……此應為國民所能諒解」，此中還有一個「應」字應該特別注意。假若國民事實上不能諒解，而駐委會偏說「應」能理解，那問題就嚴重了。那就是喧嘩奪主，出奴入主，強義民意，出賣民意，不是民意機關，而是御用機關，也就不「應」為國民所能諒解了。

還不止此。假如國民事實上不能諒解政府，那末政府之一不能迅速擊潰叛軍」的根本原因恐怕就在這裏，而其他政治的原因與經濟原因皆是枝節，而純粹軍事的原因更為枝節；至于「吃空額」云云，軍事機構龐大云云，則尤不足道了。

但願駐委會不會強義民意而出賣民意！

### 從「西歐聯盟」說起 周至誠

「西歐聯盟」的成立，看樣子只是時間問題。名稱雖是「西歐」，却因亞非兩洲許多地帶都是西歐國家的屬領，故亦在其範圍之內；再說，對德和約簽訂無期，德國至少暫時分裂，故西德亦必與義奧同被拖進這個圈子。這個圈子似以英法兩國為中心，可是誰都曉得美國是「西歐聯盟」的太上盟主。國際局面演變到這個地步，兩家天下（Two Worlds）便代替了「天下」一家（One World）。

我們也不妨說：「兩家天下」之終於形成，乃是美國退而求其次的結果。如果不退的話，求其更勝一籌的話，則是一家天下；中國古語稱為「家天下」；再回到西洋話，也可說是獨佔資本「家」的「天下」。美國既不能做「一家天下」的家長，便退而屈就「兩家天下」之中的一家

的家長了。她的旨趣反正是妥協。從此兩家門戶森嚴，壁壘分明；世界若是一直繞着這一方向發展，則最駭然要唱 Romeo and Juliet 的悲劇。單就目前情形講，這世界已是可悲的。情形將是這樣：

一、聯合國組織愈加冷落而脆弱了，任何國際重大事件，不是過門不入，便是雖入而不得解決。大家都求繞道而過，讓安全理事會空懸一塊「安全」的招牌。

二、對聯敗國的和約，已簽訂的（對義、芬、羅、保、匈）無法徹底履行；未簽訂的，實際上各別解決。德國的險難難看，紅白判然。日本的財閥哈哈大笑，保守陣營更要抬頭。

三、歐風馬上東漸，馬歇爾計劃要出遠東版，「援助」的主要對象是非、日、中與南韓。

四、西歐各國共產黨之外的各黨，其對外政策既趨一致，極右派暫時當不致有上臺的把握。

五、「共產國際」的工作更是繁重了。但是法義的共黨，祇要環境允許，還樂得照舊在黨政的軌道中行

六、除門羅國際和西歐聯盟之外，美國還有包括希臘、土耳其、義大利（西歐）乃至西班牙的準「國際」，不妨稱之為地中海國際；另外就是遠東「國際」。這裏面若干國家的內戰形勢是值得括目相看的。

### 本欄徵稿

- 一、本欄歡迎各方投寄一千五百字以內、具有現實性之短篇論著。
- 二、本欄署名聽便，能用真姓名更好。但均請於稿末註明作者詳細通訊地址。
- 三、來稿登出時，立即從優致酬，並將登載該稿之本刊寄贈一份。
- 四、來稿除附有貼足郵票、寫好地址之信封者外，概不退還。

# 美援與中國

梅碧華

## 一 關於美援的若干問題

關於美國對華政策、也就是美國援助國民政府的問題，曾引起了很多的討論。去年十一月間，在我們中國的報章雜誌上，發表了不少有關美援的通訊與論著。這些文章解決了若干問題，但也還存留着若干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

- 一、美國在援歐計畫與援華計畫之間的聯繫是怎樣的？兩者之間是矛盾的嗎？
- 二、美國政府與我國民政府之間是否存有分歧的見解？怎樣統一這所謂分歧？
- 三、美國援華是否僅以財政為限？中國戰亂紛紛，是不值得美國投資的嗎？
- 四、美國是否會集中援助日本，放棄中國？

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必須予以澄清。一絲一毫的思想上的混亂，都是阻礙我們把握美國援外政策的真實內容的。因此，我認爲關於美援的討論是有意義的。我們要在討論中解決許多重要的問題。

## 二 援歐與援華

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各國政治經濟的情勢也是不一致的。因此，美國對外援助的原則雖然在總的方面是互相關聯的，但在方式上，在要求的條件上，在追求的各別目標上，也可以是各式各樣的。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不能以這種多樣性，而迷亂了對美援的原則的總的把握。

西歐和中國的情形不同。美國認爲西歐已經有了復興的基礎，其主要的證據就是各該國的政權都是在資產階級手中的（有些政權雖然是在社會民主派之手，但這些社會民主派實際上却是中間偏右，而且樂於接受美援）。中國不是如此，兵荒馬亂之中根本談不上什麼建設以及經濟復興。反之，危機却正在日益增漲，這是任何人都看得見的事實。

希臘和中國的情形也不盡相同。雖然在軍事方面有其類似之處，但實際上還是不同的。希臘（和土耳其）是通往蘇聯和東歐諸國家的，更重要的却是通往中東油區的。在英國縮小勢力圈，調整中東戰略網的今日，美國必須趕快跑來填防，在中東插上一脚。中國的局勢並不如此迫切，而且可以實施集中援助的還有一個日本呢。

情形既然不同，美國的援助自然要分個緩急。

美國共和黨議員，你一嘴，我一舌，說了不少歐洲中國同等重要的主張。試舉裘德爲例，他說：

「美國集中一切防共力量於歐洲，而不顧及中國，實在錯誤得很。實際上，以較少的費用，能在中國完成較歐洲爲多的任務。防制蘇聯支配世界的運動，有兩個戰線，那就是歐洲和亞洲的戰線。我們現在犯着的錯誤，是在一個戰線上分配二百億美元，而在另一戰線的人民，則不給他們分文。」（十一月廿五日華盛頓合衆社電）

此外，布魯斯特、伊頓、蒲立特、杜威（均屬共和黨），以及衆院軍事小組委員會都有相同的表示，大體上都是促請政府同樣援助歐洲和中國，如果集中援助一端，實在是「徒勞無功」，是「悲劇性的錯誤」云云。

這一切，加在一起，並不足以表示援歐與援華之間是存有矛盾的。裘德、布魯斯特等人雖然一再以防共的兩個戰線引起社會的注意，但防共究竟是煙幕彈，擴張輸出才是真正的目的。中國的情形，對於美國貿易來說，無論如何是有風險的。馬歇爾何嘗不知道防共必須在兩個戰線上同時加上法碼，但中國的吸胃的確不如西歐那麼強。馬歇爾更知道放在西歐的商業資本利息大，週轉快。於是，援歐援華一定要分個緩急，有先後之別。

## 三 中美之間

如果我們認爲美國之所以慢慢援華，是因爲華盛頓與我國政府之間是存有分歧的見解的，這實在是大謬不然的。

這種假設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是有很久遠的淵源的。一九四六年三月，整軍方案在重慶簽字之時，馬歇爾在致詞中就說國民黨中有頑固份子；一九四七年正月，馬歇爾離華之時，又在聲明中責備了這些激烈派。去年夏秋，魏德邁在離華聲明以及致顧里芝夫人的信中，對中國政府也頗多微詞。直到國會特別會議之前，馬歇爾又說：

「蔣主席所領導之國民政府，仍有希望羅致其他政黨代表以擴大其政治基礎，使之更近於民主。……一切癥結端在中國苟不能大有作爲，則無能爲力。南京方面須大有作爲，然後吾人在此始能更有所爲。」（十一月十二日華盛頓聯合社電）

此語一出，中國某些人士便隨之興奮起來。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認爲美國仍願和平解決中國局勢，以便迅速重建中國工業的力量（參閱費孝通談話，載一月十一日新民晚報）；和平解決就必須由美國出面贊助、調解或干涉（參閱馮玉祥將軍及司徒雷登大使歷次談話）。一方面是認爲援助現在的



政府是不好的，援助有「自由份子」組織或參加的政府，則未嘗是不好的（如拉欽摩爾教授也具有類似見解）。

其實，馬歇爾肚子裏的那一套主意，祇是在於予人以一種印象，讓世人相信美國對外援助的對象是民主的政權，而非不民主的政權。美國政府認為國民政府能擴大政治基礎，固然能够把民主裝飾得更入時一些；如果不能呢，也不失為老早已經是民主的了。

馬歇爾，魏德邁，以及美國若干報紙雖然「罵」過國民政府，但，「打是疼，罵是愛」，正好是這句中國俗語所說的情形。我們是可以找到例證的。共和黨參議員布魯斯特說：

「我們當中究是用些什麼毀謗（中國）政府，說他們是貪污的。在我們自己政府內也有着一大批的貪污者。」（十一月七日華盛頓聯合社電）

再舉一個更有意思的例子，衆院軍事小組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說：

「蓋就美國的觀點而言，與其目睹中國成立共產勢力控制之政府，不問其如何廉潔，終不若一自由而稍爲腐敗之政府爲可取。」（十一月廿二日大公報載華盛頓廿一日廣播）

這種說法自然是太極端的。要而言之，美國對國民政府的基本態度，不是民主不民主的問題，而是腐敗不腐敗的問題。不腐敗，有效率，美國也認爲這是民主的政府。反之，如果腐敗，缺乏效率，美國就要促其「有過勿憚改」，以符馬歇爾等人口中的「民主」，對華援助也許可以收回紅利了。

#### 四 軍事將是援華的重心

所以，說來說去是在於監督。監督雖然礙於面子，但總找得出一個無傷大雅的辦法。這就是既接受了監督，又接受了援助，而面子上又交代得過去。

美國在歐洲集中援助西德，也不會放棄西歐。在遠東方面，集中援助日本也不會放棄援助中國。我們觀察援華問題，常常祇看見財政的一方面。其實，美國官員已經非祇一次地說是要經濟軍事雙管齊下，我們把也不是完全看不見的軍事援助棄置一旁，簡直是糊塗的。

美國對中國的援助是以軍事爲重心，這是大大超過財政方面的，是不必在國會裏嘩嘩啦啦一番的。如果我們把美國的政治機構，制度，立法程序，作一成不變的觀察，那是難免上當的。我們知道，美國的國外活動總要先經國會的通過，這是一方面。在另外一方面，也常常有先辦了再說的辦法。譬如，駐華美軍總部撤消之後，便成立了美軍顧問團。這個組織成立之時，在美國國會裏是沒有立法根據的。直到去年春天，國會的一個小組才算把它通過。但是到了十一月間，在太平洋方面調查了一遭的美國衆院軍事小組委員會還在要求總統立即採取有效行動，使美國軍事顧問團在國會中取得法定的地位。這不是意味美軍在中國軍事性質的行動，還要受到限制，而是要求較現在的範圍更多的更大規模的活動。我們所知道的美軍代爲運兵，護路，守礦，轉讓剩餘物資

，廉售軍火，固守基地，訓練新兵……都是在美軍總部以及後來的美軍顧問團和美國行政首長職權範圍以內逐項辦理的。又譬如贈華軍艦，也是先有事實，後有立法的。由此觀之，美國正在考慮的其他軍事援華的辦法，何嘗不可以先付諸實行而後立法呢？

美國雖然以扶植日本爲主，同時也是不會放棄中國的。衆院軍事小組委員會在向國會的報告中，指出將來美國對日和會的代表，應該——

「注意保留橫濱的海軍根據地，以及佐世保和吳港的輔助基地。至於中國沿海各地，由於它們對於日本軍略上佔重要關係的原故，較之內地，更爲重要。美國已爲青島海軍基地非正式的佔有者，將來出現新軍事援助計畫，在他處增設基地，亦非意外。所以特別注意台灣的經濟復興及用以作爲中國軍隊訓練場所。所以如此的原因，一部份由於台灣離開內地戰線較遠，一部份由於美國軍事重點是以日本爲根據的原故。」

由此可知，在以日本爲主的情形之下，美國絕不會放棄中國。由此可知，中國雖然打作一團，但美國在軍事上控制了中國，日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便可以徐徐圖之，中國也就不值得美國資本家投資的地方了。報載美國的一批科學家將往中國西北部調查礦產。這和美國援歐的目的是如出一轍的：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美國商品的尾閘，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個殖民地式的原料供給者。從這些情形，就可以證明中國雖然亂作一團，也並非不值得美國獨佔資本集團垂青的地方了。

美國新克里普斯華德報紙早已按捺不住，它們把美國政府現行對華政策比喻爲重返史迪威將軍的路線（詳見十一月十七日紐約合衆社電）。言外之意，就是美國已把南京國民政府棄置不顧了。這些報紙的說法自然是太嫌激烈的，其目的還不僅是在誣蔑羅斯福——史迪威的對華政策，而是在於催促美國政府實行更積極的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

#### 五 以希臘爲借鏡

美國必將援華，其規模必將越來越多，其性質必日益趨重於軍事。爲了方便起見，我們以希臘爲借鏡。

希臘是杜魯門主義的第一個試驗所。去年五月十五日生效的美國援助希臘法案，雖然規定了種種的用途，但事實上是可以把經濟建設的用途移作軍事用途的。這自然不見於國會的立法檔案，也不見於美希協定的條文。事實上，軍事用途是最關緊要的。去年，國會辯論之時，副國務卿艾契遜說援希三億元的分配是軍事用途一億五千萬，經濟復興與七千萬，消費品八千萬。到十一月間，杜魯門會向兩院外交委員會提出援希計畫實施後的第一次報告，其中暗示可能有三億元之外，再要求更多的數額。爲什麼要這樣呢？是因爲：一，「希臘之經濟崩潰已因爲美國之援助而避免，然希臘局勢在基本上猶未見改良。」二，「希臘軍事行動之加緊進行，不得不使原擬供經濟計畫用之一部份援



助資金改作軍用，原供經濟需用之一億四千萬中已有九百萬元移作軍用。」  
(十一月十日華盛頓路透社電)

這就最雄辯地提供了杜魯門主義第一個試驗所的試驗報告。

十二月底，希臘游擊隊成立了中央政府。美英兩國在手忙腳亂之中，便又在財政軍事兩方面，加緊挽救救頹局。在財政方面，杜魯門馬歇爾在白宮舉行會談，決定挪用更多的經濟用款改充軍用用途。接着就由國務院發表以本來規定用於經濟復興的一千五百萬元，轉交希臘軍隊使用。美國駐希代表團參謀長李夫賽也說，希臘陸軍已獲得九千六百萬美元的美國配備，以後還要增加。這些事實，就是表示在美國政府向國會討來更多的金元以前，先把三億元的絕大部份挪為軍用。所謂建設用款，實際上是興建了若干港口和機場，這是無關國計民

# 評大公報對於自由主義的看法

杜明

上海大公報在一月八日社評中以「自由主義者的信念」為題，給自由主義制定了特定的內容，把「中間路線」、「進步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都歸併起來，一手拉住了「個人主義」，一手拉住了「社會主義」。——這雖然是英國艾德禮和法國勃魯姆的同類論調，但在此時中國由一個以「Impartial」為名的報紙提出來，却是意義深長而大堪玩味的。

「在基本信念上」，它首先提出要不折不扣地實行三民主義，「捨二求一」，「可能三民齊失，一無所得」。這是千正萬確的。不過，事實上，「捨二求一」究竟何所指呢？抗戰到底，自然是民族主義；然而國家主權可以隨便讓別人糟塌，是不是應該呢？縱容官僚資本，摧殘民族工業，是不是民生主義？假普選之名行圈定之實，是不是民權主義呢？究竟誰是「對革命先賢不起」，誰「對殘喘於內外封主蹂躪之下數千年於茲的民衆，尤為罪孽深重」？大公報似乎並未正視事實，僅用一概抹煞的空話來烘托出己的高明。

當然它還有大道理在後面。  
它提出了一「水平作用的必然性」，「一部人類革命史可說不離這一個原則」，而「一流血」與「頑固的阻擋」都是一「意氣，霸氣與武器」，它是反對的。可是一部人類革命史豈不就是一「頑固的阻擋」與「一流血」麼？當「由於頑固的阻擋」而流血的時候，它便勸流血者「洞識出水平作用的必然性」；其意若曰：「等一等吧！水終歸會平下來的」。這其實倒幫助了一「頑固的阻擋」。  
究竟水什麼時候會平下來呢？那是一「艱而且慢的」。因為要普選，必先辦好義務教育；要實行多黨競爭制，必先「有其獨立而健全的文官制度」與「堅實而不受政治波動的技術人才」；「至於潛入民族靈魂的社會風習，一般傳統

生的。

在軍事方面，有以下幾點發展：美國允許希臘增兵，美國同意英軍五千名暫不撤退，同意把英軍手中的美國配備轉讓給希臘，美國海軍陸戰隊前往地中海艦隊中增加實力，地中海艦隊舉行示威演習，最後美國軍官廿名已經加入希臘軍，在師以上單位中實際上對希臘北部游擊軍作戰。現在希臘求援的重心，是要請美軍直接參與軍事行動了。

希臘游擊軍第二次被迫執起武器作戰之時，他們還沒有控制多少領土，現在已經控制三分之一的領土了。去年三月間，游擊軍的人數還不到一萬人；到去年底，已經是三萬人，而且建立了一個政府。由此看來，美援也並不是萬能的。

心理，尤其是走上現代化的莫大障礙。土地資本可以清算，社會傳統的化移却是一件艱而且慢的工夫。

「水平」如此其難，「悲哀的是唯恐這個進入原子彈時代的世界不肯等待這個古老的中國」吧！而「他們將永遠為自由平等及大眾利益奮鬥下去」！——永遠……奮鬥下去」，一直到天荒地荒！

其實大公報社評記者心中的「自由主義」是有藍本的；那便是：「由十八世紀以來，一部英國議會史也即是貴族喪權史。由十六世紀以來，整部英國政治史也即是國王由「天子」而變為「主權象徵」(換言之：傀儡)的經過，「英國自查利第一以來，政權一直在大眾化着，法國自路易十六以來，人民也在不停的拾着頭。」這便是他所謂「水平作用」。

不過，究竟英國政權有沒有大眾化呢？法國人民的頭抬起來了沒有呢？我們只見英國大眾中間有極少數的人是一「化」了；他們「化」成了新的貴族，譬如貝文便是個極好的例子。他在二十六歲時還是失業工人的領導者，到三十歲時，他却做到了使罷工的礦工同意回返工作並接受比罷工之前更小的工資。從此他便青雲直上，到一九四四年，他手制了反罷工的法律；而這一位貝文正是前任的碼頭工人，現任的工黨政府的外相呀！這政權化為大眾的了呢，還是一大眾「化」入政權了呢？至於法國人民的頭現在正受着武裝的鎮壓，究竟拾起來了沒有呢？這自然是大家知道的。

然而，這正是大公報社評記者所歌頌的水平作用。  
要水平作用者自然「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也即是反對任何「黨專政」的。那麼看看英美法各國的多黨競爭怎樣呢？大家以「大多數的幸福」作口號

，作武器，來騙取選票，打擊敵黨，等到上台以後，便忘記免現；政綱變成了敲門磚，「人民利益」這名詞變成了告朔之餼羊。尤其像現在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在基本上有什麼分別，在外交上不是已經實行着「兩黨政策」了麼？英國貝文的外交政策不正是邱吉爾的政策麼？法國現在參加內閣的各黨還不是一邱之貉麼？

這當然並不是主張一黨專政。須知假使沒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黨，則雖多亦無益。政黨與人民的關係從諸葛亮與劉阿斗的關係變成了招標合同的關係，果然是民主一些了，可是爲什麼不讓「標主」自己請工程師打圖樣，買材料，自己督工建築呢？

自從十八世紀以來，英法乃至美國的人民做了一兩百年的「標主」，換來換去只是那幾家包工頭，到現在只落得出錢的「標主」食不飽，衣不暖，日子越過越苦，而包工頭却個個腦滿腸肥，豐衣足食。「標主」要另想辦法，却被包工頭們霸佔住了硬不放手。這樣的「自由主義」是否還爲「標主」們所歡迎呢？

社會的構成似乎老是三層，照「自由主義者」看來，便是兩種再加中間的灰色人物。這三種人之間的關係的變化，最好以英國作例子：上面是國王，中間是議會，下面是人民。在查利第一的時候，英國是兩極化的。但自從那時起，英王由「天子」變成了「主權象徵」以後，英國便獲得「水平作用」了。這時灰色人物已經高坐在議會之內，「五官明晰化」了。

## 言論與資本

(一)

一種超然獨立、無黨無派、真正代表人民說話的言論之存在，有待於兩個大前提的成立，其一是客觀方面的發表自由，其二是主觀方面的經濟自主；而後者尤爲重要。

本文所稱言論，其本質是一種公共意見，亦即通常所指的輿論(Public Opinion)。此種意見的產生，最初是植根於關係大眾利害禍福的事件中，而以獲得大眾的同情與擁護爲其成熟。先有事件，才有針對事件的認識與主張；正如先有問題，才有解決問題的方法一樣。所以從根本上說，真正的所謂輿論是本來存在於社會中的，而且必然會爲社會樂於接受的，但其間總須經過「職業的言論家」加以發掘、整理與揚舉，見諸文字，施諸紙墨，始能成爲一種輿論的形式。張季鸞先生有言：「輿論之鍛鍊，賴於知識之集中」；又言：「輿論之養成，非偶然也；必也集全國最高智識之權威，而辯論之，研究之，最後鍛鍊而成之結晶體，始爲輿論」。從這裏因而又可得到一個同時存在的認識，即欲求「智識的集中」，必有賴於相當充實甚至雄厚的經濟力量。沒有這種經濟力

這批灰色人物怎樣使英王變成傀儡的呢？他們的武器是「革命」。他們向英王說，「你們再不變成傀儡，便要革命了。」於是英王便乖乖地把主權交出來。這樣革命便成功了。可是人民呢？當英王尚未變成傀儡的時候，這批灰色人物是鼓勵人民革命的，可是當英王主權已經交出以後，他們便向人民說，「革命已經成功，大家各歸原位，安分守己，我們現在需要改革了。」改革是「艱而且慢」的，不能夠「淋漓痛快」的。

那麼主權交到那裏去了呢？人民並沒有得到。那批灰色人物呢，自己說「無意奪取政權」的，可是同時又說國王已變成了「主權象徵」；這就是說，讓國王担個虛名，而由灰色人物承受了實惠。國王要不就範，他們可以抬出「民意」來壓服，因爲他們是「民意代表」。這便是某些先生所指稱的「師儒」。他們正像「政教合一」時代用神權去制服皇帝的巫師，不過現在進步了，從神權代表變成民意代表了；其作用還是一樣。人民假使不就範呢，他們又抬出國王來，他們又以「帝王師」自命，而帝王之師只有少數人才有資格的；他們應該具有哲學家的頭腦，就是某些先生所謂的「通儒」。

這樣，他們便站在「中間」，對上的身份是民意代表，用的武器是「民意」，是「革命」，對下的身份是「通儒」，用的武器是「哲學」，是「改革」。他們「絕不是兩面倒，而是左右的長處兼收並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真是「自由」得很。

「我們在此爲這「灰色人物」的臉相繪一輪廓」，是希望真正「以大多數的幸福爲前提」的人們認清這面「自由主義的旗幟」究竟是什麼？

張嘯虎

量，即無法「集全國最高智識之權威」，亦無從有所辯論、研究、與鍛鍊，自然就不能獲得知識結晶體的輿論，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的邏輯。而同時，在近代商業社會中，智識的本身就可視爲一種資本。蓋資本爲勞動所產生的成果，經過累積而用以進一步的促進生產，在這一點上，智識與資本實具有同樣意義。勢心的智識份子們，在其受教育與自我學習研究的過程中，一方面以智識的吸收、追求、以至儲蓄，作爲其「固定資本」，如土地、機器、原料一樣，構成他自己財產的重要部份，作爲再生產的根本因素，而另一方面又陸續將其智識加以鑄化而製造爲作品，也就如所謂貨物一樣的賣出去，或獲得稿費，或出售版權，或抽取版稅……當作一件交換的商品，用以謀生立業。報社或書店便是一種銷售機關，介乎生產者（職業的言論家）與消費者（讀者）之間，調劑供求，規定價格，開闢銷路，招徠顧客。這樣看來，則不僅把智識集中起來使其成爲輿論，是建立在經濟力量之上；而且言論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種近乎資本的形式。或者說，在輿論的本質中，是含有大量的經濟因素的。其次，言論從羣衆中來，又要到羣衆中去。從公開的表示，到社會的評價，以至勢力的完成，是必需以出版方式作爲其媒介的。故

輿論是以出版為其成立的條件的，其間當然又以報紙雜誌作為其表現的主要工具。而舉辦報紙和雜誌，一要有錢，二要有制度，其結果便是所謂出版業。出版業為商業之一種，亦以推廣市場，獲取利潤為其經營的目標，成為當代大規模的企業之一，其先天下便流著商業性的血液。何況要使言論深入羣衆，普及社會，發生理想中廣大的力量，起「領導革命，監督政府」的預期作用，則必須首在經營上獲得成功，就如商業上貨物要有市場一樣。換言之，報紙和雜誌必須有了穩固的經濟基礎與廣大的銷路，而後能在社會中取得一種重要的地位，獲得人民與政府的普遍重視；有千萬讀者做後盾，而後其所表現的言論，才有舉足輕重與登高一呼的價值與作用。問題就在這裏：要把報紙和雜誌辦好，就得先有堅固和相當巨大的經濟背景，就得先有一筆供開創、周轉和發展的原始資本。出版業和其他企業一樣，資本是其生產組織中最重要的基本因素。

## (二)

正因為言論非資本無以成立，無以表現，無以產生力量，無以實現其自身之一切目的，所以反映於言論方面的途有各種可悲的現象。言論界與報界早有此種沉痛的控訴與指摘，如吳哈教授謂：「目前的事實，是報紙與輿論分了家，輿論被埋沒在一般人民的胸坎中。報紙背叛了人民，離開了現實，孤零零的掛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進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為這時代的一個應有點綴品罷了。……報紙與輿論的合一，應該是當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論壇」）。吳先生所指出來的「報紙與輿論分了家」的情形，其造成的原因固然很多，我覺得主要的是經濟的原因。即以當前的上海報紙雜誌而言，真正能夠經濟自力而稍可言輿論者，恐怕只有一二家而已。其他大多數的報紙雜誌，或官辦，或接受來路不明的津貼，或以某巨公財閥作後台，或是某派系出錢來辦的……泥泥帶水，夾七夾八，其資本的來源既如此，當然就決定了其言論上不可設想的墮落傾向！此種報紙的存在，本來就是代表統治階級與一種特殊勢力，或者可說是代表現行的既得利益集團，若希望其能有代表人民說話的公正言論，不啻是一個緣木求魚的癡想！背叛人民，離開現實，成為時代的點綴品，自是意料中必然的結果。猶憶去歲報載「××報與×××結婚」一事，××報本為南京一個獨立經營的報紙，深得讀者愛戴；但終因開支浩大，經費無着，維持不易，再要如此「獨立前進」下去，將有「關門大吉」之勢，結果只得一個「嫁作商人婦」的悲慘命運。由此一例，可知資本對於言論的摧殘力量。這只是隨便俯拾的一個事例。中國自有報紙以來，與此大同小異的現象正多，明眼人自可一目了然。

但是，即正式商業經營的報紙，雖在其資本上得以獨立發展，無所依賴，而在言論上的表現，却往往並無理想中的價值可言。民國十二年當新報三十周年紀念時，張季寬先生曾致祝詞說：「中國成功之報紙惟有一新報，蓋中國有報數十年，興者仆者數百社，而認爲一種純粹商業，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資助，獨立經營以維持而發展之者，惟有一新報。且中國之報界淪落甚矣，自懷黨見，而擁護其黨者，品猶爲上；其次，依資本爲轉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尋常；並無言論，違言獨立；並不主張，違言是非。而新聞報獨能發揮其在商言商之主義，不求津貼，不賣言論，不與任何特殊勢力締結關係。」誠然，新聞報過去在這一點上可說是成功的，但正因其太著眼於純粹商業上的經營，在言論上不免就令人稍覺失望了。所以，張先生接着便很委婉的說：「報紙

性質，一面應作商業經營，一面則對於國家社會負有積極的扶助匡導之責任。新聞報者，第一層已著成功，第二層尚有餘地。」（均見新聞報三十周年紀念冊）這番話的指摘，顯然就是新聞報的遺憾所在。張先生如果還在人間，再拿今日的新聞報看看，不知又有什麼感想。我們因此可獲得一個初步結論：商業報紙雖有時在資本上以正當手段獲得可觀的成就，往往同時就在言論上無多大貢獻可言；對報紙自身是一種好生意經，而對國家社會則是一種損失。這不是一個必然的推理，而是一個事實的結論。蓋商業報紙生長在都市社會中，商人只要廣告，不要言論；市民階級只要風花雪月的軟性文章，只要那票強姦之類的黃色新聞，不需要有益國計民生的硬性言論。此其一。而且商業報紙的本質便是「市儈性」的：一則「在商言商」，以追逐利潤爲其惟一目標；再則「近商者在使商獲利」，只在如何繁榮市場，增加各商店的收入，必要時可出「皇后小姐特刊」，而不顧多開一個專欄，多增一個副刊，利之所在故也。此其二。商業報紙的組織是企業形式的，而資本又多握在幾個大股東的手裏；股東們的目的在如何多賺錢，多享受，不喜談什麼國家社會，何況這些大股東的利息，往往是與一般人民的利益相衝突的，即有言論，也只是保護這些股東的利益的言論。此其三。在今日，商業資本已與官僚資本結不解之緣：商業資本或被官僚資本牽連着，直接依附於政權；或與官僚資本融合着，構成「如影隨形」與「爲虎添翼」的關係。官僚資本支持着官僚政治，正如官僚政治維護着官僚資本一樣。在這種連鎖性關係之下，報紙只成了官僚政治與官僚資本的外圍或代言人。此其四。就此四點，決定了今日一個純粹商業報紙在言論上的平凡與墮落！

同時，一般人又以為在英美等國中，辦報不要登記，事先無須檢查，絕無封閉、拘捕、警告，以至搗毀、暗中阻撓的情形，則一定有真正能代表人民說話的言論了，殊不知事實上並不如此簡單和樂觀。四年前，成舍我先生在桂林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就指出了這一點。他說：「據我個人推斷：假使我們事前沒有準備好一個良好精確的尺度，而僅抄襲英美的「言論出版自由」，則其結果，將只是資本家或政黨的言論出版自由，真正大多數的老百姓，仍必有冤無處訴，有話無處說。此其原因，即辦報要錢，今後步入科學化工業化時代辦報，更要最多的錢。最大多數的老百姓，當然不能人人有錢辦報；有錢辦報的僅是少數資本家，或有資本家做後台的政黨，他們以報館爲維護其本身利益的利器。……在法律上，英美的確給與每個國民以最大限度的言論出版自由權，可惜的是不能人人有錢辦報」。又說：「自報紙黃化以來，一部份英美報紙，更藉言論出版自由的護符，爲資本家「招財進寶」的工具。敗壞風俗，唯利是圖，這更是英美言論出版自由制度下一種最不幸的現象」。成先生的這一些話，不僅揭發了英美式所謂「言論出版自由」的秘密，且對我所提出來的問題，給了一個極深刻的啓示和補充。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紐約先鋒論壇報的社評中有一句：「美國報紙永遠是一種關聯社會利益的事業」，立刻就遭到金融資本的中心機關報——華爾街雜誌——的猛烈反擊，其言其詞曰：「報紙是一種私人企業，社會既然沒有給它任何特權，它對於社會也沒有任何義務。它和社會公眾利益並無任何「關聯」之處。它根本是它所有人的一種財產。經營報紙的主人，也和其他企業家一樣，自己冒險，自己承擔，製造他的成品在社會出賣。如果社會公眾不歡迎他的主張或他發表新聞的方式，那麼唯一補救的辦法是把報紙掌握在他自己手裏。沒有人強迫大家買他的報紙。……我們一點也不輕視總統（指威爾遜）在最近新聞編輯會議上所提出的指示，但我們可以說，這些報館編輯除了自願自辦

者而外，他們的言論政策，當然要照他們東家的意見。……不過爲了很滑稽的明顯理由，有許多報館主人很願意給社會灌輸一個錯覺，以爲新聞選擇言論主張的大權是操在編輯先生們的手裏。……故當報紙已成爲一種大規模的新型企業之後，即令有發表自由的客觀環境，而沒有經濟自力的主觀條件，也不足以言任何勇敢健全裨益平民的言論之存在與發展，從這裏可得一有力證明。

### (三)

中國報紙中力求經濟自主，而藉以爭取其言論的超然獨立與自由者，我覺得有兩個前例可資參考。

其一是大公報。關於大公報的內部真實情形，筆者甚爲隔膜，一切未敢斷言，但至少該報是經常以持論獨立自許的，如云：「雖有商業化的趨向，而仍極力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其情形據稱是這樣的：「本社最初股本只五萬元，可謂極小。當初決定：失敗關門，不招股，不受投資，不要社外補助。五萬元剛用完，而營業收支正達平衡，就這極微細經營，自然發展。而在戰前，加上努力股，也不過僅成爲五十萬元一個小公司。我們自信：大公報的唯一好處，就在股本小，性質簡單，沒有干預言論的股東，也不受社外任何勢力的支配，因此言論獨立，良心泰然。」（三十年五月十五日社評）又曰：「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的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關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爲金錢所左右。」（十五年九月一日社評）該報過去與現在是否業已一一做到這些，事實具在，留待社會公判，筆者不過借其揭舉之言，說明報紙應有的努力方向而已。

其二是文匯報。文匯報現已停刊，但就其曇花一現的短短生命中，已爲低沉陰霾的中國報界放射了燦爛奪目的光輝。去歲文匯報因增資而公開向讀者招股，其言有曰：「報紙的生存，不外兩途：一是靠津貼，一是靠營業。本報自創刊以來，就決定不接受任何政治性的投資，不接受營業以外的任何給與，而且對於任何經濟上的變相資助，如低利貸款之類，也始終拒絕。因爲我們知道：在經濟上有所求，就不能不在言論態度上有所讓。這就違反了我們辦這絕對獨立的民間報的初衷，我們寧願咬牙苦鬥，而不希圖任何便利。……我們是人民的報紙，我們不僅要使這報紙始終爲人民所用，爲人民說話，而且要使她根本爲人民所有。換句話說：凡是本報的讀者，都應該有權監督這報紙，管理這報紙，實際來參加這個事業，大家羣策羣力，把這民間輿論機關活潑起來，堅強起來。……」（三十五年十二月七日社評），其徵募的方法是：每人至少是十股（十萬元，免費看報一年），至多一千股，以免股權集中。股票是記名的，一百股以上的認股人，都須經過詳細調查，以避免任何政治性的投資。這也是一個最進步而理想的辦報方法，冀日政治清明，經濟安定，即將是此種報紙脫穎而出之時，當可預料。

### (四)

爲了要求報紙與輿論的合一，作爲人民與現實的「照心鏡」而不是時代的點綴品；爲了要使資本爲言論服務，言論爲資本的主人，而不是作爲政治資本的工具；爲了要使

一個「在商言商」的報紙，一面可以獨立經營和發展，不假外力資助，一面又能在言論上對國家社會有所匡導扶助；爲了要在民主社會中，人民能真正享受到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我認爲必須實行下述的三個具體意見：

第一是將現在各地所有黨辦的報紙一律改組爲當地人民報紙的基本資產。此種報紙的開辦費與現在經費來源本係由國庫供給，而所作的却是黨團宣傳工作，則改爲「國營」或「民營」，正是名正言順，無可爭辯。改組之後，便須徹底的更換主要各部門的人事，務以辦黨的人不辦報爲原則（黨內出錢，辦自己的黨報，當然又是例外），聘請大學新聞系畢業的青年同學接辦。彼等志慮清純，年富力強，有專門技能，有高遠理想，而無偏狹的黨派觀念與其他切身的利害關係，自可獲得人民的衷心信託。這種經過改組，仍由國家出錢，而讓專才主持替人民說話的報紙，各省各市各縣最少要有一個，而其基本資產的來源，自以「徵用」各地的黨報最爲適宜。本年三月五日法國宣傳部長賴波爾向全國廣播稱：現代報紙需要取銷官辦，殆爲恢復出版自由的首要條件；官辦報紙在戰時固極需要，但在平時則非所宜。他的談話也是這種意思，我則主張除了消極的取消之外，更應該積極的改造爲人民自己的報紙。

第二是禁止和防止資本與大商業資本家打入報業來。中國今日因爲報業尚未大量發達，不足以引起豪門投資的興趣，可是一旦大局和平，國家步入建設，工商業繁榮起來，報紙也如英美等國那樣擁有廣大的銷路與巨額的利潤，則必然也有如赫斯德、魯斯一流人物出現，想壟斷和獨佔出版市場，而其影響又如此惡劣可怕，自不能不預爲防止。同時，目前的官僚資本，利用政治上的特權而存在，運用經濟上的特權而壯大，以一種絕對有利而不公平的優勢與民間企業相角逐；此種資本爲了保持其政治經濟上的特權，必將想盡方法打入報業來，借用言論上的特權而圖有所壟斷與發展，使民營報紙與人民言論蒙受極大損害，藉以維持其既得利益。所以，報界此後一面要嚴防此種資本的侵入，一面更應從輿論中激發羣衆的力量，從根本上剷除與打倒此種資本，這是很重要的。

第三便是讀者自己出錢，請專家辦報，替讀者說話的方法。各階層，各集團，各區域，各職業的讀者，都可以有自己的報紙。組織的形式仍然是股份有限公司，分爲若干股，每股若干元，由讀者自由認股，但不得超過若干股，以免股權集中。讀者即股東，股東大會即讀者大會。報紙的最高權力是在每個讀者的手中，讀者即該報紙的主人。股東大會中由讀者選出董事會的理監事，負責執行股東大會的決議案，並由其聘請報界專家擔任各部門的工作。總之，要使中國今後能有超然獨立、無黨無派、真正代表人民說話的言論，消極方面應將各地的黨團報紙徹底改組爲人民報紙，並嚴防大資本家與豪門打入報業來，而使商業經營的報紙，能以國家社會爲重，換言之，即是糾正和防止言論與資本之間的不良關係與危險狀態；積極方面可由讀者自己出錢，組織報業公司，聘請專家辦理，大家的錢，大家的報，換言之，即是建立和發揚言論與資本之間的正當關係與健全狀態。只有如此才有真正的言論，才有言論界的前途！

十二月二日改正於復旦。

## 啓

各方來稿除特約者外，均請附寄貼足郵票寫好地址之信封，以便不用時可以立即奉還，否則本刊不負退件之責。



# 農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會經濟生活

王亞南

##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官僚政治之歷史的經濟的解釋）之十一

由秦漢以至清代末造這一長期官僚統治過程中，農民的社會經濟生活，當然有不少的變改，比如，漢代的農民生活，不但與清代農民生活，有許多不同，就是他們各別對於唐宋時代的農民生活亦不難從社會文化經濟諸方面，指出其差異。然而，站在社會的立場上，因為那些農民同是生活在官僚的封建的統治之下，其生活內容，雖有怎樣的變改或差異，仍不會妨礙我們指出其共同的若干特徵，並且我們還不難由其變改與差異中，把握其一般的演變趨勢。

我在前面已一再講明了官僚的封建社會，就是官僚與農民構成的社會，或官民對立的社會。官僚或士宦的政治經濟生活形態，已充分從反對方面，顯示出了其對極農民社會經濟生活形態的一個輪廓。中國傳統的官僚生活，既如前篇所述，把經營商業，高利貸業，及地產業，作為其並非不雅馴，且並非不合法的勾當，而由是在許多場合，甚至視貪污為「當然」，於是，在其對極，農民方面，就不可能把他們的生活形態，拘束在歐洲中世及其以後相當長期間的農奴生活形態上，換言之，中國農民的社會經濟生活，由中國官僚封建社會形態限定它具有較包容得多的內容；亦就因此之故，一般膚淺的歷史學家，就斷定中國農民的社會生活，不但早就自由的，並且一直是自由的了。

我想沿着這一個論點，先考察他們所受社會束縛的特殊性質，再檢視他們由此必然受到的經濟榨取的深度，最後再附帶敘述他們在那種社會經濟條件下的政治動盪。

### 一

一向把中國社會的封建特質「取消了」的人，往往是拿歐洲中世黑暗時代或其前後相當時期的農奴對於領主的隸屬關係，來反證；以為當時歐洲領主對於農奴的支配，不僅表現在他們享有的經濟榨取特權上，還表現在他們的社會政治權力如初夜權，裁判權，及移住、婚姻干涉權等等上面。這裏姑先把經濟榨取的問題放在一邊，看中國的農民，是否在這些方面，真正享有「自由」。

首先就「不雅馴」的初夜權來說。這在歐洲，儘管鐵一般的史實，顯示那在某一歷史階段，曾施行得非常普遍，但正統的歷史家仍覺承認那種事實的存在，就無異否定他們以極大氣力來描述的當時社會上下階層的「善良」風習。而在一向強調禮義廉恥的中國社會，當然是根本不允許這種惡習存在的。然而一切倫理的教義，畢竟是社會的產物；社會即使在這方面給予了農民更大的寬容與面子，同時它也在這同一方面給予了士宦階層或地主階層以更大的便利和縱容。「竊見江南富戶，只靠田土，因買田土，方有地客。所謂地客，即係其民……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子女，便為婢奴，或為妻妾……」（見「元典章」至元十九年御史台奏議）也許農民子女充當主人的奴婢是當然

，而充當主人的妻妾還是「高昇」。但我們更當注意的，却毋寧是一般盛行於農村的以次這等辛酸的事實，即，凡屬農村小民間，稍有姿色一點的將婦甚或已婚婦女，幾乎是很少例外的要註定或為那些土豪劣紳乃至他們老爺輩或少爺輩淫淫污污的好對象。這種破廉恥罪行的普遍，以致許多有名的小說和戲劇，都是把它作為演義表演的題材。

其次，就裁判權來說罷。在法律上，中國地主階層對於他們個別隸屬是沒有裁判權的（雖然我們的歷史上仍不乏地主自建城堡，自備守衛，自設裁判所牢獄，以虐待佃農的非法事實的記載）。反之，農民如其受了地主的不當迫害，還有權訴之於官府。但實際的情形怎樣呢？無論是貧農，佃農乃至辛苦起家的小農甚至小地主，他們對於當地大小豪紳所表示的隸屬程度，單用歐洲中世農奴屈服於領主的裁判權來測量，是頗嫌不夠的。豪紳土劣們上通官府，下結地痞流氓；他們的語言，經常成為善長小民的命令。善長小民簡直是他們經常準備找機會去剝削敲詐干涉壓制的俘虜。我們已經瞭解官僚社會的政治法律的一般目的，就在於立並維護官僚對人民的統治秩序。在他種秩序下，要想像一個無知無識而且孤立無助的農民，去控訴紳豪所加於他們的罪行，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實在不直接受著其「頂頭上司」或莊主輩的裁判，同時還得忍氣吞聲的去接受其所在社會一切豪紳土劣輩不利於他們的任意決定。

此外，關於農民的移住與婚姻的干涉權，中國地主或莊主亦像是不會取得法律根據的。然而事實却並不因為沒有法律規定，便不許存在。我們已瞭解中國任何朝代都有大批由土地游離出來，變為官奴或私人奴隸，而與那些尚保有或租有土地的所謂「自由農民」雖然並存的事實。把十足的奴隸丟開不講，如果是一個地客，一個隸農，他要向強豪「貸其種食，貸其田廬」，「依託強豪，以為私屬」，他在實際，就已經不可能為他自己所有。而成為強豪財富勢力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了。他的行動，特別是他的移住轉業的「自由」，事實上絕不可能存在。連帶着，他的婚姻等問題，也決無法自己作主。所謂「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戶常行攔當，需求鈔貫布帛禮數，方許成親……」（同上）「元典章」奏議），不已表現得非常明白麼？然而，我覺得特別值得注意的，倒還不是個別佃農受制於其直接莊主或地主的情形，而是整個善長農民受制於其所在社會一切豪紳土劣的情形。他們的魔手，隨時可以伸展到農民生活的孔隙。農民的婚喪，買賣，遷徙乃至由死亡引起遺產的爭執，都將成為他們有權可乘，「無孔不入」的斂財作惡機會。從上面幾點說明，我們已不難窺知中國農民社會生活上的「自由」，乃具有以次這樣一般的屬性，即

第一，與歐洲中世的農奴比較，中國農民在法律上所享有的一「自由」，也許較多數大，而在現實上所遭受的壓制，實在更為苛刻。一切官僚社會都是講形式的，許多法律往往不是為了實行，而是為了「裝飾」或「掩飾」。這與秘，很早就為人道出了：「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前漢書」食貨志）。歷史上所有關心農民生活的最真文告，差

不多都可從反面去得到理解。

第二，與歐洲中世農奴比較，中國一般佃農即使對於其個別的直接的土壤保有較大的自由，而他們連帶其他貧農，小自耕農乃至勤勞起家的小地主所受所在社會官紳士劣的壓制，却又更為苛刻。這即是說，中國農民的社會生活，就一般佃農講，簡直是二重的剝削；一方面，他得聽其「衣食父母」——地主或莊主的擺佈，但在另一方面，那種擺佈，却並不能保護他，使他不受所在社會官紳士劣的侵凌與損害。

我們如其能觀察中國官僚封建社會進步裏面的退步，隱在形式自由後面的壓制，假使允許農民自己選擇所屬封建體制，他們也許不會怎樣熱心於我們國粹學者所道貌的「國粹形態」罷。

### 三

任何經濟的榨取，是在一定社會關係下進行的。中國農民的上述社會地位與社會生活，當然會影響他們所獲經濟榨取的深度。在前述租稅關係上，在官僚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的關聯上，我們已間接指出了農民的經濟負擔。然而，我在這裏所要特別注意的，却還不是他們直接的租稅負擔，而主要是由他們所處不利社會地位，招致的無形的、不確定的、無限制的、隱在可以避過到的各種無情的剝削。

本來中國歷代的專制而封建的王朝，在開朝開國之初，例皆承當喪亂之後，所以安集流亡，務農勸工，省刑薄斂一套辦法，有多少朝代，就會重復過多少次數。在這種場合，一般農民，特別是那些自耕農，還多少有一點喘息的機會。但此後不久，一般自耕農就開始佃農化，一般勉強獨立的貧農小農，就開始隸農化奴隸化，那種情形，就在正規租賦沒有怎樣增加，賦或是皇皇文告減免的場合，依舊不免發生，那是什麼緣故呢？

大概每個新王朝的最初幾代君主官僚們，爲了收拾人心，特別是爲了增加生產，以裕稅源，還多少能保持一點戒慎恐懼的精神，留意人民疾苦；對於其下屬乃至農村豪紳士劣的各種壓榨人民的非法活動，尙可予以防範或抵制。等到安而忘危，積久玩生，或者消費貪慾，逐漸隨着經濟恢復生機而增強起來，官常腐敗，貪污橫行的現象，就不期然而然的發生；不幸，每逢這種場合，又是對內對外大張聲勢的演說。在以往的社會，疆武揚威往往是當作一種政治權力的炫示，或特殊消費排場的演出，但由此製造出的貪污機會，與藉端敲詐的口實，就成爲一般人民被損害與被勒索的生死關頭。由於我們前面（第三篇）指出的中國官僚政治的包容性與貫澈性，那個官僚體制的某一部分一發生破綻，立刻就把它病菌延殖到全體機構，全部機能上，使一般農民大眾接觸到的它們任何機構，都成爲一種可怕的災害。商業、高利貸、地權兼併、差役、攤派、貪污，都像「配」合得非非常週密。姑舉述幾項極有通性而且於我們並不怎樣生疏的史例：

試看貪污與高利貸活動的配合——「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互爭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而况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司馬光語——「宋史」食貨志）。

試看各種差役與地權兼併活動的配合——「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章誼語——「宋史」食貨志）。

試看差役攤派與商業活動的配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若過四年，則賣莊田

牛具桑柘以納官錢」。錢非私家所儲，要須貿易，樂歲追限，尙失牛價，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司馬光語——「宋史」食貨志）。

試看大戶藉差役吃小戶與攤派的配合——「民所患苦，莫如差役。錢糧有收戶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食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食非富民。中人之產，輒爲之傾。自變爲條鞭法，以境內之役，均於境內之糧，宜少難矣，乃民間仍歲奔走，是條鞭法行而大戶未嘗革也。」（范景文語——「明史」食貨志）。

試看差役、攤派、貪污活動的配合——「……請先言其病民者：州縣管驛，可以調派里民，於是使臣乘騎之數，日增一日，有增至數十倍者，任意隨帶多人，無可查詢；由是管驛長隨，辦差書役，乘間需索，差役未到，火票飛馳，需車數輛及十餘輛者，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羸馬亦然。小民舍其農務，自備口糧草料，先期等候，苦不堪言……至於州縣之耗帑，又有無可如何者。差便一過，自備舍鋪設，以及筵席等等糜費，並有資絲饋送之事。隨從家人，有所謂「抄牌禮」，「過站禮」，「門包」，「管席」等項名目甚繁，自數十金至數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視氣韻之大小，以爲應酬之盛殺……」（清王杰奏疏——蕭著「清代通史」中第二六〇——一頁）。

從上面的史實，我們知道中國農民困苦的原因，與其說是由於正規租賦課租太重，毋寧說是由於額外的、無限制的、不能預測到的苛索過多。他們不像歐洲中世農奴，只有一個「項頭上司」的領主或莊主，直接對他們行使剝削；他們中間除了奴隸或隸農外，爲了取得形式上的一點不屬於任何一個封建頭目的「自由」，却得支付這樣一種大的代價，致使所在社會一切大小官僚封建的頭目，乃至與他們資絲爲義的商業者高利貸業者，都能找到機會和口實，個別的或聯合的予他們以社會經濟的損害。

### 四

中國的農民，原是以具有極強烈的忍耐性見稱的。然而他們的那種忍苦耐勞的強毅精神，並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宗法社會組織，倫理教義，以及一再再生產出來的種種同形態的統治方式，把他們教訓鍛鍊成的。他們「小人」確實是由「學道則易使也」！可是，正惟他們不是天生的「易使」，而是「學道」則「易使」，一旦那些當作「道」來範圍他們的社會組織，倫理教義，政治權力發生破綻，他們即使談不上什麼政治的自覺，也將因所受社會經濟壓制剝削的過火，而使他們的極度忍耐，具體突發爲不可抑制的反抗。

事實上，在農民社會經濟生活遭受破壞的過程中，官僚統治已經會相應發生種種不利的反作用。不論那種社會經濟制度或政治組織，在它結局是把一部分人或統治集團的特殊利益，寄託於對另一大部分人或被統治集團的剝削的限內，那種制度或組織的健全性，是表現在它能繼續保證那種剝削，或保證增進那種剝削，而不是以「殺雞取蛋」的那種暴烈方式，來枯竭剝削的源泉或挖掘其基礎。可是，不論那種制度或組織，即使其統治者再會深謀遠慮，也無法防止它繼續到一定階段以後，不走到那種「竭澤而漁」或「自掘坟墓」的道路上。中國每一王朝的官僚統治，開始原是兢兢業業的想設法培育其剝削源泉，到了它動員全社會每一統治勢力，向着農民大眾橫施壓迫敲榨，以致使農民的社會經濟生活全被破壞的階段，它顯然會從種種方面造出無可解救的矛盾：首先，「以農立國」的封建社會，是不能讓商業高利貸的活動過於猖獗的。即使

官紳自己也在從事那種活動，那於犧牲農業，犧牲農民，以成全商人高利貸者的本質，亦無所改變。結局就是所謂商人高利貸者吞併農民，而使那種社會的根基發生動搖。

其次，貪污的橫行，儘管某些個別的官僚及作爲其爪牙而活動的屬員與豪劣，得到了好處，更富有了，或更有勢力了，但整個官僚統治機構的每一環節，顯然會引起鬆弛，脫節，乃至紊亂到不能有效運轉的程度。

又其次，農民是在土地上生長的，一切倫常教義，一切「安分守己」，「安土重遷」的大道理，是要他們能繼續在土地上生存下去，才能發生作用。他們一旦因着四方八面的壓迫榨取，而從土地上「游離」出來，而變爲所謂浮浪者，浮食游民；以前所有的社會思想的羈絆，便不再對他們發生效用了。

當官僚的封建統治在或急或徐的發生上述變化的時候，農民除了應驗着古典的預示：「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於死亡」，或「老者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以死亡與流散來逃脫暴虐統治所加諸他們身上的壓榨剝削外，往往也採取其他兩種不正常的或決非他們所願意的對抗方式。那就是個別零散的變爲匪盜，或集體時公然起來叛變。一個人的生存受到威脅，而不得不逃亡，那已接近了變爲匪盜的邊緣；匪盜匯合噴聚到了相當數量，那就很快會變爲犯上作亂的隊伍。事勢發展到這田地，所謂「農民戰爭」，就一度被慘酷的表演出來。不幸這種事態一步一步的形成，已經是官僚的封建統治機構窮蹙與頹廢的結果，而要此種統治機構去應付農民的逃散與叛變，勢將使惡劣事態愈不可收拾。

本來，每個王朝對於它在統治中期以後引起的所謂「農民叛變」情形，並不是完全沒有在事前予以補救；無奈那種「離叛」情形，不是偶然從社會外部「投入」，而是由社會內部矛盾爆發出來，所以任何解救的節目，都變成了擴大災難的弊政。比如，各種各色的剝削敲榨，自然不是同時加担在農民身上的。但農民的生活本來是很苦的，本來是把他們的生活資料壓縮到了僅夠維持生存的限度的。他們一旦遇到自然的災害（一切封建社會的自然災害，都帶有極大的社會性質，此點將在下面予以交代）或意外的差遣或攤派或需索，就只好儘可能的縮減其生產支出，生產支出減少，收入將相應減少，而他們對於擴大消費，增繁刑政，加重攤派所必然導出來的負擔，却可能加多；等到被各種負擔，各種勒索方式迫着離開土地，離開生產過程的人愈來愈多了，而承受原有負擔的人愈來愈少了，負擔的總額即使不再增加，他們更少數的人個別負擔的分額，已無法不再增加了；假使這時爲了維持治安，爲了救濟貧困流亡，而再增大支出，那就無異叫那些生產收入愈來愈少，生產人數也愈來愈少，而還勉強留在生產過程的農民，除了負擔原來各種各色的消費者以外，又去負擔那脫離生產過程的新消費者。結局，能繼續在生產上掙扎的人，將愈益減少，流亡匪盜隊伍將愈益增大；事實依着無情的辯證邏輯，竟這樣不顧人們的意志而自動的發展着，這時即使有仁慈的明君，不斷下詔罪己，還加上若干有爲的輔佐，多方設法強羅，也將感覺大勢所趨，不易撐持了。

到了這種局面，每個官僚或爲統兵大員的人，像是本能的要打算抓住機會，掏它一把，以爲「後圖」，所以這時被派去緩和或賑濟難民的官吏，很容易成爲「劫民」的使者，舉一以類其餘罷；漢世新莽之亂，「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粟之，吏盜其粟，飢死者什七八」；「漢書」食貨志。由王莽篡漢，到清代中葉以後，時間快進展了兩千年，而作法還是那一套：「凡朝廷賑恤之項，皆中飽於有司，此上恩之不下逮

……」（清洪亮吉「平邪說疏」——讀著「清代通史」中第二五二頁）。這撫無方，民相率叛變，貴成文武官吏去剿治，在新莽之世，「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將軍，遣着武將軍連等領名都，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綠邊，大都督，大森猾，搜弄兵者，皆使爲盜於外，擾亂州郡，貨賂爲布，侵漁百姓」（「漢書」王莽傳）；在這方面，近二千年的「進步」，僅只是「無事備糧餉，有事避罪就功，州縣以之蒙府迫，府道以之蒙督撫，督撫以之蒙皇上；若有功，長隨幕友，皆冒得之，若失事，掩取選流願歸於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止州縣，封疆大吏，統率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今軍行數年，花翎之錫，至於千百，果安在哉？將弁棄營陣，棄營壘，常相避賊鋒，大吏又務爲掩飾，咎果誰任耶？」（同上洪亮吉疏）。

然而，在官方如此，而在其對極的民方，始終只是在爲求生存而掙扎，爲剷除迫脅其生存的障礙而掙扎。在近兩千年前，他們起來反抗新莽，並不是有所愛於漢室，並不是想再見「漢代衣冠」，那是「王莽篡漢，上書誦者八千」的士大夫，等到「見勢不佳」，又同轉來「曲解」民衆的。其實，漢在哀平之世，已經是「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離，流散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前漢書」孔光傳），王莽新朝不過是在漢代官僚封建政治機構鬆弛虛脫狀況下產生的，借他「以暴易暴」，「不知其非」，於是「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王莽傳）。可知人民在饑餓肚皮亂碰的當兒，對於綱常順逆之分，並不會怎樣去鑑別。即使是延至清代以異族入主中國，扶明滅清的「大理想」，還是等到「饑寒起盜心」的關頭，才能成爲一種現實的號召；所以，清代中葉後，對於當時所謂邪教愚民的作亂，在上者都還認定「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又謂「今者川楚之民，聚徒劫衆，跳梁於一隅，逃死於毒刻，始入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禱。繼由地方官挾制萬端。……又黔省之苗氣不靖，延及數省。賦外加賦，悉不應應，欲藉起事以避禍，邪教起事之由爲此」（同上洪亮吉疏）。這種「官逼民反」的故事，充滿了中國歷史。我之所以僅把漢清兩代官民對立情形加以比照，就因爲由此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變亂，朝代雖相去二千年，其性質大抵相同，特我認定「官逼民反」的「官」，不當理解爲某個或某些特別的官吏，而是整個官僚統治。單是某些官，甚至單是整個官僚階層依食污或其他方式剝削農民，農民尙不致逼到求生不得的程度；若官僚除了自己直接藉政治權勢侵漁農民外，更連同與其有絲毫關係的地方爪牙，從事敲榨，再益以商業，高利貸業乃至地權活動的凌奪，那才真是農民走頭無路，「挺而走險」的時候了。

然而，就在這種場合，不但農民自身，就在同情農民的少數士大夫，他們亦還不能明確認知，他們生存上所受的威脅，是由於在社會政治上沒有取得「平等」「自由」的結果，從而，他們犯上作亂的要求，一般都是經濟的意義大於政治的意義。這無疑是「不可使知之」的儒家政治典範，收到了莫大的「催眠」效果，但在本質上，却不能不說是由於以往中國二千年的社會動亂，始終是農民的，而不是市民的。亦就因此之故，中國同性質同形態的農民戰爭或農民的社會動亂雖然重復了無數次，而每次的結果，總是再生產一個同性質同形態的政治體制完事。

爲什麼呢？我將在下一篇予以確定的解答。

# 新歲雜感

白 苜

## 論甘地先生餓飯

甘地先生餓了一百二十小時又四十五分鐘的飯，結果是消除了印回兩族積不相容的仇恨，化干戈為玉帛，贏得和平，這自然是一樁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所以這幾天舉世輿論都在熱烈歌頌這位七十八歲的印度老頭兒的精神感召，狂呼「萬歲」不已。

可是個人的看法稍有不同；當然，爲了國族和平的幸福，甘地先生肯拚着老命去餓飯，確是可敬可佩的。然而假如印回兩族的領袖頑冥不靈，各執成見，聽憑你這隻手無寸鐵的乾癟老頭兒餓飯也罷，上吊也罷，他們非得打個頭破血流，你死我活而後罷休。那麼甘地先生縱使活生生地餓死，於事又有何補？

如今世界上自己內部兵兵兵，烽火漫天的國家民族，何止印度一處；爲了呼籲和平而正式掛牌餓飯的雖祇有甘地一人，但困自相殘殺的內戰，以致流離失所，飢寒交迫的無辜人民，爲數已無法統計。他們何嘗不餓飯？餓飯豈僅一百二十小時又四十五分？他們何嘗不呼籲和平，呼籲的哀誠聲更無須用電台廣播，便已到處可聞。可是好勇鬥狠，窮兵黷武的「英雄」們非但假作嫺靜，不聞不問，反而一意孤行，強逼人民去衝頭陣，當炮灰，搜括民脂民膏，作爲打仗的資本，弄得國家經濟破產，生靈塗炭。明明兵無鬥志，還說勝利可期。甘地先生如果碰到了這樣「不到黃河心不死」的「英雄」，餓飯云云，管他個屁事！

由此看來，拚着老命餓飯的甘地先生的精神誠然可敬可佩，而更值得敬佩的，

應該是識大體，顧大局，以國族人民爲重，能夠一念悔悟，適可而止的印回兩族的領袖們！

世間爲呼籲和平而餓飯的人民是夠多的了，可恨的還是像印回兩族那樣賢明、偉大的領袖實在太少！

## 競選呢？還是徵婚？

爲了「實施憲政」，鬧過一陣子國大代表選舉以後，這幾天又在鬧着選立法委員了。

對於這一類民主把戲，我這個頑劣蟻民向來是不甚感到興趣的。無奈保甲長扣留了寒舍應得的油糖配給證，必須去投一票纔肯發給，人窮志短，祇好唯命是聽。於是我也就見識了競選立法委員諸公的宣傳妙術！

平心而論，在這一方面的技術，真是五花八門，頗有一些熱鬧可看的。有的像大出喪似的汽車列隊遊行，鑼鼓喧天，招搖過市。有的像開游藝會似的發表競選演說，佐以滑稽相聲，藉助餘興。有的包飛機散發傳單，有的挨戶分送卡片……心裁別出，各有千秋。其中有一項辦法是大家一致的，那就是以招貼形式，印上競選者的姓名，履歷，競選政見等等，外加還有一幅鑲成銅版的「美術照像」。

爲什麼要用照像呢？據我的陋見，大約競選諸公怕我們選民未曾識得廬山真面目，難保不指鹿爲馬。印上一幀玉照，便可以讓大家按圖索驥，「驗明正身」。如此妙法，豈非根牢果實，萬無一失了嗎？然而事情也有例外的，譬如某一位女性競選者，就我所知，她至少是年逾半百，鶴髮雞皮，屬於「姑奶奶」一輩的人物

了，然而印在宣傳招貼上的照像，雖未必秀色可餐，動人心魄，却很明顯地是她二十年前的風韻猶存時代的芳姿。爲選民們欣賞色相計，這點「苦心」是無可盡講的，但爲了要大家按圖索驥去投她一票，這可有問題了；競選者既不以真面目示人，叫我們如何「驗明正身」呢！

鄉間陋俗，一個嫁不掉的姑娘託人做媒，往往拿了她年輕時代的照片去騙取如意郎君。而文明都市之中，亦不乏醜女人借用別人照像，登報徵婚的怪事。但目的完全不同；這是以虛偽色相騙得丈夫，自非民主競選中的爭取選票可比。難道這位女性競選者竟以爲投票者都是男性，而男性個個都是色中餓鬼嗎？

因此，當我躊躇着是否要投她一票的時候，心裏不免疑惑着究竟是競選呢？還是徵婚？

## 所謂「調整」待遇！

公教人員的待遇問題，開了無數次的大小會議，拖了好幾個月，現在總算有了個決定的辦法，採用生活指數的原則，規定種種繁費心機的計算方式來發給。

作爲一個「末等國民」的公教人員，得到這樣的好消息，原是應該興高采烈，感激涕零的。然而仔細研讀一下那套噁哩噁哩的計算方式，你就會覺得有一副不情不願、咬牙切齒的臉相，隱現字裏行間，彷彿呼之欲出。這又何苦來呢？

我們姑不談公教人員今天拿到這筆「調整」了的恩俸之時，物價已經漲到如何地步？更不談這「欽定」的指數有何根據？單舉下列數點，也就足夠叫人哭笑不得的了。

第一點，既稱採用生活指數，則所指之數，當然是依據物價之漲落而訂。如今

，也往往早晚市價不同，按月計算指數，本來已是望塵莫及的了。可是溥同政府明令規定的，却要每隔三個月調整一次指數。這樣做法，除非政府有把握保證物價在這三個月內不准上漲，或是准許公教人員在這三個月內可以用一定的價格購買生活所需，否則，指數云云，豈非偷天換日，掩耳盜鈴？

第二點，調整辦法是從今年一月份開始的，可是採用的却是去年十二月份的指數。換言之，指數雖然明令規定三個月調整一次，實際上這第一期便是凍結了四個月。年關前後，物價因發行大鈔而突飛猛漲，政府豈有不知？今既已「忍痛」調整待遇，爲什麼定要在指數上硬摺公教人員一個月的油？國庫縱使窮困，這種「小算盤」也未免打得太精了！

第三點是更妙了，從這次調整待遇後，各機關自一月份起，必須按月縮減全部經常費百分之五，直到六月縮減至百分之二十五爲止。假定是原來用一百個職員的機關，到二月份就祇能用九十五個，依此推減，六月份祇剩七十五個了。政府機關要裁汰冗員，我們當然是贊成的，可是這必得以職員的工作能力來決定去留，尤不應硬性按比例的規定。照現在這樣辦法，不僅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算盤，簡直是「殺人養命」，「挖肉補瘡」的主意了。

此猶不足，還有第四點，據最近行政院會議決定，公教人員原有的實物配給，非但食米的數量要減少，其餘的鹽、油、煤、糖等，一概都要取銷。

如此情形，實在不能不使人覺得今番政府調整公教人員的待遇，是「要花錢」，是「打過門」，是雷聲大雨點小，是裝着慷慨施予的姿態，實際却在儘量剝削。一副不情不願、咬牙切齒的臉相，豈非已經躍然可見了嗎？



# 北美重遊 (三)

陳達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院 (三六、四、二十八)

哥倫比亞大學，為紀念其校長勃德勒 (Nicholas Murray Butler) 氏，蓋一新圖書館，名曰勃德勒圖書館，在原來圖書館 (Low Memorial Library) 的對面。我進入勃德勒圖書館之後，見油畫一大張，記述英王喬治六世及王后伊麗莎白於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的參觀。按哥倫比亞大學初名英王學院，成立於一七五四年。在一七六〇年時，英王會以冕相贈，藉作紀念。我入普通閱覽室，方在一書桌坐下，忽見牆上有大字標語，曰「人以知識為本」 (A man is but what he knoweth)，我突然回想從前此校有一著名教授，為求知慾所驅使，奮鬥十七年，排除各種困難，創立美國第一個政治與社會學院。我初在排華任教的時候，哥校曾寄我一冊這位教授的演講詞，敘述他的奮鬥，很可以證明這種標語似的。我想這種標語，十足形容教育家的立場。假如我們遇到一位生物學者，他對於「人」的反應，最先必想到骨、肉、高度、皮膚的顏色等。依同樣的理由，宗教學者對於「人」的第一反應，或聯想到行善，作惡，升天堂，入地獄等。惟有教育家衡量「人」的時候，才以知識為標準。我關於這位教授的演講，至少是十五年前讀過一次，現在已經記憶不清了。我回到旅館以後，致哥校秘書長一函，內述我所能夠追想的那篇演講。於七月二十二日得復，名曰「政治學院的成立，步濟時著」 (The Founding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by John W. Burgess, Columbia University Quarterly, December, 1930)。我從前讀此小冊時，對於我留有極深刻的印象，實因其內容含有深遠的意義，所以使我歷久不忘。現在我把這篇演講，重讀一遍，覺得增加我的信念，勇敢，激動我奮鬥的精神。彷彿對於我的一生，可以作為一種榜樣的。原來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十四日，哥倫比亞大學舉行該校政治學院的五十週年紀念會，校長勃德勒先生為主席。步濟時教授曾為研究院院長及政治學教授，時已退休。經校長介紹後，在紀念會演講，今節譯如下：

這次盛會，掀動我複雜與矛盾的情感。很少有人參加他自己事業的五十週年紀念，所以我想起這個機會，我心

坎充滿愉快，但我回憶與我合作這些人中僅我一人尚在人世，心中頓起變化，快樂驟轉為哀痛，使得我無話可說。末後，我再想今日的盛會，是要我追述劇中節目。在這些節目裏，有時我個人唱獨角戲，有時我唱主角，我是覺得難以為情的，只求你們格外寬容罷了。

如果我是沙士比亞或是哥德，我可以將這件故事編成話劇，其最生動的部份將近悲劇，可惜我無文藝天才，我只能說些邊邊閒話，對這些從事於教育及文化的朋友們供給一種參考的資料。

我國南方軍隊在一八六三年一月二日時，駐紮於登尼西省的中部。其右翼正當軍事吃緊的時候，有一壯年哨兵正在站崗，我正要說他這是寂寞的站著，如果你認為寂寞是由下列這些情景造成的，天空雷聲震耳，狂風怒吼，大雨傾注，地下到處有屍屍，其未死者正在哀吟中。由於遠處敵營的燈光，得見夜鳥成羣正在飽餐未埋的死者。這些鳥要等曙光的來臨，才逐漸飛散，如果你認為這樣慘慘的情景是寂寞的話，那末我們的壯年哨兵真是極端的寂寞了。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寂寞情景裏，這壯年哨兵似乎聽到他的靈魂向他述訴：「天呵！人既有理智，天良，情感與自由意志，可以不藉藉若憾死亡與毀滅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嗎？——但接着更響亮的就是他對自己作誓願說：『如果在戰時得免於死，我要盡畢生的精力以追求上述的知識，以期改變人類的行為及國際間的行為，並且我將把這種知識傳授給青年。』」這些悽慘的情景過去快要兩年了，在一八六四年內十月裏的某日這個壯年兵士徘徊於被戰事摧毀了的拿希未爾市。他的故鄉被破壞了，他的祖產被分割了，他的父母更亡命在外。這時他既失資財，又缺乏健康，精神頹唐，感覺寂寞，但卻巧因健康不佳而被軍隊遣散。他正徘徊歧途，對於他的將來既無計劃，又得不到可以諮詢的人，如是在街上行走，他的視線忽然集中在一所建築的二層樓上。他見有一塊招牌寫着 Jordan Stokes 律師事務所，此人是在登尼西省的一個著名的律師及政客，並是熱心贊助南方軍隊的人。他的家鄉在 Lebanon 鄉即 Cumberland University 所在地。南北戰爭的第一年，他的兒子和這壯年兵士是同班讀書的。猶如雷閃一樣，以

為這老人便是壯年兵的顧問，於是壯年兵士戰戰兢兢走上扶梯，敲律師的門。入門後見了三年前所認識的長者，壯年兵問其同學之所在，老人說：「在麻山秋山省美鹿康納的坎河流域的 Amherst College 肄業。這是 Horace Maynard 所介紹的。Maynard 生在麻省，在南北戰爭時協助南方任登尼西省的議員。老人問道：『步濟時，這幾年來你做些甚麼事？』我約略敘述自己的境遇，老人說：『你有錢嗎？』我告訴他說從軍以來，有一千五百元的積蓄。老人說：『我勸你進大學，再與我的兩個兒子同學如何？』一聽見這話後，我默默不言。剎時內，一八六三年一月二日夜間哨兵時的情景彷彿重新呈現在眼前，當時的誓願也彷彿餘音振蕩耳鼓。我知道這是我生命的十字街頭，我不敢猶豫，神情重新鎮定之後，我低聲說：『先生，我認為您的勸誠是正確的，我將立刻照辦，並表示謝忱。』三日內我到達 Amherst，十日內我加入一八六七級與 Stokes 的二子同班。

這是創時代的變遷，在我入大學之後，第一次參加早晨祈禱時，是在七點五十五分，這是每個學生必須參加的。當我進入 Johnson 禮拜堂聽見 C.H. Parkhurst 琴聲學生唱和時，我就把這裏和在軍隊時的情形作一比較：軍隊裏可怕的號聲，討厭的鼓聲，粗暴的命令；區別太大了。而這裏呢？音樂好像是由天上來的，等到 Starns 校長讀聖經，作禱告以後，我彷彿聽到 Prophet of old 回到人間，帶來和平及博愛的使命。最後我從禮拜堂出來站在每一個 Amherst 畢業生都最愛的地方，我生平第一次回憶，在那十月的一個早晨，看見這些小村如 Hadley 與 Hampton，又如 Connecticut 河猶如銀絲繚繞，再加那秋天的楓樹及 Sumac 和有些 Vermont 省的小山如 Pe Ham, Holyoke, Berkshire，我想似乎在十日之內脫離了地獄，進入了天堂。我在這時，重新記起一八六三年一月二日的誓願，我懇切地相信，實踐誓願的時間業已來臨。

不過，我的期望愈高，我的失望亦愈深。因為我所想要的知識，那時的 Amherst College 卻不能供給給我，一直等到第四年，我聽 Julius H. Seelye 講授的時候

，他很坦白地說，如果我留在這裏，則我的目的連部份達到都不可能。

Seelye 教授講哲學的歷史時，惹起我關於歐洲文學對於文化史的興趣，他以前在德國 Halle 大學，薰沐於 Kant 及 Hegel 的世界哲學。我向他秘密陳訴我的志願，他告訴我如果要貫徹我的主張，必須要到歐洲去，特別是德國。

Seelye 教授對於我自始是富於友誼的，並是我的主要顧問，當我在一八六七年六月畢業時，他介紹我到法官 Henry Morris 處去學習，他是 Amherst College 的董事，在麻省春田市服務，我去工作了兩年，即一八六七至一八六九，研究平民法及其實用，同時在法庭上時常向著名法官領教，如 Reuben Chapman, Ebenezer R. Hoar, James Colt 等，不過 Seelye 不想我在法庭花費太久的時間，因為他以為平民法的知識與手續應有分別；前者是政治學者應該注意的，後者實係法學者的工作。因此我在法庭不過一年的光景，Seelye 教授即在 Illinois 的 Knox College 替我找到教授政治經濟學的位，置以嘗試我自己智力發展的需要。

我到了 Galesburg 以後，細察環境並逐漸明瞭凡我所要向別人講解關於各種問題的內容，連我自己也不十分理解，因此要想充實自己的這種情感日益加強，這種情感，未到一個學年的終了已到了不能自己遏抑的境遇。原來 Galesburg 是 Steeleye A. Douglas 與 Abraham Lincoln 舉行辯論的所在地，時在一八五六年，大部份即在 Knox College 舉行。我幾乎每日都到他們辯論的場所，盼望靖難的總統對於我所需要的知識能有所啓示。不過，我所得到的僅只已故總統的名言之，那是他生前常對他意利諸省的朋友們所講過的。他說：「知識是最重要的；比知識次一等的是你要明白你自己不知道；再比這一件事更次一等的是你去找一個有這種知識的人，你俯仰他並讓他來教你。」

最後，六月某日很熱的那天，我的旅館被焚時我不在屋內，我所有的書籍衣服俱化為灰燼。恰巧價值二千美金的政府公債，我於出門時放於衣袋內，得免於火。當我看見火焰衝天時，我又想起一八六三年一月二日的事：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日的事與 Amherst College 及春田市法律事務所。既然我的理想難以實現，我又遭遇到各種失敗，我就決定把這一筆儲蓄為滿足求知慾而花費。我要往歐洲去，特別是到德國。在一個月之內我向大學辭職

，涉大西洋以求貫徹七年前所決定的主張。

在這個富於危險性的時期，我得到史學家 George Bancroft 氏極大的幫助，他是美國駐德大使。在我遊歐以前，波斯敦友人 Rev. Christopher T. Thayer 給我一封介紹信，信內附我自己的信述說要往德國求學的志願，請其將信留在倫敦，我到倫敦以後，Bancroft 已有詳細的答覆，他勸我先往 Goettingen 聽 Herman Lotze 講思想史，聽 Georg Waitz 講憲法史，然後往 Leipzig 一學期聽 Wilhelm Roscher 講政治經濟與社會學，此後即到柏林，受 Bancroft 親身的指導。

我很仔細的遵照辦理，不到一年我就回到柏林美國大使館，由於 Bancroft 的介紹，我在柏林大學向下列大師聽講，Ernest Curtin 教希臘文化，Theodor Mommsen 教羅馬文化，Gustav Droysens 教歐洲中古及近代文化。最重要的是 Rudolf von Gneist 教歐洲公法，他是畢士麥的朋友及顧問，此外尚有 Leopold von Ranke 教歷史的哲學。

Bancroft 為使我與大使館比較接近起見，讓我幫他自己對於政府的檔案從事史學的研究，並且每逢星期日的晚間，給我參加家庭圈集會的機會。在那時候他往往邀請世界有名的政治人物，因此我往往目觀歐洲外交家的豐采並聽其敘述政治生活的情形。

根據這樣的指導，追隨這些大師並依賴這些學習的經驗，我到那時為止，渡過異常有益的光陰。經過十年的摸索，我以為已經找到對於準備一生所需要的知識。我正在想如何利用這個機會到最佳的程度，忽然在一八七三年夏，正在準備博士論文的時候，接到 Seelye 教授的信，說 Amherst College 董事會決定增設史學及政治學講座，約我去作第一次嘗試，並囑於同年十月開始。既然如此，我想從前我在 Knox College 所要做的工作，經過德國大學數年的準備，如果回到母校去，或者可以貫徹以前的主張。

在一八七三——七四學年的開始，我就到了母校，向四年級學生授課，這一級是最有成績的，特別是歷史與政治的專修生。當我任教的第二年，選出七個高才生，即 George H. Baker, Melvil Dewey, Alfred Ely, Fred H. Gillett, Charles S. Smith, Edmund M. Smith, Fred Whitridge，我勸他們於畢業後留校一年，繼續研究，除一人外餘均留校，一年以後，有四人決定往歐洲研究。

在我任教第一年中，教授們對於我將研究工作寄託於四年生一事而有反對者，對我最表同情的 Seelye 教授已於一八七四年內被舉入國會，所以在一八七五及一七六學年往往不在學校。在這個時期學校的政策為古典學派所左右，特別是希臘文化專家，他們不贊成讓四年生有研究的機會，於是我的計劃得不到幫助。在一八七四——七五學年的終了，我正在選擇學生開始第二研究班時，校長室忽然要我去，負責人說，對於我訓練研究生事學校不贊同，盼望我向出時間來教一年生的希臘史與羅馬史，以減輕古典學系的一部份責任，這表示在我母校不能獨立政治與社會學研究工作的基礎，那時我已在一八七五級選定三學生，即 Cleford R. Bateman, Charles A. Buffum, Richmond Mago Smith。我既不能負責指導研究，就勸他們往柏林去求學。

依前述經驗，我不再由一八七六級裏選出學生來。但有一人是非常的，我不知不覺把他的名字寫在筆記簿中，以便時常與他談話，今日他亦在場，校長給他名譽學位時，很實在說他對於 Amherst College 已有極大的貢獻。實際此人不論在何處都有極大的貢獻，譬如在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及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等。我不必提他的名字，因為你們都知道他幾乎自我工作開始到現在，他是不離左右的 George H. Pimpton。

在 Amherst 大學的兩個一年級中，（即一八七八及一八七九級）我找到五個學生富於史學政治及法律的才具。即 Herbrand Osgood, Henry S. Resmond, Henry C. Folger, Frank J. Goodnow, J. Franklin Jameson，在母校所教五班學生中，我找到若干才智之士，可稱奇才異能的，他們如果不在母校工作，別處一定會延攬他們的。

一八七五年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 Theodore W. Dwight 教授到 Amherst 來，作法學演講數次，他問過我關於四年生及由一八七四級中所選出來的研究生功課。在他離校以前，他問我在那年冬天是否可以抽出工夫到哥倫比亞法學院作關於憲法及國際法的演講，我說願意考慮。果然，在一八七五年秋季，哥校約我於一八七五——七六學年中到該校授課。

我趁母校放寒假時往哥校授課，聽講者有法學院學生及校外人，人數多而聽講時不缺課，內中有一年長者道貌岸然，坐於演講台之旁，顯然是感覺興趣者，因為他是每講必到的，他自己介紹為 Samuel B. Ruggles，哥校法

律學院董事之一。在末次演講完畢時，他用相當高的聲音說話，以致當時留在室內者俱可聽見：「自Francis Lieber去世以後，你是我們法律學院要請的人。今晚請來我宅接洽。」這種直捷了當的神氣，實非我所意料的，但他是誠懇而很客氣，那一日晚上我到他的家時，我並不知道他要說些什麼話。如果那日下午他是直捷了當的話，那晚他是加了幾倍的肯定性。不論我說什麼，一點兒不能搖動他的心。末了我告訴他，我有遠大的理想，並追訴十三年以前那夜的幻想，經過長時期若干次的經驗，以至在母校所遭遇的失望。但這些話不但不使他減少興趣，似乎反而刺激了他。他插入幾句說，哥校在那時每年有剩餘款項美金壹拾萬圓尚未指定用途，他準備將大部份用於發展政治學及社會學之用。

我夜深時離開他家，第二日離紐約市，沒有意思接受他的提議。一八七六年五月，哥校決定設立史學政治學及國際法學講座，約余為第一任教授，我認爲又遇到了一個難關，我必須勇敢的應付。

從現在的立場我可以衡量往事，我以爲在一八七六年五月，我的心情是在幾種矛盾中掙扎：心與腦，情感與理智，志願與責任。我生於窮鄉僻壤，長於窮鄉僻壤，我深愛隱退的生活，羣衆，嘈聲，市鎮的污濁環境，永遠要使我躲避。反過來講，鄉村的幽靜，新鮮的空氣，廣大的風景與簡樸的民風是我所最景慕的，不但如此，我對於母校所在地，其地，其校，其人，俱有濃濃的愛情，此地非但給我教育的機會，並且對於我的受罪與悲哀，供給我退思的處所，並且在我遠遊歸國之後，可以讓我實現我的理想。不過慢慢的我就感覺到此地不能發展我理想中的大學，特別是史學政治學社會法學的研究，在另一方面，市鎮或能發展我所注意的研究工作，因有財富的集中及有研究的設備如圖書館、博物院、實驗室、醫院、法庭、歌舞劇院、戲園、音樂會、動物園等。哥校的邀請，是給我對於世界最大的城市，可以得到研究的機會，并且M. Rutgers, Pres. Barnard, Prof. Dwight 屢次來函要我於六月這事會前接受他們的邀約，最後似乎理智與責任戰勝，我辭了母校教授之職，來到哥校任教。

當我於一八七六年十月到紐約時，我滿想在母校所沒有的機會，在哥校可以得到，因此或能逐漸實現我的理想，我對於哥校的組織，教授的成績及學生的品質等，全無所知。等我對於這些問題略略探聽之後，我是面面相覷的，哥校當時有文學院、法學院及法學院，由一位公同的校長

管理這個鬆懈機構，這三個學院並無同一的經濟來源，法學院大部份由學生的學費來維持，鑛學院僅能依賴會計科來供給宿舍，我記得紐約尚有幾處獨立的醫學校及神學校亦由哥校的校長每年頒發畢業文憑，但對於經濟及教育方面則無關係。哥校文學院約有教授十人，助教亦約有十人，大部份在鑛學院亦兼了同樣的職務。法學院在 Lafayette Place，離文鑛兩學院約有三哩，這兩院坐落於四十九街與 Madison Ave 中間。法學院僅有教授一人助教一人，後者的主要工作在記錄學生姓名並管理圖書室。圖書室中所陳列者大都為紐約各法庭的判例。Dr. Ordronaux 偶爾在法學院演講，法學院有學生五百人，約等於文鑛兩院學生之總數。

我在文法兩院授課，兩院的財政俱由哥校會計科辦理，當我第一年任教時，即一八七六—七七，沒有助教，在文學院授美憲法史在法學院授憲法及國際公法，我到哥校後，是在發展政治與憲法史，及政治學經濟社會學，使這幾課作為文學院的選修課。並在法學院三年級發展憲法行政法及國際公法作為選修課。不過不久我就知道，除巴乃德校長及物理學名教授 Ogdon N. Root 以外，沒有人來協助我實現這種主張，文學院的擴充，必定要從增加授課的鐘點開始，在那時候，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為授課的時間。當我提議在下午增加鐘點以便增加政治經濟與歷史時，教授會一致反對。法學院 Dwight 教授是約我來哥校最有力的一人，但對於我在該校三年級加課一層，堅決反對。他認爲法學院是職業學校，無意改變其性質。在文學院一八七六—七七級沒有一個高才生願意對於政治學作較高的研究。法學院至少有一半的學生是由國內最好的學校畢業的，在他們中間很多人預備對於憲法及國際公法作進一步的研究。這些要包括 Amherst 一八七四級的三個學生 Alfred Ely, Edmund M. Smith, Fred W. Whtridge 此外尚有兩個高才生即哈佛畢業生 Thomas Fenton Jaylor 及 Henry Adams 教授介紹來的、Venezuela 人 Daniel Deneon 及 Isaac L. Rice, 末一人約三十歲，對於目錄學有特殊的興趣，這六人是法學院公法班的核心，再加此外二十人，給我不少的鼓勵與興奮。

這種興奮又遇着了打擊，特別是文法兩院的圖書設備，在那時雖然哥校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圖書館藏書還不到兩萬五千本，少數是善本書，近代書是幾乎等於零。並無 Hansard Debate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那是政治史的學生每一個人所應當閱讀的參考書。所有的藏書亦幾乎為教授與學生或其他讀者所不易看到的，各種書僅依照著者來分類，分類亦是不精詳的，圖書館無目錄專家，僅由一位主任兼管，此人尚有採錄的任務，他每星期辦公五日，每日勻出一小時半作為借書之用。有人去借書時他表示不高興的模樣，這或許是因為他同時負有採錄的責任，一時忙不過來。董事會每年給他五百圓為購書費，但他給還半數，並常以此自豪，以為替學校省錢，我既知道他省下來這許多錢，我就請董事會允許我購買一套 Hansard's Debates, 圖書館主任因此憤恨，對於我自己或我的學生借書時，往往給以困難，我被迫向董事會另行請款，以便購置關於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學各書，存於 Hamilton Hall 並由另一圖書館主任管理之，在一八七八年，我說動了 Robert N. Toppan, 他允許捐款，因此我可以任用 Isaac L. Rice 為圖書館主任，此圖書館每星期開放六日，晚間亦開放，Rice 依照 Dewey 方法將書暫按照性質分類，此法是由我自 Amherst 帶來的，後來杜威自己來哥校，推廣其制於全校的圖書館。此種工作杜威氏得到 Amherst 一八七四級學生 George H. Bator 的協助。

我在哥校第一年所得到的主要教訓是為發展一個有效的政治與社會學院。但是關於這件事，我不能依賴當時的哥校的教授會，如果我要從學院裏面得到些幫助，那末我必須向法學院請求，這種幫助必須從校長及董事會來。一八七七年春，大總統 Grant 任內國務卿 Hamilton Fish 返其故鄉紐約市，復任哥校董事之職，他是最表同情我的，我向他可以作各種的請求。政治學院的成立三人之力編多，即 Barnard, Rugles 與 Fish。Fish 復任董事長以後，我推荐 Amherst 一八七五級學生 Richmond Mayo Smith 在文學院當助教，他那時在柏林大學習經濟。他回校以後代我授課，我抽出時間要在法學院發展公法及比較法諸功課。由於 Rugles, 及 Fish 的協助，前述的主張得以貫徹。并在法學院另設圖書館，以 Rice 為館長及目錄專員。如此當一八七七年八學年開始時，余對於校務是有把握的。

文學院的一八七八級，Smith 教授覺得有些學生對於政治學發生興趣，特別是 Charles F. Holl, Edward W. Hopkins, Fred W. Holl 末一人的讀書能力特別顯著，我以為可以約他任課。但他願意當律師，因此我的目的不能達到。一八七七—七八年的法學院學生並不比以前優良，如以公法班論，實尚不如從前，因此我更深深

的感覺到，如果不再加一學年的功課的話，法學院的課程，得不着有效的發展。

文學院一八七九級，對於歷史與經濟有興趣的，不如一八七八級之多，不過有兩個特出的人才，我在這次敘述中必須提到，他們俱在母校服務并已著成績，其一為董事長，其一為經濟學系主任。

依 Smith 及我自己的意見，在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學年，我所感覺興趣的功課，不比以前顯示任何進步。因此在一八八〇年一月我們兩人已經決定向董事會提一議案，擬在哥校創設獨立的政治與社會學院。對於這種意見我們僅是私談，不敢對於任何人公開發表，即使對於 Banard 校長，他雖一向是同情於我的，我亦未敢聲張，一八八〇年四月十五日，我應董事 Ruess 召而至其宅。我那時精神緊張，脚步不穩，因我認爲另一難關業已來臨，這種難關，不但對於我自己的前途，即對於哥校亦發生關係，當我踏進會客室時另有二客已先我而至。其一為董事之侄 Robert N. Joppa，其一為 John Durand，乃法國著作家 Hippolyte A. Taine 的譯述者。最初我以爲這是偶然的會見，因爲他們在場，會使得我不能與董事盡所欲言，不過不久，我就知道他們是被請來參加討論的，董事並不虛擲時間，就讓我說明所以要在文法學院內創設獨立學院的情形與前途。受到這番鼓勵，我就對於董事及客人坦白聲述在當時我所遭遇的困難，及依照我的意見如美國這樣大的民主國所需要的政治學院。他們仔細聽聽并表示興趣，趁我斷續發言的當兒，Ruess 很快的并且帶着急的神氣，就說：「依我看來，我們應該創設一個政治與社會學院，有獨立的教授會，和文法學院分開」。這正是我久在中心中而不敢輕於發表的主張，今由董事提出，給我極大的愉快，並免去我的窘態。我神情鎮定後發言曰：「目前世界上只有一個例，就是德國新組織的 Strassburg 大學，叫做 Die Facultät Der Kammer Wissenschaften I，在這時候，Durand 插嘴說，他剛到過巴黎，他的朋友 Taine 介紹 Emil Boutmy 此人方創立政治學院名曰 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同事中有著名人物 Casimir Perier Alexander Ribot, Edouard Laboulaye，這是法帝國在一八七一年崩潰以後，所設立的獨立學院。董事甚感興趣，勸我擬定政治學院的綱要，準備在五月內第一星期一提出於董事會，並勸我即速預備往巴黎，研究政治學院的宗旨與辦法等，董事說他負責替我向董事會請假並代約 Mayo Smith 在巴黎相見，我

那夜回家未睡，整夜擬稿。翌晨紅日初昇時，我已擬好此稿，並將提案送 Ruess 轉交，即於一個月之內到了巴黎。

Boutmy 待我甚厚，知我此行的目標，不憚煩的說明關於政治學院的詳細內容。對於一個崇尚民主的英國人，這個新機構是最適宜於新興的法國共和精神的，這個機構是合於理智的高瞻遠矚的並不是守舊的。雖成立不久但有大規模的教授會，教授中有法國最著名的政治學者。課程中包括歷史經濟公法社會學及政治哲學。學生衆多，並在逐漸增加中。教授法是合於邏輯的，並且新穎。在兩個月中間我得到極有益的教育經驗。

六月第一星期二的早晨，我的臥室有人敲門，啓門視之，一個美國電報交入我手，是由 Ruess 打來的，文曰「感謝上帝，學院已經產生，切盼各事進行」。這是我離紐約前與董事預約的電報，董事會已通過設立政治學院的議案，並約 Edmund Munro Smith, Clifford R. Batman 回校任教，前者在柏林大學攻羅馬法，後者在 Heidelberg 大學習行政法。Mayo Smith 彼時已在巴黎亦被約返校任教。我分別通知上述三人囑於七月八日到 Hotel Moser 擬訂較詳的章程，以便政治學院可於一八八〇—一八八一年正式成立。我約他們在 Hotel Moser 工作，這個旅館坐落於瑞士 Chemin 村，正在 Vevey 市的上面，相距不過數百呎。

爲完成我們所被委託的責任，我們所選的地方，以風景言，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適宜的場所。經六日六夜，我們四人不斷的並肩奮的工作。我們擬定獨立的政治學院，並規定與大學其他學院的關係，我們把主要功課分在各系教授，如史學、政治學、憲法、國際法、羅馬法、比較法、行政法、經濟學社會學等。我們擬定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的輪廓，以便政治學院的畢業生可以利用。對於教授及學生的論文，我們認爲可在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及 Studies in History, Jurisprudence,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Public Law 我們特別注重第一手材料，認爲應該由目錄專家按性質分類，供給研究員的參考。這種資料，應盡量讓人利用。一年之中應將資料室每日開放，一日之間應每小時開放。

我們在這種高度與緯度的地方工作，第六日遇着很熱的天氣，那是七月十四日的晚間，我們把材料搬到旅館前面的空地上使得我們可以感覺格外舒服些。我們已到最末一段的工作了，擺在我們眼前的情景是難以形容的。前面是圓月當空映在美麗的湖中，這輪明月就在偉大的雪山上 Dent

Du Midi。我們腳底下是 Vevey 市的各色屋頂。崇樓在望，並可以看見英國愛國志士 Ludlow 的墓。我們的左邊是詩人 Byron 一時的住宅，我們的右邊是 Calvin Milbon Rousseau 的住所及美麗的 Geneva 湖。在這種撲朔迷離的環境裏，我們產生了政治學院。剛到半夜，我們吹滅了燈，從工作桌上站起來的時候，我們聽見隔湖禮拜堂 St Ginguolph 緩奏 Marseilles 的樂，我們看見 Savoy Alps 山頂到處有煙火，因爲這是 Bastille Day 的紀念日，山中的農夫爬到頂點上來，紀念他們所認爲歐洲的自由日。這是我一生最富於戲劇性的日子。那時候我雖不到三十六歲，但已感覺到異常興奮的情景。我爬到最高處俯瞰各地，彷彿自己以爲戰勝了各種環境。我發展一種思想的十七年長期戰爭，經過多次勝利與失敗，至此完全勝利。一八六三年一月二日的理想，到一八八〇七月十四日產生一種實行的機構。對於這種機構，似乎全世界表示其贊同與歡慰。在這種情景中我們四人凝視、恍惚、驚異，默然無言，低了頭，潛默曰「這是我們的洗禮」。

## 致讀者

編者

本刊在一個月的停刊期內，接到許多讀者們的慰問信，情意深摯，懇切之外且多策勉，真使我們感奮之至。最初收到的一批，都已逐一覆謝；其後陸續郵達的，則因復刊期近，同人等都相當忙碌，未及奉答，特此一併致謝，並希鑒諒。

從上期起，本刊增闢「短論」一欄，用以刊載一千五百字以內的論文。字數既受限制，自難無法容納學術性的專著，故短論與專論的區別，初不止字數多少一端。此關也並不代表本刊意見，所載文字一律由作者署名，其爲公開閱地、歡迎投稿，可就同一問題兼容不同之議論，均與其餘部份完全相同。

本刊擬更進一步充實「通訊」。我們注重材料的真實性和敘述的系統化，希望少發空洞議論。邊遠地帶以及國外的通訊，尤所歡迎。

有人以爲本刊在專論方面不常吸收外稿，這倒也是實情。專論較難達到相當水準，故選稿時不得不略爲謹慎而嚴格。在此我們願意特別聲明：本刊在原則上歡迎專論方面的外稿，而且事實上也登過一些。

因爲篇幅的限制，我們決定此後停止登載漫畫本刻了。一定有許多讀者會與我們同樣引爲遺憾的。

經過一個月的間歇，我們又與讀者相見了，慶幸之餘，還希望各位給我們更多的指教。



# 王東原報聘宋子文

呈 熾

湖南省主席王東原於元月三日偕同四員慣說洋話的大將悄悄南赴廣州。這行動似乎突如其來，一般人懷疑「王東原找宋子文做什麼？」神經過敏的甚至說：「不好了，宋子文趁指湖南來了。」

## 湘粵這塊地盤

早在去年十二月中旬，王主席接到宋氏的電報，請他到廣東去一次。其實事先還經過內幕人員向宋疏通過湖南目前的形勢，所以宋才來電邀請，但那時適值省參會開會，無法離開長沙，接着下旬第二號電報又來了，王主席本想年底報聘，卒以新年佳節，才電復元月初去穗。

究竟疏通了些什麼？解說了什麼？首先我們得明瞭王主席的作風。他在湖北受了教訓，凡事他願意做到處處說好。記得去夏湘米禁止運粵，曾掀起了湘粵間一度隔閡，王東原非常引為遺憾，事後力圖補救，所以特派官報記者訪問廣東水災，並捐募水災救濟金。以整個華南說，湘粵兩省是應該聯成一線的，何況湖南的進口和出口，大都直接仰給於廣東；加之

湖南可以作為經濟資本的鐵產，又非本身力量所能開發，當全省經濟狀況蕭條不振之際，他很想利用外資來開發湖南，這是他去粵時磨筋裏的一個大希望。

目前，劉伯承縱橫鄂境，躍躍然頗有南渡之勢，而湖南僅有的五個總隊的警衛部隊，去年十月七日調走兩個到湖北去了；當白部長說明「中央沒有辦法，只有靠地方自衛」以後，為了應付當前的危機，省府當局也就費了好多腦筋，尤其在武器沒有來源、軍費無法籌措的形勢之下，在軍事上確實需要與鄰省聯防。假使鄰省的軍力使用得還適當，便大有助於湘省的治安，這是王東原去穗的起因。同樣的，宋子文目前所感到最迫切的問題自然也是軍事問題，廣東情形更複雜，武器雖有，兵員雖多，但缺乏了充肚子的米糧，對整靖工作的推進總是一個大阻礙，遙想着嶺北銀色的湘米，他不得不破例的來電，請王東原赴穗，洽商物物交換。

王東原曾為此行盤算過好久，第一當然是怎樣加強

## 客方設想遇到主人招待殷切

王東原曾為此行盤算過好久，第一當然是怎樣加強

聯防和軍事合作的問題，其次為經濟開發，也曾費了一點腦筋，擬具了一個計劃去引誘宋子文；最後為了要在談判技巧上佔到便宜，特別帶了財政廳長李銳、省委楊銳、高等顧問朱皆平、水利專家周宗蓮和地質調查所長同行，各別給以擬具經濟、水利、軍事計劃的任務。四員大將有個同點是：都會說洋話，任憑TV怎樣狠，也要不為他所輕視。

五日上午八時半，車抵穗城以前二十分鐘，忽然行得格外慢了，有人便問同行的杜鎮遠局長，他說：「宋主席約好了親自來站迎接的時間，所以我們緩了行車的速度」。果然一向官派挺足的宋子文親自率領着文武百官，到月台上來迎接。這真是「破例」，據說粵財政廳長私自對李銳說：「英大使來廣州時，宋主席還沒有這樣客氣哩。」

於是三湘領袖便在長蛇般的汽車行列的護送下，下榻於峨嵋的迎賓館，接着的節目是：熱烈的歡宴、分批的晉謁、小組洽商、私邸暢談……一切招待和討論，宋氏都在非常「破例」的姿態下順利的推進行着。

宋子文為什麼格外破例的對待王東原？無可懷疑的

十九是看在一湖兩熱，天下足一的銀色谷子份上。所以某隨員說：「王主席此行，最成功的是政治（政治者，面子也），其次是軍事，最失敗的是經濟合作。」不能說這句話沒有道理。

## 共同利害：聯防問題

在五至十三日的這七八天的時間裏，談的事情太多了：首先當然是聯防問題，第一個原則是兩省力量，全力保護粵漢路沿線的治安，在一些零碎的新開裏，大坑口橋被炸毀過，韶廣段時常有火警，假使唯一的交通幹綫被截斷了，那就無法可設；第二，湖南最近出現的共軍，據悉是由仁化北出的劉虎雄部，經常擾攘湘粵邊境；宋子文雖然是個行轅主任，但王東原是拿槍桿出身，較爲內行，所以有許多意見，宋都依照王的，決定成立湘粵剿匪總指揮部，派定葉肇（粵）宋英仲（湘）分任正副指揮，至于聯防會剿的具體計劃，則另行擬具，必要時并成立粵漢路警備部。不可否認，粵北的治安問題頗傷腦筋，開英德附近時有擲彈手榴彈、開機關槍的事實，所以王氏由粵歸來時，宋氏還特地派了警備護送

出境。李銳說：「聯防是搞得很好了。原則與辦法一定都很完備了。」

## 王東原計劃美羅宋子文湘米到手

其次是經濟問題。湘粵兩省的報紙都對這個問題力加渲染，據說決定了兩省合作，完成湖南四大建設：第一，建立岳陽城陵磯港埠，運港埠在經濟上的價值，是將長江各支流的土產，運由粵漢路運到廣州出口，只須從城陵磯修築六公里的鐵路與粵漢路接軌，則長江上中流各地物產的出口可比經由上海縮短百分之四十七的距離，減少百分之四十九的運費；一則可望暢銷湖南物資，而借道內陸港來繁榮湖南的工商業，二則使它成爲黃浦港的輔助港，但計算一下，就目前物價言，費用總在千億以上，已商得湘粵兩省、粵漢路、四聯總處、招商局、公路總局的同意，担任基本股東。TV宋對此計劃大感興趣。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美麗的計劃，不過一千億元的經費畢竟與現實的財政情形相差太遠了，計劃恐怕徒然美麗而已。第二是在常德漢壽益陽陽鄉四縣建立一個灌溉七十萬畝水稻的計劃，據說要錢四百多萬元，然而爲了無錢，也就只好空談計劃

了。第三是興修湘黔路，一方面從湘潭逐步延長到新化，再向西延長，以期運輸湘西寶藏，一方面由邵陽修築支綫，貫通南北，聯絡湘桂綫；其材料先由粵漢路抽出六十五萬噸的輕軌四五七公里，再向美江南公司借款添置。第四是建立資江小湫八萬五特的水力發電，籌款一四〇〇萬美金。上面這三計劃，完全沒有一點「經濟基礎」，據說要靠宋氏的面子去向中央請求，後來傳聞失真，害得一般人以爲宋氏自己要掏腰包，以常情論，是靠不住的。

上面都是些畫餅充飢的空洞計劃，事實上談得具體一點的只有「糧食換子彈」。講得動聽的，還有一個漂亮原則，就是：「湘米換粵鹽」，其實而今粵鹽并不像湘米那樣俏，准鹽把粵鹽壓得透不出氣了。這不過是說說而已，因爲廣東農產除了鹽以外，就沒有什麼可談了。

我們曉得宋氏素以精明善算著稱的，決不讓別人檢着便宜，何況洋米難得入口，水災以後的粵人難道就活活餓死嗎？他懂得了，倨傲的態度是無濟於事的，因此來一套軟的功夫，勾引湘米入粵。經過兩省財政廳長再三洽商後，結果是挪二十石湘米去換粵鹽、通訊器材和子彈槍枝。前面說過，「換

了。第三是興修湘黔路，一方面從湘潭逐步延長到新化，再向西延長，以期運輸湘西寶藏，一方面由邵陽修築支綫，貫通南北，聯絡湘桂綫；其材料先由粵漢路抽出六十五萬噸的輕軌四五七公里，再向美江南公司借款添置。第四是建立資江小湫八萬五特的水力發電，籌款一四〇〇萬美金。上面這三計劃，完全沒有一點「經濟基礎」，據說要靠宋氏的面子去向中央請求，後來傳聞失真，害得一般人以爲宋氏自己要掏腰包，以常情論，是靠不住的。

鹽」是名義，湖南所急需的，是彈藥和通訊器材，所以近日粵財政廳長胡登恆即將來湘，洽商收購湘米的辦法。交換物資的計劃，眼看即將

實現，可是湖南旅穗同鄉，尤其是九百多中大同學，八百多廣大同學，三百多警官學生，……他們在歡迎會上，一致硬性的反對這個互市的辦法。他們說：拿米換子彈，去自尋毀滅，是不值得的，何況湘米南運，馬上就會刺激湘糧高漲，試問沒有米喫的三分之二的湖南人民作了

什麼孽呢？我們且拭目以觀王氏如何答覆！V對他的「破例」招待吧！（一月二十日寄自長沙。）

## 浙大學生被毆 · 罷課與休罷的詳細經過 周永生

### 出殯序幕

浙大發生于子三慘案，至今已歷有兩個多月了。同學方面接受了于君家屬全權照料的委託，而于君的遺體迄今尚未安葬，所以始終感到不能安心。在過去的個把月裏，自治會一再要求校方協助解決這一問題，總因校方不答應在華家池分部建築墓地，就一直遲延未決。去年十二月下旬，浙大講師助教會居於第三者立場，公開建議學生自治會一個折衷的出殯方案。他們希望自治會能放棄原定安葬華家池的主張，依從校方意見改葬在鳳凰山浙大學生公墓區內，並代為計劃出殯路線，並且沿途不呼口號，不貼標語，不發煽動性之宣傳品。這樣，他們認為校方不但能同意出殯，並可給予幫助。自治會接到這一建議後，當即召開全體代表大會，提出討論，一般代表雖都認為這祇是一個委風求全的辦法，不過為求安葬問題能夠順利解決

，也就無條件通過了，並決定在四月四日那一天，以嚴肅隆重的儀式舉行出殯。在學校方面，也就允許協助一切，並就全部出殯程序，向地方治安機關徵得同意。在去年除夕那一天，自治會同時在杭州東南日報及上海大公報上刊出告窆計文。到一月三日下午，公告了殯禮程序如下：四日上午八時在文理學院廣場集合，八時半成立人權保障委員會，九時出發迎靈，出殯，下午二時在鳳凰山上公祭安葬。一般同學，滿以為這一次殯禮總可以順利完成，使死者從此有了個歸宿之處，並也略可告慰于君家屬的委託了。

### 風暴前夕

但是，就在三日下午，校長室突然出了佈告，勸導大家暫緩出殯，否則對於同學安全問題不能負責保障。嗣經探明原因，方知是地方治安當局臨時不答應同學列隊並展開盛大儀仗通過大街。自治會方面認為這種臨時

突然的變卦不能予以接受，故仍舊維持原議；不過為適應新的局面，是否需有新的改變，則尚待四日上午集合時再作最後決定。在當天晚上，當局又宣佈學校四週劃入戒嚴區域，幾處校門之外的通道上都密佈了軍警，情勢突趨緊張起來。即在同日向晚時光，杭州市區內發現有具名「杭州市夜班人力三輪車夫、餛飩攤、腳夫、宵夜店職工互助會」的傳單與標語，在各處張貼起來，他們認為出殯的舉行必引起政府戒嚴，因而妨礙他們的生計，因此他們堅決反對浙大同學為「共匪于子三」出殯，「不許于匪埋骨西子湖畔」，並主張「剷除冒充學生的共匪」等等。由於上述這兩方面的變化，一般同學都已預感到風暴難免即將到來，不過究竟明早應該出殯呢，還是改期呢？這在每個人心頭上似乎都成了個問題。

### 廣場暴行

四日早上，天氣晴朗。在八時以前，浙大送殯同學已紛紛集合在文理學院廣場上。學校四週雖然皆被軍警封鎖，然而杭州市區其他大中學生仍有不少設法抄小巷轉折進去的，總計到場人數約在二千人左右。到八時正，儀式開始，主席簡短致詞後，由竺校長向大家訓話，他誠懇地對全體同學作最後的勸告：「希望同學們在未來和治安當局得到協議以前，暫緩出發，以免發生更慘的不幸事件。」講師助教會代表也跟著發言，願繼續為同學與學校打開新的僵局，不過在問題未解決前，切望同學不可輕率出殯。接着是人權保障委員會宣讀成立宣言，再由自治會報告關於出殯事件交涉經過。正在這個時候，廣場的北側（慶春街大門口）及西側（大學路大門口）先後聽到有喊打的聲音，以及「于子三是共匪」、「不許于匪埋骨西子湖畔」、「打倒于子三」的口號。突然間，從西校門那面衝進來三四十人，沿女生宿舍直

闖向廣場，為首的手執「民衆請願第七大隊」的旗幟，聲勢洶洶，說：「人力車夫要浙大同學給他們飯吃。」當時同學們的隊伍裏有些騷動，主席高呼同學鎮定，於是會議仍繼續進行着。在另一方面，那些衝進來的人力車夫們，經教授們勸說後，又經女生宿舍門前退了回去，並隨手帶去女生廚房門口的柴片。但是他們退到西校門近處之時，忽然換了一個方向，沿着慈湖，從另一條路再度衝了進來。他們先到「求是橋畔」，再轉向「求是路」直衝到廣場上去，同時，在北校門方面也同樣呼應起來。北校門原來是關閉起來的，這時由打手們從鐵門上爬了進來，把大門打開，數十個人乃一擁而進。兩路工人，在廣場上相會，一聲喊打，二千左右同學混亂向兩側倉退。於是他們先把場上所有輓聯、花圈、祭亭、像片和各種儀仗徹底毀去，然後再執棒追奔逐北，毆打同學。女同學逃不快，又無力抵抗，故損傷最慘。男同學起初祇管奔逃，經有人提醒：「他們跑進學校來打我們，我們還不把他們抓住嗎？」於是同學乃停住腳來，開始反擊。經過一場混鬥，工人中亦有受傷的，被捉者達十一人，解押到校長公舍裏。其餘的見形勢不佳，都化整為零，匆匆逃出校門去了。

### 建衣冠塚

事後檢查，有一位女同學為了保護她的一個中學裏的老同學而被踩斷了兩根肋骨，傷勢最重。還有兩位男同學重傷腰部及頭部，其他輕傷的有二十六人。在出殯費用的損失上，據估計約在四千萬元以上。一部份校具亦遭損毀了。在工人方面，據他們報告，亦有十餘人受傷，其中有指頭被折斷的，也有被打得冒血的。

樣完成了。

### 罷課抗議

四日晚上，自治會在全校同學異常悲憤與緊張的情緒之下，緊急召開全體代表大會，先由理事會報告當日慘案經過，隨即開始討論應有緊急對策。各代表多激憤陳言，最後決定向校方提出七項要求：(一)請校方交涉立即撤除學校四週軍警及各種阻礙交通之設施；(二)保障全校師生安全；(三)如發覺有失蹤同學，應立即釋放；(四)查辦慘案主使人；(五)賠償一切損失及受傷同學醫藥費；(六)由地方治安當局表明疏忽責任；(七)仍依照原議為子三出獄。同時，並決定自五日起罷課三天，以示抗議；在罷課期間，理事會一面派代表赴醫院慰問受傷同學，一面又在校內舉行一次慰問晚會，新成立的人權保障委員會，也在大禮堂樓上舉辦「人權保障史料展覽會」。在那裏，有文字，有漫畫，有照片，也有實物，琳瑯滿目，參觀須歷很長的時間。在學校方面，校長請農學院院長晉京向教育部報告慘案經過，並要求立即有合法解決，以重學生課業。

### 工會聲辯

在一月七日杭州東南日報上，刊有杭州市夜班人力三輪車夫、餛飩攤、腳夫業、宵夜店職工互助會「為生計斷絕無故被毀啓事」一則，茲節錄內容要點如下：「浙大共匪份子于三自殺案發後，政府為求維持治安，實行戒嚴，晚間十一時以後，全市交通斷絕。惟工人等謀生時間全在宵夜，不僅無以謀生，且車夫等失却流動自由，被禁小巷中，露宿簷下，困苦待旦，所受痛苦更難言喻……二月來蒙受極大損失……去年年底，政府洞悉此中苦情，宣告解嚴，方慶謀生有路，詎見東南日報載有浙大學生自治會又定本月四日為于三出獄。工人等竊念于三已經法院判決，確定為共匪份子，該自治會又公然為共匪出獄，政府在此動亂時期，定必肅行戒嚴，此與社會秩序固是另一問題，而與工人等生計直接所受之影響，甚為嚴重……乃共同推派代表四十餘人，於四日早晨前往該校，擬向自治會哀求中止。行至大學路口，則軍警已實施封鎖，不得已繞道慶春街小巷，轉折抵達浙大門前，分站兩旁，要求浙大學生自治會顧念工人生活困難，停止出獄。不料浙大學生，正在校內廣場具備盛大出殯儀仗，如鼓樂，祭亭，花圈，像片，標語，傳單等，集令出發，糾察隊行至校門，怒目相視，破口辱罵，歷數分鐘，致起衝突……據工會表示：此次工人重傷五人，輕傷十餘人，皆已送法院驗傷，並具狀起訴。法院方面同時亦接到浙大方面公函，請該校校務處派工人十一人，並為浙大受傷同學驗傷。七日下午，法院曾函請浙大校方查報起事原因及參加毆打同學之名單，浙大方面認為此大慘案責任全在校外，同學乃出於自衛，故已搜集資料，揀齊證件，並請律師縝密研究後，再答覆法院，以待院方定期公審，追究法律上責任之誰屬。」

### 忍痛休罷

六日上午，校方會臨時召集了一次校務會議，討論對於這次校內所發生的慘案應採取的緊急措施。會議一直繼續到午後二時許方才閉幕，最後決定兩大原則：其一為抗議地方治安當局封鎖學校交通，並追究慘案責任；其二為校內同學即日復課，否則解散學生自治會，再進而解散學校。同時教授會亦跟着開會，通過全力支持這一決議案。七日早上，校內外交通總算完全恢復了。午後一時，校長在大禮堂樓上向全體同學演講，認為：交通已經恢復，地方治安當局亦已答應依法保障全校

糾察隊行至校門，怒目相視，破口辱罵，歷數分鐘，致起衝突……據工會表示：此次工人重傷五人，輕傷十餘人，皆已送法院驗傷，並具狀起訴。法院方面同時亦接到浙大方面公函，請該校校務處派工人十一人，並為浙大受傷同學驗傷。七日下午，法院曾函請浙大校方查報起事原因及參加毆打同學之名單，浙大方面認為此大慘案責任全在校外，同學乃出於自衛，故已搜集資料，揀齊證件，並請律師縝密研究後，再答覆法院，以待院方定期公審，追究法律上責任之誰屬。」

### 閻傅之間

新任華北五省勳總司令的傅作義將軍，原是閻錫山將軍的老部下。四十餘年，閻傅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微妙的演變着呢，想必有不少人是樂於聽聞的吧。

抗戰以前，閻氏本是威震華北叱咤風雲的人物，政治、軍事、建設、經濟，以至於哲學，他都能玩一手。就手下將領而言，徐永昌、商震、傅作義、楊愛源都是上將，其餘如王靖國、楚溪春、李服膺、趙承綬、周玠

忍痛自八日起休罷五天。在休罷期間，仍本原提七項要求，協同校方爭取合理解決。

為了調查及解決浙大「一、四」慘案，教育部特派程其保先生到杭。程氏曾於八九兩日，先後召集全體代表理事會聽取慘案經過報告，並指示同學對於慘案應持的正當態度。一月十一日下午四時，程氏又向全體同學訓話，就同學向校方所提出的七項要求擇要解答，說明祇要同學自知守法，並不再在校內造成緊張局面，則今後安全問題，地方當局決予保障。至追究慘案責任及賠償損失問題，則須依法解決，當由地方法院秉公辦理。最後他又勸勵同學自愛愛校，保持浙大傳統光榮。到一月十二日，休罷五天期滿，當晚再召開第八次代表會，討論如何表示新態度。大多數代表因同學所提要求都沒有圓滿結果，深表遺憾，惟為不願使整個學校陷於更大危機，同時也為遷就現實環境起見，決定不罷課，不過為表示慘案本身迄無合理解決，而全體同學仍當繼續爭取，故仍繼續休罷罷課。截至今日為止，此次慘案還在懸而未決的情況中。(一月十三日自杭州。)

### 懸案未決

等，將才之多，較之馮玉祥將軍所部，有過之而無不及，後來商震徐永昌陸續走向中央，傅作義又外任綏遠省主席，晉軍上將(除閻本人)只剩下楊愛源。閻氏素不願管級分稱，十幾年以前他以太原綏靖主任節制晉綏軍，以楊愛源為晉綏總指揮，總指揮部便設在太原。楊是閻的外甥，明知指揮全軍不易勝任，也就乾脆只有名義，少用權，不輕易向遠在綏境的部屬發號施令，一切大事完全取決於閻主任本人。

晉省軍政要人大多數是山西人，晉北的忻(州)定(襄)懷(德)三(州)台(五台)一帶更是人才輩出。民國二年前，山西有一首流行的民歌：「學會五台話，就把洋刀掛」；洋刀指的是指揮刀，所謂做官的全是五台人也。因為閻氏是五台人，楊愛源、王靖國、趙承綬也都是五台人，等而下之，各處首長也以這一帶人為最多。晉南的綏德地主們不甘永遠承恩閻氏門下，想找幾個吃香的人物另樹一幟，甚至取閻氏而代之，偏偏和閻氏同

### 靜之

晉省軍政要人大多數是山西人，晉北的忻(州)定(襄)懷(德)三(州)台(五台)一帶更是人才輩出。民國二年前，山西有一首流行的民歌：「學會五台話，就把洋刀掛」；洋刀指的是指揮刀，所謂做官的全是五台人也。因為閻氏是五台人，楊愛源、王靖國、趙承綬也都是五台人，等而下之，各處首長也以這一帶人為最多。晉南的綏德地主們不甘永遠承恩閻氏門下，想找幾個吃香的人物另樹一幟，甚至取閻氏而代之，偏偏和閻氏同

時革命的晉軍李岐山被殺，魏無政府主義的革命家景梅九漂流在外，晉南的豪紳們眼看著閻氏的氣焰無法削減，便製造出濃厚的反閻空氣，和晉北派勢力形成明暗的對立。傅作義是晉南碩果僅存的高級將領，又得有機會放緩道個時機，於是一面反閻，一面捧傅，把大部反閻實力擁集於於遠。傅氏雖跟從閻氏多年，少不了在人專方面的磨擦矛盾，日久也不會無介於中，既得主政緩遠，前途發展正自不可限量，不過傅既然仍是閻的部下，遇有大事，還得「赴井請示」；而閻氏也對他溫存客氣，商量商量，所以一直到七七事變前後，雙方都能勉強合作。

的。閻氏重返大原之後，黨部再沒有恢復起來，展開工作自然更談不到。國家政治要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準則，在黨治國的情勢下，不設黨部很不像話，要設吧，閻氏頭痛，黨方也頭痛，折衷處理，山西成立了黨員通訊社，實際上通訊社的黨員，也是閻先生從口袋裏掏出來的一羣人物。閻氏最先種下的仇恨在晉南大神身上，逼走的又往往是晉南的黨國大員或閻人，晉中的孔祥熙，關係也「見得好。依照他部下的話說，這應該是一主任以事實克復輿論」的時候了，不助與的是等不及他以事實征服輿論，輿論就汎濫得無法收拾，晉南幾次對閻發動了「獨立」運動。北平井有秘密的山西學聯會，西安有晉南的商幫，南京有許多晉籍黨政大員，綏遠有不少專修清客，這種不具形迹的輿論，無時無刻不在傷害著閻氏。勝利復員以後，各色人物莫不對於政治前途寄存著一個完好的夢想，閻氏推行的「兵農合一」制度，立刻被認為是不赦的罪狀，山西的「鄉賢」們列舉許多罪案赴京請願，滿以為倒閻運動可以馬到成功。閻氏對於鄉賢們的這番盛舉，除表示無限震憤外，一面向蔣主席請求在輿論上為力，一面派人探視南京的風

勢，結蔣主席沒有見罪，老將軍才放下心來。請願是失敗了，但這並非是個人的失敗，閻氏的聲名這種人為的氣候蒸發得像六月裏的毛蕪。

山西鄉賢們所發動的反閻運動，出面的幾乎包括了所有在省外任職的大佬，惟獨不見傅氏，這是傅氏聰明獨不見傅氏，這是傅氏聰明的地方。謹慎小心，不常露面的，原是他成功的條件之一。

傅之「奮鬥」與閻傅分家

傅作義將軍是怎樣一個人呢，外人容易一眼看透，他也有不使別人看透的條件。中國有句格言：「曹孟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這對於他頗可以作個註解。他自己積有一四十年的奮鬥經驗，哭哭笑笑以及笑笑不得的經驗太多了。他有一本據說世界條代撰的「四十年奮鬥」，他的部隊叫「奮鬥日報」，似乎與奮鬥起家的。察州之役，張學良和韓林春的精銳部隊，分三四面包圍進攻，他困守了一個多月，這一仗使他獲得「守城將軍」的英名，在晉軍中的聲望地位，大大提高。閻馮之戰，他又奉命守天鎮大同一帶，石友三宋哲元互相觀望，李烈鈞迂迴代州的戰略

沒被主將張之江採納，天鎮雖被陷，大同却在手裏拿得很穩，傅氏又第二次以「守」自稱，名噪一時了。二十六年冬際，綏東抗戰，傅氏進佔百靈廟，國外報紙上也有傅將軍的新聞。綏西五原一戰大捷，蔣主席賞賜青天白日勳章一枚，張家口戰役，血肉淋漓中又獲重大戰果。這一次又一次的勝仗像梯子一樣在多少人眼裏升高了他的身價；他是在今天最為人注意的紅得發紫的將領。

傅氏隨閻氏二十年，戰功卓著，迭次升遷。他和閻的關係，非常耐人尋味，大約在抗戰前可算一個階段，抗戰初期，他離開綏遠走向榆林，曾給閻氏寫過一封很長的信，一則表示訣別，一則發泄憂憤之情，一般人從此不袒傅氏再看閻氏家將。閻氏曾任二戰區司令長官，傅氏轉任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後，彼此皆掌軍政大權，各據一方，一面抗戰，一面抗八路軍，處境有同有異，政治上却絕無抄襲之嫌；從傅氏隨閻氏二十年，戰

睡早起，清潔衛生」，和山西的「抗戰復興」就不相同。這以後，時間和地區以及人事條件，使得雙方都只注意著各自的發展，聯繫上逐漸減少。三十一年傅作義解決了閻氏在綏遠的獨立旅後，克難坡開過一次討傅大會，山城貼著紅紅綠綠的標語，指著傅氏忘恩負義，從此來往更少。一隔數年，傅氏節節高陞，出任要職，閻則每次愈下，可以說是有幸有不幸了。

倒閻運動與傅之聰明

本來民國十九年擴大會議以後，山西省無務工作和政治行動便分道揚鑣，不相為謀。內戰打得火熱，學生運動鬧得頂兒，政治陷於紊亂狀態。閻氏既因編運問題和中央發生戰釁，黨部站在擁護中央的立場，積極從事倒閻宣傳，及至學潮擴大，省黨部槍殺程光政以後，再也在山西站不住腳，黨方要人紛紛南下撤退。後來在中央軍政方面的許多晉籍大員，便都是十九、二十年離開

傅作義將軍是怎樣一個人呢，外人容易一眼看透，他也有不使別人看透的條件。中國有句格言：「曹孟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這對於他頗可以作個註解。他自己積有一四十年的奮鬥經驗，哭哭笑笑以及笑笑不得的經驗太多了。他有一本據說世界條代撰的「四十年奮鬥」，他的部隊叫「奮鬥日報」，似乎與奮鬥起家的。察州之役，張學良和韓林春的精銳部隊，分三四面包圍進攻，他困守了一個多月，這一仗使他獲得「守城將軍」的英名，在晉軍中的聲望地位，大大提高。閻馮之戰，他又奉命守天鎮大同一帶，石友三宋哲元互相觀望，李烈鈞迂迴代州的戰略

沒被主將張之江採納，天鎮雖被陷，大同却在手裏拿得很穩，傅氏又第二次以「守」自稱，名噪一時了。二十六年冬際，綏東抗戰，傅氏進佔百靈廟，國外報紙上也有傅將軍的新聞。綏西五原一戰大捷，蔣主席賞賜青天白日勳章一枚，張家口戰役，血肉淋漓中又獲重大戰果。這一次又一次的勝仗像梯子一樣在多少人眼裏升高了他的身價；他是在今天最為人注意的紅得發紫的將領。

傅氏隨閻氏二十年，戰功卓著，迭次升遷。他和閻的關係，非常耐人尋味，大約在抗戰前可算一個階段，抗戰初期，他離開綏遠走向榆林，曾給閻氏寫過一封很長的信，一則表示訣別，一則發泄憂憤之情，一般人從此不袒傅氏再看閻氏家將。閻氏曾任二戰區司令長官，傅氏轉任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後，彼此皆掌軍政大權，各據一方，一面抗戰，一面抗八路軍，處境有同有異，政治上却絕無抄襲之嫌；從傅氏隨閻氏二十年，戰

功卓著，迭次升遷。他和閻的關係，非常耐人尋味，大約在抗戰前可算一個階段，抗戰初期，他離開綏遠走向榆林，曾給閻氏寫過一封很長的信，一則表示訣別，一則發泄憂憤之情，一般人從此不袒傅氏再看閻氏家將。閻氏曾任二戰區司令長官，傅氏轉任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後，彼此皆掌軍政大權，各據一方，一面抗戰，一面抗八路軍，處境有同有異，政治上却絕無抄襲之嫌；從傅氏隨閻氏二十年，戰

睡早起，清潔衛生」，和山西的「抗戰復興」就不相同。這以後，時間和地區以及人事條件，使得雙方都只注意著各自的發展，聯繫上逐漸減少。三十一年傅作義解決了閻氏在綏遠的獨立旅後，克難坡開過一次討傅大會，山城貼著紅紅綠綠的標語，指著傅氏忘恩負義，從此來往更少。一隔數年，傅氏節節高陞，出任要職，閻則每次愈下，可以說是有幸有不幸了。

時與文外埠經銷辦法

- 一、本刊歡迎外埠同業、各機關、團體、學校合作社批銷。
- 二、外埠批銷請先惠存刊費，款到發刊，儘快發貨，由本刊按月抄奉清單，寄請查核。
- 三、本刊同業批銷，概按七折計算，包郵、郵費、由承銷人負擔。
- 四、本刊准版外埠儘量寄發，請指定承銷最低數量，寄遞方法俾便寄奉。
- 五、本刊一經寄出，概不退換，如遇延擱，遺失，本社僅負責查詢之責。

時與文改訂價目

本刊自二卷十六期起改售每冊一萬元，合訂本第一冊、第二冊各售八萬元，第三冊售十萬元。

訂閱價目調整如下：

國	內		外	
	掛號	航空	掛號	航空
三個月	十二元	十四元	十五元	十八元
半年	二十四元	二十八元	三十元	三十八元
全年	四十八元	五十六元	六十元	七十六元

加照年全半年

時與文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發行人 程博洪

編輯者 時與文週刊編輯部

上海姑蘇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 新華

訊 通	北 文 雜
中央大學的當局與學生……杭引	舞女暴動……碧 遙
同濟——準備赴京請願之前……蔣修苗	寒夜亂筆……不 已
歲末天寒的東北與華北……何 經	煉獄……鳳 子
北美重遊(四)……陳 達	紙漿與炮灰……傅理門
	關於周作人……子 規

# 18

立 國 南 京 第 二 卷

論 短	論 法 郎 貶 值	我 不 信 仰 甘 地
簡論同濟學潮……張之齡	自由主義者的道路「是甚麼」？孟 堅	論自由主義的本質與方向……馮 契
禁舞問題……丁 楓 華	施復亮先生的	
批評與被批評……水 平		





### 簡論同濟學潮

張子齡

一月廿九日，上海市同濟大學學生準備赴南京請願，為警察騎巡隊所阻，終於發生毆打拘捕情事。據說吳市長也「被學生打了兩棍，眼鏡打破，煙斗折斷，呢帽失落」，隨後立即提出四項條件。其中第一二三項，即命令交出當天「鬧事的為首學生」、「已開除的學生」、「和「打吳市長的學生」，可說每項都已做到：當晚經警察清查拘捕之後，計「被捕的各校學生和混入冒充學生的共有幾十名，正在個別偵訊」（市警察局局長語）；又據市政府新聞處長說：「市長在卅一日晨二點二十五分回到公館，……說同濟學生已經答應今天下午復課」，那末他的第四個條件——「立刻復課」——亦經學生接受了。接着，市府新聞處特發表「書面真相」，證明「吳市長當時被毆受辱，完全係事實。」至此，我們可以說：這回同濟學潮，從學生罷課開始，中間經過赴京請願的醞釀，而以市長「被毆受辱」、學生復課結束，上海市的「社會秩序」賴以維持住了，同濟大概也可免於解散；因同濟事件而引起的一場風波，總算平息下去了。（凡上文引號中的語句，皆直接從上海大公報徵引，見一月卅日至二月一日該報「本市新聞」欄。）

才到學校，這種不負責任的校長，我們請求政府要處分他。」（一月卅一日大公報）這樣看來，潘議長倒很想以處分校長為善後辦法之一，也就是說，為圓滑解決同濟學潮計，不惜犧牲丁校長。丁校長之應受處分，我也是十分同意的。但是我所揭舉的理由，還不止潘議長所說的一點。照我看來，丁校長最大的過咎，倒在他對學生的各種無理措置。

大家都曉得，這次同濟學潮起因於學生自治會改選的問題。丁校長祇許學生成立各學院個別組織而互無聯繫的自治會，企圖解散以全校整體為背景而五無聯繫的自治會，不許學生自行推選新理事與辦理選舉事宜的負責人，而堅持由校方圈定。一目瞭然，這種種做法，是要把今日政治舞台上所玩的一整套把戲，統統移植到學校裏來，強加於純潔的青年學子頭上。這些把戲之不民主或假民主，連國民黨黨內的所謂國大代表簽署提名當選人，乃至此番立委選舉中「確已獲得多數」而仍告落選的謝仁劍書記長（國民黨上海市黨部），都已看透了而予以揭發了的，怎麼還忍心拿來施之於學生呢？其引起學生間普遍的反感，當然是意中之事，不料丁校長偏一意孤行，總說有少數人居間搗亂，破壞校方與學生間的感情，進一步還借故開除了他所厭惡而為同學所愛戴的兩個熱心公務的學生，其後更加上一連串的高壓手段，橫一個開除，豎一個「留校察看」，於是逼得學生們只得準備遠走南京，訴諸教育行政最高當局了。

丁校長縱受革職處分，顯然仍不足以解決問題。為千萬人所繫念的許多學生還關在牢裏。若說其中有一涉及共黨嫌疑的，千萬要拿出確實證據來，不能單憑一篇毛澤東的文章做材料，將就摺成紅帽子；應該公開審訊，使社會人士都能明瞭真實情形；凡是沒有重大過失以及毫無過失的學生，則應趕快予以開釋，借此表明當局並未一手抓住法律，隨意播弄。爽快地說，假如認定此番學潮全由少數人操縱掀起，那就傷及每個年輕學子的自尊心。同

濟學潮乃因學生自治問題而起，足見學生們渴求自治，也力能自治；阻扼他們的自由意志的發揮，尙且引起反感而力爭到底，又怎麼能說他們自甘受人煽惑，毫無主見，只知聽人擺佈，有類行尸走肉呢？

張羣院長致吳市長的慰問電中有云：「此次學潮，雖告平伏，但士習如此，殊深隱憂。」（二月二日新聞報）信哉此言！根據上文我的評斷，士習敗壞，顯然表現在同濟校方。學生自治會的問題，為全國各大學所共有；「不負責任」的校長如丁文淵者，全國恐亦不乏其人。我個人所以「殊深隱憂」的，老實說，並不在學生方面。「此次學潮，雖告平伏」，然而問題顯然沒有解決，絕對沒有解決；請願固然請不成了，但同濟學生心裏依然不能折服，全國不能充份自治的學生也必心有未甘。他們本就關心政治，懂得政治，惟其如此，才不肯馴服於有如丁校長的卑劣、險詐、高壓的政治手腕之下，奈何仍以政治手腕對付之？這是值得在「隱憂」之餘仔細想想的。

### 禁舞問題

丁楓華

真是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緊接同濟學潮之後，最近上海又發生舞廳業與警察衝突事件，社會局被搗毀了一部份，舞業男女遭捕者初達七百九十七人。此事起因於舞廳業向社會局請願，反對抽籤停業，懇求收回禁舞成命。所以本文特就禁舞問題本身議論一下。

誰都知道禁舞為了節約，政令上有此明文。誰都知道節約為了「戡亂」，政令上也有明文。誰都更加知道「戡亂」的花費極大，大得無底。所以，邏輯學必然肯定我的這句話：絕對不是為節約而節約，絕對不是節約至上，倒是為了不節約這才節約，為了不節約才節約小約。這是節約政策的基本精神，明白明白的，不待多說。

然而究竟也會聊為節約嗎？並沒有。中央地方文武官員忙着競選就是一例。誰都嗅出幾個月來的

酒肉氣，可說：後方酒肉臭，前綫凍死骨。外國人形容中國今日情狀，曾有一句簡便的話：上海跳舞，中國飢餓。「跳舞」一詞，在此祇是象徵的說法，廣義的說法，相當於我們的一句俗話：「飽暖思淫慾」。——特別飽暖，這纔跳起舞來。這一門藝術介紹到中國來以後，也似乎受了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議論的支配，在一般人的腦筋裏，有時也在事實上，都變成一種淫慾的把戲了。仔細一想，外國人的觀察並不透澈，只說對了四分之三，實際情形乃是中國飢餓、中國跳舞，——豈獨上海一地為然？半個中國在飢餓綫上呻吟，半個中國在飽暖綫上淫慾，而且飽暖階級正因寄生在飢餓階級身上，這纔繁榮起來的。他們酒肉淫慾之不暇，還有什麼節約可說呢？

舞女雖也跳舞，却並未飽暖，非但自己不能從跳舞中以享其淫慾，反而專門藉跳舞來供人淫慾。一般的說，她們一直呻吟在飢餓綫上，情形是極可憐的，然而她們所操職業的性質，却逼迫她們在飽暖階級的胸懷裏，忍住呻吟，強作歡顏，然後轉身始能嚐到一點殘羹冷飯的滋味，苟延自己與一家老小的生活。這是什麼滋味，又是什麼生活呀！然而現在連這一點滋味都不讓她們嚐了，連這一種生活都不讓她們過了，於是她們也就收斂歡顏，忘記呻吟，一臉憤怒，一聲叫號，並且回嘴之外還要回手了。

有一個很普通的常識：先有需求，後有供應，必有消費，才有商品。吸鴉片者一日存在，鴉片也就一日無法禁絕；打人者既然比比皆是，便不愁缺乏棍子。就舞女生涯來說，她們不就是有血有肉的商品麼？要消滅這一類職業，可以的，須在社會經濟改革之後，須在特別飽暖階級消滅之後。這就牽涉到極大極大的問題，不是這篇短文所能討論的了。

## 批評與被批評

水平

近來批評之風甚盛。這是好現象，也是壞現象

好，因為真理愈辯而愈明，錯誤的見解可以藉此糾正過來。壞，因為批評者肆意譏評，被批評者也老羞成怒，未免有些失態。

然則，怎樣才能使批評的影響好而不壞呢？先就批評者而說：第一，對於所批評的事物要有相當研究。自己不懂的，不要妄加批評；自己不清楚的，不要輕加批評。高爾基咒咀一批評家看書很不細心，不會看，而且不明白所看的書。——並不是沒有道理的。第二，對於所批評的作者要能「心知其意」。現時因為環境關係，寫文章很難落筆，作者要表達某項意見，常須轉彎抹角，或添加一些不重要的陪襯，如果批評者抓住一兩處小語病，而忽略了全文的精神，不但容易發生誤解，而且頗不公平。反之，某些人善於作偽，貌為公正，如果批評者不能指出其真正意向所在，也決不能算是好的批評。第三，批評者要能分別光明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因而決定批評時所採取的態度。對於光明的一面，應該給以善意的教益性的批評，促其改進；對於黑暗的一面，則大可不必客氣，姑息。第四，批評者不可抱有思想上的狹隘病。雖然真理只有一個，但是真理的發現、闡揚，却需要很多人的研究、討論。只消是站在人民立場的，即可自由發揮意見，這樣才能產生新的、進步的、創造性的見解，得出完善的結論。如果「一言必稱堯舜，道必尊孔孟」，以一地所宜放之四海，一時所行流乎百代，一人所見加諸萬眾，那一定會變成八股教條，鉗制思想的發展。

再就被批評者而言，首先要有接受批評的雅量。有些人在學術上稍有造詣或有地位，即自視過高，大有一唯我獨尊」之概。如果遇到他人批評，便說：「我的書，你還沒有讀懂，就胡亂批評起來。年輕人，你且先下一番好學深思的功夫再來批評我吧。」或者說：「我還要寫一本書，成為整個的一套，你不明瞭我，且等讀了我的書以後再批評吧。」殊不知一個人無論如何博學，都是如饒風之飲河，有限得很。怎麼可以自滿自足呢？而且，一個人

的思想，是集合很多人的意見而來，即使是高見，也未必便比他人高明，人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怎見得一個「年輕人」的見解就不如一個「老年人」的？因為時代的進步，說不定年輕人要比老年人高明。在學問上是沒有老少，貴賤，男女的分別的。要能作許多人的學生，才能作許多人的先生。被批評，要虛心，才能求進步。其次，要有脫棄舊包袱的勇氣。知識份子的成見是很深的，往往自以為是，以為「我的經驗如此」，故不容易接受他人的意見，尤其是與自己相反的意見。知識份子脫棄自己的舊包袱，把小腳放成天腳，需要拿出很大的勇氣來，自己和自己奮鬥，新的我和舊的我奮鬥。再次，要努力實行。這和上述脫棄舊包袱一點大有關聯。被批評者即使聲稱已接受批評了，接受人民的觀點了，但下一次發表言論時，往往又故態復萌，或者口是心非，矛盾百出，還是不能或不願力行的緣故。再次，對於惡意的、錯誤的批評又應該採取甚麼態度呢？那就只好守着但丁的格言：「走你的路吧，人們要說就讓他們說吧！」

話說回頭，批評可能有壞影響，但決不可因為有壞影響而抹殺它的好功能。好或壞，全靠批評與被批評的雙方如何去處理它。三十七年二月一日

## 本欄徵稿

- 一、本欄歡迎各方投寄一千五百字以內、具有現實性之短篇論著。
- 二、來稿署名聽便，能用真姓名更好。但均請於稿末註明作者詳細通訊地址。
- 三、來稿登出時，立即從優致酬，並將登載該稿之本刊寄贈一份。
- 四、來稿除附有貼足郵票、寫好地址之信封者外，概不退還。

# 我不信仰甘地

蔡尙思

## ——甘地和平方式批判

最近印度偉人「聖雄甘地」爲了要使印回兩族和平相處而絕食，中國各大報章雜誌幾乎一致的代表欽佩他到五體投地。現在甘地又爲了此事而被印人刺死，印、中等國都有不少的人在痛哭，英、美等國都有不少的人在悲悼。一般人認甘地最可崇拜，最有價值的是他不論對內對外都堅持和平，痛斥武力。他是自古以來至少也是當今世界政治家頭一個和平主義非武力主義者。我對於甘地的一生從事印度獨立運動而犧牲了個人的一切，自然也會和一般人同樣的欽佩他；但如說到他的根本方法，我就不得不獨持異議了。

### 一 聖賢和英雄的兩種殺人

有些人說：聖賢是愛和平而避免流血的，英雄是用武力而不惜流血的。甘地最愛和平！甘地是真聖人！殊不知：在有階級而不平等的社會時代裏，是無法完全避免流血的。在表面上看來，所謂聖賢雖似乎是真的愛和平而不流血的；但在實際上，所流的血，有時反會更多。例如中國號稱集三代諸聖之大成的孔丘，和集三代下諸賢之大成的朱熹，極力主張以君主的壓迫臣民，地主的壓迫農民，長輩的壓迫幼輩，男人的壓迫女人……爲人倫人情，合禮合理，以致二千多年來臣下，農民，幼輩，女人……的慘死於此種禮教理學者，多至無法一一查明，這真是殺人不見血，比之白起，秦始皇、項羽、成吉思汗……那般魔王屠伯的殺人，人數不知要超過了多少倍。而近代西洋黑格爾、尼采那種反民主，無入道的思想學說，也比莫索里尼、希特勒那般獨裁者侵略者惡毒得多。如再明白的加以比較，便是：聖賢們的殺人，使人流血，是無形無限的；英雄們的殺人，使人流血，是有形有限的。而且聖賢們多是思想家，英雄們多是實行家，實行家多是受了思想家的影響的。如中國歷代專制君主崇拜孔丘、朱熹，納粹的崇拜提倡國家學說的黑格爾、和提倡超人哲學的尼采，法西斯蒂的信奉新黑格爾派的秦梯爾……便是再顯明也沒有例子。於此我要對現代一般愛好和平，厭惡武力的人們說：「英雄和聖賢實有密切的關係，聖賢未必盡是」。至於中國過去的非正統派思想家如宋代的功利派，和清代的苦行派，反而看重實行家的英雄，輕視思想家的聖賢，我也要對他們說：「英雄和聖賢實有密切的關係，英雄未必無是」。總之：我要向古今中外的人們說：「一切一切都在乎內容的是與非或公與私，而不在乎形式的英雄與聖賢，或武力與和平。」

### 二 壓迫和反抗的兩種用武

帝國主義者用武力來壓迫弱小民族，當然是最羞恥的；反之：弱小民族用武力去反抗帝國主義者，當然是最光榮的。政治的獨裁者和經濟的獨佔者用武力來壓迫大眾，當然是最羞恥的；反之：大眾聯合在一起用武力去反抗政治的獨裁者和經濟的獨佔者，當然是最光榮的。（這個問題，我在十多年前已詳論過，請參看拙著「中國思想研究法」二六六至二六八頁）假使華盛頓是個甘地，爲了避免流血而不用武力去反抗英國，美國便沒有希望獨立；假使列寧是個甘地，爲了避免流血而不用武力去反抗帝俄，蘇聯便沒有希望產生；假使孫中山先生是個甘地，爲了避免流血而不用武力去反抗滿清，滿清便不會被推翻；假使蔡鈞是個甘地，爲了避免流血而不用武力去反抗袁世凱，袁世凱便不會被打倒；假使中國、英、法、美、蘇等的執政者個個都是甘地，爲了避免流血而不用武力去反抗德、日、意等軸心國，德、日、意等軸心國一定會霸佔全世界；假使陳、吳、劉、項等個個都是甘地，爲了避免流血而不用武力去反抗暴秦，暴秦一定會由始皇，二世，傳至萬世，與天地同久……像這一類的用武，是何等的需要！用古代中國人的話來說，就是「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這話太過，姑且用之）。用近代西洋人的話來說，就是「不自由，毋寧死」。真是：與其慢性的犧牲，不如急性的犧牲；與其生爲亡國奴，不如死爲自由鬼。

有人拿甘地的反對武力的抵抗去和墨子的「非攻」相提並論，這實在是一擬不於倫的。我以為：甘地的「消極的抵抗」，比那些「消極的無抵抗」，雖似稍高；但如比之墨子的「積極的抵抗」，却遠不及。托爾斯泰根據基督教聖經所說：「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爲那逼迫你們的禱告。」「便倡導了無抵抗主義，去謀實現人類純愛而沒有惡，純和平而沒有武力的社會。聽說：羅曼羅蘭會稱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爲「非武力的拒絕」，托氏在逝世前二月也曾致函甘地，說了一個厭惡殺戮的故事，「甘地的一生都是遵循着這一條『反殺戮愛和平』的道路前進的」。見二月一日上海大公報專載「新德里的十字架」文中所引「那歷甘地的和平而非武力的『不合作運動』，也就和托氏的無抵抗主義相差不遠，好不了多少了。至於墨子，可就和



托爾斯泰以至甘地等，大不相同：梁任公解釋的很正確：「墨子所『非』的是一攻一不是一戰。質言之：侵略主義，極端反對；自衛主義，卻認為必要。墨子門下，人人都研究兵法。本書備城門以下十一篇所講都是。墨子聽見有某國要攻人的國，就跑去勸他；若勸他不聽，他便帶起一羣門生去替那被攻的國辦防守，有這一著，然後非攻主義纔能貫徹。墨子所以異於空談弭兵者在此一。〔墨子學案〕據墨子公輸篇載：『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大王舉兵攻宋，……不義；……令公輸般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余。……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般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這是一種到了無以復加的抵抗精神！自己如不能用武力去守，便無法阻止敵人的用武力來攻；不用武力的不合作運動和無抵抗主義，適足以獎勵侵略。『墨子之門多勇士』，〔陸賈新語〕「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正是以武力爲有效的手段，以和平爲最高的目的，就此一點而論，墨子實於甘地遠矣！

甘地所倡導的反英運動即非暴力主義的不合作運動，只是拒絕英國的稱號、爵位、僱傭、學校教育、物品商貨交易等的關係，去對英作消極的抵抗，號爲英印間的「無形戰爭」。後又反對鹽法，倡導不納租稅，以致被捕下獄，而與印度總督訂立「妥協條件」：停止反英運動和抵制英貨；英政府才許修改鹽法，並釋放政治犯。甘地以爲民族的歧視可以從此消滅；但在英國却沒有誠意和印度合作，甘地因又去謀反英，而再入獄。他爲了徹底不用武力，至說：「如果有人罵我，我決不去反罵他，以惡報惡的結果，是使罪惡更形擴大，暴力決不能被更大的暴力撲滅，這是一個普遍的真理」。『我畢生精力爭取印度自由，但如果我必須用暴力取得它，我寧願不要自由』。他幸得生在近代，而其敵人又爲英國，故其消極的不合作運動，還能有一些表現。假使他生在古代蒙古人統治下的印度，或生在近代的朝鮮、台灣，其敵人爲日本，我敢斷言：不要說只有一個甘地，就使全印度人個個都是甘地，一致實行絕食，以至死光，那古代的蒙古人，和近代的日本人，也絕對不會被感動而退出印度。甘地如不因絕食而死，也會被古代的蒙古人和近代的日本人殺死的。在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甘地才會存在。這是一般殖民地的人們所應該看到的，千萬不要個個都去想做甘地。現在甘地死了，日皇竟也會說出一這是極悲哀的事件，日本首相也說：「甘地翁的死，實屬可悲，我們希望印度民族繼承甘地翁的思想」。〔見二月一日報載〕這真是「只有天曉得」！不知做過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台灣人民聽見，作何感想？

我常想：以印度的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如果能够團結起來實行一種極有效的抵抗，也許英國會早些退出印度；就使還未退出，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容易統治。因爲侵略者壓迫者剝削者，最怕的是一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而不是托爾斯泰等的無抵抗主義，和甘地的不合作運動。甘地的尙能見容於大英帝國，和印度的尙難完全脫離大英帝國的統治，其主要原因皆在此。甘地死後，大英帝國的外相貝文表示：「印度歷史上未有更在甘地之上的偉人，甘地一生爲和平奮鬥，反對使用暴力」。甘地的「反對使用暴力」去抵抗大英帝國，對於「使用暴力」來侵略印度的大英帝國，自然是很有利的。假使甘地用武力去反抗大英帝國，看大英帝國的政府肯表示哀悼嗎？而法國國民議會代理議長勒日納也嘆道：「一個教人相愛不可互相憎恨的大思想家與世長辭了！」國民議會旋一致通過總理許曼所提的決議案，由國民議會致電印度政府弔唁。在殖民地之多僅次於英的法蘭西帝國，對待和印度爲鄰的安南殖民地，是一只有憎恨而沒有愛的，連給它一個像印度的地位也不肯，所以它也希望安南殖民地對於法蘭西帝國，採取甘地那種「相愛不可互相憎恨」的態度。總而言之：任何擁有廣大殖民地的帝國主義者，都是非常歡迎甘地的不以暴力去抵抗暴力的。甘地一面反對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一面又反對用武力去徹底抵抗帝國主義者，真不失爲殖民地的極中庸的大聖人！

### 三 宗教和政治的兩種效力

甘地的父親相西部坎希亞瓦薩王，在商界有很高的地位。他的母親篤信宗教。甘地在他階級中是第一個到歐洲去留學的人，畢業於倫敦大學法科後，就任律師於南非，不久即棄律師而獻身宗教。他是「印度教徒精神上的領袖」。他活到七十八歲，計坐獄三次，絕食十五次，遇刺四次。他在最後一次的絕食，幾乎不支身死，告訴他的信徒們說：「與其活着眼看印度因印回的自相殘殺而分裂，反不如一死來得光榮」。他於一月二十日在寓邸主持晚禱會，會有人在圍牆外面投擲炸彈，當時甘地雖未受傷，但圍牆坍塌，壓傷了九人。他始終相信他的使命是在祛除印度內部的傾軋，及宗教的仇恨。到了三十日，預備出祈禱，在途中便被一個同教同胞連放三槍打死，他「中槍後馬上倒地，還拿手放在前額上，這是印度人表示寬恕仇人的意思」。單在他遇害的那一天，印度人心已經極端恐慌，孟買的暴動已經死了十五人，被刀刺而受傷的已經有四十六人。照上述的事實看來，甘地真不失爲一個偉大的宗教家，可是這也說明了宗教感化的效力是很有限的！他連對那些同教同胞都苦無法感化，怎樣能夠去感化個性較強的回教回教；至其對於西洋帝國主義者，更可想而知了！

記得抗戰期中，我和蔣竹莊先生、故友劉廷芳博士等約一桌人在上海四馬路一家茶館聚餐，討論思想，劉先生會說：「如要做外國的殖民地，最好是美國，其次爲英國，又其次爲法國，最不好是日本，日本的待朝鮮人，真是慘無人道」！這就使我想起美國人最信奉基督教；耶穌最反對富人，以爲富人最不

容易進入天國；但事實却告訴我們：美國人最要求富，富人最多。耶穌主張博愛、平等；但事實却告訴我們：美國國內的白黑種族界限最為分明，白人一向以虐待有色同胞為真理。連同國人的「狹愛」也始終做不到，還談得到去博愛異國人嗎？此類之例，多至不勝枚舉。最好的美國人尚且如此；至於其次的英國人，更可想而知了！

以自認為最文明的西洋人的長久篤信基督教，尚且如此缺乏同情心，正義感；至於甘地所篤信的印度教，其不足以感召異教的西洋人，更可想而知了！西洋人表面提倡宗教和平，實際注重政治武力；甘地却內外一致，名實相符的注重宗教和平。英國用政治武力來統治注重宗教和平的印度；甘地却反而用宗教和平去反抗注重政治武力的英國。印度是一個最標準的東方精神的宗教國家，甘地正是這種東方精神的宗教國家的代表人物，他只有東方精神而沒有西洋精神，只是個大宗教家而不是個大政治家，至多也只是東方化宗教化的政治家。甘地認漢視、絕食、祈禱等是最好的武器，全靠種種武器去對付一切，實在未免太可憐了！蕭伯納對於甘地之死的感想是：「可見做人太好是如何的危險」，這也是頗有意味的一句話！

甘地不但對大英帝國的侵略統治，絕對禁用武力去抵抗；而且想到社會主義的實現，也要限於採取妥協方式。他說：「我不願以強力去剝奪有錢的人，我願邀請他們的合作，共同推動國有化的轉變過程」。這和中國墨、老諸子同樣是不免空想的。墨子主張「有餘財則相分」，勸富人自動的分財，和老子主張「法一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痛罵富人「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可是到了如今已經二千多年了，接受墨、老諸子主張的富人究竟有幾個呢？

#### 四 精神和物質的兩種文明

甘地提倡自然主義，對現代一切西方文明都擯棄不用，完全回復到東方的文明，過着自耕自織的古代生活。他實行以東方的精神的文明去抵抗西方的物質的文明，以古代手工業的生產去抵抗新式機器的生產，以農園去抵抗工廠，……這簡直像以卵投石，結果是徒勞而無功的。這在甘地原是用來對英做不合作運動的手段的，但如印度人久而久之，把它誤認為立國的要道，日益和現代化遠離，那就不啻完全和英國合作，西洋的帝國主義者真是求之不得！大家不

要忘記：希特勒佔領法國時，主張「工業德國、農業法國」；日本侵略中國時，主張「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由農業到工業，工業戰勝農業，這是最顯明的指示了現代國家民族生存競爭必由的一條途徑。可惜中國的梁漱溟幾位先生直道此刻還未看出。記得印度詩哲太戈爾來中國遊歷時，滿口贊美古代東方的精神文明，痛斥近代西洋的物質文明，吳稚暉先生立即同他開玩笑道：太戈爾從上海到北京，為什麼仍坐近代西洋式的火車，而不坐古代東方的牛車馬車？可見印度兩位偉人都是同持一種態度的。而英國哲學家羅素來中國講學，也和印度兩位偉人的態度相同：極力歌頌中國精神，尤其是老子精神。梁漱溟先生到現在作文著書還是時常引來作自己的論據。我以為：如果古代東方的精神文明全是有價值的，如果近代西洋的物質文明全是有價值的，那就不論東方人，西洋人，都應該只向西洋帝國主義者宣傳，而不應該專向東方弱小民族宣傳。不然，如以東方人而受西洋人的此種含有毒素的宣傳，既未大上其當；如以東方人而向東方人作此種含有毒素的宣傳，更等於實行自殺。

#### 五 總說——甘地是印度的老子

現在就根據上述來下個結論吧：我覺得甘地幾乎可以說是印度的老子，老子和甘地最相似的，約有四點：第一、甘地的主張：以和平對付武力，同於老子的主張：「柔弱勝剛強」、「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第二、甘地主張：「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守弱曰強」、「弱者道之用」；第三、甘地主張：「只有愛而沒有恨，被刺將死，還表示寬恕仇人，同於老子的主張：「報怨以德」、「不善者吾亦善之」；第四、甘地的反對近代西洋的文明，而要復歸到東方的文明，同於老子的反對後代的物質文明而要復歸到原始社會時代，如說：「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復結繩而用之」、「復歸於樸」；第五、甘地的自幼戒絕酒、肉、婦女，願以貧乏終其身，同於老子的主張：「去奢去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常無欲」。

讀者如認老子和甘地不大相同，我就再來補充一下：甘地是以中國的老子而兼印度式的宗教家，甘地是中國老子和印度宗教化的獨立運動家。在現代世界政治革命家中是最奇怪的，再也找不出第二位來！

速寫於甘地死後的第三天

## 論自由主義的本質與方向

馮契

要給自由主義下一定義，頗不容易。因為有各種各樣的自由主義，可以有不同的內涵與外延。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即自由主義必具中庸性。

程子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自由主義者有其「不偏」，故處於左右之中間。自由主義者有其「不易」，即對於自由之追求。所謂不偏，有程度的差異。或居中而左傾，或居中而右傾，而此左傾或右傾又可多可少。至

於追求自由之原則，則或者把握得緊，緊到可以殺身以成仁，捨身以取義；又或者把握得鬆，鬆到一無把握，只顧得個中庸的幌子，那却是孔子所謂「鄉愿，德之賊也」，亦即一般人所罵的「妥協，騎牆，兩面派」了。

掛羊頭賣狗肉的不必談。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緊抓住不易之原則，在左右對立的局面下，叩其兩端，中道是循。所以在政治上，反對一黨專政，主張民主的多黨制；雖不必反對武力革命，却總贊成溫和的漸進的改良。在經濟上，反對財富獨佔，希望做到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雖不必反對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却總多少贊成各階級協調而謀共存共榮。而在文化上，則竭力反對思想與言論的統制，憧憬着一個諸子並作，百家爭鳴的時代，認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如果一家獨尊，文化就不容易發展了。——當然，這裏所陳的主張，只是就大體而言，既不必為所有的自由主義者同意，且同意的亦有程度之差。因為各個或各種自由主義者，對於自由一詞的涵義，可有不同的解釋。

然則何謂自由？——照作者理解，自由有其最高義與最低義；最低義是各個人獲得生存的權利，最高義是各個人的個性得到充分的表現。個性與社會性，或個人與社會，是對立而統一的。對立，所以難免衝突；統一，所以又不能折成兩片。人是社會的人，個性總以社會性為根柢。任何人要生存，要表現個性，必得在某種社會裏面。離開社會，割斷人和人的關係，個人既無法生存，當然也談不到個性了。所以在和睦的家庭裏，個性容易養成；在良好的學校中，個性容易發展；在民主作風的薰陶下，個性就容易得到表現。反之，家庭不和睦，學校不良好，一國的政治不民主，則不但個性不能發揮，生命也常常受到威脅。而究極地說，各個人的生命要充分安全，個性要充分表現，實在非在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不可。完全平等的社會即無階級的社會或大同之世，這是個理想，雖然數千年前的賢哲已經提出，却至今未能達到。我們現在的社會，不僅仍有主奴之分，上下之別，而且統治者的剝削和壓迫的手段，已殘酷到曠古未聞的地步。幾乎每一個制度，都成了個性的桎梏；幾乎每一條法規，都威脅生命的安危。此真如燃眉之急，迫不及待。亦可見對於自由之追求，無論從個性要求解放或從生存權要求保障說，實為全體人民（除了極少數統治者外）共同的緊急的願望。

所以自由主義者的不易之原則，正是今日全民的要求。但自由主義之為自由主義，特別在於不偏的一面。把上層的統治者除外，所有被統治的人民，又可分為下層與中層。自由主義之所以具不偏性或中間性，那是因為它是中間層的意識形態。

自有歷史以來，從沒有一個統治者是自由主義者，除非他沒落了，除非他

別具慧眼，敢於特立獨行，準備脫離他本身所處的階級。因為上層階級既居於剝削他人的地位，為了維護既得的利益，自然不贊成解放或自由的要求。個人主義，獨裁主義，霸道主義，壟斷主義，才是統治者所愛好的。當然，有時為了蒙蔽羣衆，也常戴上個自由主義的假面具。可是假面具揭開，在本質上，統治者們的主義，總是自由主義的對立物。自由主義必須與個人主義等相分別。個人主義只講一個人的自由，霸道主義只是一小集團的稱霸。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却是各個人，每個人，或所有個人的，生存權的獲得和個性的解放。

而下層呢，他們的主義，通常也不會叫作自由主義。下層階級如果不覺悟，就不知自由為何物，只把一切的痛苦委之運命，歸之老天的意志，俯首貼耳，為牛作馬，不作絲毫反抗。但是如果覺悟了呢？那就馬上作有組織的行動，或嘯聚山林，或建立秘密幫會，在現在，就是參加共產黨了。這類下層的組織，不論其內容如何差異，形式如何不同，為了行動的便利，在紀律上總有點墨子所謂「尚同一」的意思。尚同即同於上；在過去，叫作聽從大哥或頭領的號令；在現在，叫作服從組織或上級的決定。既然尚同，當然多少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在下層階級的人看來，本階級或本團體的生存權利，應該放在第一位。階級沒有解放，團體不得自由，個人也就無法活命。所以下層階級的主義，從墨子一直到今日的共產黨，都是一種團體主義或集體主義。集體主義與自由主義有別，前者強調社會性，階級性，注重一集團的自由；而後者強調個性，注重各個人的自由。

中間層才是忠實的自由主義者。中間層處於被統治的地位，當然不易與統治者同調，發展到極端的個人主義或獨裁主義；除非喪心病狂，仰承主子的鼻息，企圖作奴才總管之流。而中間層的被壓迫，其程度又常較下層稍差，所以他們要作反抗，總比較溫和，常不肯，也常不能馬上訴諸行動。說「不肯」，是因為有所顧慮；說「不能」，是因為不易團結，中間層常維持小康局面，逐步逐步的往上爬，一作暴力的抗爭，說不定被在上者強壓下去，那就不僅小康無法維持，甚且要受處分而性命難保了。這是中間層應有的顧慮。至於中間層之所以不能團結起來行動，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由於生產上比較缺乏組織。這一點，只比較小市民與產業工人即可明白。工人在工廠裏從事生產，就是一種堅強的組織。而小商人們開雜貨舖，小公務員們整日伏在辦公桌上，却簡直如一盤散沙，永遠捏不攏來。由此可見，中間層之不易走上集體主義的道路，是先天的。

介乎獨裁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就是中間層的自由主義。介乎美蘇之間，有英法；介乎國共之間，有我們的大公無私的社會賢達。自由主義是一種不上不下，可上可下的東西，如果流於鄉愿，那就又是或上或下，亦上亦下的了。所以得意時，則左右逢源，為上下的緩衝；倒霉時，則左右不討好，為上下所夾攻。此不但鄉愿如此，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亦然。試觀各個或各派自由主義者

所陳主張，總是左右兼顧，上下並包，談政治改革則主漸進，論階級利益則主協調。這些，都是生活於上下夾縫中者應有的看法。

### 三

中間層有其久長的歷史，所以自由主義有其深遠的優良的傳統。

在中國，當春秋戰國之際，中間層（包括小地主，商人，手工業者，自由農民等）開始強大起來。而所謂「士」，也是這階層的構成分子。新興的階層編帶朝氣，不能滿於現狀。於是作為中間層代言人的「士」，就聚徒講學，著書立說，造成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最燦爛的局面。先秦諸子，或多或少地，都帶自由主義的色彩。其中墨家最左傾，「兼愛」，「尚同」等主張，基本上是下層階級的集體主義。然而墨子也同孔子一樣，薦弟子至各國，為當政者服務，可見也是生活在上下之間。而當時所謂「仕」，墨家也不例外，進退是自由的，合則留，不合則去，就更可見有自由主義的傾向了。至於孔子，本來是個沒落的封建貴族。沒落了，所以變成中間層的士，但是畢竟還帶着上層階級的尾巴，於是「一方面既講『汎愛眾而親仁』，『有教無類』的積極的自由主義，另一方面却又抱『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消極態度，並替舊制度辯護不遺餘力，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這是一種右傾的自由主義。道家代表小地主階層。小地主在中間層中，是比較最接近上層的。所以老子的自由主義，就右傾得更厲害。當然，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頗具攻擊的火氣；但『無以生為』以全生，已是一種消極的自由主義；而說到『聖人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則明明是在替統治者策劃了。

秦漢以來，墨家衰頹，廣大的中間層及徘徊於上中之際的士人，皆奉「陽儒陰道」之說。說士人徘徊「上中之際」，是因為在長期（秦漢迄今）的官僚政治之下，知識分子有一條確定的平坦大道——「學而優則仕」。一踏上仕途，即是為上層階級服務，甚至自己也搖身一變而為統治者之一了。至於「陽儒陰道」，有幾重意義：第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兼善天下則步上朝廷，上朝廷是儒家。獨善其身則歸隱田園，歸田園又是道家。第二，上朝廷做官，則滿口仁義，滿心權術。仁義是儒，權術是道。第三，歸田園治家，則用孝悌忠信的一套，愚弄子弟及奴才。孝悌忠信是儒，愚弄便又是道了。

二千年來的士人，中間層，或右傾自由主義者，其面貌，其一輪廓，大半如此。而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既上承傳統，當然也有很多人，是免不了帶點這種鄉愿的臭味的。

但這不是說真正的自由主義，在中國已經絕跡了。「孔席不暇煖，墨突不暇黔」的精神，以及道家攻擊舊制度的火力，在我們的歷史上，依然為志士仁人，不絕如縷地，繼承並發展着。在今天，我們也還能從若干自由主義者身上，找到這方面的具體而微的典型。

### 四

不過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是個中西合璧的混血兒。除上述本國傳統之外，還有其外來的一面。

在西洋，撇開古代與中世紀不談，近代自資產階級興起，自由主義乃風靡一時。原來所謂資產階級或市民，當其開始強大時，也是個中間層。它是介乎地主，教士（二者為上層），及農奴（下層）之間的。更且從經濟上說，市民從事自由企業，最贊成自由競爭。所以法國革命時高唱自由主義，是必然的現象。但是當工業，小市民與市民的聯合陣線把封建主推倒，政權便落到了市民手裏。一成為統治者，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便開始變質了。由盧騷，伏爾泰，漸漸變到尼采，更進一步，就是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再翻個版，就是杜魯門主義。至此，自由主義就轉化為其對立物——獨裁主義。但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自由主義的精神仍被中間層保持者。由「天賦人權」說及「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發展出一種烏托邦的社會主義，如聖西蒙，歐文和傅利葉所主張的。這種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明顯的帶着小資產者的色彩。所以積極方面，明確地指出資產階級統治的黑暗與危機；而消極方面，却忽視工人的力量，反對一切革命行動，只企圖用和平手段達到經濟平等的目的。自然，這是中間層所應有的主張。（到此時，小資產者是介乎資本家和工人的中間層了。）但是這社會主義的觀點，後來却經馬克思等用下層階級的立場加以發展，脫胎換骨，改頭換面，就產生了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一種集體主義，與中間層的帶自由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便有了差別。

但是中間層既然存在而且還相當強大，自由主義，以及溫和的或空想社會主義，總不斷的會有人提倡。所以在左右對立之下，在戰鼓聲中，我們還不時的聽到「中間路線」或「第三方面」的呼聲。可見自由主義是活着的，而且還在發展。這就世界說如此，就中國說亦然。

### 五

以上略明自由主義如何承「百代之流」而演變至今，且尚存活力；並指出歷史上的自由主義，如何隨中間層之起伏而有興衰。溫故以知新，鑑往以知來。我們現在要問：這個傳統或歷史，給了我們什麼樣的提示與教訓呢？

第一，自由主義者對於文化（文化二字用狹義）的貢獻極為偉大。自從封建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而有強大的中間層興起以來，文化事業的創造，總以中間層及其知識分子所盡的力量為最大。統治者人數既少，貢獻自不多，對於文化的破壞作用却極大。而下層階級則又因專從事物質生產，識字的機會尚不多



，又怎能無餘力從事文化？惟有中間層，人數既多，又有受教育的機會，也明白文化所起的作用如何。所以亂世則抱殘守缺，治世則讀書致仕。至於今日，自由主義者總還是特別喜歡講理性，辨是非，推崇文化力量，致力教育工作，也就是這緣故。而將來新社會產生（不論此新社會之性質如何），在開始時，文化、教育和若干技術性工作，必大半將由今日之中間層及其自由主義者負責，是可以斷言的。自由主義者之有前途，由此亦可見。

第二，中間層有其優點與弱點，自由主義者亦有其優點與弱點。此優點生於「可上可下」的性質，此弱點亦然。一方面，因為中間層可上而又怕下跌，所以不免想往上爬而與上層結合。但是一與上層結合，自由主義的精神就喪失了。於是或則「鬬然媚世」，魚目混珠；或則為統治者張目，和上層一鼻孔出氣。到此時，文人被「御用」，文化被「欽定」，就慷慨無生氣了。但另一方面，也正因為中間層處在上下之間，他們的眼光，乃可及於全體人民。孔子「仁」，墨子「兼愛」，法國革命時就提出「博愛」。積極的自由主義者皆恍然見到：只有在完全平等的社會中，才可以有真正的個人自由。至此，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如果都不是虛偽的），變成「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第三，正因為自由主義有深厚的文化傳統，所以又派生另一對優點與弱點：此優點，即有一貫的不易的原則，博愛的胸懷，對於自由的追求，前人既已立了模楷，後人自易於追隨。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步調，是非常堅定的。敢於提出理想，敢於面對現實，敢於為人民說話，也敢於對腐敗的統治者施猛烈的攻擊。但是與此優點相連，却又有一種易為傳統束縛的弱點。傳統的自由主義，在解決個人與社會之矛盾統一的問題時，多半強調個人方面。大學上說：「豈是皆以修身為本。」論語上說：「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於是講政治則以道德為本，論改革則以教育為先。從個人修養做起，然後才談到「富之，庶之」。這就太迂闊了，所以難免空想之說。

## 六

討論至此，自由主義的中庸性及其所以然，是更明白了。問題既回到個人與社會的對立，我們就趁此機會，再申述一下上文所說「個性以社會性為根柢」的意義。

郭子玄說：「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所謂「當今之變」，是一種什麼樣的變呢？今日世界上，正進行着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大革命。這個大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從「個人本位」轉變到「人民本位」。個人不能離全民，故全體人民為本；個性不能離社會性，故社會性為根柢。從理論說，是一向「本來」如此。從實際說，是今日「應該」如此。過去的自由主義或烏托邦社會主義，都是個人本位的。這並非古人愚笨，是因受時代與階級限制，想不到提出人民本位的話來。但時至今日，如果仍高談「修身為本」，那却是落伍了。

人民本位論者，要把個人本位的話語顛倒過來。不說「修己以安百姓」，而說跟百姓站在一起來修養自己。於是講道德則以政治民主為本，論教育則以經濟改革為先。在求全體人民的解放中，解放自己；在打破整個社會的桎梏中，去獲得個人的自由。所以首先是社會，然後是個人。社會的問題解決了，個人的生存權利與個性解放也就沒有問題。因此，今日的自由主義，必須與集體主義結合，而且以之為前提。

這也就是說，中間層的眼睛，不應該向上看，而應該往下看。說「應該」，尚含有勉强的意思。但單就中國今日的中間層說，這「應該」其實也是一本「來」。事實上，中國的中間層在加速度地往下跌，甚至已跌到無可再跌了。這一個事實，誰也明白，無庸贅述。

因此，所謂自由主義的道路，或今後的發展方向如何，在這裏，我們也可以得到暗示了。

# 施復亮先生的「自由主義者的道路」是什麼？

孟 堅

讀完施復亮先生的「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載「觀察」三卷二十二期）以後，所得到的第一個感覺是內容有些紛亂。因此很可能給某些讀者以一種思想上的混亂的。施先生本是知識分子，又是常常在寫文章的人，何以文字與思想上會發生這樣的紛亂呢？我想：沒有別的，祇因為施先生於自由主義者必然的一條途徑之外，硬要找出第二條路即中間層緣來的緣故。這條路是烏有的，是俗語說的「船頭上騎馬、走頭無路」的一路。他一定要說有這樣一條路，而且說走得通的，那麼說來的話安得不東拉西扯，亂七八糟呢？

原來自由主義與其主義者是跟資產階級的興起一道起來的，這關係在歐洲如此，在別處也是相像。一般的說，他們常與資產階級相結合。由此可見：那種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的自由（及其民主）實有它的限度，通常以資產階級的利益範圍為尺度。這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像在中國那樣的被壓迫民族裏，民族的自由主義者必然傾向於革命，但有買辦化甚至洋奴化的「自由主義者」，當然阻礙改革，完全反動。）

中國的資產階級又分若干階層，下等的（小資產階級）也受壓迫：受帝國

主義的壓迫，受封建殘餘勢力及大的即豪門資產階級的壓迫。所以民族的，不與帝國主義勾結的，特別是小資產階級應該是反抗這些壓迫的。在這種資產階級裏的自由主義者當然應該是有些革命的。

那麼，中國民族資產者，（與自由主義者一起），可以像歐洲過去的革命一樣，號召勞苦人民羣衆，起來革命，推翻上面的壓迫，（獲得政權後與工農又分開），建立一個像施先生所標榜的「能自由批評異見」，「同時充分尊重異見」（實際上並不如此）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嗎？但是不能，絕對不能！

不但因為資本主義革命時候，人民羣衆屢受欺騙，（資產者，地主更不必說，起初以全人民的利益來號召，到了成功之後，便獨吞勝利之果實，把工農大眾一手推開）；不但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民的自覺已不知提高了多少倍，決不會再上這種當，再去誤聽這種號召了。而且還有重要的是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即指帝國主義國家），雖然已經走到日落西山的時候，可是它的勢力却已伸到可能的每個角落裏了，半殖民地國家早已受它的勢力的籠罩。在很早的時候，被帝國主義勢力侵入後，中國國內的官僚資本就常常與帝國主義發生關係。這種情形一直繼續着。由是我們知道，資產階級本是食利的階級，容易腐化的階級，又是很軟弱的，假使一旦握到政權，（事實上已不可能的），便立刻與帝國主義相勾結，做到共同分利，共同壓迫人民的地步。這話絕不是空談，實有事實可資證明，而且證據很容易找到的。這種事實決不是偶然的。

在這種形勢之下，反抗帝國主義及其他壓迫的解放事業，必然落在勞苦人民的肩上。因為人民羣衆是最堅實，真正求自由解放者。壓迫勢力無論怎樣威嚇利誘都無所施其技！至於其他的階層，比如較小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與帝國主義勾結，還是以民族利益為立場時，當然會感到加在頭上的壓迫，即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與施先生所指出的「特權者（即壓迫者）」的壓迫，他們一定多少是要反抗的。與這階級相結合的自由主義者，自然也多少傾向於革命與求進步。施先生的文章裏，一則說「但當他（自由主義者）發見了統治頑固反動，絕無改良希望的時候，他會走上革命的道路。」再則曰「一個自由主義者祇要他肯始終站在廣大人民的中間，始終「反靜態」，「反現狀」，「反干涉」，「求進步」，「求創造」，跟特權者（即壓迫者）「鬥爭」，我相信必然會有他光明的前途，即使因此而被犧牲了生命，也會獲得他應得的代價。」我想，這些話多少就是指這一些在此時此地的自由主義者的使命的。

但是據我的觀察，施先生還另存有一種錯誤，便是不瞭解在近代帝國主義的與國內半殖民地的形勢，及特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地人民的自覺大大提高的形勢；因此也不瞭解中國的解放事業必然落在勞苦人民羣衆身上，這人民大眾是領導力量，而自由主義者祇是其中一部分附加力量之形勢，不明瞭這種

形勢，還以為今日中國的情形如法國大革命時代及辛亥革命時候一樣（從施先生說「法國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歷史都是最好的證明」等語可見），是很可能誤為今日的謀進步還像上述的時代一樣，可由資產階級來領導的。施先生雖然沒有明白說明，但是這種意思的痕迹却多處可見。如果這一觀察沒有錯誤，那麼很可相信：施先生文章中的許多矛盾與紛亂的言辭便從這一種錯誤見解而來。既把理論與事實都混亂顛倒，自然無法「自圓其說」了。現在把混亂與矛盾的語錄錄幾段於後，以示一斑：

一、前面施先生不是說自由主義者是「反靜態」等反反反的，便是犧牲了生命也不惜，明明是說應親身從事革命的，但在別一段上却說：「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即使不去參加或同情革命，至少也不應站在反動方面去反對革命——即反對以暴力對抗暴力的爭取自由的人民。」說到這裏，他完全站在旁邊了。

二、上面不是說自由主義者是站在爭取自由的人民之外的嗎？但別一段裏又云：「決定中國前途的力量不僅是國共兩黨，還有自由主義者和國共兩黨以外的廣大人民（廣大人民必定結集在革命勢力一方面，不會獨立在外的——引用者）。這是第三種力量，也是一種民主力量。這一力量的動向，對於中國前途的決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自己又與人民結合在一起了。（倘真有舉足輕重的力量，過去為甚麼不舉一下，可見完全是誇大。）

三、上面既說自由主義者（與廣大人民）有這樣巨大的力量了，可是在別一段裏却如是說：「自由主義者要有『成功不必在我』的氣度，祇須努力耕耘，不必希望收穫一定屬於自己。自由主義者應當努力促成自己的政治主張的實現，但不一定要在自己手裏實現，自由主義者所應爭的是實際的工作，不是表面的功績。因此不能以奪取政權或參加政權與否來判定自由主義者的成敗。」這裏把自由主義者說得漫不在乎，隨隨便便的了。一切這等紛亂的言詞，都足以表示他欲往不可能中硬找出另一條路子來的彷徨失措。

然而末段還是說：「自由主義者不信路祇有一條，他相信有他自己的道路……」祇要自己的道路是正確的，便不妨堅定地勇敢地走向自己的道路！

不過據我上面非常簡短的分析裏，說明了此一時代的中國，自由分子祇有與勞苦大眾一起作反帝，反封建及「跟特權者（壓迫者）鬥爭」的一條路，此外並無別的道路。路還是祇有一條，並無第二條——並無「中間路線」這一條路。這一條路是「船頭上騎馬，走頭無路」的「路」，是幻想的「路」。自由主義者如捨此可能走與應當走的路（即與人民共作上述的鬥爭）不走，而向不可能中去尋求「中間路線」，並向讀者宣傳，假稱有走的可能性，祇要仔細想想，除「自欺欺人」之外，實在毫無別的作用！

# 論法郎貶值

郭森麒

在最近一年內，法國國內經濟無日不在惡化之中。通貨劇烈膨脹，物價不斷上昇，罷工風潮澎湃不已，財政預算無法平衡，國際收支有巨額的逆差，喧嘩將近一年的馬歇爾計劃還沒有實現。法國在此危機四伏的情狀下，乃於一月二十五日宣佈實行法郎貶值，規定匯兌率為：二一四·三九二法郎對美金一元，八六四法郎對英鎊一鎊。這種重要措施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它對於法國經濟會發生什麼影響？一定為一般讀者所關心。在我們未討論這些問題以前，我們必須先瞭解這一次法郎為什麼要貶值。

## 一

法國自解放以後，山河破碎，產業亟待復興，復興產業的器材和燃料都在需要國外的輸入，輸入的增加又要靠輸出來平衡。但當時法國外匯匯率太高（美金每元合五〇法郎，英金每鎊合二〇〇法郎），使大部份的出口貨無法輸出。不過，當時的匯率對於向國外購貨的進口商和想到國外旅行的人却給予外匯便宜的好處。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法政府鑒於金準備逐漸減少，非設法鼓勵輸出不能使復興計劃繼續推行，乃決定貶低法郎價值，將匯率作如下的修訂：英金每鎊合四八〇法郎，美金每元合一一九法郎；瑞士法郎合二七·六三法郎。這就是上一次法郎貶值的經過。

自上次法郎貶值到這一次法郎貶值，其間恰恰有兩年。在這兩年中，法國物價繼續上漲，國際收支不但未加改善，逆差反而逐漸增加。法國經濟學人和專家們對於解決物價繼續上漲和國際收支逆差的問題，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派主張通貨貶值，另一派主張通貨緊縮。通貨貶值派以為：像上述修訂的匯率還是太高，只有再貶低法郎的價值，才能鼓勵出口，減少國際收支的赤字，進而使國內物價不至於繼續上漲。

通貨緊縮派把物價上漲和出口困難，都歸咎於通貨數量太多。他們以為只要把貨幣（包括信用）的數量加以減削，便可以解決上述經濟的困難。起先，他們相信法國淪陷期間所創造的購買力大部分還在窖藏之中，市面上並未流通，只要把這一部分的購買力加以消滅，便可以阻止物價的繼續上漲。

通貨政策上的這種論爭早在十九世紀初葉就會經熱烈進行過，稍有貨幣史常識的人大概都能道及，在這裏不必再作學院式的論斷。作者提出這兩派的論調，無非要指出法國政府在最近兩年中所採行的政策，既非積極的通貨緊縮，又不敢輕易實行通貨貶值。法政府一向是走着折中的道路。

法財部前年會一度緊縮放款並發行公債，以使一部分的法郎可以回籠。可是政府經費浩大，稅收不易增加；以致收回的法郎又重新流通於市面，全國購買力並未稍減，而通貨流通率反作加速度的增加。並且法國人民看到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趨勢無法遏止，只怕法郎不久又要貶值，因此大家都是要貨不要錢，這樣心理更刺激了物價的上漲。

法國經濟的病狀有點類似中國，它的癥結所在，就是一個財政預算不能平衡的問題。因為法國要實行四年經濟復興計劃，這一筆建設費用，數目非常可觀，據一般的估計：法國去年國家總支出約在六六〇〇億法郎之譜，而收入方面僅有五五〇〇億法郎，收支兩抵後的赤字約有一一〇〇億法郎，這個數字還是最保守的估計，事實上以法國物價上漲的情形看來，財政赤字恐怕還不只此數。

本來，法國財政預算未始不可在開源和節流兩方面着手加以改善。在支出方面，如減縮龐大的軍事費（佔總預算百分之二十九），取消不必要的商品津貼金（佔總預算百分之九），都是節流的好辦法。在開源方面：如增加租稅收入，以充國用。但法國一般中產以下之人民在此經濟困難的時候，當然沒有納稅的能力。有納稅能力的資產階級有誰願意多增加自己的負擔？並且在國家決定政策的機關裏，又多是他們的人，難道他們願意和自己為難嗎？法國政府既沒有節流，又不願開源，唯一的辦法，只有乞靈於印刷機了。

法國除了財政預算不能平衡外，國際收支的逆差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據倫敦經濟學人的估計，去年法國國際收支情形有如下表（單位：百萬美元）：

輸入項目	三一五八
輸出項目	一五〇〇
輸出入項目的差額	一六五八
加：對貨幣基金繳納額	一四七
國際收支的赤字	一八〇五

這一筆十八億美元的國際收支赤字，數目確是驚人！法國要補償這一筆龐大的數字，不外有三種辦法：第一，舉借外債，第二，動用金準備，第三，改善限制進口和鼓勵出口的技术。關於舉借外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全世界貧窮紛亂的局面下，有能力貸款的只有美國。但馬歇爾援歐計劃喧嚷已久，還是一隻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就是美國國會能够通過，但以法國的情勢看來，也是緩不濟急的。過去二年中，法國平衡國際收支，主要的是藉助於金準備。但據聯合國的統計，法國在去年九月間金準備只有四億四千五百萬美元

了。早已有人認為這筆金準備不要到去年底便要全部枯竭。

除了舉借外債和動用金準備外，只有在限制進口和鼓勵出口的技术上求改善。去年法國出口困難的主要原因便是：國內物價水準與國外物價水準比較起來相對的高了，法郎對內的購買力幾將崩潰，而在對外的匯率上却要用人的方法加以勉強的維持，結果使輸出陷於完全停滯的狀態。現在法國的金準備快要枯竭了，許曼政府不得不將法郎再貶值百分之四十，以減輕國際收支上的壓力！

### 三

自十九世紀初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有一百多年之久，法郎價值都非常穩定。在此期間，雖經歷次戰爭，紙法郎總可以兌換硬幣而毫無困難。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法郎價值開始動搖，其減低程度至一九一八年戰爭終止時約為原價值五分之一。和平恢復後，法國國境受害最大，復員經費負擔極重，法政府為應付過度的通貨膨脹起見，迫不得已，乃於一九二八年作第一次法郎貶值的決定。

自一九二八年到現在，其間法郎貶值計有八次，在每次法郎貶值中，作者以為此次法郎貶值有它特殊的意義：

第一，我們以為此次法郎貶值只是法國幣制改革的一部份。法外部發言人說：「法政府處於當前財政的困難局勢，不得不將法郎貶值，法國無意退出國際貨幣基金團，並相信會員國有權實行貨幣改革。例如，基金團章程中，有一條規定：某國倘因糾正根本的不平衡而改革貨幣，不應加以反對」（聯合社巴黎一月廿四日電）。據法政府的解釋，此次法郎貶值乃「糾正根本不平衡而改革幣制」的一種措施，不得與一般貨幣貶值相提並論。

其次，此次法郎貶值是與反通貨膨脹法案相配合的。在法郎貶值的前夕，法國國民議會通過了反通貨膨脹法案，這個法案規定個人及公司於一九四二年全年收入在四十五萬法郎以上者要付特別所得稅。又發行一千三百億法郎的強迫公債，規定每年收入在四十五萬法郎以上者都要承購，這些稅收和債款中以三分之二供復興之用，三分之一供再配備之用，家庭人口衆多者可以免稅。又規定減少國庫支出百分之十，約三百三十億法郎。此項反通貨膨脹法案與法郎貶值可以說是穩定通貨的兩着棋子。

第三，與法郎貶值同時發表的是法國即將開放外匯市場，同時法政府要將黃金自由買賣法案向議會提出，所以法政府此次所採行的法郎貶值，和開放外匯與黃金市場的政策，都是基本改變過去金融管理與統制的方針。

第四，上月二十九日法國內閣會議中，決定將流通市面的五千法郎券立即收回，三十日又得議會通過。五千法郎券如果全部收回，總數將達三千三百億法郎。據法國官方估計，目前流通的貨幣總額約有九千零二十億法郎。如五千

法郎券確能收回，則有三分之一的法郎可以回籠了。因此我們認為此次法國政府所採取的金融措施，是通貨緊縮與通貨貶值雙管齊下的政策。

總之：法國政府此次實行法郎貶值，是要和其他反通貨膨脹的政策配合施行，以達到穩定物價和改善國際收支的目的。這不能不算是法國自勝利以來最重要一次的經濟改革了。

### 四

法國在淪陷期間，操着全國經濟命脈的獨佔資本家不顧民族利益，與德國攜手合作，來搜刮法國的經濟資源，他們在希特勒和維琪政府的支持之下，把許多中小型的工商業都兼併在獨佔組織裏面，使法國資本更集中在他們少數人的手裏。

勝利之後，法國大多數的人民一致認為獨佔勢力必須澈底消滅，若干規模的企業必須由政府來經營，這樣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增進國家的生產。因此，法國國家計劃委員會乃於前年擬具一個四年經濟復興與建設計劃，以達到上述的目的。

兩年以來，大企業國有化計劃，因為國內反民主的勢力還未澈底消滅，獨佔資本家還要從中作梗，以致中途變質。同時美國看着法國獨佔資本力量的削弱，「社會主義」勢力的澎湃，自不能袖手旁觀，兩年來美國用了種種手段阻撓法國國營計劃的進展，希望法國再走上獨佔資本的道路。

此次法郎貶值之後，繼之開放黃金與外匯的市場。首先允許在自由市場交易的就是美金與法郎（不包括英鎊），在此項自由市場內，兌換率則按供求法則而決定，黃金與外匯可以任商人在市場上自由買賣，政府不加干涉，這無異替獨佔資本找一條投機的出路，為馬歇爾計劃埋伏一支有力的前哨。金融市場既可以自由開放，國有化計劃未始不可逐漸鬆弛。此次法郎貶值與開放外匯黃金市場，法國究竟事前有無徵詢美國的意見，我們局外人自不得而知，但因美國國務部發言人對於此次匯率調整表示「最大的同情」，也可以略知一二。

美國對法國所表「最大的同情」，也有一定的限度，如果法國安定金融的計劃是象徵法郎勢力的東山再起，進而建立以法郎為中心的經濟集團，則美國金融資本家自不能同意。但以目前的情形論，美國深知法郎還不是美元的敵手，所以也樂得加以扶植，為自己找一個西歐活動的根據地。

法國是國際貨幣基金會員國之一，此次法郎貶值與該會規定不符，按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對於變更貨幣的平價有下列的規定：凡會員國請求變更平價的比率，連同過去已變更者合計，未超過最初平價百分之十者，基金會應予同意，未超百分之二十者，基金會得予認可或拒絕。但此次法郎貶值竟達百分之四十，其幅度之大，顯然違反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規定。所以該會發言人宣稱：「除



非法國能於五月之前重新採用得為基金會所接受的貨幣制度，法國將不得再向基金會借支其所需的美元。按基金會的規定，每一個會員國在一年以內得向基金會借取等於其認股額四分之一的美元，經濟基礎安全的國家並且可望於五月間增加第一年的借取額。法國在基金會中認股額為五億二千五百萬元，在第一年內法國可以借取一億三千五百萬元，而實際上已借取者為一億二千五百萬元，自五月份起法國本來可望提取一億三千五百萬元。但將來此項巨款法國是否可以提到，得看法國貨幣改革的情形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態度如何而定。

按國際貨幣基金設立的目的，是穩定各國貨幣匯率，及撤除匯兌和貿易的管制，使各會員國可以利用國際貨幣機構，得到調節國際收支與清算貿易差額的便利。回溯一九三一年經濟大恐慌之後，各國相繼放棄金本位，而採行通貨管理，國際經濟秩序完全紊亂。各國為刺激國內生產，促進對外輸出，相率貶低貨幣價值，其中尤以法郎英鎊和美元之間的競爭最為劇烈。這種貨幣貶值競爭持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還沒有圓滿的解決。所以一九四三年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內，對於各國貨幣作巨幅的貶值者，加以嚴格的限制。此次法國首先不遵照國際貨幣基金的規定，破例作百分之十以上的貶值，各國可能相繼效尤。如果國際貨幣基金沒有有效制止的方法，則該會的威信將要一落千

## 關於周作人

### 子規

有一位于鶴年先生最近寫了一篇長文，論到周作人的功罪，說是一周作人的罪就是與敵人合作，至于禍國殃民是談不到的。一月廿八日大公報「出版界」一欄，于君現在忽然來說這些話，不知「用意何在」。

周作人本來是不相信中國會對日作戰的，至于戰勝日本恐怕他連夢都想不到。他曾說：「兩國相爭，到得一國的海軍艦隊了，敵艦可以來靠岸的時候，似乎該是講和了？」中國沒有海軍，怎麼能打呢？這個意見曾寫在「寒文就武」一文之中；抗戰之前，鄭振鐸和他見面時，也聽到這樣的「失敗論」。一見「登居散記」，「周報」第十九期。對于國事，周既然認定是絕無辦法，等到戰爭初期，日本軍隊佔據許多大城市，那末他的降敵，也就是「勢所必然」的了。

三十一年的四月，周曾為張次溪的「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寫過一篇序，有這樣的話：

「……于君時多讀佛經，最見所見者善薩投身餓虎經一卷，蓋是什師所譯，文情俱勝，可歌可泣。……中國歷史上此種志士仁人不少，或挺身犯難，或忍辱負重，不惜一身以救衆生，為種種難行苦行，百年後讀其紀錄，猶能振起精神，在當世，如汪先生此錄，自更令人低回不置矣。抑汪先生蒙難不止庚戌，民國以後，乙亥之在南京，已卯之在河內，兩遭狙擊，幸而能免，此皆投身飼虎，所捨不顧生命，且其聲名，持此以觀庚戌之役，益可知其偉大，好之為善，正無不可也。……」

「……于君時多讀佛經，最見所見者善薩投身餓虎經一卷，蓋是什師所譯，文情俱勝，可歌可泣。……中國歷史上此種志士仁人不少，或挺身犯難，或忍辱負重，不惜一身以救衆生，為種種難行苦行，百年後讀其紀錄，猶能振起精神，在當世，如汪先生此錄，自更令人低回不置矣。抑汪先生蒙難不止庚戌，民國以後，乙亥之在南京，已卯之在河內，兩遭狙擊，幸而能免，此皆投身飼虎，所捨不顧生命，且其聲名，持此以觀庚戌之役，益可知其偉大，好之為善，正無不可也。……」

沈君元出而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原來是周派他出去的，此其一；其二，沈君元等了奪取領導權，聯合了片岡鐵兵、林房雄兩個日本人來打倒「老作家」周作人，周子是有「非成功不可」的決心。周作人的提攜聯合也必無希望。周作人根柢是埋頭在苦雨齋寫詩的散文和淒涼絕望的打油詩的「知堂老人」，他實在在「大東亞聖戰」的文化陣營中一員大將。寫到這處，可知于君認定周并未「編造」的意見，也極難成立。周作人戰後節去做漢奸，未必就是拿了盒子砲上戰場。雖然像周作人本來還是學海軍出身的，周作人本領大約還在於做文章，例如「不正是已經得到一禍國殃民」的效果了嗎？這道理好像「一加一等于二」，即使是在小學的兒童也會明白的。何況，周作人當時還是做「文化交流」的實際工作的漢奸文人？

其功亦不可沒。云云。這些話叫人是不能明白。當時在日本人那裏的「南京政府」我們承認不承認這是一一個愛國的旗幟？汪精衛曾收回租界，我們承認不承認他是為了主權而奮鬥？如是都能承認「其功亦不可沒」，那末，我們即使用了二十六條淪陷時期，北大和北平圖書館其實都是日本人的囊中之物，留了下來，也不過裝飾一下罷了。日本法西斯當時為了應付戰爭，實在弄得焦頭爛額，試問周擴大了北大，保全了北平圖書館，又是「為誰辛苦為誰忙」呢？也不必再說開去，只要想一想，周爲了「中日文化交流」，一面派代表出席什麼會，一面又做漢奸文化陣營的主帥，對于日本人的貢獻不可謂不大，而于君說周氏并未「禍國殃民」，「其功亦不可沒」，雖然他或許是「仗義執言」却非「大公報」的數萬讀者，寫了「春冰樓」。

法郎貶值之後，在國外受到影響最大的恐怕是英國，雖然英財長克里浦斯聲明，英政府不打算採取任何行動，以變更英鎊對其他貨幣的匯兌率，他認爲「目前既無必要，也不相宜」（路透社倫敦一月廿六日電）。究竟英國將來是否有改變英鎊匯率的「必要」和「相宜」的時候，我們固然不易斷定，但以往事爲例，未嘗不可以作爲引證。一九三一年，英鎊貶值，輸出價格相對下落，英國的輸出也相對增加。其後美（一九三三年）法（一九三六年）也相繼實行美元與法郎貶值，英鎊價格又相對上漲，輸出貿易乃隨之減少。這段史實實在英人的腦海中已留下極深刻的印象，難道他們還不會保留實行英鎊貶值的權利嗎？一旦英國競起效尤，則法郎貶值的效果將大爲抵消。

一國貶低貨幣價值，固然可以鼓勵出口，使出口商得到無形的津貼，可是這種利益只能在國內成本與物價未作相對提高的條件下，才有實現的可能，但外匯貶值通常使對內通貨也要貶值——即物價隨之而上漲。如果物價上漲的程度超過外匯貶值的程度時，則輸出仍然不會增加，國際收支還是不能改善。此次許曼政府將反通貨膨脹法案與法郎貶值並行並施，就是要勒住這匹狂奔的野馬——物價。通貨貶值的效果如何，將給許曼內閣一次嚴重的致驗！

二月二日

# 舞女暴動

娉婷嬌媚，被人樓腰的舞娘，前天竟然暴動了！她們領着萬餘同業，和軍警大起衝突，把一個社會局打得稀爛；這真是破天荒，破地荒啦！沒有來過中國的海外人士，看了這條消息，一定以為中國的舞女，都是一丈青孫大娘，大家將起戒心；到中國玩切莫進舞場！別說海外人士，我們近去咫尺，沒有進過舞場的同胞，也猜不出她們到底是怎樣濃眉倒豎，一臉橫肉的鐵色人物。舞業重開以後，定有一批男女顧客，特來觀光罷？我是參觀過舞場，見過花枝招展，弱不勝風的舞女的；而且其中有幾個，還是看她們從小溫文爾雅，羔羊似的長大的女學生，不想這回竟變了暴徒了！

對於她們這種越軌行爲，當局說是要嚴辦；已經被捕的舞業男女，報載達到了七百九十七名了，當然是嚴辦的啦！我們老百姓素來受過聖賢的告誡：「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應該怎樣「嚴辦」，我們用不着插嘴於其間。

不過我們女人常常喜歡關心女人的事。看到了「舞女陳露莉自動上訴訴苦，她以慘痛顛倒的聲音說：『一家老小都靠我伴舞過活，如果當局實行禁舞，我願意登報改業娼妓』」，說到這裏她嗚嗚地哭了。」

她這一聲哭是可以斷腸的。斷腸的悲痛，在還忍得了時發爲哭泣，到忍受不了時拳打腳踢，呼天撞地。如果再有橫來的刺激，發生甚麼事是說不定的。於是我理解了他們的拚命衝撞，回手打軍警，打社會局，是怎樣演變來的了。唉！可憐的！

羅馬時代的貴胄，每以卑賤的奴婢爲「能說話的工具」；但巴加斯加和他的同類的兩年奮戰，證明了這話的非真理了。被視爲卑賤的人同樣有感情，有慾望，有求

## 碧遙

生的本能，畢竟非工具可比。法國大革命時的梅蘭，梅莉如姑娘，是誰都知道的；這位領導軍衆向凡爾賽進攻的「赤色巾幗英雄」，前身也不過是被賤視的妓女。

西洋有句俗語：女人是弱的，母親是強的。母親在保護小孩的時候，就像牝獅似的凜然不可侵犯。這是母愛的力。但愛與憎的力量同等，而愛自身並不亞於兒女的愛；一旦這種愛受阻了，恨的力量就要發出來。這是生的本能，用不着思想或

## 寒夜亂筆

小孩兒冷了愛哭，爲了騙他玩，把筆給他。他拿了筆東畫西畫，畫得哈哈笑。隔壁的小孩兒來搶奪，他就舞起筆桿當武器，口裏直嚷「打！打！」

看了這個，呼吸停了許久。筆在小孩兒的手裏是有意義的；可以娛樂，也可以戰鬥。

隔壁的小孩兒是隔壁的娘姨抱來，那娘姨坐在我的書桌旁嘆氣，她懇求我收留她的姊妹姊妹。那個姊妹，原來是在有花園的東家那裏做事，東家男女用人，汽車夫，勤務兵有一大羣；天天請客，汽車絡繹不絕。近來館子裏要吃節約菜，不在館子裏才不必節約，所以家裏客人特別多，剩下的菜飯也多。依主人的命令，爲了免得架飯的上門，吃不完的東西必須立刻丟到拉屎桶去。但她姊妹，雖然做了「朱門」的肥饒，卻還記得世事，常常偷偷的送給窮人。不想這一來常有種種事情，在花園門外，已經被主人申斥了幾次。這回又被撞着了，於是即刻被攆出了。

鄉下的想法總是「錯誤」，我問過好幾個要飯的難民，爲甚麼要向上海跑？都回答是：上海東西多，香蕉皮，橘子皮，都可以活幾萬條性命，不用說那些骨頭和飯腳。可是他們全不懂得：上海的拉屎桶也多，胃口比他們更大。這些大胃口的東

## 不已

西，並不妨礙觀瞻；所以像他們這種有礙觀瞻的消納殘羹剩飯的人，在上海是不必要，最好是封鎖或撲滅的。

鄉下人完全不懂得上海，上海這地方是觀瞻第一。要飯的沿街要飯，要趕他走；妓女沿途拉客，要趕她走；鬧旗新舊不一，要取締；棚屋參差不齊，要取締；攤販橫七豎八，要取締；……這不比破落的鄉下，是「友邦」人士轄區的地方呀！

爲了「友邦」人士的觀瞻，上海忙了多事，花了多少錢了！新近九龍事件發生後，學生界寫了許多標語，紙貼的，柏油寫的。市政府爲了洗刷這個，報上說要用去幾個億。而「友邦」人士卻好像存心和政府爲難，在市府來不及洗刷之前，把那些標語攝在鏡頭裏了。好個「友邦」！

你我們的民房拆了，把我們的民衆殺了，還要叫我們的政府害怕你們的怪，趕忙來把標語洗刷！這不是舊劇重演麼？民國二十年的年底，日人佔了東北，學生們苦

苦地進京請願，全體被破壞，政府的文告是：「社會秩序，悉被破壞，……友邦人士莫不驚詫。」今日我們卻又重見與這類似的文句，更欣逢有這樣的「友邦」！

訂了無數的密約，喝了無數的雞尾酒而結下的「友邦」，是不能給一批青年學生和「無知」民衆傷了「友情」的。所以廣

九的暴動鎮壓住了，學生的行動當然也要鎮住；爲此之故，當局加重了一種新的學潮，果得吳市長都挨打了。學校自有負責人員，還要市長這等地辛苦，辛勞之外還要受辱，這話怎麼說呢？誠然，我們除了說「不幸」之外，無話可講了。爲此之故，事件發生了多日，報紙上所見到的，都是傷了人，抽了人，斃了人，完全鴉雀無聲。市長是五百萬人的市長；大學是四萬五千人的大學，和我們是密切相關的。國家毫無法紀，居下位者可以毆辱長官，當然要不得；但一個四萬五千人的國家，僅僅幾所較優的國立大學而毀去其一，或毀去其一部分將近成器的學生，也是國家莫大的損失。衰頹諸公聚集海上，而遭事未見有個結局。衰頹諸公聚集海上，而遭事未見有個結局。衰頹諸公聚集海上，而遭事未見有個結局。

是知道過去有幾種處理學潮的方法：民國以來多半是硬幹的；君主專制時代比較緩和。譬如北宋將亡的時候，太學生陳東等領導民衆，包圍宮闈，要求主戰的李綱和種師道復職。在情緒激昂之下，打了宰相的官，結果還是把朝政弄得一塌糊塗。這種復了官位，南宋高宗時候，也是太學生等隨處放翁有這樣的詩給他：

人如袁詡方當慮，士氣崢嶸未可非。萬事不如公論久，諸賢莫與衆心違。……

現在一般的士氣，可以說談不上「崢嶸」；消沉的學子，總不會是學潮的中心人物；些學潮的中心人物，每每是比較「崢嶸」的。然則當局諸公願念士氣的前途，將更爲腦筋

今日國事紛亂如麻，我們真不知查些什麼；深夜對着結了冰的寒窗，聽着淒厲的市聲；有的汽車的鳴笛，它們正開向淫樂的地獄；有的是凍死者的呻吟，他們正走向地獄；有的是凍死者的呻吟，他們正走向地獄；有的是凍死者的呻吟，他們正走向地獄。

# 煉獄

鳳子

西北利亞的寒流成了反氣旋，多日來上海的氣溫已在零度以下。住在高樓大廈中的人們都喊着冷，街頭凍斃的屍骨曾經一宿百具。除非是失去人性的人，才會說今年的冬天真太短了，雪都沒有蓋白屋瓦，霜一樣的見太陽就化了。真的，我自己的記憶裏，冬天可以在院子裏曬雪人，年年手腳都給凍的紅腫生瘡。我似乎也不禁懷念那大雪紛飛北風凜冽的日子。記憶往往是那樣的美好，可是忘掉了現實的殘酷而沉醉於向記憶中討一分溫馨的回味，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否也是失去了人性的人。

借住的地方沒有院子，我不便養狗，到一場大雪。向北的屋子終日無陽光，整日把自己武裝起來，盡可能的着上可以溫暖身體的衣物。於是斗室變成了操場，很難得坐下來讀或是寫，雖是冬天，彷彿日子真長，於是那一點悠閑的情趣蟲一樣的爬進腦子，咬我，啞我，像一個大怪物要吞食我。我安靜不下來！我應該奴役我自己，桌上堆滿了文件稿紙，可是一切工作都封凍了，我沒法回答一些作者讀者們的來信。爲什麼一切工作都凍結了呢？無處找理由作借口，可是我忍心讓一些熱心的朋友們失望麼？是的，這是冬天，嚴寒總要過去的。我却廢物的一樣把自己關着，聽着窗外風聲，聽着窗櫺振動聲，我慚愧不如飛到枯枝上的小鳥，它還能在風雪裏揮扎着鳴叫，而我，竟默默地任自己故作悠閑狀，因爲我到底還有一向棲身的屋子，到底還沒有露宿到街頭，怨恨着物價，到底沒有餓一頓飯。儘管待做的工作有重重困難，到底我還在等待着可能的希望。可怕的等待！希望總有一天到來，我怕等待到最後，連舉步都要感到艱難。給我做伴，同時也代我分勞的小孩子佩芬突然感冒病倒了，她發着高熱躺下，

起不了床。於是我可以忙起來，總管生火、燒水、煮飯，以至看護病人等事。精神馬上振作許多，忙了一天的結果，我似乎才明白她每天工作是多麼繁重，病了也還不肯安心靜養，尤其是我服侍她吃藥飲水，她十分不安心。她還是個孩子，窮人家的孩子，沒有機會唸完小學，父親死了，索興來上海找工作，這樣一個孩子就要自食其力來養活自己。她非常天真，整天掛上一臉的笑。可是，在她高熱發紅的眼睛裏，我第一次發現我在她眼光中的地位，我突然發現我和她之間竟隔上一層人爲的

## 紙漿與砲灰

傅理門

潘光旦先生日前在報上喊出「救救圖書」的口號。——所謂圖書，就是指木版書來說，因爲書價貴，看書的人買不起，書舖又不能不開支，只好論斤論兩賣給造紙廠去改紙漿了；北平琉璃廠一家書店，就論斤賣去了裝滿七間房子的舊書。潘先生認爲「舊書的價值固然參差不齊，目前不分皂白的毀滅總是一件可以扼腕的事。」

實給造紙廠的舊書，大約未必有什麼宋板明板吧，「海內孤本」是更不必說了，但是在已經幾乎沒有人刻印木板書的現在，毀滅了一本無疑就是失去了一本了。爲了保存文化，這些舊書當然是不容許輕易毀滅的。「救救圖書」實在已經到了燃眉的時候，希望不要成爲一個空的口號才好。

舊書固然在遭劫，新書又如何呢？每次到書店閱看，可讀的新書真是少得可憐；正經的雜誌本來寥寥無幾，大家也似乎支撐到筋疲力盡的地步了。成本高，讀者又窮，誰願意印了書白來賠本呢？再者

舊書。是誰做成的這人爲的藩籬，是誰？科學的分工制度應該是無可批評的，可是她整日勤勞且不過服役於一個半活在悠閑情趣中的白日夢患者。我曾對她說過不少的故事，我相信我是姊妹一般的親切態度。而現實教育並不能動搖人爲的藩籬。這是我的失敗，好的制度沒有好的執行者，我慚愧讓她分勞了我應該自己操作的日常生活上的瑣事。「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書中曹西瑪長老的故事是那樣深的感動人。曹西瑪打了勤務一嘴巴以後而發現了做爲一個人的人生真理，固然無須乎每個人都效法曹西瑪長老大大大悟，說教終生，可惜的是自認爲激悟真理的人似乎很多，而能夠獲得啓示、苦行僧一般

，現在好像什麼都難於選料；以前聽一個朋友說，某地有一個帶槍的人去「訪問」書店，看到書架上兩部「戰爭與和平」就毫不客氣的取去了，說一定是「反對亂亂」的書，否則怎麼會用什麼「和平」做書名呢？托爾斯泰真是一個「先知」，原來在一八六九年已經毫不客氣在談論我們現在的戰禍了。這位熱心的先生的「創作」雖然也可以編入「新笑林」，聊供國民諸公在愁眉苦臉的生活中開顏一笑，然而書店老闆對於以後印書也就不免因此大費躊躇了吧。——新書和舊書都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絕路，要「絕處逢生」也實在難，大約一要戰火熄滅，二要民生改善。這些是現在立刻可以辦得到的嗎？當然不。

那末，「救救圖書」大約也終於成爲書獸子的夢想了，——我說「夢想」，並沒有譏笑潘先生的意思，聽了潘先生爲文化浩劫而呼救的聲音，我是爲之感動的。然而，在千千萬萬人連自己的生命都不能由自己作主留下來今日，又

去超度世人的却那樣的罕有。「荒淫無恥，嚴肅工作」說來近乎是濫調了。這本來是生活態度的兩個極端，放眼這社會，無處不可以見荒淫無恥，自然有更多的人是在嚴肅地工作。可是不可抹殺的是一些游離份子，可能更嚴肅地工作，却有不少的理由爲自己的怠惰來辯護；罵着他人荒淫，可是自己未曾不會在一秒頃間轉一個九十度的大灣，一脚沉淪進深淵裏去，苦悶，符復，無力掙扎，無聲的呼喊。沉淪，沉淪，一個不甘沉淪的人，在這嚴寒的反氣流之下，能否趕上前人的路去迎接滿載希望的春光，全看自己苦行的程度了。

怎麼有餘力去保全幾層木板書呢？在千千萬萬人連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全的今日，我們留下了幾層木板書又有什麼用呢？木板書雖然有價值，可是人的生命不是也只有這末一回嗎？毫無疑問，是比木板書更可貴了。

炮火連天，戰鼓咚咚，武將上陣，文官吶喊，大家正在忙得不亦樂乎，老爺們當然沒有閒心去想到那些勞什子木刻書；民命已經不會比得上蠟命，即使都是「孤本」，也只好任由牠去做紙漿了。——舊書變成紙漿，雖然叫人着急；但是多少生命正在化作砲灰呢？兩相比較，這些小事也就「不足道也」。

現在誰都不肯「假武修文」，蠶民又沒有「回天之力」，如有十萬所「碩宋樓」付之一炬，也只好聽憑「尊意」。況且從大處想：以無用的舊書造成白紙，倘得印成「殺呀，殺呀」的雄壯的戰歌，彷彿也是一種「廢物利用」，現在什麼都在「動員」，舊書倘能變成宣傳品，也是牠的「時代的使命」吧。——那末，「書獸子」如潘先生者反來爲之歎息，恐怕終不免爲有遠見大識的文武百官所竊笑了。

# 北美重遊 (四)

陳達

## 芝加哥大學 (三六、五、一九)

芝加哥大學，位於芝加哥市的南方，距市中心約八哩。大學有美麗的校園，夾於華盛頓公園及傑克遜公園之間，房舍衆多，有八十五所大樓。大學的前身亦是一個教育機關，那是一八五七年成立的，但於一八八六年因經費困難而停歇。一八八九年爲創立大學起見，洛克弗樓氏捐贈美金六十萬元，此外地方上湊集他種捐款四十萬元，次年洛氏又捐一百萬元。一八九二年大學正式成立，以 W. R. Harper 爲校長。

此大學有值得注意者數事：(1) 在大規模的大學中，從早就收納女學生。(2) 自一八九二年以來，即創立大學出版部以發行學術著作及科學著作爲主旨。(3) 將一學年分成四季，因此一般的學生及大學生，在學期內可修習大學的課程。(4) 將大學本科分成二部，以一二三年級爲一部，稱爲幼年學院 (Junior College) 開美國六千幼年學院運動的先聲。

大學分以下各部：(1) 學院 (College) 這是爲未畢業的學生而設的。(2) 學部 (Divisions) 即生物學部，人文學部，物理學部，及社會科學部。(3) 職業專科學校 (Professional Schools) 即商科，神科，法律科，圖書館科，醫科，社會服務科。(4) 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包括函授系 (u) 圖書館，博物館，試驗室，醫院等。(6) 大學出版部。

我所最感興趣者是社會科學部的社會學系。以組織言，此系分七組，學生可任選一組，作專門研究，組名如下：(A) 理論社會學 (B) 社會研究法 (C) 社會心理 (D) 人口學與境位學 (E) 社會組織 (F) 社會變遷與社會解組 (G) 犯罪學或人種關係，或工業勞工問題。

美國社會學雜誌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已出至第五十三卷，係由系負責編輯的。登載關於研究的社會學論文，我記得前在哥倫比亞大學肄業時，曾聽人說，主任教授吉庭，史氏早年曾擬發起社會學雜誌，計劃未成熟，由芝加哥大學司穆爾教授搶先組織並發行此刊物。美國社會學雜誌，爲美國社會學界歷史最久的學術

性定期刊物。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叢書 (Sociological Series)，由大學出版部出版，其編輯委員三人，係社會學系的教授，此項叢書現已出至第三十一卷。社會學系的學生，最近約有二百人，他們之中大多數是希望得碩士學位者，其餘是博士候選人。學生的組織有好幾種，其一注重研究，即社會研究會 (Society for Social Research)，對於社會學深感興趣，並已從事於研究者可以入會，每兩星期開會一次，大概在星期一晚間，主要的討論是關於自己或他人的研究工作。每年暑期有年會，邀請社會學界前輩及研究者有成績者參加討論，同時這個年會是使系中的畢業生得以重返母校的一個好機會。

其餘一種學生團體是含有社會性的，即社會學俱樂部 (The Sociology Club) 每年秋季始業時，舉行歡迎新生的茶會，屆時系中名教授俱有演講，以後每季集會兩次，以資系中師生的聯歡。俱樂部亦派代表參加其他學部的學生會，以廣交際，春夏之交，野餐會是時常舉行的。

## 戰後中國社會問題 (三六、五、二六)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約我作公開的系統演講，名曰「戰後中國社會問題」，第一講於五月二十六日舉行，題爲「中國人口研究的需要」，將在倫敦劍橋大學的「人口研究雜誌」(Population Studies) 一九四八年三月號中發表。演講地點，在社會科學大樓，系主任步濟教授 (Prof. E. W. Burgess) 主席，講畢後發問者頗多，有人問曰：

「據報告，戰時江蘇省的人口增加爲每年百分之點九，確否？」余謂該省自戰爭開始，即屢遭兵災，有若干部份入於敵人之手爲淪陷區，此種報告似增加太速，另有人問曰：「中國是否應採用生育節制？」余答曰：「然，當一九二六年山額夫人經過遠東出席於倫敦第五次國際生育節制會議時，余適在華盛頓，曾作介紹信傳在中國宣傳，此次世界大戰前數年，友人與余曾在北平組織中國第一個生育指導所，維持七年之久，至中日戰爭開始，日人佔北平時爲止。聽講者有 Dr. Philip H. user 及其夫人。五月十七及十八兩日，美國人口學會在普林斯登開會，余本被

約赴會演講，惜因芝加哥的系統演講，不能改期，余因預備演講稿，不得口而辭謝，步濟時教授約余在方場俱樂部 (The Quadrangle Club) 晚餐，方場者指該大學初建時在此方場附近，目前大學教職員，在此聚餐者甚多，可以會友及參加各種遊戲，中午聚餐者尤衆，同席者有教授的胞妹，年長而未嫁，教授自己亦年老而未娶。此外尚有 Hauser 夫婦及社會心理教授 Herbert Goldhamer，晚飯後余往訪 H. F. MacNair 教授，多年以前他曾任上海約翰大學任史學教員。民國十二年印行一書曰「海外的中國人」(The Chinese Abroad) 和我的博士論文「中國海外移民與勞工情形」(Chinese Migr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 題目大意相同。工作進行時，彼此並不知，二書於同年發行，但主要內容並不雷同，彼注重於歷史及政治的敘述，余則偏重於經濟及社會的討論，果然，二書所選擇的國家亦不盡同，彼云前在商務共出四書，戰爭中未接任何報告亦未寄來版稅，余謂截至抗戰初期，余曾有二書，由商務出版，在抗戰期中未得版稅，其主因在通貨膨脹，國幣貶值，以致版稅不值錢，余亦從未追問。彼曾擬於去年再遊中國，因時局不靖作罷，夫人 Florence Ascouth 工詩，與 Amy Lowell 友善，去年亡故，余曾讀其所著「The Chinese Women: Yesterday and To-day」，覺其文學意味甚濃。

次日晨步濟時教授約余參加倪因心兄的博士論文討論會，在座者尚有 Hauser 及 Goldhamer，步濟時教授云不久以前，系中畢業生 A. J. Jaffe 對此曾提出一些意見，認爲應加入我國現有的其他人普查資料，並作批評，余謂此點余二人在華盛頓時業已談到，余亦表示贊同，Hauser 對於職業分類提出疑問，Goldhamer 認爲昆明市加能再分作較小的區域，作比較分析時或較有明顯的意義。步濟時教授約余參加系會，即在方場俱樂部舉行到者有 Louis Wirth, W. F. Whyte, Josephine Williams, Philip Hauser, Paul Wallin, 末一人爲本系畢業生，現在司丹福大學任社會學教授。此次返校爲與步濟時教授合著「家庭」一書，某學生提出博士論文的題目，



Hauser 認為範圍太廣，經討論後囑學。縮小題目的範圍。主席報告夏期將有訪問教授兩人來系授課，有人夏季離校者請暫時讓出房間，Whyte 表示願讓書房。潘如澍來信，請求免除第二外國語，因中文事實已是第二外國語，經衆贊成，主席問我關於潘的中文及中語，余謂國文程度頗高，但說話時有時欠清晰。不過我們聽慣了亦未感覺其何困難。

### 胡南與胡北 (三六、五、二七)

前長沙雅禮大學教員雷文思(Dickson H. Leavens)，現任 *Econometrics* 雜誌的經理編輯 (Managing Editor)，他說他曾在長沙住過十五年(即自一九一五至一九三〇)，老友金岳霖龍孫兄曾在其班上讀書，民國十四年洛氏基金會曾贈大宗款項作為我國社會研究之用。是年曾指派委員會，在中國各主要市鎮旅行，以考察此項工作的需要，美籍委員 Royal Meeker 曾任勞工統計局局長，住於 Hume 氏家中，Hyume 現已退休，住於紐約市，著有 *Doctors of the West and Doctors of the East*，說明西方的醫師，按其科學的知識，必須熟悉東方的民風，才能傳播其技術。余謂當民國四年肄業清華時，曾參加全校中文演說競賽，忝列第一，裁判員之一即為 Hume 氏，此人極幽默，操流利的華語，我們加以外號曰胡南，因其住於湖南，以別於胡北，Hutton 因其服務於協和醫院，住居北方，所謂胡者即二人之中文姓也。

雷文思為耶魯畢業生，余順便說出該大學亨丁登(Elsworth Huntington) 教授的故事，在氣候與文化一課，於課程將完時，比較日本與中國的文化，亨丁登氏認為我國的氣候，有些區域寒冷與酷熱俱趨於極端，在極冷與極熱地方的居民俱不能充分運用腦力，日本則不然，冷與熱俱非如此極端的，且海島利於交通，思想的潮流易於輸入，因此日本的近代化較中國為早，成績亦較中國為優，以氣候的立場，日本的現代文化將永遠較勝於中國，演講完畢，有一中國學生致書於亨丁登，認為侮辱中國，並以爲這種說法，只可於私人談話中發表，不應向大眾出中國之醜，亨丁登召集此生，皆以曾經到過中國，頗與中國人有好感，決無輕視之意，講詞實係其理論的一端。經此解釋，彼二人繼續爲良友。次年亨丁登仍開此課，並同樣的比較中日的現代化。但亨丁登氏於末尾加添幾句：曰「不過中華民族是永遠與自然環境奮鬥的民族，不肯向惡劣

的環境低頭的，一般人俱是動盪耐勞，勇往直前的，你們曾見過一個懶惰的中國人嗎？」說畢開堂大笑，亨丁登以爲又出岔子了，就向一個美國學生發問。學生曰：「先生曾見坐於第一排的一個中國學生乎？此人性情和善，我們最樂與爲友，他又被舉入兄弟會爲會員。但此人不喜讀書，是全班最懶惰的人」。

雷文思今年六十歲，準備告假一年暫作休息，擬往 Colorado Springs，因彼處有山可以爬高，該處靠近 Colorado Springs College，此校有學生七〇〇人，其教授之一爲 C.B. Malone，多年以前，曾在清華教授歷史學。

### 戰後中國工界的主要問題 (三六、五、二八)

我在芝加哥第二次公開演講，是討論戰後我國工界的主要問題 (Basic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es)，這篇演講詞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號的「美國社會學雜誌」發表，由社會學系主任——步濟時教授爲主席。有人問曰：「中國的勞工們，是否可以得着教育的機會？」余謂他們盼望有入學的機會，但目前尚無充分達到目標的可能，又有人問曰：「勞工階級所以沒有上昇的機會，是否因爲人口過多？」余曰：「人口太多，實是一種障礙」。

Prof. A. P. Scott 於講畢後告余曰：「將往燕京任教半年」。余曰：「善。余二人將爲近隣。」教授約余至其宅，以便提出若干問題，出其所藏各國郵票，作爲課餘消遣工具，余曰：「有同好焉」。我國抗戰期間，余住於雲南昆明鄉間呈貢縣文廟，前進大殿爲國情普查研究所辦公之用。後進崇聖祠爲余住宅。夜間點菜油燈，光小如豆，不能看書，往往貼舊郵票，以消磨度日如年的光陰，但余所集者僅中國郵票耳。

### 我國社會政策的基礎 (三六、五、二九)

五月二十九日，余在芝加哥舉行第三次公開演講，討論我國社會政策的基礎 (The Foundations of a Sound Social Policy for China)，此文後由「社會力雜誌」發表。(Journal of Social Force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Dec. 1 47)，社會學系主任步濟時教授爲主席，有人問曰：「假如中國軍費縮減，是否政府的他項支出(包括社會行政)可以敷用？」余謂：「軍事費用如能降低，自然可以增加各種建設的支出；但政府

的總支出是否足夠，一時難以確答」，有人問曰：「農民政策與勞工政策比較何者更爲迫切？」余謂：「二者的迫切性相等，但農民人數較多，因此對於國家的關係當然較大較深」。

### 博物院參觀與公園泛舟 (三六、五、三十)

倪因心夫人(高君蕪女士)伴余參觀科學與工業博物院，內有關於物理力學生物生理等重要發明的解釋與圖表。此外模型甚多，例如飛機，輪船，電話等，火車的模型極其小巧玲瓏，有好幾輛火車同時環繞的開行，最易惹起觀衆的注意，君蕪與余入一煤礦模型。下井後坐小型火車，車身四周用鐵網，客人的坐位分兩排，戰前數年余曾入河北省唐山煤礦的礦井，記得地下車行於單軌鐵道上，車身甚小，車形似煤兜，其設備遠不如今日所見。我所最注意的是安全燈的試驗，試驗進行時，假定礦內過着毒氣，安全燈玻璃破裂，公然作響，從前余在勞工問題班上，有時提到無知識的礦工，在井內開安全燈，以便取火吸煙，遇毒氣時爆炸。今見此試驗，似乎得着證明，心甚愉快。關於貿易的制度，分時代陳列，包括漁獵時代，物物交換時代，及近代大規模的市場等，關於家庭生活亦分時代陳列，但注重於美國的情形，如美國建國初年，十八世紀中葉，二十世紀初葉，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至現在等，每一時代陳列極簡明而扼要的傢俱服裝或日用品等。君蕪與余泛舟於傑克遜公園之湖，我划船君蕪照相，潘如澍，劉緒貽後至。湖內水鳥甚多，最普通者爲水葫蘆及綠頭野鴨。大鳥用鉛絲網籠罩，遠望之似與天鵝同類，惟毛現灰色。湖內有日本景緻的一部即鳥房，僻靜處有釣魚俱樂部，小屋數椽，準備遊人憩息，近岸處有若干寬長木板，其旁即可下釣。

## 本刊春節休假一周

本刊下期(第二卷第十九期)本應該在二月十三日出版的，恰巧遇着春節，本市所有印刷廠都將休假一週，不肯承印，所以本刊也就只得停刊一週，該期延至二月二十日出版，敬請讀者鑒諒。

# 歲末天寒的東北與華北

何經

傳作義勇下的三十五軍是他最基本的隊伍，他自己以前就是三十五軍軍長，這一次却落得師長戰死、軍長自殺的下場，傳自己當然傷心得很，為此哭了一次。戰爭的詳情，外人無從得知，根據北平報界的傳說，則是為了魯英慶軍長決定以急行軍援救被困的守軍，五十輛十輪大卡車中伏，回來時只有二十幾個人。魯自己覺到無面目對上司，才自盡的。魯是傅的老友，據說正直忠實，當然傳也極為傷心，北平在籌備追悼大會。在大會上也許我們會聽到一些議論吧，這且不說。

北平一度傳說胡宗南北來，而將傅作義調往東北的消息，不久就證實不確了。但范漢傑的軍隊，據報載，確已從青島調來，正在山海關內外防守。同時，「五十而知天命」的陳誠下面添了一個副將衛立煌，現已走馬上任。

瀋陽局面的嚴重，由於新聞檢查，我們不能知道詳情。日前有一個新聞記者從瀋陽來，說到今日之瀋陽，他說今年瀋陽奇寒，糧煤奇缺，他住在一個旅館中，暖氣只有一點溫度，每天躲在被窩中聽着一個電話打聽消

息，下午才跑出去一趟。南方的兵士從來就不習慣這般寒冷的氣候，凍得跳腳，呵氣呵在鬍子上，鬍子也結了冰。這位記者一到北平，看見居然有煤，室中溫暖如春，覺到這裏簡直是天堂了。他在瀋陽自己存了一點米麵和炭，預備了一個小爐子，以防萬一。

又據他說，瀋陽被圍的時候，物價一日數漲。那一天早晨他去買豬肉，四千元流通券（每元流通券合法幣十一元五角）一斤，拿到家中又想再買一斤，去問時已七千一斤了。老百姓家裏都生不起火，有的躲在被裏，有的在地上跳着跑着取暖。各機關也都無煤火，公務員凍得寫不了字，就是要寫些東西，墨水全凍住了，一律實行鉛筆辦公制。各機關首長無公可辦，唯一的大事是到飛機場迎接送大人。東北行轅裏，只有陳誠的辦公室生了一個爐子，烟囪在孤零零地冒着煙。

據最近見到陳誠的新聞記者說，陳因為生病，面色已大不如前了，削瘦得很。請醫的電報直到最近才有結果。陳因為自己抱病，懇請易地休養，這次衛立煌到東北，可以代陳負一點責任了

吧。與隆屯之役，與凍水之役不同，因為不能急行軍，援軍未能及時趕到，等到新六軍安然到達，却已太晚一點了。

為了瀋陽食糧缺乏，東北行轅曾經撥款到共區買糧。前時時天津益世報載瀋陽大批青年北流，如抗戰初期青年往陝北的情形一樣，據說當局也不大管，因為這邊減少些人吃飯，也不無好處。目前的工礦除撫順煤礦仍在苦撐外，其餘都在撤退中。以前東北向關內匯款本有限制，現在因為東北的國家銀行發流通券有出無入，所以也開放匯款了，天津市上又添了大批游資。

提到關內，為了任命楚溪春為河北省主席之後省府人事問題，各方爭持甚久，更高的方面不希望非嫡系的人担負重任。楚溪春不來，政務就停頓迄今。而華北的局面也是愈趨愈緊，戰事愈緊，工商業愈動搖。倉庫已查過，除了少數人之外，一般商人不敢存貨；除了少數人，一般人不肯賣黃金。集中在股票市場的游資，却遇到股票停滯不漲的局面，乾賠利息。北方請願團到南方去了一趟，回來還是說要「自力更生」，「更生」的結果

，啓新洋灰因戰爭而失掉銷場，開灤煤也存了七八十萬噸，運不出去，於是洋灰與煤價錢日跌，工業就日益動搖。河北省參議會議長劉瑤章回來之後，向新聞界報告南行經過，特別提到地方和中央應更趨諒解的問題。他說他列席中政會，曾就華北情形，提出四點希望：一、軍事希望統一指揮，爭取主動，提高士氣；二、政治方面，地方中央間組織力求嚴密，積極組織自衛隊，訓練幹部；三、經濟方面，增加生產，並應依照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貫徹土地政策，使人民負擔合理化；四、軍事、政治、經濟三方面有共同性者，應分工合作，賞罰嚴明，法令要有彈性，使地方行政因地因時而有伸縮餘地。從這些「希望」中，我們也可以想見北方工商業者不滿之所在了。

據說：劉瑤章在同一次報告中，還提到請中央速派大軍北援的要求。此間報載：新立屯失守之後，共軍又要發動波瀾形疲勞攻勢云云。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寒冷的冬天和初春將是東北的危險時期，至於情形會如何發展，也許只有事實能告訴我們了。

瀋陽的富人們大疊來平津。我們聽到了許多關於飛機票的故事，據說時價已是四千多萬法幣了。這真是道時代的怪現象吧，富人南飛和青年北流是怎樣一個強烈的對照啊！天津益世報記者曾到塘沽附近去看該處戰後的景象，他描寫富人們怎樣率領着逃難的隊伍，說：「在戰事發生之翌日（九日），塘沽離難時可能聽到清晰的槍炮聲，但一些商民們，不論老幼，都是那樣的鎮靜。至午後即有由東西大沽逃出的大批難民，而未有見到有一個人去加以開問和收容，任憑他們逃亡，流浪，男哭女啼。同時隨警隊往返的輸送彈藥和食糧，都是由勇士們親自下手，「軍民合作」就是如此嗎？我們始終不明白這些廣大的民衆力量，應該由誰來領導？一些負責的老爺們平日幹的，本來是已經麻木了！不過把這麻木沈靜的心刺激搖盪的因素，並不是隆隆的槍炮聲音，也不是八路匪軍，更不是那些哀哀無依的難民，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那些為民表率的老爺們，太太，小姐，少爺們的逃難。在這砲火連天，老百姓總是安靜的，可是他們親眼看到那些由東方開來的一輛輛的大小不同的汽車，上面滿載着皮箱，柳條包，行李，和捲毛紅唇的摩登太太，小姐，老爺，少爺們，都一齊向着新河車站和天津的方面去，於是他們的心開始動搖了，不安了，便也盲目的隨着坐汽車的闊人們去的方面逃去。每天去津擁擠不堪潮水般的人們，便是這樣才逃去天津的。因為他們的心理是這樣的：消息靈通莫過於機關的老爺，而老爺的靈通便直接的傳達給了太太，於是都逃了，我們逃，一定是情況不大好，我們這方釘不住匪軍八路……於是他們這些可憐的老百姓以及那些坐汽車的老爺，太太，捲毛紅唇小姐們都一同的踏上逃難的悲途。」

這對於士氣會有怎樣的影響呢？這位記者在另一段裏寫到兵士的悲憤：

「筆者曾向一位持槍昂立的騎警同志打聽前方的消息，不想這時適有兩輛滿載着捲毛太太，小姐，老爺，奶奶，皮箱，行李等等東西的大卡車，從我們的身旁風馳電掣般的駛過去，並且還載了我一身的泥點。這位同志憤憤的目的視着那兩輛大汽車，發出這樣的憤語：「媽的！這些個東西，平常專會吃私舞弊，大吃大喝，到了這時候屁滾尿流，來擾亂軍心，吓嚇百姓……逃吧！」

人們總以為兵士所憤得的很少，其實現實如此明顯，他們所知道的並不少啊！華北盡力打兩年，華南就可氣這因素計算在內呢？

# 同濟——準備赴京請願之前

蔣修苗

〔編者按：一月廿九日，上海同濟大學學生一千餘人準備赴京請願，為警隊所阻，終于發生毆打拘捕之事，其事經過，上海報紙各有各的記載。本刊茲接獲三篇通訊，均係記述此次學潮之原委與經過者，內容大致相同，可知都是忠於事實的報導。就中選出遺稿發表，因其行文冷靜而敘事又最有條理的緣故。〕

同濟大學本屆「學生自治會」的組織是這樣的：「代表大會」由各班產生的代表組成，是決策的機構；「理事會」由普選選出，執行「代表大會」的決議；「常設委員會」即「代表大會」的主席團，在「代表大會」休會期間，它的任務是監督「理事會」。

抵觸憲法，應該無效，並且說校方無權過問「自治會」的改選。他們指出交大與武大都已完成改選，同濟不能例外！

八日，校方宣布了三項措施：一，部訂規則中無「代表大會」的規定，因此不許「代表大會」召開；二，自治會的理監事應由訓導處指定的候選人中選出；三，各院單獨成立自治會，全校的自治會不許成立。同時校方指定各級級長與舊理事會改選「自治會」的籌備人。

今年元旦後三天，各班代表陸續選出，舊「理事會」遂定十一日召開「代表大會」。不料校方突命令舊理事會暫時留任，不准自治會改選，同時公佈了教部頒布的「學生自治會組織修正規則」，叫學生切實遵守。舊理事一再向校方請求准許改選，都沒有結果。於是，各院的民主牆上，出現了學生的標語和文告。他們一致強調「學生自治會組織修正規則」

下運行的，出席代表一致通過十三日完成改選。果然，在十三日午後一點到四點三十分鐘內，改選工作便順利地完成了。就在那晚「寒衣勸募委員會」主辦的「慶功大會」上，新理事的姓名宣布了，全場歡呼「勝利屬於民主！」

這三天，校方沉默着，許多人以為此事至此告一段落。但是出人意料以外，舊「理事會」的代理理事長（理事長已于去年五月學運中被開除）杜受百和法學院選舉事務所負責人何長城（又係寒衣勸募委員會的幹事）竟在十四日被開除了。杜的罪名是「歪曲事實，挑撥離間，破壞秩序」；何的罪名是「藐視師長，毀壞公物」。這樣一來，快要安定了的同濟又動盪了。學生認為：「杜何二同學的被開除是校方打擊同濟民主的卑鄙手段！」因此他們誓與杜何二生共去留，要求校方收回成命。

十五日，「代表大會」在學生的催促下如期召開了。那個會是在數百學生保護

請願，要求校方收回開除杜何二生的成命，並且承認新「自治會」。校方不准，說：「有意見，呈書面來！」代表繼續向學生訓話，亦遭拒絕。學生等得不耐了，一齊擁到「紅樓」大門前，有人甚至要衝進去。

正在緊張的時候，學生在人羣中抓住了一個特殊人物。從他的身上搜出實彈白朗林手鎗一枝，同濟、交大、校章各一枚，同濟總務長名片一張及警局證件二張。他說他是校長打電話叫來的。學生一面把他看守起來（下午他被送到地檢處），一面看守住門牆，以免歹人混入。

不久，三卡車警察把學校包圍了，但未進校。學生也並不慌張。校長終於被請出來了，但當學生問到他為何開除杜何二生時，他又避去了。學生氣極，擁向校長室，要他答覆。

導長却拒絕代表校長保證這兩點的實現，學生代表才知道受騙了。於是，學生轉向訓導長請願。但他堅決不肯以訓導長的身份來保證校方收回成命。一直僵持到午後四點鐘，他才和總務長用私人資格寫了一張「保證書」。學生不滿意，要他說明開除杜何二生的理由。於是他說：「杜受百歪曲事實，挑撥學生與校方的感情，並且企圖破壞學校的秩序，理應開除。」學生要他舉證，他說：「杜受百的一言一行都是證據！」接着他說：「何長城阻止徐院長勸學生的佈告，是藐視師長；他是寒衣勸募委員會的負責人，在十三日的晚上打擾了許多禮堂，應由他負責。」立即有人反駁他：「選舉事務所貼出佈告，是負責而貼的，徐院長憑什麼要撕；再說訓導會議是十三日下午開的，怎樣會知道當天晚上搞壞桌椅的事呢？你講才是歪曲事實！」聽的人都笑了，連在旁的十餘記者和訓導長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談判無結果，「自治會」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決定十六日繼續請願，如仍不得結果，則自十七日起罷課三天。

傍晚，校長同「紅樓」學生再往請願。校長答應不能向全體同學宣布。代表們讓校長走後，訓

學生唱着「明天明天再來請願……」，在文法學院內遊行一周後散了。十六日午後，千餘學生又集中向「紅樓」請願。可是，一直等到九點鐘，連校長訓導長的影兒也看不見，也無人來答覆。他們知道又受騙了。於是，學生自十七日起開始罷課三天。

十八日，校方又開除學生五人，還有一人受停學一年之處分，二人「留校察看」。一人罰寫「悔過書」。校方並警告：「今後如有聚眾要挾情事發生，學校定請治安當局派軍警來校鎮壓。」

十九日，自治會再度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決定絕食一餐，抗議校方的「瘋狂措施」，並宣佈自即日起「無限期罷課」，直至「校方收回無理處分同學的成命，並承認自治會為止」。學生「無限期罷課」後，校方復公佈五項措施：一，解散自治會；二，理事、常務委員、代表等應立即自動辭職；三，今後調見校長須先得訓導處核准，每院代表最多二人，已受處分的學生不得為代表；四，學生立即復課；五，所有被開除學生限三日內辭校。

者十三人，記大過者十七人。

是值得一談的。

情勢至此已相當嚴重了。為了挽回危局，學生會請「同濟青年軍聯誼會」出來調停，並且表示願作最大的讓步；但是校方堅持必須以學生先行復課為談判的基礎，談判只好決裂了。二十七日，學生又請教授調停，校方以同一理由拒絕談判。

現在，學生對校方已無幻想。他們一面再三把事實真相向新聞界、本校教授及其他各校學生「控訴」，爭取同情；一面積極籌備晉京請願。現在，請願的籌備工作已就緒，他們定二十九日出發。

校方的態度一直是強硬的，儘管數次抗立武令採「緩和」手段，始終未見緩和，特別是最近據說得了朱部長「嘉許」，丁校長的態度更加強硬了。校方一面請治安當局幾次發表談話阻止學生晉京，一面四次發表「告同學書」，「勸告」學生復課，並指使少數學生發動「反罷課」，企圖分化學生的團結。徐道鄰院長曾為此事兩次請某些學生「打牙祭」，不幸事機不密，請客事被學生宣佈了，未能收效。徐先生一氣之下，幾乎開除了一個姓張的工人，因為那工人有走漏消息的嫌疑。

事情發展到現在，教授和校方的態度一直都是很消極的。他們為什麼如此呢，

老教授中很多參加過三十年的「倒丁運動」(當時丁文淵即一度充任同濟校長)，頗不便于發言。新來的教授，平時在校長面前就有「人微言輕」的感覺，現在當然無勇氣出來調停。能向校方說幾句話的教授，却都是校長的親信，得不到學生的信仰。

校友會的理事長就是丁文淵，許多校友都嘆息「說話難啊！」，不願出來調解。報載朱家驊將以校友身份出面調停，完全不確，此次朱氏來滬，學生代表連他住在那兒都未能打聽出來。

然而，國內學生對此事的態度却是非積極的。同濟學生剛罷課，「華北學聯」就來函慰問。接着上海學生紛紛獻旗捐款，表示支援。同濟學生絕食時，各校紛紛贈麵包，中華工商學生且曾絕食一日。最近由交大、復旦、華東聯大三校發起的「上海市學生爭民主反對迫害支隊同濟聯合會」已有大專中學五十餘單位參加。這個會正為同濟籌募晉京費用。南京中大、金大、劇專等校對同濟晉京亦頗表歡迎，三校已決定在下週迎接請願大隊。這些學生們一致認為「同濟民主的被摧殘是全國學校民主被摧殘的先聲！」因此他們誓以精神、物質、行動來保衛這個「民主堡壘」！

# 中央大學的當局與學生

杭引

中大同學，自從自治會改選被暴徒搗毀被校方阻礙而擱淺以後，一直處在無政府狀態。原有自治會，早在去年十一月任期已滿，雖然校方越俎代庖，「欽定」延長任期至去年底為止，而今年又過去一個多月，下文如何，成了局外人猜測的題目。時間過得愈久，也就愈加神秘了。

去年十二月，其所以引起同學與學校的對立，就是因為同學堅持要自由改選自治會理事會，而學校當局則要代同學圈定理事人選，猶恐其無「法律」根據，特又搬出一套「學生自治會組織修正規則」，奉為經典。就在這個「要民主」要守「法」的矛盾下，發生爭執，混亂地拖了一個多月，達到最高潮時還曾激起校內遊行的舉動。可見事實本身，確不簡單。再就最後學校當局的片面行動而言，也不是「解決糾紛的辦法。暗礁的確是

同濟因「自治會」改選所引起的事件愈來愈嚴重了，據說蔣主席都「頗表關懷」起來。當局處置此事不知將用什麼方法，讓事實去回答好了。(一月廿八日寄自虹口)。

存在着，有隨時觸及的可能哩。

表面誠然是看不出混亂，彷彿糾紛已經解除，其實此中曲折，却大有文章。早在去年十二月中旬，學校訓導處即在設法籌組學生自治會，叫了不少同學，前往「詢」，「訓」，敦促這些同學出而競選。可是得到的回答，不是「我無興趣」，就是「我不願幹」。如是給學校的計劃，來了一下當頭棒。

硬說訓導處連幾十個理事都製造不了，那也未免說得過份一點，最大的問題，是有沒有很多同學去投票。記得上海方面辦理國大代表選舉時，某大官曾一再向市民呼籲，希望踴躍投票，以免有礙國際觀瞻；然則中大確有四千餘人之多，假如投票人數不能超過四百人，雖不見得

有損國際觀瞻，豈非至少也是選舉史上的奇蹟嗎？訓導處也會通知理事會，囑咐印發文件等移交給它，祇望私相授受，然後由訓導先生「垂簾聽政」，然而終於覺得這也太不像話，因而中途作罷。總之，雖說學校當局一事無成，確也會處心積慮。

就在目前情勢看，學校當局是在「王顧左右而言他」，直是無法再提了。而在同學方面，普遍認為學生運動並非武力革命，多少都願意避免正面衝突。最近逝世的甘地的不合作主義，此地被用上了，曾因此而阻學校當局子窘境，而無法施其技倆。

同時，同學們更有堅強的信心，隨時都在為下一步打算，現在是放寒假了，下期開學後怎樣，恐怕人人都有個準備。

自治會之不存在，對同學的確是一大妨礙，像鬧得轟轟烈烈的九龍事件，中大同學竟沒有機會來表示他們由衷而發出的純國民的意見，任少數人在狂吼；本來是洗澡的時間，却在校方一道「燃煤用整停燒」的諭示下，停爐斷水；宿舍工友在緊縮開支的美名下，減少了一半(原為一百二十個同學共一工友，現變為二百四十個同學才有一工友)；冰解路爛，學校可以置之不顧。真是學校經費困難嗎？只有天知道。很明顯的，這是年來學校一貫的技倆，步步逼害同學，希望每一個同學從新有一個心理建設，逐漸習慣于馴服狀態。然而寒流不能凍結青年的熱血呢？這就很難說了。

## 本刊經理部啟事

本社經理部辦公時間已改為每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下午二至五時，星期例休。本刊以後在上海大公報所登之廣告，由第一版移至「教育與體育」版廣告欄內，每逢星期六刊出，敬希公鑒。

## 時文

刊週

發行人 程博  
編輯者 洪  
經理部 時文週刊編輯部  
上海估嶺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三八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政部備案登記證警字第一八號



# 世界新文

當今政治人物應不怕自動下臺……呂克難  
美貸的獲得

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林滄白

官僚政治對於

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影響……王亞南

緬甸是怎樣「獨立」的？……鄭道傳

# 19

國立北京圖書館  
第一卷

短論 論東北大戰的意義……柳逢仙

論 美援對西歐與中國的畸重畸輕……周至誠

「罪與罰」及其作者……林海

北美重遊(五)……陳達

通 關外與關內·空間與時間……凌華

北平學生

訊 保衛自治權利的示威……林百榮





論東北大戰的意義

柳逢仙

林彪自從採取越城進攻的戰術，到春節前後，其大軍已進逼瀋陽外圍，先後由西、南、北三面進攻，其進攻的戰術，已由西、南、北三面進攻，其進攻的戰術，已由西、南、北三面進攻...

美援對西歐與中國的畸重畸輕 周至誠 正當五億七千萬美元貸款有影子的時期，又從太平洋對岸傳來消息：美政府決定撥款一億五千萬美元，用於西歐的經濟援助...

在前月渡江反讓，伯承向長江邊岸與漢口一帶，其目的在於...

兩極化的世界，美蘇各執一端。不論白宮的用意在於擴張其勢力，或防共也好，維持世界和平也好，其目的在於...

前敵數目，美軍要有一個美軍，美軍要有一個美軍，美軍要有一個美軍...

# 當今政治人物應不怕自動下臺

呂克難

(一)

日本民族是一齣悲劇。有人這樣說。

因爲日本民族是不會失敗的民族，所謂「不會」，並不是說日本人永遠不會失敗，而是指日本人不懂得失敗，特別是經不起失敗。日本軍閥就曾自誇過：皇軍永不投降，寧可戰死，決不作俘虜。這種精神在中國大陸，在硫磺島和沖繩島，着實贏得英雄崇拜者的尊敬。而這也正是日本民族悲劇性的表現。我想，假如美國人不看穿此層，決不致把不能再殘酷的原子彈擲在三島的，而日本人的執拗必經此空前浩劫才稍稍清醒過來。這是何等重大的代價！有人說：造成近代日本人民的悲劇，是日本的民族性使然，這種民族性是受了日本特殊的地理影響；淺狹的溪流，富士山的皚雪，終年的活火山，不可測知的大地震，盛開即萎的櫻花，無形中焙煎所致。已故軍事家蔣百里先生在其傑出的「日本人」一文中，彷彿也作如是觀。其實一種民族性的形成，與其謂爲特殊的地理環境，無寧謂爲特殊的歷史文化。和近代的民族主義本質上係爲一種歷史情緒一樣，民族性乃是歷史文化累積的結果。法國學者芮農(M. Renan)即曾主張：使一羣人民成爲一個民族者，不是由於共同的語言和血統，而是由於他們對其祖先的榮譽感衰甘苦相共的際遇，有一種共同的追念之情。愈是近代的學者，愈說民族是一個在文化上有同體性的社會集團，把民族當作一個在文化上和精神上和諧一致的集體。如果硬將民族性的淵源歸於地理環境的特殊，那麼民族性的改造勢必爲徒勞之舉。因爲地理狀況的變遷顯得太慢，而且直非人力所能驟改，果如此，麥帥大可免得操心。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太平洋戰爭初起時，我們常聽聞大批盟軍宣告投降，英軍在香港、新加坡的表現，國人莫不深以爲憾，嘆息大不列顛帝國的淪落。殊不知這實在是一個評價觀念的不同，歐洲人擊球嚴講規則，彼此破裂出之以公開的決鬥；在拳擊的場合，對手的體重均要過磅，必須體重一致（至少是相差有限），這才以裁判者的命令交鋒，而當拳擊之一方被擊倒地尚未掙扎再起時，決不乘人之危下一撤手。萬勿以爲此乃區區小節，無關宏旨。這裏實意味着西方文化自古騎士精神所遺留下來的公道精神(Fair Play)。換言之，即競爭必須出之以公正平等的手段，使交手雙方立於同等利弊的機會。由此角度觀之，香港新加坡的英軍所以投降，是因爲明知非十倍於己之敵的對手，苦戰無益。反之在敦克爾刻一役，英軍雖然敗退，但未聞有豎白旗者，何故？因其預料有路可退，一地之得失並不重要。再從歷史上看，英國人亦曾有過死戰不屈直至最後一人的光榮。一〇六六年因了守教者愛德華未生子嗣所引起的王位問題，招致威廉與哈羅德的

爭鬥，威廉由今之諾曼第人侵入三島，兩軍相逢於海斯頂斯之山峯上，血戰至夜，結果威廉勝利，哈羅德及其禁衛軍全體效忠戰死，無一降者，更無一生者。一千年來，英國的社會在變，歷史在進步，評價的觀念亦與日而異。和十一世紀相比，今天的英國人當然無此優勁了。

我的意思是說明民族性是可變的。日本人在戰後的表現，說明若干觀察家的批評並不正確。雖然今天似有不少隱匿的法西斯主義者竭力諱言失敗，但失敗總是今日日本人民面臨的最大苦惱。民族性可變，在日本已有了端倪，縱然變得很緩。這點不確立，寫此篇文章不但多餘，而且徒然加增國人的悲觀主義（這是魏德邁將軍認爲最要不得的）。

(二)

上面云云，似乎類若閒話。其實，我把日本民族的悲劇性當作本文的帽子，說來並不偶然，更不是沒有理由的。日本人的悲劇是整個日本人造成的，自作自受，罪有應得。其悲哀也，始於日本人，及於日本人。唯有我們中國，言之痛心，作祟於少數人，貽禍却及於多數人。率直的講，中國政治人物的那份悲哀，也正是中國人民的悲哀；二千年來，中國的政治人物固多不得善終，中國的國運亦隨着蹉跎復蹉跎。

中國政治人物最大的悲哀是：上了台，下不了台。上台要靠鑽營、吹牛、拍馬、傾軋、排擠，固然難到非局外人可知，但下台尤難，沒有萬全的打算，充足的條件，實在的政績，不但下不了台，而且根本不能下台。歷史上的政治人物暫且不提，民國以來，大小內戰數十起，軍閥中興起倒落的，最終的結局却只有三條路：（一）出洋；（二）進租界；（三）自殺或被殺，第四條路可能退隱甚至出家作和尚當道士，可是這也不容易。孫傳芳當了將近十年和尚，行踪莫測，最後還叫一個女子施劍翹暗殺了。這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然而中國政治人物的悲哀不止於此；在朝者是下不來台，必須把持這個戲台，直至破碎不堪無法支撐而後已；在野者則是下不來「野」，除非一步上天直登龍門，否則必須拚命拆台，直至身敗名裂家敗人亡而後已。換言之，在中國政治上，在台上的永遠唱戲，明知做也不好，唱也不穩，仍得死做到底，在台下的則一味喝倒采，雖然達到好角色唱做俱好，也不顧一切拆台到底。在朝者是一騎虎難下，在野者是一欲罷不能。這是中國政治人物悲劇性的表現，也正是中國政治肌理不安的一大癥結。

說明這點，需要花些筆墨。第一點也是根本的一點。在中國作爲一個政治人物的確太困難了。科舉時

代，講學問要十年寒窗，破書萬卷。四書五經無所不讀，臨到三年大比，更要披星戴月，嘔心嘔血。這還不算，封建政治講究關係，欲在政治上出人頭地，少不得逢迎曲阿，而這一層最難，非天生幹練之才（？）不為。政治上的競爭，勝利是名利雙收的事情。鄉下人願終生辛勞而不惜賣田地押房屋為子孫延師就讀者，無非是希望子孫「學優則仕」，俾得「一登龍門，身價十倍」，於是在政治場上就充滿了競爭者。「一將功成萬骨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輔，該有多少人在其腳底下摧折掉。失敗者其比例至少千萬倍於勝利者。因此就在成功的開始，即樹下數不清的政敵，從而上了台的人也就是在其後面跟踪着敵對的人。及至上台，因其得來非易，心理上不肯放鬆，對反己者少不了一鞭一掌，骨頭硬的固然屈服，但常有不少反對者鑒於投降者不幸的遭遇，或由於政治野心之故，死不賣帳，對於這些人，在中國歷史上就只有用武力、暗害、捉拿的手段了。而因此樹敵益多。到其行將入土意欲退休的時候，回顧四週皆是冤家對頭，縱想撒手不幹，可亦來不及了。所謂「大丈夫不可一日無官」，不僅是指享受，也是指權勢。自韓非子以來，權勢一向就被政治家目為唯一的法寶，得之可以護身，大張鴻圖，失之足以喪身，無葬身之地。（反對者得勝時，往往橫加報復，縱然死者已告入土，也要翻其屍骨，所謂鞭屍，斬屍是也。董卓的屍骨且為暴民熬油點燈。）縱觀歷史上黨爭之慘，用心之毒，如南宋蔡京獨專大政之時，舊黨（司馬光派）不但一一被排斥，丟官失祿這還不算，定要治舊黨以重罪；科罰之不足，則硬派舊黨為黨黨，為之立碑作記，馴致禁止宗室與舊黨的子孫通婚。真是無所不用其極。這樣的作風，還有什麼好事可做出來。即使有若干政績，臨到台下，鑒於既往的殘暴，自不免深懼對手「以眼還眼」，冤冤相報；是益欲把持殘局，直至「苦造打」的突發而後已！

第二點，在今天大家都知道有所謂「既得利益集團」。名詞雖新，實際是二千年前早就有的。不過隨着朝代的新舊交替，既得利益集團也改名易勢罷了。中國是一個封建的宗法社會，道德着重倫理，搞政治則不過是把倫理精神由家族擴大為同宗同鄉同誼。一言以蔽之，發展為鄉黨而已。政治如此，軍事亦然。中國最出色的軍隊，是子弟軍，項羽以八千子弟兵打天下，曾國藩以湘軍中興清室，大凡歷史上成功的英雄，殆為善用子弟軍者。所謂子弟軍，其實乃是阿哥兄弟表兄弟堂兄弟在血統上有關係、在家譜上同輩份、在情感上共利害的一個集團。中國人講天理、國法、人情，似乎人情是次要的，但在實生活上人情佔有最大的比重。子弟軍之所以能百戰不殆者，乃因其為情感所凝結之力量，較之臨時召集的壯丁，其韌性自不可同日而語。唯其如此，在中國的政治上，握權者，其對人員的任用，每不能出六親之外。中國歷史上之多外戚專政，弄得民怨沸騰，實在毫不偶然。因為搞政治者既是那些娘舅外甥，堂哥表弟，同鄉同學，自不能搜羅廣眾的人才，天然辦不好「衆人之事」。所謂「一子成名，九族昇天」，所謂「攀龍附鳳」，最後則莫不大大開「黃綠倖進」

的機會。其結局是：圍繞於某個政治中心人物的四週，形成一道不可破的感情圈，法律、制度、道德乃至經世的人才，決不能透過這條鐵圈。換言之，不是圈內的人不得進去，縱有奇才，亦只自歎千里駒無主，遁退林泉。因此上了台的人，即使問心無愧，不想再唱，在感情圈內的人却硬要捧住他，不叫他下台。曾國藩在水師敗績後，一再要自殺，一再為部下所阻。請想，曾國藩一死，他的部下只有投匪了，不拖牢他何為！明末民亂首領李自成，兵敗於漢中車箱峽，為總督陳奇瑜所困，據說也曾自殺過，是他的部下救住了他。官匪異勢，其心境則一，皆是抓住立足點不放而已。

最後的一點是心理的。上述種種造成中國人獨特的看法：「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種觀念不容許人們失敗，其後乃轉變為不肯向政敵低頭屈服的強硬性格。項羽烏江自刎，無非是一羞見江東父老，果能通權達變，說不定有最後成功的希望。可是他至死不悟，臨刑還說：「天亡我也」！自然此種心理不是純粹來自精神上的變態，如魯迅所描寫的阿Q，實另有其客觀的社會背景。儒家好談忠恕之道，但在實際政治上，中國人對失敗者最不講謙恕，毫不寬容。因為中國人所講的政治乃是家族主義的政治，所以一旦富貴，固然光耀門楣，反之，一朝大禍及身，亦必然光臨闔第。所謂「罪誅九族」，「斬草除根」，像京戲上所演出的「搜孤救孤」一般的殘酷屠殺，在中國政治史上連篇累牘，無朝無之！而因此在反抗傳統勢力的週圍也有一道防線，我無以名之，直曰拚死的防線。因為傳統勢力對抗者決不會寬容，橫死直死，自然不如拚死，拚台到底。譬如明時的王守仁，因為反對炙手可熱的權閥劉瑾，先挨廷杖四十，謫發貴州龍場驛丞，但劉瑾還不放過，半途遣人暗害，逼得王守仁伴投江死，這才罷手。王氏不過反對個把弄權的太監而已，坎珂至此，試想反對主政人物如三公六卿甚至皇帝老子的該得何罪！職是之故，反對者不反抗則已，反抗之念一定，身家性命早已置之腦後。他只有拚台到底，直至最後勝利擇吉攜班登台而後已，絕不可能中途變卦，客串演出，或者掛一個二牌、三牌。

在野的一面如此，在朝的一面，如前所言，也是騎虎難下。他們既不能下台，又明知政治生命的短促，遲早有踉蹌被逐被殺的危險。這種事實上不可解決的矛盾，在主觀的精神和心理上總得尋求擺脫。這種心理是上下交織而成的，起初大概是在上者強調地位的穩固，叫下面不必害怕，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即屬此類人物，在中國自然更多。如明朝末代皇帝崇禎，當李自成兵臨城下，派遣投降太監杜勳勸崇禎禪位的時候，他不但允，並大怒呵責，手無一兵一將，自稱下詔親征，結果落得吊死煤山。又如洪秀全，當太平軍為湘軍所敗，城圍被困，忠王李秀成入奏請示辦法，竟不顧實情，妄自誇大說：「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欲出外去，欲在京住，由於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會妖者乎？」他大概不知道在沙漠中要水



多難吧！這種空虛的樂觀，可直曰：無條件的樂觀！在上者自大，在下者自然更得火上加油，捏報虛實，淆亂聽聞。就此角度言之，一部近代中國對外戰爭史，實際上是一部說報軍情誇大戰果史。義和團之亂，就是由一批昏愾的大臣討好於自大的那拉氏，聽吹什麼刀槍不入炮彈不傷而惹起的。其結果如何，盡人皆知。我還記得在「桃花扇」那齣話劇中，阮大鍼爲了討好馬士英，竟至卑鄙地買通兩個苦老兒，乘其赴梅亭賞梅之際大獻殷勤，僞稱「人民代表」。明明兵荒馬亂，餓殍遍野，偏說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歷史上有無此事，我不敢說，但觀乎今日的治績，上下瞞混之態，恐怕是變本加厲，愈演愈烈了。

職是之故，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唱戲的和喝倒彩的總是那一羣人，「不到黃河心不死」。除非時勢推移，主客易勢，這才奮勇地殺上台來；而另一方面，不消說是狼狽下台。

### (三)

中國政治爲何搞不好，由上面可以得到消息。如前所說，這固然是中國政治人物的悲哀，也正是中國人民的悲哀。所以，去掉這悲哀，非僅政治家的責任，乃是全中國人民的本分。

在中國，不問政治理論家和實踐家，不問士農工商，有產與無產，大家一

## 美貸的獲得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林滄白

美國的所謂「觀望政策」

美議會特別會議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通過以一千八百萬元，借給中國政府糧食等物資之後，國務部就開始起草一種較長期的援華計劃。二月五日，美政府官員證實該項救濟中國法案業已完成，並經國務卿及財、商兩部長與進出口銀行及聯邦準備銀行兩總裁共同組織的全國顧問委員會通過，貸款數額計五億七千萬元。六日，國務部就正式宣佈請求國會通過該方案了。華盛頓的外交界人士認爲美政府的這一措施，「實是美國對遠東外交政策的重要新步驟。這一計劃的宣佈結束了戰後美國對華的「觀望」政策」（合衆社七日電）。在事實上，戰後美國的對華政策，並不如華盛頓的外交人士所說的，是一種觀望政策。自抗戰結束以來，如剩餘物資、租借物資、聯總救濟物資、聯總結束後救濟物資、進出口銀行貸款、棉花貸款、太平洋剩餘物資、改進海港用途等等，這一大堆的經濟援助爲數約達四十多萬萬美元，另外，還有二百七十一艘海艦、空軍基地設備、海軍基地設備、訓練軍隊費用、指揮台灣訓練新兵、一萬三萬發彈藥、AAG軍火庫等的軍事援助，……援華興趣的濃厚與態度的積極，於此可見，怎能說是觀望政策呢？再以去年下半年這段期間來說，經濟的援助

齊頹懷三皇，嚮往於堯舜禪讓的佳話。爲什麼？當然不是開倒車，迷戀古代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的生活，而是追慕那種從容揖讓在政治上和平融洽的狀態，——大人物上台下台一如派角色，老百姓太平無事度盛世。自然，歷史不會重演，三代去而不來，但三代的精神是可以攝取的。民主政治這一套制度及其精神，就是醫治中國政治人物心病的唯一良藥，就是消解上述拚死的防線和無條件的樂觀的唯一針劑，而且現在也到了應該吃藥打針的時候了。

爲今之計，實現民主是第一。但在實際上，因爲剛剛開始，民信未立，所以爲政治家者必須做出成績，辦幾件有利於民的事，獲得人民的信仰。這還不够，更要有犧牲精神，在必要時自動下台。問心無愧的人，應該是不怕下台的。

環顧國內，三十年前政治舞台上這批人物，三十年後的今天，大勢依然。其實不論是把台的與拆台的，都該歇手了。看人家，想自己，真要逼人急煞。邱吉爾和戴高樂不是安穩的下台了麼？拆台的艾德禮不是兵不血刃不發一彈而上台的麼？我們中國呢？

大選在這個絕望的時間中，本應該予人以一線曙光，但是且恕我悲觀地說一句，這批由「炮選」、「包選」上台的衰衰諸公，將來能安閒地下台麼！我謹祈求民主制度的真正實現。

也沒有停止過。九月初，楊格受任「平準基金委員會」與中央銀行的顧問；十月簽訂中美救濟協定，行政院並且宣佈歡迎外人來華投資，實際上，也就是歡迎美國的投資，結果，美國資本就在兩廣、湖南等地建立起它的基地來了；而粵漢、湘桂黔、浙贛、成渝、川康滇等鐵路都將由美國資本家來督令修建，並且，台灣也包括在美國投資的體系內了；有關農業部門，則成立繼承聯總之後的「善後事業委員會」，來推動美國專家所擬訂的農業建設方案，而且很多美國專家也都直接參加到中國政府的農業機構來了。——這些事實都可證明戰後美國的對華是採取積極的政策。這也正是美國的不變的國策。所以這次五億七千萬元的援華方案，實在不能說是美國戰後對華觀望政策的結束，祇是更趨積極而已。

美國對華援助的更趨積極，一個現實的重要原因，是由於以往這一年，中國局勢的迅速發展，中國已到達歷史上重要的轉折點了。早在一月十八日，美議會的撥款委員會主席白里奇對合衆社記者就這麼說過：「各委員均感覺使國民政府繼續存在，有其必要」，那末，正當國民政府處於今天這樣一個嚴重關頭時，怎能不加援助呢？而這援助，恐還不止於五億七千萬元。據霍華德系報

紙駐華盛頓記者辛姆斯引述消息靈通之若干參議員之言論，稱：「國務部所擬之計劃，主張予中國六億美元之支助，並建議以割撥方式，將彈藥及美國在華所有廢置武器，作為軍事援助」；新報後歸國的陳納德，則大肆宣傳，主張「美國必須發動大事補充中國的武器與軍用供應品」，而且，「美國又須在中國邀請之下，供給可能獲致之最優秀美國戰略家，使能深入中國陸軍的連組織與中國空軍的飛行組織」。（美新聞處華盛頓二日電）同時，中國派遺赴美的技術代表團的貝祖貽，更露骨地表示：「中國希望經濟與軍事援助雙管齊下」。所以今天美國的援華，不僅是經濟性的，而可能是更廣泛更澈底的全面援助，正如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副董事長富倫在遠東考察回去後所說：「就余所見，中國之局勢似甚惡劣，中國政府需要軍火彈藥較貸款尤甚，除非國民政府能獲得美國之軍事援助，包括美國以專家供給中國，否則即使美國以二三十億元貸予中國，仍屬無濟於事。」

美國當局是深深瞭解今天中國政府面臨局勢的嚴重性的，因此，就像我們古諺所說的「乘人之危」，認為對華援助是「奇貨可居」，而必須考慮到如何求其有效，以及如何獲得實惠了。而這兩個問題獲得解決的程度，也正是美國以往衡量對華援助程度的標準。

### 如何有效並讓美國獲得實惠

所謂如何有效，也就是一個監督問題，而如何獲得實惠，正就是怎樣用最經濟最簡捷的方法，來獲得最大的利益的問題。最近陳納德就這麼說：「中國最迫切的需要，係在東北，具有主要決定性者，厥為美國軍事上的參議，以及不致犧牲中國主權而能由中國接受的指導」。這是好聽的面子話，事實上，近百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接受某種特定意義的外援是從來不會不危及國家的主權的。況且，美國也不是一個糊塗的鬮少，他講究「捐錢的技術」，他更重視如何得到經濟的利得。這裏自然沒有必要從「中美商約」說起，就自去年下半年說起吧。隨着美國對華的各種援助，他似乎已享受到對陸軍的訓練權、全面的指揮權、海軍協定後對海軍的監督權，此外，又有海陸空的軍事基地、屯兵場等；在經濟上，對金融外交的顧問權，「救濟協定」後對生產、貿易、商業分配以及財政的監督權；在歡迎外商來華投資後，美國獨佔資本家對華的壟斷更具備了合法化的形式；在農業上也取得了中美農業技術團所訂方案的執行權，並且，簽訂對華教育基金協定，得到了美化教育的監督權；以龐德為司法行政的顧問，改造中國的法典，使其更接近於美國的法典。諸如此類可以看出中美兩國政府關係的密切，也可以看出美國對華援助的真實性質了。

現在，五億七千萬元援華法案的提出，自然是衡量了上述標準的結果。那末，這次援華談判，是在怎樣的情形下，中美政府獲得協議的？也就是說，美國務部在怎樣的情形下，對這次談判感覺滿足了呢？

這不是個謎，祇要留心在這談判過程中所見諸於報章雜誌的材料，那末，

也可以給我們一個粗淺的了解。首先是監督的問題，以往中美間對還問題是有過爭論的，就是一切的援助，是否一經過中國政府之手——一點，在美國是想直接下手，而中國政府却希望美國能將金元交給中國政府自己來處理，所以，美國就不時嚴厲的批評中國政府的貪污無能，魏德邁來華後也假惺惺的大罵一頓。在去年十月間斯克里希羅華德系報紙的社論，認為延緩援華的理由之一，是「美國援華所耗款項已不知凡幾，但均已因貪污與政治無能而浪費」。該社論並說：「若長此等待中國產生盡善盡美之政府，則美國恐將永無對華援助行動之時」。其言外之意，就是能由美國來監督執行最好。在這期間，中國政府對澄清吏治肅清貪污，也像努力認真執行過，例如最近海軍走私軍官以及海關貪污高級官員的槍決等。但是，中國政府的這些做法，並不能使美國滿意，何況美國對華貪污無能的指摘，也不過是個藉口，其目的並不在這裏，所以自中美救濟協定訂立後，「監督援助」也就開其端了。去年十月簽訂的中美救濟協定，關於救濟計劃及救濟物資的支配就有如此的規定：「此種計劃應經美國政府之審查及核准」，而且美國代表對於所供給之物資「應有直接監察及管理之權」。以現在的情形比較去年十月間，中國政府是更急切需要美貸，而這次貸款，數目又在五億以上，所以，較中美救濟協定所規定的更進一步的監督援助，將是非常可能了，好在美國對希臘已有直接監督的例子在先。十二日大公報的南京電說：「據某關係單位負責人說：美國五億七千萬借款是物資借款」，並且說：「在今天的經濟局勢中，急待解決的已不是物價問題，而是供應問題，這就是要使五百萬官兵、三百萬公教人員、二百萬文化工作者和技術人員都有飯吃，都有衣穿，對於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不致感到缺乏。這就是政府處理當前經濟問題的基本工作，美國五億七千萬物資借款成功，政府獲得大量物資後，即可充分供應官兵公教人員文化工作者和技術工人」。以此來說，由美方贊同而宣傳很久的配給計劃，今後將更見具體。然則繼中美救濟協定中所規定的「監督援助」之後，不更可以採取直接的監督了嗎？

其次，是對日和會問題，這已是眾所週知的被當作「爭取美援的一種外交皮球」。中國政府對日和會的態度，由「強硬」變為「軟化」，進而「如和約問題延而不決，為日過久，則中國最後將冒險接受英美邀請，參加不用否決權之「和會」，即是不遵守中蘇友好條約的規定，而排除蘇聯，不顧八年辛苦抗戰的代價來簽訂對日和約。這一態度的轉變，正和美援美貸的趨向積極，若符合節。現在，「幼稚天真的敵竹槓手段」既已發生效果，美國務部已提出五億七千萬的援華法案，並且除此之外還可能有更澈底的軍事援助，那末，為了支持內戰而急切需要美援，為了急切得到美援，就果真如此的聽從美國的意見，而不顧自己國家的命運了麼？參加不用否決權之「和會」，鑄成國策上的錯誤，其後果真是不堪想像的。今天，日本軍國主義的基礎依然存在，軍事與經濟武裝尚未澈底解除，而美國已積極在推動復興與日本的經濟計劃了。這個計劃將由美國

貸款及自由投資促其實現，原則是恢復日本一九三〇——三四年工業水準，而且要在和約簽訂以前提前實現，以達到其完全適合美國在遠東戰略需要的目的。美國這種自私的對日政策，我們怎能盲目追隨？美國爲了要實現這個政策並使之合法化而召集的對日和會，我們又怎能貿然參加？然而，正當美國務部宣佈提出撥款方案的第二天，七日紐約先鋒論壇報的社論中，提到中國報紙竭力攻擊美國對日政策時說：「日本經濟的穩定，對於中美兩國的福利，都極關重要，中國固理由要得到日本在亞洲的侵略不再重演的保證，但目前這樣抨擊美國實在有點過分，假使繼續這樣抨擊下去，可能產生對中國不利的反響」。今天，中國並沒有得到日本在亞洲不再侵略的保證，而祇眼見美國在積極扶植日本，難道中國連批評的權利都沒有了嗎？拿「可能產生對中國不利的反響」來威脅，是不是說，對日和會問題這個作爲「爭取美援的皮球」。已成了美援的伴虜了麼？是不是說，美國對華已作重大的援助，中國應該接受美國這種對日政策呢？不然，爲什麼連批評一下，就要「引起不利的反響」呢？果真如此，實使人不寒而慄，八年的仗白打了，太違反中國人民的利益了。

第三，一個真正有關國家民族利益的對日問題，竟不幸作了換取美援的犧牲品，已經是頂惡劣了。然而，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及其代理人，並不以此爲滿足的，他們會要求更多更現實的代價。舉例來說：

關於最近頗爲熱鬧的積石山探測，恰於此時簽訂合約。（七日），探測團的團長是美人雷諾，科學指導長也由美人華士本担任。而美方（即合約上所稱之乙方）得聘任適當人員參加工作，但無人數的限制，而中國（甲方）如提出科學家或軍官參加，則有不超過十二人的規定。不僅如此，有關國防安全地區照片之拍攝，若科學指導長與甲方聯絡官之意見不能一致時，也可拍攝，並且，乙方或該探測團經乙方同意後，可與任何團體或國家訂立契約，由乙方履行。從這些條文看來，就可明瞭這個探測團誰主誰從了。而探測團的目的，傳說是在探測鈾礦，美官方人員說：「凡是蘇聯戰力範圍以外地區所出產的鈾，相信美國將全部收買」（華盛頓一月廿三廣播）。足證這傳說不是事出有因了。積石山探測，不僅爲了有關原子彈的原料，而探測戰略地區的價值，也是具有極大的意義的。此其一。

中美共同開發台灣，已逐漸見諸事實，台灣是政府練兵場所。它與戰火隔離，並且在日本多年血腥統治下，其經濟體系是十足的殖民地化，這對美國獨佔資本家是極大的誘惑：「中美兩國共同開發台灣的談判，現在在南京舉行，美國將投資台灣，同時在技術上給中國政府以協助」（新德里五日廣播）。又據資委會發言人告外籍記者稱：「該會已與紐約雷諾公司協議，技術合作，開發台灣製鋁工業」，傳聞雷諾公司已決定投資該項工業二千萬美元。此即中美開發台灣的一例，雙方談判之能獲得圓滿的結果，是可以預見的。此其二。除此而外，美國熱心於華南、西南的建設，已是衆所週知的事實了。十二

日全國經濟委員會討論「歡迎外商來華投資設立公司或製造廠案」，張院長就鄭重表示：「在擬具的辦法中，應給予外商以種種方便」。又據申報刊載，「魏德邁頃有一文件送致蔣主席，對財政、資源、交通等項有所建議，該文件中包括改革我幣制，開發資源，交通建設等項，尤特別重視對華南水利之興修」。一唱一和，極其合拍，而此次貝祖貽赴美，就會攜帶詳細的計劃，例如長江水電廠的計劃，就會由貝氏帶到美國去。所以，開發中國資源的重點，是轉移至西南華南去了。這在今後是會愈加明顯的。此其三。

美國資本今後不僅在地區上，如台灣與華南西南等地，大爲活動，就是在若干個別的工業、礦業部門，也將益見活躍的。以言紡織工業，中國紡織公司，其原擬將資產的百分之七十出售爲民營的，現在已告終止了。不久前美國駐滬領事會訪晤該公司負責人，詳查設備、生產等概況，據一家通訊社的報導，此與美貸有關，而且盛傳以此向美借貸二萬萬元，如果這一傳說確實，那末紡織工業也將大量滲入美國資本了。甘肅的油礦，也爲美國資本投資的對象。美衆院外交委員會開會時，民主黨議員李却士說：「我們執行馬歇爾計劃，給了歐洲這麼多的錢，當然不能不有報酬，我們必須以此換得許多重要的戰略原料和基地」（十八日聯合社電）。這在亞洲何嘗不是如此？此其四。

此外，長江航權開放的傳說，亦甚爲熱鬧，大美晚報曾有社論，「中國對於內河航運必須遵守國際慣例，目前因爲中國少數航商的利益，對於外商船隻加以反常的限制，不但削弱了中國的交通便利，而且增加了運輸的費用」。於是全國輪船聯合會秘書長李雲良特別對「美國援華貸款將以開放長江航行權爲附帶條件」的這一傳說，加以關斥，認爲是無稽的謠言。但看他的聲明，也僅僅是說：美國會遵守故總統羅斯福的諾言，美國會瞭解我國爲維護航權的奮鬥而尊重我國的航權獨立的。然而，這兩點恐怕也祇是一種主觀的願望而已。

### 一條老路：中國殖民地化

這次援華談判，在將欲予之。必先取之的交換條件之下，中國政府殆將獲得五億七千萬元的貸款。這數目說小不小，說大不大，那對中國的經濟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呢？

如果單從五億七千萬這個數目來說，那並無重大的意義的，我們應該從獲得這筆貸款的條件，來理解對中國今後經濟的影響。直接監督是否有礙國家尊嚴和主權獨立，這一點姑且不論，但顯而易見的將產生下列幾點後果。第一，以對日和會問題當作爭取美援的一種外交皮球，則在美援到手後，中國就失去了對日問題獨立的發言權，一切祇得聽命於美國了。今後美國透過日本財閥，以其雄厚的資本、豐富的原料、和日本廉價的勞力，與對遠東市場的經驗相結合，必就此獨霸了遠東市場，其結果，中國永遠翻不了身，永遠停留在「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苦海裏，永遠成爲人家殖民地的殖民地。第二，正如李却士所說，我們中國將要供應美國「戰略原料」以及「戰略的基地」。第三，

如果美國對華投資並對中國有關經濟各部門加以顧問及監督的諸項步驟一一實行後，那無疑的，中國走着一條老路，一條更壞的老路。其所具有的殖民地性質會更加深刻，今後的境遇會更加悲慘的。

再以五億七千萬這筆數目本身來說，現有兩種猜測：其一，是此項撥款，除若干劃歸貨品及建設器材外，另有一部份可能為現款；其二，是全部撥款方案將為貨品之供應，而無現款，並且分十五個月內購買貨物供應，此大部份貨物為小麥、汽油及米等。上文中曾經提到的十二日大公報南京電傳：「美國五億七千萬借款是實物借款」，並且馬歇爾也再三說：「五億七千萬元援華，純屬經濟性質，此計劃中准許中國政府在規定範圍內動用此款，推進若干工作」，則此項貸款，以實物為主，恐無疑義，而所謂「推進若干工作」，將是積極實行各大都市的配給制度，着重於五百萬官兵、三百萬公教人員、二百萬文化工作者和技術工人。這所謂經濟性的援助，目的就在穩定幾個重要的城市，使其秩序能够安穩，使士氣能够振作，以渡過這個危難的關頭，延續內戰，以待今後大有作為的到來。然而，第一，由於內戰的發展，廣大的面不能被政府控制，而城市的圈子愈來愈小，則幾個少數的大城市縱能因此項救濟而暫時安穩，這對中國大局的影響究有什麼作用？要曉得今天廣大的購買力是在農村，主要的食糧供應來自農村，工業原料來自農村，如果城市沒有了鄉村的供養，則正同於一條乾涸中的魚，還能有多大作為？第二，輸入物資在大城市實行配給，這對物資的供應可能稍稍加強，但並不能因此使生產增加，而在收縮通貨這一點上，也不能收到甚大的效果。這對中國當前經濟危機的解除，仍無多大補益的。至於配給制度的本身，雖有「直接監督」，但這需要多少耳目呢，行政效率也確乎是一個問題。這不是說我們對配給制度有何興趣，而是說，雖是「直接監督」，其能發揮的作用還是有限的。

毒花結出了毒果。正當中美經濟關係日趨密切的今天，正當美元對中國政府有那麼大的誘惑與作用的時候，美國這個資本主義最後的堡壘，終於無可避免的又一次面臨着經濟危機了。這危機的來臨，較一部份美人估計於戰後五年

內發生的預期恐將提早。不久前，物價狂漲，現在物價突又狂跌，「十一日芝加哥交易所的穀類價格繼續下跌，同時，全國的糧食價格也猛降，芝加哥股票交易所開盤亦小，五月——六月期貨小麥及大豆跌停板，這次麥價下跌，較一九二九年的跌風還厲害」。這跌風不只表現在芝加哥等城市，而是波及得很廣的，紐約股票市場十日亦猛烈下跌，上市股票的價格下跌，幾達十億元之多，公債及棉花亦小，而且，最堪注意的，是經紀商人說：「市場中商人已失去其自信心，羣情惶惶」（合衆社電），市場恐懼心理的濃厚，正足以反映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沒有信心，混亂與恐懼的情緒如果支配了市場，則一切的控制也就失去其效力了。這次以糧價為首的股票狂跌，正是經濟危機迫近的凶兆。

一九二九年的那次大恐慌，也開始於該年的股票狂跌，隨着物價的跌，帶來了生產的銳減，失業與破產，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那時對於中國發生怎樣的影響呢？首先在商品市場方面，由於外貨傾銷，我民族工業突受打擊，工廠倒閉甚多，另一方面，由於外國工業停頓，農產物及原料價格下跌，我國出口貨大受影響，江浙一帶農村經濟因而破產，金融市場在上述情勢支配之下，信用自然會消失，信用消失，則資本貸放就感缺乏，於是許多小資本銀行也要陸續倒閉，又由於美國的白銀政策，我國白銀外流，資金逃避，工商業益見蕭條。這影響到政府財政，亦就感到困難了。而當時依賴於僑匯極大，由於華僑企業一落千丈，於是匯款大減，使財政更趨困難了。那時，中美的經濟關係遠沒有今天的密切，如果在今天情形下，美國遭受了經濟危機的襲擊，將給予中國又有多大的影響呢？今天雖是「自力更生」，但實際却是一美援是賴，如果依賴美貸改革幣制，則美國幣制一有問題，如形隨形，新幣必然也要發生問題。就是不改吧，以今天的法幣與美元關係之密切，甚至在仰仗着美貸來設法支持財政的情形下，一旦美國自己經濟有了問題，則惡浪波瀾，後果不堪設想，而那時外貨傾銷，外國過剩資本大量來華，毒花結成了毒果，中國祇得更進一步變成別人經濟宰割的羔羊，更進一步陷於殖民地經濟的深淵，走上了一條更壞的老路！這豈是中國人民所願意的？而百年來中國的歷史又說明了什麼呢？

## 官僚政治對於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影響

王亞南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官僚政治之歷史的經濟的解釋）之十二

從社會史的立場來講，中國是一個文化發達較早的國家，現在反落後了。原來落後的國家走到了前面，原來是先進的，變成後進了。這說明在它的發展

過程中，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沒有什麼大的進步。

自西周開國之初的紀元前一一二二年起算起，我們一直留滯在封建社會階段，迄今已近三千年了，它差不多占去了中國比較有信史可徵的文化史的全部。



其中自西周至春秋戰國時代，我們已在前面講到，那是中國類似西歐領主封建體制的所謂初期封建形態發生以至崩潰的期間，前後雖經歷七八百年，但與西歐封建經歷的時期相比較，却毋寧說是極其短促的。因此，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問題，即使是發生在封建的階段，它的領主型的封建體制，並不會耽擱時間，而使它延滯不前，使它追不上一般社會發展的，只是由於它在初期封建體制的崩解中，並不會像西歐一樣，緊接着出現一個現代資本制的社會，却依種種理由，半轉形為一個立在地主經濟基礎上的集權的專制官僚的新型封建社會。自從它由秦代起跨入這一社會階段，迄今亦已超過二千年。在這二千餘年中，我們不能說它完全沒有進步，只是它在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上的改進速度，過於緩慢，過於顯得蹣跚不前；而其改進程度，且始終不會越出技術性的，量變的階段，直到現在，還不能脫却半封建的狀態。於是，中國社會的長期停滯問題，事實上，無非是中國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組織的長期存續問題；又因為中國特殊的封建組織，在政治上是採取集中的專制的官僚的形態，於是，我們那種特殊封建社會體制的長期存續問題，自始就與專制官僚政治形態，保有極其密切的聯繫。在專制官僚政治，主要是把統治者官紳或士宦與被統治者農民結成的社會生產關係作為其社會存在基礎的限內，那種社會的勞動生產力始終不會發展到突破其社會生產關係的水準的事實，就極可能由專制官僚統治形態得到系統的說明。

惟在依專制官僚政治來解說中國社會或中國典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問題以前，先得把以往有關這一問題的不同說明，予以簡括的評正。

一  
不論在中國抑在外國，在新史學未出現以前，通是把歷史看作是政治的延續。而政治延續過程中顯示的變動，反映在中國正統歷史家乃至一般人士心目中的規律或節奏，就是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則分，分久則合」，所謂「治亂相循」，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代交替與治亂分合，一次又一次的定型的週期的表演，很容易使人把那種表演，當作歷史發展的自然定律來接受。在這點上，頂刮刮的正統歷史家，和一般只從演義小說中看到朝代興亡故事的人，沒有大不了的區別。

把中國歷史上的這種惰性的週期演變，看作是一種「停滯」，那首先須得把歷史範圍從狹窄的政治領域解放出來。就我所知，最初對中國政治形態妨礙社會經濟發展表示意見的，是大經濟學者亞丹斯密，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優，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然而，許久以前，它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客居於該國之馬哥孛羅的報告，殆無何等區別。若進一步推測，恐怕在馬哥孛羅客居時代以前好幾百年，中國財富，就已經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之極限」（見鄧玉合譯「國富論」上卷第八五頁）。

把中國「停滯於靜止狀態」的原因，歸之於中國財富早就「達到了法律制度所允許的極限」，顯然是一種極有意義的提示。但也顯然不夠明白。差不多在一個世紀以後，另一位大經濟學家卡爾馬克斯依據許多有關東方社會的文獻，特別是關於印度爪哇等地的文獻，知道在那些地方，農工結合體的自給自足村社組織，在一種單純形態下，儘管居民生活了多少世代，村社的界限，殆很少改變，雖有時村社被損壞了，或被戰爭饑饉疫病破壞了，但同一名稱，同一村界，同一利害關係，甚至同一家族，常保存數百年之久。居民對於王國的解體或分裂，沒有任何懸念。只要對村能保持完整，他們絕不問自己所屬的村，是隸屬在何種權力下面，是受那一個權力支配。其內部經濟是保持不變的。他因此推論到那種社會的停滯性，而有以次的說明：

「這種自足的共同社會，是不斷以同一形態再生產；如偶然被破壞，也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現出來。但其單純生產組織，却給了我們解決一個謎的鎖鑰。由此，我們可以說明，為什麼亞細亞諸國不絕解散，不絕重建，王朝也不絕變更，但亞細亞諸社會，却毫無變化，社會經濟基本要素的結構，不因政治風雲的驚擾，受絲毫影響。」

這段話原是對亞細亞諸國民立論的，中國當可算在裏面；中國王朝變更的政治風雲，不會對中國社會經濟基本要素的結構，引起何等根本改革，顯然很符合上面提論到的事實。但我們對於這段話的理解，須得明瞭，政治變動未改變社會經濟基本要素的結構，固然同那種結構的頑強性有關，同時也由於當時的政治，無論在變動以前，抑在變動以後，有時甚至在變動當中，都在設法加強那種結構的頑強性。這就是說，中國的專制官僚體制，是把農民的無知、孤立、被束縛於宗法社會組織，和對政治的不關心，為其存在的前提條件。如其看落了這一面，那種成為問題的社會的基本要素的結構本身，就不像是由各別歷史王朝多方努力，積累的變相的強化起來的結果，而像是一開始就頑強到不能由任何政治變動所改變的「自然體」。那顯然是誤解了那位大經濟學者的正確論旨。

中國社會長期停滯問題，本來在戰前有關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及中國社會史性質問題論戰中，已被附帶提論過，但正式被提起，却是在抗戰期間，那時中國進步論壇上，曾一致「鳴鼓而攻擊」日本侵略主義代表者秋澤修二，他在其所著「東洋哲學史」及「支那社會構成」二書中，會反覆論到「中國社會之「亞細亞」的停滯性」；他誤解或曲解卡爾的上述論點，把「農村共同體的存續，殘存」看為是中國「社會經濟基本要素的結構」，看為是一切其他社會組織的胎盤。它範圍着中國社會「父家長制的專制主義」，而成為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基礎。這兩者妨礙着工商業的發展，妨礙農業的發展，於是農業止於「集約的小農經營」，手工業不能「依中國社會自身的性質」，「產生出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製造業」，而商業則是「商人資本主義在中國社會自身發展中

，沒有外部的作用，便不能發展成爲資本主義的資本，像這樣，商業、工業、農業，即全部經濟生活，都「先天地」被中國「社會經濟基本要素的結構」所規制住了，或者內在的相互制約住了，由是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停滯性，那種停滯性本身，變成了「中國社會的根本性格」。要打破這種停滯性，只有期待外部的壓力的誘導與推動，而「鴉片戰役」成爲中國社會現代化或傳統停滯性打破的第一步，正是那種推論的有力的佐證。

然而世界任一先進國家的現代化，殆都與其對外發生戰爭有關，果其如此，「停滯性」云云，就似乎不是中國社會特有的一根本性格了。我在這裏沒有充分論證秋澤錯誤的餘裕，只須指明：

(一)他誇大了那種農村共同體存續或殘存的範圍和功能，事實上，在自給自足的農村共同體以外，還由地主經濟在各村落各地間，特別是地方對中央間，造出了一種不自給自足的經濟依存實況，作爲中央集權政治控制地方的相反而實相成的物質基礎。

(二)他以固定的形而上的眼光，去確認那種農村共同體孤立的作用，而不知道，那種社會經濟基本要素的結構，隨着全官僚封建社會的進展，被賦予了一些新的動境，新的誘因；並且社會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築的法律政治關係，在不絕起着辯證的相互阻制的功能。

### 三

國內新社會史學家們由秋澤批判所展開的討論，首先當數到李達先生。他在「文化雜誌」第二期發表的「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雖然只從正面講述他自己有關這一問題的意見，但他顯然是見到了秋澤所發表的「高論」的。他把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歸納爲以次八項：(一)戰亂頻繁，(二)封建力役，(三)封建剝削，(四)宗法遺制下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五)封建的政治機構，(六)農民階級不能担負新生產方法，(七)科學不發達與儒教學說的影響，(八)地理環境的影響。這無疑已把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全觸到了，但正如緊接他發表那篇文章之後，即起而與他理論的蒙達坦先生所說，「即使這些全是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但這些原因怎樣作用於中國社會而使其發展遲滯呢？如果單祇說這些原因妨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因而遲滯了社會的發展，那是非常不够和太籠統的，科學的說明，決不容許其含糊，而必須說明其如何如何。」

上面的話，是蒙達坦先生在「與李達先生論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一文中（載「文化雜誌」第二卷第一號）所指陳的，李達先生平列出八大原因，並指出前五者爲主因，後三者爲從因，確實是太籠統而非科學的說明，但蒙先生是怎樣來說明的呢？他認定社會的發展，取決於資本積累與生產方法進步兩件事。我們要解決中國社會何以發展遲滯的問題，非從確定究竟是什麼事物妨

礙生產方法進步，究竟是什麼事物妨礙並破壞資本積累的相互關係處去研究不可。他是按照他所提出的方法論，來分別解說其原因的：關於妨礙或破壞原始資本的積累，他提出三項：第一是特殊的土地所有關係，第二是農民戰爭，第三是共有財產；關於妨礙生產方法的進步，他又提出三項，第一是重農抑商政策，第二是地域發展不平衡，第三是儒家學說的影響。李先生的八項，到蒙先生手中只有六項了，並且有幾項還改了樣。這樣的研究，似並不會完全改變李先生的平鋪列舉的缺點。從原理上提出生產方法與資本積累來，雖像把問題「鞭撻近裏」推進了一層，但如果有誰把妨礙資本積累的三原因，和妨礙生產方法進步的三原因掉換一下，或者主張那六項原因，同樣會妨礙生產方法進步和資本積累，我想蒙先生也不能怎樣表示異議罷！比如，特殊土地所有關係，爲什麼就只妨礙資本積累，而不妨礙生產方法改進呢？又如，重農抑商政策，假使不停止在表面的政策上，爲什麼只妨礙生產方法的改進，而不妨礙資本的積累呢？李先生平列固然籠統，蒙先生分舉却更機械。

然而我要進一步看看華崗先生的意見。他在一篇「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基因」(見「羣衆」第七卷第十一、二期)的論文中，直接討論到李先生蒙先生的觀點。他認李蒙兩先生所舉述的中國社會發展遲滯原因，有的是因果倒置，如科學的不發展，原是社會不發達的結果，不能同時又把它看爲是社會不發達的原因；有的是附因被看作主因，如李先生強調的戰亂頻繁，蒙先生強調的農民戰爭，都像過份的把社會不發達的責任，放置在戰亂上，而却把殘酷剝削妨礙生產，並招致動亂和戰爭的更本質原因，放在次位了。特別是關於蒙先生把農民戰爭描寫成愚民盲亂破壞一切生產手段的意見，他提出了極不客氣的指摘和抗辯。

在這幾回合的爭論中，我們應該不忽視它對於中國社會史研究的莫大貢獻。自從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問題被提到論壇以後，我們以前幾乎全是蒙在中外流俗學者所放言高論的一些不着邊際的曲解和疑難中，如缺乏自然科學哪，缺乏自然科學的研究精神哪，缺乏蒸汽機的發明哪，缺乏對外貿易的彎曲海岸線哪……經過這次討論後，至少，那些技術的自然理由，已不再能蒙蔽任何一個稍有新歷史科學修養的讀者了。

### 四

然而，我們顯然是不能滿足於那種討論的。

我想順便在這裏把前面各篇已經研究過的諸基本論點，拿來作一總結，並在那種總結中，試圖使一切解釋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較健全主張，能各別得到其在科學說明中的適當地位。

我們已一再指明：中國專制的官僚的政治形態，是把地主經濟作爲它的物質基礎；地主經濟原是對領主經濟而言的，它的大體內容，包括以次諸項：(一)

(一)土地為社會財富的最重要的生產手段；(二)在相當範圍內的私人土地所有權的確認；(三)在相當範圍內的土地自由買賣；(四)集約的小農經營；(五)土地剩餘生產物的地租化與賦稅化。我們這樣來規定地主經濟的內容，理應與本篇前兩節所討論到的共有財產與自給自足的工農結合體不相抵觸，因為社會科學告訴我們，非有最進步的生產方法，是不足以完全否定以往的原形遺留的氏族共有地等財產形態的；地主經濟對領主經濟儘管在農業生產方法方面有了不少進步，但即使沒有我們將在下面述及的強化氏族組織的宗法關係，那種被封建社會本質限制了的進步，亦是不能促使原始性共有地產徹底解體的。至若自給自足的農工結合體，如把它看為地主經濟下的細胞組織，或地主經濟型封建制下的「社會經濟的基本要素的結構」，那亦是非常自然的。零碎保有土地或使用土地的小農，即使在較和緩的租稅負擔下，他們亦是需要利用農隙（經營的土地面積愈少，每年可能的農業勞動日愈少，農隙愈多），以從事手工副業的；如其租賦課稅加重，他們那種必要就更大了。此外，商業對農民的過分剝削，亦無疑要加強那種排斥中間商業的農工結合的重要性的。

可是，農工結合雖然要在某種範圍內縮減商業的規模，但它並不會抵消中國社會商業發展的諸般有利條件。中國版圖的愈來愈擴大，中國中央集權政治形態可能採行的許多便利商業的設施，中國各地經濟的差異性與其發展的不平衡性，特別是中國在地主經濟基礎上，必然有很大一部分農業剩餘勞動生產物，須通過賦稅，或地租的方式，轉化為商品，所有這些條件，都會直接間接拓展市場，而最後一項，且必然會使商業與地權，商人與官吏發生極其密切的聯繫，而由是成為地主官商合一的物質基礎。然而，利之所在，害亦隨之，中國商業儘管因它取得了政治的便利，和與地權發生密切關係的融通性，而把它對於一切生產者的剝削欺詐機緣加多了，同時就商業本身的發展前途講，那却寧是一種損害。商人有入仕途的可能，商業資本有轉化為購置地產基金的可能，已經說明商業自己擴展有了限制，況且商業過分掠奪生產者，生產者不將依其被掠奪的程度，而使商業因以進行的商品提供發生障礙麼？統一政治權力固然會在交通、市場、稅制、貨幣諸方面便利商業，但那種政治權力集中在專制者手中，也極可能在這些方面打擊商業。事實正是如我們所理解的，且再考察一下工業上的實在情形。

如其說中國農村的手工業是當作農民的副業，中國都市的手工業，就差不多是當作商人的副業，或者是對於商業的隸屬。這是我們在中國舊式市集或城

市中，只見到商業基爾特型的商會，而不易見到手工業基爾特型的工會組織的基因。工業隸屬於農業，隸屬於商業，在本質上，就不易由它自身的積累而擴展。不錯，西歐在近代初期，製造業家原本有許多就是由手工業者或商人轉化來的。但在中國，這條「上達」的通路，又遇到了集權的專制主義的障礙。中國過去較為普遍，較有一般需要的有利事業，如鹽業、鐵業、酒業、碾米業乃至後來的印刷業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變為官業或官僚壟斷之業，而它們由此等事業所獲得的贏餘，顯然最可能轉用在不生產的消費上；同時，商人或一般商工業者不能把積累用以擴展本身事業，不能「自由」找到有利事業經營，自然更加要敦促他們去購買大地，去接近官場。況且，專制國家人民要從事對外的商工業經營，亦是受有嚴格限制的。中國從唐代以後逐漸展開的對外貿易史，儘管為我們充分提供了此種佐證，但我們的許多皮相歷史家，却丟開這些更基本的因素，專向海岸、季候風、地勢一類自然條件去作中國產業資本不發達的攻證。

上面是有關中國社會經濟形態各部門的比較靜性的分析，在此分析中，我們已不難瞭解：(一)每種的經濟活動，都滲透有社會的或政治的作用，或在為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所網維着；(二)即使社會經濟基本要素的結構或所謂自給自足的農工結合體，極長期的存續着，那種存續，亦非它自身有固定不變的所謂「根本性格」，而是由於適應着並範圍着它的社會生產關係，或巨及全面的官僚統治，始終都要求它在經過政治動亂騷擾以後，重復沉澱為原來的或類似原來的形態；而且(三)農業既由土地所有與使用方式限制着小農零碎經營，小農零碎經營限制着農業生產方法，限制着農業勞動剩餘，而可能被榨取出來的農業勞動剩餘，不依賦課轉作不生產消費，便會以高率地租或高率利息或商業利潤轉作強購土地的手段，而由是使使用土地的條件更形惡劣，這樣一種反覆作用的過程，根本就會限制資本積累，同時也限制生產方法改進，終於使自給自足的農工結合體成為不可避免，在這場合，為了補強社會統治，而被變相復活起來的宗法秩序，便給予那種結合體以更多的原始外觀。

## 五

講到這裏，我們對於中國社會長期停滯問題，似乎有一較生動的理解了。但我們還不應停止在這比較靜態分析上面，而須進一步分別指點出它的一般動態推移：

首先，如我們一再指明的，建立在地主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官僚政治，有着

無比的包容性與貫徹性，它不但動員了中國傳統的儒術、倫理、宗法習慣等等來加強其統治，並還把可能而且社會史上必然要成爲它的對立物的商工市民的力量，也給解消同化在它的統治中。結局，作爲領主經濟或貴族政權之死對頭，而在那種政治經濟中爬升起來的市民階層，就不可能在中國地主經濟與官僚政治場面下產生出來。於是

其次，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經濟政策，雖然在每個朝代初期被強調着，但官僚政治的根本作風，終歸是多面的，敷衍應付的，官商的本質聯繫，不但從不會因此隔離，每逢勸農務工，講求水利的政功收到多少實效，農業生產力在喪亂之後有了一些恢復，依政權統一，農工業生產物加多而展開的商業，就照應着專制官僚機構的擴大，官僚階層消費慾望的增繁，而使官商暗中的「苟合」得到一層發展。在這場合，中國都市的政治性，商業性與消費性，就「相得益彰」的盡情發揮。然而由商業與胡亂消費所給予政治上的腐蝕影響，不旋踵間，就由官僚階層勤於剝削搜括，而忘於獎勵農事講求水利的頹廢傾向向上充分表現出來。

其結果，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一切打擊生產者特別是打擊農民的措施，從四面八方緊逼攔來；貪污、橫奪、詐欺，在先是壓迫着農民的生產條件，進一步壓迫着他們生存條件；社會已有的生產方法，還不易維持，社會可能掙出的原始蓄積，皆浪費殆盡，所以，等到農民大批流散，大批死亡，大批成羣結隊變爲叛亂隊伍，社會勞動生產力實已被殘酷的封建剝削破壞得相當普遍與徹底了，然而我們並不因此就否認農民戰爭在這已有殘破基礎上的荒廢作用。

又其次，有不少的王朝，在普遍農民叛變出現以前，或在其演變當中，常常還因其統治力減弱或弛懈，而招來外侮，但在過去，不論是對外戰爭，抑是內亂或內戰，都止於促成王朝的崩解，而迄未招致社會的革命。這原因，與其說是取決於戰爭的性質，不如說取決於戰爭進行過程中的一般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可能貯備條件；與其說是由於農民戰爭只有破壞既成統治的消極展望，不如說是由於既成統治已把新社會所由孕育誕生的積極因素給無情摧殘剝削淨盡了；與其說是由於農民不能單獨担任新生產方法，不知道愛惜舊社會可資利用的生產手段，不如說是由於當作新社會之主導者的市民階層，根本把他們的歷史任務歪曲了，他們不論是扮演官僚的配角，抑是轉化爲地主豪紳的伙伴，都只能在農民叛亂過程中成爲沒落王朝的殉葬者，而無法以新社會領導者的姿態出現。所以，中國以往農民戰爭沒有表現出積極的革命的果實，是不應也不能單從農民本身的性質或其崛起反抗的單純動機得到理解的。

然而，所有上面的說明，都不應驅使我們達出這樣一個無可救藥的宿命的

結論，就是，中國以往由特殊自然條件與歷史條件所造成的專制主義、官僚主義、與封建主義混合統治形態，根本就從本質上，從它內部的相互制約，而永遠不許由它自身孕育出一個新的社會機能。但是，這是荒謬無稽的。一遲滯發展一並不可理解爲永不前進。中國由秦代到清代二千餘年中的社會經濟狀況，儘管還是停滯在同一社會史的階段上，然而，以秦漢的社會經濟生活，與明清的社會經濟生活相較量，我們就很容易發現後者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向着近代大跨進了一步。我們要有這種認識，才知道劃時期的「鴉片戰役」究在促成中國現代化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兒；同時也才知道爲什麼中國現代化開始這麼久了，傳統的官僚統治，仍不肯讓新社會好好抬起頭來。

在下面，我將從這些方面展開說明。

### （上接第十六頁）

深刻。客觀戲劇好比肉體，缺少了它，這靈魂便等於脫離了臭皮囊的鬼魂，叫人看不見，摸不着。「意識之流」派作家的吃虧處，正由於太瞧不起臭皮囊，以爲拋掉了它，作品可以更高超，那曉得這只是一可憐無補費精神」的孟浪之舉！朵思陀也夫斯基把這兩者兼而有之，一方面介紹事實，一方面分析心理，這就是他的作品不廢精微，而仍舊讀得下去的真正原因。

這書的戲劇性還可從下列幾點看出。第一，全書四百五十頁（據 Everyman's Liberty 英譯本），除去尾聲二章外，只寫十幾天的事，而其中的四五天（兇手在病中）僅一筆帶過，因此實實在在只有九天；行兇前的準備佔兩天，行兇一天，病起至自首六天。這六天中，每一天都塞滿了緊張生動的事實。其次，這書極富穿插變化，而且一鬆一緊，跟舞台上的情形尤其相像。還有，書中的對話有幾處完全是戲劇式的，如兇手跟斯維德立格諾夫的初次會談。太過戲劇化的結果自然會發生毛病。這書本來是極接近人生的，後來突然異入傳奇作風，憑空教這部偉大的悲劇成了鬧劇。書中如斯維德立格諾夫的逼奸杜妮亞以及後來的贈金、自殺等都能算是鬧劇中的好情節。（這些大約是受了雨果和迭更斯作品的影響。）許多批評家對於朵氏寫實浪漫一齊來的作風頗致不滿，這當然是有見解的。但比起他的優點來，這究竟是微不足道的小疵，不值得大加訶責。

## 催結帳款

蘭州黃河文化服務社、開封黃河書店、開封四方書報社、樊城米亨泰書店、溫州建地圖書出版社代辦部、南充嘉陵文化書店：

貴店等結欠本社賬款，屢經函催，迄未清償，盼即賜匯，以維信譽。

時與文週刊發行部



# 緬甸是怎樣「獨立」的？

鄭道傳

## 一、「咖龍」起義與緬印分治

經過了一八五一、一八五二和一八八五年三次的英緬戰爭，緬甸遂正式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當時曾把它劃歸印度，作為「不列顛王冠上的珍珠」的屏障，交由印度總督轄下的英國省長統治。

緬甸是一個富足的油米之鄉，但是這些「黑金」和「白金」卻控制在英國資本家及其所御用的緬印地主和高利貸者手裏，緬甸人民被剝削得是無立錐之地，據調查，緬甸一千七百萬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變相的農奴，百分之十一是工資勞動者及其後備軍。這些可憐的人民，隨着人為的和天然的災害，浮沉在飢饉的苦海裏。

但如同東南亞其他地帶的弱小民族一樣，由於多年來經濟上的壓迫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新刺激，緬甸人民也有了新的覺醒。雖然他們所走的道路極為艱難，但仰光又發生更劇烈的得拉瓦底暴動，繼而得越丁約和英山各地也紛紛響應。策動這次革命的領袖是在瑞波的人沙耶山，總機關設在高山叢林中，組織頗為嚴密。沙耶山利用緬甸的宗教信仰，謂印度神話中有一種怪鳥，名叫咖龍 (Galon)，能啄食毒蛇，而咖龍象徵緬甸人，毒蛇則象徵英人，於是組織咖龍會和咖龍軍，通譯英國政府，要求英人退出緬甸，一時緬人從之者甚多。他們使用符咒和劣勢鎗炮與英軍相抗，甚至婦女亦英勇參加，卒以英軍繼續增援而失敗，沙耶山於一九三一年八月被捕。但這種「義和團」式的民衆運動的發展，却逼使英國當局不得不另想應付辦法，於是她一面派遣「賽蒙委員會」赴緬訪問，一面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上院召開圓桌會議，企圖消滅反英運動，而當時緬甸代表的要求也不過是英國自治領所享受的獨立而已。圓桌會議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閉會，麥克唐納首相發表演說，謂英政府待緬甸願與印度分治時，即從事組織由緬人負責的政府。這可以說是英國為適應「咖龍」起義後的緬甸新局勢，而在緬甸改革專制為政治玩弄的開始。

接着，一九三五年的「緬甸政府組織法」公佈了，又依據「賽蒙委員會」的建議，緬甸與印度分離，並依此「欽定的」政府組織法將緬甸交由總督、內閣總理及各部部长合組之內閣統治，內閣總理及部長等皆為緬籍。另有參議兩院，從選舉中產生。政府組織依照英國的形式，內閣附屬於立法機關，各部部长有處理緬甸本國內部行政的權力，但總督仍得於緊急狀態時行使職權，而國防、外交及經濟政策且由總督個人處理，立法機關雖可提出討論，但對總督並無約束力，特定區域或邊界區域亦不受部長或立法機關的管轄。這個「政府組織法」的特徵，即將非常廣泛的權力都集中放在總督手中，而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只在形式上象徵所謂民主而已。至於印緬分治，正是由於英國當局要使緬甸不受自己的一個最重要殖民地影響，也就是說，不受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影響；而「特定區域或邊界區域不受部長或立法機關的管轄」的規定，更顯示着一個「分治中的分治」的陰謀。

## 二、猶豫不決的查山路線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入侵緬甸期間，是緬甸獨立運動向前發展的一個新階段。然而在此一階段以及其後，緬甸政局是非常搖曳不定的，這很明顯的表現在以查山為代表所走的忽右忽左的道路上。

查山出身於英國人所辦的仰光大學，他的父親是一個有名的高利貸者，他自己參加過自主黨，並做過該黨的總書記。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英國為了要加強對緬甸的控制，紛紛抽禁緬甸的革命份子，查山此時即憤而參加地下工作，他懷着浪漫色彩的幻覺，亟欲藉外援以排除英人的勢力。一九四一年，他離開緬甸來到中國的廈門，有意投奔當時的重慶政府，但終於被日本人說動，潛往日本受訓一年，於一九四二年隨日軍打入緬甸。可是日軍接着在緬甸即建立有利於他自己的政權，令巴莫組織新政府，實施對英美宣戰對緬甸採取的決策，這使得查山深感苦悶，於是他決意與當時在緬甸從事地下抗日活動的緬共領導人德欽索秘密聯絡，暗中給予盟軍不少的幫助。等到一九四五年三月盟軍反攻東南亞的時候，他領導着在日本協助下所建立的一緬甸獨立軍，裏應外合，把日本打出仰光去，並且他隨即聯合緬甸各黨派組成「緬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本文以後簡稱「緬盟」)，一時追隨他的盟員擴展到二十多萬人。

本來，緬甸人民與日本佔領軍進行鬥爭是為了要獲得民族的獨立，而英國則仍企圖把緬甸留在不列顛帝國的系統中。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英國保守黨召開帝國政務委員會，對緬甸獨立問題會發表藍皮書，其內容為：(一)緬甸須在不列顛聯合帝國範圍內得到自治，且須經六年的建設時期而後實行；(二)緬甸須供給英國以海陸空軍基地；(三)任何外交事件，須經過英國政府的審核；(四)掸族及東北邊區民族並不包括在緬甸境內。此項藍皮書曾引起當時英國國內外輿論的批評和指責。嗣後英國工黨政府亦於一九四五年五月發表白皮書，其內容却與藍皮書差不多，它說明緬甸首先應獲得自治領的地位，且必須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將繼續至一九四八年底，由英國總督統治，不受任何憲法上的限制；第二階段恢復一九三五年憲法並舉行立法機關的選舉；第三階段開始於選舉之後，完成於英國議會批准關於緬甸按自治領形式而實行自治的法律之時。此外，對於佔緬甸全面積百分之四十、人口百分之二十的錫安聯合州以及其他邊境地方，規定在英國總督權力之下，以特殊的統治形態，作為特別行政區域而存在。接着戰後第一任來緬「復員」的英國總督斯密司，即據白皮書於一九四五年十月與「緬盟」進行談判，但因後者要求在即將建立的行政會議中多佔席位而中斷，結果斯密司竟組織了一個沒有「緬盟」代表參加的行政會議，同時他還設立一個「物資供應委員會」，負責管理緬甸的物資、商業活動、交通和房屋；該委員會是由英國的官員和英、印的工業家所組成，為復興並擴展英人在緬甸的經濟統治的工具，而在名義上，英國是以八千七百萬鎊復興借款來為緬甸「復興」的。但斯密司這樣的作風引起了緬甸人民的全面反抗，十一月起，警察、郵電、火車、海關、港務局和碼頭工人都一致罷工，他們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時要求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於是逼使英國當局不得不表示讓步，斯密司於前年六月稱病離任，暫調印度孟買州顧問亨利·邁德代理，同時在下院提出「關於在緬甸建立合法政權」的法案，又於八月正式任命蘭伯特·蘭斯為總督。蘭斯到了緬甸，即採

取「迂迴的戰術」來展開他的「新猷」，他一面把緬甸巴莫釋放出獄，允許他進行合法的政治活動，一面於九月廿六日重新建立行政會議，在十一名委員中，「緬盟」佔了六席，由羅斯任總理，蓋山任副總理「兼理國防外交」。羅斯的說法，行政會議將享有與當時印度臨時政府同樣的權力，其實它比印度臨時政府的權力差得多，因為：行政會議的組織係根據一九三五年的「政府組織法」，總督仍握有一切問題的最後決定權。上述蓋山「兼理國防外交」，實由於有意或無意的誤傳，蓋山在行政會議中，事實上是不管部員兼任「國防參謀」(Counsellor for Defence) 和外交參謀(Counsellor for Foreign Affairs)，只是顧問性質，而不是一般所說的部長(Counsellor Member-in-Charge)，至於十一位閣員中，除蓋山和田培外，其中至少有五位是十足的官僚(如字素、丁突、巴蘇、字基、孟基)，而「緬盟」提名的人選中，德欽苗和巴培也是戴着新面具的老政客。德欽苗自命為社會黨員，但他一向認為緬人應留在不列顛聯合國內做自治領。巴培在戰前當過五年的閣員，一九三九年對全緬革命份子搜捕，便是他任內政部長時的「政績」，所以「世界政治與評論」雜誌論及這次行政會議，說：「英國總督未作任何些微的讓步，就順利地把緬盟的右翼代表拉入他的行政會議。」蓋山上台以後，親英的傾向便日趨濃厚。他企圖繼續採用談判的方式謀取獨立，因此引起緬共的不滿。而緬共內部又因為觀點不同而分為兩派，一派為德欽苗和田培所領導的 Burma Community Party，他們主張暫留在「緬盟」，以影響蓋山的決策；另一派為德欽索所領導的 Communist Party of Burma，他主張組織工農，直接行動，所謂「紅旗黨」便是他的主力。於是羅斯即趁機進行離間的陰謀，策動蓋山向緬共「開刀」，第一刀宣佈「紅旗黨」為非法組織，並下令通緝德欽索；繼而再撤除丹東所任「緬盟」總書記的職務，另委德欽苗充任，田培也逼得不得不辭去部長職務。這麼一來，蓋山的行政會議便成為清一色的「自己人」了，因此艾德禮便選擇於十二月廿一日在上院發表邀請緬甸總督行政會議代表團訪問倫敦的聲明。接着蓋山便率領巴培、丁突、孟基、字素、巴蘇等所組成的代表團，於去年一月初到了倫敦，但行前緬甸輿論界對蓋山等此行的反響並不大良好，例如「緬甸時代報」、「沙瓦那日報」、「阿聖都報」等，「人民呼聲報」等立場不同的報紙都有着以下共同的意思：(一)對於「緬盟」急切地隨便接受英國的邀請，表示不同意，而不願予以支持；(二)對於英倫的邀請表示懷疑；(三)大家都擔心會不給予完全的獨立，必須堅決予以拒絕而馬上回來。果然，在這次會議中，英國政府對於緬甸的要求，一個也沒有同意，曾經宣佈，在法律上並不能把行政會議改變為自治領形式的部長內閣；關於英軍撤退的問題，也公然延擱下來了；內政的監督權依然留在英國政府的手中；邊境區域的管理，繼續歸省長負責(而且羅斯還趁着這個時機，在一月間任命史登文生為邊區長官，直屬總督轄下，不與行政會議相關)。英國人唯一的讓步，就是同意在一九四七年四月辦理立憲會議的選舉，然而這種讓步顯然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立憲會議草擬的憲法必須有英國國會的批准；代表團中有兩個團員(字素和巴蘇)不同意這次談判中的協定而拒絕簽字，巴蘇發表談話說：「我們來到英國，是帶了緬甸在一年之內獨立的一致要求而來，現在英國所提出的並不能滿足我們的期望，而且跟白皮膏沒有什麼差別，現在緬甸的行政會議是沒有主權的。」但蓋山卻「顛着手簽字」了。

時間是好的證人，「緬甸四月九日選舉第一屆制憲會議議員，但選民態度冷淡，官

方估計投票者不過二萬人」(見聯合社傳光電)，但競選者卻表現得非熱非冷，蓋山利用自己的「人民志願團」(Peoples' Volunteer Organization) 做競選的爪牙，自主義頭目巴蘇則宣佈領導「緬甸人的緬甸」運動，他說要組織革命軍十萬人，以與英帝國主義及「緬盟」奮鬥。此次選舉的結果，「緬盟」在制憲會議二百〇二席中獲得一百九十六席的絕對多數，餘為共產黨得了六席，右翼黨派如愛國黨和自主黨等却沒有一席的份兒。然而正當蓋山等高歌勝利的時候，驚人的政治暗殺案發生了，七月十九日上午緬甸行政會議正在開會時，突有暴徒多人侵入，以手提機關鎗掃射，蓋山及其同僚七人飲彈身亡。這場暗殺案自然帶給英國以無限的「便利」，艾德禮一面宣佈「不變對緬政策」，一面由印度調派英軍前來彈壓，字素和巴蘇被指為殺人的兇手。英國自由派報紙「曼徹斯特導報」評稱：「在英國政府的面前，造成了干涉緬甸事務的重大誘惑」；倫敦「工人日報」更揭發這次暗殺的內幕：「不管蓋山在政治上的一切動搖，過去幾個月來，確已企圖正式對抗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了，倫敦與仰光方面消息靈通人士認為這個事實就足以使他被人謀害，蓋山已與緬共開始談判，但在實現其計劃之前就被殺死。憑藉英國支持的緬甸右翼份子，應對蓋山被暗殺一事負責。」的確，蓋山自倫敦會議歸來後，由於國內左右派都非難他，人民的怨聲和示威更使他驚慌，他已經表示在選舉後願再與緬共合作，回頭是岸，然而他卻逃不出反動派和帝國主義者的魔掌了。

### 三、緬甸宣佈獨立後的對英關係

在「一七、一九」慘案發生之前，英國曾於六月十九日邀請以德欽苗為首的新代表團到倫敦去「談判政權移交問題」，德欽苗即牛犢真，一度是費邊社會主義者，日本佔領時代曾出任僑外政部長，後來跟蓋山一同反正，任「緬盟」副主席，又是蓋山親英路線的推動者。他這次去英談判的結果，並沒有在回國後即宣佈，即在七月十三日「緬盟」委員會的會議上也還保持沉默，一直到七月廿四日才公佈給緬甸人民知道，但那個時候的緬甸政局已經發生了大變，而德欽苗也高坐在蓋山的座位上了。

據艾德禮和德欽苗的協定，第一條即規定英國承認緬甸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但在經濟上和國防上，卻很明顯地仍受英國的控制，例如第六條關於財政經濟方面所規定的「徹底解決雙方的償還」問題，雖然英國慷慨地自動取消一些借款的數字，可是又規定緬甸應償還的尚有緬幣五萬一千七百萬盾之多(英政府對計劃部所借出的款項和一切費用不在內)；又如附錄中英緬國防協定：「緬甸政府同意英方派遣軍事教練顧問，其中教練費用由緬甸負責……緬甸認為不需要時，即可中止」，一雙方同意，在平時，海空軍得知過去一樣，予預先通知後，互在對方停泊」，這在字面上看來是很「平等」的，但就兩國國情考察，毫無疑義是英國操着絕對的優勢。

同時緬甸制憲會議也於十月底圓滿結束，正式通過了共有二三四條的緬甸聯邦憲法，推選瓦瑞士司素瑞德(原任制憲議長)為臨時總統，德欽苗為臨時總理，並定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正式宣佈獨立。據德欽苗解釋，緬甸已經通過了「一部左傾的憲法」，其目的在改善緬甸土地上英國大資本家、印度大資本家、華僑大資本家與貧困的廣大的緬甸人民之間「不平衡」的現象(大意如此)。印度人和華人與英國大資本家並列，真不勝榮幸之至。但不知德欽苗是否知道英資的斯蒂爾兄弟公司(Steel Brothers Co.) 操縱着伊拉瓦底輪船公司(Irrawaddy Fostila Co. Ltd.) 和「緬甸鐵道局」一大部分股票，以及英資的緬甸煤油公司(Burma Oil Co.) 獨佔上緬甸仁安宮一帶煤油採掘權這些事實，前者尤足以操縱緬甸土產的市價，並壟斷大宗從外洋——特別是從英國——而來的進口貨，緬甸的「白金」和「黑金」便是由這些「吸血管」吸出去的。至於印度高利貸者「齊知仔」(Chetty)，在緬甸可以說尚頗有地位，但較之英國資本家卻有小巫之別，而華僑不過是在「流通過程」中拾人餘錢而已，不料竟幸運地也被德欽苗看上了！當這些中國的海外孤兒目前正普遍地受着排擠的時候，我們又不禁為留緬五十多萬僑胞的未來捏一把冷汗。

# 「罪與罰」及其作者

林海

十九世紀的俄國小說，大概可用「戰爭與和平」和「罪與罰」來代表。這兩部作品，一以博大勝，一以精微勝。我們說「戰爭與和平」是博大的，並沒想抹殺它的精微，事實上這書也有其精微的地方，只是它的精微被它的博大掩住了，這却無法否認。同樣，我們說「罪與罰」是精微的，也並沒乾脆認它作「意識之流」派的小說，因為它除了意識之外還有世界，到底未曾精微到牛角尖裏去，但它的博大遠不及它的精微，這也是事實。

博大精微而外，這兩部小說，就整個氣氛來說，也是截然不同的。「戰爭與和平」雖一樣充滿着人間世生老病死、悲歡離合的故事，而其空氣却是健全的，正常的；我們可以說這兒是一片陽光的世界。「罪與罰」則與此相反，那是鬼氣森森，鬼影幢幢的世界；這兒除了貧窮，疾病，罪惡，痛苦之外，幾乎一無所有，因此它的空氣是惡濁的，非常的。我們展讀此書，彷彿在着但丁「神曲」中的「地獄」。是的，這書極像「地獄」，「把一切希望拋掉吧，你們這些進來的人！——當我們隨着但丁步入地獄之門，我們立刻便被悲慘黑暗的霧氣包圍住；這霧氣不斷纏繞着，直到我們從撒旦的身下爬出地獄，望見星光為止。同樣，翻開這書，我們便隨着作者踏入鬼氣森森，鬼影幢幢的世界；這世界的盡頭便是這書的末頁，在那裏我們得到新生的消息，僅僅是消息而已。

但是，仔細一想，這書又不很像「地獄」。「地獄」的作者對於正在受難的鬼魂，至多只有悲憫，而並無半點同情之意。這書的作者則對於書中人物，既加悲憫，又予同情。很多人拿這書來比希臘悲劇，說讀了會使人起哀矜恐懼之情，因而滌除心中的惡念。這話用以譬說「地獄」，甚為恰當；用於此書，則未盡中肯；因為朵思陀也夫斯基跟但丁有別，並沒想拿他筆下人物來告誡讀者。他根本就

沒把犯罪的人當作什麼元惡大憝；相反地，他要我們相信那些人一樣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他何以有此偉大的心胸呢？這就不能不研究一下他的生平。

朵思陀也夫斯基於一八二一年十月二十日生於莫斯科。他父親是個貧寒的退伍軍醫，共有兒女五人，朵氏居次。從幼年起，他便患着癩症，不時發作。一八四三年，他畢業於聖彼得堡軍事工程學院，名列第三。一條高官厚祿的坦途擺在他的面前，但爲了酷嗜文學，他終於在翌年父親逝世後，棄掉原有職務，來從事寫作。他所仰慕的文人是果戈爾、普式庚、巴爾扎克和喬治桑。一八四六年，他的第一部作品「窮人」發表於詩人尼克拉索夫主編的雜誌裏。這書深得尼氏及批評家白林斯基的讚賞，出版後果然一舉成名。以後的三三年間，朵氏連續發表了十幾部小說。這些並沒增加他的聲譽，只使他更爲貧困和苦惱。一八四九年四月，他忽然被捕了，原因是參加了一個專門討論傳立葉和其他經濟學家學說的所謂革命團體。跟他一起被捕的有三十人，他的一位兄弟也在內。八個月後的一個清晨（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和其他二十一位囚犯被綁到彼得堡城內一個方場裏去執行死刑。在嚴寒的天氣裏，他們穿着汗衫，等候槍決。結果在行刑前一剎那，沙皇的命令下來了，把死刑改爲流刑。聖誕節前一日，他們出發到西伯利亞去。整整一個年中，他「彷彿被釘在棺材裏，拿去活埋」（這一段經歷記載在一八六二年出版的「死屋回憶錄」中）。出獄後，他又在西伯利亞當了三年的小兵和一年的軍官。一八五八年，他跟寡婦伊莎萊英結婚。夫婦倆吵吵鬧鬧地過着日子，直到幾年後寡婦死了爲止。一八六二年至六六年是朵氏一生最痛苦的時期。這時他死了夫人，死了哥哥，身上百病交集，辦雜誌又折了本，爲了避債，不得不到國外去流浪。

就在這貧病交逼的情況下，他的第一部傑作「罪與罰」出世了（一八六六年）。不久，他又跟一位女速記員斯維特庚小姐結婚。這一次內助得人，他的生活史便大大地改觀了，最後八年乃得在比較安樂的環境中渡過。一八八〇年俄國京城的普式庚紀念碑揭幕典禮，集全國著名文人於一堂，朵氏即席發表了一篇關於俄國文學和俄羅斯人民的將來的驚人演詞，激動了無數人心。翌年正月二十八日，他病逝於彼得堡。出喪那天，參加執紼的有四萬人。他的一部未完成的傑作「卡拉馬索夫兄弟們」，就在那年出版。

從上面簡單的敘述裏，可看出朵思陀也夫斯基是個怎樣苦命的人。我不會拜讀過王世貞的「文章九命」，不知道裏面所刻畫的千古文人的境遇悲慘到什麼程度。但我想朵氏一生的遭遇也够得上稱爲悲慘的了：他生了一輩子的病，坐過牢，上過法場，流配過邊遠區域，娶過不忠於自己的女人，負了一生一世還不清的債，又會遭過各方面的非難；倘不是晚境尚佳，那真可說是一坎坎坷終身了。這樣的人最易成爲憤世嫉俗的小氣鬼，朵氏却是個例外。他不特未曾爲了吃盡苦頭而痛恨人類，他反而因此覺得芸芸衆生的可憫。放到西伯利亞去的那幾年，他日夜跟一羣兇惡的囚犯生活在一起，得到一個結論：犯罪不是一種愆尤，而是一種不幸。假如說但丁到地獄去是爲了求取個人靈魂的解脫，朵思陀也夫斯基到西伯利亞去却是十足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慈大悲的精神。這種精神充分表現於朵氏所有的作品中，尤其是一「罪與罰」。布慮克納（A. Birner）說過：「世界文學史上或許有比朵思陀也夫斯基才力更大，聲望更高的人物，但比他心肝更熱烈更富於情感的，那却決不會有。不是在「浮士德」，而是在「罪與罰」裏，「人類的全部苦難」抓住了我們。」（見所著「俄國文學史

「這些不是溢美之詞，是句句有根據的。讓我們先來看看這書的故事吧。」

主人翁拉斯考爾捏考夫是個因貧寒而失學的法科大學學生。在困苦中，他忽動奇思，以為自己具有和拿破崙一樣偉大的性格，成大事者必須不計細行，世間的法律祇是為庸庸碌碌的人而設的，不足以範圍豪傑。於是他決定去暗殺一位以放債為業的老寡婦，預備劫取她的財寶，以發動自己的事業。在實行這個計劃以前，他遇到一連串不愉快的事情。首先是他在酒店中碰着一位名喚馬麥拉道夫的酒徒，從談話中得知那人一家的慘狀。其次是接到母親的來函，訴說着他的妹子在人家當家庭教師怎樣遭東家的欺侮，後來又怎樣匆促地答應跟一位陌生人訂婚。最後是在出行時，眼見一位少女被人灌醉了酒，要施以非禮。這些事情間接增強了他謀殺的決心。終於，在一個黃昏裏，他把那位老寡婦用斧頭砍死了。這時他纔發現自己並不像拿破崙，因為他行兇時的心境遠非事先預料的那樣平靜。在極度的慌亂中，他不特未曾奪取多少財寶，甚至還連帶殺害了寡婦的妹妹。事後他更恐慌得厲害，把劫來的東西埋在一僻靜的院子裏，竟昏迷不醒地病倒了。這時幸虧有一位名喚拉蘇密金的同學特來照顧他。幾天後，他的病雖已脫體，而精神反彌見恍惚，有時狡猾異常，有時則險些要把心中的秘密全部吐露出來，因此引起了警察局中人的注意。為了心中苦痛，他直想離羣索居，朋友的善意固然不予理會，甚至母妹來了也遭到他的厭惡。好幾次他想投河自殺和上警察局裏去自首，最後他決定向一位妓女供認一切。這妓女名喚索妮亞，是酒徒馬麥拉道夫的女兒，爲了要救活全家的人，她纔情願犧牲自己，投入火坑的。索妮亞勸他自首，並表示要跟他一起上刑台。他掙扎了一番之後，把母妹付託給好友拉蘇密金，真的便自動投案了。他被判到西伯利亞去充當八年的苦役，索妮亞履行諾言，陪他同去受難。在最初的一年裏，他心中快快不樂，對於索妮亞十分冷淡。後來病了一場後，他忽然愛上了她

，雖然還有七個艱苦的年頭在前面，新生的活力已降臨到他們心上來了。

從正面看來，這書似乎只有一個主題：犯罪的人怎樣發現自己挑不起罪惡的重担，因而被逼着去尋求自新之路。這時正是虛無主義流行的時代，據說在巴黎以及俄國各地，便有一班學生，活像拉斯考爾捏考夫，想以行兇來考驗自己的勇氣。作者是個篤信宗教的人，似乎要借這書來攻擊虛無主義。他在這兒告訴我們：一切兇殺的案件都起因於不敬畏上帝；兇手於行兇前，每自以為是個超人，犯了罪後，纔知道自已一樣的會日夜提心吊膽，痛苦不堪；這時惟有藉宗教的力量，纔能把自己從罪惡的深淵中救起，送上自新的道路。書中的索妮亞便是代表着宗教的力量。關於這方面的見解，我們不必多加評論。早就有人指出，朵思陀也夫斯基的思想是不澈底的，甚至也可說是反動的。對於怎樣撲滅罪惡的問題，他不往改良社會環境方面着想，而只注意個人的思想和信仰，這自然是重大的錯誤。但是這書也有其非常偉大的一面，便是把社會的黑暗面毫無掩飾地給暴露出來，讓我們知道貧窮、疾病、罪惡，這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它們中間又有怎樣連帶的關係。書中最動人的一幕是拉斯考爾捏考夫突然跪在索妮亞的身旁，吻着她的腳，然後對着這驚惶失措的女人說出下面的話：「我並不是跪你，我是向集中在你身上的全人類大悲哀下拜啊！——其實這正是作者自己所要做的，他寫這書的目的便是向受難中的人羣致敬。他自己已經過千災百難的，所以他深知悲苦的滋味。不然，他怎能把馬麥拉道夫一家的慘狀寫得那樣活靈活現？有些批評家認爲作者的才力不够廣大，祇能描寫悲慘的場面，不知人間還有光明愉悅的一隅。我們却以爲這正是作者人格偉大的地方。當「悲慘的場面」還未絕迹於人世的時節，試問這一「光明愉悅的一隅」值得我們浪費筆墨去歌頌的嗎？」

這書的寫作是在「心理小說——一個名詞發明以前，但後來的心理分析派的小說，比起這血與淚的

紀錄來，全都顯得單薄虛幻。這自然大部分要歸功於作者卓絕的天才。他有那種探入靈魂深處的本領，跟一般專在意識外層作浮光掠影式的分析的作家截然不同。可是，這中間還有技巧的因素存在着。原來朵思陀也夫斯基不像後來的「意識之流」派的作家。那些作家專喜作抽象的分析，一部作品裏，除了川流不息的所謂意識外，什麼也沒有。這些意識因爲是架空存在的，所以跟天上的浮雲一般，顯得飄忽不可捉摸。朵氏似乎預先看到了這一點，他不肯憑空刻畫意識，而要讓外界具體的事件來反映意識。這書從頭到底寫的是拉斯考爾捏考夫的心理狀態，計分三段：行兇的前後和過程。在行兇以前，作者借着馬麥拉道夫一家的慘況、他母親的信、和被灌醉的少女這一連串的事情，來反映兇手心中越來越緊的惡劣情緒。在行兇的過程中，不用說，兇手的全部心理都在他的一舉一動裏面反映出來。行兇後的事佔全書六分之五，這時兇手的心思簡直倏忽無定，變化萬端。作者利用着他和警察局中人苦苦掙扎的機會，來反映出他心中恐慌的情形；又借着他和母妹及密友酬對的情形，來反映出罪人渴望離羣索居的心理。總之，這書到處都在描寫心理，而寫法一點也不抽象，這是朵氏在創作的技巧上獨具匠心的地方。

假使我們再仔細地把這書研究一下，我們可以發現它乾脆就是由兩種戲劇拚合而成：一種是描寫心理狀態的主觀戲劇（the subjective drama of spiritual states），還有一種是注重情節和動作的客觀戲劇（the objective drama of plot and gestures）。從技巧的觀點來看，這書的重心是放在主觀戲劇上面的，因爲它所要表現的主要的是兇手在行兇前後和過程中的心理變化。但是與此並行貫串全書的還有好幾條線索，如兇殺案的追究與水落石出，馬麥拉道夫一家的遭遇，兇手之妹與斯維德立格諾夫和盧迅二人的糾紛等，這些都屬於客觀戲劇的範圍。主觀戲劇好比靈魂，缺少了它，一部小說便不會

（下接第十二頁）



# 北美重遊 (五)

陳達

## 勃倫德遠東協會 (三六、六、一)

勃倫德大廈 (Brent House) 是長老會的產業，紀念牧師勃倫德氏，外國人特別是大學生介紹後可以在此住宿，收費頗廉。因心即囑余下榻於此，因心的寓所離此甚近，往還極感便利。余預備演講稿時，在因心處用飯，因心自己煮飯，既便利又經濟，余藉此可以避免熱人，得專心撰稿，因余在美國東部時，每日忙碌，無暇準備演講也。

遠東協會每逢星期日正午舉行聚餐，聚餐時會長沈門夫人 (Mrs. M. D. Sinnann) 為主席，凡第一次參加者由會員介紹後，站起身來作簡短的演說，今日聚餐者約三十人，最遠者來自印度，最近者為一美國人，其寓所離此僅三街。

## 芝校社會系茶會 (三六、六、六)

余於芝加哥大學公開演講完畢後，社會學系主任步濟時教授與其妹在 Hull Noyes 舉行茶會，雖大學已屆一季終了，一般人忙於考試，但教授與研究院學生參加者尚有一百餘人，如 Prof. and Mrs. R. G. Tugwell, Prof. and Mrs. W. F. Ogburn, Prof. and Mrs. A. P. Scott, Prof. and Mrs. H. G. Creel, Prof. and Mrs. D. H. Leavens, Mrs. E. Hughes, Prof. W. L. Warner, Prof. Prull, H. Douglas, Prof. H. G. Idhamer 當日所用者為中國紅茶，並以桃酥為點心之一。烏格朋教授為主席，其介紹詞的一段有云：「今日的客人是我三十一年前的老朋友，當時他在麗德學院肄業，麗德學院的學生，要他談些初到美國的印象，因為他是中國人，講些很客氣的話，美國頗值的少年要懇求他加幾句老實話，他就提出印象兩種，(見北美重遊(一)序言)……」我從前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肄業時，當時社會學系有榮譽俱樂部，是愛莫主任教授吉庭史的學術團體，即以教授名字的縮寫為名，通常稱為 F. H. G. (Franklin Henry Giddings)，每隔兩星期在教授家中聚會一次，會員係教授的同行朋友，或成績優異的受業學生，這些人畢

業已久，或在社會服務，或在大學任教者，教授在哥校任教三十餘年中，到那時止，選出優材生約一百人，烏格朋與余俱為會員，余為會員中最幼者，一九二二年夏，年會聚餐時，係在紐約市一旅館舉行，烏格朋教授為主席，余為講員之一。那時他亦向我開玩笑，今日由芝校社會學系的茶會，我聯想到二十五年以前哥校開會的情景。

## 烏格朋教授 (三六、六、九)

烏格朋教授 (W. F. Ogburn) 於一九四七年春季在魯意西安拿拿大學任教，六月初返芝加哥，其住宅即在勃倫德大廈對面，晚飯後余被約至其宅，見扶梯旁懸掛家人族人照相，已亡者及生者俱有，有一攝影為其內姪女，我嘗記得戰前某年耶誕節，教授贈我全家照相一件，內有此女士相，長子 Reynolds 戰時從軍於印度，和平後至昆明，一九四五年秋，曾兩度來呈貢文廟，現服務於上海聯合救濟總署，二子 Fielding 在華盛頓任化學工程師之職。其書房在樓上，另一部份書籍即置於客廳內。教授謂近年來書價略漲，有些書籍，用小版書印行，以廣銷路，例如 Path Benedict's: Patterns of Culture，實三角五分即可買一冊，戰前須實二元五角，屋後有草地，教授每逢星期日，往往自己耕種並栽花。

星期日下午教授與其夫人，在住宅中舉行茶會，來賓中有 Prof. P. H. Douglas，在麗德學院肄業時曾授余經濟學，今日提起 R. T. Ely 早在 Johns Hopkins 任職，某次演講，由 Schornberg Handbook 採取材料，但未指明來源，洩氣學生 Verblen 一日當眾宣言曰「先生的翻譯有誤」，Ely 不悅，將其逐出於研究院，據說一生並無出色的演講或有價值的著作，但因與學生合作而顯其名。聽說 John R. Commons 早先於肄業時亦是被學校除名的學生，但到衛司康新大學任教以後，因與學生合作而亦成名。

Prof. Mac Naiv 今日重新申述其擬再赴上海研究的計劃，因一九四六年秋，我國時局不靖未成行。九月初旬，余在華盛頓市，遇見烏格朋夫人時，謂渠已不幸因心病發而逝世。烏格朋教授的辦公室有內外兩間，外間有許

多文件櫃，內藏材料及單行本等，書記亦在此室。內闢為自己書房，壁間有書，桌上無片紙隻字，清潔異常。旁置一睡椅，每日午後小睡，烏格朋教授云：「Social Trends」共出十冊，研究費總數為八十萬元，這種工作完成以後，不論何人俱可參考，因只有事實而無結論，因此最守舊的政治家與最激烈的共產黨都能參考，副總統華萊士及社會計劃委員會，俱常以此為主要參考材料。「社會變遷」一書為其成名之著作，於一九二二年出版，銷路不大，但自出版以來，已歷二十五年，每年銷四百或五百本，教授曾與 Ninkoff 教授合著「社會學」一書，其銷路頗大，有幾年特別賣得多，那幾年每年二人可共得版稅一萬元。

烏格朋教授云：「學者的重要目標，是要向新的方向努力，如果僅從舊文獻裏找些新解釋，雖不完全是無益之事，但於推進知識的貢獻往往不大」。

教授贈我新書一本，名曰 The Social Action of Aviation 近來更進一步研究原子彈的社會影響，自謂須三年以後才有結果。他說第一個飛渡太平洋的飛機師，後來就是反對孤立主義者的健將。又反對威爾遜總統者如能預料飛機的用途，提早使美國加入國聯，或者可以影響國際間的關係。目前有些人利用飛機，作人為的下雨或下雪，分明飛機可以影響農作物的收成。

余謂飛機對於中國社會也要發生重大的影響，在前清時，雲南到北平來參預京試的考員，旅行所需的時間往往在兩個月以上，現在自昆明至北平的飛行時間僅七小時。

烏格朋教授認為研究工作應注重科學態度，這種態度與實行家的態度是不兩立的，前者是學問家，後者是社會改良者。一個人只能抱一種態度，至少兩者不能同時兼而有之。記得吉庭史教授曾經說過，只有英國著名化學家與物理學家弗來特 (Michael Faraday 1791-1867) 可以同時為研究者又為實行家，有人問他，何以能如此？他說他有兩個個性，一個管實驗室，一個管雜辯術，他任何時候，只用一個，在實驗室裏不雜辯，在雜辯場中不採用實驗的態度。

烏格朋教授介紹我在方場俱樂部用餐，此俱樂部的會

員，是芝加哥大學的教職員，內有餐廳，遊藝室，圖書室，網球場等，余大抵在此午餐，逢星期二午餐時，社會學系在此舉行系會，余數次被約參加，我的印象是，他們平常在短時間內討論一個問題並解決之，所以不浪費時間。烏格爾夫人云：近年來有三大學來約其丈夫任校長，俱遭拒絕，內有一校在南部，離家鄉甚近，頗有戀戀不捨之意，烏格爾教授自以為不適宜於充任校長，據其所述大學校長應有三種資格，彼無有焉：(一)校長應善於交際，(二)長於演說，(三)並能籌募經費。

### 密歇根省立大學(三六、六、十八—二十四)

由芝加哥坐火車，約五小時半到密歇根省新市(Lansing)，老友李紹昌與其夫人黃芝愛女士在站相候，芝愛自駕汽車，東行三哩即至省立大學(Michigan State College)所在地，此校成立於八十九年前，校園五〇〇〇畝，面積之大在美國各大學中列第十三位，校分六院即(1)農學院(2)商學院與公眾服務學院(3)工學院(4)家庭經濟學院(5)文學院(6)獸醫學院，戰前有學生五千人，現有學生一萬三千人。

紹昌原任致於夏威夷大學，於一九四三年來此，夫婦住於「國際聯誼社」，此社有社員一六〇人，內有中國學生四十人，其十分之一來自浙江大學，晚餐後余等散步，驚聞校鐘奏三民主義曲，乃 Murphy 氏主動，此人不久即步行至聯誼社前首，笑曰：「諒君等必樂聞此樂耳」。彼以獸醫為專修科，有意來中國服務。

### 青年人的政府(三六、六、十九)

根據多年的習慣，中學生每年舉行公民教育的訓練，由 American Legion 主辦，其目的為訓練少年對於行政的經驗，訓練期為八日，今日為末日，男學生九〇〇人在此校舉行，女學生在密歇根大學舉行，男學生結隊到省政府去，一個學生被舉為省長，執行省長職務，其餘被舉為省政府各級職員，各人分別執行職務，晚在校園內舉行隆重的儀式，稱為 Wolfertine Boys State，假定這是美國第四十九省。

### 雷馬教授談通貨膨脹(三六、六、二十)

密歇根大學離此約六〇哩，芝愛駕車於一小時內開到。紹昌與余往訪 Prof. Carl Remer，此人戰前在上海約翰大學任教十二年，著作中的一部討論華僑匯款，和我的興趣相似，但彼研究其經驗影響，余則注重匯款的社會

意義，則觀點略有不同。抗戰期間，曾在重慶相遇，彼認為我的人口研究，對於我國戰後的經濟與社會建設，有相當重要的關係。

雷馬氏以為我國通貨膨脹，尚不如德國之烈，德國有一個時期，商品不標市價但列一原價，其下則注明倍數，因物價增加太速，不算其價而算其倍數。通貨膨脹的最惡劣影響，是消滅整個中間階級，德國的大學生，自歐戰國家的前途沒有出路，紛紛加入國社黨，這是希特勒政治上政治舞台主因之一。中國的通貨膨脹，近來愈形加速，一九四六年的入口貨，超過出口貨約八倍，實係物價不斷上漲不可避免之惡果。

雷馬教授的承繼女，是李升伯兄的女公子，近與密歇根大學一個中國學生結婚，在其宅行禮，並在其宅小住。

密歇根大學及其附近，巨樹成林，有些街道終日不見陽光，雷馬氏曰：「此市可稱為樹林市」，因其到處多樹，相反的密蘇里省內無樹，因此該省往往大風為災。

### 牛生雜記(三六、六、廿)

紹昌對於我近著「浪跡十年」一書深感興趣，出示其性質類似的「牛生雜記」，民國三十年上海青年協會印行，余觀其下面所述一節，頗能反映其人格：「一九二四年，在(檀香山)春季始業第二日(夏曆甲子年正月初六)父親來函云：舊日向人所借之款，債主日日催還，雖有婉言，亦不動聽，幸賴值債表姊挪借三百元，方能過年關，現在清盤計算，欠人四千餘元，每月利息六十元，若不從速清還，恐名譽掃地矣。今日再四籌思，開誠與汝兄弟商量，可否由汝兄弟在美担任揭供美金二千元，一次匯來還清」。紹昌於三月五日向檀香山華美銀行揭借美金四千元，匯家還債，自述云：「為父親清還一大部份債項後，余頗難感措措，但心甚樂，愛妻與余，以後能專心服務於人矣」(第一八六面)。

### 牛羊園與游泳池(三六、六、二十一)

學生劉永濟，伴余參觀牛奶場，晨間擠奶工作完畢，正有人在清掃擠奶室，此室的牛奶，極富於蛋白質及其他養料，我們到小豬試驗室，主持人以指定的食料，並每日稱其體重，有一白豬引起我的注意，謂某小豬身上有蛋，數星期內減輕其體重的十分之一。其次參觀羊園，一週年的羊體重一三五磅，在我國未曾見過，有人正在剪羊毛，準備於九月內參加農博覽會。下午三時半劉與余赴游泳池，池水溫度為七十度，但

余在池邊遲疑甚久，不肯入內。查余自一九二三年離哥倫比亞大學以後，未曾入美國任何大學的游泳池。余性喜游泳，並喜用跳板，今日在跳板上嘗試亦是二十四年來的第一次，永濟善於游泳，余於感覺倦乏時亦往往行之。

### 留學制度(三六、六、二十一)

中國學生約二十人，到國際聯誼社來參加座談會，對於我國派遣學生赴美國求學一事，提出下列意見：(一)美國大學的課程，專為美國學生而設，有許多功課對於中國不適宜，他們大部份是農科學生，關於農科的課程有種種感覺，我認為很值得注意的，他們說：「有些中國學生，在課堂上往往得甲等分數，不過這些功課，在中國的實用不大」。這種是觀察敏銳肯用心思的學生，他們的見解，很值得我國教育當局注意。

(二)有許多中國學生，英文的準備不夠，所以往往不能充分了解教授的演講，以致他們虛擲光陰。

當討論進行時，有些學生提出以下的建議：(甲)我國教育部，對於留學問題，應有通盤的籌算，最好是委派留學生的經費，充實國內若干大學的內容，如購置科學儀器與設備，採購圖書等。(乙)把美國有名的教授，酌量邀請到中國各大學去講學。

有些學生認為目前的留學制度是浪費，有些認為是由於不信任我國自己的大學及其已畢業的學生。

我於三十一年前來美國求學，想不到今日我國的青年，還是要走這一條路，是因為我國大學教育沒有進步呢？還是教育政策(如留學制度)應該要改良呢？今日座談會裏所提出的問題，引起我對於上述這些項目，有更加研究的必要。派遣留學生是不經濟的事，戰前有人估計，政府供給一個留學生的費用，約等於十五個大學生在清華求學的費用。我國國庫拮据，不應繼續留學政策，對於節省經費是必需的。其次，留學生在外國暫居，據一般的情形講，很難學到有用的知識，對於社會科學我們早已知道留學是多費錢而少成功的，目前我們漸漸聽見有些自然科學的學生，特別是應用方面的，目前我們漸漸聽見有些自然科學的學生，特別是應用方面的，亦有同樣的感覺。誠如座談會所提出的辦法，但他們來講學必需要比較長期的，一般所謂訪問教授，於中國學生不能有多少幫助。比較更基本的，是充實我國大學的內容，大學之所以成為學府，以教授圖書及科學設備為基礎，除聘請外國籍教授外，我們還需要鼓勵本國的學者，努力研究，以期產生更多的更有學問的教授，其他添置書籍及科學儀器與設備是很明顯的，不過有些教育行政者對於這些往往是忽略了。

# 關外與關內·空間與時間

凌華

## 錦州遼陽的戰事

范漢傑兵團的北來，顯然表示中央對華北東北的重視，同時也就證明另一個傳說有幾分真實性，那就是：外國方面希望華北可支持兩年，掩護華南建設。范兵團已陸續開到秦皇島，傳說暫時指揮機構就設在那裏，至於詳細辦法，則要待東北華北聯防計劃確定之後方可決定。

范部第一軍團，方在秦皇島登陸，一部份開駐榆關，正發急電向南京索討冬裝的時候，東北的一個新戰事却又開始了。林彪部同時對錦州遼陽發動攻勢，而北平更傳說范陽情形也極緊張。共軍在目前這冬季是處于有利地位的，他們決不會讓冬天白白地過去，至少也要趁此時大量消耗對方，何況范兵團立足未穩，正可以趁此進攻。於是東北剿匪總部成立的前夕，遼陽錦州外圍便兵兵打起來了。

全出意料之外，到二月二日，錦州已經可聽到「清晰砲聲」了。同日，大虎山的爭奪戰也達高潮，「共匪獲自新立屯抽兵峰擁南下」，守軍雖以砲火反擊，可是因為砲隊的部隊受阻而無法到達，守軍便於「完成其戰略意義後」，在空中掩護之下，「向某地集中」。大虎山自國軍撤離後，復遭飛機轟炸，砲烟瀰漫，情況不明，而同時犯大虎山共軍則有一部已在四日南下，於是大凌河也就有「共匪瘋狂進擾」了。一度傳大凌河情況不明，但並未證實。可是共軍是由東而來，國軍為保衛瀋陽段最重要的大凌河橋，原在河東堅守，到四日則「為集中兵力，阻止共匪行動，故向大凌河西集結，固守車站，並與錦州國軍保持聯絡」。大凌河橋已失守，這段鐵路在最近半年內就不會再修好了。

幸而錦州有范漢傑的援軍自山海關開來，雖二日到三日一度緊張，五日就有一部份援軍抵達，形勢略見穩定。官方認為保衛錦州是沒有問題的。不過還沒有兵力可以大量增援大凌河，却是事實，而共軍却自大虎山方面增來了山砲，「匪兵力陡增」，其後則消息不多了。

另一方面，遼陽外圍共軍從南北兩路進攻遼陽孤城，自一月廿一日起，國軍也如錦州情況一樣，賴空軍助戰支持，三日共軍已到城郊，北平世界日報二月五日登載四日晨三時遼陽情況不明的消息，到翌日又更正；另外方面也說一切消息從四日起是空軍偵察來的，五日遼陽是「火光冲天」，但其中心據點「仍為國軍固守中」云。

在遼西激戰中，同時受到「共匪殘部竄擾」的，有營口、葫蘆島、和瀋陽間的重鎮、新民。瀋陽方面，「形勢自三日起又轉緊張，四日瀋陽已可聞清晰的砲聲。東北空運補給，連日顯呈忙碌」。至於吉長方面，政府又特別注意起「難民還鄉隊」來，探所謂「三保三取政策」。三保是保鄉保家保命，三取是「錢取之於富戶，糧取之於共匪，鎗取之於共匪」。糧取之於「共匪」，我們還不覺到奇怪，都市農村對立加甚時，歐洲也有過下鄉搶糧的先例，而鎗也要「取之於共匪」，就令人不勝詫異了，看起來好像一切生產事業都要對方來搞，而自己只管消費的極子。

## 關內關外的聯防

東北如此情形，怎麼辦呢？第一，「國軍在華北最精銳之空軍，均已飛抵瀋陽」。第二，范漢傑部不稍喘息，即赴東北，由上海空運大批冬裝到天津。第三，關內冀東軍隊抽調出關。

我們再談到關內外聯防問題。傅作義就任華北剿匪總司令後，就遇到涇水之役，一百輛卡車沒有回來。傅作義在電話中對軍長說：「一定要把卡車拿回來，結果連軍長也沒有回來。在這一戰役之後，中央就有意要關內外聯防，這意思就是說由范漢傑自由調動冀東的部隊，傅的名義雖大，實際轄區却要變得很小一些。中央的說法是：關內外軍隊自由調動，活用兵力就等於增加兵力。遺事經過羅卓英范漢傑來平，方案就由陳誠帶京。大家推測，范漢傑的名義這一下要確定了，傅作義的支配地域也要重新確定一下。

## 一方「死守」他方「零吃」

冀東的軍隊如出關，而冀東有事又怎樣辦呢？答曰：可以調用傅作義的察綏健兒。這幾個軍的察綏健兒真是能者多勞，目前在守着平津保三角地區。對抗着這四個軍的是最榮臻的部隊。最榮臻的部隊在冀中、冀西及平津線左右的，原為四個縱隊（傳說每縱隊十萬人），最近已增加到六個縱隊以上。縱隊之外，另有兩個獨立旅。一個記者述說這種擴充的原因，道：

「國軍的行動，遵守最高當局的原則：『死守據點』；共軍的戰略是迂迴運動，主力在東西南北忽忽不定的集中使用。死守命令的嚴峻，使據點的守軍為了責任問題，一方不敢輕易移動，只好「挨打打」，直至打光了為止。不被打的據點，眼看著「鄰居」被打以至於消滅，而自己不敢應援，終至等着「打」的來臨。這種「死守」的辦法，雖然丟了涇縣，完了石門，華北各大

小據點一個一個的被侵蝕，好的軍隊，好的裝備，一團一營的被消滅被吃光，而兩年來這死守的老套，並沒一點改進。……這零吃與被零吃之間所得的結果是：國軍的官長方面，時時感到身邊的危險，死在一個據點中心魂不定，對守攻猶豫莫決；士兵們因各據點一個個的被消滅，對自身的力量誤會過低，對共軍的威力估計太大，因此大家都懷了一顆恐懼的心。官長猶豫的結果，在作戰指揮上沒有決心，在平日部署上得過且過。士兵恐懼的結果，見仗之後，考慮的是自身的利害，而不是如何打擊敵人。」

最榮臻的軍隊決不會知道一地空虛而不來進攻，何況他的部隊又以善於急行軍著稱，民間傳說清風店之役，「殘匪」一夜间就走了百六十里。魯英廉本想比他們行得更快一些，不想賠了卡車又折兵。

二月四日的報上有這樣的一段消息：「冀西最榮臻的一縱隊，在易縣以東之塘湖整補。第二、三、四、六等縱隊在保定以南之安國、定縣、唐縣一帶整補，並揚言三週後再行襲擾」。據軍方人士稱，以目前情勢推測，其未來進犯目標，可能為保定（保定）。





中國經濟政治與文化的歸趨……樊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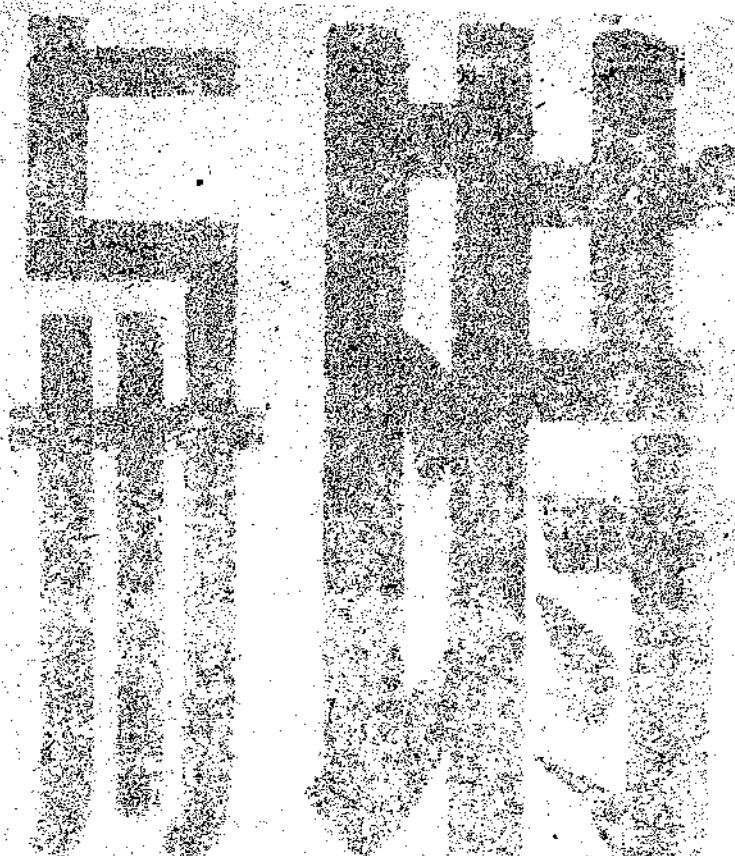
關於復興日本的幾種謬論……范承祥

一個大學生看大學教授……尹穎默

關於和談的幾陣旋風……林達懋

搶救教育危機……周行健

白米與白報紙……曹孟白



國立圖書館  
20

文 雜  
論打與(匪)  
改革幣制芻議……白宇  
監獄官司  
軍人風度……碧遙

北美重遊(六)……陳達

通 東北局勢的急遽變化……凌華

訊 北平的又一串搜捕事件……何經



## 關於和談的幾陣旋風

林達懋

這一週來，在京滬兩地突然連續括了幾陣旋風，都是關於調停中國內戰，恢復國共和談的。首先是二月廿一日合衆社轉述司徒雷登大使的談話：中國問題最可能之解決辦法爲國共重開談判；然而事隔一日，他又加以否認，而說合衆社誤會了他的聲明，所作推論並非他的本意。就在那一天，合衆社發出京滬電訊各一通，謂蘇聯官員、中國共產黨會與中國政府人員作「非正式」或「間接」的接觸；滬電且傳蘇方提出建議三點，一認爲可作調停中國內戰的基礎。先後對此說加以否認的，有行政院新聞局、外交部以及蘇聯駐華大使館。又過了一天（廿三日），路透社南京電說：「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稱：只有經由美國與蘇聯的共同調處努力，始能在中國以談判獲致和平。苟無美蘇的合作，中國的共產黨問題不能有和平的解決。邵氏並表示相信此一行動可能爲中央政府接受。」截至我寫本文之時爲止，未見邵氏否認此說。

第一，旋風之起由於低氣壓。此時突然流行和談的傳說，其事不足怪。傳說不止一個，來源不止一地，涉及不止一方（有國共美蘇），而且一再發生一誤會一與否認，這就統統無足詫異，倒是情理之常。因爲旋風之起由於低氣壓。請注意：我的意思，絕對不是說這些傳說真實可靠。新聞局說：「此事絕對不確，純係無稽謠言，意圖擾亂人心。」我則想補正一句：雖或一絕對不確，純係無稽謠言，然而謠言偏在此時連續發生，則的確完全由於南京這個政治中心與上海這個經濟中心正是目前低氣壓的中心地；如果散播這些謠言是有計劃的，目的在於「擾亂人心」，則顯然美國合衆社認爲此刻正是吹括旋風的時機。究竟低氣壓是怎樣釀成的呢？目前的內外局勢，尤其是軍事情況，便是明顯的答。是謠言也好，不是謠言也好，意圖擾亂人心也好，足以安定人心也好，反正謠言與否、人心如何，都與局勢密切關聯。

第二，此時國共和談難望恢復。世上本無不了之戰，最後終必出現和平。——不是屈敵而和，便是妥協而和。屈敵而和，就是要敵人「無條件投降」，完全貫徹了我的方的意旨。這在今天內戰場合，當然還談不到。妥協而和則必須先有妥協的基礎。沒有雙方妥協的基礎，而高唱妥協，便是一相情願，和平絕對恢復不起來的。以目前國共敵對的程度而論，以當前國共敵對的形勢而論，都顯然沒有妥協的餘地。

第三，然則是否可能如邵秘書長所說，經由美蘇共同調處，而促成談判獲致和平呢？我們應知道，美國縱令有恢復中國和平之意，她所希望出現的新政府也必定仍是她所能夠控制的政府，換句話說，必須是國民黨佔着上風的政府，否則她是寧願中國永無和平的。至於蘇聯，我很懷疑她肯在此時捲入中國內爭漩渦。合衆社所傳蘇聯所提三點建議，即：（一）中共須控制政府；（二）國民黨不受壓制，但應在政府中佔少數黨地位；（三）中國軍隊的改編應完全由共軍負責，不但不是中國政府

與美國所能接受的，同時，我並且非常懷疑蘇聯會提出牠們來。因爲如果這樣一提出，便立刻造成一種印像：蘇聯要使中國共產黨佔住上風。那末美國之加緊援助國民政府，不是更能振振有辭了麼？蘇聯何致如此其傻？再說：若美國對蘇運用壓力，轉使中共讓步吧，那也是做不到的。因爲：第一，蘇聯對遠東一隅向來不常說話，所以美國對蘇也無從使用壓力；第二，馬歇爾最近在衆院外委會答覆議員詢問時，還說：「共產黨自中國之外獲得援助一點，並無證據。」然則又如何好叫蘇聯對中共運用壓力呢？

「和談」旋風之來，由於低氣壓；然而即使旋風轉瞬即逝，却未必便是氣壓發生變化。美國似乎充份懂得這一點，所以司徒雷登大使說道：「美國正予中國以援助，以期中國在或可獲得其他根本解決辦法之前，美援可予中國以暫時之紓解。」

## 搶救教育危機

周行健

教育是一百年大計。也許正因爲它是一百年的一大事，在這戰火漫天的時候，政府除了消極的統制以外，是很少把它打在算盤之內的。然而既然是一個國家，就不能沒有教育，於是教育就這樣不死不活地維持着，教育經費在國家的總預算裏，僅祇占到百分之三到四。

儘管政府公佈的憲法裏堂堂皇皇地寫着：「人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可是今天究竟有多少人能入學，又有多少人被關在校門以外呢？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這學期上海各校收費的標準據公布是比上學期增加了四倍，大專收費五百四十萬到七百二十萬，高中私立四百萬，公立一百七十四萬，初中私立三百廿萬，公立一百四十五萬，小學私立二百萬，公立八十一萬。筆者有個朋友，家裏有五個孩子入學，一個已入大學，二個高中畢業，另兩個則分別在初高中肄業，這學期他要負擔三千多萬的學費，試

（下接第十二頁）

# 中國經濟政治與文化的歸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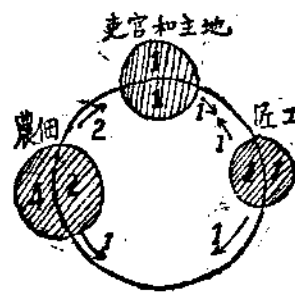
樊弘

中國的經濟、政治、與文化，受中國國民所得的主要生產手段的進化決定，這是無可置疑的一件事。從純粹的理論上說，一國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關係一國全體國民的生活。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一旦起了變化，全體國民的生活必要發生變化。全體國民的生活既然發生變化，當然他們在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思想與行動勢必也要發生相應的變化。未必道還有什麼疑問麼？更從歷史的事例上說，在一國的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尚停滯在土地萬能的時代，她的經濟必然是地主的，政治必然是君主的，文化必然是法天的。在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或在中古時代的歐洲，便是極好的例證。可是一國的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一旦跨入了資本萬能的時代，事態的變化便將從頭到尾的掉過頭來。她的經濟必然是資本家的，政治必然是民主的，文化必然是崇向人力的。在工業革命而後的英美法各國便是極好的例證。順着這個趨勢再往前進，假令一國的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又跨進了集體勞動萬能的領域，事態必然還要發生急劇的變化。她的經濟必然是屬於集體的勞動的，政治必為集體勞動所領導的民主政治，而文化必然是鼓勵、推崇和歌頌集體勞動的創造的偉力的。蘇俄便是一個可舉的例證。當然在這或徐或急的演變過程中，隨着各個國家的客觀的和主觀的條件的不同，無論在經濟上，在政治上，或在文化上，均有多少的介於兩個極端之間過渡的形態，恰如橫在兩個對岸之間的過渡的橋樑一樣，但這並無害於社會進化的主要階段。除非我們閉着眼睛說瞎話，我們纔會相信中國的經濟、政治、與文化，會不顧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的進化，而將永遠的停滯不動。

我充分的相信法國重農學派的財富循環說可以用來描繪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主要的生產手段的性質，和與之相對應的中國的經濟的機構。一來呢，是因為法國的重農學派的學說確係淵源於中國。二來呢，法國的重農學派的學說與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財富的生產與流通的情形幾乎完全相同。我所最感到驚異的，即中國雖有重農抑商的政治主張，但對於在中國農村的社會裏的財富的生產與流通的情形，幾乎完全不明瞭。除非借鏡於法國重農學派的財富循環說，我們對於中國的農村社會的知識的不足是絕對無法彌補的。

重農學派確是太偉大了。依據梭內(Orsini)大師的意見，在土地經濟時代，國民所得的物質生產手段有兩種：(一)土地和(二)器具。在這兩種生產手段之中，只有土地能生產淨餘。器具是不能生產淨餘的。人在器具上加工所生產的生產物，除了維持直接生產者的最低的生存外，是不能生產淨餘的。

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經濟結構



。但人在土地上加工，其所生產的物量除了維持直接耕種者而外，尚可養一個地主階級。因此地主階級便應運而出。伴着淨餘生產物和其他的財富的生產與流通，在經濟的機構內，產生三個不同的階級：(一)坐吃淨餘的地主和官吏的階級，(二)佃農階級和(三)工匠和小商人階級。梭內大師的財富循環說專在說明在這三大階級之間財富的生產與流通。現在我們可以舉一個例，來說明財富循環的實際情形。現在我們先說生產。假令在這三個階級之中，佃農階級每年投資三億(以糧食一石作為計算價值的單位)，生產五億。在投資的三億之中，兩億是糧食，一億是農具。而在他們的五億生產物中，四億是糧食，一億是原料。工匠階級每年投資兩億，生產手工工業品兩億。在投資兩億之中，一億是原料，一億是糧食。而在兩億手工工業品中，一億是農具，一億是上等的家庭用具。為什麼佃農階級能夠投資三億生產五億呢？因為佃農所利用的土地是生產能力最大的手段。反之，工匠階級所使用的只是生產能力較少的器具，如斧頭、鉋子、鐵錐、和刀剪之類。工匠階級所生產的只夠用來維持他們的生存。但佃農階級所生產的，除了維持他們的最低生存之外，尚可以其淨餘生產物養活地主和官吏。這是說生產。

其次說分配與流通。農人加工於土地既能生產淨餘，而土地在法律和習慣上又為地主所有，於是地主便有向佃農收取地租的權利。在我們這裏的舉例中，地主可向佃農收租兩億。工匠階級的器具是他們自己所有的，而且不能生產淨餘，所得兩億只夠成本，全以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我們知道，在佃農所生產的五億之中，有兩億糧食是要他們留作自己用的。這兩億是絕不流通的。其餘三億是要流通的。在這三億之中因有兩億糧食，農人須以之送給地主作地租，其餘一億是原料，農人是要用來交換農具的。地主於取得佃農兩億地租之後，留一億糧食來自己吃，其餘一億他們是要用來給工匠們交換上等家具的。恰好在工匠階級裏面，便有一億上等家庭用具要用來給地主交換糧食。經此交換佃農階級便開始交易了。因為工匠階級尚有一億農具要拿來給佃農換原料，同時佃農亦有一億原料，要拿來給工匠階級換農具。經此交換之後，佃農與工匠所投下的資本通通都復原了。他們又可從事再生產的活動了。佃農在其次的一

個年度裏再以兩億糧食一億農具生產五億農產品，而以兩億糧食為地租。工匠再以一億原料和一億糧食的消耗生產出兩億手工工業品。流通的過程再依照昨天的情形再度重複一遍，於是在這農村社會裏的經濟情形便得永遠的保持常態。

現在我們可以進而說明，中國的君主政治與如此的土地經濟的關係。

在土地經濟的時代，既然全體國民的所得，均要靠天，不但佃農的所得要靠天，地主的地租要靠天，政府的田賦要靠天，甚至連工匠階級們的收穫也要靠天。天之於人既然保有這麼大的威力，那麼，在政治上，最好是以「天子」為君主了。反之，人為的力量，在經濟上，既然生產的力量如此之小，在政治上，當然絕無崇尚民主政治的可能了。這便是在土地經濟時代，在政治上只有君主而無民主的主要原因。易繫辭上說：「君萬物者莫大乎天。」左傳上說：「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民也。」書經秦誓上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參看王亞南官僚政治與儒家思想，「時與文」二卷六期）老子道德經上說：「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都表示在土地萬能時代，因為在生產上是靠天吃飯，所以在政治上，也就形成一種天道政治或君主政治。

驟看起來，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君主政治，好像與歐洲在重商主義時代法國的專制政治相同，實則二者不是完全相同的。這個不同是很容易區別的。在歐洲重商主義時代，人為的專制較多。中國較少。在重商主義時代，法國的君主干涉人民的生產事業。但中國的君主不干涉人民的生產事業。凡是讀過歐洲的歷史的人都知道，在重商主義時代，法國哥伯提(Coblet)政府管理法國的製造業的法律共有八本，其他各國的政府干涉的程度較輕。那時法國的紡織工廠，在織布時所用的紗線，和布疋的寬度及染色，都受政府的命令規定。可是，中國沒有。法國路易十五常說「朕即國家」和「王權萬能」一類的諷旨。可是，中國的君主很少有這一類專制的口吻。他們所常說的是：「天子不取，反受其殃。」「予弗順天，厥罪為鈞。」為什麼中國的君主，比較重商主義的歐洲，其專制的成分要輕呢？因為中國君主只是土地經濟的產物，他的神聖的任務，只在維持土地生產力於不墜，而欲達到此目的，只須服從「天道」就行了。但法國的皇帝乃是商業資本的產物，他的神聖的任務，乃在管理生產、增加出超、和擴大市場，當然非訴諸於王權的擴張不可。正因中國的君主只在維持土地生產力於不墜，除了水利灌溉而外，幾乎不必有所作為，所以「無為的政治」便成了中國的一種理想的政治了。不但「不須」有為，而且簡直可以「無言」。記得論語書上曾載有孔子和子貢的一段問答，我想這頂好可以用來說明中國的無為政治的美妙：

子曰：「余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哉！」細想起來，在土地萬能的時代，全部國民的生活悉在維持如此簡單的財富的生產與流通。假如把這生產與流通的過程圓滑了，縱令君主終身不言，亦無所害。反之，假如君主不幸把這生產與流通的過程攪亂了，全部國民生活失了保障，縱令君主口若懸河，聲如洪鐘，並富有雄才大略，天下也是要紊亂的。這便是中國儒家和道家很輕鬆的倡導無為政治而得到了相當成功的原因。

現在我們可以進而談談中國文化的本質了。因為中國人全部都是靠天吃飯，而所謂靠天吃飯的意義又係在維持在如此的階級社會裏財富的生產與流通，所以中國的文化，於不知不覺之中，便洋溢着一種聽天安命的思想。誰都知道，中國文化的主要的特徵，便是力求人的精神的生活與自然合而為一。偉大的哲學家熊十力先生在其「略說中西文化」(「學原」一卷四期)一文裏說：「中國人唯反求諸己，而透悟自家生命，與宇宙原來不二。孔子贊易。明乾元統天。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莊生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灼然物我同體之實。」這皆表示中國人的最高的理想不敢與自然分庭抗禮，與她鬥爭，但把自然看做無限的偉大，恨不得與他結合而為一體。自然既是無限的偉大了，區區的人的小智站在自然的面前，好像一粒微塵站在天地面前一樣，除了五體投地的拜倒在她的足下外，別無他道。所以在中國人的哲學裏充滿着神祕的感情，而缺乏西方人邏輯的修養。這都是由於中國的哲人把自然生產力看做神明所引起的。這樣的哲學無疑的大有便利中國如此的自然經濟的維持與流轉，當然會得到全體社會，特別的是地主老爺們的歡欣和鼓舞了。

中國的政治與文化既係建築在中國的原始的土地經濟上，那麼，假令中國的原始的土地經濟有了變遷，中國的政治與文化也要跟着變遷了。是的，不錯。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自鴉片戰爭以還，隨着中國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的變化，便立刻起了變化。試問中國國民所得的主要的生產手段是怎樣變化的呢？

## 二

在這裏我們應該特別強調的，即中國的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始終沒有脫離土地萬能的階段。可是，中國國民的消費手段，除了糧食而外，早已經過私人資本萬能時代的資本主義的洗禮了。只是這種資本主義不是生長在本國的資本主義，而是生長在外國的資本主義就是了。這即是說，工業資本主義在歐洲誕生較早。歐洲自資本主義誕生而後，利用其龐大的生產的能力，增加商品的數量，在這日益增加的商品的數量中，除了給本國消費而外，所餘的部份便以中國為市場。隨着資本主義商品的入口，中國國民的消費的手段，除了糧食之外，便起了極大的變化。衣服、留聲機、影戲、紙張、牙膏、香水……汽車，幾乎無一不是外人所有的資本，即機器生產的物品。這即是說，中國人的物質的享受已經近代化了，可是，中國大部國民所得的主要的生產手段，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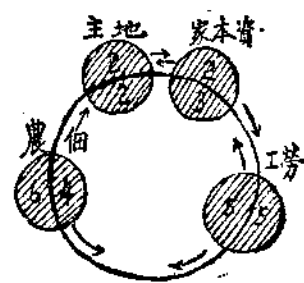


土地。從資本生產的關係上說，中國似乎需要資本家的民主。但從土地生產的關係上說，中國的政治不要民主而要君主，並不要歐洲在重商主義時代的萬能的極端專制的君主，而需要歐洲在中古時代的消極無為的君主。從資本家的生產關係上說，中國似乎需要一種反抗自然崇尚人力的文化，可是，從土地生產的關係上說，中國仍然需要尊崇自然的文化。崇尚自然的思想是神祕的，直覺的，和感情的。崇尚人力的思想是現實的，觀察的，和理智的。對這種經濟的生產關係的矛盾，同時便暴露出中國在政治和文化關係上的矛盾。這種矛盾的暴露從一個中國人看來，確是一個極其有趣的問題。即在政治上，中山先生主張民主，辜鴻銘主張君主，而康有為和梁啟超等則主張君主立憲。在文化上，陳獨秀提倡科學，張君勱提倡玄學，而梁漱溟和熊大力先生等則獨唱中西文化調和論。更有趣味的問題，即在中國的實際政治上，實際所表現的是既非君主亦非民主，而是一種掛民主的羊頭賣君主的狗肉的不像的民主政治。袁世凱是如此，段祺瑞是如此，吳佩孚是如此。……更有趣味的問題是，在中國的實際文化上，實際所表現的是，口裏提倡民主而實際上則深恐怕得不到一個主人來寵愛，或恐怕人民力量真起來。口裏提倡科學，實際上，則把科學來當做一種獵取功名富貴的勾當，深恐怕苦讀寒窗十數年，尚點不到一個翰林招牌，或得不到權威的領袖一官半職的賞賜。如此的政治和如此的思想的矛盾，我都想盡力在後文中詳細解釋。

歐洲的各大先進國為什麼就有民主，而中國為什麼就沒有呢？我在「觀察」第三卷第十四期上便會經大膽的宣言，因為歐洲會經過資本萬能的時代而中國沒有。因此中國便沒有民主，歐西就有民主。這即是說，伴隨歐洲各先進國的國民所得的主要的生產方法的進化，歐洲的經濟機構起了變化，因此，歐洲的政治與文化也就跟着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在政治上，由王權萬能的專制政治一變而為民權萬能的專制政治。在文化上，由上帝創造世界的宗教觀，一變而為人類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的進化觀。試問歐西各國的經濟的機構是怎樣演變出來的呢？

我們知道，在工業革命以前，一國國民所得的主要生產手段是土地，或自然，器具只占一個不重要的地位。可是隨着人類的物質生產力的進步，器具忽為機器所代替。器具與人類的勞動結合，所生產的貨物，經過交換的程序，其所得生活的資料只夠維持直接使用者最低的生活。反之，機器與人類的勞動結合，其所生產的貨物，經過交易的程序，其所取得的生活資料，除了養活直接使用者最低生存外，還可以養活一個新興的有閒的階級。因此，機器的所有便同使用分離了。機器的所有與使用分離之後，經濟的機構立即發生變化。在從前社會只有三個不同的階級：(一)地主和官吏，(二)佃農和(三)工匠及小商人。現在不是了。雖說地主和佃農的地位依然不變，但工匠和小商人的階級，隨着機器生產的革命便化為兩個階級去了。由是在社會裏便

歐西各國的經濟變構



有四個不同的階級：(一)地主階級，(二)佃農階級，(三)資本家階級，和(四)工人階級。在這四個階級之中，財富的生產與流通大約還與從前的情形相同，只比較複雜罷了。假令在這資本家的生產社會之中，佃農的生產因為人口增加之故，投資和產量均增加一倍，即佃農以六億的投資(三億糧食和三億農具)，生產十億農產品(八億糧食和兩億原料)，內中有四億淨餘農產品。資本家以五億的投資(兩億機器，一億糧食和兩億原料)驅使工人生產十億製造品(五億家庭工業品，三億農具，二億工業機器)。在一個生產年度裏，農人以四億糧食繳納地主作地租。資本家在工人身上榨取了五億家庭用具出來，作為他們的利息與利潤。生產和分配的關係便算完結。現在我們可以進而說明在這四個階級之間商品流通的過程。地主於得到四億糧食的地租之後，欲以二億的糧食交換資本家兩億的家庭用具。同時，資本家階級於得到五億家庭工業品的利潤和利息之後，欲以三億留作自用，二億交換地主的糧食。供給和需要恰相符合，二者均各滿足。工人在其所餘五億工具財中(二億工業機器和三億農具)，除以二億工業機器留作自用外，欲以三億農具向佃農交換一億糧食，兩億原料。同時，佃農在其所餘存的六億農產品中(兩億原料，四億糧食)，除以三億糧食留作日用外，欲以一億糧食和兩億原料去交換工人的三億農具。經此交換之後，農人和工人的資本均各收回，於是又可進行再生產了。

可是，假令資本家階級以五億的投資，驅使工人生產了十二億的工業品出來，在他的收益七億之中，除以五億作消費外，恨不得再以二億向佃農階級換取原料與糧食，以擴大他們生產的規模。可是，佃農的需要業已達到了飽和點，於是所餘存的這兩億，便非自為消費不可。然而資本家的生產的目的，並不在增加消費，而在累積資本，為達到資本的繼續累積計，資本家階級於是便不得不向中國或其他落後的民族來開闢第三市場了。事情尚不能只在這裏終結。設使這資本家的社會內，工人逐漸覺醒起來，不堪資本家的剝削，要求工資加三倍，於是資本家階級所餘的這兩億便不足以為擴大生產規模之用了。可是，在中國和其他落後的國家內，工資不但增加三倍，而且比一倍還要低，於是這個新興的資本家階級，不但是要以其所剩餘的工業品向中國交換糧食與原料，把中國作為一個商品的市場，而且要把這二億工業品在中國來投資，即把中國作為一個投資的市場了。假如此二億工業品只係消費品，則以之交換糧食與原料而以之作為中國工人的工資與流動資本。假如地係生產的機器，則以之作為在中國固定的設備，再以其方法所得來的糧食與原料補其不足。恰好中國又是一個原料與糧食出產的國家，富有廣大的勞動的人口，從歐西的資本家

的立場，他們確有向中國銷售商品和擴大投資的要求。但這要求要如何纔能滿足呢？這點留待以後我們仔細來解答。

本來歐洲在資本家的生產制度誕生以前，商業資本家早就有了，但這在政治上還只是立於一個附庸的地位。以英國而論，在工業革命以前，雖然已有所謂議會的政治，但這議會的議員全部均為地主和貴族所充任，商人是無權過問的。而且，在任何歐洲國家裏面，當着商業資本發達的初期，商人需要君主以其無上的威權來擴大市場，反而造成歐洲出現極端的專制政府的原因。新釘鐵的說，歐洲各先進國的近代民主政治還是在工業革命或機器革命以後的事。因為歐洲的工業已經革命了，資本家階級的經濟的勢力扶搖直上，可是政治的勢力無有。除非取得政治上的權力，資本家的生產的制度，便將無法保持與擴大。爲了維持和擴大資本家的生產制度起見，資本家需要向外國買進廉價的糧食與原料，可是糧食與原料的價格一低落，地主階級的真實所得便要減少。由是資本家和地主之間的矛盾便發生了。從地主階級的利益上說，非要提高穀物與原料的關稅不可，但從資本家的生產關係上說，除非取消或減少穀物與原料的關稅，資本家的生產制度莫由發達。這是地主階級和資本家階級衝突的第一點。又資本家階級還需要取得政權來鎮壓工人的階級，限制他們集會結社的自由，和取締他們對於高工資的要求。其三，資本家階級還需要取得政權來便利他們剝削婦工和童工，取消封建時代的殘餘的過境稅。凡此都不是地主們所願意去做的事。但爲了維持資本家的生產與流通的圓滑進行起見，資本家非要取得政權不可。恰好在工業革命之初，機器的產量若干倍於器具的產量，並因此大大地提高了各個階層的物質的幸福，當然勞動者也包含在內，於是資本家爭取政權的活動便爲大多數的民衆所擁護。此時他們的口號是「讓我們以我們自己的方法作自己的買賣！」——反對國家的干涉！——干涉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資本家階級要求民主政府的運動，聲勢日漸浩大，除非政府讓步，革命便要爆發，於是政府便只好讓步了，民主於是實現了。由此可見近代的民主制度在當初發生的時候，確是爲了促進資本家的自由和權利。所以近代的民主制度亦可稱做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也可以說，他是資本萬能時代的民主制度。

隨着機器代替人工的資本家的生產制度的發展，歐洲的文化也變動了。從自然與人的關係上說，人已獲得了征服自然的武器，——機械在手內，他不復畏懼自然了。他要面對自然與牠爲敵，並且要以科學的權力去征服牠。引一句最普通的話來說，就是，「科學即權力」。人自此便不再受自然的束縛而要求盡力的表現「自我」。不但在哲學上主張自我表現，在文學上主張自我表現，甚至在日常生活上也要求自我表現了。更從取得知識的方法上說，在土地萬能時代，在哲學裏，充滿着神學的味道；一般的哲人取得知識的方法是直覺的，感情的，體念的或反理性的。而在資本萬能時代，牠是分析的，理智的，外觀

的或批評的。一言以蔽之曰，資本家所需要的文化乃是一種有利於資本的維持和擴大的文化。這便是歐洲的近代的文化與中國的文化不同的原因。由此可見，中西文化的根本的不同，主要的是由於經濟機構的不同。而此經濟機構的不同又係由中國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的不同而來。在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和在工業革命以來的歐洲確是這種情形。

###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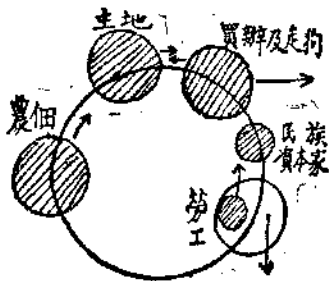
最可令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歐美各個先進的國家，雖然她們的國民所得主要的方法已經由土地萬能進步到資本萬能的時代了；而且在其本土以內，雖然因爲資本家階級已經起來要求民主，並且已經變成民主了；在哲學上，雖然已經要求自我解放或思想自由，而且已經達到自我解放和思想自由的階段了，可是，她們對於其他的落後的國家，從資本家階級的立場上說，則需要她們永遠的停滯在土地萬能的階段，而不許她們逐漸進化而至資本萬能的時代。因這最有利於她們的剩餘商品的銷售，和便利她們的資本的積累，或只使中國一類國家變成她們的投資地，便利她們的直接投資。剛才我們說過，在我們所舉的簡例中，在一資本家的社會內，假令有剩餘工業品兩億，在勞動的組織力不強和工資較低的場合，資本家們便要以中國爲商品的市場。而在勞動組織加強和工資增加的場合，他們便要以中國爲他們的直接投資的尾閘。爲達到前一個目的，在經濟的機構上，他們需要創造一個買辦資本家階級，來便利他們剩餘的商品到中國來傾銷，並吸收中國的低廉的工業的原料；而爲達到後一個目的，在經濟的機構上，他們需要創造一個寄生的坐吃股息的階級，以便利他們在中國來直接投資。在政治上，爲達到前一個目的，他們需要扶植一個媚外喪權的政府，來接受他們強制中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這個政府的主要的特徵就是無能和軟弱。爲達到後一個目的，他們需要扶植一個崇拜資本主義的政府，來鎮壓中國的勞動階級的反抗，來便利他們直接投資。這個政府主要的特徵就是窮兇和極惡。在辛亥革命的前後，他們所扶植的政府是北洋軍閥的政府。北洋軍閥政府主要的特徵就是昏庸與無能。在現在，他們所極欲培植的政府已經不是北洋軍閥的政府了，因爲北洋軍閥的政府太昏庸與無能了。牠的最大的優點只能便利他們的剩餘的商品到中國來傾銷和換取低廉的原料，但其窮兇與極惡的程度絕對不足以鎮壓工人的革命，以便利他們在中國來投資。在文化上他們更需要一批文化人，來謳歌資本主義的文明。中國根本沒有龐大的資本家階級，只有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和買辦，謳歌資本主義直接間接便有利於他們在中國來投資和經商。假如中國的名流和學者欲要取得他們的寵愛，並不需要真正的實學，只要天天叫囂中國需要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便行了。不幸中國竟有一批文化人中了他們的詭計。這確是最值得慨歎的！

返觀現在中國國民所得的主要生產手段，自鴉片戰爭以還，仍然還是土地。在外國的資本家的剩餘商品傾銷範圍內，確只成長了一個買辦的階級。他們

的獲取所得的手段，雖然不是土地，而是資本，但却非生產的資本，而係商業的資本。否！牠亦非正常的商業的資本而係買辦的資本。除此之外，在各重要的都市，雖然生產所得的手段已由器具而變為機器，且此機器生產的能力，除了養活直接使用機器的勞工外，尚可養活一個有閒的階級，但在這個階級之中，有些是不在場的資本家，他們是外國人，住在外國。只有一小部份才是中國的新興的資本家。還有一部份潛在的資本家階級，即是華僑，他是生長在外國，但不堪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很想到中國來投資。如果我們肯把中國今日的經濟的機構來與外國作個對照，那末，在中國經濟機構內，其階級共有五個：（一）地主階級，（二）佃農階級，（三）買辦階級，（四）少數的新興的資本家階級，和（五）工人階級。這與歐洲的資本家階級恰成立一個對照，有如下圖所示。中國的工匠和小商販階級現在已經不存在。但代替他的地位的不是中國的資本家階級，而係外國的資本家階級及其買辦和走狗，這便是中國今日的經濟的機構。

### 外國的資本家

鴉片戰爭而後的中國經濟機構



無職業者：土匪、流氓及傭兵

將中國今日的經濟機構明白之後，我們可以進而解釋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政治的性質。在鴉片戰爭的前後，中國的政府確乎是由無能和昏聩的地主階級所壟斷。當外國的資本家正欲傾注其商品到中國來的時候，這種無知與昏庸的政府，恰恰合於外國的資本家的要求。中國政府對外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都是在這種腐化無能的政府手裏締結的。歐洲的資本家在國內要民主，因這可與資本家的生產謀便利。在國外要阻撓民主或反抗民主，因這最有害於國外的商品市場的擴大。假令中國的民主政治成功了，中國的人民必定要以各種的立法，來保護中國的幼稚的工業。這樣一來，外國資本家的商品市場便沒有了，這豈不是對於他們的資本的積蓄有妨礙麼？外國的資本家不要民主，中國的地主階級亦不要民主，兩個反民主的勢力合在一起，中國的民主便沒有了。買辦階級的神聖的任務在於推銷帝國主義者的商品，帝國主義者既然不要民主，當然中國的買辦階級亦不要民主了。獨有中國的新興的資本家階級與華僑的資本家階級需要民主，因這實有便利於中國的資本家的生產制度的發達，這便是孫中山先生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時候，得到華僑擁護的原因。無如華僑不在中國。在辛亥革命而後，當選的議員大部都是地主。他們把當議員看做作官，因此，在袁世凱稱帝和以後的曹錕賄選之時，這些議員所表現的只在獲取功名富貴，而不在爭取人民的權利，因此民主便變質了。這便是中國的民主政治失敗的根本原因。佃農階級何如呢？他們實在遭受了雙重的壓迫。第一是，地主和官吏的壓迫。第二是，自帝國主義的商品侵入中國之後，中國的農產品

可以出口交換近代的工業品，於是地主階級對於佃農再壓迫，以圖獲得更多的農產品來交換洋人的奢侈品。工人階級與佃農幾約立於相同的被壓迫的地位，當然，在內心裏當然希望取得政權來改善他們的經濟的地位。可惜他們尚未覺醒並缺乏團結，因此，他們對於民主或不民主，亦不表示關切。正如張東蓀先生所說，自從民國成立以來，所有的選舉都為特殊階級所利用，只有民初一次選舉不由金錢買得，但即以這次選舉而論，自從民國十二年曹錕賄選成功，其結果亦是替特權階級作工具。這種說法當然是有道理的。

更從中國的經濟的機構與文化的關係上說，既然中國的地主和佃農均無自我解放的精神，並五體投地的屈服於自然的足下，不但畏之如雷，而且敬之如神明，而且中國的儒者又多係地主出身，當然他們要擁護中國的文化了。新興的資本家階級雖然喜歡聽取個人主義者的「一人力可以勝天」的學說，而且新興的士大夫階級多係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率皆崇尚自由，然因聽眾不多，而且在帝國主義的高壓勢力下，亦無促進資本生產的作用，所以個人自由的主義好像一朵鮮美無比的不實之花，在中國這個國度內。便未發生領導的作用。由是而中國的哲學家如馮友蘭，梁漱溟和熊十力一類哲學家所倡導的中西文化調和論，便居然能在中國的哲學論壇占上風，豈非機會哉！豈非機會哉！

為什麼中國國民所得的主要生產手段從未由器具進化而為機器呢？在鴉片戰爭以後，固然是由於外國商品的壓迫，然在鴉片戰爭以前，外國商品的壓迫並不存在，為什麼始終沒有實現呢？這是由於中國沒有經過原始的蓄積，因此沒有足夠的儲蓄來發達中國的資本。但為什麼中國沒有原始的蓄積呢？從地理的關係上說，中國最早便是一個大陸的國家，缺乏一個可以自由航行的海洋，如像地中海和愛琴海的大小，因此中國自始便缺乏國際的貿易。再來呢，在中國的國內，河流尚嫌不暢，不足以便利中國的交通。三來呢，中國的耕地似乎尚肥沃，足以贍養中國的人口。四來呢，在中國每畝土地上的口密度太大了，土地的生產品只够消費，不儲蓄。這第四點是北大農學院蕭劍雲先生尚未發表的意見。因此中國的商業不發達，儲蓄不儲蓄，這恐怕是中國沒有經過原始蓄積的原因。或亦就是中國沒有提早發生工業革命的原因。

在鴉片戰爭而後，中國既無強有力的政府，又無新興的資本家階級，足以排斥外國資本的侵略，並建設中國的工業，所以中國的經濟便永遠停滯在土地經濟的階段。中國的政治便永遠的被掌握在地主並帝國主義者的爪牙裏。同時中國的文化亦永遠停滯在一種似聽非聽，似馬非馬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中西文化大調和的絕望的局限裏，而不能有所開展。然則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前途就絕對沒有出路了嗎？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竟有學者以為中國人是天生的奴隸，除非由外人來統治，中國絕對無望。實則中國的工農階級原是賦有無限的對內打倒封建的剝削和對外排除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潛力的。假令中國的勞苦的大眾善於組織與團結，並與進步的小資產階級攜手而進，其力量是無

敵的。爲什麼呢？因爲任何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都要中國人自己給他作工具。假令中國的勞苦的大衆不許任何中國人給他作工具，帝國主義者的奴役中國的計劃必要被粉碎。蘇聯似乎可做一個最好的先例。

回憶在重商主義時代，歐洲的商業資本家，爲了擴大市場起見，對內要求武力統一，對外要求開闢海外的市場，在政治上需要絕對的專制政治來完成這個使命，因此歐洲的君主政治到了重商主義的時代便變質了，即由虔敬上帝的比較的消極無爲的政治，一變而爲王權萬能、朕即國家的專制的政體。中國絕對不會再有一個重商主義的時代，毋待贅述。但帝國主義者爲便利他們的資本的維持與擴大，在這勞苦大衆覺醒的時期，却需要扶植一種反動的與它友好的政府，不惜以何方法來鎮壓革命。我以為現在的美國極力去扶植希臘的反動政治來撲滅革命，亦是可舉的例子之一。所以，中國的工農對外國資本主義的解放的鬥爭將是最痛苦的。

## 關於復興日本的幾種謬論

范承祥

最近美國決定暫時擱置對日和會問題不談，專心一意去幫助日本復興經濟。美國官方人士深知這種做法一定會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感，所以正式或非正式地爲美國的對日新政策辯護。譬如，美國新任駐滬總領事卡勃特，履任不久，就發表一篇很長的演說，申明美國無意扶植日本作爲反對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軍事台柱。美國報紙也常對中國報紙的抨擊言論提出警告，認爲這種抨擊一將陷中國於不利。

至於中國政府則似乎因爲過去在對日和會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得罪了美國，不免有點感到歉然，亟欲對美國有所補償，於是這次在經濟復興日本問題上，一開頭就表示「願意支持（美國所提）日本復興的計劃，只須保證其鐵武主義不致復活」，並且聲明「如主張先有和約再談經濟恢復，便屬浪費時間」。中國的若干學者名流和官方人士也都紛紛發表論文，替美國的新對日政策辯護解釋，希望中國人民能夠同意美國的做法，諒解中國政府的態度。

這些中美辯護言論中所一致強調的理由，是說復興日本經濟的目的在於「讓日本人能好好生活」以便「減輕美國公民的負擔」。關於這一點，已經有人很詳細地指出其不正確了（參閱「世界知識」第十七卷第七期官邸著：「應該復興日本經濟嗎？」一文），這裏無須贅述。

我們細讀所有代美國辯護的文章，覺得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自願爲美國反蘇的尾巴，爲了幫助美國反蘇的緣故，甯願看見日本的復興。例如，胡適博士在他的「論國際形勢的兩個問題——致周鯁生先生的一封信」裏，就一面明說蘇聯是侵略主義者，一面強調美國扶植德日復興的合法合理，故意用

中國的工農決以計劃的集體的勞動來作爲中國的主要的生產的方法。在經濟的機構上所要求的當然是消滅買辦的階級，實行耕者有其田，而代之以工農並新興的小資產階級。但這當然是指消滅他們財產的關係，而非置之死地而後快。在政治上所要求的是民主，或者說，仍然是民主，但不是資本家階級所領導的民主，而是由革命的工農階級和進步的小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民主。在文化上所要求的是集體的勞動的自由，而非個人的自由。此與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的宣言，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同時亦是中國的復興所必需的。但我們莫要忘記了，這種要求所當遇着的空前的阻力。

馬克思說，當着一個新社會從舊社會的母胎內產出的時候，須得經歷一段痛苦的時期。中國好比一個六十歲的老太太，近來新結第一胎。如果不讓這個新胎兒降生，恐怕這個老太太和這個唯一無二的胎兒，二者均必同歸於盡。

三七，二，四，於北京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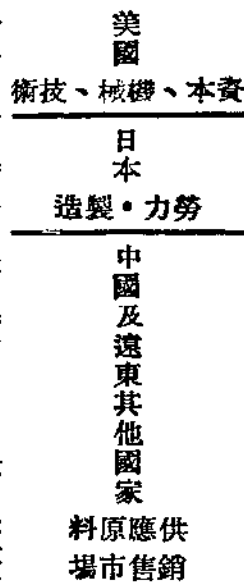
這種排比對稱的方法來暗示國人：既然要反對「蘇聯侵略主義者」，就不能不歡迎美國扶植日本和德國。劉子健先生在「觀察」三卷廿四期的大文中，更坦白露骨地承認，「就目前看，美蘇對立的尖銳化，已不是任何他國所能左右；中國雖想在兩大之間有所週旋，但就全局而論，凡在「鐵幕」之外的，對蘇方針大體上都不得不惟美國馬首是瞻」；這在實際上就等於說中國既採取追隨美國反蘇的政策，當然也就應該容忍美國助日的政策。

這種看法簡直把中國當成美國的附屬，走着「以夷制夷，聯美制蘇」的老套，實在是很謬誤的。蘇聯究竟不是一侵略主義者，不是一個可以隨便武斷的問題，需要專寫一篇文章來討論，這裏且不去管它。不過，任憑作怎樣強調蘇聯拆遷東九省的機器的罪過，蘇聯所給予中國的損失，無論如何總不會比日本所給予我們的大。因此，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對日本的敵視是遠過於對蘇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爲了要防制蘇聯而竟然勸告我們中國人民去跟着美國幫助我們過去的仇敵（其實日本現在還是我們的仇敵，因爲日本的政治社會經濟結構原封未動，統治權仍操在原來的那一般 Old Guard 手中），我想，一百年來飽受日本侵略之禍的中國人民是未必能同意的吧。

其次，美國自己從不諱言「日本是亞洲的工廠」，「任何復興亞洲的計劃，如不優先扶植日本，便沒有成功的希望」。中國的美國辯護者們也說，「將來復興的日本一定會變爲美國的一分廠」，復興的日本是一個工廠國家，而其大權，在和約簽訂、佔領結束以後，也仍舊是操諸美國手中」。這都是事實。日本是遠東最發達的工業國家，美國佔領了日本兩年，她的托萊斯正和日本各



種重要工商業都發生了血緣關係。所以今後日本的經濟之必然劃入美元集團以內，成爲美國獨佔資本集團的遠東分支，是毫無可疑的。但這並不足以證明這樣的日本不致成爲中國的經濟威脅（如同劉子健先生所說的），恰恰相反，正因此，其對中國的經濟威脅也將比我們所想像的嚴重。請聽美國紡織聯合會主席兼訪日工業考察團團長W·傑可勃博士的話吧：「日本的紡織工業是美國工業的安全保障，我們深信美國工業將來工業上的保障和日本工業的順利復興，以及遠東市場殖民地市場的恢復，有密切關係」；「美國的原棉、美國的資本及管理、日本的廉價勞力、再加上中國的市場，將合併爲一個極好的計劃」。假如傑可勃博士的話實現，那末未來遠東的經濟結構將成爲左列的金字塔形：



這樣一個金字塔形的結構有幾個特點：一、美國是大老板，日本是第一號奴隸兼奴隸總管，中國和遠東其他殖民地國家都是奴隸；二、美國用資本，原料和機械及技術等控制着日本，日本用工業製造能力控制着中國和遠東各殖民地國家；換句話說，日本是美國的殖民地，中國和其他遠東殖民地國家則是殖民地的殖民地；三、一切工業利潤，最肥美的部份自然爲美國享受，美國吃剩下來剩的骨頭賞根把給日本，至於中國和遠東其他殖民地國家則只是刀俎上的魚肉，美國大老板和日本「龍頭」口裏的骨頭。試閉目一想這幅畫圖，豈不有點可怕？

至於劉子健先生所說，「現在日本工業不能享受特權，有何可怕；——如果價錢低廉，有傾銷的企圖，我們儘可提高關稅」，那簡直是夢囈。請問，中國的關稅實際上能够自主麼？日本工業固然不能享受特權，可是今後的日本工業却是美國工業的分支呀！劉先生果真認爲中美商約是平等的麼？被作爲殖民地之殖民地的中國，又有什麼力量來抵禦日本貨對於中國民族工業的威脅？

去年下半年開始的時候，麥克阿瑟發表談話，說中國的戰亂阻止了日本的經濟恢復與復興，增加了他管制日本的困難。我們雖然不十分明白麥帥的真意，但很顯然地，他是說中國的戰亂使得中國這個原料供應地和銷售日貨市場的價值失掉了。由此可知，美國的扶植日本計劃實在是以過去日本的一大東亞共榮圈「思想爲基礎的。所不同者，日本的一大東亞共榮圈」是日帝旗下的一「東亞經濟協同體制」；而今天的美國的一馬歇爾計劃遠東版」則是星條旗下的「東亞經濟協同體制」；面目依舊，不過老板換了而已。

第三，美國人曾經向我們解釋說，「你們對美國復興日本的恐懼完全是無根據和不必要的，因爲日本在五十年乃至一百年內，絕對不會有再度發動侵略的力量」。劉子健先生也說：「即使不幸而有第三次大戰，美國最多也不過用日本爲一重要基地；再武裝日本，既沒有必要，美國人自己也未必放心。……：：：：美國決不會再武裝日本，更不會讓日本對中國有任何軍事性的威脅。太平洋在美國海軍手中，日本人焉能飛渡？」這都是騙小孩子的話。

作爲日本帝國主義復活的一切基礎既都存在——全部存在，日本的再度發動侵略便決不是不可能的，也決不會在很遠的五十年或一百年的將來。保證日本襲武主義不致復活的，應該是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的徹底改造，澈底民主化，而決不是美國的空洞諾言；何況美國口頭上雖作了若干保證，而實際上則大修軍港和飛機場，提高鋼鐵生產，保存並加強各項軍需工業，事實上並沒有毀滅任何日本的戰爭潛力呢，老實說，日本的戰爭機構依舊原封未動，美國是隨時都可加以利用的。

至於劉先生所說，「原子時代戰爭無須幾十萬日軍幫忙」和「美國決不會讓日本再侵略中國」的話，簡直是沒有絲毫軍事常識的謔言。誠然，今天原子的時代，但這並不就等於說，陸軍就沒有用了。任何稍具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武器無論怎麼進步，總不能推翻那些古已有之的戰略和戰術原則，也總不能廢棄步兵的任務和作用。所以，假如不幸而有第三次大戰，美國還是一兵不厭多的，特別是像日本那樣被若干美國軍人譽爲「精兵」的陸軍。至一美國決不會再讓日本侵略中國」的推斷，真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依我個人的看法，萬一真不幸而有劉先生所說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美國在遠東戰線上是一定會立刻武裝起日本軍隊來，並用美國船隻和飛機，運送他們在朝鮮和中國的東北登陸的。假如美國這樣做，那算不算對中國的侵略呢？中國人是不是能允許日本兵再度在東北耀武揚威呢？根據這些，我認爲我們一百年飽受日本軍事侵略的中國人，對於美國扶植下日本的潛在軍事威脅，不僅應認爲絕對可能，而且應該深深警惕；我們不能過份天真幼稚地信賴別人（美國）的好意，特別是在這美國各方面人士（包括官方在內）已經絲毫不諱言他們決意將日本變成「美國的盟邦」、「未來反抗遠東極權主義戰爭中的美國堡壘」的時候。當然，對於那些不顧中國的民意，甯願也做次於日本的美國第二戰略基地，並把中國人民驅來做美國反蘇的馬前卒和炮灰的人，我們這番話都是白說的，因爲在他們心目中，美國利益第一，他們自己的利益第二，中國人民的利益在他們看來是不值一顧的。

第四，還有一部份美國人急言厲色地對我們說：「我們美國本意原不要扶植日本。是你們中國自己太不爭氣了，這纔逼得我們不能不扶植日本。你們只能怪你太不爭氣，失掉了歷史上千載一時的黃金機會，如何能怪我們，更如何

可以因為你們自己不長進而抱住日本也不讓人家發展進步？這是你們中國的自私，我們不能同意你們這種無謂的指摘。由麥克阿瑟到卡特到紐約先鋒論壇報的主筆先生們，都是唱的這調子。

同樣的調子也可在中國人自己的口裏和筆上聽到。譬如，劉子健先生在他的大文裏，就一再提到「不實備自己的失敗，却深怕人家的成功」，「問題在中國能安定不能安定，中國但求自強，不怕日本復興」之類的話，好像美國復興日本，責任不在美國而倒在中國似的。乍聽之下，如果不是看到劉子健先生這三個中國字的名字，我們還以為是替麥帥起草那篇責備「中國內戰阻止了日本的經濟恢復與復興，增加了美國管制的困難」的談話的高鼻子美國秘書呢！

日本經濟恢復與復興之所以被延緩被阻止，完全是由於日本統治階級的故意怠工和為私利而榨壓剝削日本人民，完全是由於美國的故意縱容日本舊財閥官僚和軍人，不把他們趕下控制全國政治經濟生活的權力地位的緣故。美國人和日本人不自反省，硬要拿中國內戰來解嘲，來辯護 Le Tchong-tze 自己的行動，倒也罷了；奇怪的是許多中國學者名流（如胡適）和現任官員（如王世杰、朱世明、劉子健），也跟着美國人和日本人對着自己的同胞咆哮，這就叫人難於理解了。

事實上，從美國開始管制的第二天起，美國就不會真心誠意地朝「改造日本，建立民主化日本的方向走」，無數的中美學者和政論家都會根據事實，確切指出美國是以改造日本使成爲美國的遠東看門狗爲目的，而不是以改造日本使遠東和平安定得以永保爲目的。中國爭氣也罷，不爭氣也罷，除非中國自願

# 一個大學生看大學教授

尹穎默

記得在西南聯大時期，某院長曾經說過：「當教授的人差不多都有幾分怪癖，否則只要圓通一點兒，在官場中弄個把部長、次長、參議、顧問一流的官銜是不太成問題的。」然而我們的教授們就偏是多了一點怪癖。提到怪癖，似乎就和中國舊時的山野文人有一脈淵源，其實山野文人和教授門的一怪一是有着差異的。山野文人的生活是悠閑的，至少喫飯是不成問題的，不管他們是「肥遯山林」或「待時而出」，這點怪癖對他們都有用；對「肥遯山林」的，可以使他們得到一個「灑落清高」的美名，因為在那樣社會裏有足多欣賞高人隱士的人；對「待時而出」的，自然更是終南捷徑了，因為在那樣社會裏至少還有利用山野文人的政府。然而我們的教授就偏偏生在還一個時代，「自己已經沒落成了無產階級，偏要保留那一點中產階級的心情！」（吳恩裕教授在課堂上的自白）當他們在講堂上繁徵博引，侃侃而談的時候，大有躊躇滿志捨我其誰之慨，等到挾着書包踉蹌歸來，再拿着竹籃走上菜市，一百二百地和賣菜

代替日本做遠東的看門狗，否則美蘇扶植日本的作法是決不會改變的。老實說，一個沒有內戰的真正民主和平團結統一的中國——也就是說，一個真正爭了氣的中國，是決不會替美國做看門狗和奴隸總督的，也決不會替美國做防蘇反蘇的工具。假如中國真這樣爭氣的話，我怕美國恐怕更加會要加緊培植日本來滿足他需要看門狗和反蘇工具的慾望吧。再退一萬步說，中國眼前的內戰，是否就是不爭氣的表现，也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縱使是不爭氣吧，則中國爭不爭氣是一件事情，要不要日本帝國主義復活與復興又是另一件事情。硬把中國的情形扯作掩護支持日本帝國主義的護符和藉口，那如果不是有意歪曲事實，就是對中國太不公平。

第五，劉子健先生把中日美的三角關係分拆爲「一、中日之間的合作與競爭；二、中日之間對於美國援助的合作與競爭；三、中美之間對於日本復興的合作與競爭」的三條邊，大大發揮了一番，主題不外「應當以十個廿個五億做目標，不向美國借款則已，一借就要超過日本」。這在基本上已經錯誤了。請問，和約尚未訂立，戰爭狀態尚未全部解除，怎麼能談得上對日合作與競爭？劉先生叫我們「不要同日本爭風吃醋」，却叫我們去「不借則已，一借就要超過日本」的五億元借款十倍廿倍，這不是一「爭風吃醋」是什麼？

總而言之，中國人不反對日本的復興，但復興與必須在日本已經真正徹底民主化了之後，我們不反對民主日本的復興，不僅不反對，而且還願意盡力從旁協助，加速她的復興；但我們爲了遠東的永久和平與安定，却必須堅決反對美國現在復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措施！

卅七年二月廿二日

的老婦人斤斤計較的時候，又未嘗沒有凄然窮酸之感。

本來，在戰前拿兩百以上大洋一月的薪水，在家有良廚佳肴，隆冬有輕裘暖爐，出門有洋車代步，自然可以把門一關就隔開整個世界，書房就是完美的象牙之塔的天地。可是抗戰一起，生活從天堂降到人間，學校的播遷，大局的動盪，待遇的低減，他們就開始着咬牙關的生活：忍耐，忍耐，爲了國家，爲了人民。不幸，在抗戰的末期，打出了貧富懸殊的局面，國戰似乎只是爲官僚財閥而打的，到現在，勝利已逾兩年，而他們的痛苦更一天天地加深了，政府天天儘管喊教育，而事實上教育經費僅佔全國總預算的百分之三，而且青年團又得拿去一半，再加上言論講學的不自由，動輒有被解聘、被逮捕的危險，他們生活的這付狼狽相，自然不能比擬那優閑自適的山野文人，似乎一千二百年前和他們同一階級的杜甫就替他們作過這樣的晦氣的寫照：「文章憎命達」！

在大學裏混過幾年的人，心目中對教授的生活自然都有個粗疏的輪廓，而且喜用傳奇方式來向外間講述。在某些人口中，教授甚至變成了一瘋子，一無聊文人」和一失意政客」，其實教授們的精神頹廢和不满現狀，都是環境逼成的，如果再把他們當作打趣或譏評的對象，那是太忍心了。

自然，教授們都是這一代的高級知識份子，在知識上豐富些，在感覺上銳敏些，在社會上他們仍然有相當的地位，正義感濃厚些，進步性大些，這是他們較常人不同的地方。我們在開頭提到的怪癖，也該從這裏去理解。他們這種怪癖是由早年中產階級經濟生活而扎根的一點「保守」，加上舊時文人習性的孤傲，又加上一點時代精神和自身個性而組成的。不過這一點怪癖在接觸現實後，就有積極和消極的區分，積極的人時代性強些，消極的人保守性強些。前者是由於面對現實以致於痛恨現實，認清現實，他們是想着「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在今天黑暗的時代裏，他們抽緊了心弦守望着黎明。後者是由於不敢面向現實以致於隔離了現實的，在今天黑暗的時代裏，還恬戀着剛過去的一夕陽無限好」的黃昏。這是教授羣中兩種不同的心向，雖然心向不同，但他們的立足點總是一樣的。他們都不肯離開這一點而乾脆向前邁步或向後縮步。有人也許說，教授當中不是許多都已經參加了政黨，甚至如聞一多先生就因此而被殺，這還不算對時局的行動麼？自然，在教授中，參加實際政治的也不在少數，可是除了像陳雪屏、燕樹棠等僕僕風塵往來南北的食客學者御用教授不能歸入這裏討論之外，他們仍然不是參加行動的；至於聞先生所參加的民盟更是用筆用口的政黨，這種用筆用口的行動並沒有改變他們的立足點，而聞先生之死是因為有了一個連說直話的文人都不容忍的政府。聞先生以死來貫徹他的說和寫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敬效法的。就事論事，雖然聞先生會徹底否定士大夫階級，然而他的行動正是士大夫的「高風亮節」。

處在這一變動的時代，教授們不是應該行動起來，參與其事，是另一問題，我這裏只是說明教授階級這一批人處在紛擾萬態的情況下的苦痛——沒有斷然取捨而感覺徬徨無所適從的苦痛。楊人樓先生在「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一文中，會對「不滿於現狀而欲追求進步的知識份子」的道路有一種看法：

被譏為「小市民」的知識份子，反而與勞苦大眾沒有多少距離……惟有他們始可根據人民的需要而提出進步的要求，且願為此要求而鬥爭。即使他們不自承是自由主義者，事實上他們已是十足的自由主義者。人民知識誠然不夠水準，但人民有決定好惡向背的良心；自由主義的進步標準之決定，必須根據此種良心的判斷。惟有接近人民的知識份子始能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而增強其判斷力量。這種教育的功能便是自由主義者所當完成的功能。

楊先生又曾經表示：「自由主義者可能畢生是失敗的，他們之所以能畢竟爭得勝利，在於能教育下一代來繼續鬥爭。」又說：「人類關係演變到非戰爭不足

以消滅反進步力量的時候，這便是自由主義者最感矛盾與苦悶的時候。」最後這兩句話，倒是幫助我們了解教授們痛苦最爲一針見血的話；至於「接近民衆」——教育下一代來繼續鬥爭」都與事實有些距離，以目前情形言，只要有良心的知識份子莫不是一不滿於現狀而欲追求進步的，然而「教育」下一代「追求進步」不是單憑「欲追求」三字就可以辦到，還需要勇氣去教他們應該教的，像聞一多先生便是一例。但是能如此敢教敢說的又有幾人！即在有民主傳統的北京大學，敢於毅然出口講革命、馬列主義或蘇聯文學的也寥寥若晨星。我不敢說馬列主義至高無上，然而作爲「博大」——進步」的自由主義教授是不該摒棄它的，因爲它會引導一些國家從資本主義社會步入社會主義社會，至少要比那些古典經濟理論更現實些、更重要些，然而我們「不滿於現狀而欲追求進步」的教授們，對此却是一噤若寒蟬，有的還動輒用一些掌故皇哉的古代學術經典巨著來唬學生，藉此掩飾自己的逃避現實。本來今天政府對學術的扼殺政策是人所皆知的，清華大學的教師爲指定高爾基、屠格涅夫的作品給學生讀，也會引起某些人的懷疑，諸如此類的事實很多，教師們乾脆不指定，不出聲好了，學生是可以諒解的，然而偏要掩飾，却令人有些迷惑。像這樣的自由主義者真是太多了，兼以現今又有這樣一個不開明的政府，若要自由主義者在教育上奏效，不是有些不可能麼？總之，在對是非邪正有所取捨的積極派教授，心裏固然沉痛，然而他們還有可寄託的希望。至於逃避、徬徨、游移的消極派教授，則更有一種窮蹙無路的悲哀，當悲觀的、殘酷的、獸性的事件紛至沓來的時候，管你接不接受，它的影響都會加在你身上心上的。

我們從教授們自己的文字中去了解他們，也許會正確些吧！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在西南聯大校門之內，四個學生被殺害，對這種出乎人性的殘暴，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人都會激憤起來，當時聯大教授中以教職身份用詩來哀悼他們自己的學生，而且出於至誠的，我看有兩位。

李廣田先生在「我聽見有聲音控告我」一題下寫着：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攜了書包到學校，

我聽見有聲音向我控告：

「先生，你是來上課嗎？」

爲了爭取言論自由，

爲了抗議無理的壓迫，

他們罷課了，

我心裏暗暗答道，

「我不是來上課的，」

而我的沉甸甸的書包也忽然盛滿了空闊。

十二月一日，最悲慘的日子，

真正的「匪徒」屠殺了善良的學生，

我空著兩手走進學校，我又聽見有聲音向我控告：

「先生，他們爲爭取民主，反內戰而流了血，你呢？」  
我呢，我羞於掏出手絹擦掉我的眼淚，我兩手捏得滿滿的，我心裏塞得滿滿的，我閉緊了總是要爆炸開的口唇，走進了我們的大圖書館，我在四個死者身上讀到了仇恨的血書，我說我今天是來上課的，這是最新的最初的一課，然而我今天不是先生，而是一個小學生。我站在那裏不能走開，好像在等待發落，直到有聲音向我嚴厲地喝斥：

「你呀，你這壞學生，這一課你不及格！」

這正是知識分子（尤其是作教師的）檢討自己在這個時代中所盡責任之勇敢的、真誠的獨白。

蕭濂非先生是潘琰烈士的教師，他在「弔潘琰同學」的兩首詩中也發出一種出於衷誠的聲音：

堂堂漢宇變屠宮，血染青天白日紅，載籍應無前例在，先生誰不動於中。休言報講爭三日，直欲歸耕老一農。世事也知無處說，低眉深覺負春風。

### （上接第二頁）

問一個中等家庭如何負擔得起！除了讓他的孩子失學，還有什麼辦法呢？三四個孩子的家庭，該不算特殊，然而有幾個家庭能負擔這麼一筆入學費用呢？這難道是家長的罪過？至於學校，據筆者所知，有些小學開學兩次沒有開成，原因是學生繳不出八九十萬的學費。有些學校招生三次，招不足額，無法開班。清寒學生獎學金，則因資格限制過嚴，真正清寒工讀學生多不容易得到。

至於一般教師的生活清苦，更是衆所周知，每月舌疲唇焦辛苦講授的代價，不能買三四斗米的大有人在，這些人爲國家作育人才，何負於國家社會，而竟多食不果腹，未免太不公道了。

推行教育原是國家的責任，教育費用不該完全轉嫁到家長身上，眼看家長無力，學校關門，教師餓飯，學生失學，教育危機日甚一日，政府應該從速負起責任來。

## 白米與白報紙

曹孟白

這一欄，物價又全面狂漲，白粳和西白報紙尤其漲得兇。在上海，紙價每令由兩百萬漲近三百萬，米價每石由一百八十萬漲到二百五十萬，迄今仍有繼續上漲的趨勢。

物價上漲的原因很多，比如：春節過後，銀根鬆動啦；通貨膨脹，搶購貨物啦；官僚資本，壟斷市場啦；米和紙既都是貨物，當然也不能例外。不過米和紙的漲價，似乎還有其特殊的意義。米要買四五百萬元一石，武漢等地需要二百多萬米，即如產地的無錫，也買到二百四十萬。天下米一般白，原不只在於上海。有一個時期，上海米價反比許多地方爲低。這種米荒的現象，說明了內戰的惡果殆已在全國成熟。因爲內戰少不了壯丁和軍糧，抽丁要影響農作，軍糧要影響民食，一方面，米的生產減少，他方面，米的分配偏枯。加之

哭者無淚又霑巾，歷竟三刀見此身。人性只今惟有惡，天心自古不親仁。由來政治多污濁，凡在高明有逆鱗。占得西南聯大葬，英雄華嶽永相因。

蕭先生另外還有一句詩：「浮生幸轉蓬」。一轉蓬一何幸呢？不過幸存此身而已，這和「低眉深覺負春風」「人性只今惟有惡」，都是在痛苦中又惦戀現實逃避現實的無可奈何的心境。

李先生在「死者的身上讀到仇恨的血書」時，就自認「是一個小學生」的心情，那是多麼深沉而勇擊，應該是屬於積極的一羣。蕭先生則屬於消極的一羣。正好一個新詩，一個舊詩，都恰如其份地表達出了他們的心境。

時代加在人們心上的痛苦是慢慢的，一分一分、越來越沉重的。這是兩年以前的詩，兩年後的今天，歷史已通過了十萬八千里的道路。如果「一二、一」是黑夜初臨的時候的話，那麼今天已經是四更天了。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積極的教授們心裏固然已經在沉重而迫切地期待着新的黎明，就是一些比較保守的教授們，時代也似乎逼着他們了解這一個「變」了。他們在遲遲不決之後終於說出了他們的認識。周炳琳先生在北大追悼于子三的大會上說了：

「這是一個大革命的前夕了，……我用『愛』的心情，希望諸位同學要沉着應付。」

簡短幾句話，言盡而止。「大革命」是時代強迫他們去明白的，而「沉着」却是扎根在早年經濟生活裏可憐的定型意識。「沉着」，就不能進一步麼？

戰事向南發展，鐵道公路寸斷，農村對都市絕交；於此自然要發生普遍的米荒了。惡果生於惡因，又有甚麼辦法？

紙的漲價，不能不歸咎於一種不合理的、不光明的政策。戰亂與文化似乎是不能兩立的。爲了輸入更多的軍需品，所以限制紙張進口。爲了便利思想的統制，所以偏私紙張的配給。官方的報章可以藉黑市出賣配給紙而賺錢，民間的刊物則不勝紙價的重負而賠折，以至停刊。前些日子，上海幾十家雜誌聯合請求配給紙張，至今沒有下文。大公報曾經很天真地向政府要「文化政策」，我却以爲現在所行的根本就是「不要文化」的政策。

報紙、雜誌、圖書是精神的食糧，正如米是生理上的食糧一樣。我們對這兩種食糧，不但有需要，而且有利。假若一個政府硬要把人驅向饑餓和愚昧的道路，那就失掉這個政府存在的基礎了。

二月二十四日。



# 北美重遊 (六)

陳達

## 星期日聽傳道 (三六、六、二十二)

紹昌、芝愛與余晨往倫新市某教堂聽牧師 Robert M. Bartlett 傳道，牧師於戰前曾在燕大服務，題曰 Man Plus God，略謂目光短淺的人，以為興建房屋只要有人的高度就夠了，不必要有崇樓大廈，但羅馬的 St. Peter 倫敦的 St. Paul，俱是極偉大的建築，彷彿得到上帝的指示，這是有遠見的，有遠見的人可以有成就，從前有一個英國醫師，擬登 Everest 之頂，失敗歸來，入一印度的醫院診治，見該醫院僅有醫師一人，護士數人，聽說每年要醫治病人十萬人，這個醫師大受感動，忘却自己的病，一年內幫同他們醫治十四萬五千人，這個醫師不是只顧目前的，乃是有遠見 (Vision) 並由上帝指示的。

## 泛獨木舟 (三六、六、二十二)

大學近傍有河曰 Cedar River，紹昌芝愛與余在其泛獨木舟，河旁巨木成林，蚊蟲甚多，飛來停於險上手，但往往未嘗吮血即被撲滅，河中野鴨成羣，為公家所養，時見大鴨一對帶小鴨一隊，遊於河邊，遊人誤以碎麵包，前來爭食。獵者通稱此鴨為綠頭，因公鴨頭上有綠毛，重約三斤，演化成為家鴨，母鴨毛灰色，體略小，與家鴨甚難辨識。

河邊樹林空處，有人帶家屬野餐，行餐時用路邊桌 (Roadside Table)，所謂路邊桌者，以大木板為面，小圓木為腳，有油漆者，有未加油漆者，公家取森林中現成的材料，做成粗桌，供一般人野餐之用。

## 巧遇 (三六、六、二十三)

芝愛駕汽車西行，約七十五哩，至 Kalamazoo，紹昌與余入 Kalamazoo College，此為基督教學校，有美麗的校園，方在舉行基督教社會活動會議，由教會聯合會舉辦，有會員一百七十五人，余二人入國際關係組旁聽，其主題為美蘇關係。

我們的目標是來訪兩個中國學生，但據說此校並無中國學生，余問曰「此處尚有其他大學或學院乎？」某職員

答曰：「Western Michigan College 離此不過半哩」。余聞此言，深覺美國特色之一，乃國內有大量的學校，所以一般人的知識水準自然提高。紹昌以前接讀此地中國學生的信，但忘其校名，今日來此，已知這塊小地方，共有二學院。

西密歇根學院規模雖小，樹木極多，有一中國男生先與余談，自述曰：「父名陳鶴琴」。余奔告紹昌，蓋此人致函紹昌時，並未說明係某人子弟，鶴琴，紹昌與余為民國初年時清華舊同學。稍坐，其妹亦至，由南京鼓樓幼稚園鎮主任作伴，不期而遇，皆大歡喜。

## 關心國事 (三六、六、二十四)

今晚有中國學生到國際聯誼社來閒談，他們的意見，可以概述如下：(1) 他們的觀察，以為國民黨與共產黨，似乎沒有合作的可能，因此統一與和平不是短期內可以實現。(2) 戰事雖有延長的可能，但任何一黨似不能於短期內有決定性的勝利。(3) 以目前的情形論，似無第三黨出現的可能。(4) 國內現在似無有力的輿論，可以主持正義。

此外，他們對於知識分子還鄉一事，頗感焦慮，余曰：這種理想，實際難以貫徹，據我的意思，亦無須貫徹，因我們盼望各人有專門學識，這些學識大抵須在市鎮裏才有用處，到了鄉下往往是一籌莫展，所謂知識分子還鄉，應該專指農業人才而言，他們工作的範圍，大概是在鄉村，其餘的知識分子，不必還鄉，但與家鄉必須時有聯絡，遇到家鄉有事，可以互相討論，知道外面有新方法或新思想，如與家鄉有益的，必須隨時向家鄉介紹，一個知識分子，在人身方面不必還鄉，在精神方面不能一刻忘記了家鄉。

## 臨別盛會 (三六、六、二十四)

紹昌在此負責主持外國研究學院，又勻出一部份時間，在國際聯誼社指導外國籍學生。為使我明瞭此校若干方面的形勢，約同事若干人聚餐，內有：Dr. Harry H. Kimber, Director of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s; Prof. Arthur C. Clark, Chairman of Scholarship

Committee; Dr. Paul Honigsheim, Professor of Sociology; Dr. Carlos M. Teran, Professor of Latin American Culture。

## 自命新至奧克司福 (三六、六、二十五)

自命新乘公共汽車，晨七時三刻出發，下午三時至印第安那省律起孟市 (Richmond)，湯麥孫 (W. S. Thompson) 先生在站相候，自駕汽車伴余至奧海奧省奧克司福市 (Oxford) 奧克司福是一小市，人口僅二千，自律起至奧克司福路上，沿途見包穀地，這些包穀作為餵豬的飼料，普通六七個月的豬，體重可至二百至二百二十五磅。包穀以外，此處尚產小麥及乾草，乾草係餵牛的飼料。今年雨水太多，天氣太冷，包穀不長，較去年晚了三星期，收成約減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奧克司福市有馬埃米 (Miami) 大學，戰時作為訓練飛機駕駛員之用，新建的飛機場即在附近，目前該校業已恢復戰前情形，有學生三千餘人。我來參觀司各烈伯斯基金會 (Scripts Foundation) 的人口研究所，該所借用大學圖書館的一部為工作場所。

湯麥孫氏約余至其家小住，自有房屋，甚寬，多年以前由其父自造，屋前有大樹即 Japanese Walnut 及 Hard maple，屋旁玫瑰與月季成架，時方盛開。屋後有空地一畝，分栽菓樹、蔬菜與花，並留有相當大的曠場。蔬菜中最難得的是龍鬚菜，做團時，掘地須深一呎，用化學肥料。如栽龍鬚菜秧，兩年後才能由新生的龍鬚菜中，取其嫩鬚而食之。以後隨生隨取，如江浙人於竹園取筍然。Goose berries 為余初次所見，未熟時帶酸味，熟後取之作餡，通常用於點心中，即拍安 (Pie) 的一種，White Hiles 已開八十三朵，為其夫人最鍾愛之花。

湯麥孫夫婦喜戶外活動，閒時以栽種為樂。又因屋旁有寬廣的空地，使兒女們可以隨便遊玩。長女已嫁，其子戰時在軍隊服務，此時在夏季學校補習德文，開學以後擬往 North Carolina 專修數學、統計學。

## 司各烈伯斯人口研究所 (三六、六、二五)

當一九二二年時，湯麥孫正在考乃耳大學經濟系任教

馬埃米大學的校長，有一次去訪問，談起新聞記者司各烈泊斯，有意捐出一筆款來，長期作人口研究之用。湯麥孫氏對此深感興趣，接受此種建議，即與馬埃米大學發生關係，該大學非但管理其基金，並供給工作的場所。基金的利息僅有美金每年一萬五千元。研究的題目，隨研究員的興趣，對於研究的結果，亦不限制發表，並且除研究以外研究員亦無其他任務。湯麥孫氏從未在大學授課。

研究所與研究員的個人關係，向來截然分開，譬如湯麥孫與 Whelpton 俱以私人名義，簽名推舉 La Follette 為副總統候選人，但這是個人的行動，與研究所無關。又湯麥孫贊成生育節制，惟這是完全代表其個人的立場。

我猜想，研究所的工作對於美國的社會政策，必發生直接的影響，不過湯麥孫說：「直接的影響沒有，間接的影響則有之。曾記得一九三〇年左右，研究所曾利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的材料，來估計美國人口的趨勢，這種工作，近年來由人口局担任，研究所也就放棄了。」

Bogue 氏的補充意見，以為研究所的書籍與報告，常為大學校及一般人所參考，當然產生相當重大的影響。余亦曰：我記得戰前在福建南部參觀一個現代化的農場，我以為對於農場的改良必有直接影響，但場長亦說沒有，不過我離農場不遠，即見一個小規模的農場，實行模倣的工作。我疑心今日的問題，犯了同樣的毛病。最後討論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所宣讀的論文，湯麥孫氏勸我注意關於工作的經費及管理問題，他說：如果我的計劃因各種困難而不能整個實現的話，不妨舉行小規模的調查，幾個小規模的調查併起來，就可以擴充研究的範圍。

Whelpton 氏以為準確性是值得考慮的問題，如果這樣普查的範圍擴充後錯誤要增加，不如縮小範圍而提高材料的可靠程度。

### 燒烤肥雞 (三六、六、二六)

倚頓 (Eaton) 市離奧克司福約三〇哩，湯麥孫氏約余去晚餐，湯氏開一汽車，另由 Whelpton 開一汽車，兩車共約十人，地點為 The Colonial Inn，屋內陳設為美國開國初年的光景，各菜亦都是鄉間風味。每人得肥雞半隻，用古老及村中燒烤法。日前鄉間道路平滑，一般的人家俱有汽車，湯氏與輝氏的兒輩，俱自駕汽車，約女友至新辛拿底市 (Cincinnati 離奧克司福約四十哩)，晚間去參加跳舞或看電影，並當晚歸家，「我們童年時代所

認為不可能的，兒童們今日視為平常事矣」。

同席客中在我右邊的是一位文學教授 Dr. Mueller。她描寫已經讀完關於中國的一本文學書，但不記得書名及著者名，她說作者用巧妙的文筆敘述明月星辰各種夜景，及抗戰的士兵生活，與學校的艱苦狀況，余曰「莫非是 Robert Payne 所著的 Forever China 一書乎」？答曰：「然」。余曰：「在戰時，著者與余在昆明同住一宿舍，余往往晨五時起，準備七時上課，著者的臥房在余對面樓上，余常見其房內尚有燈光，蓋方預備入睡也」。

餐後齊返湯氏宅閒談，Dr. French 前曾任教於馬埃米大學，見客廳裏實有極大油畫一幅，描繪海濱滔天的情景，粗視之似乎不分上下，男學生中有淘氣者，曾一度將其倒掛，數日間無人發覺，Dr. French 於一個星期日，在早點後才發現而糾正之。

### 農場與租佃 (三六、六、二六)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遭遇經濟恐慌，湯氏為保

## 軍人風度

國代選舉的花花絮絮，已談陳跡了；立委選舉的花花絮絮，也已成陳跡了。現在落得一批落選者春殘夢斷，悲憤交加，大打其「舞弊」官司了。

現在是輪到了競選總統的時候，正副總統的競選者，已經有好幾位了。這幾位競選者中，有的是黨國元勳，有的是教育界鉅匠，而較遠的一位則是軍人，現任省訓團教官。

報載這位趙教官印發了競選施政綱領：第一是要確定國曆；第二是要定都北京；第三是要解決人民生活。在第一項確定國曆之下，解釋得最詳。他說：西曆慶祝元旦，正值三九寒天；夏曆春為歲首，好比劉伯溫說的：「冬寒之極，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大治」。他主張應以夏曆的春夏秋冬之歲時，定為國曆。歲時正了，那麼，憑「事實經驗，五百年必有聖賢興，安我百姓，統一天下」。

這三項施政綱領，簡單明白，直率天真，而且也不是完全的空文。第一項睡手可以實現；第二項也不困難；第三項雖不一定立刻成功，但那也許是「五百年必有聖賢興」的五百年，稍為延了一點值，還要多加幾年。我們若以

持其儲蓄的一部，取出其工業裏的投資，購買二農場，一為二五〇畝，一為四〇〇畝，每畝價一二五圓，購入後利潤不豐，但原值至今尚能保留。湯氏原籍納勃來司加省為農業區，因此他酷嗜農村生活，歷年以來，經常在研究所工作，間或抽閒照顧農場，特別逢假期及休息日是如此。目前二農場俱有佃戶。規模較小的農場有夫婦二人為佃農，平時其夫一人以機器耕種，可以照顧，忙時另雇一農工幫同耕種。佃戶的機器及耕具約值三千圓，內一 tractor 值一千四百圓，湯氏供給房屋、水電、並付租金二百圓。二五〇畝中有一七五畝須耕種，餘作牧場。主要作物為包穀，作為豬的食料，餘為乾草，作為牛的飼料。其次為小麥，係人用的食品。去草時亦用機器，每小時可去草五畝。現有豬三百頭，七個月之內豬重約二五〇磅，養豬的收入，地主與佃戶對分。佃戶之婦，可以養雞至二〇〇隻，那是不出飼料費的。為了這種權利，她供給地主雞蛋。宰好的豬，切成大塊，藏於農場上高冷度的冰箱內，數月後取出如新宰者然。

## 碧遙

明成祖為最近的「聖賢」，那麼，從他的定都北京算起來現在是五百四十五年。

國代，立委選舉的當時，競選者必不完全靠「花錢」，「舞弊」，有的也發表了施政綱領。但那些綱領多半太堂皇響亮，很像王大娘的發呢：一邊手指着天口裏說得惡毒，一邊腳在地上抹它個乾乾淨淨。軍人的趙教官就不同，他把冠冕的解決民生問題放在最後一項，而把容易做到的兩項放在前面，看來他是想對說出了的話就負責任。他赤裸裸地以一個「聖君」的已飢，已寒自居，不掛一絲民主的招牌；在競選者的宣傳品中，他是最不近代化的，但也是最不矯揉造作的。這可算是軍人風度。

當希特勒的炮火封鎖整個歐陸，愛森豪華硬要全軍去諾曼底半島登陸，說做就做。現在大戰結束了，軍人正在白宮的政治舞台跳梁，愛森豪華看看不對，退出總統競選，說不做就不做。這在腐爛的當代，可算是磊落光明的軍人風度。

中國現在遍地皆軍人，但願能見到負責任，重實踐，當機立斷，鐵血無私的軍人風度。

# 二月雜感

白芩

## 論打與「匪」

慶曆年前，上海竟於五天之內連續發生了學、舞、工三大風潮。並且這三大風潮，都是動手動腳，鬧到開打為止。學生打市長，舞女打社會局，警察和申新九廠的工人更是雙方對陣，如臨大敵地大打特打。急景凋年，大家都在驚慌着「陰關」難過，經過一陣子兵兵兵，似乎又頻添幾分鬼氣，真是太煞風景。

參閱官方各種文告，據說這三大風潮是有着聯繫性的，且為「匪」類有計劃，有組織的陰謀。等情據此，我們倒很容易下一個結論：凡屬打的事件，其與「匪」絕對有關，應無疑義。

說到打，依常識來講，當然要有打者與被打者兩方，才能構成打的行爲。天下誠不乏喜歡自打嘴巴的人，但究竟跡近神經，當作別論。然則所謂打的事件絕對與「匪」有關云云，到底是指的那一方呢？

這問題可真叫人難於對答了。譬如我們說：打者絕對與「匪」有關吧，姑以往事爲例，則遠自重慶的滄白堂、較場口，以迄南京的下關車站等等事件，凡屬動手打人的，自屬與「匪」有關了。可是事實告訴我們，這批橫行不法的「匪」類，既未見繩請以法，甚且還有論功行賞，加官晉爵的。難道一個即將揮「行憲」的國家，竟「民主」到連「匪」類都可以有打人的自由嗎？欠通！欠通！

那麼就算打者與「匪」有關吧，這可更不像話了。試以此番三大風潮爲例；學潮中被打的吳市長，舞潮中被打的社會局，工潮中既屬對打，被打者當有警察在內。對於這些被打者，大家方想問唯恐不週，怎麼可以隨便使地牽扯到這個「匪」字呢？

經此分析，足證打者與被打者兩方，殊少與「匪」有關的可能。除非我們睜着眼睛說瞎話，硬把「匪」的帽子按在既不打人又不被打的第三方面，否則與「匪」有關這種說法，似乎是一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了。

不過話也得說回來了，夫「匪」者，其本身原祇是一個固定的名詞而已。方今之世，死法貴乎活用，祇要你在主觀上決定了「匪」的看法，「匪」的用途，儘不妨時而指其與打者有關，時而指其與被打者有關，隨心所欲，固無往而不可「匪」人家一下。反正一被稱作「匪」類的人

，還能有資格聲明辯誣嗎！嗚呼，「匪」之一字，其爲用亦大歎！

## 改革幣制芻議

大公報最近刊載一則天台通訊，原文照錄如下：「平鎮某紙店，近來異想天開，向銀行買來大量不能通行的一元鈔票，蓋上「冥國銀行一百元」字樣的印戳，每張實法幣一百元，利市百倍。附近的善男信女爭相購買，真是生財有道。」

這段新聞所報導的並非什麼了不起的大事，祇是內容相當有趣，編輯先生給它四週按上個線框，看來便顯得醒目一些。然而天下事如果不妨「小處見大」的話，則雖淺陋如我，倒也有點意見想發表。

溯自通貨無限度膨脹，鈔票愈弄愈不值錢以來，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執掌金融財政的政府諸公，也深知長此以往，局面實在不堪設想。於是改革幣制之說，甚囂塵上。但改革究非沒本錢的生意經，專家們固然說來頭頭是道，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向墨西哥定鑄銀洋既因成本太重而作罷，換發新鈔也還得伺候美國老關的顏色。何況即使美款借到，新鈔換發之後，若國內仍是烽火連天，永遠不

分勝負，誰又能担保新的鈔票不再因赤字預算而繼續膨脹？小派一點地說：如今紙貴如金，印刷工本也不便宜，換了一套又一套，偷雞不着蝕把米，又何苦來哉！

鄙見以爲平鎮某紙店「異想天開」的妙法，似乎頗值得政府當局參考一下的。從五千元的關金券乘廢曆新年悄悄上市迄今，原有法幣千元以下的鈔票，早就失去了流通的資格，留着無用，棄之亦未免可惜。至於將小額票面價值改巨額票面的辦法，久經郵票與印花稅票領導在前，老百姓當可見怪不怪。如法泡製，既得廢物利用，又兼本輕利重，能避改革幣制之惡名，仍收改革幣制之實惠，一舉數得，曷勿嘗試一番！

不過問題也還有一點，查平鎮某紙店將一元法幣的「陽鈔」改印成冥國銀行百元「陰鈔」，也許由於該店信譽卓著，人鬼皆知，所以「善男信女爭相購買」，「利市百倍」。萬一政府當局將千元以下鈔票改用增值之後，信譽不如某紙店，以致陽世既無善男信女爭購，鬼域又不肯通用陽鈔，人鬼兩方，均不歡迎，又將何以善其後呢？

弄到這般田地，辦法祇有一條，那祇好請金融財政當局到陰間去和鬼商量，索與把陽鈔一律改印「冥國銀行」字樣，以維信譽。這年頭，人鬼早就不分，人世何殊鬼域，來他個名實相符，倒也乾乾淨淨快！

府諸公。

## 監獄官司

據民獻曝，用心甚苦，是否有當，還以質諸賢明的政府諸公。

拘押在上海監獄裏的三個囚犯，近向滬市參議會潘繼長遞了個狀子，密控監獄中的「六大黑幕」。消息通過中央社傳播後，已引起社會各方的嚴重注意。照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看法，監獄本是人間地獄，黑暗也是理所當然。初不料黑暗之中，還有如許「黑幕」，而身禁監獄的囚犯，居然還敢「拚死吃河豚」，探頭出來捋老虎鬚鬚。中國畢竟大地「民主」了，可喜！可喜！

然則作爲被控告這一面的反響如何呢？地檢處的首席檢察官認爲是「無理取鬧」，「並不重視」，「沒有調查的必要」，態度鎮靜如此，簡直滿不在乎。至於典獄長的態度，更爲坦然，他首先依據法律，義正辭嚴地向市參議會反擊一下，「案情未經法院調查前，何以隨意發表」？言下大有提起名譽訴訟之勢。說到被控的「六大黑幕」，首席檢察官和典獄長都有輕描淡寫的辯白，似乎理由十分充足。

譬如監房內不鋪地板，典獄長就說「這是經費問題」。可不是嗎，沒有錢，你能怪誰？難道典獄長還有掏腰包替囚犯鋪地板的義務嗎？對於其他各點呢，答復也頗爲玄妙的。囚犯控告他們的看守主任都是漢奸，首席檢察官說「中央當局本爲大爲憐」，所以把「敵偽時期的舊人」，繼續留用，而且「另招一批新人，相當困難」。換言之，監獄裏的看守主任，實在非用漢奸不可。

囚犯控告炊場張主任盜賣囚糧，典獄長的答復是「本入還沒有到差」。事情之有無，雖未加分辯，但既非他本人任內之事，眼不見爲淨，落得推開不替！

囚犯控告他們虐待犯人，在五樓特設「風波亭」。典獄長却說「這是一點好嗎？英國是文明國家，尚且有此「風波亭」，典獄長「肅規育隨」，原封未動，你能說他不是？至於特別優待漢奸，原是舉國皆然，初非上海監獄所首創，何況典獄長還特別聲明，祇是「供給少數文化漢奸翻譯各國文字」而已。當今之世，漢奸文化最合時宜，爲了保存營養，自應予以方便，何足掛齒！別的囚犯既非漢奸，又不文化，怎麼可以要求同樣的優待？控告，你控告個屁！

總結以上所述，足證法律遺棄東西。確是尊嚴的！那怕是「黑幕」重重，依然有其堂皇的法律根據。現在地檢處的首席檢察官在法官法，已認爲「沒有調查的必要」，我想市參會的潘議長如果還要澈底追究，只好先去以身試法，親自到上海監獄去嚐嚐「風波亭」的滋味。否則這場監獄官司，看來是難於打出個名堂來的！

—— 15 ——

# 東北局勢的急遽變化

凌華

## 從遼陽棄守到鞍山失陷

遼陽是「潘南門戶」，是守遼陽必爭之地，遼陽棄守，就表示了潘陽南門已被打開。這樣，潘陽便已「三門」大開，所餘只是西面的「二門」新民了。河北省主席楚溪春，是助陳誠守遼陽的要員，他這幾天也對新聞記者承認遼陽失守對潘陽的影響了。他十七日對新聞記者說：

「遼陽為潘南門戶，遼陽轉進後，共匪圍攻潘陽，勢在難免。但潘陽城防鞏固，且有王鐵漢將軍負責指揮，安全決可無虞。目前潘外圍共匪以四個縱隊輪流攻擊，戰事相當激烈。但仍是一種威脅，目的在企圖孤立該地而已。」

我們且先不談潘陽。共軍對潘陽本市雖不停在攻擊，實際上只是以「車輪戰法」來牽制最主要的兵力，而企圖在潘陽附近吃據點，並在遼西吞吃有生力量。

二月十七日天津益世報上有一篇通訊「東北軍事演變」，除了詳述杜（聿明）熊（式輝）陳（誠）衛（立煌）的興衰史之外，特別指出目前的情形馬上就是冰雪融化、軍事困難益增、各據點孤立、平潘路打通無日。性急的人都說：「急驚風碰見慢郎中」了。

遼陽失守後，鞍山守軍當然不會再起什麼作用，不過遼陽名全亞甚至全世界的鋼鐵生產地，似乎也總要打一下才說得過去。遼陽的守軍本有一師多，鞍山或更不止此數。根據中央社的報導，鞍山戰事是十二日就開始的，「子匪痛擊」之後，就愈打愈兇了。到十四日，共軍由各方面進犯，「最近處距市區一里」。攻鞍山的共軍，有說兩個縱隊，有說四個縱隊，十六日「鞍山攻防戰依然激烈，殘共損失慘重，對鞍山之壓力仍不稍鬆弛，並企圖向潘陽方面進犯，阻止我援軍開往。」十八日晚，鞍山情況「已陷不明」，十九日「潘陽報紙公開報導鞍山國軍已轉移陣地。中央社則說：「十九日晨，戰事益趨最高潮」，北平報紙十九日專電則說：「鞍山情勢危殆，十九日十二時守軍電告，鞍山西各礦悉遭侵入，……刻殘共攻勢益猛」。大約鞍山戰事，到此已告段落。假如我們把東北戰史分作無數小段落，則這一星期可以叫做「鞍山戰役時期」。

## 新軍西走

在鞍山之役前後，還有三件事值得併提的，第一是新軍與屯戰爭轉劇，第二是共軍對潘陽進犯益趨猛烈，第三是共軍針對范漢傑部，在遼西部署，如今「大戰一觸即發」。

十六日報上登載，「共匪為切斷潘陽新軍間聯絡，連日正猛犯與隆店，昨（十五日）並集中炮火向與隆店射擊，而國軍亦配合轟炸及戰鬥機，以熾烈火力反擊，與隆店外圍各據點正為炮火摧成一片瓦礫，共匪陸續集結兵力達兩個縱隊以上，有必得之勢」。十六日「共匪對與隆店再集兵力，配合熾烈炮火逼進，企圖發動總攻」。同時「一部共匪攜輕重武器，會合大量民兵，向東移動，有增援新軍外圍之勢」。

共匪何機猛撲之企圖，刻新軍已陷孤立」。十七日與隆店爭奪戰「益為猛烈，共匪兵力一再增加，自西北兩方向與隆店逼進，與隆店對新軍及潘陽已逐漸失去聯絡。……刻與隆店情況極緊」。同日，「新軍外圍戰況益緊張，共匪繼續於夜間作普遍性之試擾，守軍仍固守陣地。聞共匪為整個孤立潘陽，有即猛撲新軍，完全控制潘陽段之企圖。新軍之大會戰，已近眉睫」。這方面的報導，似乎到此為止，以後的報紙上就不再提及與隆店，而新軍戰爭的更趨激烈，也不言可知了。

潘陽的戰事，和鞍山新軍與屯戰不可分，一方面共軍是牽制國軍，一方面共軍是阻止潘陽軍隊向各地援救。現在潘陽「市區中心地中山廣場，業已置有大砲數門，市內各砲堡亦佈置就緒」。潘陽十四日起就聽見砲聲，到十九日愈烈，戰區離潘陽只十五華里。津大公報載消息說：東北剿匪總部參謀長趙家驊，已經六晝夜未能睡眠。

為防守錦州及山海關了。共軍的鐵路，已由遼源、通遼經彰武、新立屯直達大虎山。國軍飛機日夜轟炸，並加入了加拿大的蚊式機，但事實效果如何還很難說。十七日報載這樣一則消息：

「遼西共匪為呼應東北各地即將展開之大會戰，大股兵力及彈藥給養自彰武經新立屯南下，向新軍迄大凌河間積極增援部署，並抽兵增防瀋陽一帶，刻已有相當兵力集結，係企圖阻撓范漢傑兵團之立體反攻。另李運昌所屬第九縱隊全部，則分別集結於錦榆段以西地區，其主力盤踞於錦西之西，潛伏備戰，聞係俟范兵團東進反攻後，乘隙大舉破壞鐵路交通，並與關內共匪呼應，襲擾各據點，以切斷關內外聯絡，陷范兵團於孤立，故錦榆段情況又漸趨緊張，惟國軍已嚴密部署，且鐵翼部隊連日出動阻止共匪行動，遼西共匪之企圖難望得逞」。

## 關於張作相·萬福麟·馬占山

在這情形之下，東北青宿請願代表張作相、馬占山、萬福麟等就要南下了。南下之前，幾位老年人集議一下，要有一個建議，這建議，我們是無從得知的。在幾次談話中，萬福麟相信只

要自己到東北去「振臂一呼」，歸順了共軍的東北子弟就都要「來歸」的。張作相不像他那樣樂觀。馬占山尤其，他在一次東北同鄉的談話中講到遼陽的重要。在黑龍江、嫩江、興安三省旅平同鄉會的歡迎席上，他說了一番話。我們把一個報的特寫節錄於下：

「馬占山身著便裝，對挽救東北決心及赴京備詢事關述甚詳。據謂：回到東北一年多，救鄉工作始終未能展開。東北行轅曾任我為松北剿匪總司令，而中央並無明令，又無具體辦法。有很多人勸我回到北平來休養，惟因故鄉父老在水深火熱中，同時我過去曾用東北青年血汗得了一點名氣，更不能忍心丟了他們，來北平苟安。東北已經到了這個地步，萬一丟了，國軍退不出來，共匪兵力當因此增強。彼時華北也危險，長江以南也不能穩，國本就動搖了。我們一貫主張，全國各地都當自救，只需中央補助子彈和武力相當強，每一農村都有自衛武力，所以地方很安靜。後經日本摧殘，勝利後曾從中央扶植，而終未能如願。我是軍閥時代的人物，過去打仗沒有命令，就如甲被打，乙一定聽從，只想自己的良心；良心也就是命令。」

要自己到東北去「振臂一呼」，歸順了共軍的東北子弟就都要「來歸」的。張作相不像他那樣樂觀。馬占山尤其，他在一次東北同鄉的談話中講到遼陽的重要。在黑龍江、嫩江、興安三省旅平同鄉會的歡迎席上，他說了一番話。我們把一個報的特寫節錄於下：



我能獲得一點小名譽，完全由於不願受人壓迫。國軍訓練確實很好，裝備也強，因為學的是陣地戰，就是不能打土匪。傅宜生的軍隊所以打土匪有名，就是因為地理熟，人情熟，能運用許多辦法。東北當地雖然可以抽丁編入國軍，但因為長官是外省人，言語等均有隔閡，

所以都未得到好結果。所以我們主張本地人帶本地的兵。國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中央雖有一定辦法，不過我們想建議讓地方人自救，自己幹一下，死也瞑目。要是現在這樣，死了也不甘心。云云。

從這一番話，似乎可以看出起用老年人有幾分把握。東北的情形如此，一旦形勢全盤收觀，最受威脅的是冀東。冀東是開採煤礦所

在地、青島上海的大部動力。馬占山從東北來，對現實的了解當遠在張萬（張作相）在天津，萬福麟北來後一直住在北平做寓公）之上的。如今也許就是這樣一死馬當作活馬醫吧。

向被認為合法組織，華北學聯代表也到行轅及各處拜訪請願談話，不知「受華北學聯領導」是不是罪名，如是，就很可能了。他是在離校外出時忽然失蹤的，經過詳下。

此點，我們將另有聲明。胡適在二月八日對新聞記者談話如下：「看情形並不太嚴重，而且據說經過一兩天的偵訊以後，可以移送法院。學校方面還沒有和警備司令部方面進行交涉，只是在探聽消息。」

# 北平的又一串搜捕事件

## 官方發表經過

在二月下旬，北平一部份當局突然「據密報，共匪準備於舊曆春節發動所謂「暴動計劃」，本市各治安機關暨大商店均普遍接到共匪署名「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犯調查部」之傳單暨恐嚇信。

海溝，一些往返於「解放區」和政府區之間的商人，以及鐵道學院的兩個學生（姓名不詳）等。

## 被捕記詳

我們現在把官方和民間傳說的逮捕情形，按逮捕先後記下來。

第一，根據官方發表，「宋泛（化名唐吉、董永祥、黎簡）為朝華書店職員，供認加入共黨為匪作文化宣傳工作」。這人被捕，早在一月上旬。朝華書店是北平僅有的兩三家新書書店之一，為生活書店等的特約經售處，自從中外出版社被封後，朝華已受過不止一次的搜查了，但始終遵守法令出售書籍，所以沒有被封。而且這位「宋泛（化名唐吉、董永祥、黎簡）」又不是主持人，不過是一個小職員，所

以被捕原因，很費猜測。但有一件確實的事，却可以報導的，就是被捕者在被捕兩天以前，曾在電車上因為一個便衣人物不肯買票並凌辱售票員而上前打抱不平。便衣人物氣勢洶洶地問：「你是幹什麼的？」他據實以答，朝華書店翌日即遭搜查，又一日而他自己被捕。

見經傳，據說是民社黨外圍組織，因「社會主義」四字引起疑心。民社黨新派發表，他是「中國學院學生，本黨黨員」。可見官方發表的舉措是有誤的。

逮捕的情形，外間所知者如上。春節前夕，北平人大放鞭炮，據說十年倒毒日子今年到頭，從此要趕走毒氣。而這九個或是十幾個「共匪」既已被捕，當然不會再有「暴動」，果然平安過去，可見各治安機關的豐功偉業。學生們却為此鬧了起來，並鬧了一個控訴示威大會。根據學生的快報公佈，胡適對學生說，這些人是被「中統」捕去的，並聽說這些人關在X池子X號辦事處云云。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犯調查部」之荒謬警告函件，由郵局分寄國民黨各級幹部人員，其寄發地點不在一處，其所用信封分別盜用各機關名稱，所以治安當局一乘其尚未發動之際，予以搜捕，計捕獲宋泛、范光斗、宋國柱、顧華明、高同慶、徐啓恆、鄭長風、孫寶言、鄧特等九名」。（以上都見於中央社稿）

實際上據外間傳聞，被捕的尚有輔仁高中部教員閻

第二，閻海濤是寫詩的人，作品有「零下四十四度」等，平平而已。一月下旬在西城某飯館被捕，據說因通信被查出激烈語句，而遭逮捕。閻外出時曾告人去與朋友同吃飯，而至晚不歸，捕人者來將行李及書信等取去。

第四，宋國柱（北大學生）、高同慶（清華學生）、鄭學純（官方發表他「無業」，名字是鄭長風，事實上他是清華學生，名鄭學純）、范光斗（輔仁學生）。

北大人權保障委員會二月八日發表的報告如下：「自看到今天報上登載警備司令部發表宋國柱、鄧特等同學之「罪嫌」後，我們即去訪問胡校長，胡校長表示願意立即催促警備司令部，請其依法移送法院辦理。至於公佈的「罪嫌」，胡校長認為亦多不能成立，關於

胡適在二月八日對新聞記者談話如下：「看情形並不太嚴重，而且據說經過一兩天的偵訊以後，可以移送法院。學校方面還沒有和警備司令部方面進行交涉，只是在探聽消息。」

第五，鄧特，北大學學生，官方發表他「曾在二〇八師入伍，現在北大讀書，係復員軍人，受華北學聯領導為共匪宣傳」。華北學聯一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第六，孫寶言，據官方發表，他是「華北學院學生，為華北學院匪份子之領導」。顧華明，一切不詳。

捕去徐啓恆(中大學生)，皆飲黨黨員，捕去多日，下落不明，當即具函請爲查明示覆。夫憲政修明、人權有保障之國家，事無鉅細，必須根據法律，即以捕人而論，非經過正式法律手續不可，既捕之後，在二十四小時內，非送交正式法院拘禁與公開審判不可，否則便是違法，民即譁然。今宋國柱等之被捕，無論是何原因，然不經過正式法律手續，顯然易見。某對此事並無他求，惟求飭令經手捕人機關應立將宋國柱等即送地方法院公開審判，使案情明白於天下，被告例得延請律師，爲之伸辯，藉可表明公平，庶免指鹿爲馬。明公對於學潮措施寬大，口禱久在民間，此事發生，或因明公國事繁勞，未及過問，抑或下級官吏不明法紀精神，擅作威福，皆不可知。特此再具函陳明，務祈亮察，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敢獻蕪蕪之見，不避斧鉞之誅，肅候動祺，餘不一一。

### 學生的主張與胡適的態度

當被捕者遭囚禁時期內，外面無法知道詳情，謠言很多，都被捕者的親友備加担。到十七日，北大要緊把鄧特保釋就醫，總算經過警備司令部允准，送入指定醫院，這時大家才知道鄧特還未移送地方法院。鄧特出來了，外間不明瞭一些情形，現在我們完全根據北大學生自治會和北大人權保障委員會發表的公開報告，報導比較詳細一點的情形。

第一個文件是北大學生自治會理事會和人權保障委員會的一張聯合通告，節錄如下：

昨天(十六日)我們會同常駐會代表于上午十一時往見校長，校長外出，由鄧秘書代見，我們除口頭申述要求請爲轉達外，並留下一封信，內容主要有三點：

(一)警備司令部所公佈鄧特同學的罪名為「接受華北學聯領導，爲共匪宣傳」。(按：這點已由華北學聯秘書處發表聲明嚴正駁斥

續，要他拿出證據證明華北學聯是共產黨；如果能夠證明華北學聯是「共產黨」，再能夠證明鄧特果真是「爲共產黨宣傳」這一事實，這罪嫌才能成立；學校當然盡力交涉釋放，鄧特既然有病，學校擬去正式公函，附醫院證明書，同時託人說項要求保釋，校長說這樣做法可以較法理上的辯駁更有實際的效果；此外，鄧特雖曾爲青年軍，但既退役，當然便無軍人身份；至于已移送法院的同學，學校當以孟憲功的辦法委託辯護人進行訴訟，沒有問題。

下午一時，我們訪謁賀麟訓導長，重申上述三點要求，賀訓導長說十二日報上登載被捕同學皆移送法院時，以爲鄧特也在內，昨下午送食品去法院時(按：理事會曾于舊年除夕時，備若干食品，請訓導處轉警備司令部，送給宋鄧二同學)，才知道鄧君還羈押在警備司令部，並未移送法院。賀訓導長也認爲警備司令部所公佈鄧君的一罪嫌「不能成立，學校這幾天即已開始向有關當局交涉，但舊曆新年各機關多不辦公，所以聯絡方面發生困難，同時訓導處已派董訓導員負責與警備部接洽，而這位董先生却到了天津去。賀訓導長決定下午同鄧教務長親自去見陳繼承司令商談……晚六時，……改在明天去。……七時，我們見到校長。校長亦認爲當局所公佈的鄧特的「罪嫌」不足構成逮捕的理由；並說首先華北學聯可以聘請律師控訴警備司令部發言人的誣

續，要他拿出證據證明華北學聯是共產黨；如果能夠證明華北學聯是「共產黨」，再能夠證明鄧特果真是「爲共產黨宣傳」這一事實，這罪嫌才能成立；學校當然盡力交涉釋放，鄧特既然有病，學校擬去正式公函，附醫院證明書，同時託人說項要求保釋，校長說這樣做法可以較法理上的辯駁更有實際的效果；此外，鄧特雖曾爲青年軍，但既退役，當然便無軍人身份；至于已移送法院的同學，學校當以孟憲功的辦法委託辯護人進行訴訟，沒有問題。

### 學生團體公佈鄧特被捕受刑經過

鄧特終於在十七日送入市立醫院檢查，又轉入德國醫院了，十八日自治會和人權保障委員會去訪問他，十九日又去看他，回來之後，發表了一個報告書，全文載快報第十三號，如下：

「鄧特同學自經校方保外就醫後，校內校外人士皆極關心。茲將訪問鄧特情形公佈於后：

(一)被捕情形 二月三日下午二時鄧特同學在自三院宿舍走往紅樓的時候，有一個面目生疏佩帶北大校徽的特務人員在後面追蹤，待走到北河沿銀閣胡同時，該特務突然將鄧特同學抓住

，並說：「你是鄧特嗎？有位×××小姐請你到××胡同××號開會」。

「我沒有會開，我也不認識她」，鄧同學說。

「我們都是自己人，何必……」。

「甚麼自己人，我根本不認識你」。鄧同學氣憤起來。

於是該特務再不由分說，強行拖拉，同時從旁邊又跳出來一個特務，持槍綁架，架向胡同內警察第六分局而去。途中鄧同學欲喊求救，特務即不斷用槍柄打擊他的頭部。這時四周的老百姓圍攔上來的時候，特務說：「你這小賊，架到警察局後蒙上眼睛，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輛汽車把他裝跑了」。

(二)非法刑訊 鄧特被捕後，即關在一個黑森森的牢獄中，裏面骯髒臭氣，八九個人擠在一起，衣服不夠，又沒有鋪蓋，冷得怕人，每天只發幾個窩窩頭，總是吃不飽。這倒不是小事情，最可怕的是嚴刑拷打，他們爲要討得口供，用槍柄擊打他的肩膀，而且還灌了兩次凉水，每一次都是把他按在板凳上用龍頭向面部猛沖，口鼻氣閉了，一要呼吸，水就灌入，灌得肚皮像一個小鼓，漲得要爆炸了，昏厥過去，他們又把他拖起來走動，待他回轉氣來又灌，然後

他們用腳對他肚子上踢，水從口中冒出來，這時叫你欲生不能，求死不得。更殘忍的，他們又叫鄧同學坐老虎凳，就是把手脚在兩個分開的板凳上綁着，在腰部下面用東西墊上來，墊得腰部要斷了，痛得昏倒了，再用冷水一噴，又活轉來，於是再墊(直到現在還是傷痕累累)。

(三)逮捕之藉口 鄧特同學遭次逮捕的藉口是：因爲他是奔流壁報的負責人。他們認爲奔流言論激烈，定有人在後面主使，所以他們抓來拷打，想找點線索，事實上，奔流是在學校訓導處登記過的合法團體，發表的文章多爲學術性的探討，反映同學們的生活，無論如何不能構成犯罪之理由，至於其他更毫無證據，由此，鄧同學之冤獄實爲顯然。

(四)病情 鄧同學在被捕前即患病，再經過這半月非法監禁，又屢受酷刑拷打，身體更難支持，於是病倒獄中。警備司令部在不得已之情況下，才答應學校保外就醫，並指定送德國醫院醫治。

現在鄧同學的病情相當沉重，頭部時常作痛，口乾咳嗽，吐痰，手及嘴唇時常發抖，但截至目前爲止，鄧同學之病情，醫院尚未發表

現在鄧同學的病情相當沉重，頭部時常作痛，口乾咳嗽，吐痰，手及嘴唇時常發抖，但截至目前爲止，鄧同學之病情，醫院尚未發表

鄧特談話的筆錄，

也由北大自治會和人權保障會發表。內容大要如下：

「二月三日下午二時，我從三院到紅樓，去到銀閣胡同東口，就有兩個人走近來（他們跟着我背後），他說：『×××請你去開會？』我說：『我不認得她，開什麼會？』他們強迫我走，他們帶北大校徽。老百姓圍着看，他們說我是小偷，把我拉到六分局，我的後腦被打了一個大疤，後來就來了一輛汽車。我問他們：『爲什麼要抓我？抓我到什麼地方？』他們說：『我們是自家，不要緊。』我們坐汽車走了二十分鐘，後來又換了一部汽車，走了十多分鐘，我的眼睛是蒙着的。這時我被架上階梯，到了一間很小的房子，然後把我的眼睛打開，來了一個穿西服（好像穿中山服）的人，對我說：『你來了這裏，要好好守規矩。』當天晚上有人來問我參加過什麼團體，事先還有個人來和我談，隨便聊聊，問我認得那些人，如孫清標。……他說：『他們都走了，你不要緊，可以放出去的。』但是後來就擺出桌子來審問了，問我參加什麼團體，我說參加奔流和壁聯。他說：『壁聯是中共團體，你爲什麼參加？』我說我是壁報負責人，被選爲代表，所以他問我壁聯有什麼

人，華北學聯有什麼人？我說「認不得」。他說「爲什麼認不得？」我告訴他從前是孫清標轟運華。『華北學聯組織如何？』我說：『不曉得』。後來我說：『大概有宣傳總務學藝，因爲我沒有參加，所以不清楚。』

「你和孫清標一起工作，你知道他幹什麼的？」我說：『我不知道，我知道他在院聯會負責。』又問我一些壁報的負責人知道不知道是誰？我說不知道。但他說：『你騙不了我，我都知道了。』於是他說了好些名字，又問我學校那些是共產黨首要份子，我說我不是共產黨，那裏知道誰是共產黨？他說你怎麼不知道，便打了我個耳光。又問那些同學比較激烈，我說我看大家都差不多。他又問校外共產黨與校內共產黨是怎樣聯絡？我說：『我怎樣會知道，我不是共產黨。』他說他們在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開會？我說我怎麼會知道？他說：『要叫你吃些苦。』於是把我捆起，坐老虎凳。他又說：『你到過學生公社沒有？』我說：『去過。』「那是什麼地方，你知道他們幹什麼？」（按：學生公社是基督教會辦的學生救濟機關），我說我是請求工作自助，幹過兩個月，後來身體不好，我不幹了，第一個月十二萬。於是

生公社是什麼人辦的弄不清楚，只是裏面是左派分子。」「華北學聯的錢從何來？」

「我只知道是各自自治會各交會費。」「壁報聯合會的錢從何來？」「各壁報交會費。」「怎麼會夠開支呢？各社團的錢從何來？」「各社員自己出。」「你爲什麼要創辦奔流？你既無錢，又辦壁報，鬼也不相信。你一月領多少津貼？」「我們自己辦的，根本沒有津貼，每人每月出一兩萬就夠。」「現在物價這樣貴，一兩萬怎麼夠？」我說：『人多，湊合就夠了。』「你是什麼時候加入共產黨的？」「我沒有參加共產黨，沒有參加任何黨派。」「你一定是共產黨，你到這裏應該坦白。』他說：『一年來做了些什麼，我都知道。你每日做什麼，我都有日記。』（他拿出一本日記來）。」「既然有日記，你們說好了。」「我不給你看，就要你坦白。』他於是舉出我的「證據」來，如辦奔流社，言論激

烈，參加壁聯。（「爲什麼壁聯沒有黨團壁報參加」，就足以證明壁聯是共產黨）……總之，要我承認是共產黨。

於是，他又把我捆住，拿了一壺水向我口裏灌，我暈了，醒來時看見有人給我做深呼吸。老題目又來了，還是咬定我是共產黨，於是又灌了一次。」「你看過共產黨的宣傳品沒有？」「我看過。」「那些宣傳品是誰給你的？」「那是充信箱裏來的。」「你參加抗暴沒有？」「我參加遊行。」「你參加反內戰反飢餓沒有？」「我怎麼會不參加？」「你得到多少錢？」「我怎麼會得錢？」「你太傻了，人家得一袋麵粉十萬元。共產份子辦了一個訓練班，你爲何不去？」「我根本不知道。」「你騙不過我，你一定知道誰是共產黨，你就不是共產黨也一定和共產黨接近。」

識份子。我說「我沒有什麼話說。』他們便走了，留下一個人看我。我睡著了，沒有被舖。後來他又來了！「你考慮那麼久，還有什麼話說？」我說沒有話說，他說你將來吃苦我不管了。第三天，又一個人來問我：

「北平的報紙那些是左派的？」「我不知道。」「那麼你們學生的報紙呢？」「燕京新聞，中大新聞。」「外埠的報紙呢？」「華商報……」「人家反內戰反飢餓，你也反，你多傻……我看你還老實，你中毒還不深，你認王連平嗎？」「認識。」「你認得女同學嗎？」「男同學我認得多，女同學很少。」「你有什麼困難嗎？經濟不困難嗎？」「我沒有困難，我有公費。」「你大概今天或明天可以出去了，但是你要坦白，第一你告訴我你的困難，第二你以後行動要守紀律，第三你在最短期間內要打進共產黨的組織，我可以幫助你，你要參加我們的組織，你的工作只要去知道去打聽就行

了。』說到最後，他還要我參加他們的組織，他十二點鐘再來，並聲明我絕不能告訴別人我到過這裏。我從一塊石頭下翻出一信封，有信街是「××司令部特別高級組。』

當他臨走時，我說我不參加任何組織，只好好讀書。」「你想有什麼需要？」他說。但他十二點鐘沒回來。到第二天（大約八時）他們又把我捆上，我蒙上眼睛，這時細我的人有那個戴北大校徽的人。這樣到了一處，後來聽說是×局。眼睛打開，我看見是一辦公室，將我檢查一遍。」「你到這裏來就不必怕了，你只要坦白就得了。』於是有一個兵帶我見一個軍官，他問我犯什麼罪，我說我不知道，他是登記的，把我登記爲「共產黨嫌疑犯」。我被拉到一小室，九個人住。大便也在那裏。第二天才有一張很小的被，又臭又髒又薄。六號早上，我被傳出

的案子，你只要坦白就行了。

六號下午，又把我叫出去。有好些人在，他們穿西服，長袍，等等。其中一人說：「我們不是審判你，我們在這裏，知道你也，很感興趣。我們來辯論一下，你做國民黨我作共產黨來辯一下。」

「你反內戰就反征兵征糧，……這是戰亂時期，你犯了什麼法。……你們對自治會的規則不滿意是不是？」

「是。」

「我是奔流報的忠實讀者，你每一篇文章我都讀過。」

「很感謝。」

「反內戰反飢餓是共產黨城市政策。」

「我做事本真心，不知道別的。」

「你要坦白，你想想我們在解放區捉了我們就要我們坦白，現在我要你坦白了。」

「我不是共產黨，不知道解放區。不過，我可以坦白。」於是我把身世告訴他，他說我只坦白了百分之四十。

他又問許德新和樊弘先生怎麼樣，我說還好。

之後就走進一人（後來知是大隊長），在我的肩上一拍，說：「老弟，你要坦白呀。在這裏不知有多少青年坦白了。他們比你還滑頭。」

「……」

「不管你是不是共產黨，你是向共產黨路上走。」

「這不是給你一個打擊！一個人插口。」

「我想一下。」

「你腦筋不靈敏，任何一句話都考慮。」

「我覺得很有趣。」

「你研究過共產主義嗎？」

「沒有……」

「你們學政治的為什麼不學共產主義？」

法官就把我們九個學生叫去訓了一頓話。從抗日戰爭到太平洋戰爭起一直罵到我們學生。「解決的途徑，只要你們坦白，坦白後政府從不追究。你們寫悔過書，找兩個舖子就行，沒舖子找兩個同學也行。」那法官姓羅，自稱也是北大的，所問的與特高組一樣。這樣讓我回去，半個鐘頭後，他來問我在「一二一」時幹過什麼，我說撒謊，貼標語。

九號又把我叫去問了一遍，依然是那些問題，又叫我再反省。以後一直沒有問到我，出來的前一天下午要我穿上自己的衣服把我送到警備司令部看守所第二號，裏面有許多人在，臨晚，讓我和看守的兵住在一塊。第二天（我出來那天）又問了一遍，特別提起同濟的事，後來通知我是學校來保出外就醫，囑我就醫時不要管閒事不要洩漏秘密。

X局中關了三百多人，原名叫「XXXX青年訓練大隊」，據說華北有五個。犯人有五十多名，其他叫學員，受訓。同室九人中有從解放區運糧、運雞來的商人，也有民兵，年齡從十二歲到龍鍾老人，約兩人可得一被，一天吃兩頓，上午九時每人高頭四個，鹽白菜湯一碗。下午晚餐吃生米飯，有一小碗。早飯前小時出外，集體大便集體洗臉，晚飯後有一刻鐘可出外大便。

過年時吃一種黑饅頭。其中有肉。還演了一次京戲「二進宮」。有八個民兵向我們廣播講演，他們為什麼投誠，現在政府對他們怎樣好，一個是支隊長。還有一個很年青的聲音，自稱參加蘇聯革命，當紅軍准尉。還有一個李先生講「動員戡亂的認識」。我看見過一個女同學被抓進去。

關於這事結果，還難預測，北大自治會理事會人權保障委員會十九日發出的通告是這樣的：「本會於昨晚（十八日）晉謁校長，因校長未在家

，當即趨訪鄧秘書，扼要報告鄧同學被捕經過及在獄中慘遭非刑拷打之情形，並書面提出四項要求，請代為轉呈校長立刻向警備司令部交涉：（1）警備司令部所宣佈的「罪嫌」，校長和我們都認為根本不能成立，「偵訊」十餘天亦無絲毫罪狀可言，應立即無條件釋放。（2）鄧同學無辜慘遭毒打，傷勢嚴重，醫藥費用應由警備司令部負擔，設有殘廢或其他不幸事情發生，警備司令部應負全部責任。（3）全體同學對鄧同學傷情病況備極關切，請向市立醫院交涉，立即宣佈檢驗結果。（4）賀訓導長會向本會代表說過，當初警備部答應由學校任擇市立醫院或北大醫院為鄧同學療養，同學認為鄧君係本校同學，如在北大醫院，更便於照料保護，請立即向警備部交涉，轉北大醫院。

最後希望校長本愛護學生維護人權的立場，向警備部嚴正抗議這種濫施威權摧殘青年的非法行為。本會並擬於今日再謁校長，懇切陳述同學這種迫切的要求，結果容後續告，請大家注意。（二月二十日寄自北平。）

學生的抗議與四項要求

本刊發行部啟事

本期刊前為便利遠各地讀者，曾規定：訂閱本刊，郵票代洋，十足通用。惟近來各地同業亦均以匯款不便，用郵票代替貨款，致本刊收到郵票積存過多，郵局又不允兌換，茲不得不重行公告：除遠各地讀者匯寄作為訂費者外，暫不收受郵票，否則按九折計算。敬希各地同業諒察為幸，此啟。

時文 刊週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發行人 程博 編輯者 洪 經理部 上海 電話九〇二一九

訂閱價目	
國內	國外
三個月 十二元	三個月 十五元
半年 廿二元	半年 廿六元
全年 卅九元	全年 四十五元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三八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八號



# 時評

## 第二卷 第二十一期

春季物價上漲的風暴……林滄白

論士大夫……吳吟

中國官僚政治在現代的轉形……王亞南

析「和論」……余望白

兩個朝鮮……潘公昭

關於許壽裳先生……景宋

美援小品(雜文)……商翼

潘陽外國之戰……凌華

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胡光

和民盟三中全会……

皖南七共企圖打通……

直抵長江南岸的走廊……

農村的盤剝方法日新月異……

關於縮減篇幅的聲明……

編者 丁溪陽 漢

### 春季物價上漲的風暴

林滄白

新春後，大局沉重，物價，作為政治局勢的情雨計，又一次急遽的在變動了。二月第一週，物價已經不穩，不過終因清償債務的積習的限制，未釀成大災。第二週，正值舊曆新年，市場休息，第三週，紅盤做開，物價因時得勢，漲風就此掀起，至第四週漲達新高潮。是周上海物價有如下表所示：

類別	較上週上漲%	對廿六年一月倍數
一般物價	二五·八五	二九·二八
食物類	二五·八九	三三·一八
紡織品	三四·五八	二八·五三
金屬類	一六·七六	三〇·七四
建築材料	一六·四五	一八·九二
化學品	二四·二六	二八·一九
燃料類	二四·七六	二三·七四
雜項類	二八·九〇	三六·五五

這次物價漲勢的不平衡，是顯而易見的。食物類、紡織類、日用品類上漲最快，這些都是民生必需品，故其上漲對大眾生活的威脅也就愈加嚴重。但相反的，對另一些人的生活却仍是無關痛癢的。一方面是地獄，一方面是天堂，兩極的對照日益明顯，而局面的維持也就日益困難了。

這次物價波動的幅度也是空前廣闊的，上海批發物價的總指數，二月第四週較第三週上漲百分之二五·八五，第三週較第一週上漲百分之二八·二二，而今年二月則較一月上漲竟達百分之三十一。如以月指數來說，去年每月平均的上漲率約為百分之二十五，而今年二月則較一月上漲竟達百分之三十一。物價波動的幅度愈來愈廣，殆已成爲今後的必然趨勢。

至於這次物價上漲的原因，從純粹經濟的立場來說，則由於舊曆年關後游資過多，又一次物價週期波動是無可避免的。但這次漲風的猛烈和急迫，則顯示出非經濟的因素之重要：第一個顯著的現象，就是東北、華北游資的大量來滬，而這正說明了東北華北軍事局勢的嚴重。第二個現象，就是市場謠言紛起，人心浮動，因此，在市場上板貨不放，有買無賣，重物輕幣的心理越加顯著。而這正反映了當前政治局面的不穩定性。在經濟、軍事、政治錯綜複雜的影響之下，游資沒有出路，便與風作浪，到處流竄了。

一九四八年將是不平凡的一年，而這次漲風正是不平凡的開端。

本來在舊曆年關以前，當局對付物價，是煞費苦心的。爲配合加強金融管制，緊縮信用起見，會明令規定：各地對上海、廣州兩地輸送現鈔或匯寄款項應有限制，目的就在防止資金過度集中都市，以求物價的穩定。同時對「經濟戡亂」一加強推行，經濟警察全體出動嚴密監視市場，如有乘機抬價的商人，則一決以擾亂金融論罪，逮捕嚴辦。而工商貸款，也沒有開放。但這些辦法實行以後，效果怎樣呢？只有使正當的工商業陷於更大困難，而漲風依舊是一陣緊似一陣的吹來。儘管如此，新措施還是層出不窮。舉幾個例：

當局限制票據抵用的辦法，最近即將嚴格執行了。在三月十五日前，各行莊須將所有訂立抵用契約的客戶、戶名、帳號及其約定額度，呈報金融管理局。此辦法旨在：一、分期禁止票據抵用。二、對抵用加以限制，可使客戶及銀行雙方負法律上的責任，抵用額度可因此減小(上海金融管理局副局長談話)。而其最後目的在求減少通貨的流通與信用的膨脹。但是，以工商業而論，在目前，其資金已極短絀，如當天收到的款項不能運別，則週轉更將不靈。並且現時利率高昂，每筆資金多攔一天，即增加一天利息的負擔。至於和銀行締訂契約，事實上困難很多。因爲大部份工商業家如無特權人物撐腰，就不易容「兜得轉」，一吃得開，尤其是中小工商業，更感困難。最近社會局發表的解雇糾紛，不僅百分數增加了，而且還特別說明了當前中小工商業歇業倒閉的日益增多。工商業的不幸，將爲社會動盪不安增添了更嚴重的因素。以

金融業來說，這種限制票據抵用辦法的硬性規定，也極不合理，如對信用良好的客戶，有鉅額抵用，即可臨時接洽處理，硬性規定數額以後，則毫無伸縮餘地了。抵用與透支實為兩件事，目前是答應抵用的客戶，即使遇到退票，也可於短期內解進。行莊代墊頭寸，至多一二日，如改訂透支契約後，反須長期准其透支，這在行莊與客戶都感不便了。結果，勢必將一部份資金驅出正當金融機構，造成現鈔收付頻繁的現象。

當局又提高存款利率到一角五分，想藉此吸收商業行莊的資金，而便利自己每天票據交換的差進，在表面上可以裝點好看的門面；可是現在這種人為的差進，已是拆穿的「西洋鏡」，不值得重視，對市場沒有多大影響了。例如過去的二週，差進數字，就在四萬萬以上，但對物價有甚麼作用呢？存款利率提高後，中央銀行負擔加重，結果是當局自討苦吃而已。

此外，棉花憑證移動的規定也快要實施了。棉花移動，先須呈請得到准許的證書。不用說這辦法是違反了財產移動自由的權利。即就其效果來說，也足以遏阻棉花的來源，使棉荒更將嚴重。政府以為限制移動就能減少投機囤積，以憑達到抑平市價的目的，這又在經濟政策上犯着形式邏輯的嚴重錯誤了。

總之，物價的上漲因素已超越了經濟的範圍。因此也就不能單在經濟上想辦法，而經濟政策的錯誤，則更加深了經濟危機的嚴重性，並加速了經濟崩潰的到來。這次二月漲風便是一個富有教訓意義的例子。

× × ×  
隨着內戰形勢的演變，城市的圈圍愈來愈小，內戰的一方採用「剝奪」或「吃蟹」戰術，就經濟上的意義來說，只不過是削弱或打擊對方戰區經濟體系使其愈趨惡化，以影響戰力對比而已，似乎不能被解說為「城」「鄉」對立的戰爭。他們何嘗不需要城市？而在這一方，城市裏又何嘗沒有對立？

城市裏的對立，顯示着政府的苦悶。因為內戰經濟體系的加強，往往就是城市經濟紊亂的加速。通貨的惡性膨脹，加重了城市工商業與薪津階級的負擔，已是人人皆知的事實，用不着多說。這裏且另舉一兩個近例來說。

最近武漢米價狂漲，其原因一經有關方面查明，主要由於購買軍糧的糧款，平素被人挪用，未能深入產區陸續公平收購，同時一在付款技術上又有很多問題，以致造成狂漲。並且，湖北省田糧處在年底時搶購了四萬軍糧，在事實上已不敷供應，一忽然廣州方面又來了兩批人在無限制地搶購，因此又平添了一道刺激，而湖南省田糧處一為了解繳軍糧的運費，也乘熱鬧騰到武漢來搶購了若干担。一（均見二月廿五日大公報漢口專電）。搶購軍糧，放價收購，對於民食，有極大的影響，而款項被人一挪用，一到緊急催繳，就在當地一搶購湊數，這不祇是在武漢如此，即在無錫，在蕪湖也莫不皆然。這一「挪用」款項的人物不就可以從中漁利，上下其手了麼？安得不使糧價一狂漲，而什麼「田糧處」，「救濟會」，不也藉口什麼「軍糧」，什麼「救濟

一趕湊熱鬧，撈上一把麼？這樣，就把一切苦難的負擔都移嫁給城市裏廣大的民衆了。於此，原是不上所謂「城」「鄉」對立的。

又如棉花的收購，也引致棉價的狂漲。去年全世界產棉量均較往年為多，我國產棉亦增加二百萬石，且產棉主要區域如漢口及洞庭湖畔，交通運輸並無困難，棉花應尚有來源，加之美國援華貸款五億七千萬元內，規定以一億七千萬配購美棉，依現價可購三百萬担，將來全部輸入我國，棉花供應大可改善。但因「目前中紡及農行代購棉花成績甚好，舊曆新年元宵以前，往年均停收購，今年則反加緊辦理，故各地收購量，均甚可觀」（二月二十四日大公報）結果，棉價反而狂漲，以至政府要來管制棉花的移動。

米、棉狂漲的這類怪現象，該不能歸咎於「鄉」對「城」的破壞與擾亂吧？在官僚資本的漁利政策下，無怪廣大的民衆更貧苦了，城市的經濟更紊亂了。而這批官僚資本，鑒於中國政局的不穩定性，都把所「賺」的錢移入安全地帶的美國，據最近馬歇爾的援華報告：截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止，估計中國政府在美存款總額約為二億七千四百萬美元，而中國私人在美的存款，較此還多二億美元以上，即約為五億美元，在通貨膨脹下，中國私人資金逃避愈多，這些財富存入美國什麼銀行，這對中美政府都是一個謎，不過據馬氏透露，若干政府要員也在這一存款人名單內。這一事實，足够說明「民死」政策的奧秘了。所以，當前的戰亂，不能說是城鄉的對立，這是不想死的人，甚至想過較好生活的人，與另外一種人的對立。

× × ×  
問題再回到這次震撼人心的物價漲風上面來。  
這次漲風到了二月第四週的週末，稍見平穩了，由於上漲猛烈，相對地抵銷了籌碼對市場的作用，銀根可能趨緊，而出現盤局的階段，但這盤局能維持多久，何可樂觀？因為當前的物價，已不是一個經濟的問題了。祇要大局稍有擺動，就對市場的升降有着嚴重的影響，而今天的大局已從這次漲風中顯出牠的不平凡了。

當前的問題，並不在這一盤局的能維持多久，因為這是任何人都能想像得到的。而值得注意的倒是：在物價不斷狂漲下，工商業將愈加枯萎了，勞資兩不利的局面將愈加惡化了，而民死政策也因為局勢日趨緊張而將變本加厲地推行了。這一切是會加速局勢的演變的。而這次春季狂漲的風暴，不正是預示了今年不平凡的開始麼？  
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

## 本刊訂戶注意

本刊自本期起縮減篇幅為十六頁，為使舊有訂戶免受損失，凡訂閱尚餘五期以內者，延長一期，十期以內延長兩期，餘類推，敬希台鑒！

時與文週刊發行部啓

# 論士大夫

吳晗講 文琪記

(本文係吳氏在清華大學之演講，筆錄後曾由講者加以修正。)

以前曾向大家講過的一個題目是「論官僚」，今天講的是「論士大夫」，以後若有機會的話，要講的題目是「論紳士」和「論知識份子」。所以要把這幾個題目一起提出來的原故，是因為這只是一個東西的幾方面，正如你可以是河北人又是清華學生又是中國人，幾種不同身份的同一種人。今天只就士大夫來說，抽象的一部份可以使我們了解到士大夫是甚麼人物。士大夫是封建社會的產物，而今日的知識份子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許多士大夫的劣根性仍然保存在今日的知識份子中間。關於知識份子，我準備放到另一個題目裏去說，但是因為他們兩者之間有着相連的關係，所以今天也許會提到一些，那是無法避免的。

我先講士大夫的本質或定義。原來大夫是在士之上的，古代的士是武士而非文士，士的職務是戰爭，好像下象棋時「帥」旁邊的兩個「士」一樣。士是被人家養着的，就如養雞養狗一樣，吃誰的飯就替誰做事，要想吃得肥吃得飽就得賣勁去幹。由於社會的改變，士不能被人家養了，甚至連養士的人都得被人養，於是士就要改行，替人講故事啦，做結婚時候的債相啦，辦事打雜，作祕書跑腿啦，士就由武士而變為文士。士找不到出路的時候，在選舉徵辟等等制度之下，巴上了高枝兒，直接被養於帝皇，成為官僚，亦即古代的大夫，於是士大夫又牽連在一起。

士大夫有幾個特徵。第一，有受教育的特權。士大夫有特權囤積知識，就像商人囤積各種貨物一樣，待價而估。而一天辛勞到曉的勞苦大眾是沒有這種權利的。就這一點而論，士大夫和今天的知識份子完全一樣。

第二，是居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對統治者來說是奴才與主人的關係。奴才是要忠心替主人服務的，依權附勢，好在其中啃到一些殘骨頭來養自己。對老百姓來說，則他們是主人而老百姓是奴才。拚命的剝削，兼併土地，包庇賦稅，種種事情都是他們幹的。這種兩面人物，對上是一付臉孔，對下又是另一付臉孔，而這臉孔是用一塊布蒙住的，這塊布就是「仁義道德」。對上面是勸他要採取寬容作風，這就是古書上的「仁政」「德政」，用現代話來說就是「養雞吃蛋」，為了長期打算，勸主人不要殺雞取蛋。對老百姓則欺騙，可以造出種種理論，百姓沒有吃則說應該供養有功的人；而他們是保護你們的，何況你們還可以有草根樹皮空氣。理論之外還有種種刑罰，今天則除了刑罰之外還有機關槍手榴彈。要使得老百姓絕對服從，不能有絲毫反抗。兩面作風，一個道理。現在也有人將這個道理說穿了，就是不要變不要亂，即使變的也要

一點一滴慢慢的變，無論如何不能亂。今天的報刊上也有這種論調，為的是要保持既得的利益，一變一亂就會喪失他們既得的利益，在兩面作風之下他們走的是中間路線，也可以說這些就是所謂「自由主義者」。

第三，有種種特權，如免賦稅之權，免稅之多少，依官級而定，官愈大所減愈多，歷朝都有一定的規定。此外又有免役權；担任各級官吏之權；不做官而住在鄉間時，有享受特殊禮貌之權；包辦地方事業之權；打官司的時候也可以去找他們，他們有奔走公門之權；蓄養奴隸之權；走私漏稅之權；子孫有繼承做官之權。他們可以用師生同年的關係互相幫忙，可以引用同鄉親戚朋友造成政治上一般看不見的力量，在任何角落裏都有人情面子，條條大路都可以通行。

第四，士大夫只有權利而沒有義務，可以不當兵，不服役。地方官當然不會自己掏腰包或者自己去當兵，所有缺額都由這個地方的老百姓去負擔，一個地方的士大夫愈多，那個地方的百姓就愈苦。遇有特殊事故時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出力的固然是百姓，出錢的也是百姓。例如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攻打北京城，正在危急的時候，皇帝命令文武百官獻金銀款項作守城之資，可是大家都不肯拿出來，出得最多的還是一般商店平民。等李自成一進城，達官貴人吊起來一打，通通都把金銀珠寶獻出來了。這些人不但不出錢不出力，甚至混水摸魚，到處跑跑腿，印印捐冊，錢自然而然的經過他們的手就會進入他們的腰包裏。

第五，因為知識專利，所以輿論也專利，歷史上所謂的「清議」或者「輿論」，都是士大夫所包辦。只有他們才會寫文章，只有他們才有資格講話，老百姓是沒有份的。東漢後期的太學生，明末的東林黨，清朝後期的變法運動，都是站在士大夫立場與另外一個損害他們利益的集團的鬥爭，與老百姓的關係可說很少。像今日報紙上時常都為公教人員待遇的菲薄表示不滿和同情，但對廣大人民的死活却不管，這是因為屬於同一階層的原故，輿論是士大夫所專利的。

第六，士大夫常常也就是地主，因為他們有特權可以取得土地和保存土地。如果光是地主而與政治沒有關係，則不過三年便會徵購徵實加上徵兵，把土地人力都征光，只有在士大夫與地主合一時才能繼續增加土地增加收入，他們是看不見人民的痛苦的。通常士大夫的形容辭是「四體不動，五穀不分」。不但明白農民的痛苦，甚至連孔子那樣人，都說我是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連走路都以為失身份。他們在政治思想上是保守，反對一切改革，整個看起來是反動，反變化，反進步。當然也有例外的，如清末的康有為梁啟超，與一

些頑固份子對比來看，是進步的，但並沒有站在人民立場，只是想怎樣保存舊王朝，保持舊利益，也就是自己的利益。今日之實行「民主」也是只把民主之頭伸在外面，最好的例子，如某名流的一頭在外面，準備在萬一的時候說，我並沒有參加呀！嘴上所說的與實際所做的完全不同。

第七，士大夫並不包括工農。士為四民之首，士農工商，士高高在上。後來寫成農工商學兵，農居首，真有點使一農一誠誠誠恐不敢當。工是被人最看不起，一向是不登大雅之堂。商人在賤商政策之下也是被人看不起的，要想做官，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和今日所不同的是今日知識份子最上層是買辦，知識份子至少一半與商有關係，查查大官們的履歷，可以充份證明這一點。皇帝也不包括在這個集團之內，開國皇帝沒有幾個是士大夫階層的人物，像朱元璋劉邦都是地痞流氓。第二代第三代的皇帝也不是，他只是爲了他爸爸或者是他媽媽的原故，才做了皇帝。相反的，士大夫也做不了皇帝，因爲缺少那股流氓勁，只能做幫閒幫兇，作清客篋片。

由上面的分析，士大夫是站在人民普遍憤怒與專制恐怖統治之間，也站在要求改革要求進步與保守反動之間。用新名詞來說是走中間路線，兩面都罵，對上說不要削得太狠心，通通都刮光了那我們吃甚麼。對下則說：你們太頑強，太自私，太貪心，又沒有知識，又骯髒，專門破壞，專門搗亂，簡直成什麼東西。其實這些都可以回敬給他們，等於自己罵自己。他們之所以要表示超然的態度，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吊在半空間，他們知道這是有好處的。像清朝的會左李諸公，幫助清朝穩定了江山，自己便青雲直上，在漢人滿人之間發展自己。兩面罵的好處是萬一舊王朝倒了，他便可找到新主人的懷抱裏，他不是曾經罵過那已經倒了的舊王朝嗎？反正不管誰上台總有他們的戲唱，這就是士大夫走中間路線的妙用與作風。

這種士大夫的典型例子，在歷史上可以找到不知多少，簡直數不勝數。這裏只隨便舉幾個談談。

一個是錢謙益，明末時候的人，少年時候和東林黨混在一起，反貪污，反官官。後來被政敵一棍打下來之後立刻變成了「無黨無派」，在鄉間住了幾年又變成了一社會賢達。一六四四年機會一到，一躍而爲禮部尚書，無黨無派和社會賢達的銜頭都不要了。對東林黨人則說：我是當年反貪污反官官的健將，對當局則拚命獻身。清兵一來，首先投降就是他，死後清廷把他放入一二臣傳之內。此公不但政治節操如此，在鄉間當社會賢達時就是標準的土豪劣紳，無惡不作。

第二個是侯恂，桃花扇裏面所說的侯朝宗的父親，此公是明末的重臣，李自成入北京，他就降李自成，清兵入關他就降清，可以說是三朝元老。

另外一個叫阮大鍼，也是桃花扇裏面的人物。此公一生可以分成七大時期：第一時期，正是不得志的時候，想入東林黨而不得入，後來總算找到了他的

小同鄉左光斗才混進去了，甚至成了東林黨的紅人。第二時期，那時正是東林黨得勢的時候，他也想弄個大官而且要握實權的官，可是即使是東林黨人也看不起他，欲上不得，一氣之下轉而投魏忠賢門下，拜爲乾兒子，成爲東林黨的死對頭，專門替魏忠賢想法對付東林黨。第三時期，東林黨諸人被捕的被捕，被殺的被殺；但是他恐怕好景不常，每次去見魏忠賢出來的時候，總要用錢向門房買回自己的名片，生怕這些名片日後成爲他巴結魏忠賢的證據。第四時期，明思宗死後，他兩面都罵，提出清算口號，表明自己是中間份子，以爲這樣就可以不因魏忠賢而倒臺，但是因爲惡事做得太多，終被列爲魏黨，削官回鄉，回鄉後埋頭寫劇本，成爲當時第一流的劇作家。第五時期，東林黨的後代在南方組織了復社，氣勢浩大，阮大鍼這時也沉不住氣了，於是專寫文章自我宣傳，想利用復社的青年人作爲他的羣衆，但結果自討沒趣，反被這些青年人大發宣言討伐，揭露他是魏閹乾兒和作特務屠殺人民的醜史，前後吃了大小東林黨兩次虧。第六時期，福王即位，因爲馬士英的關係，阮大鍼也當了兵部尚書，一上來，不管清兵怎樣，首先便對東林黨報仇，大小東林黨通通逮捕，還來不及殺光時清兵已到。那時候，貪污的風氣達到最高點，有兩句話形容買官的盛行：「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第七時期，他逃到浙江後，終於降清，這時候還想騎兩頭馬，與福建的唐王通聲氣，被清庭知道把他殺了，就此了結他的一生。

第四個叫吳偉業，他這個人的例子可以說明了士大夫的悲哀。此人文采風流，是明末文化界的領導者，清兵入關後想請他出來做官，一次，兩次，三次都沒有答應，最後終於在威迫利誘之下跑到北京去做官。做官後也沒有被重用，自覺沒趣又辭官回家，當時懊悔極了，深悔自己爲什麼要去過這幾天官癮，一生清白只因這一念之差而完全毀了，一塊真正老牌社會賢達的招牌也丟掉了。臨死時留有絕命詞，有一句是：「竟一錢不值何須說！」文詞悲壯極了，寫盡了沒有骨氣的士大夫的悲哀。即使在今日，恐怕也會有人懷有這種悲哀。

但士大夫也並不都是這樣的，例如范滂、史可法、文天祥、譚嗣同，他們雖然是爲了保持他這個階層的利益而死，但是這些人無論如何是有血有骨頭的，最主要的是他們有靈魂，歷史上稱他們爲「忠臣」「義士」，在封建社會中他們是忠於封建道德的人。

當兩個朝代在交換，或者是社會有很大的改革的時候，往往是對人的一種考驗。現在恐怕又是到了一個考驗的時候了，這考驗包括你也包括我。我們看見了許多阮大鍼、吳偉業、錢謙益；同時我們也看見許多譚嗣同、范滂、文天祥。面對着這考驗，也有許多人打着自由主義的招牌出現，那麼也讓歷史來考驗他們罷。歷史是無情的，在這考驗下面，我們將看到歷史的悲劇，也是這些自由主義者的悲劇。固然我們不希望今後的文學作品裏再發現「絕命詞」一類的作品，然而歷史始終是無情的。



# 中國官僚政治在現代的轉形

王亞南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官僚政治之歷史的經濟的分釋）之十三

到了現代，到了中國開始走上現代化旅程以後，官僚政治始終不會離開我們，反之，直到抗戰開始了，特別是到抗戰結束了我們才因更沉重的感到官僚統治的壓力，而第一次明確的把它當作一個實在對象，來加以攻擊，加以考察，加以研究。

是不是中國政治的官僚化，愈到現代，倒反而愈形變本加厲了呢？對於這個問題，我暫且不忙解答，我必得在此指出的是，中國現代的官僚政治，已不完全是傳統的那一套，由本質到表象，都有了不小的改變和轉化；如其說它在現代，特別在晚近，在許多方面比過去表現得更其殘酷有力，更其神通廣大，更其無所不在，無微不至，那也不能說是由於傳統形態的發展，而寧說是未被根本否定的傳統形態，與模仿資本主義各國在轉形過程中出現的新官僚政治形態的混合。

但我們作着這種斷定：

第一，須緊接着前篇提出的論點，看中國現代化怎樣能開始，怎樣能突破前述的「治亂相循」的延滯局面。

第二，須說明我們在現代化過程中，為什麼不能把傳統的官僚政治克服或否定，而只是改變或轉化它的存在形態。

這兩點，我將在下面分別交代清楚。

## 一

中國社會在集權封建階段的發展遲滯原因，我們不但已從中國特定封建生產方法的強固性去說明它，且還從官僚政治不絕給予那種生產方法以固定的或阻滯其發展的影響去說明它；根據那種說明，我們雖堅決反對日本秋澤修二一流學者看法，而認定即無外力，中國遲早亦將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但外國資本如其不東來，鴉片戰役如其不發生，中國是否還會在原來社會階段留滯三幾百年，或再兜一兩個朝代的圈子，恐怕誰也不敢斷定。

我們這樣推論，顯然是承認「鴉片戰役」對於中國現代化的推動作用，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得明瞭，「鴉片戰役」可能發生的推動作用，歸根結底，畢竟在受着中國已有社會發展條件的限制。

「現代化」是一個非常籠統的術語。它在實質上可以轉譯為「資本主義化」，或者是更具體的解作是由封建制生產方法到資本制生產方法的推移。這種

推移，可以由政治上的革命行動促其實現，也可以由對內對外的戰爭方式促其實現，但不論是革命也好，戰爭也好，都只能把舊社會或封建社會母胎內已經孕育好的新生產力，幫同解脫出來，假使那種新生產力，或者採行新生產方法的貯備條件，根本不會在舊社會中育成，或所育成的隨即被破壞摧毀了，則政治上的變亂或戰爭，都將從開始就改變其性質。這是中國過去二千年只有王朝更迭的政變，而迄未出現社會革命的基本原因。

到清代中葉前後，以往歷史的旋律，雖仍發生着支配作用，但由唐宋以來的緩慢而確實的社會經濟進步，畢竟使它在橫遭傳統剝削與週期喪亂之餘，猶能在某種限度積聚保留或孕育出一些新生產力的生機，或新生產方法的可能條件。關於這點，我將由農工商業及金融業諸方面簡括指出一個輪廓：

（一）農業 這是任何一個封建王朝所最關心的產業。由歷代分別勸助農田水利所給予農業上的鼓勵，雖然始終不會打破土地所有形態所加於它的限制，但自唐代中期以後，土地轉換所有者的頻繁，逐漸把附着在一般土地上的「特權性」減少了，而相應使其「商品性」增加了。至關於農業生產技術改良，也有以次幾項值得提起：首先，關係農業生產動力的耕犁，友人郭大力先生曾考證有三個進化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金屬代替木材，第二個階段是以作用相同的諸種的複合代替獨用，第三個階段是以作用不同的二種，結成一個統一體（見所著「生產建設論」第二三七頁以下「論犁的進化」），他認為前兩個階段在漢代已經完成，後一階段，在北魏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中還不會提到，而在唐陸龜蒙著的一「耒耜經」中則有較詳細的說明，可見那種最後階段的犁，即我們今日普通常用的犁，最可能是在唐代才被發明的；其次，次於犁的重要農具，就是水車，水車及由水車運轉的機具，亦是到唐代才為人講到的。到了元代，由踏足運轉的龍骨水車被發明了，以後由足踏改為手推，再進而用牛轉，一直成功為我們今日普遍通行於大江南北的各式水車；最後，我得指明，中國在這個長期間的農業技術的改進（即使把耕犁及水車也包括在裏面）與其說是直線的，毋寧說是平面的，把原來應用在已有基礎上的新發明範圍，逐漸予以推廣。因為原有水準以上的改良或進步，會本質的遭遇社會的限制，而同一水準的技術的推廣應用範圍，却不與這一歷史時期的版圖擴大有關，同時也與這一歷史時期的封建官僚統治發展有關。農業上的這種形態的改進，顯然會直接間接影響到農業對外的經濟交往關係，而由此反過來刺激農業本身。這是由下面工商業金融業上的變化得到說明的。

(二)工業 中國的工業，由唐以至於清之中葉，不但在種類上，數量上，皆大有增進，即其性質，亦有非常不可忽視的改變。現在且就有關導向新生產方法可能的諸變動跡象，略予分述：第一，無論是官工業抑是官僚占有工業，已經不只限於鹽業、鐵業、酒業幾項了，碾米業、製紙業、印刷業、蠶絲業、紡織業、製瓷業、採礦業、鑄幣業……都愈來愈變得重要，特別是其中的五金產量，以及由製鐵鍊鋼需要而引起的大產額的大量增加，尤饒有意義；其次，各種工業產品，愈來愈帶有商品性質，甚至有許多產品，愈來愈帶有輸出商品的性質。史載「在元朝時代商品的分類，形成了中國一般經濟的發展；最初出現於市場的，是大宗的中國磁器、綢緞、棉布等」(見李澤沙哈諾夫著「中國社會發展史」三九〇頁)，在這以後，整個東南亞各民族，差不多都需要中國的金銀、綢緞、絲、青白各色的磁器、銅、鐵、麝香、朱砂、水汞及草蓆等等。又其次，在這個時期，夾在官業與當作農村副業的家內工業中的一般手工業，亦因應國內與國外市場關係的擴大，而發展起來，馬哥孛羅在他旅華遊記中所描述杭州等地的手工業組織情形，並不是自古有之的，特所有這類手工業有一共同特點，就是對於商業的隸屬，各種手工業的頭目或老闆，也可能僱用幾個工人，但他自己却是在為給他以貸款或原料的商人勞動，卡爾曾說在十九世紀中葉，法國的絲工業，英國的織襪工業和花編工業，就是採取這種形態。(見郭王譯「資本論」三卷二六二頁)。這種在舊生產方法上榨取更多剩餘勞動的形態，雖然會成爲現實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障礙，但其中有若干部門手工業，按照分類性質，由一個商人結成統一起來，便可成爲轉向製造業的起點。

(三)商業 農業工業上的緩慢改進，一方面爲商業發展的結果，同時又爲促使商業發展的原因。由上述中國工業產品向東南亞各地市場的進出，以及在這一時期，廣州、廈門、泉州、杭州、揚州等等對外港埠的開闢，我們就明瞭所謂中國地理條件不適合於對外貿易的理論，該是多麼皮相而沒有根據。但我們在這裏不想重複馬哥孛羅的敘述，說中國「商人的數量，商人的財富和經過商人手裏的商品，多得怎樣驚人」，而要特別注意的，是這個期間的國內外商業的繁盛，使商業舊來對地權，對官僚的依附傾向，難免顯出若干分離或對立的徵候。特別是在元代統治下的南方，因爲商人在各種新興都市中，支配着大批的手工業工人；又因爲他們依基爾特或行會的組織，逐漸取得了控制都市方面的力量，他們對異族的，封建的，軍事的壓力，第一次表現出了帶有相當濃厚的市民性質的反抗。「在十四世紀中葉，在揚子江中部的大城市，在浙江，福建和廣東的港口，都是過着緊張的地方生活，蒙古人的集中權力，並不會軟化這種生活」。而由這種生活發出的反抗，「才造成真正的中國，造成對抗鞏固的中國人的中國，造成對抗北方封建和軍人中國的商業和民主的中國，最後，造成智慧的中國，偉大藝術家的，學者的無數反抗北京專制制度的秘密結社的中國」(Rene Grasset: *Historia de l'Asie IV*, 1922, P. 259—260)。

轉引自前書四二六頁)。元代在同世紀末結束其對中國的統治以後，中國商人的現代市民性格，雖又有些模糊了，又與封建官僚恢復了舊來的不解之緣，但我們絕不能忽視這一階段對於以往商業的進步性。

(四)金融業 當作商人事業之一個分支的金融業，已早因唐代以後紙幣或信用券逐漸增大其重要性，和明末清初銀本位的大體確定，而有較活躍的開展；商業藉着各式高利貸業或通過高利貸業而活動的實在趨勢，致使商業變爲高利貸業的隸屬，而這時與政治上保有密切聯繫的，或更具有政治權勢的，已不是經營商品的商人，而是經營貨幣的商人了，聞名中外的山西票號，其所以在此時，特別在清代，對整個華北乃至華中發生極大的經濟政治支配力量，其關鍵就在於此。如其說，高利貸業對於封建生產方法具有特大的分解作用，那麼，這個時期的高利貸業的突出的發展，即使我們隨時應記着中國官商地主高利貸者「四位一體」的內在關聯，而不應過分強調其進步性，但舊有封建生產方法將因此加深其分解過程，却是非常明白的。

由上面的分析，我們似可有以次幾種認識：  
第一，所有農工商業各方面的進步因素，或可能形成新生產方法的進步條件，一般都在隨時代的前進而增加，到了清代中葉，已有種種跡象，在更迫切的期待一個新社會場面的開端。

第二，所有那些進步，大體都是在我們傳統的具有極大韌性的社會生產關係，或具有極大包容性的封建官僚統治的孔隙中，或其內在矛盾中，逐漸見機發生的，它們無疑會日益增大其對於原有社會關係，原有統治形態的束縛感。

第三，在明末清初出現的反專制和強調民主的市民思想，已顯然證示是那種感覺的反應。但因爲作爲那種社會關係或統治形態之基礎的社會經濟的基本要素的結構——農工結合體還頑強地存在着，所以，在一方面，那諸般進步因素或條件，仍很難廣泛的自發的形成爲一個足夠突破或社會統治關係的新分化，軟化，或使對立物轉變爲其附在物的機能。

要之，現代化可能開始的條件，是在鴉片戰役以前就存在着的。惟是新的力量不夠，舊有的障礙太大，於是具有誘發或外鑠作用的鴉片戰役，就成爲一個社會歷史的轉捩點。

### 三

鴉片戰役之取得中國社會轉捩點的重要性，不在這次戰役本身；戰爭的規模是很小的，斷續經歷的戰爭期間也不過三年，其直接破壞損害的作用，並不算大；也不一定在結束這次戰役的割地償金喪權辱國的條件，有了應付五胡侵凌，有了對遼金割地獻金，有了屈服元清異族經驗的中國封建官僚統治，那一類條件的接受，並不算是了不起的難堪恥辱。鴉片戰役之不同於以往對外戰爭，

和它對中國社會發生決定的影響，就是由於戰爭雙方當時各別所具的社會經濟條件使然，那次戰爭係發生於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四二年，在中國方面，剛好是在滿清專制統治極而衰的中葉以後，而當時社會可能形成新生產方法之諸進步因素，已如前面所說，對於傳統封建官僚的社會統治方式，早有些感到不能忍耐；而在戰爭對方的大英帝國，它却正當着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鼎盛期，所以，這次戰爭從較遠觀點去看，實不只是兩國有關鴉片貿易的事件，而可更基本的理解為東方專制的封建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的首次決鬥，或東西文化的正面衝突，而在戰爭過程中，兩方各別從折衝，應戰，以至結束戰爭所表現的一切，亦充分暴露出了它們不同的社會本質。因之，清廷在這次戰爭當中一再表現的破廉恥的慘敗，和毫無保留的恥辱，並不僅只表示清廷統治的缺德與無能，且更充分證明了封建官僚社會體制本身，根本就不表示清廷統治的敵手。這次的失敗，是往後一長列類似對外戰爭失敗的開端：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聯軍之役，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役，一九〇〇年的八國聯軍之役，無非是一次比一次厲害，一次比一次嚴重的證示腐朽的封建官僚統治，是怎麼也不能應付新的世界場面罷了。然而我這裏所要注意的，却是鴉片戰役及由此引起的變化，究是如何的幫助了中國社會的「新生」。

照一般較有見地的歷史學家所說：經過鴉片戰役，中國一向誇境內為天下的自尊自大態度改變了，不相信世界有比中國更高文化的想法改變了，特別是中國社會法制為無可變易的頑固成見也改變了；以前一直是「以夏變夷」，現在開始要「變夷」了，這是後來洋務運動，變法圖強運動的意識前提，而當時直接影響到工商業發展方面的，就是由那次所訂通商條約，使中國專制權力，不能再任意停止對外貿易，不能由官商或所謂公行包庇壟斷，也不能對外貨流通任意加以勒索或留難，雖然這出於英國人的強迫，但已不啻為長期被囚禁的中國工商業網開一面了。事實上，不僅中國傳統的封建官僚統治，從這些方面受到了破壞和限制，而其現實的社會經濟基礎——即前面所論及的社會經濟基本要素的結構，或所謂農工結合體，也是由此後逐漸深入逐漸展開的對外商業活動而促其分解的。

當作一個農業國，集約小農經營需要把家庭工業作為其補充所形成的生產方法基礎，當然是最主要而又最基本的了。這種生產方法結構廣泛的存在，對於專制的封建的官僚統治雖然非常必要，但對於商品經濟，對於資本主義的商業，却是一個致命的障礙。可是，就從鴉片戰役以後，這種障礙被緩慢而確實的逐漸減除了。

比如，中國農村最普遍的副業，是人民穿著所需的紡織業，不幸，現代大工業的發展，在每個先進國家，又差不多是由紡織業開頭，於是，一國新舊生產方法的衝突，最初就會表現在紡織業上。中國人用自己的新式紡織業產品破壞那種副業，分解那種農工結合體，是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發生的前後，而

在鴉片戰役後，直到這個時期，則最初是英國新式紡織業品，接着又加上日本和印度的新式紡織業品，在中國從事那種「分解」工作。英國用大砲轟開中國門戶以後，會以種種體驗，發覺在中國推銷紡織品，並不像它推銷鴉片的那樣容易。卡爾曾明確道出了其中的究竟，他說：「資本主義前期國民生產方法內部的堅固和組織，對於商業之分解的影響，會成爲一個障礙，這一點，可由英國對印度和中國的通商得到證明。在印度和中國，生產方法之廣大的基礎，是由小農業和家內工業的合一而成的。在印度，還有以土地共有為基礎的村落共同體的形態；在中國，原來也是有這個形態的。所以，在印度，英國人不得不同時以支配者的和土地所有者的資格，使他們所有的直接的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雙管齊下，然後才能把這種小經濟共同體破壞。……但這種分解工作，不過是緩慢進行。在中國，因為沒有直接的政治權力從中幫助，其進行還更緩慢」（見郭王合譯「資本論」三卷二六一—二頁）。但「利益也往往使人智慧」。英國人不論是否明確意識了此種原因，他們後來在中國確在多方設法獲得配合經濟權力的政治權力，投資敷設鐵道，是政治經濟雙管齊下的方法之一。而其結果，也正好符合他們的要求，即是，「中國鐵道之敷設，乃表現中國小農及家庭工業之一切基礎的破壞」（見卡爾給恩格斯的信）。

像英國這樣「開化」中國或分解中國舊生產方法的大事業，愈到後來，愈有更多的國家參加，其中，像日本印度那些勞動低廉，距離中國較近的國家的紡織業製品，且更能有力的摧毀中國家庭工業。等到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訂，外人得在中國利用廉價勞力與原料自由開辦製造，而同時國內的新式紡織業，亦在種種刺激下，逐漸發展起來，於是，中國舊式家庭工業乃至獨立手工業的悲慘命運，就已經瀕於破滅境地了。

所有上面這些事實，以及必然隨伴而發生的一般交換交通範圍的相應發展，都說明傳統的封建官僚統治，在多方面受到嚴重打擊；首先，農村那種舊生產方法結構之分解，乃意味著封建官僚統治之固定的各別孤立的自然經濟基礎的根本動搖；其次，商品經濟成分的逐漸增進，商工業比重對農業的逐漸加大，以往為配合農本主義與農業社會組織而被利用作統治工具的綱常教義，宗法秩序以及有關舊社會維繫的一切法制思想體系，或則變為具文，或則失其作用，而使那已經根本發生動搖的封建官僚體制，更無法支持；然而更關重要的，還是在另一方面，依着商品經濟或新式工商業發展而逐漸露其頭角的市民階級的興起，他們的經濟活動愈向前擴展，自然要愈益感到專制官僚主義的束縛與壓迫；他們在鴉片戰役甫經結束後即發生的太平天國變亂當中，雖還因沒有形成足夠主動的力量，而使那次變亂仍不能不止於農民的民族的性質，但在此後辛亥革命當中，他們的主導力量便表現得非常明白了。因此，滿清王朝的覆沒，實不僅說明異族統治的中止，同時還表示傳統封建官僚主義的變形。然則封建官僚主義爲什麼不會因此完全覆沒下去呢？這是我現在要進而解

答的問題。

#### 四

作為中國封建官僚政治之物質基礎的地主經濟，雖然因其基本因素的結構——農工結合體的逐漸分解，而使其原來所有與使用形態，發生一些變化，但現代性土地所有關係，現代性租佃關係，並不能因此就建立起來；事實上，都市的市井經濟形態愈發展，愈對封建官僚統治表示不耐與反抗，統治者便愈需要把農村社會維持在原有狀態下，使其統治基礎有所寄托，並圖藉此限制都市商工業資本的發展。可是，客觀的事實儘管如此，他們在主觀上，却往往自許是工商振興者，大建設人物，並昌言把都市商工業，交通事業建設起來了，再去變革農村；這樣就可達成一面維護封建官僚統治，一面創建資本主義商工業的二重目的，而一點也不感到矛盾。這是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大大小小的封建主義者官僚們，都毫不羞怯的裝扮成新建設人物實業家的基因，同時亦是將近一百年來現代化一直陷在坎坷困頓中的基因。我們自然沒有理由忽視國際資本或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現代化所加的妨礙與束縛，但敢於正視現實的人，應相信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發生的阻礙破壞作用，都是通過我們封建官僚統治者的那種自私自利的便宜打算而進行的。

## 美援小品

商翼

「喂來食！」

二月二十二日上海大公報上，登載着陳衡哲女士的一篇星期論文，題名「美國人眼裏的中國人」。文內講到一部分美國人有種「對於苦狗的同情」，把中國人個個看做難民；又講到自己在美國屢次被當作布施的對象，覺得啼笑皆非。於是發牢騷說：「一個中國文化人的自尊心，美國人是不大懂得的。」

這使我想起禮記檀弓篇的故事：齊國闕大機旌，富人斃於路旁布施酒食。有個飢民「藜藜輯履，實實然來」。斃者左手拿飯碗，右手執酒杯，說：「喂，來吃吧！」（原文「嗟來食」。）那個飢民抬

們對於一切落後國家，也發生兩種極相矛盾的要求，即一方面要破壞落後國家的傳統生產方法，以便它們的商品得以推銷，原料的取給得以實現；同時又希望落後國家的新生產方法，不要成長，因為落後國家的大商工業發展起來，它們對市場與原料的要求，就不免要落空了。它們的這兩種要求，表面上好像與封建官僚統治者一面要保持農村封建生產方法，一面要發展都市商工業的企圖恰好相反，但帝國主義者對於現代經濟的運動法則，畢竟是懂得較多的。它們自始就認定利用既成封建官僚統治的弱點，才可能達到它們那兩種企圖。因此，在太平洋變亂當中，它們就決定支持滿清統治者；在以後一長列侵略事件當中，它們儘管多方提出酷虐的不平等條約，以期扼殺中國的產業，但同時總未忘記使中國執行其侵略使命的舊統治階層，能繼續維持下去。

因此，中國舊型的封建官僚統治，雖然逐漸為其自身在新國際關係中的矛盾要求，為帝國主義的矛盾政策，以及為從那些矛盾空隙中逐漸增長使來的新與經濟政治力量社會力量所沖消了，改變了，但畢竟為它所寄託的農村封建社會經濟基礎始終只有動搖，分解，而不會根本變革，同時又因帝國主義在中國一波以後，我們即使還是在受着封建官僚的支配，但它已具有另一種形態和另一些特質。

這是需要把它與已往形態作一較詳細的比較考察才得明白的。

定是大大以為然的。

不但此也。馬歇爾對於他所要布施的可憐蟲，尙有更多微辭：一則說，「中國政府並不缺乏勸告，我們曾不斷地並且着重地提供意見，但終未實現」。再則說，「中國政府的基礎必須擴大，而不應以一小集團為限」。三則說：「依我所見，在我國（美國）的援助能成爲有效前，該方面（中國政府）有若干基本工作必須做到。就此一意義言之，援助尙屬過早」。四則說，「在中國目前這種情況下，這筆款項必將大部分是毫無結果的消耗了。所以從這種局勢看來，採華計畫在實質上對未來中國的經濟局勢無法保險」。

這似乎連「對於苦狗的同情」也沒有。這是死馬當做活馬醫，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美國政府拿出五億七千萬來，好像並非心甘情願。

但我們的當政者的反應如何呢？有的說：「還算滿意」。有的說，「令人興奮」。而作爲傳聲筒的報章雜誌，大抵如學生兒一般面目相似，數不清的感激涕零之辭，頌揚「美」德，無以復加。

難道稱爲四強或五強之一的政府，竟沒有一點自尊心嗎？難道以「禮義廉恥」治國的諸公，不知道「其嗟也可去」的古訓嗎？

當然不是的。我們的當政諸公，聰明得很。不但他們不像齊國的飢民那麼傻，陳衡哲女士那麼迂；而且他們心裏更亮：馬歇爾的話，並不是說給中國政府聽的。美國的國務卿向來愛護中國的政府，美援並不從這五億七千萬始，剩餘物資和軍用品的接濟，從來沒有斷過。

須知這些似讚刺，似辱罵的辭，雖在美國國會裏發表，其實是演唱給中國老



百姓的台詞。馬歇爾是中國通，他明白「中國政府在政治方面不能滿足人民」，「在下層階級中，時常有一種感想，以為政府對於他們或他們的問題，置之不顧」。(都是馬歇爾自己的話)。在這種政府與人民不能協調的情形下，美國援助中國政府，豈非容易引起中國人民之反感？於是當他一手拿錢，準備交給我們的政府時，另一隻手却扯它一下後腿，給它一個耳括子。這就使得旁觀的小民們油然生敬意，覺得美國政府真是大義凜然。而既把我們的政府說得那麼可憐，說不定還會引起大家的惻隱之心哩。

中國老百姓積數千年的奴隸生活之經驗，發明了兩句諺語：「閻王好見，小鬼難纏」。這就是說，主子越小越兇暴，越大越仁慈。比起繩管來，田主常較寬大；比起獄吏來，縣長簡直是青天。因為當着佃農或下民面前，爲了裝裝仁慈樣子，田主有時也會罵他的管家，縣長有時也會打他的屬吏的。今日馬歇爾之言，是亦此諺語之又一佐證歟？

### 知識分子

與馬歇爾異曲同工，司徒大使致書中國人民，並且連續發表了幾次談話。他從美援談到民主政治，談到民主政治下的思想自由言論出版的自由，特別強調地提出：「中國知識分子及受教育人士，例如若干大學教授，對於政府所採之消極態度，使他至感驚訝」。他以為「此輩人士可組一新黨，而對政府作建設性之批評。亦可僅成立若干團體，以倡導若干有關改革之主張及進步的活動」。

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建議，只可惜不會引起，大概也不致引起，「中國知識分子與受教育人士」的響應。但是董顯光局長已經作了反駁。他說：「大使所稱我國知識分子與政府不能合作一說，似屬言之過甚。我國正如其他國家，容有若干知識分

子在情感上未能同情政府之措施，其中多數對任何政府皆將取批評之態度，是或即蕭伯納氏所謂「專事抗辯者」歟？我國知識界有此直言之士，政府至感欣慰。蓋此實爲思想健全發揮之表現，隨時能以衡量政府之準繩提供政府。……接諸事實，中國知識分子正多數與政府真誠合作。其言行之所以鮮見報端披露者，實因彼等鮮願虛耗時間以從事自我宣傳耳。……茲願向諸位(記者)確切保證，知識分子將與政府繼續合作。蓋彼等深知唯有在國民政府治下，始能獲得生存與自由，進而謀求政治與經濟的改革」。

如此宏論，只須「立此存照」，不必加上任何按語。但董局長既代表政府歡迎「直言之士」，姑試以書生之見，「直言」之如下：

作者自信並非「專事抗辯者」，對於言行之「披露報端」，也「鮮願虛耗時間」。然而身爲知識分子，對於「唯有在國民政府治下，始能獲得生存與自由，進而謀求政治與經濟的改革」云云，卻實在並不「深知」。正相反，我們所深知的，是這些「生存，自由，以及政治與經濟的改革」並不會得到「確切保證」。

所謂知識分子，極大部分是學生與公教人員。學生的「生存與自由」如何？公教人員的「生存與自由」如何？答案是禁止集會禁止遊行，一連串的逮捕和屠殺的事件。公教人員的「生存與自由」又如何？答案是裁員，失業，和待遇凍結在十二月的指數而配給米減少了五斗。

寫到這裏，作者忽然記起莊子上的的一段文章：「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現在我們的政府養公教人員，也是用狙公賦芋的辦法。收照生活指數發薪也者，就是朝三暮四易爲朝四暮三而已。所以，如果你在十二月拿的是七十萬，在一月，二月，也還是這個數目。但是物價呢，天曉得已經漲了多少倍了。

在生活如此困難與個人的身體自由當受威脅的前提下，所謂「政治與經濟的改革」，那自然是一種修談。試問那個還能「虛耗時間」，去從事「組織新黨」，「成立團體」，以「作建設性的批評」與「進步的活動」？因此這是董顯光局長的話語有道理，知識分子的言行，以後不但要「鮮見披露」，而且一定會鎗聲匿跡的。司徒大使的樂觀的言論，大抵也只在表示他的仁慈而已。

### 和謔

由上述二事，可見中美政府之間，或者說中美的人們之間，像煞是有點齟齬或衝突似的。好比現在上海很流行的歌曲「夫妻相罵」，女的怨男的不給金剛鑽，男的就這個家庭簡直是殞儀館。歌詞發辣之至，然而調子却輕鬆，甜蜜，令人消魂，令人絕倒。

但最令人絕倒的，却推二月二十二日的和談之謔了。

和談之謔，由來久矣。起初只不過作些地下活動，恍兮惚兮，若有若無。而當五億七千萬鬧得滿國風雨之際，它却突然表面化起來。如晴天霹靂，合衆社從上海發出一「最可靠方面消息」，從南京傳出一「確權威方面」的謔片。據說蘇聯以「間接但確能到達南京官方的方式」，提出一項建議，以調停中國內戰。這建議，於政府是極端不利的。但合衆社在有色之報導之中，却輕描淡寫的夾了這句：「中央政府決不以任何方式正式承認獲得此項建議，且可能否認會獲此項建議」。

果然，政府否認了。行政院新聞局奉命負責聲明：此事絕對不確，純係無稽謠言，意圖擾亂人心。如此這般，一個當頭棒喝：你意圖不真！一個噱皮笑臉：我早該你要否認的。

雖然又一場夫妻相罵也！然則和談之說，究竟是那非耶？捷朔迷離，非局外人可得而知矣。

然而有可得而見者如下：

莊子說：「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綜觀合衆社的消息與中央社的否認，言外之意，極易領會。忘言之後，僅存八個大字而已，曰：蘇聯可惡，中共好壞！此其一。

蘇聯可惡，則與蘇聯相對者自然可愛。中共好壞，則與中共相反者當然寬大。用金聖嘆批水滸傳的話語來說，這叫做「背面傳粉法」。而合衆社在字裏行間，透露出一「若干官員已向蔣主席請求重開國共談判」，司徒大使認爲這是中國問題一最佳的可能解決辦法」云云，也正暗示了這一個意思。此其二。

但更重要的，是在於轉移衆人的視線。設法人人會變，巧妙只在於「障眼法」三字。竊術家請你注意着紅手絹，綠手絹，弄得你眼花撩亂；而陳倉暗渡，忽然間一枝雞蛋變出來了。美援聲中突生和謔，雖只曇花一現，却已使多少人的眼睛迷惑住了。至於暗渡偷換者，不知是否內河航行權之類？此則暫時無法得知，且聽下回分解。此其三。

五億七千萬美援，是大題目，好題目，極妙題目，應該能結撰出一段一天地間至文一來。此「至文」，由錦心繡口的中美要人們執筆，從華府開始，大概將終於中國的戰場。作者三則短語，筆法零亂，質木無文，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然而亦美援聲中之一鱗，一爪，一毫髮也。因大題眉目曰：「美援小品」。

至於所引消息，概見於二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上海大公報。一併附誌。

### 啓

本刊全賴發行維持，茲以最近物價波動過鉅，致使本刊在經濟上遭受重大損失，爲維持本刊生存，特請各界同人：除將已欠本刊刊費火速匯寄以外，並請以後於收到本刊後即將上期刊費結清匯來，否則不予發刊。事非得已，敬祈諒察爲感！  
時與文發行部啓 三月一日



# 折「和謠」

余望白

蔣主席在牯嶺披閱會文正公全集的時候，司徒大使在南京鄉下兩顆紙彈。其一是致中國人民書，其二是月之廿一日對合衆社記者發表的談話。即令是一池死水吧，丟下兩個石子，也會波動，何況是兩顆紙彈。

據司徒廿一日向合衆社記者所作的表示，其「發表告中國人民書的動機」是：「他相信中國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國共重開談判」，和談這個調劑兒，自從去年孔庚大罵主張和談者是漢奸以及邵從恩病倒中央醫院後，不彈久矣。轟就重開，不禁疑信參半。難道是合衆社記者的誤傳麼？

我們很難肯定這是合衆社記者的誤傳，因為據司徒廿四日致合衆社記者一函中稱：「本人謹此聲明閣下所引本人之言，均屬正確無誤，本人也曾同意發表」。既然「正確無誤」，而且「同意發表」，如果說是誤傳，豈非欲盜竊影嗎？

爲什麼在戰亂軍事發動一年多之後，司徒遂認爲中國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國共重開談判呢？這句話實值得玩索。一年來軍事形勢的演變，無疑是決定的因素。本月廿四日大美晚報的社論就是最好的說明：「事實上戰爭仍然是無益而且纏綿不決的。沒有一場纏綿不決的戰爭是有益的，除非你贊同希特勒的觀念：戰爭在加強士氣與民心上對於一個國家是有利的。即今是希特勒，最後也對其信念懷疑了。希特勒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唯一的出路只能應用於舊式戰爭而且是必勝的戰爭中，新式戰爭所給予任何一方的都沒有完全的勝利。當這戰爭不會終了，而且無休止的拖下去，無限的浪費國家復興所需的人力物力財力時，其局勢是很渺茫的，這就是今日中國局勢如此渺茫

的原故」。這是一張接近美大使館的報紙的看法，大約也可代表某一部美國人對中國內戰的看法。

司徒的談話恰發表在杜魯門總統向美國國會提出五億七千萬元援華法案之後，而且正當楚德等人大聲疾呼軍事援華之時，也許有人惋惜司徒發表談話所選擇的時機太不巧了。但，如果不專從一個固定角度來看，司徒所選擇的時機，正因爲其不巧而巧。可以說是一種事先安排的巧合。假若和談是一種姿態，五億七千萬元援華法案却是和談姿態的姿態。五億七千萬元援華法案是張大牌，有了這張大牌，和談這牌就相得益彰。這叫做雙管齊下，其目的無非在給對手一個暗示：你們可以適可而止了，知難而退了。

以上是對所謂「和謠」的來蹤的分析。其去向如何呢？可借用長恨歌中一句詩來回答：「山在虛無缥缈間。」這因爲客觀條件變化得太快了，爭取和平的方式也隨而轉變。這一方面縱然還想以和養戰，亦是單相思而已。

正如空城計一劇中諸葛亮所唱的一句：「我眼前缺少個知音的人」，司徒此次舊調重彈，也是缺少一個知音的人，彷彿對牛彈琴，而滿身泥土氣息的牛木然無所表示。和談本是一個難題，在這個難題之下，實難做出一篇好文章。儘管空虛空洞也可敷衍成篇，但陳言濫套，華而不實，又不易入考官之眼。古人說得好：不誠無物，又說：修辭立其誠。可見做篇得意文章，首先需要誠。這樣，和談八股自不會得到賞識的。就這一點而論，我倒同情胡適博士的「和比戰難」。胡適博士是會做文章的人，當然深知做空頭文章的苦痛。記得曾有這麼一個笑話：妻子嘲笑丈夫文章做不出，說：「你們秀才做文章，比我們養孩子還難！」丈夫正色答道：「你們肚子裏有東西，我們肚子裏沒有東西呀！」文章據說要擠，不過，奉勸做空頭和談文章的論客，肚子裏實在沒有東西，千萬不要把胃汁也擠出來，這反而令人惡心。因爲，現在讀者看文章的眼力大大提高了。魚目混珠，恐怕不但不易，反會拆穿西洋鏡的。（二月二十八日于南京）

## 兩個朝鮮

潘公昭

美國一手包辦組織起來的聯合國朝鮮委員會遭到朝鮮人民一致的排斥而失敗以來，朝鮮問題在遠東國際關係上更加引起世界的重視，已經有人把朝鮮比作「遠東希臘」，一臉孔焦急和像煞「正氣」地大聲疾呼：「如叫韓國扮

演遠東的希臘，東方人民將記住：那是美蘇兩國的罪惡，太平洋的大災禍。我們今天特預作警告，並如此懇切呼籲，快到来的三月底，莫讓希臘悲劇在韓國登場」（見三月一日大公報社評）。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不是非地把美蘇都劃進罪惡之列是與論界應有的態度嗎？所謂「三月底」的「悲劇」的「預作警告」的真實意義是什麼？讓我們用事實來答覆。

按照戰時雅爾達及後來的波茨坦協定，以北緯三十八度劃分美蘇兩方作戰及受降的區域。美國軍隊在蘇軍進攻及迫使朝鮮日軍完全投降的二十五天之後——九月八、九日開始在南韓登陸，成立軍政府，實行軍事管制。在美國的統治之下，首先強迫解散由人民黨及共產黨共同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組織，把南韓軍政經濟一切大權完全集中在自己手裏，由美國軍政人員分任各部局首長（後來改用顧問等名義），利用日本在韓原有的殖民地統治機構甚至保留日本官吏及親日派的職位。親日的大資本家大地主依舊在南韓作威作福，僅僅由日本人的變成美國人的奴隸總管。職工運動，農業改革及民主運動受到了極大的抑制，爲祖國獨立與自由而鬥爭的政黨報誌及人士，受到重重迫害。另一方面，美國在南韓建立起比日本人更強大的經濟上的壟斷制度和軍事上的侵略性基地，扶助極右派以前親日賣國的「傀儡性政權機構」，支持他們以反蘇反共姿態出現的「反對莫斯科三外長會議決議」的暴力運動，使依照決議而成立旨在實行託治制度促成朝鮮民主與獨立的美蘇聯合委會，經兩年之久的折衝而毫無成就。

另一方面，蘇聯在北韓做些什麼呢？衆所周知的事實是：他們完全解除了日寇的武裝，解散了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機構，撤銷了朝鮮民族叛徒賣國份子，把政權移交給朝鮮人民按公民普選制度產生的「人民委員會」，並把包括一千多個工業機構的日寇財產也移交這個人民政權；人民政權實行普遍的民主自由人權，蘇聯駐軍不得干涉朝鮮內政；實行農業改革沒收日寇韓奸大地主土地一百萬公頃，免費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改善及振興商業工業，八小時工作制，社會保險；男女平等，普及教育，復興戰時破壞的一切建設。當莫斯科關於朝鮮的三國決議遭受破壞，美蘇聯合委員會的工作受到阻礙而失敗之後，蘇聯曾在去年九月正式提議，在一九四八年元旦以前，美蘇兩國同時撤退在韓駐軍，使朝鮮人民自行決定自己的命運。

美國也鑒於北韓有上述種種成就，人民力量超過南韓

人民自決將不利於美國對韓政策的貫徹，所以斷然拒絕蘇方建議，利用自己在聯合國大會中票數上的固有優勢，通過自己的方案；由聯合國組織朝鮮委員會去朝鮮工作，監督朝鮮舉行民主政權機關的選舉，協助朝鮮人成立國民政府並建立國民軍。但是，在受到兩年來美蘇兩種不同統治的滋味的朝鮮人民大眾，却認清這個機構，只是美國統治權利利用的工具，藉以批准美國壟斷資本家們對朝鮮人民內政的干涉，把去年九月蘇聯所提外軍一律退出朝鮮一事無限期地延下去，加強在韓的戰爭基地設施。因此，不僅蘇聯及其與國拒絕和這個機構合作，不僅北韓人民對這個委員會實行抵制，而且在美軍統治下的南韓，以工農學生為首，包括各民主政黨社團，一致推進人民民主陣綫，和北韓人民陣綫配合，合力反抗，提出了朝鮮最大多數人民一致要求的口號：「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民主的朝鮮！」在南北朝鮮人民一致排斥之下，這個委員會從一月八日抵漢城，至二月十四日悄然「返美覆命」了。

美國當然決不甘心就此放任朝鮮人民自己起來解決自己問題的，他們將進一步利用「小型聯大」，在朝鮮建立起自己所需要的「民主政權」。按照去年赴韓調查的魏德邁的密報：南韓居民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二（其實北韓約一千三百萬人，南韓約為一千七百萬），所以建議在南韓單獨舉行大選，改組政府，由美軍控制，使從北韓逃到南韓的韓奸大地主份子在南韓參加普選，俾擴大為全韓統一的政權。這就是為什麼今年二月廿四日美國要建議在南韓選出三分之二的國民代表，保留三分之一代表「以待北韓參加」了！當然，南北韓人民都不會上當，而且更加傾向於北韓的民主政治活動，準備通過及宣布朝鮮民主共和國憲法。這難道是蘇聯的罪惡？美國却大聲宣傳北韓共和國成立的謠言，促使朝鮮希臘化的計劃實現了，它就有一理由「援助」南韓傀儡政權，增派駐韓軍隊，進而發動朝鮮反動派「叛亂建國」以求「統一」了！今天我們這裏的「輿論權威」，却在「預作警告」：「那是美蘇兩國的罪惡！」但很明顯，把美蘇之間的是非不加分別而這樣武斷，實際上在替美國獨佔者及戰販們向朝鮮人民及「東方人民」預作警告，把未來「太平洋的大災大禍」的責任預先認清了，使朝鮮和全體東方人民迷失自己奮鬥的方向，這種罪惡難道還待詳加解釋嗎？

然而，今天的局勢和事實真相已那麼明白，廣大人民已經覺醒并起來了，他們再也迷惑不了，再也壓迫不倒的了！（三月一日，朝鮮獨立運動紀念日）

## 關於許壽裳先生

景宋

許先生號季莪，是我當學生時代值得敬仰的一位校長兼教師。也是離開學校之後，二十多年來不斷通訊請益，親交最長久，質疑解難的唯一師長。最後的通訊是今年一月三十一日，而不知道是成爲給我臨末的訓誨了。

先生對人始終一本至誠，從未見其疾言厲色，却得到如此慘酷的遭遇，砍殺數刀，幾致頭斷，識與不識，幾將疑死非其時，其地，其由，而竟死於此時，此地，此由，真不禁搔首問天，以如此厚道長者，而竟有這樣的遭遇，則人世坎坷，幾何時何地何由而不可致死？性命既被視如草芥鴻毛，則人們又何從更須有甚麼戒懼與防範？真所謂身處末世，難言之矣。鑒於許先生的無辜而死，或更使謹慎之徒，不知戒懼爲何用，則高萬俸的兇暴，不是抵命所能償其值的了。爲了許先生的死，雖然已經過去了十天，我還是低個悽惻，不能已於懷。

人皆知許先生與魯迅先生友善，而不知他和蔡子民先生也屬深交。在中華民國元年，臨時政府定都南京，蔡先生出任教育總長，許先生即被邀至南京幫忙。後來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許先生任女高師校長時，用人行政，都深得蔡先生協助。民國十六年間，蔡先生在南京主持大學院院長之職，許先生也還是和他一同共事的。沈君履重，遇不可爲的時候就潔身引退，絕不游移，則兩位先生的性情，有相似處。彬彬有禮，和易近人，似紳士風，也是兩先生所同具的。

許先生和魯迅先生相提，就頗兩樣，一個是知識分子型，一個却是農民型。例如遇到桌面有塵污時，許先生必俯首詳視，確有不潔處，就拿布去揩掉。魯迅先生雖然也曾用布去揩，有時或者會丟去，或順便用手揩兩下，然後兩手相拍，即算拍掉了塵，若無其事似的。前者是處用紳士態度，而後者則更近於農民式了。又如喫麵包，據魯迅先生的回憶，作爲越談告訴我們，說是在東洋留學的時候，有時喫麵包，許先生如同某些人一樣，歡喜撕掉邊緣，這原是普通常遇到的。魯迅先生却捨不得，就拿起邊緣放到自己的嘴裏去嚼。許先生看着倒奇怪了，問他爲什麼要喫麵包皮，魯迅先生隨口答道：我喜歡喫的。許先生信以爲真，以後每次同喫，特地把麵包皮送給魯迅先生。這可見許先生的厚道，老實。隔了多年之後，魯迅先生說到時還發出爽朗的笑聲，表示對這樣誠實的老友的愛護呢。

許先生無論寫信，撰稿，總是行楷，用毛筆寫。「亡友魯迅印象記」的稿子如果是託人抄寫，寄出之前，他一定重校一遍，待到見於刊物上，遇有錯字，總希望女期設法替他登報誤表，但因篇幅，時間種種關係，未能滿足他的願望，祇得委婉向他說明。而當這本書印單行本的時候，我們特地給他校對了一次，到出書之後，從他眼裏，還是看見有錯字，他又來信要求趕附校勘表，出版社以爲最好等到再版的時候再修改，却想不到再版時許先生已經無從修改了，這豈是出版社所料到的呢！

復員之後見到的許先生，已經齒落髮白，和八年前大不相同，幾難辨認了。但是身體健康並不算壞，到台灣之後也沒有什麼病，這是許師母所承認的。並且她又說許先生腰背還是挺直，並不衰老。師母又拿出許多照片給我，裏面有些是在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北平女子文理學院撤退時所拍攝的。那時該校由許先生率領，師生長途跋涉，先至陝西城固，沿途短衣，赤足，持杖步行，經聖水寺，登山遠眺，在班公樓，涉水野餐，和青年一同進退，並不落後。在動亂的時代裏，所看到的許先生，已經拋却長衫，禮帽，含紳士式而實踐平民生活了。

許先生性情雖然和易，但是非善惡之分，有不能寬恕然去之的時候，也許難免以直報怨。或者忠厚待人，而遭到以怨報德，那麼變態的還是許先生了。但在我看來，以爲許先生學生有公憤而沒有私仇。

去年台灣事變，從許先生信裏說及台人曾經到過編譯館幾次，幸而無恙，那時我祇不過替許先生放心，並不覺得怎的。後來聽說台人到館，曾經問過館裏的台胞，有沒有人受壓迫，他們都說相待甚好，因此沒有遇到危險。最近來人，說如果我不滿意，說當緊急時，許先生站在大門口，阻擋這種犧牲小我來保存整個組織造起來的文化事業，看事業重於生命的精神，即是失却理性控制的時候的人，也爲之感動退去，豈不是真個「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嗎？無怪他死之後，整個台灣爲之震動，弔喪的人無不落淚，衆口一辭，悲悼痛惜。而獨不能談格高萬俸，則頗有類於韓愈的誠格鱷魚，而不能同君王的視聽了。然而假若多幾個像許先生在台辦事的精神，也許不會有台灣事變之類的事情發生了。

死得越可惜，越能銘刻人們腦際，善良的魂靈，必然長存在善良的軀體中，不但在他自己，也遺流永遠。安息吧，先生！我們懂得你，遵從你的善心，爲人民服務的。

# 瀋陽外圍之戰

(北平特約通訊)

凌華

「南京國民參政會王參政員化一鑒：請轉陳國民政府主席蔣，行政院院長張國防部長白，參謀總長陳鈞鑒：東北情勢危如累卵，人民待救，有如倒懸。赤寇鴟張，迭陷名城，烽煙四野，流亡載途。吾民何辜，受此慘禍！懇請中央推如殫已溺之懷，憐憫亡國之懼，迅赴事機，申明決策，慎勿放棄東北，應火速派遣重兵，採取實際有效辦法，搶救東北。並望尊重東北老志士，挽救民心，光復國土。凡我東北旅平同鄉，誓死願為後盾。迫切陳詞，伏冀嘉納！遼寧旅平同鄉會。」

這是遼寧旅平同鄉會，配合着東北宿衛在京談話而發的一個給政府當局的電報。這電文所用的詞句，並沒有一點誇張，或許還不足以為描寫這些東北人的急切心情。

遼寧現在是國軍集中的地方，自從新五軍受了損失，現在瀋陽周圍兵力已感不敷分配，法庫撤守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錦州到山海關一線原由范漢傑兵團駐紮，但自從范部渡大凌河收復了溝幫子，好像錦州也空虛起來了，於是上海又調來了一「番號不詳」的兩師精銳部隊，這部隊到了秦皇島，馬上出關，填補了前面的空隙。

打開地圖一看，就知道瀋陽的外圍，有五個衛星。北面的鐵嶺和開原，這是比較不重要的，由一支精銳軍隊駐守；東北是撫順，這是瀋陽今日電力和煤的來源，這裏如一旦有問題，瀋陽就岌岌可危了；東南是本溪，這地方不甚重要，現在產煤量也少；南面很重要的遼陽和鞍山，已經失去，瀋陽到營口這一條路就受到阻礙；西面是新立屯和新民，新立屯已經失了，剩下的「二門」是新民。

關於鞍山的損失，到現在所知的只是「重大」而已。在軍事上，外間傳說在鞍山的駐軍有一師餘人，但又有說不到此數的。據失陷前逃出之政工人員談：「守軍胡師長及鞍山市長以及黨政人員，於全市及礦廠陷落後，最後集中於鋼鐵廠之二白樓內，對圍攻之共匪以手榴彈抵抗。入夜共匪吹牛角作衝鋒信號，聲音悽絕人寰。胡師長於投完最後一彈時，即從容整備服裝，懸掛勳章並手帶白手套，自殺成仁」。但「非政工人員」又有一種說法：

「工礦界悉：鞍山鋼鐵公司員工數人逃抵瀋，據稱：該公司員工均安全，廠內亦無破壞，洗煤、煉焦、化鐵、軋鋼各廠均經完整保管。因無煤，共方短期內亦難復工」。而另外一些電訊還說：胡師長自殺未遂，下落不明。

在日本人竭力經營下的鞍山鋼鐵廠，有三百五十、四百、五百、六百及七百五十噸的鍊鐵高爐各一座，四座一百噸和二個一百五十噸的鍊鋼平爐，三座預備精煉爐，此外附設東西鞍山，櫻桃園等八處採礦所，和鋼片、鋼板、鐵軌、鐵絲、鑿業、煉焦及各種副產品工廠，出品計有鋼板、鐵軌、鋼片、電線、鋼材、各種螺絲釘及磅安（肥料）、硫酸、瀝青、耐火磚、代用汽油等十餘種。根據日本人在一九三九年發表的數字，鞍山鋼鐵廠員工共約七萬五千人。在日本投降前一年，該廠生產了鐵塊一百八十萬噸，熱鋼一百三十多萬噸。鞍山丟掉之後，對政府的損失當然是極大的，因為北方石景山（北平城北）的鋼鐵廠等於一點也不生產，資委會曾在天津有一個鍊鋼廠，只有一個三十噸的爐，每天出個兩爐三爐，便已經是「最高紀錄」。

至於重慶大渡口的鋼鐵廠，勝利後已經停工，最近大概又要恢復了吧，誰也不知道能有多大規模，多少技術人材。

鞍山鋼鐵廠在敵偽手中是東北、華北、華中主要的鋼鐵來源，鋼軌、軍火、鐵筋、鐵管的來源都在此，但如今最大的損失，却是一千多位技術人材，包括許多最近方回國的留美專家和大部分學習鍊鋼的大學畢業生，一個也沒有出來。

更可嘆的，是「鞍山國軍確於十九日作戰略之轉進，二十一日空軍轟炸機轟擊已對鞍山作摧毀性之轟炸，礦區各處已成大海」，「二十三日國軍轟炸機，再對鞍山之防禦工事及戰略據點加以摧毀，車站已破壞，鋼鐵公司部份起火，硝鎗迷漫上空，共匪已開始搬運市內機械……」

鞍山戰事結束之後，攻鞍山的共軍顯然有三條路可走：第一，南下解決營口，免得再過半個多月營口開凍後國軍有一個增援的海口（實際上這個港口容量不大，欲利用來增援收復遼寧總嫌不夠）；第二，東取本溪，但本溪已在囊中，事實上用不到專誠與兵；第三，和新

立屯南下到大虎山的共軍連成一氣，則南下可以取錦州，北上可以攻新民，直叩瀋陽的西門。這三路的戰事幾乎是同時開始的，不過本溪戰事顯然並不很重要，本溪的守軍本來不多，已從周圍各據點如東牛心台、成寧村和南公原等地撤退，聚守本溪，共軍的戰略目前似乎只在切斷瀋陽與本溪的連絡，所以戰事是在瀋陽到本溪之間的「歪頭山」發生。到廿七日，傳說本溪已告失守，但還未經官方證實。營口方面，二十四日就有「試探攻擊」，到二十五日轉劇，「共匪全面攻擊營口南郊」，二十六日營口車站機場同告失守，「殘共已進入營口近郊，戰火刻已迫近市區」。

遼西戰場分為南北兩個，北面是新民，南面是錦州。由新立屯向打虎山（大虎山）搶修鐵路，現已修至八道壕，並以馬車汽車由黑山向打虎山增援。如今共軍在東北第一線有十個縱隊，主力便在遼西，一方面迎戰北上國軍，一方面阻斷瀋陽國軍的退路。北面的新民國軍已在二十三日從東站撤退，同時城南十五里馬廠國軍也已轉移。「二十五日國軍又集中兵力反攻，共匪受挫。重要據點，仍在國軍掌握中，惟情況甚緊」。共軍據說有五萬多人，由東南

兩路進攻，到二十八日北平聽到兩個傳說，一說新民正在巷戰，一說二十七日相當沉寂。

最重要的還在南面，這是一個長期的戰場，目前還不會有大的正面戰鬥。由錦州北上國軍已在二十三日收復溝幫子，可是前面進，後面空，「二十五日夜，共匪開始向外圍壓迫，錦州情況驟趨緊張，出關增援部隊，兼程挺進，且夕可達錦州」。共軍在等機會「吃」，國軍也必會很慎重，什麼時候這面計算有一點錯誤，那邊就來咬一口，否則還是僵立對峙之局。在整個的戰事中，國軍是儘量不暴露弱點，但軍事上却不能不有弱點，共軍總是避實擊虛，跳過了吉林、長春、四平街、瀋陽，如今難道不會再跳一個錦州嗎？如果真有這一跳，却要跳到山海關了。這是關內與關外的分界處，誰也曉得的。

官方的王牌，似乎這次還是傅作義部。鄭洞國南行請援，據說中樞除已答應派軍北上之外，並命鄭轉告傅部立即出關，打通錦瀋段。這也就怪不得一位東北宿將要說：「像傅宜生那樣痛苦局面，我們是不幹的」。由此可見傅的處境。傅部開始北調的消息方一傳出，我們便聽說聶榮臻在冀中的軍隊又增加了一個第七縱隊（



一縱隊約合一軍了。  
潘陽的衛星，還有撫順和鐵嶺開原。撫順附近還沒有大戰，只有小接觸。從鐵嶺開原到潘陽的聯絡早被切斷，而且鐵嶺與開原之間也斷了。開原車站已經放棄，舊城本無可守，現在就要看鐵嶺了。但道孤立即據點在軍事上也沒有重要意義，倒像很激昂。王化一說：「要請中央當局拿出具體有效的辦法來，口頭上的調撥大軍，是無濟於事的。」他認為潘陽還可守三個月，湯恩伯兵團如能北上當然好，「不過以後的戰略戰術，似乎有重加檢討的必要。」  
另外，潘陽有許多機關首長，正在使用金蟬脫殼之計，將職務留給當地人，自己用備出差

的名義，逃出了危險地帶。至於有什麼新的戰略戰術呢？東北舊宿一要回去，就有什麼辦法嗎？天津益世報一篇通訊寫得很清楚，這時候仗着幾塊老招牌與共軍一二人物的舊關係，就可以挽救大局嗎？那未免太像神話了。（二月廿八日）

# 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和民盟三中全会

胡光

自從去年秋天民主同盟宣告解散，在國內停止活動之後，牠的領導人物紛紛南來，香港——這塊大不列顛的殖民地——就成為各反政府黨派唯一的活動中心了。截至目前為止，這裏面包括共產黨、民主同盟、農工民主黨、救國會、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和致公黨等，幾乎是所有反政府黨派的大集合。而其中最惹人注目、影響最大的活動，要算是去年底「國民黨民主派聯合代表大會」的召開和「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以及今年年初民主同盟三中全会的召開。

國民黨黨內重要的反對派組織本來有兩個：一個是「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領導人是陳銘樞、何香凝、柳亞子、譚平山、郭春濤等；另一個是「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領導人是國民黨元老李濟深，「一二八」抗日名將蔡廷鍇、「基督將軍」馮玉祥、老教授馬敘倫（馬氏本來領導上海的「民主促進會」，但現在已經和香港的「民促」合併）等。這次的聯合代表大會就是以上面兩個組織為基礎而召開的。出席者有全國各地黨內反對派人士一百四十餘人，大會在二月二十五日開幕，一月一日閉幕。經過一星期的討論，最後正式聲明脫離南京國民黨中央的指導，組織「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黨員為「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實現中國的獨立、民主與和平而奮鬥」。這樣，國民黨內激烈反對現狀的份子便開始團結一致，和南京蔣

派、中華革命黨等，這些派系都是不滿現實、不滿蔣主席及其領導下的國民黨中央的。

「革命委員會」的政策是什麼？牠的任務和目標是什麼？要了解這些，我們得看看牠的「成立宣言」和「行動綱領」。這兩個重要的文件明白的指出：中國的局勢今天所以如此之糟，完全是蔣主席及其所領導的集團「放棄總理所手定之三民主義三大政策（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兩大任務（反帝、反封建）而甘為帝國主義的工具與封建勢力之代表者」的結果，因此，這個「委員會」的最高理想是「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建設獨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國」；其行動的基本原則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的對外對內政策（即三大政策）」，而以推翻蔣主席所領導的政權為「當前革命任務」，並且認為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在今天必須加以充實和擴展：「聯俄」應該擴大為「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容共」應當擴大為「聯合國內一切民主黨派」，至於「扶助農工」則必須具備實現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內容，並保證勞動者「免於失業飢餓」之權利。這是原則。具體的「行動綱領」分消極、積極兩方面：消極方面包括反對蔣主席的「武力統一政策」，發動人民制止內戰；反對蔣主席的「獨裁政治體制」，否認國大和憲法；反對妨礙人民基本自由的法令與制度，力爭人民應享的各種自由；反對「助長內戰、窒息民生之財政經濟」，號召人民反對三徵；反對「助長獨裁窒息民主思想之文化教育政策」，力爭學術、思想自由；以及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等六條。積極方面包括十八條，大都是關於未來的「民主政權」的主張，例如以全國人民普選產生的民主政權代替蔣主席的政權，司法獨立、嚴懲貪污、簡化政治機構、推行省自治、廢除保甲制、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敦睦邦交、重新審查各種違反獨立自主原則的對外協定與條約、根絕日本帝國主義的復活、沒收豪門資本、促進國營企業、扶助農工組織等等。

「革命委員會」既以推翻蔣主席所領導的政權為當前的任務，那末，在目前的形勢之下，他們究竟拿什麼作為武器呢？關於這個問題，「成立宣言」和「行動綱領」都沒有正面的說明。雖然外界傳說目前在兩廣活動的武裝部隊分別接受李濟深和蔡廷鍇的指導，但這種說法並沒有可靠的事實證明。當然，如果說兩廣的若干武裝部隊與李蔡二氏多少有點歷史上的淵源，那是不錯的，但要說是直接受他們領導，就恐怕與事實不很相符了。

不管擁護這一組織的人數有多少，不管他們實際的力量有多大，總之，對於中國第一大黨的國民黨而論，「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不能不算是一件大事；因為在過去他們只是黨內的小派別，而現在已經團結一致，舉起一面色彩鮮明的旗幟，公開的與其他反政府黨派站在同一條線上，對蔣主席領導的國民黨和政府進行正面的鬥爭了。以這個「委員會」領導人的聲勢和歷史而言，他們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雖說目前還不能斷定他們的成就可有多大，但至少在精神上對於南京的國民黨中央是一個威脅，而對許多不滿現狀而又願加入別的黨派的國民黨員也是一個有力的號召。

。不久之前，這裏曾有南京特派吳鐵城來港對付這個「委員會」的傳說，可見政府對這件事並不是不關心；但即使吳鐵城南來，恐怕也未見得能起什麼作用吧。去年宋子文的「噓此一行」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一向拿「以和平求民主，以公開爭合法」為口號的民主同盟，在去年秋天被解散了。民盟經過這次打擊，是從此就銷聲匿跡呢？還是有一天會重振旗鼓呢？如果重振旗鼓，他們的政治路線會不會有所改變？這差不多是每一個關心中國政治局勢的人需要知道的事。

今年一月五日在香港召開的民盟三中全會給了這些問題一個答覆。

在民盟總部解散前後，民盟的高級領導人紛紛南下，至去年底為止，中委裏面除了張瀾、羅隆基、黃炎培等以外，餘如沈鈞儒、章伯鈞、周新民、劉王立明、李相符、朱蘊山等都已先後來港，連同本來在香港的中委周鯨文、李伯球、鄧初民、沈志遠等，合計已足法定人數，於是決定在一月五日召開三中全會，討論許多迫切的問題。在開幕的當天，大會全體一致通過了一個「緊急聲明」，否認南京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的舉動，不

接受總部去年十一月發表的「辭職」、「解散總部」和「停止盟員活動」的聲明；同時宣佈「恢復領導機構，繼續奮鬥」。這證明了民盟並沒有因為受了打擊而心灰意懶。

這一個會議從五日開幕到十九日閉幕，前後歷時半個月。整個會議大致可以分三個段落：第一階段是各級工作報告，第二階段是全盤檢討，第三階段是從分組審查到大會討論。在第二階段結束而開始進行分組審查的時候，曾經傳出一個謠言，說是由於內部「共產黨份子」和「保守份子」在今後應採取何種政治路線的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彼此爭持不下，會議因此無限期停頓云云。這個新聞在香港由一家英文報紙刊出，接着某些華文報紙也轉載。可是以後的事實證明了這是謠言。

參加會議的某民盟負責人公開聲明：會議中發生不同的意見，那自然是有的，如果說沒有任何爭論，那是超乎常識以外的說法；但是爭論並沒有妨礙團結云云。

會議閉幕以後接着就發出了一個宣言和一萬餘字長的「政治報告」。宣言開頭分析了國內外大勢，下面分四項說明對最近時局的態度與主張，大意是：一、在目前的形勢下，要實現中國的和平民主，已不可能

由談判妥協中求之，必須粉碎「反動貪污腐敗化的政權」，才能建立一個「和平民主的新政權」。二、反對代表地主豪紳買辦封建的整個集團，澈底消滅封建剝削的土地關係，實行耕者有其田。三、反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反對美國把中國當成反蘇反共基地，反對美國一切「危害中國主權的行動」。四、不承認美政府與國民政府簽訂的一切「損害中國人民利益的條約」。四、強調表示與一切民主黨派合作，結成堅強的「民主統一戰線」，認為只有與「其他一切民主黨派」親密合作，民主和平自由獨立的新中國才能實現。

「政治報告」裏面詳細說明了民盟的立場、態度、政策和戰鬥任務，指出民盟的立場是「人民的民主立場」，而在現階段的客觀形勢之下，「要民主就非革命不可」，所以也必然是「革命的立場」；承認了過去以和平、合法、公開的方式爭取民主的失敗，認為今後應當「積極支持以人民的武裝去反抗

反人民的反動武裝」；反對中立的態度和所謂「中間路線」，強調民盟的任務是「為澈底實現人民的民主而戰鬥」。

從上面的兩個文件和各種決議案中，可以看到民盟已經提出了新的政治路線，揭棄了過去「以和平求民主，以公開爭合法」的口號，而決定要推翻蔣主席所領導的現政權，走「革命鬥爭」的路了。不過，民盟本身是沒有武裝的政黨，現在雖然決定走「革命」的路，說「今後必須發動、領導全國人民積極從事此項鬥爭」，但並沒有明說要自己組織武裝從事鬥爭，而且也沒有任何跡象可以看出他們有意組織武裝，所以今後民盟的主要工作似乎還是從各方面去「支持」這個鬥爭。

以上原則上的決定。至於在組織方針和組織形式上也有新的決定。全會首先通過要貫徹「民主集中制」於整個組織之中，同時決定以「革命性的羣衆性的組織路線」代替以往的「公開組織

、和平爭取、合法活動」，而將各級組織轉入地下。在宣傳方面決定首先恢復光明報，並且通過了一套詳細的宣傳計劃。其他如救濟被害、被捕及流亡監獄，加強國際宣傳活動、發展海外盟務、充實總部人事等等，都有所決議和措施。總部的各處會主管人員都照舊，只是有缺額的由大會選人補充。

民盟在過去所採取的手段是和平的，從來無意於武裝鬥爭，但結果終不免被政府認為是中共的尾巴，參加叛亂，因而予以解散。在政府或者以為從此可以一了百了，高枕無憂，殊不知這一來竟迫使民盟走上公開造反的道路，也許不是政府始料所及的吧。在民盟被迫解散之初，中共方面對於民盟少數領袖曾經有過批評，認為他們對政府和美國政府存有若干不應有的「幻想」，如果說這種「幻想」過去確實存在過的話，那末毫無異議的，現在則完全消滅了。民盟已經接受了失敗的教訓，可是政府能不能接受他自己

的行為所給與的教訓呢？

有人說一九四八年是香港的政治年，也許是對的。這一個「政治年」顯然將以民盟和「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為主要角色。與民盟內部發生「分裂」的謠言同時，傳出了這樣的消息：說是香港政府曾經「很客氣地勸告」民盟和「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不要進一步有什麼「妨害中英邦交」的活動。從兩個黨派對這消息沒有否認過一點上看起來，這件事可能是事實；可能因為中國政府對香港政府提出過有關這事的要求，所以香港政府為了禮貌的緣故不得不這樣做一下。但據一般人觀察，只要不違犯香港政府的法律，香港政府對中國各反政府黨派的活動是不會出而干涉的，至多不過「很客氣地勸告」一下而已。所以，上述兩個黨派還是要繼續活動下去的，而香港恐怕將繼續成為所有反政府黨派的根據地。

關於皖南的土共，我們必須從三十年的皖南事變說起。那時新四軍的根據地是在涇縣的雲谷，政治部則在南皖北共達三十個師，加之

## 皖南土共企圖打通直抵長江南岸的走廊

丁溪陽

富國的卅二集團軍上官云相的總部，右邊是太平廿三集團軍唐式遵的總部。事變發生後，國軍調動的壓力皖南皖北共達三十個師，加之項英、袁國平被擊斃。可是這裏面却埋下了一些種子。有極小的一部份，不過百數十人的隊伍，潛伏到黃山的深山裏，晝伏夜出

他們經過了四年的發展，慢慢又力量雄厚起來。在抗戰期間，不斷加入了從江北來的新力量，慢慢的生長發展，漸漸從百數十人增加到四五百人，活動的地區有宣城、郎溪、廣德、旌德、績溪、太平、石埭數縣，不過做個綠林裏的好漢，在極荒野的山地裏游蕩，主要的根據地便是黃山。抗戰勝利後，他們的旗幟漸漸鮮明起來。這時從延安來了一個生長在印度的華僑名叫胡明的，帶着他的太太梁華，打着「蘇皖邊區解放軍」的旗幟，儼然組織了各種機構。胡明在胡明在蘇皖邊區訓練了十餘名幹部，他擔任着蘇皖邊區政委和解放軍副司令的職務，他的太太梁華是婦女部長。

這一數百人的隊伍在物質條件極艱苦的山林中日夜長大，看中國軍大部北調皖南空虛的弱點，漸漸活潑起來。起先他們不過躲在山地裏，後來逐步向公路兩側發展，編組沿線的民兵，以「抗兵抗稅抗糧」相號召，再又慢慢的泛濫到涇縣、甯國、郎門、歙縣等二十三縣，沒有一縣沒有他們的蹤跡，就是接近京畿的當塗與蕪湖也不能倖免。

國軍在皖南根本就沒有武力，只在蕪湖成立了一個首都衛戍司令部江蕪指揮所，由六三師師長林浩、六區專員楊績森分任正副指揮官。那是以防範共匪主力渡江的江防機構。另外還有省保四團、保三團的一個大隊以及保二團的一個大隊，一共不足兩千人。李品仙看見皖南鬧得太不成樣子，去年六月曾派省委林中奇率兵前來督導綏靖，結果他了他的新婚夫人到山清水秀的皖南來旅行了一番，便回到合肥繳了一摞白卷。

大概是去冬從望江渡江而經由東流南下的一支部隊。另外在大通對江的桐城縣的土橋鎮也發現有劉伯承部八千人集中，已成立前進指揮所，據說準備春季渡江。這些都是暴風雨即將降臨的預兆。在歙縣（徽州）的南鄉浙皖邊境天目山區，現還有土共數百人在編組民兵，裏面有電台、醫院、小型修械廠的設置，看樣子是準備作

志敏與羅炳輝的老路綫，進可威脅京滬杭三角地帶及太湖沿岸，退則轉竄福建華南等地。皖南指揮所已召集皖南各專員、縣長、保安團長在歙縣開過清剿會議，並開會電請孫連仲、李品仙前來主持，此外蚌埠第八級靖區也在召集各縣長開綏靖會議，而三月廿日全省行政會議又要開幕。看這些會議的頻

### 農村的整剝方法日新月異

稼漢

（湖南通訊）在城市裏，儘管正常的工商業已陷萬劫不復的絕境，總還有收音機在力竭聲嘶地接成街頭空虛的熱鬧，儘管一般小市民成天爲着油鹽柴米而煩惱呻吟，總還有美麗的霓虹點綴着畸形而片面的繁榮；然而脚步一踏進農村，這就真正接觸到人類最殘酷最慘的一面，全面暴露，毫無掩蓋。尤其在道廢曆年關前後，農村的疲廢殘破的景象更是觸目驚心了。

在山談山，當然農村第一是谷子，普通借一石谷是一年加四斗息，可是當我們做孩子時（早十多年）是很少納四斗息的，至多是加二息，而今加二的絕了迹，加五是平常，加倍的息也并不出奇。最新奇的，是春上借一担谷，到青黃不接時照高價折錢，將價款按日加三分息，到新谷登場時，本利和再照時價折谷納還；這樣，一石谷借出不過半年，可以得到二石半以上。地主却搖搖頭說：「我們是救濟窮人，否則，荒上的谷那裏有借呢？」上這種盤剝當者，爲數固然不怎樣多，但是絕望的農民往往無法跳出這種火坑。鄉下流行一個沉痛的諺歌：

其實，農村跟城市的經濟發展的方向雖然是一致的。城市中，官僚資本在盡量方法吸吮貧民的血液，農村則是地主階級抽着貧農的筋。爲了避免通貨膨脹與紙鈔貶值，城市的有錢人在計算如何使利率追上物價的上漲

「谷折錢，錢折谷；借一石，死一屋。」可是誰也珍惜這一條殘命，當難關不能渡過的時候，只要這着能狗醫好，即算挖斷一隻腳，他們也無法估算得失的！借谷的貧農，一朝給壓倒了，就永遠沒有抬頭的時候！貧農的「力」可以換得生活吧？征兵演暴流沖走的壯丁，正像禾中揀去的種子。「活力」被拿去打仗了，剩下來多是殘廢。於是土地枯槁了，農村沒有動力了，誰也不能否認，而今生產力降低了。沒有人力，土地成了廢物，剩下這些殘廢農民，他們在地主控制下，肩上的鎖枷永遠釋放不下。壯漢少，應該是雇農出頭的日子，可是地主們的方





# 大時代

## 第二卷 第二十二期

愚昧主義必須反對	周建人
正常的經濟政治與道德法律	蔡尚思
美國對日政策的劇變	孟憲章
看大局(短論)	司馬觀
「勢靶」(雜文)	許由
「父與子」及其作者	林海
北美重遊(七)	陳達
北方教授看美援	文琪
蘇北近事實錄	徐桐
湖南的兩件慘案	黃非
十五小時的「壯丁災」	陶湖

### 論短

### 看大局

司馬觀

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候雁北。這個好季節，生生發發的事物滋多，看一看大局，包括預卜中國的前途，是很有趣的。今天大局像是矛盾極了。漁陽鼙鼓，殺聲震天，而和譙繁盛。美援急如星火，經濟軍事雙管齊來，而司徒大使公然主張國共重開談判。蔣主席上下廬山，避寒如避暑，傳說紛紛，而外間人不足見其真面目。總之一個問題，和呢？戰呢？消息實在矛盾極了。

東北局勢土崩瓦解，朝野惶惶。東北耆宿們晉京獻策（當然不是哭秦庭），蔣主席連連表示，「中央有決心有辦法」。事實也確在徵召援軍，悉力以赴，輸贏由天，豪興不減。你不能不相信政府「戡亂」迄尙堅定。美國議會正在討論軍事援華，軍火源源而至，據說，美蘇快要開戰了，故麥帥極言開關中國防共第二戰線，陳納德飛歸出庭作證，天假良機，好事已近，為政府謀，計不出戰。要我作主，就言和者斬。但環顧整個形勢，「戡亂」一經年，暴兵浪戰，師老無功，久懸戰固兵法之所忌。政治腐朽，經濟枯竭，而民情離散。憑良心說，主和之議對政府未始不是一片耿耿的忠心。司徒氏登高一呼，「智識分子」應聲而出，說組織團體就組織團體。和平使者南北穿梭。文有「自由主義」，「中間路線」；武有……談判陣容不能不說略已整齊。試為遠眺，如行憲國大開成，蔣主席個人功成名就，國民黨理合還政於民，此時來一個萬機公決，更始國是，使兩大共存共榮，主和者當認為十分理想。

事實有無可能呢？我看是不可能的。在政府中雖有見仁見智的不同，對愛護國民黨，「維持現狀」作孤臣孽子則一。此種不同的見解，在未來數月變化繁劇中，殆將不斷產生虛虛實實的和論，但不能成為事實。因為在政府有「手術治病」之說，手術到中途半端忽然停止，何等危險。患的是手術的病，待養胖了還要施行第二次手術，但養不胖又怎麼辦呢？還有，和必須是雙方相應，彼此都感到力屈而想休戰，今天勢力消長正走向於起倒相替，攻守易勢，在歷史運命的酣戰時刻，怎樣可以和平得下來呢？和的局面看準了也是暫時的，過去的教訓如此。難道今天還有像項羽那樣鬥力而不鬥智的英雄，願與劉邦劃定鴻溝，假和當真和，引兵而東，再等着挨劉邦的打，奔走城下？至少，中共是作如此想的。因此，還是胡適有眼光，「和比較困難萬倍」。那些遠落在現實後面的書生想像，清談誤國，可憐的！

這樣一鞭辟近裏，所謂大局就不外是戰局了。突變例外，按正常的規律說，春季將有好幾場大戰，但戰場則未能跨越長江。（五月渡江說或與事實相近，但那時已是初夏。）在春雨泥濘以前，遼西可能演出空前劇烈的硬仗，這一戰將使東北之戰近於尾聲。孤立大據點，對方恐怕要採取軟化辦法。之後，便是不一定經過山海關的入關戰了。此際河北保定不保，冀東風雲緊急，關內外烽火也許要燒連一片。唐朝已有入說：「河北治，天下治。河北亂，天下亂。」以河北為主的戰場大轉盤，兩三個月後可能開始行動。這是兩場配合一場的大戰之一。其次，不要小視了西北。最近宜洛一戰，西安震撼。據說高級將領陣亡，部隊多有損傷。延安並無軍事價值，非所必爭。兵力對比起了變化以後，受威脅的是古都西安。西安淪陷已破，但似未能逕取之。可能有一幕關中會戰。再其次，陳毅新兵正絡繹南下，豫北蘇北形勢趨緊，徐州可憂，圍繞於徐州外圍的大小纏鬥必難避免。獨眼將軍喜歡左右開弓，說不定信陽南陽以至武漢外圍，都有戰事。這幾場大戰以後，渡江問題乃可以提出。

這樣看，國事前途主要將決定於戰場。故所謂和談，「和」一則有之，「談」一字根本不對勁。事實已發展到你死我活，不是消滅就是投降的階段。中國問題必須解決，如戰場能解決問題，流這一代的血，節省下一代更多的流血，為什麼我們不該把宋襄之仁收藏起來呢？

# 愚昧主義必須反對

周建人

思想界很早就分爲對立的二派：一派是進步的，又一派是反進步的。西洋科學史或哲學史上，曾把這種情形形成了科學與宗教之爭的形式表現出來。其中最著名而廣知的事件，有白魯諾因講述哥白尼的地動說而被判死刑燒死，伽利略因講地動說亦大受迫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若干年，美國還有教員因講進化論而被起訴，判罪的實例！

理由是很明白的：爲極少數人謀極大利益的統治如想保持下去，必定怕懼進步，怕懼改革的，便怕懼思想上有甚麼進步。這種統治，在意識方面大大的依靠于迷信、愚昧、保守思想去支持，如果把任何事實的真相揭發出來，於這種統治是大大不利的，故他們必須竭力反對之。這是消極的一方面。積極的方面，他們還提倡有麻醉作用的宗教，有利於統治者的道德，及施行其他各種愚民的政策。這種東西，一古腦兒是屬於「愚昧主義」的。

愚昧主義決不停留於主要爲宗教壓迫科學的這一形式之內，它亦借科學的形式以假借科學。其中最顯著的事實，有德國希特勒時代的優生學與「種族主義」。他們是劣等的人！種族主義也非科學地說出日耳曼最優秀，應統治世界的謬論。凡反科學的，反進步的言論，或借科學或哲學的面具出現，或毫無假借的直白說出來，是有助於專制獨裁的統治，能阻遏進步，反人民大眾的利益，「花樣雖多，不過都屬於愚昧主義這一套。爲了支持有利於少數人利益的專制獨裁統治，必須作愚昧宣傳，行愚民政策；真相的曝露，眞理的指出，於他們是無利的，故必須隱瞞、歪曲、欺騙，不惜全力來玩這套把戲。伽利略時代的反動者大抵的確不相信地球會運動，今日之反進步者則常常故意反對眞理了。

此種主義在今日的中國舊社會中，除了提倡封建思想、尊孔之類以外，一切有利於反進步的欺騙、偽造、歪曲及掩飾事實真相的行動都在進行。舉例來說，中國人民今日對於美國的竭力扶植日本侵略勢力，已感到極大威脅的程度。波茨坦宣言中雖有這決定：「對於日本戰罪人犯（包括虐待我人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但是結果怎麼樣？除却把嚼吃美國人的肉的幾個日本戰犯已經絞死外，別的消息，祇聽到屢次在把戰爭罪犯釋放出來，有時甚至使被釋放者感到莫明其妙。

還有，這些話也是波茨坦宣言中說過的，即：「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權威及勢力必須永久剷除；蓋我人堅持非將負責之窮兵黷武主義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勢不可能建立」。但結果

又怎樣呢？戰爭罪犯不斷在釋放，前已說過，還有天皇不是不折不扣的窮兵黷武的領導者嗎？然而至今沒有辦罪，連廢除天皇制也沒有辦到！美國的沒有照波茨坦決議來辦，莫非還不够明白嗎？

然而胡適博士在給周鯨生先生的信里竟認爲「西方民主國家」並無扶植德日侵略勢力的事實，其理由之一，便是說因有波茨坦的決議在。決議是有的，但沒有照辦，這是一衆目昭彰的事情，鐵一般的事實，不是祇要說有波茨坦的決議在，便可以說沒有扶植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

還有，美國會將日本神風隊飛行員運到美國去訓練，撥交兵艦二十八艘給日本警察，保存日本戰時的飛機場、防空洞、及地下工廠，保存遠東第一大規模的八幡製鐵所，不認眞的解散財閥等等等等，都不是一爲了給予日本恢復一部分的生產力，使日本人可以養活他們自己「一語所能解釋的。「事實勝於雄辯」，美國的扶助日本恢復侵略勢力的事實已早成不可掩飾的事實，故這一事情已成爲中國人非常注意與感到威脅的事情。孟憲章先生在一論美國助日復興一文中云：

「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不僅野蠻而且詭詐的，太天真的（其實是擴張欲太盛的引用者）美國人竟把它化敵爲友，並且認爲生死之交的密友，這不僅是一個大錯誤，而且是一個大危險。日本帝國主義一旦死灰復燃，當然不會首先打美國，更不會向蘇聯的硬碰硬，結果不仍是先向抵抗最弱中國進攻……」

翻開「中國建設」月刊三月號的第一面，評論上講明了美國扶助日本復興侵略勢力之後，有這樣的話：

「我們決不是杞人憂天，事實最雄辯，人類已被曾有的厄運所威脅，東方的危機已經開始了！……面臨於我們的是民族安危存亡的大關鍵。我們必須不憚煩瑣的正告全世界愛好正義，和平，文明的人士：東方民族的安全是與全世界的和平，安全不可分割的。爲了自己的安全，爲了子孫的幸福，爲了避免世界又一次投入於流血悲慘，阻止那一條舊的道路是有着充分的理由，更有着神聖的責任。」

然而胡適博士給周鯨生先生的信裏，說「西方民主國家」沒有扶植德日侵略勢力，給他們恢復一部分的生產力，無非使他們能够養活他們自己云云。胡適博士竟把美國罪惡的扶植日本恢復侵略勢力的事實輕輕用使他們能養活自己一語掩蓋起來了，把關係於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安危存亡的事情，說得與中國好像毫無關係似的。我們見過日本軍人把中國的孩子關於豬欄裏凌虐得骨瘦如柴的照片，用了狹的刀子，細細割裂中國俘虜等等的照片，并確知有屠殺人民、強姦婦女之許多事實；一二八時候，有在鄉軍人說爲報復元兵去打日本的仇恨







# 美國對日政策的劇變

孟憲章

## (一) 暫且拋開和會，先造既成事實

自從日德意法西斯投降以來，聯合國間特別是美蘇間，在戰時因對付共同敵人而形成的聯合戰綫，逐漸呈現了裂痕，這特別反映在對戰敗國德日的管制上面。去年十二月倫敦四外長會議破裂，全世界益向兩極分化以後，這種裂痕愈益深刻。美國過去還想透過和會形式扶植德日反動勢力之企圖，也因之激劇改變了。本年一月六日，美陸長羅雅爾在舊金山演說：「吾人不能摧毀日本之工業能力」，已表示美國決定改變態度，放棄波茨坦立場，而為第一次美官方的試探。二十六日聯合社華盛頓電：「使日本工業復興，可能成為將來馬歇爾援亞計劃之核心。若干外交界權威人士稱：此乃美國新近聲明決心加速日本經濟自給，俾對世界經濟復興能有適當貢獻之一種理由。……遠東局勢與歐洲十六國或受同等重視。日本久被認為亞洲工廠，一如德國之被視為歐洲工廠。故官方稱：任何遠東方面之復興計劃，若無日本工業之助，殆難實現。……次日該社電訊又稱：「負責方面宣稱：美國援助日本復興計劃，將請遠東委員會各國贊助，否則亦擬單獨為之。共和黨參議員諾蘭德對美代表麥克萊在遠東委員會所提主張，深為贊許。據稱：此係聲明時機業已到來，須給日本以無阻礙之機會，俾得在財政上自立。美國陸軍部準備加強進行助日復興計劃」。二十七日合衆社華盛頓電：「美國在事實上已放棄其竭力催促早開對日和會的意思，相反的，美國將增加努力，在佔領下協助日本經濟復興，以等候更適當的時間，再來致力於對日和約的談判」。二月二十五日，該社又據權威方面消息報道：「日本和會問題，可能在一九四八年成為被人遺忘之問題。官方認為在今夏無召開和會可能，並懷疑今年全年內是否有舉行可能。……翌日又報道：「馬歇爾派首席政策顧問秋南赴日，恐係美國擬激劇修改對日政策，以全力發展日本，使成爲遠東反蘇擴張的堡壘一項計劃的先聲。美已決定放棄標榜懲戒日本的波茨坦立場，而覓取方法，恢復日本的經濟繁榮，使日本力能成爲亞洲反共的屏障。……接着聯合社三月一日電：「美陸軍部摘要發表海外諮詢公司主席斯瑞克調查日本賠償能力報告書稱，惟有強大工業之日本，對於遠東和平及繁榮，較之繼續現在之不安定及經濟失調情形，危險反少。……華府權威人士認此爲一種「探測氣球」，而遠東委員會人士則稱：「最後美國的目標極可能達到。此事可能將繼續保持不下，直至造成既成事實，而日本工業將依美國所決定的水準建立。……三月七日中央社東京電：「據消息靈通日人稱：日本與太平洋各盟國極可能永不簽訂通常於戰後所締結之正式條約。再行延宕若干月之和會，至時已不具何種意義。而此種和會，如僅爲證實先行議決並執行之決議與行動之儀式，則更無意義矣。……如果說美國過去扶植日本，還是偷偷摸摸的裝腔作態的幹，有時像駐滬美總領卡寶特還辯解美國未曾助日復興，完全出於中國人誤會；則現在却是在彰明較著的硬幹。反正它獨佔管制日本大權，先造成一個既成事實，以後再說。」

## (二) 獨佔財閥等不得了

美國激劇改變對日政策，雖說是以倫敦外長會議破裂爲契機，然從美蘇兩國社會經濟體制看，却原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蘇聯是一切生產手段國有、無階層無剝削的共產主義國度。美國却是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的生產與財富，已高度集中化，政權掌握在以垣街爲司令台的八大獨佔資本集團手中。華盛頓的部長，有四個都是從垣街派出的。獨佔資本家最可怕的是社會革命。他們借款給別國，尚且要提出不推行社會主義與縮小國營事業範圍的條件，對於共產的蘇聯，當然更其害怕，怕到要檢查好萊塢電影明星的思想。他們簡直害了不可救藥的恐蘇病。從西德到日本，佈置了一道長達數萬里的防線。西德和日本，工業技術既高，現在又在它如來佛掌心，遂被選擇爲兩座防蘇前哨堡壘。想使堡壘有力量，遂不得不在軍事與經濟兩方面積極援助。近因國際情勢之緊張與國內之面臨經濟恐慌前夕，遂愈益使他們感着焦急。這是從軍事觀點看，美國不能不激劇改變對日政策者一。現在國際經濟情形，是別國都窮而美國獨富。上年度美國輸出百六十億元，輸入僅八十億元。本年度即連這種一面倒的貿易，也因各國缺乏黃金與美元，維持不下去了，致國內積累商品達五百億元，無法運出。而美國本國內經濟情形，又是多數人窮而少數人富，以致發生物價慘跌現象。這實在是經濟恐慌前夕的紅球。美國獨佔資本家急想給過剩商品與資本找出路。西德和日本，過去工業水準既高，現在又在軍事上受其佔領，在物資上受其救濟，遂成了它對外經濟擴張的理想地帶。美國獨佔資本想透過日本獨佔資本，以美國的資本與管理，日本的勞力與對遠東市場的經驗，和遠東其他各國的原料與市場相結合，以挽救其資本主義的垂危命運，兼以奴役遠東各國。這是從經濟觀點看，美國不能不激劇改變對日政策者二。

## (三) 事實勝於雄辯

美國激劇改變對日政策以後，即擬一復興日本經濟計劃，以正式條文，通知我國及遠東委員會其他各國，請共襄盛舉。據云，該計劃即係以麥帥扶植日本六年計劃和日政府復興經濟五年計劃爲藍本。前者擬將日本生產增加三倍，進口增加五倍，出口增加十二倍，在六年內需要美國投資二十億元。後者計劃

五年後必須實現約十六億美元之輸出，而提高至一九三〇—三四四年之淨輸出量。輸出目前置重點於纖維工業，逐漸轉移重點於機械工業及化學工業。五年後將年產煤六〇〇萬噸，電四二〇億瓩小時，銹鐵四二〇萬噸，鋼材四三〇萬噸，窒素肥料二〇〇萬噸，水泥四五〇萬噸，綿紗八三〇〇萬磅，人造纖維三九六〇〇萬磅，多超過一九三六年之標準。接着主張提高日本鋼鐵年產量至五五〇萬噸，派沙倫代表團協助恢復日本海運事業；派訪日工業觀察團協助恢復日本之紡織業，其團長傑克勃主張全面恢復日本戰前紡織業（一二六〇萬錠），向麥帥建議十六條，並盛氣凌人的大放厥詞說：「不管亞洲他國如何反對，美國志在必行，必恢復日本紡織工業的亞洲市場及殖民地市場」；取消外商入境限制；公私不斷投資並組織一個包括百五十餘實業家的規模宏大的投資團到日本去；撥軍艦二十八隻與日警。

最近美陸部發表斯揣克委員會長一百七十五頁有關日本賠償與經濟復興之報告書，認為除開基本戰爭工業設備以外，一切日本生產設備之移去，將妨害世界生產及減少日本臻於自給自足之可能性；又說：現已由美國務陸海三部調整委員會決定，認為日本自足經濟必要之工業容量，計為保留銹鐵二〇〇萬噸，鋼板三五〇萬噸，鋼條二六五萬噸，硫酸三五萬噸，曹達四一九・三萬噸，水電全部，海運一二四萬噸。此報告第一部，擬定應歸日本保留及劃作賠償工廠名單，共包括二十餘種工業，主要為鋼、化學、機械工具、電力、造船、石油、鋁等。除四種工廠設備價值九九〇，〇三六，〇〇〇元外，均免作為賠償。第二部係陳述建立日本自給經濟而應保留之工業之意見，在應被保留價值八一七、七六四、〇〇〇元之工廠設備中，應拆除作賠償者，僅硝酸及人造橡皮廠與一部份鋁廠及鋁精鍊廠（三月二日華盛頓中央社電）。美權威人士稱：「美國之新立場，事實上將使移出之賠償品較美國官員原來估計之數目減少百分之三十。美國現在之態度，除根據美國緊急頒發之一三成臨時訓令，中、菲、荷、英得取得主要戰爭設備外，今後日本工業設備，不應再受剝削。」（同日華盛頓合眾電）三月七日中央社東京電又證明：「目前所認為臨時賠償者，極可能即為盟國所能獲自日本之全部物品」。（我國原本要求二十億美金賠償，近擬讓至十五億）。

#### （四）一喜一懼適成尖銳對照之各國表情

美國積極扶植日本在法西斯軍國主義操縱下復興，不僅將使中日兩大民族再演互相殘殺之悲劇，而且將使美國下一代無數青年灑血於太平洋中與北極圈內，為其少數獨佔資本家火中取栗。故在中美日三國廣大愛好和平民眾間，引起普遍之反感，自不待言。且日本復興，將重復威脅遠東各國，而減輕賠償則又使各國戰爭損失無從取償，故凡與日本有關甚至英美集團之各國內，亦會掀起一片反對聲。據二月二十日華盛頓聯合電：「美國重建日本經濟、拯救該國免於破產之計劃，已使盟國在太平洋方面之戰後共同陣線發生緊張。美國希望

日本商業恢復並自給自足，其他盟國不以為然。若干國認為日本倘在世界市場重行強盛，將威脅太平洋其他各國之經濟。亦有認為日本重行工業化之後，又將踏上贖武之路，危害世界和平。菲律賓與澳洲均抱此見解，中國亦被認為抱此意見。西南太平洋方面，以美國祖護日本，亦表示不安。馬來聯邦、新加坡、與荷印，對日軍鐵路之創痛，尙未忘却。新近獨立之緬甸與英國自治領巴基斯坦與印度，見解相同。同日，法國新聞社倫敦電：「今日將在曼徹斯特舉行會議，屆時棉花局局長史特列特將告知英國棉業領袖多人，日本輸出之捲土重來，實為英國棉業一腹大患。」三月二日華盛頓合眾社電云：「遠東委員會」（對減輕賠償）之初步反響，十一國中至少有四五國將反對美國之新立場。中國及菲律賓率直宣稱反對，預計紐西蘭及澳洲亦將在原則上反對，印度傳亦同具此見，蘇聯之態度則不能得知。一日馬尼刺合眾社電：「菲律賓外交部高級官員四日證實，菲島反對減少日本之賠償品，並重申菲島之立場稱：應儘可能自日本取得最多之賠償品。該官員批評合眾社華府電美國新立場主張減少日本賠償品之移出事稱：菲駐聯合國大使羅慕洛已奉訓令，在遠東委員會中反對減低日本賠償品之一切建議。」同日東京法國新聞社電：「在他方面，美國以外之其他盟國賠償代表團，却十分悲觀。業已接獲一部分日本兵工廠設備之各國代表團，現在懷疑渠等是否不能再接獲更多之賠償。而迄今尙未接獲一物之代表團，則對於渠等是否能接獲足以償付其駐日開支之賠償亦無十分把握。一足徵美國倘一意孤行地助日復興，不僅中蘇不能同意，即英美集團內部，亦將有發生分裂之可能。」

但在日本當局方面，却對美國現行對日政策異常興奮，與各國之悲觀情緒，恰成一尖銳之對照。東京四日中央社電：「東京各報今登載斯揣克之報告，並備加渲染。按斯氏報告主張僅移運日本製造軍用品工廠，作為對盟國之賠償，今晨各報多以此事作為頭條新聞，加大字標題，甚至有關於盟國之賠償其下。」同日法國新聞社電：「日本各界之領袖人物獲悉美國海外顧問公司所發表之報告書，其中建議日本應保留其工業量之大部分以後，渠等普遍之意見，認為日本將在和平中獲得勝利。日本各早報皆以顯要地位登載海外顧問公司主席史揣克向美陸軍部所提出之報告書，並一致強調稱，史揣克建議祇有基本軍事設備應移去供賠償之用。日本各界之領袖認為美國接受史揣克之結論，必屬無疑。某高級日本官員面帶笑容稱：此為戰爭結束以來令人最感愉快之消息。對日本經濟前途表示樂觀之空氣日在增高中。」而東京每日新聞社評（二、二八）居然還威脅中國說：「日本經濟復興，如不獲迅速推進，共產黨在日本之勢力將增加，此一趨勢自非正與共黨苦鬥之中國國民政府所歡迎。」

#### （五）我國應有的對策

正當美國積極助日復興，並強調將建設日本為亞洲工廠，為遠東防蘇堡壘之時；正當遠東各國對美國對日政策充滿焦慮與不滿之時；正當中國輿論界一

致對這種政策，充滿憤怒並提出抗議之時，不幸國內有少數人，竟有意無意地爲這種危險政策作了辯護人，如胡適先生「國際形勢裏的兩個問題」（東南日報一月二十八日），朱世明先生「如何對待日本」（南京中央日報二月八日），官方的劉子健先生「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觀察二卷二十四期），南京某官員談話（新聞報二月十三日）等。對於此等謬見，各方均有文論及，作者亦曾在「幾種錯誤的對日見解批判」一文中（載工商天地二卷十一期）予以批評，茲不再贅。我國對日抗戰，時間最久，犧牲最大。而日本軍國主義再起，對我國之威脅又最甚。對於美政府這樣拋棄和會不談、先造成事實之陰謀，應該勇敢的揭穿，堅決的抨擊。但我們應有兩點要辨別清楚，即：（一）我們反對的，只是在華爾街操縱下之美政府現行的對日錯誤政策。至中美兩大民族，原有百年傳統友誼，而且美國過去在抗戰期間的對華援助，以及將來在我建議過程中可能對華的援助，我們均應珍視。我們不應盲目的排斥一切美國人，反之，還應和廣大的美國愛好和平人士緊密聯系，以共同糾正美政府現行的對日錯誤政策。（二）中日兩大民族，比鄰而居，經濟關係，自甚密切。倘使美國遵守波茨坦宣言，在佔領期間，真正建立起一個民主和平性之日本政府，

# 「劈靶」

許由

雖然嫻嫻其來遲，國大代表當選人名單，終於局部開始公布了。在鶴立久候之餘，引領觀榜之際，竊思一場緊張熱烈之明爭暗鬥，已近尾聲。正如久掛在心頭的石塊落地，有種說不出的輕鬆之感。

想用粗線條作一幅漫畫：中間畫一塊大肥肉，寫上「國代」二字，四周若干隻手臂，或粗或細，握著若干把刀子，或大或小，從不同的方向，或快或慢，指著，點著，甚至已經割著了那塊肥肉。當然，此時此際，免不了刀背相擊，刃鋒相格，而發出鏗鏘之聲，灼灼之火。這幅漫畫，可題名「劈靶」。

劈靶者，分財之俗名也。上海人稱用武力搜查衣袋爲「抄靶子」。抄了靶子來，幾個人把搜查得的錢財劈開，就稱爲劈靶。試想像，若干萬三或警察在老虎灶邊：或橫眉怒目，或揸拳持袖，或作奸作歹

，或左顧右瞻，……劈分著他們那來路不明的贓物，豈非亦可用上述漫畫來表示？作者於此用「三」之事來比喻「國大」，真是以秋毫爲泰山，以稀米爲天地。尊卑如此懸殊，豈可同日而語？然而比喻只是取一方面的相似。古人拿麒麟，鳳凰比喻聖人，並非說聖人等於鳥獸也。

聲明在先。且說劈靶之時，自然每個人都想自己多劈得一點。要想多劈得，就須用策略。策略或軟或硬，或雌或雄。不過雌中必須有雄，硬中必須有軟。軟硬兼施，雌雄並用，則立於不敗之地。

試觀此次國代之劈靶：小黨派因爲自己的肚皮不爭氣，養不下多的兒子來，當然只好用軟功，雌功。所以表面上關聲不響，只在暗中同姨太太一般跟老爺嚼舌頭。但善嚼舌頭的，必語中有刺。這根刺就又是硬的了。因爲雖然生米已煮成熟飯，小黨

則日本經濟早日復興，毋甯爲我們所歡迎。不幸現在日本社會經濟結構、政治體制與當權人物，與戰前完全一樣，一旦死灰復燃，自勢必重向中國侵略。故我們反對日本復興，完全因爲現在日本政權仍掌握在少數反動侵略派手中，並非反對日本一般人民。反之，我們並願與日本廣大人民合作，促成日本真正的民主化早日實現。

至英美集團各國政府，雖說大體上都是唯美政府馬首是瞻，但其一般人民並非如此。有時因利害之衝突，即其政府亦然。這可從斐律賓因賠償問題而反對美國政策一點看出。我們還應發動國民外交，爭取遠東一切民族國家合作。和約尚未簽訂，日本還是盟國共敵，美國這種認敵爲友、防友如敵之態度，不僅在道義上說不過去，而且違反了戰時協約國共同簽訂的一切神聖的國際文告。我們堅持要早日召開四強一致參加並有否決權的對日和會。我們反對美國我行我素獨斷獨行的對日管制。我們更要提防當我們空言反對，把目標釘在「試探氣球」上的時候，人家趁著我們目標轉移之時，把我們的口袋掏光。我們除閉口不言壯語之外，還要有實際的表現去爭取。我政府尤應站在整個民族國家永久利益的立場，在這個防制侵略保衛國權運動中，起一種領導的作用。

派仍有可以要挾者在。萬一白鴿子飛去，捲了首飾珠寶逃走，這幕家庭醜劇，豈不貽笑大方？爲首的執政黨是有所顧忌的。

而所謂「簽署提名當選人」，正如某部長所說，「得票多數，已居優越地位」，當然可以用硬功，雄功了。所以繼鼓喧天，今日登報，明日請願，後日又發表談話。聲稱「對本黨或友黨決不退讓」，倘「中央黨政公使本黨同人得票多者當選無效」，即當「集體訴諸法律」，甚至「最後決以實際經過情形訴諸國際輿論」云（一月廿九日緊急啓事）。這完全是硬派作風。不過「知其雄」者，「守其雌」。本黨同人「大吹大擂，正所以襯托「中央黨政公使」之「爲天下殆」，樂受萬物之垢。而在下者如此個強，對於在上者之討價還價，亦大有方便。爲首執政黨「劈」得的「靶」，將較選舉前所協商者爲更多，自在意料之中。

當然，亦有若干「簽署提名當選人」，終因「政黨互讓」而降爲候補了。但當局已決定「予退讓者一些經濟上的獎勵」

（二月五日大公報），董顯光局長又盛讚「讓讓爲中國固有之美德」。經濟，利也。美德，名也。名利兼收，則所「劈」得的大概也和一國大代表相當了。

現在名單開始公布，表示劈靶工作已大體完成。猶想不論大黨，小黨，正選，候補，皆已各得其所，各如其分。縱有若干「提名當選人」心裏不服，延請兩律師以維護「法律公道均等之原則」（三月三日緊急通告），大概也不致影響既定之大局。

盜新說：「盜亦有道」。他所謂道，第五項是「分均，仁也」。這是頗不破的真理，決不能因人廢言。何況「夫道一而已矣」，帝王之道，亦即盜寇之道也。「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王寇之分，只在成敗，道是並沒有兩樣的。現在國代名額分配定當，小民們自該領手解慶。舉一反三，以後當局者之必將事事求達到「分均」之原則，可以斷言。「分人以財」，謂之仁政；「博施濟衆」，謂之王道。盜口氣，更鶴立以待。

# 「父與子」及其作者

林海

十九世紀俄國三大小說家中，柴思陀也夫斯基和托爾

斯泰的地位，到現在可說已經確定了。這兩位儘管在技巧方面有着許多缺點，論氣魄，論才情，他們都是第一流作家，比得上荷馬在史詩中的地位。只有屠格涅夫很成問題。一般崇拜藝術至上主義的批評家，如亨利·詹姆士之流，把他捧到天上，說他的作品十全十美，精巧得足以方駕希臘悲劇家蘇福克利的劇作。然而另一些人却覺得他氣魄太小，至多祇能歸入第二流。布盧克納(A. Brückner)便曾在他的「俄國文學史」中坦白地指出：「他(屠格涅夫)缺乏強大的史詩的激勵力——他的推敲刻鏤的本領和嗜好祇配撰製短篇故事」。一位英國批評家貝靈(Hon. Maurice Baring)也曾以委婉的口氣下過貶詞，他說屠氏是「一個偉大的，一個古典的藝術家，俄國文學中的散文味吉爾」(見「俄國文學綱要」)。這「散文味吉爾」(Prose Virgil)的名稱真定得俏皮之至，因為它一方面固然在推崇屠氏藝術功夫的到家，一方面却也輕輕地把他抑低了一級。屠氏究竟屬於第一流或第二流呢，這自然又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但照我們只能閱讀譯文的人的感覺，他的作品比起柴思陀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二位的作品來，的確顯得寒儉一點。柴托二氏，表面上雖然天差地遠，而其精神氣魄却很相像。假使用我國文評家的話來形容，他們的作品是「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屠氏的作品則決不能比作「長江大河」，最恰當的比喻該是他的一部大作的名稱「煙」。真的，屠格涅夫的小說再像煙不過了，而且是輕煙。它漂亮，活潑，然而大風一吹，立刻化為烏有，因為它又稀薄，虛幻。具有這樣性質的作品，如果它的內容只限於批風抹月，談情說愛，那也罷了，偏偏屠氏的小說又都含有一些嚴肅的意義，尤其是「父與子」。這番的題材，倘放到托爾斯泰手裏，不知又要寫出怎樣動人心魄的一部大書來，而到了屠氏筆下，大題照例要被小做。於是，儘管有人稱讚這書「納須彌於芥子」，而我們平心靜氣地讀來，却仍不免有一種不足之感。這所謂「不足」自然不專指篇幅而言，上面的煙的比喻在這裏還用得着，這書仍很像煙，它給予我們的印象是「稀薄，虛幻」。讀者或許要問：屠氏的作風何以跟同時代同國度的其他兩位的不同如是呢？這問題的答，照我們的老辦法，還是要

向作者的生平中求取的。

屠格涅夫於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生於俄國中南部的奧勒爾城(Orl.)。這一姓的祖先據說是鞋匠人，他們的門風老而且貴。屠氏的父親是個軍官，漂亮，不羈，於一八一七年跟一位比自己大六歲的豪門小姐結婚。他們的家庭簡直無幸福可言，夫婦兩日夜吵嘴，待兒子尤其兇暴——直到晚年，屠氏猶能記憶幼時口中的淚味。父親逝世後，他繼續受着母親的苛待。他母親最瞧不起文人，特別是用俄文寫作的作家。她渴望兒子討一門好親，再來個轟轟烈烈的事業。那曉得兒子偏不從命，既不想做官，又立志獨身一世。這一來，母子兩便永不得妥協。屠氏幼時在家學的是法、德、英三國文字；至於俄文，那只好私下裏向僕人去學習。(他母親生平，除了跟下人說話外，從不操俄語。)後來，他連續在莫斯科，彼得堡，和柏林三個大學裏讀了好幾年的書。在古今著名的文人中，他可算受過最講究的教育的一位。到了柏林後，他的頭腦完全西化了，這叫他一輩子菲薄國粹派的親斯拉夫主義者。他最初是寫詩的，早在一八三七年，便已在「現代雜誌」上發表了幾首詩。一八四三年，他出版了一本詩集。跟莫泊桑一樣，他終於發現自己並非真正的詩人。於是，他轉而運用散文。一八四七年，他在「現代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驚人隨筆」，以後繼續寫了二十三篇，於一八五二年成書問世。這書一出，屠氏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穩穩地奠定了，但也因此開罪了本國政府，因為這書揭露了農奴的悲慘生活。恰巧果戈爾就在那年逝世，屠氏得例做了一篇哀辭，不知說錯了什麼話，竟被責令還鄉思過，在老家裏整整住了兩年。釋放後，他自動流亡到西歐去，先在巴黎(德國)，繼在巴黎，銷磨了他後半世的生涯。這時期，他偶爾也回到祖國去，但每次總跟過客似的，小住便去。他的全部作品幾乎都在國外寫成，中間最傑出的是兩部小說：「貴族之家」和「父與子」。前者於一八五九年問世，這書不特增加了作者的聲望，同時還使他受為普遍的愛護。後者則剛相反，它的出版(一八六二年)叫作者憑空受了一場重大的打擊，因為各方面都不討好：俄國革命黨認為作者有意借書中的主人翁來諷刺他們，而反動份子則咬定這書是用以推崇虛無主義的。這一場糾紛持續了很久，屠氏在國內

的聲光一落千丈。在國外，他却備受敬仰。一代文豪如福羅貝爾、喬治桑等都推重他，批評界權威羅因(Taine)甚至說他的作品是蘇福克利以後最佳的藝術品。他果然一輩子沒結婚，但在少年時代却曾認識了一位法國歌星嘉茜亞小姐。他們的友誼一直繼續下去，屠氏在巴黎和巴黎的時節，多半是跟她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嘉茜亞小姐後來成了維亞多夫人)。一八八三年九月三日，屠氏逝世於巴黎，臨終時曾給托爾斯泰去了一封懇切動人的信，請她重新從事文學工作。

上面的傳略裏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屠氏後半世(三十年)都住在外國；第二，他的所有重要作品都不是在本國寫的。這些說明了什麼呢？因為他長期生活在國外，他對本國的情形，便如霧裏看花，難得清楚。又因為他的作品都在外國寫成，他的作風便多半受了西方文學的影響，尤其是法國的。這兩者併合起來，決定了屠氏小說的內容與形式。在內容方面，他慣以轉變中的俄羅斯為題材，但因情形隔膜，寫來不免膚淺，虛幻。有些批評家竟說他寫過了時的小說家，實在並不過分。我們記得，屠氏自願流亡的日子，差不多就在俄皇亞歷山大第二登極那一年(一八五五年)。從那時起，俄國內部起了大變動：政治舞台上連串不徹底的改革，合上民間無數積極的行動，把整個社會都攪亂了。而我們的小說家却正在「文學的國都」裏逍遙自在地過着寓公的生活。你想他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當時俄國社會的情形，還會是真實的，深刻的嗎？在形式方面，他完全走着福羅貝爾的路線，而且比他還要古典化些。為了力求整齊劃一，他把題材節省到無可再省的程度。這自然也有好處，但過度的經濟，往往會把內容弄得極稀薄。費爾浦斯(W. L. Phelps)在他的「論俄國小說家」一書中，曾稱讚屠氏說：「屠格涅夫的方法是先把故事寫得很長，然後加以嚴刻無情的緊縮，因而他最後給予讀者的就是他藝術的精華」。其實這種方法只可用以寫抒情詩，拿來做小說不見得十分合適；小說跟史詩一樣，需要濃重的色彩，更需要豐富內容的。

讓我們來研究「父與子」吧。以題材而論，這是多麼莊嚴偉大的！本來年老一輩跟年輕一輩的衝突，自古以來便無休止的時候。何況在大動亂的時期中，保守的和進取的，浪漫的和現實的，他們中間的鬥爭更應如何的猛烈？這些如果由一位有才情，有魄力的作家來下筆，論理會寫成一部史詩般的巨著。然而，到了作者手裏，它變成怎樣



一位剛從彼得堡大學畢業的青年阿卡提，帶着一位比他年紀稍長的半朋友半老師的青年巴札洛夫，回到家裏去。阿卡提的家在鄉下，他父親尼古拉是個小地主，從前亦出身於彼得堡大學。跟尼古拉同住的，有他的哥哥保羅——一個退伍的軍官。尼古拉為人富於情感，愛讀普式庚的詩，也愛彈大提琴。他待底下人極好，但因缺乏駕馭的能力，把田莊的情形弄得很糟。他哥哥是個十足的公子哥兒，爲了早年在戀愛上傷了心，垂老之際仍保持着一種抑鬱不平，顧影自憐的神氣。他雖退隱鄉間，却仍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而且頭腦裏塞滿了貴族和騎士的思想。當那一對青年回到鄉下時，他們立刻跟這兩位中年人起了衝突。阿卡提還好，他只是覺得父親和伯父身上的古老浪漫的氣味，有點不合他的摩登胃口。巴札洛夫則直接跟保羅拌起嘴來。巴札洛夫是個研究自然科學和醫學的人，他的頭腦非常現實，對於一切空虛的，抽象的東西，諸如文、哲、音樂、美術之類，他全瞧不起。他更徹底否認所有傳統的權威和制度，如宗教、道德、婚姻階級等。而這些恰是保羅所推崇擁護的。阿卡提說巴札洛夫是個虛無主義者。在保羅的心目中，這位虛無主義者實在只是個毫無教養的流氓罷了。而照巴札洛夫看來，這位容止甚都的紳士也只是個古老的，毫無丈夫氣的一「男性」而已。巴札洛夫在阿卡提家裏的主要工作，除了收集昆蟲花草和解剖青蛙外，便是跟保羅爭辯。一個月後，這兩位青年到附近的一個縣城裏去作客。在那裏他們遇見了一位綺年玉貌的富孀阿丁索夫夫人，隨後便請到她鄉下家裏去遊玩。這兩位瞧不起浪漫情感的嚴肅青年，在短短的兩個星期內，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起先是兩個人一同愛上阿丁索夫夫人，後來阿卡提把情感轉移到她的妹妹凱提亞身上，而自命頂天立地的巴札洛夫僅僅處於極艱難的情形下，勉強把自己從愛情的漩渦中掙扎出來。他的虛無主義第一次遭到嚴厲的考驗，他失敗了！之後，巴札洛夫帶着阿卡提到他自己家裏去。他父親法西利是個退老的老軍醫，只有薄田數畝，差堪糊口。他母親阿里娜是個癡心的，迷信的老太婆。這一對老夫婦把兒子當作天神般的崇拜着，供養着。而兒子偏不領情，只覺得他爹娘唠叨可厭，在家待了三天，便又匆匆地離去了。他們又回到阿卡提家裏來。十天後，阿卡提尋個機會，再去探訪他的意中人凱提亞。巴札洛夫早預備下來，繼續做着他的實驗。有一天，他忽然起了浪漫情感，在花叢中吻了一下尼古拉的情婦費尼奇佳。這却使他的對頭保羅撞見了。原來保羅也正在對費尼奇佳作着柏拉圖式的戀愛，這一來激怒了

他的醋心，便奮鬥去約巴札洛夫作一次決鬥。我們的虛無主義者竟又違背自己的頭腦，答應去跟那位落伍的紳士作騎士式的表演。決鬥的結果，受傷的是保羅。但巴札洛夫也不便再在他們家裏待下去了，第二天他就動身回去。路上他曾經過到阿丁索夫夫人家裏去跟阿卡提訣別，在那裏他眼見他的得意門生接受婚姻制度，正式向凱提亞求婚！到家後，他決定埋頭工作。這一次他的新穎很識趣，一點也不去麻煩他。但幾天後，他却自動地不做工了。他覺得抑鬱、厭煩、無聊——這些都是浪漫派人物常有的情緒！他在家裏慣用嘲笑的口吻跟他父親談話，出外對農民們談話有時也用同樣的口吻，却被他們看作小丑或傻瓜。最後，他的厄運來臨了。有一天，他幫着一位鄉下醫生解剖一具害傷寒病死掉的人的屍體，不小心割了一下手指，結果自己已染病死了。死前，他曾託他父親把阿丁索夫夫人請來見了一面。六個月後，尼古拉父子同日各跟費尼奇佳和凱提亞舉行婚禮，而保羅也就在那一天離家到西歐去作永遠的流浪者了。

這兒故意把故事詳細地介紹了一下，目的是要讓讀者看出作者的意向。很明顯地，作者對於這一場大轉變時期的情形和力量都歪曲了，小看了，無怪出書後，革命黨和反動派一致加以攻擊，認爲有意侮辱。他用保羅來代表反動派。保羅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呢？他是個破落戶子弟，是個情場寡少，是個一輩子只念過五六本法國小說的人，是個老了還要塗脂抹粉，用香水來灑鬍鬚的怪物。以這樣的個人物來代表整個的舊派，自然是很冤枉的。至於新派的代表呢？在這書的前面三分之一以內，我們似乎看到作者站在年輕一代——也就是革命黨——這一邊。他一方面刻畫着保羅的「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情況，一方面也敘述着巴札洛夫怎樣整天地埋頭工作。他又借着一連串的辯論，把前者腐爛的陳腐空虛，和後者思想的清新結實，明明白白地揭露出來。這樣，作者無疑地是向着新派表示同情的了。然而，十二章以下，情形便大謬不然，他一步緊似一步地把新派代表巴札洛夫的真面目展示給我們。原來這位鐵打的漢子，碰着自己中意的美人兒，也照樣會動起情感來的。他並且還會對他的門生吃醋！對他那慈愛的爹娘，他簡直冷淡到不像人類。最後，他索性下作起來，以至於在人家的花園裏，強吻主人的女人——這一來，圖窮匕見，老派與新派原來是一丘之貉，「誰也感覺到對方完全看穿了自己」。於是，他們來決鬥了。其結果，老派固然失敗，

但新派更墮落了，墮落到連工作也無心繼續——他變成了十足的浪漫派了！到了這裏，作者便不客氣地來了個致命的一擊——這一個「自以爲懂得怎樣和農夫談話」的革命黨，在鄉下人們的心目中，却原來只是個小丑或傻瓜！於是，於是他死了！這位「巨人的惟一使命」，只在告訴我們「怎樣能死得像個樣子」！

以上的分析絲毫帶着開玩笑的意思。如果書中的兩個角色真的是代表着反動派和革命黨的話，作者的態度便也只能如此。我們不要忘記屠格涅夫自己是個怎樣的人物，簡單說來，他的人格是等於保羅人格和巴札洛夫人格的併合；那就是說，他是個瞧不起貴族的貴族子弟。因爲他表面上瞧不起貴族，所以他要給反動派畫花臉；又因爲他骨子裏是個貴族子弟，所以他不忘給革命黨安個尾巴。一場頂熱鬧的「父與子」的鬥爭，爲了作者人格的自相矛盾，竟變成毫無意義。這情形彷彿一位象棋比賽的裁判員，當紅白雙方正在忙着廝殺之際，他忽然不待終局，便把兩邊的棋子一概洗掉了，認爲雙方都不是材料！作者以「父與子」來作書名，而其實做的却是「人類與自然」。他委婉地告訴我們：反動派也罷，革命黨也罷，人類到底還是人類，歸根結蒂，還不是同歸於盡？我們曾經用煙草比屠格涅夫的小說，這「父與子」還不像一種嫵媚的輕煙嗎？

假如我們撇開重大的意義，另換一副眼光來看它，我們可以坦白地說：這是一部寫得極好的小說。書中比較次要的人物，雖都只寥寥幾筆，而寫來異常生動。巴札洛夫更是一切小說中找不出幾個的絕好人物。他並不是什麼革命黨，而只是如書中一位老用人所痛斥的「騙子」和「暴發戶」。他一面瞧不起貴族，一面却又鄙視低層的人。他有着極嚴重的自卑感，由這出發的是虛偽、嫉妬、冷酷，是輕浮。他有了這許多缺點，所以儘管把握着一種驚人的自制力，却仍舊救不了自己，他終於無可奈何地沉淪了！像這樣的人物，社會上那裏會沒有？作者可算給我們畫出一個深刻的有力的類型來了。此外，這書的寫作技巧，從消極方面來看，可說已達到完美的境界。它真的連一點缺點也沒有！全書很均勻地分作三部分：十一章以前爲第一部，十二章到二十一章爲第二部，其餘爲第三部——活像一本三幕劇。書中的情節不多不少，一切貪多愛好的毛病，誇張取巧的習氣，全都避免。至於文字之美，譯文上自然看不到的，不過我們還可從作者對於景物的不斷描寫，以及書中每章結束處的悠然不盡上，推見原文該是怎樣地富於詩趣。也許是有鑒於此吧，一些崇拜屠格涅夫的批評家，便竭力替他辯護，說這書根本與政治無涉，而只是一件純粹藝術品。果真如此，那就徹底證明了屠格涅夫比不上榮恩陀也夫斯和托爾斯泰；因爲他們兩位，除了藝術之外，多少還給我們一點別的東西。他們不是純粹的藝術家。

# 北美重遊 (七)

陳達

## 華美協進社的暑期學校 (三六、六、三〇—七、十二)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於一九二六年創立本社(China Institute)，以資提倡中美兩國的教育及文化事業。一九四四年經美國聯邦政府及紐約省教育廳分別承認核准立案，本社宗旨在促進中美人士從事於文藝、科學、歷史及其他有關教育及文化等工作，以期互相瞭解兩國的文化及教育情形。同時復設立獎學金，藉以資助中國留美學生的生活費用。在教育及文化的措施方面，除印行刊物，舉行學術演講，無線電播音，放映電影，並舉辦文化及實業展覽外，復藉討論會及座談會以檢討中美兩國間的一切問題，俾得隨時傳達消息，交換意見。本社承管中國大廈一所，係由亨利路恩基金會所贈，藉以紀念亨利路恩氏者(Henry N. Luce)，路恩於四十年前曾致力於中國的現代化教育，厥功甚偉，為中美兩國人士所景仰。今年本社舉行第四次暑期學校，地點在紐求柔省孟德克克的師範學校(Montclair State Teachers College)，由委員會會長 Mrs. Perdue 主持，由社長孟治(君平)協助，時間為兩星期，有學員七十三人，以女性小學教員為多，其次為中學教員，依其程度分為一年生及二年生兩級。午間為上課時間，每日午餐後勻出一小時為唱歌、音樂及團體集會之用。以後兩小時為實習團(Workshop)，由團長領導舉行實習。上午上課時二年級生由馮友蘭氏負責，並主持其實習團。一年生的功課由孟治、楊連生、劉彭年、林夢生及余分別擔任。一年生的實習團分為三團，由戴愛蓮女士、陳福添及余分別擔任指導。午前的演講分述我國歷史、文化、中美關係、中國文學、中國藝術等，並簡單分析我國目前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情形。戴女士的實習團注重民間舞，陳福添指導我國烹飪法，我的實習團以中國社會為討論及研究的主題。

我最愛戴女士的西藏舞，女士上身穿綠色綢單衫，用馬蹄袖，袖甚長，有時捲起，腰圍綉巾，下身圍短裙，有褶。腳踏黑絨高鞋，舞時無樂，但同時唱歌，這些是民間舞，舞者身體旋轉，脚步輕鬆，眼睛亦有時轉動。女士亦有我國民間舞，其一描寫婦女刺繡時穿針線，維妙維肖。

其一刻畫搖紙扇的姿態，其富藝術性，實屬難能可貴。女士之夫葉淺予，就會場所遇見的人物或情景，隨時畫出，成最敏捷最靈活並有生氣的漫畫，他的作品亦是國內畫家中所罕見的。

我的實習團共有學生二十人，工作的一部是讀書報告，她們所讀的書包括下列各種：K. S. Latourette: 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Martin Yang, A Chinese Village; Owen Lattimo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如以書籍的性質論，所有的報告可分下列各類：(一)歷史4 (二)現況3 (三)概述3 (四)鄉村3 (五)藝術2 (六)政治2 (七)戲劇1 (八)孔子1 (九)生活1。

比讀書報告分量更重的是各人所作的論文，因為她們是中學及小學的教師，這回入暑期學校是她們進修的機會，並可因此得著學分。所作的論文可以拿回學校去作為教材。以一般的情形論，作者對於此事俱甚鄭重其事，並花費頗長的時間。論文中往往夾插畫或標本，大致要費許多工夫才能搜集。有些論文的裝璜，頗表示藝術化而又美觀。作者的目標是要引起學生的興趣，所以往往對於一個問題，作粗淺但有系統的介紹與敘述。例如關於中國對於世界的貢獻，一共有三篇論文，分別敘述絲茶與磁器，每一篇裏有圖畫，有一篇還有標本，初學者對此必能發生興趣無疑。另外有一個學生是某俱樂部的職員，該俱樂部要舉行一次關於中國藝術的遊藝會，會員們準備演中國戲。她選定熊式一所編譯的王寶劍劇本，和我討論劇情，戲裝，甚至請柬的格式。

按論文的性質，可以分成下列各類：(一)婦女4 (二)中國的貢獻(絲茶磁)3 (三)農業2 (四)孫中山主義2 (五)家庭1 (六)符號與迷信1 (七)戲劇1 (八)農作物與生活1 (九)地理1 (十)詩1 (十一)遊戲1 (十二)工會運動1 (十三)工業勞工問題1。當我演講中國現況的時候，引起許多很複雜的問題，例如(1)國民黨的成就是什麼？(2)共產黨可以得到勝利麼？(3)星期日是是否普遍的休息日？(4)農民最

迫切的需要是什麼？(5)勞工運動的前途是什麼？

末次上課時，馮芝生氏與余各有簡短的演辭。芝生云：「宗教是有個別性的，並且每一宗教是彼此互不包含的，譬如耶教不能包含回教是。哲學則否，因其係說明一個至上的原則，這種原則通常適用於宇宙間，可以無所不包的」。又謂：「中國哲學所以異於其他哲學，在其比較實際些，例如印度哲學就不能謂之適合實際。」余謂我國的社會，有其值得注意的特點，即注重人與人的關係，這種關係決定各人在社會裏的地位、權利與義務。如父與子，兄與弟，朋友與朋友等。這些關係，可以因時代及地域而產生區別，但在一個時代或一個地域裏，各人間的關係必須得到平衡，社會秩序才能維持，否則社會裏必有騷亂的現象。結果典禮是在橢圓形的露天劇場舉行的，校長 Dr. Harry Sprague 為主席，介紹委員會主席 Mrs. Perdue 及新任主席 Mrs. Hassel 並孟君平社長，隨後由張仲遠兄演講中國對於世界文化的貢獻，大意以為一般人對於西方與東方有不正確的見解，在中世紀時，所謂亞洲者僅指小亞細亞而言，其狹窄可想而知。同時我們對於精神文明及物質文明，也有錯誤的見解。在工廠制度以前，西方所用的東西，俱由手工製成，有許多諺語係由我國傳去的，足見我國人亦喜歡用手，並非純粹的精神文明。英國某藝術家，批評我國的文化，用 man in nature 來描寫，謂勝過於英國人之專門刻畫 human anatomy 的藝術，對於自然界往往不十分協調。不過目前中國文化關於自然學是太落後了，亟應迎頭趕才是。末後全體學生，用印好的羅馬字拼音唱三民主義歌，可謂係極難得的事。

師範學院有寬廣的草地，樹上有小動物已糞屎，似松鼠而小，滿身有紋，兒童們常餵食物，草地上偶爾發現野兔，晨間尤多，亦不避人。

Mrs. Buelah Barlow 有一日帶我們參觀一個菜園，由某農夫經營的，共有六畝，其內栽各種蔬菜，成熟後即在路邊小店出賣，稱為 Roadside Stand。小屋數椽，整潔異常，其父為小菜販子，本人已是小康之家。種菜工人每日工作十小時，每小時工資七角五分，星期六與星期日休息。菜園的營業，可得淨利百分之十五，不如工廠

對於後者的投資，可以得百分之二五。

Mrs. Barlow 早寡，常懷孕時，一日謂其夫曰：「如為男嬰，將其夫名之曰 Charles，如為女嬰，將以己名之曰 Buelah。」夫曰：「父名 Charles，短壽而卒，不祥」。於是命名的問題懸而不決。一日午睡得夢，謂係男嬰，適外婆家送來收音機，第一片即著名歌唱家 Leslie Stuart 的作。夫人好音樂，深盼其子亦嗜音樂，遂即以 Leslie 名之。Leslie 六呎五吋，甚壯健，但不喜音樂。今日與其母各開一汽車送余至紐約市，距離三〇哩，一輛汽車來同一次，僅須汽油五角。

歸紐約市途中，經華盛頓橋，橋在市西第一七八街 Riverside Drive 的近傍，每輛汽車過橋時，納稅半圓，此橋懸於赫德孫河上，其鋼索可繞地球數周，這是世界上工程最偉大的橋。

### 割治痔瘡 (三六、七、一七)

我近在上海加哥大學演講時，前學生倪因心屢次勸我作健康檢查，余深感其善意，至大學醫院三次，據報告身體各部如心肺血壓等俱正常。惟離芝加哥時，尚未接來一部份的檢查報告，余在孟德克爾暑期學校演講時，方接報告，知肛門流血，係因生一瘤，破後有時流血。此病最先引起我的注意，是在雲南呈貢縣文廟，時為一九四六年七月，因其不痛，並因流血不多，又並非每日流出，余未加以注意。芝加哥所檢查的玻片，近寄外科醫師顧仁氏 (Dr. Philip F. Green)，顧仁氏曾在中國二十年，服務於長沙湘雅醫院，與雷文思為同事併同時。其夫人為提倡暑期學校最早的一人，孟德克爾即其家鄉，余與彼夫婦從前在長沙即曾見面，此次常在一起，顧仁醫師現服務於白露格林市立醫院 (King's County Hospital, Brooklyn, N. Y.)。七月十七日囑余至醫院復驗，因是日獲司醫師 (Charles B. Jones) 適在彼開會，獲司是紐約市肛門病著名專家之一。獲司診斷為 adenocarcinoma，肛門裏有一高起的瘤，約十釐，最大處直徑為二釐，這是由於 esse ulceration，獲司醫師數日後勸我再去檢查一次，取出膿皮一塊，檢查結果，與芝加哥的檢查及他前一次的檢查相符。在第二次檢查之後，余即返旅館，常想大便，隔十五分鐘必上馬桶一次，桶內見大量血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許，余本擬出外晚餐後即返旅館休息，甫出門，即覺大便急，即入升降機，即不省人事，約三分鐘後甦醒來，有人扶我坐於機內椅上，並有一醫師伴我入臥

室，失去知覺時流血約兩磅，為余有生以來所流最多的血，但是夜安眠如平常。

以後兩日，在旅館長睡並靜養，第三日體力較強，至華美協進社交出書單一件，計社會學新書三百五十種，社會學雜誌七種。關於選擇這些書籍，余在芝加哥時業已進行。余在芝加哥時，並得大學圖書館的協助，允許我選擇該大學圖書與雜誌的複本作為贈送清華之用，共得二千餘種，此事與新書單，今日一併交出，託其代為接洽辦理。

顧仁醫師與獲司醫師，俱勸我割治，但入何處醫院尚須考慮。因受經濟的限制，我決定入白露格林市立醫院，彼處通常是不收費的，此醫院有病床二千，聽說是市立醫院中規模最大的。顧仁醫師帶我參觀其主要建築，余見其牆上有大字石刻，文曰：Let all Who Serve here remember that this building is dedicated by the City of New York to the care of all who are helpless and afflicted: this before all else。

我入醫院之後，就感覺到這石刻的精神。因院內收容了許多光景平常的病人及窮人，並有相當多的黑人。

經顧仁醫師的介紹，我於七月二十七日入院。Dr. Conroy 寫下病案，替我輸血五百公釐，我的病房有六人。內有黑人二人，其一因患胃病已在院七個月，開刀三次，但尚未找出病原。另一人為機器匠，住院已四十九年，已開刀一次，即在小便的旁邊。另一黑人已腹部開刀三次。我床邊的一個病人，在腹部施行手術，把肛門暫移至腹部下面，大便即暫由此出。

醫院的食品，大致簡單而衛生。早點用麥餅，一個雞蛋，一塊烤麵包，一杯牛奶，早晨有人取我的血作試驗，並引我入一暗室，作 X 光的測驗，醫院的午餐與晚餐大致相似，普通的食品為牛肉，白薯，青菜，烤麵包，點心及牛奶，下午有人剃我小鬍鬚的毛髮，預備施手術。二十九日晨七時半，護士給我白色藥一小片，用水沖下，我覺頭部微昏，另一護士在我左臂打一針。數分鐘後，將我抬上病人床，送入手術房，顧仁醫師已先至，即由獲司醫師施手術，先在我脊骨下部用麻藥，後將肛門放大，用電將肛門內爛皮肉燒去，共費三刻鐘，返病房後余即入睡，到下午四時方醒。

三十日晨進湯食，不起床，護士拿磁盆來行使小便，三十一日醫師囑用礦物油一小杯，藉通大便。八月一日，不時想入廁所，腹痛而大便不通，感覺如患腹瀉然。

八月二日老友姜立夫來醫院，自謂若干年前彼患痔瘡，由北平協和醫院關頤醫師割治，余曾入院望病。不料今日在海外，立夫入院探視余疾，而余所患者與立夫的宿疾大致相似。

四日晚間余在另一病室，遇一建築工人，謂已開刀兩次。方接通知明日又須開刀，彼曰：「施手術之事，多少帶有危險性」。此人年六十五，有親兄弟三人，堂兄弟三人，原籍為英國普利茅斯 (Plymouth) 地方，六人之中有一人尚在英國，其餘三人先後徙入美國。余曰：「君等六人的身世何如？」老人歎曰：「餘五人俱已婚，俱有職業並有房屋，獨余一人未婚，且無儲蓄，回思以往，好酒實為最大的漏洞，三十年來每日的酒錢，須平均兩圓，逢星期日飲酒更多，大約每日須十元，目前我是孤身隻影，既無產業，又無親人，未免悲傷耳」。

黑人 Carl Walker 睡在余旁，三個月之內業已行手術兩次，俱在腹部，末次開刀以後，藥丸及藥水漲，經醫師放過一次，大部份為血，現又漲滿，醫師囑長期臥床，不能起身。

七日晨主任醫師告余曰：「今日可以出院」。余換好衣服，面謝醫師及護士，並與同室病人話別，即至管理室取回存物及錢包。當余入院時，照章把自己的衣服換下，存於醫院，有女職員曾對余曰：「錢囊尚有鈔銀」。余聯想到此事，疑心醫院或將要我出醫藥費，但我出院時並不收費。

### 一稿請勿兩投

本刊本期原排有萬哥先生「華萊士的旗開得勝」一文，乃因同稿在上海新民報先期(三月十日)以「郭明」署名發表，不得不隨時抽去，以致本刊蒙受損失。誠恐以後發生同樣情形，本刊特鄭重聲明：任何作家之任何稿件，除有特別約定者外，如已投寄他處，請勿再投本刊，以重信譽，而免糾紛。

本刊編輯部啓

### 時與文改訂價目

本刊自二卷二十二期起改售每冊二萬元。





# 蘇北近事實錄

徐 卿

舊曆新年是在風吹雨打之中渡過的，湊巧得很，整個蘇北的形勢就如這氣候一樣，風雨飄搖，幾乎難以卒讀。記者首先要報導的，就是華軍準備棄國投共的事件。蘇北南部的如皋、泰縣、泰興、靖江諸縣，從去年夏天起，原先駐防的王鐵漢的四十九師和李天霞的一百師，一開關外，一調山東，遺下來的防務由華軍的廿三師前來擔任。華軍原係郝鵬舉為軍的一部份，勝利後曾投降中共，去春陳總長通過「銀彈政策」，才「還軍於國」，改換今天的番號。但因為這支隊伍做過將近一年的「民主聯軍」，在思想與感情的兩方面，都和中共結了不淺的淵源。雖然中共派駐在郝部的顯要人物如朱克靖（陳毅總部秘書長）等十餘人，當時為郝鵬舉捕送南京，但在中下層幹部和廣大士兵的中間，仍潛伏了若干的中共份子，並且通過了中共一貫擅長的秘密工作，又使這星星之火種，迅速地擴展開來，成為燎原之勢。

年終歲尾，「華中解放軍總司令部」派朱履先充當代表，和華軍駐防兩縣的一個旅進行談判。朱為蘇北著名的紳士，其地位僅次於韓國鈞、冷禦秋等人，是一個老同盟會會員，民初曾任南京留守副司令，中將師長，馮國璋的參謀長，及孫寶兩總統府的高級顧問等職，北伐以後，株守家園，寂寂無聞了。在共軍於廿九年夏進入蘇北之後，以大紳士老章的身份與共產黨攜手合作的，他算第一人。他一直被選為「蘇中區參議會」的議長和「華中區參議會」的副議長。抗戰期內，他的子女就加入中共。他本人的思想也是趨左的。這次，經過他的奔走斡旋，雙方談判的條件有下列數款：

(一)廿三師歸中共蘇中區司令部調遣指揮，並由中共派遺幹部充任各級政治指導員和軍事教官，担任訓練事宜。

(二)除開「國特份子」必須堅決予以清除外，所有工作人員照舊充任原職，人事權則仍屬原有的部隊首長。

(三)物質給養、彈藥補充及政治地位，與中共主力部隊同。

(四)病傷老弱及不願繼續服役之官兵，按其原階級及此次「反正」之功績，由中共發給退役金，准其退役，並由中共設法予以轉業。其家在「解放區」者，由中共負責送回原籍。

(五)退役金總額不得少於黃金二千兩。

他們舉事的日期，約定為舊曆臘月的廿四日。這一天，依當地的土風，是家家恭送「灶君」上天的日子；他們想利用人們醉心於這個熱鬧節日的當口，完成非常熱烈的舉動。中共「蘇中區司令部」和無政府軍首長統率八個團的主力，移動南下，計劃中是以「反正」隊伍為內應，一鼓而下蘇北南部的各大據點，以便打開一個直通江南的缺口，源源運兵南下，展開江南的游擊活動。這是和傳說中的「五月下江南」的軍事攻勢完全配合的。

「天有不測之風雲」，軍事在準備發動的一週前為國防部駐黃橋鎮（兩泰之間的中心據點）的人民服務大隊發覺了。服務大隊是韓和軍事的政工、與特務於一爐的組織，也就是談判條款中所要堅決清除的對象。他們立即分呈國防部和南通綏靖司令部。李默庵司令官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星夜抽調五十七師、二十一師及直屬部隊前往鎮壓，雖然經過一場戰鬥，少數幾個連突圍

走向中共，但大部份却因兵力的懸殊，被押送江南了。遭支隊現調到蚌埠改編整訓，而主持其事的，旅長以下連長以上的軍官都被解往南京，經過簡單的審訊，即處以極刑。共軍功敗於垂成，祇得暫時北撤了。

抗戰後期，政府在蘇北原有的黨政軍組織差不多完全解體了。城市在敵偽手裏，鄉村為中共控制，連韓德勤省主席最後的一個根據地——興化曹甸——也為敵偽佔領；韓本人通過新四軍的護送，才狼狽逃歸重慶。蘇北祇留着一位代理主席李明揚，時而化裝為僧，時而飄蕩「水鄉」——興化東台的邊緣地帶——，時而藉着偽軍李長江的掩護，躲進敵偽中心據點的泰州城裏，他僅僅作為一個「象徵」的統治者而存在着吧了。勝利後國軍攻入蘇北，各種組織必須重新建立起來。從大體言之，「政」是王主席的嫡系，王為軍人出身，物以類聚，如專員、縣長、稅務局長、田糧處長這類位居首要、獨當一面的大人物，大多是追隨王氏多年的中小將軍。他們南征北戰，出生入死，王主席的意思要給他們「調劑」一下。「黨」是仍然操縱在CC手裏，

差不多還是當年的原班人馬。「軍」是以昔日的李長江為軍和潰散了的游擊部隊為基礎，再加上新建立的「武裝還鄉團」。只有「團」是嶄新的組織，七零八拉，真是一集九州四海之眾，最不成樣子。至於基層行政人員，如科區鄉長一類的，不是一家有良田三百畝的流氓地主，便是「搖身一變話盛朝」的漢字號人物。

在政治上，顯著的特徵是貪污侵蝕成風，要舉出具體事實來真是如毛如潮的，也不是一篇雜誌所能登得了的。南通的一位區長，一次侵蝕敵偽和「奸匪」的物資價值十億元。這是去年春天的事，那時十萬元的大鈔固然沒有出籠，在蘇北連一萬元的票面還不多見哩。如皋的一位區長，任職未及一載，貪污侵蝕也在十億元右，最近有人告發，上舉正虛張聲勢的要派員澈查，適巧共軍來攻，他一彈未發，棄甲曳兵而逃，居民也跟在後面亂奔，黑夜裏共軍不辨軍民，以二十幾挺機槍集中追擊，死傷千餘人，老百姓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田莊河時，屍骨壘壘；但這樣一來，區長可以報稱：全部的卷宗、現金、物資燬於炮火，貪污責任完全委卸掉了。興化法院前任院長，吸食白粉，日耗黃金一兩，張三殺死

李四，他可以判成李四謀殺張三未遂，張三為自衛計，把李四格殺，而宣告張三無罪。諸如此類暗無天日的案件，不勝枚舉。現在是徵了時期，假如依照國防部兵役局規定的名額，一鄉抽徵一兩個適齡壯丁就行了，但事情決沒有這樣簡單。鄉公所將所有的及齡壯丁（廿一歲至四十五歲），一齊具名公佈出來，名義上叫人家聲請免役或緩役，但暗中散佈流言：「上榜的都要當兵，年老的當自衛隊保安隊，年青的當國軍」。農民們不懂得什麼，「我的名字上榜了！」「我家的兒子的名字上榜了！」「哭哭啼啼，到處風雨」，於是找人疏通說情，自己叩頭求饒，五石十石米不等，「錢到公事了」，沒錢沒勢的隨便拉他一個去當砲灰。在泰縣鄉間，更公開的談判壯丁買賣，區鄉公所盈庭盈門，生意興隆得很。共軍目前正發動「參軍運動」，經過這麼一來，不需要他們發動了，一向懦弱胆怯的農民青年也大伙兒去「參軍」了，說：「我們泥腿子，與其幫財主去打窮鬼，不如幫窮鬼去打財主，」縮頭烏龜「反正一樣活不成」，一呼百應，蜂湧而起，政府以強迫手段徵了一兩個兵，共軍却順利地添上五六個兵了。

在「解放區」裏走路要有一條子（通行證），說

：認「條」不認人，即使「毛主席」「朱總司令」，沒有「條子」也是不行的。於是政府控制區內的各鄉鄉公所也懂得「跟敵人學習」的道理，用起條子來了。一張條子的有效期最長的是三天，去年春天的代價一千元，夏天的代價五千元，現在漲為兩萬元了。一張白報紙可以裁出六十四張條子，一天的收入就是幾百萬。區公所看得眼紅起來，對鄉公所說：「你們職權有限，不配發給」。鄉公所又那裏肯輕意的放下這塊肥肉，最後實行的折衷辦法，出入區域的歸之於鄉所，出入縣境的歸之區所。「有飯大家吃」，黎故總統的話真是不錯，當然沒有什麼配發不配發的問題了。

談到專員縣長，他們地位高，派頭大，門路也更多了。當然，他們不便和區鄉長一樣，「見錢眼開」，什麼都可以要牠一手的；然而，他們可以包運違禁物品，代購槍枝彈藥，號報戰鬥損失，統制交通工具，吞蝕敵產「匪」產……，十億二十億算不了什麼大事，王主席本來是給他們「調劑」一下的。前夏國軍進攻時，因為他們類多中小將軍出身，還多少有點「英雄」氣概，隨軍推進，深入鄉村；現在腦滿腸肥，命很貴重，一個個深居簡出，累月不出縣衙。

古語有所謂「牀頭金盡，壯士失色」，然而牀頭金多也就壯士胆落，何況本來是些不壯之士。縣長們有一個苦楚，也就是說有一個很大的支出，對於地方駐軍要大大的買賬，重慶開來的固然不必說，即便孫其誠書文一流的，也必得按時送禮，相機慰勞。縣長們固然多是將軍出身，但究竟是解甲的將軍。一位與主席私交甚篤的省議員向主席進言：「縣長們鬧得太不成話了，你是蘇北人，

得澈底整頓一下」。主席答語頗妙：「我的部下都是能打仗的，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你能幫我找到這樣的人嗎？」

國大代表的選舉鬧過了，現在又剛開完立委選舉。要人嘴裏記者筆下的什麼「人民擁護」，什麼「投票熱烈」，完全是白晝見鬼。東台縣政府的一位金先生告訴我，我們這批小職員，不但連夜抄完了幾十萬人的名冊，

## 湖南的兩件慘案

### 黨團戰鬥。縣長送命

（長沙通訊）一月二十八日湖南發生大庸慘案，到現在已經超過一個月了，但事件迄未結束或告一段落。大庸慘案是以黨團磨擦為背景而演出的一幕悲劇。大庸黨團磨擦之初次尖銳化，當數前年縣參會的成立，雙方為了要爭取這一個民意機關，不知經過了多少明爭暗鬥，結果團方勝利，不但在議席中佔了多數，而且議長一席也為團方的熊悟工攬得。可是後來團方兩議員另有高就去了，補上來的卻是兩個黨方人物，於是議會中形勢為之一變，本來是多數

而且還要連夜的替有選舉權的公民填好了選票」。泰興城的票碼分為兩處，一在七院寺，一在醒華中學，三日內門可羅雀，吳縣長葉書記長也有點過意不去了，各自統率部屬，延門曉諭，但人們仍是東躲西閃，觀望不前。最後是他們自己演了一幕壓軸戲。開票結果，仍不過五百多票，有二十幾張選票上寫著：「妻啼兒號嗚，何心來投票？幸還空白紙，祝君官運高。」「四海困窮日，烽烟久不熄，民命甚倒懸

的團方反而變成少數。此後團方的議長召集開會，黨方的若不出席，則會便開不成，三十五年的第二次會和三十六年的第四次會都是這樣流產的。而且每次會議流產，雙方都發出快郵代電，互相攻訐。

去年五月一日，新縣長田廷鈺一到任便撤換主秘及民、財、軍三科科長，另委黨方人物接充，其中民財兩科科長且係通緝有案者。他們一朝權在手，便想有所報復，終於引起了五·七慘案，這一次大庸慘案的序曲。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縣府撤換了厚坪鄉警察所長。黃某（團方），而代以與縣長同宗的田某（黨方）。當下黨所長一怒而去，率領全部三十餘人馬「拖騾」去了。而團方的激烈份子由議長熊悟工率領，調集了國民兵三千餘，包圍住縣城；城內警察局第一隊田隊長（黨方）則將第二隊田隊長（團方）包圍住。大戰從五月六日傍晚一直打到五月七日早晨，經縣長調停，答應團方所提撤換縣府主秘及民財兩科科長，恢復熊所長的任用，保障團員安全等三條件後，戰事方才停止。後來王主席西巡，將田廷鈺撤職，以李善後代之，而黨團磨擦仍未暫

### 黃非

作為這次大庸慘案的近因的，是去年十一月間的國代選舉。雙方因競選會發生械鬥，但事態幸未擴大。但選舉結果，上面圈定的團方彭正宇得票反較簽署提名的黨方李佑琦為少。因此團方極為不滿，而暗醞釀「倒李善後運動」，說他處處偏袒黨方。結果李被倒了。代李的是在省參議會中為團方人物的黃穎川，同時又傳說自衛隊副隊長李宗松（黨方）也被「調劑」，這樣一來，縣長換了，副縣長也調了，對黨方豈非致命的一擊？於是，到頭來便拿

出最後的一手。據說阻黃上任的黨方早

在府慈（利）、庸沅（陵）等通道上佈置了相當的武力，但黃穎川卻從保靖取道永順前往，黨方乃在城郊佈署部隊，準備相機行事。團方不甘示弱，亦準備「武力迎駕」。一月廿八日黃穎川抵城郊，與城防部隊幾經交涉，約定解除自衛隊武裝後方許黃氏入城。及至黃上前，即被亂槍射死。事後雙方正式開火，連續三四日，未曾停止。

以後八區行政專員張中舉趕到，暫得維持秩序。省府方面呢，派了毛榮文，會同陳大榕（黨方）與張雲漢（團方）前去「調查事實真相」。可是毛推說患有小恙，不便於乘坐三四天的騾子，辭謝了。陳大榕張雲漢也都借故推託。誰都知道黨團糾紛是最棘手問題；「偏於黨，便要受團方攻擊，偏於團，便要受黨方攻擊；態度超然一點，便要左右做人難」。

可是，大庸黨方雖說敢做，卻又誰都不敢承當。風定義（現任議長，屬黨方）寫了一封公開信給黃穎川的



。有個學生說，走在路上被攔來的。有個可憐的鄉下人說：新年來了，砍了一担柴，準備上街換錢打年貨，正碰到他們，就被抓來了，說後淚水串串的掉下。我們都嘆着氣，背轉身去，實在不忍看。總之我們這一羣全是騙來和抓來的，並且都是窮人！

我們這羣不知命運的人都擠在屋子的一邊，因為另一邊早已尿尿橫流臭氣薰天。天氣又冷，地又陰濕得不能坐，只好全靠驅動，一直站到天亮，真是苦不堪言。我在人叢中穿來穿去，一會找個談話，一會找那個問問，倒也不算寂寞。其間又一批一批送進來許多人，有的還被捆成「五花大綁」，像犯人似的。到天亮時已經有四百多人了。

有個商人告訴我，我們將被送充壯丁，我起初還不敢相信，總以為政府還不敢出此下策。直到那位鎮長在台上講了一頓漂亮而不著邊際的安慰話後，我才相信了。既知道純粹係壯丁問題，我就安心下來了，只是憐憫那些自知無助的難友，他們焦急得跳腳嘆息，各訴各的痛苦，鬧做一團。

淒慘的婦人的哭聲和孩兒們的呼喊聲，真是淒厲欲絕，令人腸斷。我自進來，一直保持鎮靜，這時也難免黯然神傷起來，更有多少人在低頭垂淚，太息！這是一幅什麼圖畫？！

難堪的等待着，天總算大亮了。窩個好心的衛兵遞進許多家屬送來的早點心和香煙之類。人畢竟是人，還未致完全失去同情心，當我看到他們往返的替我們傳遞東西的身影，心裏升起無限的敬意。也許是患難朋友吧，遞送進來的有限的食物香烟，大伙兒都分着吃着，表現出人性中善良的一面。

沒有坐過年的大不知道自由的可貴。這時候我們就領會到了。看到幾頭蒼鷹在天空悠閒的飛翔，好生羨慕。已近晌午時分，還沒有如何處置我們的消息，大家又餓又急，忿怒無處發洩，禮堂的桌椅板橙，窗上玻璃標語，都成為發洩的對象，一齊打得粉碎，只剩了總理遺像還穩穩地掛在上面。有個人想去打，旁邊幾個人異口同聲的說：「打不得！打不得！這是國父的像。假若他老人家在世，我們也不會落得這樣呢！」其意味深長，實令人感慨莫名。誰說人民智識水準低！

更有幾個胆大激烈的跑上台去，慷慨激昂大發牢騷，大罵政府：「人民的自由

那里去了？」有些人大叫：「人民是油榨的！」接着全場嘩然，後來又舉出五位代表，預備去見縣長質問幾點：（一）中國的兵役制度是徵兵制度還是抓兵或騙兵制度？（二）這是民主國家，是人民作主的，為什麼隨便深夜裏抓人？（三）為什麼專抓窮人不抓富人？（四）：

……代表很快的產生了，全體一致擁護，掌聲雷動。我開始真正認識了人民的力量的偉大。正在鬧鬧開鬧的時候，忽然那小門開了，出現一個高個子的軍人，手上握着一根快慢機，大喝一聲：「那個造反嗎？槍斃你們這些共產黨！」同時四圍衛兵的槍門「喀啦喀啦」的亂響着，似乎都在上子彈。全場頓時寂然無聲。幾位代表也跳上台來攔進人叢裏去了。這高個子軍人分開眾人，也跑上台，先施以恐嚇，繼之吹牛，說國軍的待遇如何如何好，自動參加的人如何踴躍，單單他一個人發動的就有五萬多，接着照例又大罵共產黨一通。這種疲勞轟炸式的吹牛繼續了一個多

鐘頭，才由鎮長來報告。他先說了一頓非常抱歉的話，害得各位親愛的兄弟們站了一夜和半天，自己心裏十分不忍，現在已經由全縣軍政各界首長開會決定舉行個別談話，凡獨子、技術人員、學生之有證件者，都可以無條件釋放，並且保證「絕對公平」云云。

還有幾個插曲也是很有趣味的。當我們正在等候個別談話的時候，突然發現私放了一些化錢運動的或是一特殊階級之類的人。起初是說某某要解大便，由衛兵帶出去了，這樣一連兩三個，一去不見回頭，因此被我們發現了。還有一個軍人跑進來，把自己的軍服脫給另一個壯丁穿，然後自己再憑證章出去了。後來我們就大家守住門口，不准隨便進出。誰知他們還有辦法：忽然進來了幾個持槍的人，說某某在法院裏有案子還沒有了結，奉命抓去坐牢，也就這樣出去了。請如此類，真是笑話，現在想起來也着實好笑。聽說每個人要

化二百多銀洋哩。

「個別談話」在鎮公所對面的一所小學裏舉行。那時滿街滿巷都佈了衛兵，嚴如面臨大敵。我們被一批一批押過去。縣長和許多兵役官長都高高坐在上面，手裏各拿一支筆，一個個的口試。我因是技術人員，又有醫院裏的公函來保，於是縣長在我的名下打了個X，便叫釋放了。那時正是下午三時半。我的朋友們都已在外面等候了幾個小時了。我出去，大家迎上來，有的手裏提了麵包，有的買來糖果，真使我感激和快活得幾乎

流淚。

從五日夜一時半起對面日下午三時半，我整整失去了十五小時的自由。能夠重獲自由確是一件幸事，也應該感激院長和許多好朋友們熱心的營救。在短短的十五小時當中，我却領略了「牢獄」的滋味，體驗了不平常的生活和善良人民的痛苦，更認清了某些人的嘴臉和狠毒。……聽說那些未被釋放的人第三天就不知解到什麼地方去了。

誰能替他們訴說冤苦，誰又能解除他們的痛苦呢？二月十日，九江澤陽鎮。

### 本刊編輯部啟事

- 一、本刊篇幅縮減，各方來稿請勿過長，最好在四千字（通訊）或五千字（論文）以內，以便一次登完，長稿即使內容好，亦極難刊出。
- 二、各方來稿除特約者外，均請附寄寫好地址貼足郵票之信封，以便不合用時，可以立即退還，否則本刊不負退稿之責。
- 三、本刊從下期起恢復「讀者之聲」，希望讀者多多惠稿。
- 四、本刊繼續徵求各地特約通訊記者，海外及邊遠省份者尤其需要。

## 時文

刊週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發行人  
編輯者  
經理部

上海文週刊編輯部  
上海崑崙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 目價閱訂

外國	內國	三個月	半年	一年
平一	航空掛寄	廿四元	卅七元	卅七元
寄律	掛空號寄	廿四元	卅七元	卅七元
二	卅七元	卅七元	卅七元	卅七元
元	卅七元	卅七元	卅七元	卅七元
半	卅七元	卅七元	卅七元	卅七元
元	卅七元	卅七元	卅七元	卅七元
加	卅七元	卅七元	卅七元	卅七元



# 時文

## 第二卷 第二十三期

美國「軍事援華」問題…… 范承祥

近年來的大公報…… 陳石銘

「婦女解放將近完全實現了」嗎…… 碧 遙

讀「三十二條」(短論)…… 顏欽善

「夏蟲疑冰」(雜文)…… 商 翼

北美重遊(八)…… 陳 達

「通」 總結東北冬季之戰

「訊」 從臨海「綫」看華北全「面」

「新第三方面」——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讀者之聲(五則)

### 短論

## 讀「三十二條」

顏欽善

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三月一日成立於北平。在世局危疑國是不清的今日，我們這四十餘位一代鴻儒，海內碩彥，在錢昌照氏領導下，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組織團體，發表對中國前途的三十二條主張。

學人腦汁，我不疑有私。一應謠傳，都不在揭發之列。但讀罷那三十二條會是名流學者竭盡智慧的主張，不禁慨嘆中國「智識份子」的貧乏與愚昧。中國劇病，所開處方竟只是甘草五分。何其庸陋，何其欺人。我為我們的學人惋惜。這堆已發霉了的陳藥，中國吞服下去，不但難望病象回春，事實還要中毒的。學者被利用了。

在客觀上，這個「不是政治團體」的「研究團體」，有如英國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在今日中國，是代表司徒大使所呼喚的智識分子團體，主張似中間路線，實則是國民黨及政府歷次議決案的翻版。以官僚資本為背景，此時憲法未實行言論尚非完全自由，我們當原諒此輩鴻儒公開的主張備極苦衷，且必有保留。但黑字寫出，駟馬難追；這樣主張，獨立純潔的靈魂，就被俘虜過去作御用學者了。

在積極意義上，三十二條對當前的重要問題一個也沒有碰到。當前重大問題是：對內戰的態度？如何反對萬民深惡的貪污政治？如何打倒扼殺民生的官僚資本，拯救人民於饑餓死亡？如何推翻這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如何維護民族獨立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等等。社會經濟研究會對此，一概消極規避，含糊其事，調子唱得無可再低。

那是他們表演驚人的文字技巧，明哲以保身嗎？果然如此，倒也情有可原。事實反是：三十二條幾乎條條默認與維護現實，解釋起來，並不是為人民大眾，只是為一二集團的利益。例如甲項政治方面，所開九條，都是某系官僚集團久已宣揚的主張，因為他們沒有軍隊，就昌言「軍隊屬於國家」，「軍人不得干涉政治」。也不問國家是誰的國家。實際他們所謂國家就是自己份的少數人把持的政府。政府以外有軍隊，當然是稱兵作亂，絕不容許。因為他們沒有羣眾，就痛陳「法治」與「文官制度」的重要。難道國民黨不講法治？早在民國十七年二月，二屆中委四大全會宣言就指出了：「共產黨徒……漠視法治與國家之關係……須知一切政治主張，若不成為具體法律……便成空文。」確立文官制度的決議，更是汗牛充棟。社會經濟研究會諸公，當認為法治與文官制度並未實行，或行而未臻於完善。不想四億五千萬黎庶，做官的究有幾人？請問二十年統治搞不好的事，今日何日，能搞得更好？又因為他們對國民革命無功，僅恃做官技術，取得高位，故反對暴力，更恐懼被暴力所推翻。詛咒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當然更不要中國革命。不圖我們這四十位鴻儒的政見，竟抄襲某系全套的理論，真是倒幕！

關於經濟方面，十條裏面有五條(十六，十七，二〇，二二，二五)是給資源委員會說話，一言以蔽之，由他們與美國合作，壟斷工礦事業。一條(二一)抄英國工黨的銀行國有辦法。十八條表面主張土地國有，實際辦法是永無希望實現的，政府不知已作了多少相似的決議，由理論到條文洋洋大觀，祇是二十年不着邊際。二三條賦稅，二四條對外貿易，及十九條農業生產，全太濫調了。如此十條經濟政策，一反對官僚資本，二不即行土地改革，三不徵用華人在美的存款，四不要有錢出錢讓富人以財產累進稅，但為外資廣開方便之門，讓少數人永遠獨佔國家資本，包括國營事業，這是什麼經濟制度？對誰最好，代表何種人利益？難道要待「研究」然後知道嗎？

也許有人訕笑我的忠厚，說：「他們所開的中國前途，並不是要給中國人看，而是準備給美國國會討論的，不要小看了「新路」了。」但既然有話在先：不疑學人有私，即使因此上當，我是不能後悔的。

# 美國「軍事援華」問題

范承祥

最近這幾個星期當中，美國國會對於所謂「軍事援華」問題，辯論得很是熱鬧。麥克阿瑟老遠地從日本打電報回去要求立即實行「軍事援華」；在中國的陳納德巴巴地趕回華盛頓去為「軍事援華」問題出席國會作證；蒲立特、周以德則到處宣傳美國國務院過去不會實行「軍事援華」的失策。這些呼籲和攻擊很容易使世人得到一種錯誤的幻象，以為美國國內對於應否實行軍事援華這一基本問題，發生了原則性的爭執——即美政府只贊成經濟援華，而共和民主兩黨的大部份要人却贊成經濟與軍事雙管齊下。這種看法，顯然完全是不符合事實的。

大概美國國會中懷抱着這種錯覺的人，為數一定不少，所以馬歇爾總被逼得不能在二月廿六日參院外委會的祕密會議席上，正式承認「美國軍事援助，包括剩餘物資中的軍火與飛機，其數字遠較已公佈者為大，而且這種援助從來就在繼續着」；同時還公佈了若干祕密軍事物資供應的協定，來證明他所主持的美國國務院一向未曾忽略過軍事援華。

事實上，這種錯覺之所以會發生，唯一的原因是由於美國政府這兩年多來從不曾公佈過對華軍事援助的確實數字。就在共和黨攻擊得這樣嚴厲的今天，美國政府所公佈的正式援華數字（包括軍事的與非軍事的在內）還只有十四億三千餘萬美元（美國新聞處一日電）。然而依據一些可靠的民間機關（如外交政策協會）和報紙（如華盛頓郵報等）的統計，則迄今為止，美國援華總數至少已達四十億美元或更多了。

美國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根據官方的和非官方的統計，列出兩個表來說明美國援華數字的龐大驚人，富於參考價值，值得抄錄在這裏。第一個表是全部公開發表過的價值；第二個表是全部價值未經公開發表過的。

第一表 價值已公佈之援助

類別	價值	來源及根據
租借法案項下 (勝利日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卅日)	\$728,000,000	華盛頓郵報 (一九四七、十二、廿六)
租借法案項下信用借款	54,000,000	外交政策協會
中印緬戰區剩餘軍用物資	500,000,000	紐約時報 (一九四五、九、廿七)
剩餘軍用物資撥交	865,000,000	外交政策協會
出口銀行貸款	98,000,000	全上

一億三千萬發彈藥	6,570,000	全上
一九四二年戰時公債餘款	155,000,000	全上
運貨船隻貸款	22,000,000	全上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國會批准總統緊急費項下撥付	18,000,000	全上
總統緊急費項下撥付	450,000	全上
聯總費用	492,000,000	全上
聯總結束後餘款撥用	30,000,000	華盛頓郵報 (一九四七、十二、廿六)
海軍撥付修理港埠費用	15,000,000	一九四七、十一、十五、
其他「救濟」費用	20,000,000	外交政策協會
以上總計	\$3,004,002,000	

第二表 價值未經公佈之援助

1. 撥交海軍艦艇二百七十一艘（一九四六年七月）；
2. 青島美國海軍設備；
3. 運送政府九個軍至華北及東北之費用；
4. 訓練裝備政府軍（勝利日至一九四六年底止卅七個師，一九四七年十個師）；
5. 美軍顧問團維持費用；
6. 一九四七年移交之美軍大批火藥械彈庫；
7. 本年一月以五千萬美元一架之特別廉價，出售C-54式運輸機一百五十架；
8. 本年一月會訂合同以特別廉價出售或無代價讓予之彈藥、軍火、船艦。

據美國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的估計，第二表中所列各種援助的總值，恐怕還會超過第一表所列卅億元的總值；縱使不超過而是相等，那到今天為止，中國政府自美國獲得的軍事與非軍事援助，總計已經達到六十幾億之多！以之與英國所得卅七億五千萬美元及希臘所得八九億元相較，那「實在不能說美國是厚於歐洲而薄於中國」了。

還有一點是必須指出的。所謂非軍事援助事實上與軍事援助是沒有什麼差別的，因為中國政府可以利用這種非軍事援助來獲得美元並購買軍火。舉例來說，中國政府會獲得允許把價值兩億元的聯總救濟物資在公開市場上出售變賣；又會把太平洋島嶼上美國軍用物資若干作為廢鐵轉賣給美國公司，而以所得款項購買軍火。

根據這些鐵的數字，沒有人能否認馬歇爾的話的正確性。是的，美國對華軍事援助，兩年半來規模極大，而且一直就在繼續中，從來未曾間斷停頓過。所以今天爭論的焦點，不應該是對於這個問題的原則性爭執——即應否軍事援

助、或應否經濟重於軍事等；而是另有其癥結。

## 一

這癥結在哪裏呢？馬歇爾在國會議席上有幾句一針見血的話：「中國的局勢和處境與希臘完全不同。美國如以援助希臘的規模去援助中國的反共力量，那是很危險的，而且不大有成功的可能。」

這一段話是對那些中美要人所作「中美建立軍事同盟」或「美國應把中國放在援希臘中處理」等建議，正面提出的答覆。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她該還記得最近三四個月當中，美國有不少外交界和政治界的要角，曾經竭力倡導「美國應與國民政府締結正式互助同盟，在中國負起直接責任」的說法；中國方面也有不少政府要人公開承認（甚至連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氏都會這樣特別強調），「中國局勢與希臘並無不同，美國既在反共立場上援助希臘，自應以同樣決心及規模援助中國政府」。馬歇爾二月廿六日在參議會秘密會議席上所作聲明，一方面駁斥中國與希臘同屬一個範疇的說法，另一方面則堅決拒絕對中國政府負起直接責任。

關於這一點，美國獨佔集團的權威代言人李普曼曾經這樣解釋馬歇爾的立場說：

「假如我們把馬歇爾外交政策的兩大重點——對歐與對華——來仔細比較研究，就可看出兩者之間是有着極顯著的差別的。馬歇爾很明白地說明，依據他的判斷，我們美國不能夠，也不應該運用像我們干涉希臘內戰那樣的規模和方式，去干涉中國的內戰。他坦率承認：我們不能對中國政府提供直接保護，像我們對希臘政府所提供的那樣。馬歇爾對華政策的路線，是與美國的「如果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就不必過份深入地牽連過渡」的傳統政策相符合的。不過，這並不只是說，馬歇爾決定對中國政府採取袖手旁觀的孤立主義政策了。不，美國決不會停止對中國發生濃厚興趣，更不會坐視蘇聯在中國自由行動。但是美國對於那些我們既無能力，也無知識和方法去控制的局面，却必須放棄硬要去控制的企圖。」——（李普曼：「冷戰」第十章）

為什麼李普曼認為中國的局勢是美國所「既無能力，也無知識和適當方法來控制的局勢」呢？在他的近著「冷戰」一書中，有很詳盡的說明。

首先，他駁斥對落後國家締結同盟的建議說：

「在先進的強國中組織同盟，甚至就在共同作戰的迫切需要下，尚且是一件極困難艱鉅的工作。今天如果要把握一些分裂、衰弱而不成熟的落後國家組織起來，形成一條長期反蘇的軍事外交陣線，那當然是更加困難艱鉅，甚而是根本不可能的了。為了要鞏固這種同盟，我們就必須組織、保護、領導並使用這些國家；這樣將使我們非積極地並長期不斷地控制他們的內政不可。我們的使節們必須能夠很迅速地並且毫無誤誤地判斷誰是我們最可靠的傀儡，而我們的國會必須隨時準備根據他們的判斷來扶助這些傀儡取得政權，用金錢收買他們補助他們，並幫他們粉飾內部。無庸否認，這種條件可以說是根本辦不到的。縱使能夠辦到，以美國有限的資源金錢，又如何能填得

滿一個一個的老鼠洞呢？何況蘇聯是不會靜坐着挨打的，她也會反擊。我們已經組織好的，她定去破壞；這些國家的人民已經很不滿意了，她將煽動他們使更不滿意；他們的內戰已經夠激烈了，她將使內戰更趨激烈。事實上，與傀儡國締結同盟，等於是把我們自己的安全保障及世界和平寄托在傀儡、衛星和美國奸細身上。我們對他們知道得很少；他們時常會根據他們自己的考慮和需要自由行動，造成我們所不願造成的事實，引起我們所不會準備應付的危機，給予我們一串串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們不能隨便拋開他們，因為那等於我們自承失敗；我們只能不顧一切代價，不顧自己的意願去支持他們。」

對中國政府的同盟，在美國當局看來，不僅不是一筆資產，反而是一筆沉重的負擔。因為這裏牽涉到美國的威望。馬歇爾說得很明白：「中國情形混亂不堪，甚至無人能預言將來的情形」。名軍事評論家H. 鮑爾溫也說：「美國如對中國負起直接責任，則萬一中國局勢危急崩潰，那美國將陷於一個極困難的情勢中。我們在希臘的遭遇是很痛苦的。我們在那裏已經牽進去那麼深，以致有點感到進退維谷。由於希臘問題的不能解決，我們的世界威望已經受到嚴重損失了」。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儘管美國對中國局勢十分着急，儘管美國暗地裏已經對中國負起了直接責任，但美國無論如何不肯把中國放在與希臘相同的範疇中，正式地公開地表示願對中國政府負起直接責任。

除了這兩點之外，美國當局還有一個極重要的考慮，就是深怕援華會影響到美國的援歐政策。從馬歇爾和美國當局的各種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歐亞局勢有這樣不同的看法：

### 歐洲局勢

- 1 義大利選舉即將舉行，義國內局勢微妙尖銳；法國左右鬥爭亦趨劇烈。故歐洲危機相當嚴重，如美國不立即設法穩定歐局，則崩潰堪虞。換句話說是說，歐洲的局勢是急性的，拖不得。
- 2 李普曼認為組織大西洋集團應該是美國的當前急務，因為這個集團中的各國纔是美國的天然同盟，她們除掉種族文化等與美國接近之外，還具有雄厚工業力量，可以形成反蘇基礎。
- 3 歐洲的局勢容易穩定，只須加強經濟援助就行。

### 中國局勢

- 1 馬歇爾承認中國局勢的危急，也相信政府軍不能突然轉變內戰的局勢，但他認為局勢並不如一般所想像的那樣危急。馬氏似乎認為還可以「拖」一下。
- 2 目前如過份着重在援華，將分散援歐的力量；縱使中共可能被擊敗，也不容易把中國立刻形成一個美國反蘇的強大同盟。
- 3 中國局勢複雜，非單純經濟援助所可奏效。

基於這些考慮，所以馬歇爾勸告國會議員們說：「我們如能同時進行援歐援華兩計劃，自然很好。但如果我們必須在短期內通過援歐案，則各位應將援華案暫時擱置以待援歐案的通過。」馬歇爾顯然是主張美國雖然可以在所謂冷戰中東西兩面同時作戰，但歐洲應居第一，中國應居第二的；在歐洲危急局勢未經消除或減輕之前，美國的全副精力應該集中起來應付歐洲；因之，對援助中國政府內戰一點，固然也要儘最大可能去做，但却不能不有一個一定的限度，即只要能幫助中國政府獲得喘息的時間，「拖」過一個相當時間，美國就滿足了。

### 三

要幫助中國政府「拖」過目前內戰的難關，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著名的斐斐教授在「本月廿五日的紐約時報」上曾經發表過一篇題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危險抉擇」的文章，於比較國共兩軍將領、士氣、民衆對雙方好惡及雙方經濟情況之後，在結論中指出：「美國目前當政者所討論的，已不再是應否援助的問題，而是援助多少和如何援助的問題。目前談到援助，單靠貸款甚少實效，最多不過只能使通貨膨脹稍爲緩和一下而已；而照目前形勢，如果美國不能派遣精兵至少十五萬人的龐大遠征軍，配備現代武器及強大空軍，完全控制中國，並同時整個掌握住國民政府的全部軍事與行政組織，從蔣主席身上卸下擊潰中共的負擔，那就只有聽其自然，任令中國局勢自然發展。或者武裝直接干涉，或者完全不予過問，此外別無更好的良法可資抉擇。」

武裝直接干涉，假如各方面的條件許可，美國是未嘗不想嘗試嘗試的。不幸的是，目前美國內外的形勢都不允許她這樣做。一則「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價值並不太大」（斐斐教授語），不值得在此刻就冒險去公開參加中國的內戰；二則迄今爲止，蘇聯始終不會支持中共，因而「中國內戰的影響到今天還限於中國境內」，假如美國公然執行直接的武裝干涉，可能使已經緊張的美蘇關係更趨緊張，最後會「冒對蘇戰爭的危險」；三則美國人民厭戰反戰的心理異常濃烈，未必會准許美國政府派一二十萬人的大軍到海外去師出無名地參加一個與美國無關的別國的內戰；四則縱使美國悍然出兵，是否能夠很快地符合理想地解決問題，美國實在也毫無把握，萬一直接武裝干涉了而仍然解決不了問題，鬧成功像日本人在中國那樣騎虎難下，泥足深陷的困難局勢，那美國恐怕將不知何以善其後。

大概是出於這四種考慮，所以不僅「中美軍事同盟」（美國人所提）、「中美自衛同盟」（王世杰所提）之類的建議在美國得不到廣大的共鳴，而且就連那些拚命呼籲對中國政府加緊軍事援助乃至軍事干涉的人們，如陳納德、魏德邁之流，也不得不在大吹了一遍「美國需要實行更進一步的軍事援助」之後，立即補上一句「然而這並不是說美國應該直接參予中國的內戰」，來緩和美國

人民的疑懼。譬如，陳納德在他鼎鼎大名的援華論文裏就說：「美國雖然極端需要在滿洲實行軍事干涉，但這種干涉却不必是一種直接參加作戰的性質」。魏德邁在他對國會致辭中也十分強調地指陳：「美國雖然必須以軍事援助給予中國，但目前美國軍隊並沒有直接參預中國內戰的必要」。照美國國內的情形來看，美國的反動力量恐怕永遠不可能動員美國的人民來贊許他們公開直接武裝干涉中國內戰的冒險的。

既然直接武裝干涉不可能，而「完全不予過問，聽任中國局勢自行發展」又非美國心之所甘，同時美國當局又非設法在歐洲人民力量愈趨高漲的時候幫助中國政府拖過當前的難關不可，這就使得美國對華政策陷入一種極度苦悶之中。在無可奈何之餘，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只好寄厚望於所謂中國「第三方面」的力量了。前引斐斐教授的文章，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認爲「今後中國內戰延續，前途渺茫，什九以分立爲結局」；「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共雙方都可能打到精疲力竭，只要這種狀態一發生，美國就可以再來調解，給那以不爲國民黨的貪污和共產黨的曖昧傳染的中間路線者爲主體但又包含各派系的新中國政府以物質援助」；「總之，美國應該保持一雙自由的手，在遠東危機到來的時候可以自由選擇，而不爲國民黨所牽累。」

事實上，美國當局今天的對華政策，就是依照着斐斐教授這番談話的精神的。老實說，美國對華軍事援助的辯論，焦點就在這種援助的大小快慢是否能夠達成使國民政府不致過早崩潰，使中國內戰延續的目的。美國的執政者不願意看見中國政府早日崩潰，而寧願讓中國內戰無限期延續下去，前途渺茫下去。美國明知扶助中國政府不一定能達到消滅中共的理想，但却熱烈殷切地希望長期內戰把中國削弱。美國的算盤，說得深刻些就是，一個國民黨所控制的中國可以在第三次世界大戰成爲美國的盟友，雖然這盟友的能力是可以懷疑的，但總是盟友；這一點既然不容易辦到，那就不如維持中國的內戰，使精疲力竭而長期衰弱與無力，以便中和 *Neutrality* 中國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所可能發生的作用。

但，單靠美國的軍事經濟援助，還是不能夠把中國的內戰延長。美國還必須有若干的政治策動和作爲；希望兩方面配合起來或許可以收到延長內戰的效果。

這種政治策動大體上可以分成三個方面。第一，內戰既然在政府方面是打不下去了，那就不能不設法爭取一個喘息的時間，而爭取喘息的唯一良法自然又不能不是恢復和談。如果和談能夠恢復，那對政府當然是有利的；但美國明知和談決無恢復可能，所以退而求諸其次，就想把和談作爲一種姿態，希望把不能恢復的責任確定地推在中共方面，利用中國一般人民的厭戰心理，煽動一般的反共情緒。二月間的和談，起於柯克將軍在青島招待記者惜別會中關於蔣主席的一段談話和司徒雷登大使的一篇告中國人民書。這和談現在雖然已經事



過境遷，但以後恐怕還會不時再起的吧。

第二，若使軍事經濟援助有效，美國認為中國政府必須有若干政治的和財政的改革。馬歇爾在提出五億七千萬援華貸款案時就曾坦白地說過：「本案的性質主要是非軍事的，其目的在予國民政府以一喘息時間，以進行其十分急需的財政及政治改革」。這所謂政治改革，用美國所習用的漂亮外交辭令講來，就是一擴大國民政府的基礎；揭開表皮來說，就是前文所引李普曼的一選擇誰是美國最可靠的傀儡，幫助他們參加政權，以便美國可以更加積極地並長期不斷地控制中國的內政，如同美國在希臘所做的。

第三，美國認為國民政府的一個最大缺點，就是知識份子對國民政府離心，不願團結在國民政府周圍，從而對國民政府的剿共工作形成一種重大損害。因此，美國政府就迫切地希望把這般知識份子組織起來，「團結在政府周圍」，「進步運動」的真心用心。司徒雷登最近（二月廿二日）在答覆記者詢問時，特別對知識份子與受教育人士（包括無黨無派的自由份子以及新聞記者）提出「懇摯呼籲」，希望這一般「具有領導民衆能力」的人士「組織一個新黨，而對政府作建設性的批評，或僅成立若干團體以倡導若干有關改革之主張及進步的運動。凡曾經批評政府而未曾有所作為者，應於新憲法之下積極盡其責任，以協助解決其國家之問題」。在大使這個談話之後，不過一個星期，北平就成立了一個「社會經濟研究會」，好像替大使捧場似的。這個會竟是一個「僅僅倡導若干有關改革之主張及進步的運動」的團體呢？還是一個專「對政府作建設性的批評的新黨」呢？還是準備做裴斐教授所說的「不爲國民黨的貪污和共產黨的曖昧傳染的中間路線者」，而作爲「國共雙方打得精疲力竭」時，出

## 近年來的大公報

現在所有討論自由主義的文字當中，以大公報所表現的微妙姿態，最使我們感覺興趣。

大公報的言論，每個時期都有一個中心論點。遠一點說，從民國三十年「皖南事件」起，以迄抗戰將近結束的那一段時期內，大公報每一論及國內政治問題，常常抱定一個所謂「這個國家中心萬萬動搖不得」的理論，因為那時要求聯合政府的呼聲剛剛抬頭，而當時的大公報是頗爲反對那樣「動搖國家中心」的多黨政府的。主張聯合政府的是非，我們今天無庸置評；但大公報的「國家中心」說，却予人一種印象：以爲一個政府無論好壞，只要形成中心，就「萬萬動它不得」。我們倘持此論以觀歷史，則辛亥革命實屬多此一舉，因爲滿清政府雖然腐敗，當時國家中心究竟還要數北京城裏的溥儀；革命只是少數的覺

面接受美國調解和物質援助的「新政府主體」呢？且待未來的事實去證明吧。

### 四

從美國國會中關於軍事援華的爭論，從美國當局在中國所作所爲，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國政府的日益惡化的軍事形勢，迫使美國對華政策不能不轉上一個新的階段。美國被迫要在直接軍事干涉和完全放任不過問兩者當中間選擇一條。然而放任則心有不甘；直接干涉則在歐洲人民力量日趨壯大、法義兩國左右鬥爭將近攤牌的時候，在美國人民厭戰情緒還十分濃厚、進步勢力逐漸發揚開展的時候，美國無力也不敢蠻幹硬幹。而對着這樣複雜微妙的世界局勢，美國政府在百無聊賴之餘，只好採用一種「中間路線」。這就是，一面加強對中國政府的軍事援助，甚至企圖在保持「中間路線」。這就是，一面則下實行某種程度輕微的軍事干涉；另一方面則希望通過經濟援助和政治策勵，來替中國政府贏取喘息時間，並削弱孤立中共的勢力及影響，企圖藉此拖長中國的內戰，直到馬歇爾能把歐洲經濟整個控制住，有了充份的餘力可以更進一步過問遠東的時候。這些，可以說，就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全貌。假如我們的推論不差，那今後中國的內戰，將是一個軍事決戰與政治策勵交互採雜的複雜局面。不過，無論美國的謀略如何高明，手法如何變幻，中國局勢的決定因素始終還是在軍事方面，這是無可置疑的。

（本文寫完之後，看到馬歇爾所作「美國仍主張中國政府應擴大基礎，並羅致中共在內，但中共已公然稱兵反抗南京政府，此問題如何解決，須中國政府自行決定，並非美國所能指示」的談話，以及翌日杜魯門總統否認「美國主張國民政府應容納中共」的聲明。我認爲這更加證實了本文對於這次和議的看法。

卅七、三、十四補記

陳石銘

悟的知識份子的事情，大多數的鄉曲小民，他們心目中祇有「皇上」。然而我們因此能否定辛亥革命和中山先生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黨嗎？當然不能！那末所謂「國家中心」的理論，實在非常可笑的。

隨後時勢推移，政協召開，大公報也贊成聯合政府了。不旋踵而政協決議被破壞，論者以爲由於決議上留下東北問題的漏洞所致，大公報即持此說，一再論及，惋惜不置。我們現姑且承認這種皮相之見爲是，但不禁要指出一項事實：即首先向這所謂政協漏洞開刀者，實始於重慶大公報所載傅斯年氏的「中國誓與東北共存亡」一文，時在三十五年初春，國民黨二中全会召開，政協危機開始顯露。當時東北問題未嘗不可以政協內妥善解決，但是人們深謀遠慮，第一步，應用四川「厚黑學專家」李宗吾氏的所謂「踴箭法」，將東北踴在

政協之外，亦即國內問題之外；第二步，又應用「補鍋法」，強調「東北問題國際解決」，希望將一絲絲破綻織成一個大窟窿，以作推翻全局的張本。傅斯年氏恰如一個補鍋匠，手執釘鎚，一馬當先，作開宗明義第一敲。不健忘的人當還記得，傅氏大文刊於大公報星期專欄，長幾佔二分之一版面，除了充分表現專斷、跋扈、抹煞一切的大砲作風以外，稱得起慷慨激昂，不可一世。文末並引左傳語作結，謂「鹿死不擇蔭，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挺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大似一封哀的美敦書。這樣登高一呼，官方乘勢響應，於是而有反蘇大遊行，接着有較場口事件，一連串的事件下來，以迄於今。倘要依照論客們的「漏洞」說法，則首先向漏洞開刀，終致政協徹底被毀，論功行賞，刊載傅氏大文的大公報，實應得第一功。不過我們不如此講，因為根本認為「漏洞」說是一種極端皮相之見。大公報所應惋惜者，似乎首先是它自己。

其後內戰擴大，不可收拾，論者又有「長痛不如短痛」之說。這個「短痛」，其實就是某先生之所謂「施手術」。迨延安攻下，政府通令各報，必須使用「匪」軍字樣，這使我們記起一件事。當民國三十四年九、十月間，日本已經投降，政協尚未開始，國共兩方軍隊已有若干零星接觸。某日大公報社論提及此事，略謂近來外國駐華記者的新聞電訊上出現有 Bandit 字樣，果真有此事，則政府負有維持國家秩序與安定的責任，應即斷然處置云云。（手頭無該報，無法抄錄原文，讀者中存有三十四年大公報的，可以查出覆按。）這說法極為別緻，一反大公報的半吞半吐傳統，雖云「書生論政」，而頗有大將風度。一時輿論譁然，有人說連大公報也主張打，你還有何話說？但多數人則更氣憤，詩人馬凡陀先生並為此寫了一首歌，叫「我討厭這張報」。筆者記性不佳，手邊亦未存有馬凡陀山歌集，不然可以抄出來，讓大家都把當時的憤慨情緒回味一番，並且和今日的「自由主義者」的面目對照觀看，也是一件頗為有趣的事。

「施手術」或「長痛不如短痛」，都是指懲治對方而言，不然是說不通的。但萬不料戰局演變，竟使「手術」和「痛」都施在自己身上來了，所以這兩

### （上接第十五頁）

三二、在推廣醫藥衛生設備，以減低人口死亡率政策之下，國家應同時使醫藥衛生人員，負責傳播節育知識。在不使品質下降之條件下，減少生育，俾中國人口壓力，不致加增。國家並應進而謀人口數與就業機會的調整，使生活水準，可以逐漸提高。

這三十二原則發表之後，學校中倒常有人談及，一個學生刊物據說還要專文檢討。我們看全文，覺到政治九條最堂皇，除了一國內應有的政策「不知出處之外，的確「用彩筆塗出輝煌遠景」。在如今說應是進步的。但「獨立」不知是否指國共而言，如是，則似乎是不希望有一

種論調早已寂然不聞。一年來從大公報所看到的，就是唉聲嘆氣，偶爾帶出幾句詛咒戰爭的話。至於高唱自由主義者如何如何，則是最近的事，也就是說，「自由主義」之說是大公報在現階段的中心論點、策略和路線。

以上我們簡單地談了一點大公報言論主張的來龍去脈。關於自由主義的堂皇議論，這裏不必贅述，但從常識來看，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起碼條件，當是明辯是非。可惜得很，大公報在這一方面是非常欠缺的。統觀它的言論，除了對日本問題尚能嚴守立場以外，其他問題，尤其是對國際及國內政治問題，有時看來看去，簡直不知它說些什麼。看慣大公報的人，有兩個公式可以概括它，其一我名之曰「糊塗縣官」式：糊塗縣官問案，上堂不問青紅皂白，原告被告，各打四十大板。大公報談問題也是這樣，甲方這樣這樣不對，乙方那樣那樣不該，支吾一通，結果不知所云。其二我名之曰「九執厥中」式：諸如「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類。

不辯是非，不願辯，不肯辯，不敢辯，這樣的自由主義者，真令人懷疑。而他們又時常提起老百姓如何如何，在他們的心目中，老百姓永遠是第三者：過去，現在，將來。他們說中國人民所需要的只是有衣穿有飯吃，別的談不上。乍一看，他們極其謙虛，一切以老百姓的意見為意見；可是他們又說老百姓太愚昧，因此中國要實行民主憲政，至少是五十年以後的事，一下子又把老百姓看得一錢不值了。這時候他們忘了：一切社會改革，假如都要等每一個老百姓有自發自覺的要求的時候才作，則不但什麼民主憲政，連辛亥革命根本就不會有。他們絕口不提覺悟的知識份子，在時代變革中所負的先驅使命，也毫不估計老百姓的真實力量，祇是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活菩薩面孔，說着一些不三不四的話，不久以前大公報上刊載的蕭乾先生所作「我家有個夜哭郎」的大文，便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儘管他們混作偽的手段怎樣高妙，一到緊要關頭，總不免露出馬脚。倘使今後一個時期內，美援源源而來，而一戡亂「軍事居然稍轉順利，則大公報「自由主義」的說法必然又與今日大不相同的，祇怕客觀形勢的發展，不能順從某些人的主觀願望，那就大可悲哀了。

### 面倒的局面。

外交六條，辭意含混，好像又是左右都罵。左右都罵的人往往不知如今世界右面的陣營日益開倒車，自私、獨占。一面向前，一面退後，大方向根本不同，目前一定要又親蘇又親美，等於向東同時向西。只有內政站得住腳，自己向前走，才後選擇良友，才不做左右乞憐的鄉愿。朋友之間，本來能合則合不合則離，不一定非「睦鄰」不可，問題只在自已站得穩不穩，因此問題還在內政。

內政的根源在經濟。要現代化，要國家走上建設的路，首先要結束內戰。現在是一切建設都成了戰爭的附注了，根本談不上現代化。經濟方面的十條原則，有二條談土

地問題（十八條和十九條），十九條是空的，十八條提出溫和的辦法。但溫和的辦法如今也還是行不通，只要看華北的「綏靖區」，多麼好的辦法也行不通，地主和農民的對立太深刻了，那些工業化的國家所行的溫和土地政策，在中國根本行不得，那麼道第十八條只好等內戰結束之後再談吧，但是內戰結束之後，土地可能大體改革，用不到溫和的辦法了。這就是這些溫和的社會經濟研究家的悲哀也。

沒有有效的土地主張就談不到經濟建設，沒有經濟主張，那麼道三十二條主張恐怕只好永遠處於「遠景」了。這個藍圖只好一直拿望遠鏡去觀賞吧。（三月十日）

# 「婦女解放將近完全實現了」嗎？

「婦女節感言」的感言

碧 遙

從報章上三八節的紀念文字看中國婦女，中國婦女可謂幸運的安琪兒了。這一天，所謂「權威」的大報，沒有不做文章慶祝的。

這些「權威」的大報，大都以「婦女節感言」為題，內容是說：國代的選舉揭曉了，婦女有她們的座席；立委、監委的選舉揭曉了，婦女也有她們的座席；國民參政會與各省市參議會，婦女也有座席；還有不少的女經理、女董事、女校長之流；中國婦女在政治上，經濟上，可謂已達到了男女平等的地位。因此「今年的婦女節，並不具若何時代的意義」。這些大報在頌揚讚美之餘，又低徊感歎地說：「中國近幾十年來的進步雖不夠快，但婦女解放是將近完全實現了。」

國際婦女節的起因，原是要聯絡全世界被壓迫的婦女，共同求解放。現在中國婦女解放將近完全實現，那麼，婦女節在這裏將成為歷史名辭；如同中國革命已經「成功」，革命紀念日也成了歷史名辭一樣。所謂「今年的婦女節，並不具若何時代的意義」，是當然的。

可是我們日常所見腫腫醜醜，流浪街頭的難胞，多多少少是女人？她們左提右挈，敞開着胸脯，哺育着嬰兒，餐風飲露，這等人可會解放？被人攔腰取樂，求在恥辱中生存而不可得，至於挺而走險，打社會局，身首流血的舞女，這等人可會解放？為向資方多爭一點羹湯，被打得死去活來，活來死去的紗廠女工，這等人可會解放？胃寒忍飢，滿身惡疾，鶴立通衢的娼妓，這等人可會解放？伏處幽暗的廚房，終年受着鞭笞的婢妾，這等人可會解放？身負過重的勞作，心負過重的憂傷，飲淚過日的被徵壯丁的妻母，這等人可會解放？戰火、苛政、窮困、充塞着中國大地的今日，社會大半數人淪為牛馬牲畜，婦女更是牲畜的牛馬，何會半點解放？然則所謂「中國婦女解放將近完全實現」，不是一大報「的大言無慚，便是它們的眼睛近視；再不然，便是「別」的了。

法國大革命以來，「女權運動」在西歐各國鬧了一個多世紀；爭參政權，爭教育權，爭財產權，……好些次打得頭破血流，震動世界。這個運動，目的是在和男子爭特權；一旦特權到手，自己做了議員，做了高官，做了經理官，其他的婦女死呀活呀，可以全不管的。這個運動移植到中國來，約在辛亥革命到「五卅」的前夜。這十多年中間，女學校林立了；北京大學開放女禁了；國家憲法和省憲，都籠統地有「男女平等」的規定了；各種機關和學校，任用女性了；女省議員、女參議員出現了，娜拉可以出家，寡婦可以再嫁了；男女的社交完全公開了；戀愛可以自由了；……在西歐嚷吵了一個多世紀的「女權運動」，在中國，十多年中間，幾幾乎完成了。這確是中國婦女長足進步的地方，

但，「三八」國際婦女節是出現於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到這個年代，歐美一般的婦女運動，不再停留於「女權運動」的圈子裏了。她們不再為少數上層婦女爭特權，而在為全體婦女爭解放了。要全體婦女解放，須是社會無復特權存在，無復壓迫、剝削、束縛存在。然後社會人人都解放了，婦女也解放了。這時以來，是所謂婦女解放運動，再不是以前的女權運動。

婦女解放運動移植到中國來，約在「五卅」和北伐時期。這時婦女運動的目標，是在反帝國主義對我的壓迫剝削；反封建軍閥的黑暗腐敗；反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為非作惡，反中外資本家的貪婪壓榨，反禮教貞操的精神束縛，反同工異酬的男女歧視，反蓄婢蓄妾的人權蹂躪，……一時從產業部門到機關組織，從政治會議到軍隊中心，婦女往社會的門戶洞開，洞開。這時所謂婦女解放，是實際的行動，而不是紙上談兵；是真實的生活而不是文字虛構；是婦女工女廣大婦女羣的崛起，而不是夫人、貴婦、記者、教師等少數知識婦女羣的吶喊。這婦女解放運動結合於中國社會的解放運動，使大半個中國的怒吼震撼全球，使帝國主義者的軍艦從遼遠的中國腹地遁逃至於海濱，這都是事實，不是神話。

自十六七年解放工作告一段落，繼之以九一八東北陷亡，繼之以一二八滬戰失利，繼之以八一三大戰爆發，大半個中國倒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臂下，於是以前狂烈的吼聲，成了絕響。

抗戰勝利了，天賜鴻福，趕緊「接收」。日人在我八年聚集的精英，「接收」自也是一件繁榮的「偉業」。祇見封條滿天飛舞，落在房屋、倉庫、汽車、人身，……處處。在這封條至上時代，婦女顯著的活動，便是擠入「五子登科」或榮昇「吉普女郎」。光陰荏苒，將近三年。現在是戰亂第一，徵兵至上。於是而萬千婦女靈宿野處，萬千婦女成了孀婦，萬千婦女自動為娼，萬千婦女瘋狂自盡，知識婦女踏車為生，無知婦女賣夫為兵，……這都是事實，不是神話。

二十年之隔，前後判若天淵。「中國近幾十年來的進步不夠快」，誠如「大報」所說；「但婦女解放將近完全實現」，就不知它們說的甚麼神話？社會的險象不斷地增加，婦女的處境日益危殆。打著「解放」旗幟的「三八」節，今年正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

少數上層婦女得到了政治、經濟、教育、生活等等的解放，擠進了立委、監委、國代之類的座席，對於廣大的未得解放的婦女，很少補益。將這很少補益的事實，擴大而為神話，對婦女廣為宣傳，還在「權威」的大報，是可以的。但我們婦女本身，則必須看事實，說實話。

# 夏蟲疑冰

(雜文)

商翼

作者在「美援小品」(見時與文二卷二十一期)中，提到司徒大使主張「中國知識分子及受教育人士可組一新黨或成立若干團體」時說：「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建議，只可惜不會引起，大概也不致引起響應。」沒想到文章剛脫稿，就見到報上登出「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當仁不讓，北平新第三方面組成」的消息。正符司徒大使之期望，這是個「知識分子及受教育人士」(而且是大學教授和知名之士)的「團體」，旨在對「中國目前現實需要的各方面，提供出來原則」，以「公諸社會」，「據該會發言人說，也「就等於建議當政者」(三月七日新民晚報)。因此董顯光局長所謂「知識分子將繼續與政府合作」之說，是馬上得到「確切保證」了。

作者自覺慚愧。用上海話說，這一次真是「估錯了邊」。「不致引起響應」云云，顯見得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莊生有言：「夏蟲不可以語於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是以「長見笑於大方之家」也。

雖然，作者仍欲以「小人」之心，更申述一下「井蛙」之見。豈敢望上達「君子」之視聽？亦只在表示一點「夏蟲疑冰」的愚思而已。

所謂「新第三方面」，打的旗幟是很鮮艷的。一開始，就提出「工作內容三十二條」。此三十二條，陳義甚高，句句「君子」之言，決非「小人」所能理解。例如第一條說：「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會化」，三個「化」字重疊，一句句頭尾銜接。文心之巧，排列之美，差可比古人的「織錦迴文」。「小人」怎能如此文學天才？又如最後一條，建議「國家應使醫藥衛生人員，負責傳播節育知識，在不使品質下降之條件下生育，俾中國人口壓力，不致加增」。這是在為全民族打「選種」與「人為淘汰」的算盤。原來中國久亂，是因為「人口壓力」太大，國民「品質下降」。經過八年抗戰與兩年「戡亂」，固然已淘汰了幾千萬品質欠佳的賤民；不過那些活著的，仍然轉着「多子多孫」的觀念，以致亂到現在，還是源源不絕的有壯丁可拉，「瘦丁」可徵。「節育知識」果真傳播，則於戰爭之外，又加了個更有利的選種與淘汰的工具。國民品質自然提高，人口壓力自然大減，終於沒人充砲灰，天下也就自行太平了。「君子」之科學遠見有如此者，「小人」又怎能夢想到？

夫君子之道，可一言而舉也：「學而優則仕」。「新第三方面」諸君子，既熱心天憫人，滿腹經綸，當然應該出來「干」一下「時君世主」，好把小民救出火坑。在這以前，諸君子是被稱「深藏若虛」。用董顯光局長的話說，就是「鮮顧虛耗時間以從事自我宣傳耳」。現在三十二條既已「公諸社會」，鋒芒初露，端倪略見，大概已自居於「學而優則仕」的「則」字上面了。孔子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據該會(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某負責人說：該會決沒有拿宋子文的錢。」似乎也正在表示諸君子只是「待買者」，而尚「守身如玉」也。

所謂君子，是上等的士或士的典型。「士」「女」並稱，其立身行世，大抵亦可相對比：女人不出嫁，稱為處女。士君子不做官，稱為處士。出了嫁，則從一而終，謂之節婦。做了官，則不事二君，謂之忠臣，然則將仕未仕之為「待買」，亦猶將嫁未嫁之為「待字」也。今日諸君子

陳三十二條，「耗時間以從事自我宣傳」，大概也同年已二十七八歲的「待字」的處女一樣，塗脂抹粉，打扮得妖妖燒燒，急於想我個如意郎君吧！引句古話來說，這叫做「銜嫁」。

但是古語又有云：「銜女不貞，銜士不信」。——對於尊貴的「士」「女」之「冰心」發生懷疑，似乎是古已有之的事情。這種懷疑，就女人方面說：倒不是對「娼妓和「玻璃杯」之流而發的。因為這些下流女人只說「從良」，決不會說「待字」。在待字的上流處女羣中，以「小人心」之「度」之，最易滋生疑竇的，似乎首推一類稱為「花瓶」的密司。「花瓶」是大機關或大公司之不可或缺裝飾品，行徑却有點介乎「銜嫁」的少女與出賣色相的娼妓之間。對於這樣的處子，你說她不安分吧，她却在人面前宣稱「一直抱的獨身主義」。你相信她的話吧，她又也許早已是一輛「拉圾馬車」了。她有時和上司打情賣俏，似乎是要往高枝兒爬。有時又和同事眉目傳情，好像正想跟你這個小職員鬧「自由」戀愛。你不識相，問她一句：那來的這麼漂亮的貂皮大衣和金戒指？她就馬上放下臉，哼你一口，聲稱自己從不拿經理或老板的錢。甚至嬌嗔滿面，怪你怎麼不把她當自己人看待，她也主張「規定最低工資，最高工時，並對勞作環境的安全予以保障」(三十二條中之第二十九條)哩。但是出乎你的意外，過不了兩天，你在什麼娛樂場所，見到她正甜甜蜜蜜的吊在你的上司的膀子上；又過不了三天，喜帖送來，她已升格為你的老板娘或經理的第七房姨太太了。

男女有別，古有明訓。作者決不敢狂妄到如此地步，說「新第三方面」就是一「花瓶」。但是把兩者對比一下，却又覺面貌酷似，不能不令人疑惑他們是同胞的兄妹。同樣的在「待」，同樣的在「銜」，同樣的說「此地無銀三十兩」，同樣的聲

明自己是「自由人」，身子是乾淨的。而三十二條之第六條中說：「民意的表現為選舉，政權的轉移，應視選舉的結果而定。」第二條亦說：「執法與制法並重，憲政尤重憲法。」至理名言，特別於此時此際，以在野之「新第三方面」的身分提出來，當然使南京那座富麗堂皇的國民大會，如錦上添花，案頭置「瓶」，平添了一段爛爛。猜想政府當局與國大諸公，好比雄貓見到了雌貓，也必定會噴出一片好聽的聲音來！

但「小人」仍有疑惑：「有情人」到什麼時候才公開的「成眷屬」呢？焚香祝禱，願天老爺保佑「新第三方面」早早的升格！到那時，只消新升格的老板娘好言一聲，小民的「生活水準」將立刻被提高(第十六條)，從此可以免於匱乏了。而「離鄉政策」推行(第十一條)，美援也必將大量湧來；馬歇爾的「中國政府應擴大其基礎」的老調，大概也就無庸重彈了吧！然而即使到那時，「小人」還要生疑惑：這是一世修來的福，竟蒙好心腸的諸君子如此照拂？「小人」畢竟都是夏天的蟲多，對於那玉壺裏的一片寒冰，銀瓶裏的一束春花，是一輩子也想不通的！

### 本刊經理部啟事

一、自本刊二卷廿二期起，航郵又皆漲價，原來每份郵資為六千元，刻已漲為一萬元，敬請讀者補寄，不另函告。又本刊紀念訂戶訂單甫經發出，適逢航郵調整，茲亦不得不重行訂定價目如次，敬希鑒諒。

航平三個月十二期 二十八萬元  
航掛三個月十二期 三十二萬元

二、為便利讀者訂閱本刊，大額郵票代洋，十足收用。在本市者并可使用橫綫台頭支票。

三、本刊暫時停收半年或全年之長期訂戶。



# 北美重遊

(八)

陳達

## 重訪華盛頓 (三六、八、十)

我因甫出醫院，身體虛弱，老友姜立夫伴送至火車站，並代照行李，上午十一時半離彭爾尼亞車站，下午四時到華盛頓，前學生張景觀兄在站相候，雇車同至預租的房舍，坐落於市西北區，離中國大使館僅兩街，我得屋一間，租金每月四十元，街旁大樹甚多，陽光從未射入屋內，華盛頓夏日溽暑，余得此屋甚覺滿意。

## 美國人與其家庭

美國社會有較速的變遷，在急速的變遷中，美國的男女如何生活？家庭如何維持？一般人對於婚姻，職業及人生觀等有何種態度？這些及其餘可以反映個人及團體行為的問題，俱是社會學者所深感興趣的，本段擬加以簡單敘述。近年來美國公衆輿論研究所 (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 對於上述各問題業已搜集很多的材料，據所長格樂魄 (George Gallup) 氏的觀察，我們可以作下列的簡單分析：(一) 婚姻與兒女，一般的美國人，以為男子的結婚年齡應為二十五歲，女子應為二十一歲，訂婚時間長者較短者可以得着美滿的婚姻。主婦們相信夫婦應共同管理家庭的財政，據她們的意見，夫婦間的爭吵依多寡的次序來說是起於家庭經濟，妬忌與兒女，雖然如此，夫與婦俱不願意把離婚律鬆懈下來。

論到性選擇的標準，女選男時注重他的和善性，好脾氣及對於他人的體貼心。這些特點比賺錢的能力，志氣都還重要。她盼望丈夫於結婚前更為浪漫些，一般的美國男子或女子，認為三個小孩是最理想的家庭。第一個小孩出世時，最早須在母親出滿一年以後，其撫養的責任應由父親負責。關於擇配時男選女的標準注重優良的伴侶，理智及治家的能力，他認為女子在婚前與男子接吻太多，他承認已婚的男子較光棍為快樂，不過他以為女子過於撒嬌。 (二) 家庭生活 一般的美國人，晚上十時就寢，逢星期六則改晚一小時，平時晨六時半起床，星期日則晚一小時半。五分之一的人在夜間不易入睡，但三分之一則早晨難以起床。

農業以外的工作人員，自家至工作地點要旅行十五分鐘，其距離為二哩。三分之一的人回家午餐，其餘的人自帶點心或在食堂用餐。在家庭用餐時，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尚作禮告，普通美國的家庭都有珍愛的家畜：貓最少，狗兩倍之，每十個成年男子中有七個是愛狗的，三人愛貓。父母對於兒女的職業選擇，不願他們入政界，認為政

治太腐敗，礙於男子的職業，盼望他們做醫師、工程師、律師、農夫、牧師、商人或教員。

父母訓育兒女尚離不了鞭撻，據報告：十個成年人中有八個在小時時被打，每十人中，有七人認為父母打小孩是應當的，但他們不贊成教員打學生。

在城的家庭，關於食品費用目前要比四年前增加百分之五十，據他們的意見，每星期入款在五元以下者以不婚為佳。(三) 體質特點。男子的平均高度是五呎九吋，體重一五八磅。女子的平均高度是五呎四吋，體重一三二磅。每十人中有四個是棕色眼睛，三個是藍眼，其餘是灰、綠或黑色，至於頭髮的顏色可列舉如下：棕色占四八%，灰或白色占二二%，黑色占一四%，白色占八%，紅色占七%，以上得百分之九九，其餘百分之一為禿頂。十個男人中有六個喜歡顏色較黑的女子，只有三個喜歡顏色較白的女子，其餘一人喜歡紅色。

(四) 娛樂 男子的主要戶外遊戲是棒球與籃球，他們間或賭博如紙牌、體育節目等，但輸的時候多，贏的時候少。每十個成年人中六個飲酒，他們大致反對重行實施禁酒律的。

女子的戶外娛樂是游泳與走路，室內遊戲包括看書聽無線電，打紙牌等。偶爾也喜歡旅行，不過還不相信飛機的安全程度與鐵路相等。

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嗜音樂並學習鋼琴。十人中有八人嚮吹哨，他們喜歡的調子是 Star Dust, 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Peg O My Heart。

(五) 社會態度 美國人對於許多社會問題抱前進的態度。遠在公衆衛生官之前他們主張對於癩癩等症廢除一切的禁忌。各省的輿論都贊成懷孕的母親要驗血以測驗癩毒。同樣的，所有各省的輿論，俱主張婚前的兩造要有一樣的驗血測驗。

一般的父母俱贊成少年於婚前須有性的教育，大多數主張中學校裏增加性的課程。一半的美國人，願加入成年教育班，百分之七十五願意自營商店，美國人所最景慕的當代偉人是麥克阿瑟，艾森豪威爾、邱吉爾、杜魯門、馬歇爾。

全國人口的一半是上禮拜堂的，百分之七十六的人相信死後還有生命，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相信上帝的。

## 國際人口科學研究會

當一九二七年，山頓夫人在日內瓦召集第一次世界人口會議時，其主要目的在宣傳生育節制，那時到會者有許多人人口學者，他們利用這個機會組織國際人口學會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這是學術團體，有些國家紛紛組織分會，以便利本國的人口研究，例如英美德法德意諸國。在戰前國際人口學會已在倫敦，羅馬，柏林，巴黎等市開過會議，每次俱印行長篇會議錄，包含各種學術論文，一九四七年九月，這會開會於六個學術團體之一。在華盛頓聯合舉行國際統計委員會自六月至十八日共兩星期。乘機改組，余被推為改組委員會委員之一。當第一次開會時，會長耶德利 (J. J. Duv) 報告該會最近十年 (一九三七—四七) 的情形，一九三七年該會在巴黎開會，兩年以後印行會議錄八本。戰爭期間會務停頓。德人佔據巴黎時，曾提議重新活動，但本會委員以其陰險政治野心，未入圈套。本會學術雜誌，曰人口 Population，一九三八年曾於巴黎出版兩期，後以戰事停刊。第二次開會時討論本會名稱，定為國際人口科學研究會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有人提議，本會以人口學為研究範圍，注意數量與品質，不包括政治人口學。余主張刪去末一段，認為不必要，隨後有好幾個人提出應明白加入末一段的理由，因戰前本會在歐洲開會時，意大利曾宣傳法西斯主義，德國曾宣傳納粹主義，結果此次修改會章時，於第二條仍舊加入「不包括政治人口學」字樣。當開會時，會員的論文如非學術性者本會即不接受。論文的數目及篇幅亦可以受限制。非會員的論文或通信，亦可以由執行委員會 (得專門委員會的同意) 拒絕接受。這些繁雜的條文，無非是要保持本會的學術性。本會會員 Corrado Chi) 係世界知名的人口學者之一，本次亦出席國際統計會議，但因其從前曾協助墨索里尼宣傳法西斯主義，故此大改組後，不歡迎彼參加。借學界來開揚一種政治主張，為歐美學者所深惡痛絕之事。

入會的會員純以個人的學術研究為準。其主要條件為對於人口學的興趣與貢獻。要由會員五人提名，經選舉後入會。每一國的會員人數過多時，有選舉權的會員必須受限制，任何國有選舉權的會員，不能超過會員總數的八分之一。各國人口學者被舉入會者已有一百餘人，內阿根廷三人，澳大利亞三人，奧地利一人，比利時二人，巴西四人，加拿大四人，丹麥一人，美國二十九人，法蘭西十三人，英吉利十五人，匈牙利五人，中國五人即陳長衡，朱祖晦，劉大鈞，李景漢及余。本會會長一人，副會長七人，由到會會員公舉，人名與國籍列下：

會長：A. Landry (法) 副會長：A. Arca Paro (秘魯)、Bodrin (意)、D. V. Glass (英)、Hersch (荷蘭)、A. Fred Lotka (美)、Salze (波蘭)，陳達 (中國)。

# 總結東北冬季之戰

凌華

(本刊特約北平通訊)

在寫這篇通訊之前，記者重翻了一下過去的報紙，溫習了一遍共軍這次冬季攻勢的開始、擴大，以至最近二週以來的演變。他們的攻勢是早有準備的，遠在去年秋天，就從河北各地農村徵集白布，據說運往東北製造冬衣。這次冬季攻勢就是著了白衣的白兵在白雲堆中的成績。陳誠總長對共軍的攻勢全未料到，對共方實力估計也有錯誤，如今陳將軍已由京而滬了，這裏一張報紙就他意見最高當局而見不到，就遞了辭呈，奉批「准予修養」，才黯然去滬的。人們愛把一切失敗歸於人謀，其實陳也不是能負一切責任的，政治、經濟、軍心士氣都有關係。我們在此試再溫習一下這次東北之戰的發展情形，當有助於對前方戰鬥狀況的了解。我們且先談鞍山之戰，再談營口之戰。鞍山失陷前後的情形，根據這裏一個報紙的專訪，是這樣的：

但經過六、七次攻勢，大家都習以為常，舊曆除夕(二月十日)在市內就隱隱聽到砲聲，然而大家仍照常過年。到了二月十五日，才感到共軍更近了，住在廠外的人都集中到廠內去，十七日，守南面的蓋平保安隊便退進鋼鐵廠內，大家更明白戰事不利。十八日自來水廠炸壞，樓內便沒有水了。國軍兩個重機槍連，便退到我們的製鐵學校樓上，守軍的指揮部也退進白樓。同時在鐵路東的研究所(也是三層大樓，是鞍山三大樓房之一)槍砲聲最烈。十八日薄暮時分，共軍便把我們的製鐵學校大樓層層圍住，最初並不打，吹着號角和口笛，勸守軍放下武器投降。指揮的人吹一吹號，共軍便大聲嚷：「老鄉們放下槍吧！」然而我們樓上的守軍，却不斷的以重機槍答覆他們的勸告，結果他們也就不再響了，開始由四面八方開始射擊，門窗玻璃都被打壞震壞，我們臥在地上一點都不敢動。十九日被圍一天，無大戰鬥，但路東研究所的槍砲聲却十分加緊，入晚則突然靜下去。

這時我們已經兩天未進飲食，因為沒有水，便利用澡塘中的穢水洗米做飯，洗米的水也不忍棄掉，因為不知再被圍幾天。十九日一直到夜十二時，對方並沒有槍聲，至凌晨二時，槍砲聲突然大增，同時樓上便有坍下的聲音，知道大樓已經中彈很多，槍彈由窗口飛進，打到對面的牆上，我們互相擁抱着伏在地上。到了四點多鐘，聽到人聲沸騰，在樓裏便有了互擲手榴彈和罵聲，不久便停止了。我們的門也在此時被打開，便有人問：「有中央軍嗎？」我們說：「沒有」。又問：「你們做甚麼的？」我們告訴說是老百姓，他們其中便有人說：「什麼老百姓？便放了一槍。因為沒有電燈，黑洞洞甚麼也看不見，後來把我們都趕出樓外，我們看見白樓也正在被圍打，人聲槍砲聲號筒聲十分悽慘。我們大約有四十多人，連男帶女大人小孩被帶到樓外東南面坐在地上。到了上午七時許，白樓的戰事也停止了，同時也看見好幾批和我們一樣被俘的人羣，被帶到各處去。後來來了幾個人開始檢查我們身份證，他們注意裏面是否隱有軍官和黨員。檢查完畢，我們請求釋放，最初不允，後來允我們去收拾東西。但是到樓裏一看，所有的東西被翻淨，

甚麼都沒有了。最後經過他們考慮的結果，把我們放了，在釋放前却得裝着注意的樣子聽他們的宣傳講演。他們說：「我們八路軍都是自願的，自己家裏就是一個弟弟，妹妹不願意也不要他當兵，所以你們看我們打的多麼好。」我們請他們給我寫路條(通行證)，他們說：「就說是一長勝部隊」放出來的就可以。我們被釋放後便跑到廠外朋友家聚點飯吃，等到飯做好要吃的時候，來了一個八路軍，他也加入我們一起吃。他說你們師長自殺了，市長被俘了，現在還有東鞍山兩連人不肯投降。我們在二十一日晨便悄悄逃出來。

「據一位廿四日跑出來的人說：鋼鐵廠的員工完全被俘，生命尚無危險。我走開時已被組織成連環保，經理保經理，廠長保廠長，工程師保工程師，送了一個別人負責，所以為了別人誰也不肯跑，因此他們已經得到了在市內來往的自由。據說共軍為了需要生產鋼鐵，已令軍要人員擬製開工計劃，鐵都鞍山就遷移移交了，僅僅是在九天的戰鬥中決定的。

更據世界日報載稱：「淪陷匪手甫三日」，鞍山鋼鐵廠就已復工。從鞍山逃出來的人員說：除了幾個工頭被工人「清算」之外，幾乎全體職員都沒有變動。鞍山共軍放回的人，已有百餘，但到平的只有三個，據說專家回來的很少。

關於營口的消息，平津報上比較少。從營口逃出來的人描寫營口之戰，那簡直就等於笑話。據說駐在營口的軍隊是由偽軍改編的，為暫編五十三師，師長叫王蒙，二月二十五日，他把營口市長、各局局長、各機關首領、各銀行經理、各商店主持，各人找去開會，人到齊了，王師長把他們關了起來。晚上營口大亂，兵士到處搶劫，第二天(二十六日)清晨七時，共軍就進了營口，不久王師長在共方「保護」下走了，兵糧大概也就此交給共方。共軍進入市區時，王師長還幫了他們忙，把全市警察都監視住了。

最妙的是這時各方面還不知道這事，葫蘆島方面派了一個登陸艇運了糧彈去接濟營口，到廿七日下午六時許還在下令催促「速進營港」，進了營港，方知已成俘虜，「王師長」也變成「共匪」了。在死傷及失蹤二十人後，乘國機轟炸才逃出營口，途遇海軍水定艦，才到塘沽，不久修好將去上海。該艦是「招商局中一〇五號登陸艇」。現在把該艇正式發表的遇險經過轉抄於下，想來大部份是真實的。

「本輪奉命由「北極一號」及趙課長會同汪連緒官指揮，在葫蘆島裝軍米五千包，汽油三十八桶，榨菜三百二十八罐，食鹽三十七包，彈藥三十噸，在二月二十六日十三點四十五分，離葫蘆島開營口。由汪連緒官及押運員王、顏、劉三人，士兵九名，在被冰船北極一號領行下同往。二十七日十七點到達營口港外下碇，自離葫蘆島，即與營口電台連絡，但不得要領。十八點廿分接獲葫蘆島港口司令部電示：速進營港。二十八日夜半六時三分，起錨進港。十時因遠河冰厚，無法前進(冰厚約六、七尺)，于四號岸標處慢車與北極號尾後附近保持接觸。趙課長及押運員二人先行登陸。十三時三十分發現右岸三里之地有二十餘番號不明軍隊荷槍監視，十四時後又來番號不明大批軍隊，由趙課長等三人帶領前來，在船旁佈崗。本輪因其形跡可疑，先令趙課長上本船，但不得要領。趙課長即上北極。十四時三十分，本輪乘退潮倒車轉頭退出，再候命令。但同時砲聲四起，集中本輪射擊，經數分鐘之

久，北極道過船頭，並由趙課長用無線電話令立刻停船，否則要開砲。汪連緒官仍深信岸上我軍因需糧情形迫切，致有此舉，乃令船上人員放心，強令本船停車，遂擱在冰上。十四時五十分由領事館派員同王師長（共匪）領事部隊，經北極道登船，由王師長談話後，方知已成俘虜。船上電台即被強制停止工作。同時並開始擄奪本船公私各種物品。十七時開始卸米及彈藥。

二十九日六時，報務員盧家順首先被押登岸，同時汪連緒官押運員三人士兵九人亦被押離船。

十七時五十分在被共匪監視下由共匪領港駛離營口，經復州灣往大連。後因北極道被冰所困，本船再返營口，繼續被卸米。三月十一日十一時五十分再度被追離營口往大連。十三時四十分因潮水不足，在營口外第三浮標拋錨，是時為第一次被我軍飛機偵察，旋即飛去。同時本輪大副孫基博因不堪共匪威脅而神經失常。後再繼續航行，子夜時因海面冰厚，船身無法前進，便由北極道令回航營口。二日八時四分，又在營口卸米。

務生兩名及大副（因神經失常）亦隨共匪登陸。十四時三十分共匪去盡。當救火之際，船員見有機可乘，一方面設法滅火，一方面不顧共匪砲火密集射擊，以全速後退。當時轉舵器被炸傷，電路不通，失去效用。幸兩部主機電燈機及迴旋羅盤尚未損傷，乃靠兩部主機前後操縱方向。不幸十五時二十五分因潮水不足，在港道第三浮標擱淺。

十五時五十分再度被我軍飛機轟炸，大船中彈，汽油被焚，機槍不停射擊，因之三管輪卸人（浙江鎮海人，二十四歲）、看艙陳玉唐（湖北漢口人，二十六歲）、服務生周寶根（浙江奉化人，三十三歲）、水手馬寶華（天津人，二十二歲）均因救火而被炸死。木匠王永發、洗衣匠何世福、服務生張濤洲等三人亦因救火受重傷。三副謝鳳澤、服務生陳楚洲二人亦受輕傷。十七時四十分因漲潮而脫險。在港道不熱、舵工水手全無、前艙漏水之惡劣情況下，幸全體餘生者抱與船共存亡之決心，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毅力，在全體合作精神下整夜工作，最後卒皆脫離虎口。

三日四時五分被水定艦發現，因不明本船真況，開砲射擊，廚房首先著彈，幸彈未爆發，未有死傷，否則結果亦不堪設想。當時全體員工以為係共匪指揮駕駛北極道來，心灰意冷，致有自殺之意。至六時一分發現水定軍艦燈號，全體員工始拍手稱慶，再獲逃生。

十一時五十分經海軍二名軍官登船檢查，及詢問真象後，四日下午由永定軍艦保護，在「濟平號」拖輪拖駛下，五日帶到葫蘆島。七日上午六時，由「濟平輪」拖帶開來塘沽，於八日下午二時五十分到達，靠招商局東碼頭。招商局塘沽辦事處備有大批慰勞品送到船上慰問脫險人員。死者棺槨，擬於明（九日）上午十時舉行公祭。

還有一報登了遼陽失陷後的消息：

「綜合各方面的消息，似乎是八路軍進遼後，前三天隨便出入，許多人都趁這個機會逃了出來。三天以後，政工隊來了，按圖索驥，把二十幾個有資格被清算鬥爭的人先後解決，以後怎樣，就不得而知了。」

那麽瀋陽怎樣呢？「瀋陽外圍據點，眼看一一遭遇着不幸，瀋陽市民知道時局是嚴重了。但大體說來，大家都很鎮靜。軍事當局固然承認困難，但對瀋陽城防很抱樂觀。老百姓照常奔波他們艱苦的生活。舊年以來，物價尚稱平穩，但各機關裁

員，工場商店紛紛到閉的結果，使多數人生活沒有辦法。機關照常進行工作，而辦公室工作精簡極低，大都為個人的身家、安危、生計憂慮。」

在瀋陽的人有兩種。一種是想走的：「比較有錢的人都在想盡方法要離開，因此民航機平瀋線三十萬元的票價就有了一千萬的黑市，因為買票而被騙走金元寶的事也屢見不鮮」。另一種是走不了或不想走的，則幻想着奇跡，「瀋陽又流行着種種傳說，而其中最驚人聽聞的，莫過於張學良出山之說。有人說：中央經過相當的考慮，認為挽回目前東北的頹勢，最好的辦法是讓「九一八」前東北的主人張少帥出主東北軍政大計。張軍前些時候去臺灣，就是去徵求張的同意，結果張不肯。於是馮庸又去，大概也沒有什麼結果。這一次張作相萬福麟馬占山等東北元老應召去京，主要的任務也是在勸駕。截止到現在，這種傳說還無法加以證實。」

對他大發牢騷，到最後孫自己也要牢騷起來。有一張報這樣描寫這些撤退人員，標題是：「資委會如此撤退，數百人待斃故都，——無食無住，當資皆空。」原文如下。

「這是資委會東北工廠人員撤退中的一支插曲，他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片小波瀾，不過官場裏的「推諉」、「不負責」……和「裙帶風」却已經表現無遺了。」

東城甘雨胡同同撫順礦務局北平通訊處，住着從撫順礦上撤退的一批人員，不算家眷，僅僅職員（中級幹部或中級以上幹部）共有二百六十多人，他們差不多都是從事工礦事業若干年的老手，其中以四川人為較多。他們在「撤退」的名義下撤退到北平來，但資委會原令的「撤退」，經撫順礦當局加了一層修正之後，變做「自動請辭」或是「自請停薪留職」，並決定在礦工作一年以上的按十二月份的薪額發給一個月的薪金，二年以上兩個月的薪金，姑且做為遣散或是撤退費。據他們說：這和阜新礦、烟台礦、東北電力局等機構的撤退辦法不同。同時其他單位撤退的人員，現在有人招待食宿，並且按月發薪。他們呢，除了少數的人以外，大家都擠住在通訊處，幾十個人擠在一間屋，睡地板，沒薪

水，沒人管飯吃，大家幾乎都是當賣度日，尤其大家公用一個爐竈，每天須排隊按班燒飯吃。所謂「少數人」和礦當局有私關係的人們，因人事關係獲得了優待，現在住X招待所，漂亮的建築，溫暖的春日的宿舍，並且有人款待吃和喝。

還不幸的一羣，他們要向社會控訴，更呼喊不平，其中X先生提出：「為什麼礦當局強迫我們自動辭職和自請停薪留職！我們幹工礦多年，我們是技術人員啊！」另外幾位補充：「我們帶着老婆孩兒在瀋陽等飛機，暫住倉庫，睡冰冷屋子，但與礦方有私關係的少數人却住鐵道賓館。」

坐飛機應每個人限帶十五公斤行李，但少數人可以帶五六十公斤的東西。——寥寥無幾的遣散費（一個月薪約二十餘萬元流通券）在瀋陽等飛機就花光了，我們不得已只好賣東西，連有關工礦的科學書籍也賣了，一斤書才賣流通券八百元，只頂一個燒餅的價。」

只在原則上答應他們「擇優設法安插，餘者贈予路費送回原籍去。」

現在通訊處主任陸建勳跟他們三月底以前搬走，他們正在焦急的情緒中等待着資委會當局的最後答覆。

到了三月二日，這些人都去找孫越崎請願，早晨下午去兩次都未見到。他們的聲語是「我們要工作」，「有飯大家吃」，「請拿出供給高級人員的奢侈享受來維持我們最低的生活」。晚上八點，有五十幾個人見到了孫越崎，「孫氏劈頭便對他們貼標語的舉動，大發雷霆。

並且說：「這次原想抽出時間來看看你們，但是後來竟得知你們貼標語，我感到極度的悲哀。沒有看到我，便先罵了我一頓，你們對得起我嗎？」他的聲音愈發大起來了，震動屋中每一個角落。

請願的每一個人都屏住了氣息，靜立在那裏。孫的語調由激昂變為沉痛了。他說：「請你們想想，我爲了保障你們的安全，耗費鉅款，包了飛機，把你們運回安全地帶，我不知受到了多少的申斥與責難！假如我是失去了良心的人，那我滿可以仍舊把你們放在撫順不管，或者在當地把你們遣散。然而你們竟如此對我，真使我難過。」……他又說：「我在來平之前，曾從南京到上海，從上海又到湖北、湖南

，到廣州，到香港，輾轉地來到北平。我不願危險，在空中飛來飛去，還不是我看到東北的工業已經無法開展，而想到關內各處找事業，爲你們安插工作！來平後對你們的招待很壞，我知道，同時我也曾責備過主管人。現在我願意聽聽你們的意見。在他這種「威德兼施」之下，大家還要餓死，誰還發表意見呢？於是決定改就「書面意見」，這意見也就客氣得很了。對這書面意見，孫越崎說：「仍將按照會中決定的兩大原則來處理，也就是：一，儘量安插至平津及華南等地工作，二，對過去工作成績不良，能力低下的職員裁撤後遣散。」

有一個記者訪問孫越崎，問答如下：「東北工礦的損失，估計能有多少呢？」

「這簡直是個天文數字，以美元計算，約達一百億以上。這些工礦被毀以後，我國重工業的發展，只有一條路，仰仗美國的援助。資委會上半年對全國各工礦投資國幣六千億，而交通部對一條粵漢路就投資四千億，所以數目聽起來雖然很大，但實際上單位過多，分配出去，也就沒有多少了。」

「華南工礦的開展是否也已經有具體的計劃了呢？」

「有的，現在在研討中。」

「外傳孫先生到香港去，曾與章伯鈞等見面，不知有

沒有這回事？」

「這怎麼能鉤，我到香港只是去玩玩而已。」孫先生在搖頭嘆息中，結束這一段話。東北工礦前途依然一片厚霧。

## 從隴海一「線」看華北全「面」

張青萍

（徐州通訊）北方在陣痛中。以都市人的眼光看北方，不寒而慄；發生戰亂的地方，人人過着牛馬一樣的生活，都變成了破家。少年人慨歎自己生不逢辰；老年人會順口說出一「還不如早死的好」的話；壯年人像玻璃房中的雀子，鼓足勇氣，到處碰壁，結果不免還是頭破血流。慣於傷感的人，在這兒會把神經搞壞的。記者於去年返歸北方故鄉，半年來的見聞特多，現在記述如下，想爲關心北方的讀者樂於知道的吧。

（徐州通訊）北方在陣痛中。以都市人的眼光看北方，不寒而慄；發生戰亂的地方，人人過着牛馬一樣的生活，都變成了破家。少年人慨歎自己生不逢辰；老年人會順口說出一「還不如早死的好」的話；壯年人像玻璃房中的雀子，鼓足勇氣，到處碰壁，結果不免還是頭破血流。慣於傷感的人，在這兒會把神經搞壞的。記者於去年返歸北方故鄉，半年來的見聞特多，現在記述如下，想爲關心北方的讀者樂於知道的吧。

天四平又在打着，不由我們想起上次守四平的名將陳明仁，報上一度說東北行轅要辦他食污，可是謠言到底是謠言，他是國府的中將參議了。在四平戰死的韓師長，家居北平，貧困已極，孩子因窮自殺了。社會上一片惋惜聲，韓師長的卹金三千元最近才發下來，可以

一下，再行交戰了。這兩天報上范兵團、台灣新軍和李彌隊伍北上的消息熱鬧得很，但是台灣軍隊北上消息迄今仍是傳聞，李彌的第八軍北上還未定期，傳作義一部份軍隊才出關，而保定却又大打起來了。東北的情形很快又要有了新的發展的，「換季」原是很簡單的事。這兩

達着這種年景，路局方面常常抱怨，據說他們一月要賠本十數億元，國營事業貼補辦法非常煩瑣，再加以工作人員無紅可分，因此前些時京滬報紙曾傳出隴海路不擬予以修復的消息。

然而隴海路畢竟在掙扎着。但在戰爭影響下的人心，是在怎樣地變化着啊！以最近修復的徐商段而言，工程真馬虎得怕人。按普通修路的程序是先築路基，然後鋪石，鋪石子，洒路渣，最後再鋪枕木，敷鋼軌，因此鄉間至今還流傳着一寸鐵路要一寸高的銀元才能修成的佳話。而這次的搶修鐵路却是這樣：去年十二月起，動員沿路村莊百姓填平共軍所挖壞的路基，隨便倒上路渣，就把全新的標記着USA或CANADA字樣的枕木放上去，再將以往磨光了的路軌左右對調，於是二月一日

便通車了。而實際上所謂通車不過每天對開混合列車一次，車行速度減低一半，從前走四小時，現在八小時未必能到。而且一月二十九日首次試車時，礮山到馬牧集百餘里中，火車曾出軌八次之多。

### 癱瘓中的隴海綫

漫長的橫貫華中平原的隴海綫，正在患着半身不遂症。潼關至寶雞始終完好，寶雞至天水剛剛通車不久；除此以外，潼關段在陳賡渡河後就癱瘓了，汴鄭段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於元月通車，

現在在研討中。

打算把沿線三十里內的八路



趕出去，但終因犧牲過重而中輟。剛剛修復的徐商段，通車不過一月，已經遭到兩次破壞，一次在楊集，一次在馬牧集。在黃口，記者曾邂逅一位客商，他告訴我，三里以外被八路檢查的故事，我聽着，舉目望四野，那靜得連鷄鳴犬吠聲都是非常稀疏的村落，不知是在那個政權下過日子？

### 戰事如何在六大重點之間進行？

隴海綫的戰事常常在冀魯豫邊區進行，而這個地區的仗却是最難打的。有名的方先覺部、十一師鮑羅部、張鳳軍部，都在這裏垮了。現在雖然誰都知道曹縣是八路担架隊訓練所在，魚台金鄉是其軍隊整訓所在，考城是其補給地，但是誰也沒有什麼辦法對付它。過去黃河等於四十萬大軍的兵力的話，經過戰火的考驗，已與事實不符了。陳賢部正式南渡之前曾兩次從新安偷渡，擄走了鎮長和小學校長；而去年七月一日劉伯承的南渡，則實在一夜中完成，橫渡時間僅須二十三分鐘。然而這並不是說天變變樣了，只是說明兩方力量的消長而已。

旅長，說陳毅一個縱隊經徐州向睢寧靈璧。旅長聽說之後，立刻告辭歸去，當他到縣城之後，縣黨部、團部、商會、行政當局都準備逃走，當下他奮怒異常，立刻下令，凡逃走者就地槍決，同時以電話通知各團體機關代表開會，限於三日內完成防禦工事。到第四天，陳毅的軍隊兵臨城下，實際上却只有一連人護送棉衣到皖南去，他們放出一縱隊的空軍，原是唬嚇保安團的。戰爭開始了，共軍衝鋒攻城繼續了三天，守軍損失了大半，共軍完好的也只有五十幾個，最後共軍從原路退回。這個人少將參謀感慨萬分地說，是我們戰鬥力降低了呢？還是八路戰鬥力提高了呢？為什麼他們一連人竟敢和我們一旅人打仗？

但仗也就這麼打着。據一位流亡地主說，八路攻佔城池是用人命去換的，他們平時吃得很好，等到吃好飯菜時，大概就要打大仗了。他們攻城，如果該城沒有「天塹」，便用幾個人背負黑色炸藥衝向城牆，拉引線，一次炸倒幾丈，大軍衝進，如果該城有天塹，便用雲梯攻城，隊伍在雲梯炮火下衝上城牆。這些負炸藥和爬雲梯的人常是九死一生的。有一次，三個八路在那地主家中吃大肉，其中兩人送一位「同志」去「光榮」去，意思就是說作敢死隊，而他們居然若無其事地吃着，談笑着，毫無死的恐懼，這是這位流亡地主所驚訝的。

半年前，記者曾會見一位剛自山東回徐的副旅長，據他說，在隴海綫的國軍中，除了少數精銳部隊，如傘兵、第五軍、機械化部隊以外，大都以守城為主，到一個地方先修碉堡，白天出城打靶，晚上進城，六七點鐘就戒嚴了。訓練呢，仍是老的一套，開頭幾個月照例是立正稍息，變換隊形。而八路却一開始就打靶，決不把在檢閱中被人稱讚算作光榮的。

### 統治人物與地主階層

去年十一月徐州發生一件哭笑不得的事。當局檢查自大別山寄出的信，發現有稱讚劉伯承部「真正是秋毫無犯」的，當時檢查機關預備把受信人當作「共黨嫌疑犯」加以逮捕，但在同一天又檢查出一封自不同地區發給不同受信人的另一封信，內容與全相同，於是陸總部認為並非故意宣傳，即將原信扣留，冠以訓戒式的傳聞命令，兩封信便在各機關旅行起來。

馮氏負責。據說商邱某次會議席上，有某副總司令會沒頭沒腦地責難專員公署、縣政府、縣黨部和縣參議會。縣參議的議長也真胆大，他侃侃而談地回敬了一炮，他說：「匪軍合作的道理。他說：『匪軍有許多優點，是我們要學習的。他們借用民物，開口大娘，閉口老伯，雖然是假惺惺，但老百姓喜歡這一套，我們的軍隊要學一學，不能開口罵人，動手打人。』」接着說：「他一套慣用的邏輯，把他那套長得面紅耳赤，他說：『凡是不和國軍合作的，疏忽職責的（指縣黨部未辦理民盟自首工作），故意刁難的，統統危害了建國工作，危害建國就是民族的罪人，就應該與奸匪同罪，軍法從事。』」會後議長立即召開參議會，主張自動解散，「民意用不着，要它幹什麼？」這番風波到現在總該平息了吧，但這裏的當然不會是軍隊方面。

據一位從戰火中流落出來的中學生說，火線上的隊伍才奇怪。軍隊佔據了校舍，用學生伙房的鍋鏟馬，要講一句話，他們就說：「打八路是打自己人，打你們學生還不一樣是打自己人？」有一個機會，記者曾訪問過一個醫院，醫院中住的大都是內戰英雄，也就是共

了，他（姓王的地主）怎麼辦呢？他說，那還怕不給他小舅子的地分光！

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出純粹的農民的變化。共方自去年起進行「土地改革運動」，這從一批批流亡地主的口裏可以知道，這些消息的不脛而走，自然給貧農們一個啓示，更何況現在在碭山二里外小村中還保留着共軍用煤煙燻成的標語：「窮人團結起來才有飯吃！」

在今日各個階層中，真正的悲觀主義者應當首推地主的。由於方便的緣故，記者曾接觸過不少流亡地主，而他們沒有一個不怨艾，不悲觀。今日情形，北方地大大都瞭解分田是無法避免的，他們吝惜土地是一回事，但最使他們害怕的却是「鬥爭」後的「參軍」。在八路手中，他們無法賄賂逃避兵役，同時誰也不敢担保自己沒有被當作鬥爭對象的可能。在這種情形下，他們逃走大吉，把不得已的信賴交給國軍。但脫離土地的地主們就像魚離開了水，首先他們需

要救濟，他們大都只帶了兩三個月的口糧，而政府給他們的却是幾次「戡亂大會」，呼呼口號而已；不僅如此，他們還得負擔力役，所得報酬也很微薄，地方當局偏還不信任他們，怕有「奸匪」潛藏。

落魄了的地主們，失望之餘，拋棄了原來的生活和願望，有的把輜載到眼窩上，推一輛驢車出賣氣力，有的作小販，擺地攤，也有賣掉子女的。地主階層的蛻化，實在是值得注意的。

每一件值得報告的就是流亡地主們在逃時大都帶着地契，他們在市場上公開出賣，每畝只收三十萬元，折合麥子只有大斗七升。這折交易，據記者所知，成交甚少，誰也不願把現錢放到不知的地方去。這在綏遠區或非綏遠區，都是一樣。徐州附近自稱有眼光的地主也在競相賣地，但仍很少有人問津。

陣痛期中的北方，滿身都在瑟瑟着，到處是災難，到處是痛苦，期待着一個新生命的降生。

## 「新第三方面」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裴仁

（北平通訊）三月一日，北平有一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宣佈成立，並在歐美同學會開成立會。這個組織醞釀已逾半載，北方的吳景超（吳是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戰時在經濟部戰時生產局等機關做過官，苦於不能發展，才又回學校來），南方的錢昌照、蕭乾，都為這事出過大力。後來北方的周炳琳、潘光旦，南方的邵力子，都曾支持過這個團體，有助於這團體的組成。

北大教授加入這團體的，有周炳琳、朱光潛、楊振聲、樓邦彥、馮至、錢端升（在趙邁、馮至、錢端升（在美）等，清華方面有吳景超

、潘光旦、劉大中、費孝通等，燕京有翁獨健等。中央研究院的陶孟和，政府人物中的錢昌照孫越琦邵力子，實業界的吳蘊初王崇植董冠賢等，都是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會員。

開會時，周炳琳提議錢昌照為臨時主席。錢昌照致辭的原意如下：  
「諸位先生：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今天正式成立，兄弟承推擔任臨時主席，謹將本會的經過及意義簡單的報告一下。  
中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各種大問題非常複雜，空氣混沌不清。一般人民感覺十分徬徨，十分煩悶。

去年夏天起，教育界、輿論界、實業界、金融界的許多朋友時常討論這些問題，到了十一月，我們覺得有成立一個會，共同研究這些問題的必要性，名稱定為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特別在民不聊生的今日，有些人不免把我們看作迂腐。另一方面，對於社會團體向來抱懷疑態度的人，或許又猜測我們於「研究」之外，說不定別有用心。在今日情形之下，懷疑猜測乃是極自然的心理現象。我們認為研究如果離開現實，當然容易遠於迂腐，但是處理現實而沒有研究基礎，一樣也是盲

人瞎馬。中國距現代化的階段還很遠，若干現代化的先決問題還得徹底研討。誰能準確的說出中國有多少人口，多少土地，多少礦藏，多少森林？誰會精細的計算過中國的國民所得？然而這些事實都是有朝一日建設真正開始時所必須知道的資料。此類研究工作遲早必做，而且是早應該做的。

至於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對中國各種大問題加以分析，在黑暗中為民族摸索一條可能達到光明的途徑，乃是我們分內之事。若謂藉此參加政治或組織政治集團，則我們並無此心。凡是有功人類的革命，應該像一樹

花，思想基礎好比枝葉，人民幸福的增進是果子。中國過去革命之失敗，失敗於思想基礎不夠深厚。建立思想基礎，乃是本會成立的唯一動機，而本會的工作亦將停留在研究階段。我們研究的目的為全民福利，我們研究的方法是盡量客觀，我們研究的方式絕對公開。

我們真想尋求一條新路，這新路既不拘於國內已有人走過的途徑，也絕不隨着國際局勢的演變而輕易轉移。我們必須集中力量並與外界合作，根據全民需要，試畫一幅建設新中國的藍圖。此後本會的刊物、叢書、研究報告等等，都可算做那幅藍圖的初稿。我們希望社會上對我們這嚴肅而艱鉅的工作予以協助。

以上是本會開成立大會時的若干感想。至於本會的工作步驟以及目前本會對政治、外交、社會、經濟的各種大問題的著法或意見，留待會員大會詳細研討。倘有結果，定將全部公開，并請各方面指教。

接着是北平市社會局代表致辭，當然不外要大家對政府有所貢獻一類言語，不必多引。代表致辭之後就選舉理事，結果是周炳琳、錢昌照、吳景超、孫越琦、潘光旦、劉大中、錢端升、陶孟和、王崇植、樓邦彥、馮至、邵力子、吳蘊初、董冠賢等。錢端升在致辭時說，他對人與獸比較大，潘光旦先生說，他聽了五座談會時代，實業界的人就該和自由主義者

聯合起來，發揮一點作用。有幾位善於幻想的先生大概也很有興趣，但大多數人對錢昌照的調查國民所得之類的大問題，恐怕不見得會與高深吧。

美國人的反響還不知道，但甚為讚賞且有若干淵源，則可想而知。請看司徒大使半個多月前的話：

「余曾稱在中國目前面臨如此最嚴重之形勢時，凡愛其國家者尤其曾受教育之愛國人士，似有一極大機會與責任，以策策軍力研究何者為國家之問題，且喚醒並指導全國人民，俾使渠等得以實現民主政府，如是知識份子對於政府不信任之處必能消失，從而支持政府，謀致中國和平之努力。……余以為此輩人士可超一新黨，而對政府作建設性之批評，亦可超成若干團體，以倡導若干有關改革之主張及進步之運動。……余對若干大學教授對政府之消極態度至感驚訝，當此美國人士充分注意振華問題之時，彼等期望能在此政府支持之下發動一此種進步的運動，美國人民對此期待頗殷，俾其援助可得到最大效果。」

也再三提及。吳說錢是向實業界捐來的，是否這樣簡單呢？北京大學一個「北大人」壁報上有一段消息說：

「一位資源委員會造紙廠的經理告訴別人，單遣一個廠就被他們的副主任委員孫越崎下令捐一百令紙，其他的廠也都是下令捐。」

二日會員大會之後，三日招待記者，報載情形如下：

「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三日午後三時，在歐美同學會舉行記者招待會，出席中外記者二十餘人。該會負責人錢昌照、吳景超、周炳琳、蕭乾等二十餘人亦均與會，由吳景超報告二日會員大會之決議各項，吳氏並表示該會為學術研究團體，研究方式絕對公開，非政治團體。二日會員大會中決定對會務推進之工作中心，分為下列四項：(一)發行「新路週刊」，編輯部已由理事會決定組成五人委員會，由吳景超、錢端升(錢氏未回國前，由樓邦彥代理)兩氏負責政治，劉大中負責經濟，蕭乾負責文藝、外交，吳景超負責社會，將於五月間世。(二)成立圖書資料室，在經濟人力範圍以內，將定購一批國外圖書雜誌，並供給平市一般學術研究機關之參考。(三)基本研究工作與國外各研究團體共同合作，從事各項基本問題之研究。」

(4) 成立出版社，以服務讀者作為目的。該會於會員大會中選出四十餘人，集中討論該會對中國前途之主張，計分政治、外交、經濟、社會四項，共三十二條。吳景超表示：既非宗教之信條，亦非政黨之政綱，僅為出版研究之參考，以為週刊編輯取捨。……吳氏並表示會務即積極推進，新路週刊即開始辦公，該會經費除係會員所納會費外，即將發起募捐。」

根據外面的傳說，「新路」週刊的稿費每千字一百萬元起，另一個傳說是以美金計酬。據說籌設中的圖書館，各方面的雜誌都有，館址就在東直門該會會所。至於三十二點主張，據吳說「這不是永久的，時時刻刻可以修正」；「社會經濟研究會成立的時候，原擬將經濟放在前面，後來覺得政治更緊要，把政治放在前面。」

原文如下：

(甲) 政治方面

- 一、我們的基本政治主張，是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會化。
- 二、法治必須代替人治，因制律人，而不因人設制，執法與制法並重，憲政尤重於憲法。
- 三、公務機關，於其法定職權內，應有其獨立地位，並對人民負法律責任。
- 四、文官制度必須確立。

除政務官外，公務機關人員不得作政治活動。

- 五、軍隊屬於國家，以防衛國家為職務，軍人不得干涉政治。軍人從政，應先放棄其軍人身分。
- 六、民主制度必基於政黨組織之運用。國內應有並立的政黨，互相批評與監督，並各致力於爭取民意的支持。政黨不得假借任何口實，施用暴力壓迫異己。民意的最後表現為選舉，政權的轉移，應視選舉的結果而定。
- 七、選舉應以區域為單位，人民所選舉的代表，負責行使政權。
- 八、地方自治之基本原則，應由憲法加以保障。凡地方自治事項，中央僅能在法定範圍內行使中央監督權。
- 九、民主政治，不應只重形式，並應注重行政對於大眾所發生的實惠。我們所要的民主政治，應保障人民基本自由與權利，務使免於恐懼，免於匱乏，免於壓迫，免於剝削。

(乙) 外交方面

- 一〇、我們主張以內政的協調，謀外交的協調。
- 一一、積極推行睦鄰政策，建樹獨立的對外國策。
- 一二、反對種族歧視，支援弱小民族，尊重其獨立意識。
- 一三、反對以戰爭為國家政策的工具。國際糾紛，應依據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以和平方式解決。我們贊成裁減軍備，並樹立國際管制制度，同時擁護健全的國際組織，使其成為真正解決國際衝突的機構。
- 一四、贊成國際經濟文化合作，及國際經濟文化機構的樹立。
- 一五、反對任何政府或集團操縱言論，從而造成國際間宣傳攻勢，妨礙國際和平。

(丙) 經濟方面

- 一六、我們主張國家應籌畫妥善方法，負責發展國家資源，實現全民就業，促成公平分配，提高生活水準。
- 一七、國家應運用各種合理的政策，積極促進我國經濟的現代化與工業化。
- 一八、全國土地，以全部收歸國有為最終目標。第一步應即規定私人農地的最高限度，超過此限度者，應立即收歸國有。對於原來地主，給以長期債券，以為補償。收歸國有的農地，或租與自耕農，或集體經營，視情形而定。市地應立即收歸國有，並酌予補償。
- 一九、農業之生產經營及農民生活，應運用國家力量補助其改進。
- 二〇、凡獨佔性及關鍵性之工礦交通事業，原則上應由國家經營。
- 二一、金融事業，應由國家經營。第一步應將國家銀行之私人股本立即收回，並簡化及統一其機構。
- 二二、國營事業，應以資源之充分與合時運用及謀全民之最大福利，為其經營方針。

(丁) 社會及其他方面

- 二三、國家賦稅政策，應以平均私人財富，創造國家資本，促進資源開發，維持經濟繁榮，及達成社會安全為目標。
- 二四、國家對外貿易政策，應配合國內經濟及其他生活方面之需要。
- 二五、歡迎不帶政治作用而能配合我國經濟建設的國外投資，在互惠的條件下，參加我國經濟建設。
- 二六、充實教育經費，擴大教育機會，並限期完成普遍的國民義務教育，使人民在發展才能的機會上趨於平等。
- 二七、教育應著重個性的自由發展，健全人格的培植，獨立判斷能力與正義感的養成，及服務精神的提倡。青年學生從事自動而公開的政治與社會活動，應予以贊助。
- 二八、我們反對一切歧視男女的辦法。在法律前，男女應絕對平等。
- 二九、國家應即制定現代的攸關勞工福利之立法。參照我國經濟情形，規定最低工資，最高工資，並對勞作環境的安全予以保障。
- 三〇、推行社會安全各種制度，使人民在疾病、失業、老年、殘廢等狀況下，不受貧困的威脅。
- 三一、擴充醫藥衛生設備，並逐漸推行義務醫藥制度，使人民在保健的機會上趨於平等。(下接第六頁)





# 附文

## 第二卷 第二十四期

文化的漸變與劇變……………劉緒胎  
 知識份子的彷徨……………馮契  
 傳統的舊官僚政治之覆敗……………王亞南  
 談「赤色的上海」(短論)……………丁楓華  
 北美重遊(九)……………陳達  
 通 傳作燕楚溪春應付臺北險局的軍政方針  
 榆林備戰·青島失事  
 訊 從北平審副總統競選

### 論短

## 談「赤色的上海」

丁楓華

上海這個花花洋場，久有列強「冒險家的樂園」之稱。凡在自己國內走頭無路的碧眼黃毛，憑着立志要做暴發戶的一股衝勁，再託庇於本國政府的支援與庇護，大抵可望空手而來，腰纏細軟而返。話說在當今一堆較享盛名的冒險家中，有一位與下走同行的英國人，姓伍德海(H. G. W. Woodhead)，盤桓中國極久，樂不思歸，竟於最近在香港星期報發表了一篇題目叫做「赤色的上海」(Red Shanghai)的奇文，已由本市三月九日的大美晚報予以轉載，值得一讀，尤值得仔細研究。

該文分為三段，而義理一貫。首段可說是導論，在拚命渲染中國共產黨的殘暴橫蠻之後，一語道破今日內戰形勢的實況，再說明政府軍隊的無能與軍事援華的難望收效，然後順理成章帶到正題：上海在不久將來有陷落而赤化的可能。中段承上啓下，為全文的骨幹，作者還特意以一虛構的報導「的小標題，憑其異常豐富的想像力，細心描繪出一幅樂園傾圮、化為鬼域的圖景，費煞一片匠心。於是他說：

「或許上海作為一個偉大的、近代的、工業與貿易的城市的日子，就此永遠終止了，在未來的歲月中，它將退化為一堆碎石。」

末段寥寥數字，却有千鈞之力，偏又含蓄而富於啓迪的意味。有云：「上海(單提這一座中國的大城市吧)是值得拯救的嗎？大多數的英美人士總會說Yes的，但是很少的人(假若有的話)能够推動一個切實可行的計劃，以防制紅軍在中國的進展。」

把文章粗略介紹完畢，我要談談「讀後感」。就「文章」而論文章，伍君的噱頭真好，尤其中段乃為一訴諸情感之作：共軍未來之前，第五縱隊橫行、工廠郵局及公用事業一概停頓、機器破壞、洋人橫遭搶劫、到處發生火警而不可撲救，於是英美政府被迫派來大批船艦撤退僑民；共軍既來之後，瘟疫猖獗、糧食奇荒、難民流落四野、幸免於火焚的教堂醫院與學校都變為紅軍的營房，「人民法庭」把白俄與大多數未能撤離的英美籍僑民執行了死刑，資本家或遭屠殺或供苦役，他們的妻子則做了共軍洩慾的器皿，不用說，人口是銳減了，全市一片慘象，入夜無光。試想這是什麼世界，什麼樂園，簡直化為閻羅地帶了。這幅圖景何等動人心弦，共產黨的面目何等猙獰！若無絕世才華、一代神筆、空前的創造本領，何能寫出伍君所寫的一個字來？然而猶不止此，伍君的這一段「訴諸情感」，目營心匠的佳構，就全文來說，還祇是陪襯之筆，其真正命意乃欲借此烘托上下文之間在言外的邏輯，發揮文化冒險家的「悲天憫人」的一濟世主張。久蒙青睞的中國同胞不能不深自警惕！

伍君在「訴諸情感」之外，又訴諸英美政界及商民的一理智。「或許上海作為一個偉大的、近代的、工業與貿易的城市的日子，就此永遠終止了」，這是不是非常可惜呢？就單提上海「這一座中國的大城市吧」，一是值得拯救的嗎？「No」。以今日中國內戰形勢的實況而論，以政府軍隊的無能與軍事援華的難望收效而論，還「能够推動一個切實可行的計劃，以防制紅軍在中國的進展」嗎？「No」。然而上海究竟是否「值得拯救」呢？當然還是「Yes」。

彷彿這就難壞人了。上文說伍君的文章有千鈞之力、有意在言外的邏輯、而偏又含蓄而富於啓迪的意味，即指此而言。其實我們不難索解，伍君真正的命意乃欲呼籲美軍登陸，直接以軍隊干涉中國。伍君誠不愧為一個文化的冒險家或冒險的文化人。

自來帝國主義者的入侵，有文武兩套法寶可使。先用客船載來寄生的傳教士與文化人，搞一套文的辦法，好讓商船載外貨物；如果商船上不了岸，則換上一套武的辦法，以軍艦載來兵卒鎗炮。此之謂先禮後兵。沒有貨物，則上海算不得「樂園」。沒有兵卒鎗炮，又不成其為「冒險」。帝國主義者最懼怕的就是奴隸抬頭；伍君那節「虛構的報導」的用意，說來說去，就在淺空製造恐怖，忠告美英政府與商民：上海不是咱們的樂園了，此後你們有錢人的貨物靠不攏岸了，我們走頭無路的一羣也不能空手而來、腰纏細軟而返了。怎麼辦呢？冒險呀，把軍艦開去吧。

但是做了一百年奴隸的中國人民，經驗的確太豐富了：樂園終必是樂園，樂園是我們的；你冒險麼？遲早回敬你一個冒險！

# 文化的漸變和劇變

劉緒貽

## 文化與人生的關係

用需要的觀點來解釋人生，我們可以說，人類生活的目的，在滿足幾種基本的需要。這種需要，因為性質與發生次序的不全，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生物的，是不學而會的；一類是心理的，是從社會裏學來的。生物的需要，籠統的說便是「活着」；分開來說，例如肚子餓了要吃東西，身上冷了要有蔽寒的物體，到了適當年齡要有性的滿足，身體不舒服的時候要求舒服等等。心理的需要，照林頓(Ralph Linton)修正湯姆斯(W. I. Thomas)以來的意見，大約可以分成三種：一是情緒的反應(如愛、贊美、賞識等等)，二是安全，三是新奇的經驗。(見他一九四五年出版的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Personality* 一書第一章。)籠統的說，便是要痛快的活着。據林頓的看法，以為就重要性而論，生物的與心理的需要，兩者沒有什麼不全；但我們的看法，則以為就大多數人而論，生物的需要是更基本的。因為人要先活着，然後才能講究活得痛快。所以大多數的人，到了要餓死凍死的時候，是要犧牲安全去革命的；社會上可以有大多數人沒有經驗詩人們歌頌的所謂精神的愛，但只有極少數的人才能完全杜絕性生活。人類到了最低限度的飲食男女之欲無法滿足時，別的一切只好暫時放下，這是事實。所以從發生次序或基本性而論，我們未嘗不可以說，心理需要是在滿足生物需要過程之中引導出來的。

社會上每一個人，在滿足這些基本需要過程之中，一方面，要牽涉到社會上其他人的生存權利與幸福；另一方面，又關係着社會的安謐與和平，所以人類在滿足這些需要的時候，不能僅僅憑着個人的慾望與意志，一定得通過一套「規矩和辦法」，在這種「規矩與辦法」的範圍內從事於滿足此種需要的活動，才不會妨害他人的生存權利與幸福，以及社會和平。舉例來說吧，男人為了滿足性的需要，一定要和女人發生關係，假如沒有一定的「規矩與辦法」來範疇這種關係，那麼，不管女人願意不願意，只要男人有力量，他可以強迫任何他所喜歡的女人滿足他性的需要，這樣，對於女人自然是一種痛苦。其次，男人和女人發生性的關係，除了少數的情形以外，不是沒有後果的(如女人懷孕等)。假如一個男人，不負責任，只顧滿足他性的需要，不管女人懷孕的後果，則不獨對於女人的幸福有妨害，對於生下來的孩子的幸福更有妨害。再進一步說，假如一個男子所看中的一個適合於滿足他性的需要的女子，正也是另一個男子所看中的，又假如他的力量大於另一個男子，則在沒有一定的「規矩和辦法」來解決此三角關係的情形下，可能發生兩種結果：第一是另一個男子壓制自己的慾望與意志，不和這個男子競爭；第二是和這個男子競爭，終因力量較小而不免吃

虧。此種事，如果發生得少，還只妨害少數人的生存權利和幸福；如果發生得多，社會上便決不能有和平。所以為了滿足性的需要，人類在不全的環境裏，創造出來了各種各樣的「規矩與辦法」，也就是各種各樣的婚姻制度，如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等等。通過這些「規矩與辦法」，以從事滿足性的需要的活動，才不會常常出亂子；人類才能安定下來，在滿足性的需要之外尋求其他的滿足。除了性的需要的滿足以外，其他各種需要的滿足也是如此。我們不能因為自己要吃，便隨便去搶別人的東西；我們不能因為自己要安全，便隨便去妨害別人的安全，在通常的情形下，一切需要的滿足，都是要通過一套一定的「規矩與辦法」的。一個文化裏這些「規矩和辦法」，有些研究文化學的人如馬格朋(W. F. Ogburn)等，認為是文化的核心。繞着或者通過這些核心，文化裏的其他各種部門如生產品，技術，文藝，思想等等，也爲着人類各種基本需要的滿足，各盡各的功能。在一個整個的文化裏，這些核心又互相配合着，爲人類全部需要的滿足而繼續存在，繼續發展，這便是文化與人生的基本關係。

## 文化和人類基本需要之間的失調

文化的產生，固然是爲了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尤其是文化裏的「規矩與辦法」，更是爲了大多數人需要的共同滿足，但是，在文化發展過程之中，往往因爲人類的情性、淺見、自私、愚蠢，以及其他各種緣因，人類創造出來滿足自己需要的文化，並不能滿足人類的需要；有時候，甚至妨害此種需要的滿足。大體上說，這種文化與人類基本需要之間的失調，可以有以下三種。一種起於我們上面所說的文化核心以及繞着這種核心的各種文化部門，不能適當的，合理的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這樣的例子很多，僅僅從吃東西來說吧，我們知道，爲了人體需要適量的「能」，我們的食物中應有適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其次，除了肌肉皮膚組織需要蛋白質，骨骼與牙齒需要磷和鈣，血液需要鐵以外，人體還需要許多其他酸類和礦物。但是，很少的文化，也許根本沒有一個文化，會供給人類一種食譜，此種食譜，包含適量的人體需要的各種物質。不獨如此，有時候人類食物中還包括一些與生理需要毫無關係或者有害的東西，如茶、咖啡、煙、酒、乾麻葉、可可葉、胡椒等等。上面這些食物，雖然有害，但仍不嚴重，其實還有些食物或者吃東西的習慣，是可以致人死命，或造成可怕的疾病的，比如印度人和中國南方人喜歡吃白米，往往造成腳氣病；從前中國人吃鴉片，最後總不免受害，這些有害於生理需要的食物與習慣，大家即使知道，有的也難改掉。除了吃東西以外，其他人類各種滿足基本需要的

文化活動，也常常走這種岔路子，大家只要翻開文化人類學的書籍，或者從我們日常生活中去尋找，就可以發現很多類似的例子。

其次一種文化與人類需要的失調，是由於人類往往盲目的服從文化，過度的尋求心理需要的滿足，而壓抑或犧牲其生理需要的滿足。這樣的例子也俯拾即是。比如因為我國社會看重貞節，於是許多沒有出嫁的女子，爲了要讓人家贊美自己的貞節，不惜守「望門寡」，「抱牌成親」；也有許多出了嫁的女子，在很年輕的時候死了丈夫，誓不再嫁，從前的人把這種故事渲染得冠冕堂皇，其實說穿了，還不是爲了一片虛榮心，犧牲自己終身幸福？又如我們重孝道，尤其是東漢的統治階級，因了當時的社會背景，更強調「以孝治天下」，提倡獎勵，不遺餘力，末流所及，大家因爲要得到朝廷旌榮、社會讚譽，於是有人爲了守喪出妻，有的人爲了過哀毀形，割股的風氣盛行，一直到唐朝中葉以後，連衛道的韓老夫子都有點覺得過度了，不得不寫文章來加以糾正。再比如，人類爲了要別人誇獎自己的美，常常不惜做出許多愚蠢的事。有些原始民族，或者在腹部、臀部、腿部、面部、唇部刻上繁複的花紋；或者在耳部、鼻部、唇部插入飾物；或者在頸項上戴上許多項鍊，使頸部移動艱難；或者攜帶過重手飾，使身體行動不便。不僅原始民族如此，就是所謂文明人，也是一樣。例如目前在美國，有不少的女孩子，爲了怕按着需要量吃東西有害於身材的窈窕常常挨餓。這些這些，都是人類變成文化的奴隸的例子。

最後一種文化與人類基本需要失調的現象，是由於文化中一部分人（往往是一小部分人），利用現成的（或者製造新的）「規矩與辦法」，以盡量滿足自己的需要，而剝奪旁人（往往是一大部分）對於其需要的滿足的機會。這樣的例子在人類歷史上和現社會中，恐怕更是數不勝數。比如說，中國的男人，爲了滿足其性的需要，除了在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招牌下討小老婆，在「風雅」的招牌下嫖妓女以外，還爲了要滿足其不正常的性心理，逼迫着女子纏足，天下還有比這更殘忍更自私的事嗎？又比如在古代的希臘和中國殷周時代的社會裏，一部分人爲了要得到更大的滿足，奴役另一大部分，從事於生產勞動，並盡量減低其各種基本需要的滿足，我們現在認爲是不公平的，然在當時，連亞里士多德那樣講理性的人，都認爲是天經地義，真是利令智昏。實際上，封建社會裏的貴族，神權社會裏的僧侶，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資本家等等，以及爲這些階級說話幫凶的人，都是直接間接有意無意的，創造或維持這最後一種文化與人類基本需要的失調的人。

從程度上說，這種失調的現象，又可分爲兩類，第一類是一部分人用一些特別「規矩和辦法」，剝奪另一部分人心理需要的滿足，比如從漢至清兩千年來的中國社會裏，皇家和士大夫合作，製造並維持一套所謂儒家的文物制度，在此種文物制度之中，除了皇家和士大夫以外，社會上其他各式各樣的人，頂多也不過在太平時候，生物的需要得到相當滿足，心理上的需要（尤其是情緒

反應的那一類）是很少得到滿足的。第二類是一部分人利用一些特別「規矩和辦法」，除了剝奪另一部分人心理需要的滿足以外，還剝奪其生物需要的滿足。比如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隋煬帝時候，宋徽、欽二宗的時候，以及唐玄宗、清乾隆晚年，整個政府腐敗貪污，驕奢淫佚，弄得全國老百姓吃也吃不飽，穿也穿不暖，這種失調，是最嚴重的，可以稱爲惡性的失調。

### 文化的漸變與劇變

既然文化在發展過程之中，因了人類的自私，愚蠢，惰性，與淺見，以及其他各種因緣，文化與人類基本需要之間，有許多失調的現象，那麼要使得文化不失其創造目的，時時刻刻均在滿足人類需要，而不妨害此種需要之滿足，文化的（尤其是文化核心的）變動是必要的。換一句話說，既然一個文化裏的「規矩與辦法」，不能滿足這個文化裏的人，尤其是大部分人的基本需要，則只有破壞這些舊的，另外建立新的，「規矩與辦法」。不過文化變動，至少要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能覺悟文化與人類基本需要之間的失調究在何處，此種覺悟，或是由於對於自我文化的檢討，或是由於外來文化的刺激與比較，是隨環境爲轉移的。

關於文化變動的劇烈性，爲分析的便利起見，也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小變、漸變、或者局部的變動；一種是大變、劇變、或者整個的變動。換一個觀點說，一種是個別或少數「規矩與辦法」的變動，一種是全體或大部「規矩與辦法」的變動。事實上，人類既然有惰性，人類的心理需要裏既然包含着安全，所以文化在通常的情形之下，總只有小變或漸變，個別或少數「規矩與辦法」的變動。而且，如果一個文化有高度的警覺性，川流不息的有小變動，足以補救這個文化裏全部或大部的失調現象，換句話說，足以使這個文化裏大部分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這個文化便不會（至少不容易）有大變或劇變，大部或全部「規矩與辦法」的變動。比如英國文化，自十六世紀以來，一直在慢慢的局部的變動，如宗教的寬容，莊園制的破壞，選舉權的擴張，因科學知識影響而逐漸增進的人性解放，隨工業革命而來的各種社會立法等等都是。所以英國文化，不容易產生像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那樣劇烈的，或者全盤「規矩與辦法」的變動。其次，如果一個文化雖有小變動，但此種小變動，不足以消除這個文化裏大部的失調現象，也就是說，不能使這個文化裏大部分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則積水可以決堤，這個文化是有產生劇變的潛力的；而且從倫理的立場說，也有劇變的必要，因爲一個不能滿足大部分人的基本需要的文化是沒有用的。不過，假如這個文化閉關自守，不和其他文化接觸，它往往不容易意識到自身的缺點及其不能適當的、合理的、公平的滿足人類基本需要的事實。因此，這個文化，也不容易有劇變或全盤的變動。比如自漢以來一直到清末的中國文化，從大多數人的立場說，簡直是一個否定人類基本需要的文化，我們的御用知識分子告訴人民清心寡慾，節儉樸素，聽天由命，換一句話說，就

是告訴人民靈量的誠心的減低生物與心理需要的滿足。他們甚至走到如此極端，說出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那樣荒謬絕倫的話；這種話，掉一個方式說，其實就是：「你要想適當的滿足你性的需要，最好連吃的需要都不滿足，就是這樣餓死了都算不了什麼的」。這種消極而否定的人生觀，是印度哲學容易被中國社會接受并加以發揚光大的基本緣因。可是反過來，這些御用的知識分子，就從沒有夢想着去積極的征服自然，增加生產的質與量（請參看觀察三卷十九期拙作「知識生活的偏向」一文），并尋出新的「規矩與辦法」，以提高大多數人的各種基本需要的滿足。其結果，我們民族身心健康的斷喪已到了一個十分嚴重的程度，只要是對於近代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生物學、生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稍有知識的人，是會一目了然的。這樣一個蘊藏着無數失調現象的文化，一直到海禁開放以前，我們因為沒有機會用其他文化的價值判斷來作比較，變得夜郎自大，認為凡是我們的都是最好的。不管割股也好，溺嬰也好，納妾也好，纏足也好，愚忠也好，高利貸也好，重地租也好，八股文也好，守喪出妻也好，抱牌成親也好，守望門寡也好，後宮數萬也好，敬神求雨也好，多愁多病也好，絕對父權也好，三從四德也好，男女授受不親也好，用陰陽五行之說來治病也好，……總之，不是天經地義，至少也是當然的不變的「規矩與辦法」，很少人敢對之懷疑或反抗的。因此，我們對於這個餓我們、叫我們變成怨女曠夫的文化（自然還有少數人有飽暖與縱慾的機會），便不會覺得有變動的必要，所以從來便沒有大變動，連小變動也是很少的。或者有人要說，中國不是時常改朝換代嗎？是的，我們也承認這是變動，但這種變動，只是統治者羣的更換，新的統治者羣雖然代替了舊的統治者羣，但其所用一套統治方法，仍然和從前一樣，沒有什麼變動，對於文化內容是沒有什麼影響的。所以朝代雖然換了，原來的失調現象仍然存在，一代一代的換下去，只有更加多的份兒。

（上接第十六頁）

我們再看李宗仁的競選問題。李宗仁自從傅作義來担任華北剿匪總司令之後，當然事情就更少了。他是比較老實的人，與「小諸葛」白崇禧不同，在目前的處境下，一方面無權，一方面却担了名義，當然不大情願，很想別謀發展。有些人說副總統競選者後面都是沒有人支持的，別的人我們不知道，不

過李宗仁的競選却頗有「巧合」之處。他的宣佈競選，在司徒上次來平之後，司徒在平與李接觸頻繁，更是衆所周知的事實。李宗仁第一次宣佈競選散發政綱，是在招待美國記者的時候，發出的宣傳品也是英文的，所以他的政綱也是外國報紙首先刊載，其中大概包括輔翼元首、澄清貪污的吏治、對外要睦鄰等等，而且特別提出他

在去年五月對學潮的「寬大」來標榜。這當然要比他人略勝一籌了，但顯然仍是完全根據於美國的要求的。可是儘管在北平香港若干報紙的「民意測驗」中，李宗仁佔了絕對優勢，儘管外國報紙也紛紛捧他，但仍未必能上台。他的競選不但未得到南京的同意，而且南京最初連知道也不知道。他突然宣佈競選，南京摸不清頭腦，傳說還派了人來看

又其次，還有一種文化，一方面，它的漸變或小變動不足以消除其中大部分失調現象，已有劇變或大變動的潛力；而另一方面，又和外來文化長期而深沉的接觸，引起了澈底的覺悟，於是人民要求大變動，將這文化裏的劇變潛力表面化，正如決堤救泛一樣，到了一定的時候，劇變是不可避免的。十八世紀的法國文化變動和大彼得得來的俄國文化變動，便都是例子。

### 我們當前的文化變動

中國因東西文化交流而產生的衝突，目前似乎已到了最尖銳的時候。面臨舊文化的消逝、新文化的誕生，仍有少數頑固的人認為舊文化大部分是值得保存的，這種人已將就木，用不着去管他們。還有一些人，一方面被傳統迷惑着，一方面也許是對於新文化理論沒有澈底的訓練，所以雖然能夠寫出些言之成理的文章，講出些持之有故的話來，說中國文化還須要慢慢的局部的變動，這種言論只是替我們當前的文化變動算八字，其所根據的仍然是陰陽五行的道理，實在難說是針對現實的科學討論。

如我們前面所說，兩千年來，中國文化沒有什麼變動，由人類的自私、愚蠢、淺見、惰性、以及其他各種因緣所造成的文化與人類基本需要之間的失調現象是數不清的，鴉片戰爭以來表面上雖有許多大變動，但實質上，我們的文化仍然是個封建的文化，這些老的失調現象，仍然深深的在我們社會裏發生作用，所以我們文化裏劇變的潛力是極其巨大的。而另一方面，自鴉片戰爭以來，由於與西洋文化的接觸，我們對於這些深沉繁複的失調現象，尤其是造成這些失調現象的文化核心——舊「規矩與辦法」——的缺點，日益覺悟，因此這種潛力也慢慢在表面化。然而就因為這種表面化的過程太緩慢，所以演變到了今天，我們的文化，已是個大多數人「吃不飽、穿不暖，甚至沒有正常性生活」的文化。這一種失調，便是我們前面所說的惡性失調。要挽救這種失調，只有劇變；既有了這種失調，也一定會劇變的。

到底怎麼回事。二十日北平報載，中央希望文人來做到副總統。事實上，當李宗仁派了人到南京去活動競選後，他已知道自己無望了，但他不甘心放棄，因為覺到這個人行轅主任做得沒有意思，所以如競選不成，則要職「歸去來兮」了。李宗仁這兩天在北平仍未停止競選活動，而且上海也有人代為進行。

預備在國民黨五中全會開砲，是否確實，則要待事實證明了。如果搞出一個文人，那位文人副總統又可能是誰呢？當然目前南京也還沒有決定。孫科原來會想做副總統的，後來看看國外輿論，覺到未必有望，所以只想做立法院長。但這次從台灣回來，才覺到自己可以競選副總統了，所以外間傳說三月廿八日國民黨會議中提出的副

總統候選人將是孫科。不過從今天到三月廿八日還有八天，到副總統的正式產生也有十多天，這裏面還有兩個因素可能影響孫科的競選的。一是國外方面對國民黨的提名會不會有新的意見，二是胡適會不會到南方之後改變初衷，競選副總統。兩件之中，如發生了一件，那麼孫科的副總統及立法院長可得而兼的希望，就會動搖的。（三月二十日寄）



# 知識分子的彷徨

馮契

「近來又常有人論及中國的知識分子。早被遺忘，且常遭輕視的知識分子，是又一次地受到了青睞。」——這是密勒氏評論周報上的話語，作者抄襲來作為本文的開端。

是的，「被遺忘」，且「遭輕視」！一向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現在却弄得一個大學教授的特遇，已遠不及一匹跟在貴婦人腳後根的哈叭狗了。知識分子之地位的墮落，就中國歷史說，是空前的。記得在什麼小報上見過一則幽默的對話：「甲問：『斯文有什麼用處？』乙答：『可以掃地。』」當「斯文」被認為只有一「掃地」的功用時，其被遺忘與輕視，是當然的。

但是為了迎貴賓，接高朋，裝裝面子，有時却也還需要把台階以至臥榻打掃一下。因此，知識分子「又一次地受到了青睞」。一「新第三方面」的「自由主義者」，一反司徒大使所謂「冷淡的態度」，終於團結起來，熱心於研究「國民所得」與「中國有多少人口？多少土地？多少礦藏？多少森林？」等大問題，儼然真對「政府作建設性的批評」了。

不過蒙「青睞」而熱心於「研究」的，畢竟是極少數。大部分知識分子，正因為被遺忘與輕視，而感痛苦，而滿懷憤激，而彷徨歧途，而謀求打開一條生路。態度「冷淡」，大抵亦是此種心情的表現，司徒大使正不必「奇怪」。本文擬就此種心情與此種現象作一剖析，故題名「知識分子的彷徨」。

## 一 古今

曾有一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彷徨於歧途。那就是「周室衰，禮法墮」的春秋戰國時代。原來，在「公侯伯子男」以及「卿大夫士」皆世襲的制度下，士雖只居上層的末位，飯碗却是不會打破的。到了春秋，這種世襲的禮法開始破壞，首先遭殃的就是士。譬如孔子，就是一個失去了一世營之業的知識分子。日夜栖栖皇皇，到處奔走，固然在於「行道」，却也在於解決他自己和他那一羣學生的飯碗問題。當時知識分子之感到苦悶而急欲謀一出路，是和今日相彷彿的。

其時有一中間層（包括商人、工場主、小地主、自由農民等），在「世田世祿」制崩潰的過程中，日漸生長而且強大起來。士和其他沒落的貴族，很自然的，也成了這中間層的一部分。而孔子既開私人講學的風氣，「王官之學」播入民間，受教育的人在一天天增加。作為中間層發言人的士，不久就匯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了。於是處士橫議，百家爭鳴，攻擊舊制度，提出新主張，推波助瀾，加速了經濟與政治方面的大變革，終於於形成秦漢的新局面。

此新局面，就社會構造說，有一廣大的中間層介乎上（封建主）下（農奴

）之間；就政治說，有一羣經由考選或徵辟而並非世襲的官僚，作為君主公侯等的助手，此亦即「新第三方面」所樂道的「文官制度」；而就文化說，知識為新士大夫（讀書人和官僚）所佔有，雖然秦始皇一度想燒盡民間書籍，仍舊同西周似的只贖王官之學，却也並沒有成功。

這個局面，自秦漢至於清末，數千年如一日，無本質上的變化。士大夫處此局面下，真是得其所哉。因為知識就是力量，有了這一法寶，進退自如，再不愁沒有飯吃。進，則以之為敲門磚，中舉應辟，可以做官而「行道」。退，則打開留聲機，做個教書匠，也可以美其名曰「傳經」。實在不得意，則歸田園居，「三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吟風弄月，也稱為「名士」。而有了一頂方巾作護身符，不但徵兵徵糧落不到頭上，即使犯了法，縣太爺也不好隨便用板子打你的屁股的。

如此「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士大夫便又攀着上層特權階級的尾巴了。雖然比上不足，對於皇帝或任何上級統治者上起奏章來，要稱「奴才萬死」；却是比下有餘，從小民眼光中看來，士大夫是天子所重的「英豪」，王者所敬的「師表」。舊日家庭中多供「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師雖只「敬陪末座」，然而其為人民所供養，是和君一樣的。

但是這樣的優越地位與平坦大路，自海禁被迫打開，就開始動搖了。至於今日，要想「兼善天下」以「行道」，已不可能；要想「獨善其身」以「傳經」，也極困難。富，已為豪門資本家所獨佔；貴，已為軍閥與黨國要人新包辦。知識與白菜蘿蔔同價，大筵席上已用不着它。

正如周室衰微，士首先遭殃；今日封建制度從根本崩潰，最倒霉的也就是知識分子。固然是四民（士農工商）一同受苦，但商尚能勉強苟延殘喘，工農則反正一直生活在地獄裏，只有士，是轉了一百八十度的方向。所以相對的說起來，知識分子是最傷心的一羣。本來十年寒窗，一舉可以成名，攀雲雲而直上，附驥尾而登天；現在却同斷了線的鴿子一般，倒栽跟斗，急轉直下，終至粉身碎骨，委於塵土，而且被主子遺棄了。

不過封建的官僚政治既然尚尸居餘氣，轉着往上爬的念頭的，自然還不乏其人。但是這條舊道路，已非常狹窄，容不了多少人，而且說不定走上幾步，前面還豎着塊「此路不通」的牌子呢。

## 二 中西

中國問題之複雜，不但在於新舊交替，而且在於中西交錯。我們被稱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這就是說，我們是被迫的半資本主義化了，而封建勢力

還殘存。打個比喻，就好像上海的摩登女子穿西裝褲子短棉襖，西裝褲子自然是西式的，短棉襖却又是國粹。

在以前，當我們完全是封建社會的時候，儒家教人做「通人」，道家教人做「散人」。蟒袍玉帶，則通達於朝廷；青衣小帽，則閒散於山林。不論「通」或「散」，對於一技之長的「一技」，却總是瞧不起的。所以說：「君子不器」，「散木無用」。無用之用，方是大用；不器之器，乃成大器。是以醫卜星相，君子不屑為；學圃學稼，孔子罵小人。士大夫只需讀經。經者，常道也，內則聖，外則王，進則通，退則散，這是施於四海而皆準的道理。

但是受了西洋的影響之後，我們的知識分子就有變化了。起先是所謂習洋務，到外國去學辦工廠，修鐵路和造兵艦等等。後來自己辦學校，也分門別類的有文、法、醫、工等科目。於是知識分子大多成了「一技」，翻譯做現代話，就是專家或技術人才。通人和散人是容易做了，內聖外王之道，留給御用哲學家去研究與發揮。不過既稱御用，則大概也同御筆、御床一樣，只有一種用途，而非無用之大用了。

在以前，士大夫雖也以為知識是奇貨可居，但畢竟和商品有點兩樣。儘管孔子說得很老實，「我待賈者也」，孟子也承認，自己是在「食功」；然而孔孟的信徒們，却總愛在買賣的關係上，披上件道德的外衣，如聲言「忠君」、「救民」、「行道」等等。因為國是家的擴大，君臣猶如父子，這怎麼能談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呢？而且「匹夫不可奪志也」，實際上，也真有一些收買不動的呆子。

這情形，現在也已大變。一切皆半資本主義化，知識自不能例外。連繫人與人之間的紐帶，只賸了利害關係，不必用溫情作裝飾，也無需用道德來點綴。任何機關要徵求人才或招考職員，只需登個報，言明待遇若干，供不供膳宿，分不分紅利，就馬上會有大批待價而售的知識分子去應徵或投考。政府之雇用公教人員，性質亦復相似。只不過價值大一點的買賣，總在「黑市」進行，局外人無法知其底細而已。

如上所述，西化的知識分子，既各有專長，似乎道路廣闊，要把自己的知識「出籠」，應該比較容易。但是，一則我們的西化只是局部的，被迫的，專門人才雖然造就得並不多，新興的事業却更少；二則我們還停滯在半封建階段，各機關的行幫色彩仍非常濃厚，如果沒有裙帶、黨團或鄉誼為媒介，要想出賣自己，却也不易找到主顧；三則戰爭從不曾停止，到今天，「一戩亂」如噩夢，「建國」成幻想，僅有的一些事業與機關，即使不毀於砲火，也要一天緊縮，以至於停辦。所以，知識分子的道路，在半資本主義化之後，反而越來越狹窄，越來越艱難了。

目前百貨飛漲，只有性命、勞力與知識三者，跟法幣一同大跌價。從純功利的觀點看來，知識之跌價，是最可傷心的。因為性命天賦，勞力天生；而知

識之獲得，在我們這個半西化的中國社會中，却必須投上一筆大資本（受教育的費用）。投資原望獲利，現在却弄得「偷雞不着蝕把米」，連老本也虧折了。這真是一樁太不合算的生意！山窮水盡，到了辛辛苦苦苦學來的牛頓和亞丹斯密，同五百塊鈔票一般，再也買不到一隻燒餅的時候，悲觀一點，自然只好把性命也賠上，如最近南開大學某教授自殺，便是一例。

### 三 上下

上文已提到，過去的士大夫「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也會表示，今日的知識分子是已經下降到最低層了。其實這不是知識分子獨有的現象，整個中間層都是如此的。

秦漢以來，中國一直有一個廣大的中間層，其力量足以緩和上下的衝突。在生活，中間層滿足於小康的局面，故祈求安定；在意識上，中間層主張「中道」，而實際常不免流於「一鄉原」。而作為中間層代言人的士，便右手拉着帝王的袖子，左手拍拍小民的肩膀，一面頌功頌德以媚上，一面又略為諷刺幾句以媚下。真是左右逢源，上下稱善，優哉！優哉！這副嘴臉，從今日若于自命為「自由主義者」的身上還可以找到，也即是魯迅用辛辣的筆描畫過的「二丑」。

但是這中間層及其知識分子，在二千年之後，為什麼竟顯得如此柔弱無力，狼狽不堪了呢？這是因為中國的社會在趨向兩極化，中間層本身起了分裂了。在分裂的過程中，自然也有些勇士，捷足先登，爬上了高牆頭。有眼光，能投機，善於看風使舵，則可得上下之利；有個漂亮女兒或妹子，嫁了閥老，則可擠於上之中；有流氓氣，能組織，能殺人，那就可以達到上上的地位了。至於隨侍趨奉，聽候使喚者，那只是走狗而已，並不能列入顯要的名單。等到「狡兔死」，還是有被「烹」的危險的。

但這上升的只是極少數。因為官職是有限的，而養養大批走狗，也要影響到國庫。極大部分的中間層及其知識分子，却由於禁不起打擊，而走下坡路了。打擊來自多方面。外有帝國主義，內有亦封建亦買辦的豪門及軍閥，聯合起來，通過種種的方式——傾銷貨物，發行紙幣，徵實徵購，……最後是戰爭及由戰爭而引起的通貨膨脹和社會的大混亂——向老百姓身上搜刮。窮人是早已連褲子也沒有穿的了，中產者到最後，也只好把他那件舊長衫脫下交出。

知識分子本來居中之際，有一些便宜可佔，如不必服兵役和免除若干的攤派。但也有很多吃虧的地方：他們原是靠上層的佈施而生活的，一旦被棄，就有點手足無措。此其一。向來勞心而不勞力，等到下降到必須用雙手謀生的時候，就無辦法。此其二。「通」「散」的舊路雖不通，傳統的幽靈却還在作祟，至少，一襲長衫是值得留戀的。有此顧慮，就越發躊躇了。此其三。半身西化之後，學到一技之長，假定你是學工的吧，工廠關門，難道你還能行醫不成？至此，專門知識反成了自己的束縛。此其四。

有了這些原因，就使得知識分子不但免不了跌倒的危險，而且在跌倒之際，特別顯得優柔寡斷，彷彿莫知所從。甚至弄得昏頭昏腦，呆頭呆腦，竟會作出種種意想不到的可笑的姿態來。

#### 四 左右

上升總是右傾，下降却不必即左傾。如果躊躇不前，那多半還有後顧之意，留戀着昔日的地位，心底裏在轉着如何重新往上爬的念頭。

然而大部分知識分子，的確是向左轉了。誰又能隻手挽此狂瀾呢？「新第三方面」恐怕也只有望洋興嘆吧！中國的知識分子，比較起其他國家的，是更前進。其緣故，可略舉如下：

第一，自然是因為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急遽下降。如上文所說，受了內外各方面的剝削與壓迫，生活困難了，甚至生命安全也受到經濟與政治的威脅。困獸猶鬥，而况人乎？即使在行為上不挺而走險，在思想上「挺」一下，總是應該的。

第二，人民的力量空前壯大，這就給知識分子指出了希望之所在。相對地說，中國人民的力量已遠勝過統治者，這是因為：一，下層階級從苦難中覺醒了；二，中層沒落；三，上層腐敗；四，國際民主力量繼續生長；五，國內民主運動不斷推進，形成一種不可抑制的一勢。所以很顯然，只有跟人民站在一起，才有出路。而人民却也很需要知識分子，因為只要善於運用，知識不但可以作攻擊敵人的武器，也可以作喚醒並團結民衆的工具。

第三，知識也給知識分子本身以啓示。作者於上文，對於中西舊傳統，皆有微辭。此地應該指出：我們也曾有過不少一以爲道的志士和主張「民爲貴」的先哲，而西洋更有民主、科學和社會主義。這一份寶貴的遺產，知識分子得從根本上首先和它接觸。因之比起一般不識字的老百姓來，知識分子反而是最先覺醒的。而資本主義式的學校教育，無形中又使學生有了組織。所以中國的革命鬥爭，幾乎毫無例外地是由學生運動發其端的。

但是知識也是一種束縛，傳統裏的毒素畢竟太多了。此點由上文所言，已可明白。所以知識分子做事總不容易澈底，就左傾者說，習慣了勞心，則不能行動；愛重面子，則脫離羣衆。遇事彷徨，還說些什麼內心矛盾呀，情緒不安呀。要割斷這一條尾巴，只有和人民接近，向人民學習，然後才能辦到的。

這一段尾巴，右傾者也難免，不過表現爲另一種形式而已。常見這個否認拿某某關老的錢，那個申言自己毫無做官的意思，半推半就，忸怩作態，這只有舊戲裏的花旦才能表演的。

#### 五 真偽

在今天中國，主義繁多，口號紛陳，簡直如萬花筒一般，使人眼花撩亂。此中真貨色固然不少，假招牌却更不勝枚舉。有真行者，便又有假行者；有真

李遠，便又有假李遠。這些假行者和假李遠，本來都是知識分子搞的玩意兒。不過既然搞出來了，受惑最深的，却又是知識分子自己。

遠一點的例子有偽古文尙書，蒙蔽了千多年的士大夫的眼睛，到閻若璩手裏才算露了原形。近一點的例子則隨手拈來就是：「民主」，「科學」，「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都在被狗屠作羊頭用。

若干知識分子之善於偽裝，有其一家學淵源，也有其現實需要。論淵源：知識本來是一種最好的文飾，其功用有時和脂粉相彷彿。在過去，上廟堂則歌一頌，歸山林則吟一風，這比豎碑掛匾，更可使門楣生光。今日之知識分子在口頭上諷頌「民主」之類，其作用亦復相似。論需要：識時務者爲俊傑。以知識分子之聰穎，當然能明白大勢之所趨。談談「自由主義」，喊喊「土地國有」，則可以廣收民心，借此自重，其該蒙「青睞」，自是意料中事。

而其他知識分子，就被迷惑住了。工農多不識字，商人只注意行情與廣告，報章雜誌上的這些炫眼的金字招牌，其實也只能引起學生與公教人員之流的注意。而這些人又剛好在彷徨，急欲謀一出路，今見權威人士登高而呼，怎能不本能地喝一聲采？且這些權威人士的呼聲，既響亮，又甜蜜，復投合知識分子的脾胃，如「研究國民所得與生活指數」云云，真是一語中的，道着癢處，那末又怎能不叫人感激涕淚呢？

但是孔子說：「聽其言而觀其行。」循名責實，真偽到頭來總可分辨。名實相符，則謂之真。言行不一，則謂之偽。孔雀毛儘管炫眼，如果覆在下面的是一堆糞土，臭氣終究是要發散出來的。

然而，視聽既經淆亂了，是非已被顛倒了。你滿心以爲抓着一塊真金，拿到手裏，戳一戳，才知是石頭；你滿意以爲嚐到了一塊好糖，糖衣舐去，才發覺裏面是一包黃連。如此，上了當，受了騙，落了圈套，於大呼晦氣之餘，自然也難免使心頭更增幾分無可排遣的苦悶。而心靈單純一點的，經此打擊，或者真以爲黑霧蔽野，狐鬼猖獗，再也找不到出路了吧！

但是，無需學阮籍窮途痛哭！也不要再同楊朱似的，只呆坐着慨嘆歧路！作者於上文列陳若干對岔路（也許還可以列出更多），究其實，却只是兩個相反的方向而已。朝前直走，就是進；旋轉了背，就是退。退，則檢起中西的腐朽傳統，扮起虛偽的面孔。進，則繼承古今的革命遺產，惟真理是從。論真理：知識分子之往下跌，是勢所必至；知識分子之向前進步，是理有固然。必至的不可挽回，固然的應該努力讓它實現。而事實上，很多知識分子，在彷徨一陣之後，是向前邁進了。這向前邁進的隊伍，儘管因爲環境的壓力與自己先天的弱點，顯得有點步伐不齊；然而真理所在，必有光明，追上了人民，步調也就堅定了。江河東流，歸於大海，知識分子下降，終必與人民合而爲一。這一趨向，非右手執行右策者所能抗拒，亦非左手奉行右策者所能阻遏。

# 傳統的舊官僚政治之覆敗

王亞南

##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官僚政治之歷史的經濟的解釋）之十四

中國現代的官僚政治，也正如同以往的傳統官僚政治一樣，在本質上，有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範圍着。特如我們前篇所說，那些對官僚政治在不斷發生着限制作用的社會經濟條件本身，同時又在辯證的蒙受官僚政治的影響，所以，我們除了指出中國現代官僚政治是在何等社會經濟基礎上取得其生存以外，還得看它是如何施反作用於那種基礎，看它在現代的全歷程中，即從鴉片戰爭開始現代化以來，該經歷了多少轉化階段。

從鴉片戰役以來，已經是一個世紀了，中國社會還一直是留滯在過渡的狀態中。要死的不會很知價的死去，要生的不克很順利的成長起來。一般的講，一切過渡社會才正好是官僚政治孕育發達的溫床。但中國的特殊社會歷史條件，既使它在封建的經濟基礎上成立了如此長期的官僚政治，等到它臨到真正的過渡階段，它的官僚政治，也自無法與近代初期西歐各國所發生的官僚政治，採取同一的形態，和實現相同的轉化歷程。

大體說來，中國現代官僚政治會經歷三個演化階段：第一階段是由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我稱此為傳統的舊官僚政治的覆敗期；第二階段是由辛亥革命到抗戰發生以前，我稱此為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盪接續期；第三階段是由抗戰直到現在，我稱此為新官僚政治的成長期。本篇只就前一階段加以說明，而關於第二第三階段，則打算分別留在下兩篇從長討論。

現在先來考察第一階段，考察舊官僚政治的覆敗過程。

我已在前篇說明：中國傳統的官僚統治，到了清代中葉以後，已逐漸變得與新起的社會經濟現實，不相適應，甚且在許多方面，極相矛盾了。但同時我又指出，當時國內國外，動搖傳統官僚政治的社會因素雖在不絕增加或成長，而支持那種統治的外在內在的力量，也並不曾示弱；這是舊的官僚統治，其所以竟能一直維繫到愛新覺羅統治結束，才歸於頹敗分解的基因。

事實上，愛新覺羅王朝的統治，與它所推行的專制官僚統治，是分不開的。但作着理論的研究，却容許我們這樣加以分別，即，假使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不是異族的愛新覺羅王朝，而是同族的什麼王朝，則在社會轉形當中，少了一項種族間的猜忌與傾軋，對於限制或代置官僚政治的憲政或議會政治的採用，也許較能容易實施像日本那樣的立憲步驟，那一來，中國傳統的專制官僚政治

形態的歷史交代，也許是另一個方式，也還較能保持一些官僚政治本身所最需要的形式上的體面，但因為最高統治階層——愛新覺羅王朝，是以異族自主中國，於是當時稍有覺悟，稍有時代認識的漢族臣民，非到圖窮匕見階段，不敢提出任何牽涉到君上至尊大權的政治革新步驟，而在滿族，它恐怕任何性質的政治革新，都將是有利於被支配的漢族，而不利於它的統治的生死關頭，一直要等到它把專制官僚政治的一切弱點暴露盡了，一切醜態盡了，它才從中國政治舞台滾開。因此，中國到清代因了版圖人口的增大增多，因了小落後異族統治大文化國，需要動員以往一切社會文化統治手段作為更包羅的典章制度，尤其因了經濟愈來愈發達活躍。而促使其發展到最高峯的傳統專制官僚政治體制，却竟也在清代末期表現得最悲慘，最不可收拾了。

從這一線索來考察舊專制官僚政治分解的歷程，以次幾個關鍵是值得注意的。

### 三

(一) 太平天國變亂——反滿清，不反對專制的封建官僚統治：

國人對於太平天國的變亂，迄今還沒有一個定評。它的發生，在本質上殆顯然與每個王朝末期的農民叛變，具有同一性質；我們略一參閱當時農民的困蹶情形，由土地集中及官吏貪污勒索活動，即可見一斑。乾隆時湖南巡撫楊錫綬會說：「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皇朝經世文編」卷三九)。農民儘管吃不飽，負擔却加重得厲害。會國藩亦曾慨乎言之：「……然自銀價昂貴以來，民之完納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則鎖拿同族之殷實者，而責之代納，甚者或煩其親戚，押其隣里，百姓怨憤，則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廣之未陽崇陽，江西之貴谿撫州，此四案者，雖閭閻不無刁悍之風，亦由銀價，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濫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勢……」(同上卷三二)。「官逼民反」之內在原因已成，而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之大砲，則從外面加速促其實現。卡爾馬克斯當時曾在「紐約論壇報」分析此中經緯：「一八四〇年戰爭失敗以後，中國所付給英國的賠款，大宗鴉片消耗，鴉片所引起的金銀外溢，外國競爭對地方生產的破壞影響，全部國家行政機關的腐敗……」都變成了太平天國變亂的誘因。「鴉片加速取得對中國人的統治，皇帝及其拘泥的官僚們就逐漸喪失其統治」；天朝的皇帝在大砲下低頭，而在皇帝治下的人民却正因神聖



不可侵犯的皇帝的低頭，而反敢於拾起頭來反抗了。所以這新的外來影響，再加上當時沿東南各省商工業的逐漸變形與新生，遂使那次大規模的農民叛變，不但帶有濃厚的種族的宗教的色彩，且還在某種程度，表現出一些市民的特質。然而畢竟一半由於傳統統治習染太深，一半也由於市民根基薄弱，洪楊一批有勇氣叛變的人物，一到達「自古帝王都」的南京，便作着「帝王夢」，相互間發生爭奪權利的內訌。中山先生評述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說：「洪秀全當時在廣西起來，打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滿清天下大半為他們所有。但是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依我的觀察……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般人到了南京，就互爭皇帝，閉起門來大相殘殺。第一楊秀清和洪秀全爭權，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楊秀清也想做皇帝……因為發生做皇帝的內亂，韋昌輝便殺了楊秀清，消滅他的軍隊。韋昌輝把楊秀清殺了之後，也專橫起來，又和洪秀全爭權。後來大家把韋昌輝消滅。當時石達開聽見南京發生了內亂，便從江西趕到南京，想去排解，後來見事無可為，並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說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軍隊帶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滅。……太平天國的勢力便因此大衰。……所以那種失敗，完全是由於大家想做皇帝」（見「民族主義第一講」）。

太平天國的「哈謨雷特」的結局，顯然是由於那些發難的首腦人物，只知道要推翻滿清的異族統治，而無意去推翻專制的封建官僚政治，不但無意去推翻專制的封建官僚統治，且進而想建立專制的封建官僚統治，來與舊有的相抗衡，「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他們雖在南京建都後頒布了一種「天朝田畝制度」，主張廢除舊的土地私有關係，並在其中擬訂一些不同於舊統治的社會政策與政治制度，可是他們的帝王思想，把所有新的企圖都取消了。中國專制的封建官僚統治本身，竟變成了銷燬、鏷解一切反對勢力或革命力量的洪爐。

可是，專制官僚統治雖藉其「魔力」把太平天國拆台了，它自己本身却不在此大規模的叛亂與「戡亂」過程中，曝露了一切弱點，斷喪了僅有的元氣，且還被迫製出了不少反對力量。

第一個反對力量，可以說是政治上的離心運動的抬頭。我們一再講到中國封建官僚政治，是當作專制政體的副產物而產生的。清代的中央集權體制，到乾隆時代已經達到了中國集權政治的最高峯，由鴉片戰役到太平天國叛變，已說明那種統治在中國南部已經失却了制馭的能力，而總督巡撫在靖亂過程中的軍政權力的擴大，滿族大臣將軍的所表現的無能，以及漢族官吏勢力的相對伸張，都顯示一種對滿族專制皇帝的離心力量，已經在開始醞釀着，而由對外門戶洞開，特別在南部各省，引起的經濟變動，自無疑要使用那種醞釀，愈來愈趨於表面化，而況同時還有

第二個反對力量，即洋務運動的發生，太平天國政治上的失敗，我們已講

到是由帝王思想的作祟，但它在戰爭技術上失敗的原因，却顯然是由於洋兵洋鎗洋礮幫助了大清帝國，李鴻章曾公開表示上海附近戰爭之轉敗為勝，「實戈登大礮之力」。加之，在太平天國亂事尚未平定的一八六〇年，英法兩國的聯軍，又挾其長槍大礮攻破了帝都北京，並趕走了咸豐皇帝，其結果，在敵人佔據帝都中簽訂的天津條約，當然比南京條約還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所以，中興諸功臣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在太平天國平定後，馬上即發憤變法圖強，「講求洋器」，以為武備「能與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中國但有開花大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以上均李鴻章語）。此後二十餘年間的輪船製造廠，機器製造局，招商局，水師學堂，旅順軍港，南北洋電報局，武備學堂，北洋艦隊……等等的相繼籌辦，都是由那種認識出發。但「開花大礮與輪船」兩樣的仿造，雖然是關係技術的東西，却需要一長序列的社會政治文化條件來與它相配合；一個腐敗的專制官僚統治，顯然無法擔當此種「建設」工作，反之，那些「建設」的任何一點成就，却可視為是與專制官僚統治對抗或鬥爭的結果。所以，即使是皮毛模仿的「洋務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也不得不理解為是反專制官僚統治的一種業作。

#### 四

然而，專制官僚統治不適於任何新興事業，不適於成就富國強兵的任务，直到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才被明確的證驗出來。

（二）戊戌政變——反專制的封建官僚統治，不反對清室。

中日戰爭的慘敗，雖不一定證明「但有開花大礮輪船兩樣」，便「敵外國亦無不足」的認識的破產，但却能證明專制的官僚統治，根本就不易有充分而有效的開花大礮和輪船，就是有了那一套東西，也根本不能發揮效力。關於前一點，試看下面的說明：統治腐敗貪污的病，「從西太后起一直到最下級的小官吏，能免了的很少。西太后除了移用國家正當的軍政費，供自己個人的享樂外，又率領宮廷內的妃嬪及閹宦小人，相率出賣官爵，於是上行下效，凡供職於政府機關的人員，也相率以苟且賄賂圖謀個人位置的維持並墜遷。北洋海陸軍的重要將領，及主管人員，多屈身於李蓮英的門下稱門生；苟且賄賂品的來源，不外刻扣軍餉，侵吞公款，於是弄得軍事上的設備腐劣不堪」（見李劍華著「中國近百年史」上冊第一六七—一八頁）。關於後一點，「當時政治上的各方面，軍事上外交上財政上以及其他，無不一盤散沙……就軍事上說，海軍衙門是管理並指揮全國海軍的，但實際上僅能指揮北洋艦隊；若要調遣北洋以外的南洋艦隊，就非繞一個灣，先打電報和南洋大臣商議不可，即海軍衙門本身，總理之下，有兩個會辦，再加上兩個幫辦；總理有一權「無一能」，會辦幫辦則有「能」有「不能」，而「權」則彼此相掙；故在衙門的自身，事權就不能統一。陸軍的不統一，更甚於海軍。兵部是配調機關；各省的兵，已經成了各省督撫的兵；李鴻章可以直接調遣的，限於北洋的陸軍；其他各省的軍

隊雖然可以奏調，但是編制訓練器械既不統一，指揮的將校又各不相習，那種散漫無紀的狀況，比海軍更甚」（同上第一六八—一九頁）。

一句話：單從軍事建設，技術建設上講求富國強兵，講求安內攘外的大理想，由中日戰爭曝露出的一切腐敗無能現象，而歸於幻滅了。於是，在這以前已經有所醞釀的政治改革活動，便找到了一個大做文章的機會。經士兼政論家康有為、梁啟超一派人物的維新運動，應時產生了。他們的基本政治運動綱領，是依開明的君主立憲政體的理想展開的。當時戰勝國日本的明治天皇，是他們想藉以模造光緒皇帝的樣本。因此，他們的保國強國號召，就是想不變更清室的統治權，而只改善其統治方式，改善其專制的封建官僚形態。但無論他們在理論上作着這種區別，是如何殷切期望避免改革上所必然要遭遇到困難，而在實際上，清室的統治是與專制的封建官僚統治分不開的。所以，有名的「百日維新」，雖由光緒皇帝決定實行像科考改試策論，於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並裁撤冗官及駢枝機關……一類無傷大體的新政，此外除康梁外，又任用了號稱「四卿」的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一流維新人物，實在談不到什麼激烈的改革，却馬上激起了西太后及整個滿族官員的不滿，而漢族的守舊人物，更怕「維新」不能維持他們的地位，也都拚命反對，以致光緒在給「四卿」的所謂「衣帶詔」中，極可憐的表示：「頑固守舊大臣，朕固無可如何，然卿曹宜調處其間，使國富兵強，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則朕位且不保，何又於國？」後來，「朕位且不保」，竟成了讖語；對西太后有所暗算的計謀尚在醞釀，西太后對維新人物一網打盡的佈置，却已經安排好了。六君子被殺害，光緒帝被囚禁，前此被稱為新政的若干節目，重又恢復過來了。一切像是仍舊的，但這次政變畢竟留下了極不可忽視的影響。

就消極方面言，由維新運動受到鼓勵的，是一切落後守舊頑固勢力的大抬頭。他們由反對外國的新法，進而把當時山東直隸各處因生活困迫激起的民變，轉移為排除外人，鞏固統治的手段，所謂「義和團」事件，所謂「拳匪之變」，就是在這種「維新排新」，「扶清滅洋」的好打算下釀成的。在事變推演過程中，由西太后，到接近他的滿漢權臣以至若干地方巡撫官吏，有的竟相信亂民可以用呼風喚雨，飛沙走石的邪術，和「封神榜」上許多天兵天將的法寶，去打敗洋人；有的雖知道亂民力量絕不可恃，却因為怕開罪西太后，觸怒那些頑固人物，相率袖手坐視其發展。直到八國聯軍陷大沽，逼天津，破北京，西太后挾光緒帝出奔西北，這一幕「放縱亂民」打洋人，殺教士，圍使館的騰笑中外的「萬愚」醜劇，才作了一個結束。事實上，這也可視為是愛新覺羅王朝和中國專制的封建官僚統治最後一次的最無法軍飾的出醜。它們在藉此應付鴉片戰役，英法聯軍之役，中日戰役，還只表現貪污，顛覆與無能，而這一次則叫全國，叫世界明瞭它們是如何無可救藥的頑固，執迷不悟和無知無恥。一切壞的東西，一定要讓它找機會壞個痛快，它才肯罷休的。

然而我們還得看看戊戌政變此後在積極一方面的影響。

### 五

（三）辛亥革命——反清室兼及專制的封建官僚統治。

經過戊戌政變，一向囿於「君臣之義」，「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滿腹數百年之恩」（康有為「公車上書」中語），因而企圖「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庭」，以和平手段，完成君主立憲政治的改良派人物，多半絕望了，而與此改良運動同時發生或平行進展的革命運動，是曾經一度為改良運動的抬頭，為改良運動在新舊士大夫中，在全國各地政治性團體中，乃至在革命運動因以進行的華僑和會黨中，所喚起的一些鮮紅色的幻想，而遭受了極大的阻礙；等到改良運動在戊戌政變中澈底失敗，前此站在改良主義旗幟下的個人或政治團體，或者被激動而辯證的轉移到革命運動中來，或者至少，已漸相信這是唯一的可能改革途徑了。

當時革命運動的領袖，是孫中山先生。他自始就認定有長期專制傳統的中國，溫和的改良主義，決無法實行，而任何政治改革，也決不能對愛新覺羅王朝抱着何等期待。因此，打倒滿清統治，與推翻專制的封建官僚統治，都是建立中華民國不可避免的消極前提。所以他說：「革命的宗旨，不專在排滿，當與廢除專制，創造共和，並行不悖」。而他對於當時作為革命總組織的「中國同盟會」的誓言，且提議用「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個字。以為驅逐了滿清，建立了民國不算革命成功，民族的平等，民權的平等，是要經濟上平等，才能有所保障的。事實上，他在滿族未推倒以前，已經具體而微的把三民主義作為其革命理想了。

可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雖在戊戌政變後得到一個發展的轉機，但腐朽和醜態百出的舊專制官僚統治，却並不因為它在義和團事變中的丟醜和失態，就安然滾開，反之，它的執着與無賴，却寧是變本加厲了。西太后從西北逃難歸來之後，為挽回顏面，收拾人心，「下詔罪己」的一套把戲搬出來了，前此光緒帝在「百日維新」中實施過的幾項「新政」，重又拿來表演一番；此後鑒於國內外輿論的攻擊和革命運動的愈形猖獗，乃狡猾的實施一種便於排斥漢人削弱地方權勢，並使清代萬世一系統治受到法律保障的偽裝憲政。然而事已至此，多一項新花樣，也不過多一項出醜的機會，辛亥革命已迫在眉睫了。

辛亥革命的偉大成就，不在它推翻了滿族統治，而在它同時還至少在形式上推翻了數千年的專制統治；它雖不會澈底的掃除專制官僚統治所由建立的封建經濟基礎，致使我們在時近半世紀後的今日，還嘆惜致恨於「革命尚未成功」，然而隨着那種封建經濟基礎的解體與變形，完全傳統型的專制官僚政治形態，畢竟不能不說是由此作着歷史交代的開頭了。

下面且看舊專制官僚統治對新專制官僚統治的推移轉化。

# 北美重遊

陳達

## 我國人口普查的討論 (三六、九、十一)

美國人口局若干專家，對於我在普林斯登大學所提出的我國選樣人口普查，甚感興趣，和我有很多次的討論，并共同擬定全國性的選樣普查計劃。適朱君毅兄帶來內政部人口局的全國人口普查草案，乃抽出一個晚間在 Morris H. Hansen 家裏，舉行一個討論會，出席者有 Prof. W. F. Ogburn, Morris H. Hansen, Philip Hauser, William Hu-witz, Benjamin Tepping, 朱君毅，劉大鈞，金國寶及余，烏格朋教授云：「美國人崇拜專家，譬如有人要開化學工廠，他就去請教化學家。因同樣的理由，如果中國要舉辦選樣人口普查，最好是與選樣專家商討。」余曰：「中國的情形尚未到這個地步，有些問題應由專家解決，但往往他們無權，要由上司來決定，雖然上司對這些事往往不知其內容的。」君毅便提出我國人口局關於全國人口普查的計劃，Dr. Hauser 說：「美國舉行第十六次人口普查時，尚須準備三年。在普查進行時，主要調查工作亦須三年才竣事。中國的人口數量，據估計大於美國三倍，各種物質條件不如美國，對於普查，又缺乏經驗，其準備時間必須較美國為長，並更須為費事。目前美國對於第十七次的普查，國庫已有準備金一億圓，必要時可以動用，不知中國對於經費一項如何籌措。依個人意見，如中國規劃全國性的選樣普查，將來發表其結果時，頗想加以研究。若中國於最近的將來，關於全國人口普查印行一個報告的話，我以為不值得閱讀，因為我不相信中國能於短期內對於如此艱巨的工作得到比較有價值的成績。」

## 我國選樣人口普查的計劃 (三六、一—九)

余對於選樣人口發生興趣，遠在二十餘年前，當民國十七年內政部長賴文(次龍)約余長統計司時，其主要的目的在調查我國的人口，我那時即提出選樣人口的建議，認為此種辦法可以逐漸擴充其範圍，於相當的時期內，達到調查全國人口的目的。因選樣普查關於人才與經費俱屬相當節省，故此法應為我國所採用，特別是對於目前及在最近的將來。其主要意義，我在所著「人口問題」一書裏曾經作簡單的敘述。

近十五年來，我國有十種以上的小規模人口普查，係依照現代方法舉行的。這些人口普查及我自己於戰時在雲南的人口調查，實際俱是選樣人口普查。根據雲南的經驗，我更進一步規劃全國的人口調查，這是我最近一年半的努力。全國的人口調查亦必須依選樣的原則，但在好幾方面，以後的選樣要和以前的選樣有區別的。

當一九四七年四月，我被約出席於普林斯登大學二百週年紀念會時，我宣讀論文一篇，即主張全國性的選樣普查。以後我在美國數月，和許多人口學者商討，其最重要者是人口局選樣專家的意見。經過若干次的修改，我申述全國選樣普查的要點於後：

(一) 戰前的選樣調查是無計劃的，我這次的選樣是有計劃的。我的計劃是以全國為範圍，要由這種選樣普查考察全國人口的大概情形。我的目標可以簡述於後：

(甲) 可以明瞭全國主要地理區域(與經濟及社會區域)如山嶺、平原、米區、麥區、市鎮、鄉村等，及每區內的人口分布。

(乙) 可以明瞭全國人口的主要特點如性別、年齡分組、婚姻狀況、職業、教育等，及這些特點按主要地理區域(與經濟及社會區域)分類。

(丙) 對於(乙)節各主要特點，按主要地理區域(與經濟及社會區域)算出實數或百分比。並對全國作估計。

(丁) 關於全國人數作估計，關於若干地理區域亦於可能範圍內作估計。

(戊) 關於全國各民族，應先後全數調查。即在第一次選樣普查時，亦應於漢族外包括若干少數民族的調查。

(二) 方法。為要貫徹前述目標，我們採用選樣法。戰前的選樣是有意的，我們現在擬用無意的選樣，以免除主觀的偏見，增進科學的精神。如果我們由全國選出一百縣十市四少數民族區，我們由此估計全國的人口總數。這種估計，和由全國人口普查所得的數字，相差不致超過百分之八。有三分之二的機會，錯誤不會大於百分之三。若因為各種理由，上述的選樣認為太大的話，我們可以將單位減少至一半。由此我們選樣較小的選樣普查，估計

全國的人數，其結論和由全國人口普查相比，相差不會超過百分之十二。有三分之二的機會，其錯誤不會大於百分之五。至於按其他特點所得的人數，如性別年齡與職業等，亦可個別估計，其準確性與全國人數相彷彿。關於這些特點的人數的比例及各種平均數的估計，要比關於全國人數的估計準確些。

為進行方便起見，分期選樣是更穩妥的辦法。第一期選二十五縣，二或三市。由此我們可以明瞭關於全國人口的若干特點，同時我們可以訓練若干工作人員。依二十五縣的經驗，我們可以決定全國性的選樣普查，應該包括五十縣或一百縣。如果分期所搜集的材料，能於兩三年內完成，對於計算結果時，不致有許多缺點，至於分期的辦法，其主要利益在於需要少數的人才及少數的經費，並可藉此長進經驗，訓練工作人員。

(甲) 選樣的手續。最先應該對於中國的每一縣，找到人口總數的估計，這種估計如果不準確的話，對於最後的結果亦不致發生太大的影響，但如能得着比較準確的估計則更佳，因可降低選樣的錯誤。

其次將每一縣按照已知的特點分層 (Stratification) 全國應有一百層，每層的人口總數幾乎是相等的。所謂特點包括地勢、地形、鄉村、市鎮、農業的性質、工業的種類等。一百層分作四類，每類有二十五層，每類裏各層的主要特點，應有高度的相似性。

(乙) 縣內的選樣。縣內區域可以劃分而每一區又有戶口估計的，可以作縣內的選樣，如按保按村選樣是。保或村選樣與縣選樣用類似的手續，保與村選樣時，可利用地圖以明界限，遇必要時，如在遙遠的區域，或利用飛機照相，以資劃界。

(丙) 選市的手續。關於全國的獨立市準備一個清單，這些應以人口的數量為準。市鎮人口因此可與其他的人口作比較。市鎮人口要按特點分層，所謂特點如工業的性質是。這些市鎮可以分作二十五層，每層的人口總數要大致相等。我們如果不打算將市鎮人口與其他人口比較的話，十層或已敷用。由每一層裏選一市，被選的可能應以人數的多少為準。大市是每一市可以選一層的。

(丁) 市內的選樣。大市被選了以後，每一市還須作市內的選樣，其手續與選市大概相似。

(戊) 少數民族區的選樣。有些少數民族有固定的住區，很可能的有一部分就包括在各縣裏。那末在選樣時或已被選。有些少數民族無固定的住區，特別是遊牧社會，

關於後者選擇時應特別注意。所適用的原則應與選縣選市相似的。

### 羅德學院 (三六、九、二十一—二十三)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時由舊金山乘北車北行，次日上午十一時半至奧拉根省實德命市，下午往市南羅德學院 (Read College)。三十一年前余曾在此校讀書。今日重來，胸中深有感觸。余在校園繞行一週，見有新屋若干，新圖書館是最顯著者。其次為體育館的一翼，露天游泳池等，亦惹起我的注意。最觸動我心的是一間 *Glen Cheney Quiet 紀念樓*。Glen 是和我同時的學生，畢業後曾在紐約市同住於一公寓。Hugh Taylor 余在羅德肄業時，彼曾任學生報的編輯。余在紐約哥校時，彼已在市內工作，余返國任教於清華的初期，其姑母曾至清華西園住宅訪問，謂其表任患肺病，不料其不久即死亡。此紀念樓收容暫時患病的學生，凡因病而不適宜於住居宿舍者可以暫住於此。

校長 P. H. Odegard 約余參加教授會，並約余作簡短演說。余曰：「自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余曾在此渡過最寶貴的光陰，母校不但培養我的智力，我並在此得着數十年間最敬愛的友誼。」老教授中我所認識者僅有物理學教授 A. A. Knowlton 及數學教授 F. L. Griffin。

Prof. Charles McKinley 約余晚餐並住宿，餐後余往訪前校長 N. F. Coleman 及夫人，余前在此肄業時，曾被授余英文。夫婦二人於一九三六年遊歷遠東，曾至清華西園住宅來訪，晚餐後與清華友好數人談話，當時中日兩國感情惡劣，已呈雲霧欲雨的狀態。校長今年七十二歲，體格頗健，精神亦佳，十一年前之事尚能記憶。

次晨於校門口遇體育主任 C. S. Bonford，亦是三十一年前老友，用自己汽車送余至實德命市。

### 飛渡太平洋 (三六、九、二五—二七)

余此次赴美，往返俱乘美國海軍部飛機，按美國法律，凡學術與科學工作，認為於政府有益者，可以得政府的協助。海軍部此次協助普林斯登大學及國際統計會議，余因此得到無費旅行的便利。九月十九日晚十時離華盛頓，次晨七時一刻到舊金山，經十三省約二八〇哩，穿過舞極尼，曼德蘭，本雪凡尼，奧海島，印第安那，意大利諾，米蘇里，堪察司，奧格拉虎，紐美格魯古，安立松那，老買拉多，加利福尼亞。

二十五日晚間乘海上飛機赴檀香山，晚十時起飛，次晨七時二十五分到。下機後有軍官二人伴余至珍珠港 Ma

Kalaia 海軍招待所下榻，收被單洗濯費三角五分，早午兩餐各收三角五分，晚餐收六角。食品頗佳，其價不及市價之半。海軍部供余汽車應用，余往中國領事館，該館方在準備舉行雙十節慶祝會，據說行政院核准招待費美金二百五十元，但籌備委員會以為此款僅敷印發請柬之用。余參觀夏威夷大學，曾於一九三〇年春在此講學一學期。至社會學系遇 Bernard Hoermann 此人前曾在余班聽講，去年已在芝加哥大學得社會學博士學位，近返此校授課，述及老友 Prof. Romano Adams 於七十五歲時死去，死前兩星期尚討論其遺稿一種，係關於夏威夷的人口研究者，此人留有大量的筆記及未刊印的文稿。華僑中之年老者死亡已多，例如前商會會長杜惠生，華美銀行經理黃福民，及夏威夷大學創辦人之葉桂芳等。

余至日報館 Star Bulletin 找些材料，見主筆 Riley Allen 曰：「不見面者不止十六年矣，余記得當民國十九年時，我在夏威夷大學講學，曾致該報一長函，說明華北災荒的現象，並勸美人與華僑捐助，此函於同年四月二十九日登於該報。海島的總督旋宣布五月二十三日為募捐日。在此前數日，余曾參加募捐隊，向美國富戶募捐。有些美國人以我為我國的災荒有季節性，另外有人以為政治與社會的因素較自然因素重要，不肯慷慨輸捐，惟此大募捐，其起因實由於特殊的事實。據說有一位美籍女教員，拿一晚餐費計七角五分，交於 Star Bulletin，並致主筆一函，囑其宣傳，以資喚起同情心，後來檀香山所得的捐款，華洋義賑會即作為修濟陝西省渭河之用。記得舉行放水典禮時，清華同事陳福田兄曾親到觀禮。因陳君係生長於檀香山者。」

余在 Star Bulletin 找到關於太平洋學會中國代表團的報告。登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七日該報。此為該會第一次開會，出席者總數一〇七人，內有美國三十一人，澳大利亞五人，加拿大五人，夏威夷十三人，日本十九人，高麗六人，新西蘭十一人，中國十二人，菲律賓二人，不列國籍者三人。是年七月六日夜間中國代表有三人演說，陳立廷講中國現狀，晏陽初講中國平民教育，余講中國對於法權的取消，(三)中國對於太平洋區域的遷徙，應享受公平的待遇。我國的遷徙，不論在任何一國，應享受移民律所允許的各種權利，凡我國的遷徙，與外國籍在我國境內的徙民，應享受相同的權利。

二十七日下午二時自檀香山起飛，四小時後到達約翰斯登島，共約七六〇哩，每小時飛二三〇哩。此島面積僅四分之一哩，步行四十五分鐘即可走遍全島。此島無其他用途，僅為飛機起落時加油之用。余等在此停留四十五

分鐘，島上有海軍人員四百人，此外尚有少數陸軍士兵。由此島至 Kwajalein，為一四二〇哩，飛行約八小時，余等在此停留一小時半，亦為飛機加油的緣故。時鐘撥慢兩小時。此島雖曾為日軍所佔，但易攻難守，其軍事上的重要性，不在本島而在其外圍，凡能控制外圍者則此島可保，否則難守。我們到此島時在星期六夜間一時二十分，離時在二時五十五分。但實際我們已在午夜線內，所以我們從此以後便失去了一日即二十八日。

由 Kwajalein 至關島為一四一〇哩，飛行約八小時，二十九日晨八時半到達。此島長三〇哩，最寬處八哩。在太平洋區內，美國海軍在此建立最大的單位，有海軍上將二十人。余下榻於 Rear Admiral Charles A. Pownall 的招待所，此地收帳單洗濯費五角，早午兩餐各收五角，晚餐收六角五分。島上有土人二萬二千人，大部分服務於海軍，如人事服務等。業農者絕少，大半係種水菓蔬菜等。種蔬菜以人糞為肥料，因此患鉤蟲病者頗普遍。招待所各人用晚餐時，須有領帶，其餘隨便。招待所裏每夜有電影，招待所旁即露天電影院。全島共有露天電影院二十五處。三十日海軍新聞處職員伴余參觀日戰犯的審訊，此軍事法庭以 Rear Admiral A. G. Robinson (U. S. Navy) 為主席，此外尚有軍事法官四人，被審者為 Rear Admiral Asano (Shimpei)，及其餘五犯。今日審問 Surgeon Commander Ueno (Chisato)，其罪狀為當一九四四年六月七日間，日軍佔領此島時，此人曾虐待美軍受傷俘虜，於施手術時不上麻藥，或施手術後不用棉布包紮，以致毒菌侵入病人身體，或潰爛或喪命。

十月一日午餐後余步行至某地，見行政院物資供應局職員方俊奎及謝庚兩君。二人曾服務於兵工廠，係前清華物理系畢業生。二人伴余至營房，離招待所約七哩。營房內有兵四萬名，專為裝運美國所售的剩餘物資至中國者，處長丁天雄將軍因公赴上海，由醫師陳勳坊暫主此島事務，美籍工人五十名，昨因營房中國憲兵於盤問時舉鎗示威，恐釀事端而罷工，並提出解除憲兵鎗械的條件，昨夜營房中國籍職員及工人，自行將各種貨物裝上卡車，運至輪船碼頭，裝入輪船運往上海。

十月一日晚十時半由關島起飛，二日晨七時到上海龍華美國海軍機場，約一九〇〇哩，據說戰前由關島至上海的輪船，通常須四日四夜，才能到達。余此次在關島逗留兩日，其主因為颶風侵襲中國海岸飛機停飛。乘客中以軍官居多，按任務的重要而用 Priority 排飛行的程序，最要者為一等，余被排入二等及三等，余為非軍界乘客，稱為 VIP，每次降機及升機，俱有軍官招呼，沿途亦頗蒙優待，如參觀及被約往招待所休息等。(全文完)



# 傅作義楚溪春應付華北險局的軍政方針

凌華

（北平特約通訊）除了山東陝西與豫北之外，今日華北其餘五省（冀察晉熱綏）名義上是在傅作義指揮之下的。傅到北平就職以來，據最近見到他的人說，顯得蒼老多了，頭髮已全白而稀少，走起路來老態龍鍾，大非昔日可比。我們且先轉錄一段特寫，從這裏看他的處境——

「傅宜生（傅的別號）這個担子加在身上，別人看也許是官星顯耀，前途無量，在我們看，恐怕是傅先生手中一個刺蝟。這個滿身針刺的東西，養得好也不過給別人準備一味藥，弄不好把自己刺得落花流水名利皆無。比方說名義上別人給他負責的是所謂華北五省兩市，而事實上他能指導裕如的只是久隸綏遠的察綏兩省。山西省已有個遠年老樹根苗在地下不動，看在上司的面面上，傅先生已是無能。熱河呢，已責有專屬，傅先生所能置喙的地方已經有限。餘下來的，祇有河北和平津。平津不必說，僅在朋友的立場上說，大家是老朋友。至於小小的這個河北省呢，冀南已非我之所有，冀中已七零八碎，冀東的北平線最近又是一個小圈圍。……不必諱言，幾十年來，

我們的政治作風始終在雙重心理中打滾。社會制度方面，一般人對嫡子和過房兒的觀念，一直沒有改變。老子對兩極不同根源的後生，似乎心理上總有些不同。對親生兒，一切都好，一切觀點還保持着國產的溺愛。對過房兒的要求則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不過吃草的而且草可吃的馬，未必都能「上路」，而能夠「上路」的却無草可吃，常是吃不到主人的草。

一年以前，河北的局面是實有專屬，那時軍隊最多到五六個軍，人數幾乎二十多萬。這裏面至少有兩個軍是半美式配備。中央對各軍的軍火供給，是無疑無慮無條件的。回想打勝芳那個小村鎮用幾千發重炮彈代價的事實，可以推想這二十多萬人威力多大。那時……東北非但不能同河北在江南爭食（按：現在河北平津糧食靠察綏和江南供給），東北糧還可供河北。……

現在，名義上傅作義是北方的腦袋，……當然要破釜沉舟來一兩手，……不得不先下地獄，這個地獄下得順利可幸保全屍，不然的話，這命運可就不敢想下去了。……傅先生和他的搭檔們已在作釋家的犧牲。不過他這樣滾下去，到底能滾到如何地步，現在還不敢說。可以斷定的，就是如果這情勢永遠維持下去，試想察綏不到六十萬人和每年不到幾百萬噸糧食，結果如何？可以想見。」

傅作義在河北第一件事是改變軍事上死守的作風，第二是以政治配合軍事。我們先分開來說。過去的軍事是分散兵力，死守據點，「打老爺仗」。根據報上的描寫——

「去年晉綏國軍大捷，同一位朋友去看孫仿魯長官，他說：「福要共產黨不玩流氓，國軍有把握把他打垮」。這位拚命將軍的話，確有道理，國共兩軍戰術的不同也就在這裏。所謂「耍流氓」，就是打起來「不論套」，「不擺架式」。流氓的對稱是「紳士，老爺」。老爺作事是「擺架子」，「擺譜兒」，一切要按部就班的連方步。這就是說共產黨的對手在河北戰場（別處也是一樣）過去打的是「老爺仗」。

「打老爺」的原因，應由政府負責。兩年以來政府對共匪作戰，有個基本原则，就是「死守據點」，大的重要都市放上一軍，小的城市擺上一師，下至於團營則

派在主要鄉鎮。那批人往那裏一放，意義之間便有一種嚴峻的目的，就是「這地方給你，你不能丟」。這地方一旦有事，上面的命令馬上來到，內容很簡單：「死守待援」。在軍事上死守待援需要幾個條件，重要的是軍隊運用靈活，交通有把握，指揮統一，情報切實。不過據戰場回來的內幕人告訴我，這些條件都等於零，誰都知道去年西南合一役羅歷戎軍的四圍人全軍覆沒，軍長師長全部被俘，原因是二十四小時內馳援保定的命令，他們執行了十八個鐘頭剛離開石家莊。這就是說命令是死守，而有時時死守的條件等於零。

大小城市鄉鎮的交通方便，生活優裕，軍隊駐下後睡覺處是這地方最好的房子，地方上雞鴨魚肉大店舖的主顧是穿短衣的，許多城鎮出門不到三五里便是敵人，而旌旗相望，而各不相擾。許多駐軍的態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因爲命令嚴峻，「死守」成了每一個據點負責部隊長的飯盆。因此各據點間養成一種「各顧各」的心理，有時鄰村緊急，此村袖手不動。去年××車站被攻甚急，守軍的連長四出呼援；我

們正在鄰近不到廿多里地那個大據點的軍部，親自聽見那個最高幕僚在電話上回答說：我們自顧不暇，你們自己想辦法好了。

死守是命令，在戰場上出生入死，誰能否認這個大前提！每一據點的守軍，常常如傅作義將軍所說「挨死打，死挨打」。如果比較重要一點的地方太危險時，大軍則被動出動，先擺陣勢，後找主力，準備會戰，結果十有九次如某長官所說「摸不着敵人」，結果被動，被動，一直的是被動到現在。

在這一點上，傅作義的確是改正了許多的。各地都由地方武力駐守，軍隊則流動地打仗。可是也有困難。「面」在共軍手中，於是第一，交通線不能確保，時受阻礙，影響行軍的速度，第二，行政工作既不能開展，課報工作打不開，共軍何時來，來了多少總關不清，常常一小部共軍在幾個村子中兜圈子，到一個村中換一個番號，國軍就發出消息，說有第一、第三、第幾、第幾縱隊都來了。這樣的談話不

據說遼陽的失守，就是爲了瀋陽軍事當局相信了共方「陰曆年關取瀋陽」的神經攻勢之故。兵不厭詐，這也是一種「耍流氓」。

涑水之役就是爲了沒有掌握「面」，在運輸上吃了虧。據一位參與作戰的軍官對新聞記者談：

「偷火車按預定速度到達高碑店，那一個機械戰，一定可以消滅共匪主力百分之八十以上。若如此，冀境的局面，在短期內就可改觀。可惜事與願違，結果失去這個聚斂的機會，使共匪又能重復奔回老巢整補。這真是莫大的遺憾。」

爲了要掌握「面」，傅作義和上任的河北省主席楚溪春在兩方面下工夫：一是軍事上肅清，二是政治上的建樹。軍事上的肅清，有所謂「春季掃蕩」。根據報紙的分析，這掃蕩有三點意義：第一，涑水之役既失良機，只有先清除「散共」；第二，要鞏固基地和交通線；第三，爲了政治經濟的安定，要樹立地方政權。至於成績如何，傅作義也不敢肯定。報上這樣講：

「一月以來的春節掃蕩，若作一個整個檢討，表面看來，是有相當的成績；如剿滅散股，捕捉共匪幹部，破壞地道，摧毀基地，每日都有報導。誰也不能否認這些事實。而且共匪的確也

感覺到這是一面威脅，並足以震動搖共匪軍政的行動，但再進一步檢討一下，共匪力量雖在這些小區域消滅，可是在另一方面，是否在加速度的成長，同時在「面上」的民衆物資，是否已能掌握，這好像又是一個問題。何況共匪正針對這一個春季掃蕩，拚命鬥爭搶糧拉了，雖然給他不同地區若干次的打擊，但仍未能掌握住任何一個地區全面。這不是危言聳聽，而實在是共匪成長的迅速不可忽視的一端。傅總司令也曾自己表示過：「我們的工作推行實在太慢了，應該加速的展開。」

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雖然最近剿匪這樣與高采烈地宣傳，把捉到的二百多共俘在北平市裝上大卡車滿街跑，却決不能表示有什麼大成就。最明顯的對比，就是共方對待國軍的俘虜，向來是不遊街示衆，而且只要自願，隨時可以放回來。抓到兩三百人，在他們看來，好像不是一樁大事。

至於政治方面如何開展，那就更複雜了。第一個問題，是土地問題如何解決，過去那些解決「綏靖區」土地問題的辦法，根本沒有實行，現在要實行，當然要受牽制，尤其是各縣地方武力，不是在「職業武力家」(恕我想不起再漂亮的字眼)就是在地主手中，地主農民

又如此對立，緩和的改革辦法能說而不能行。就要實行，幹部到那裏去找？傅作義創辦的「縣政工作實驗隊」在張家口集中訓練，將來就任後成績如何尚不可知。至於原來的幹部，現在抬出來一個「反共英雄」十區專員王鳳崗。這人是一個沒有多少知識、肯苦幹、愛權力、相當大膽的人物，他的轄區已被認為示範區域。有許多新聞記者去看這個人，他穿了灰色的棉軍裝，不拘小節，「在他的心目中無所謂困難，機警是他唯一的本錢」。某報描寫這位反共英雄時，說：

「對王鳳崗的經歷和看法本已記載很多，却再沒有比共產黨對他的看法更滑稽。他自己很引為榮的是共產黨對他的已投出最大的注意力，他還獲過共產黨的檢討簿，上面寫着：『我們一切辦法都被王鳳崗學去了，王鳳崗以我們的辦法來對付我們，正是我們的困難。』他也曾獲過共產黨的生死簿(三十六年)，上面有他的名字與批評，原文如下：『王鳳崗，三十五歲，雙舖頭，高小十五班畢業後，上師範，沒畢業，自幼頑皮，因之被校長于子縉革除，即在衣市村曲場當教員，經常抗槍，走火打死一人，跑到北平，回家後，隔土匪。他當了土匪，綁來票叫他父親看，他

父親不留神被票打死(票暗帶手槍)。他不當鄉團，姜東升來，他投曹學敏，跟曹學敏當營長。四大隊被打敗，他帶着人打游擊，將日本張松隊打垮，自稱七路。廿八年與我聯繫，將他改爲特務大隊副，他不高興。叫他受訓，他跑到涿縣投周文龍，當爲軍副司令，在展台駐防，由黃介民、李適齋介紹入國民黨，又由黃介民到新城聯絡，與張玉、趙力支、傅多士、宋占元、李適齋、郭樹支、黃介民、貫道一等頭頭，即來新城，又由這些人到保定運動。特性：好奇，好鑽研，好打仗，愛研究機械，會修理槍，狡性，好許多疑，既無情，沒遠近，六親不認，善用壞人，獎勵壞人，製造壞人，對上級諂媚，巴結勢力。利用壞人辦法：明鼓勵，暗控制，善促使人作壞事。他本人對此是不能完全承認的。現在他在開疆拓土，在做全河北的模範。他的理想信念在「哪裏呢？王鳳崗雖然本身是國民黨員，却没有主義信仰，他反對任何黨派，說他們搗亂有餘，成事不足」。只有他自己能「成事」的，是不應該受反對的。」

天津冀東去了一次，在天津開了一次座談會，許多河北人發言，慷慨激昂。楚溪春首先說話，先談計劃，最後說到「現在和共產黨拚命的人，不是共產黨要殺的人；而共產黨要殺的人，又不是和共產黨拚命的人！」(天津益世報特寫)又說：「仿魯先生(孫連仲)將河北省交給了我，我要再辦不好，就沒有人可交了，只好交給共產黨。——這次也就是最後一着。」

告發張廷壽未成的天津士紳李廷玉首先起立發言，「大聲疾呼，毫無忌憚，他說現在『無一處不貪污，無一處不混帳！』」

國大代表李華棟希望楚溪春「要實事求是，不要只管中央的命令。」

還有做過大好文的路陸禮(參議員)也發表意見，把傅作義和中興名將相比，他說：「(一)希望傅楚兩先生認清華北的特殊環境，時常自念做官是做的『華北人民的官』，而不是中央政府的官。一切措施、方法和手段，都要從這一觀念出發。」

河北省的政治將建築在這一點幹幹之上，我們且不多說。還是談談河北地主階級和工商界對各方面情形不滿的牢騷吧。楚溪春最近到

「的特權。這並不是要造反，也不是要脫離中央，而是華北的特殊局面非如此不能應付裕如。傅先生應該像國藩拜任兩江總督那時一樣，以獨立的責任急挽華北的大局。」

他又說「傅先生也許有兩點不如曾國藩：(一)曾國藩有度量，能用整天價反對他的左宗棠。(二)當時洪秀全造反，有『宗教』的理論，曾國藩可以打出維護孔孟之道的旗號，來爭取民心。今天我們也需要理論，使老百姓認識三民主義的價值。」

中紡津公司副理希望傅楚兩氏當機立斷，拿出魄力來爲地方做事。他提到了馮玉祥閣錫山——

他說：「應付華北的局面，非有絕大的威權不可。要確定這個方針。爲了這個目的，丟官不怕，有錯不怕，中央認爲是叛變也不要怕。因爲這是爲華北人民，也是爲整個國家。」又說：「我們要領導輿論，向各方呼籲，發動輿論機構，把這要求帶到即將召開的國民大會。」

此外，他說要抓住人心。他問：一般人只知作官，刮地皮，耀武揚威，「請問東北的人心何在？」他又舉出山西的例子，說閻錫山的作風雖遭一部份人反對，但他的平民經濟政策，確實抓住了民心。而山西由圍城之困，到現在還有完整的十幾個縣。他說：「抓住民心的可以存在，抓不住民心的就要滅亡。」

他的結論是：針對共產黨「窮人翻身」的政策，政府要採取「取富濟貧」的政策，要富人拿出錢來。不然，就在鬻錢瓜上鑽眼。

但牢騷是牢騷，實踐又是一回事。楚溪春冀東之行，親自聽到老百姓說全部收成都給「軍民合作社」合作去了。合作社收購人民物品，給價只到市價幾十分之一，濫捕人，濫用刑，被害者前來告發。一個行政官吏說：「諜報機構太複雜了，有三二種，而且有的利用特殊地位魚肉鄉民，勒索商旅，敲詐住戶，有時還要干涉到行政人員的工作。」

河北省參議會的議長劉瑞章下鄉去了一次，回來之後寫了一篇「河北各縣巡視記」，指出地主不出錢，非正式攤派太多，地方武力被私人派系把持或被縣長故意



# 從北平看副總統人選

林一榮

(北平通訊)三月十一日，有一位貴客從南京來到北平，這就是前北大校長、宋子文時代的行政院秘書長、現在國府委員的蔣夢麟氏。蔣君他的夫人到平，對外却只說「太太來了」，報紙上如此報導，也再沒有新聞記者去訪問他。外間傳說，有說他是來賣北平的房子，有說他是來勸胡適出山的。總之，沒有人知道怎麼回事。

星期日(十四日)北大許多老人物公宴蔣夢麟，據傳飯後胡適曾請大家坐到一起，請蔣君談談南京情形。蔣說：「現在是一無辦法了，但我可以向諸位說，共產黨決不會先取平津。」他們是要接亂比較富饒的地方的。——接着談到行政院改組的問題，他說現在沒有一個人是會國語，可以出來做行政院長，「不但會國語，連張之洞也沒有。」北大外語系教授(胡適適外傳)說北大接南遷命令之說是否確實，胡適笑而不答。樊際昌就說：「即便有，我們也不考慮的。」

星期一(十五日)蔣夢麟到胡適府上，長談竟日，星期二(十六日)一早就回南京去了。

他這神態莫測的舉動引起了許多揣測。有人說：胡適要作副總統了。新民報並作了一篇短論，大意說：杜

蔣夢麟這次來平，一定對他說到大局，他也一定很清楚，相信還不見得肯出山吧。但到了南方會怎樣，誰也不敢預卜，一旦又飄飄然起來，加上他那「美國迷」的勁兒，再加上他近來動不動就說話就帶意氣，實在很使人擔心，不知道又有什麼精采表演了。

洪承禧被清朝俘虜，押解北上時，他的故舊連棺材都為他預備好了的。當天大家流着淚送他的時候，連洪承禧自己都不會想到不久竟成了「貳臣」，替愛新覺羅氏來平定天下呢？

胡校長也說不該比洪承禧，但難道連這頭出國的張君動都不動嗎？在南下之前，我們站在北平大的立場，送給胡校長四個字：「不要受騙！」

爲了胡適的事，記者曾問到張奚若，張與胡的交情很久，他推測胡大概不見做官。(下接第四頁)

個月的食糧，便可能延遲敵方的三打，果被榆林當局明智地而且迅速地做到了。這是地而工，同時還在繼續地不時的食糧運進。同時對無法接濟持久的攻城戰。否稍有變態呢？不，共軍計劃。例如「晉陝綏聯防總司令部」在攻昭陽後，王震部之「在攻昭陽後，就很少回昭陽了。

而彭德懷則以教導各旅，屬於地方性質的「一軍」，對於「武功隊」，「警備隊」也重新整頓。這意味着春季攻勢的大準備。

在彭德懷賀龍正積極準備春季進軍的時候，鄧寶珊不能離開榆林，是盡人皆知的。馬鴻逵的隊伍決不肯來背這個包袱。

看膠濟鐵路這一頭，再山東東部也在打，共軍取濟南，下周村，鷓鴣店，好幾處，好像要威脅濟南。

南並恢復國軍取得烟台以前李綱的第八軍還沒有動，已而如此。尤其是青島來了一大軍火大爆炸，損失奇重，對大。根據青島的通訊：三月九日午十一時三十分，本市商河路某軍火倉庫突然爆炸，震動天地，全市搖撼，利時烈燄衝天，高達千尺，隨即即倒塌，鐵片及未裝信者之砲彈滿天飛舞，全市市民相顧失色，一時秩序大亂，全市地處震中，房屋倒塌，損失空前嚴重，難民中心五百餘戶，房屋完全倒塌，水泥石灰骨之房屋，完全震塌，水泥石灰骨之房屋，完全震塌，水泥石灰骨之房屋，完全震塌。

出事後受災區域附近即先告戒嚴，美海軍陸戰隊十餘輛，救護人員二百人到場。山東消防車二十餘輛，市立醫院救護人員二百人到場。

院救護車一百多輛，下午一點，道上，用棉絮，模糊，慘不忍睹，人估計計達五六百，尚待送往市立醫院，則送往二號碼頭美海軍，則送往二號碼頭美海軍，則送往二號碼頭美海軍。

本報二卷已出滿二十四期，循例休假兩周，至四月十六日繼續出版三卷一期。休假期間，訂閱價格暫不調整，歡迎讀者直接訂閱。

時與文化

Time & Culture

Published weekly by the Time & Culture Association, 34 Kuling Road, Shanghai, China

本週刊

發行人 程博洪

編輯部 上海文週刊編輯部

經理部 上海文週刊編輯部

電話九〇二一九

目價閱訂	外國	內國
三個月 <td>十二元</td> <td>八元</td>	十二元	八元
半年 <td>二十二元</td> <td>十六元</td>	二十二元	十六元
一年 <td>四十二元</td> <td>三十元</td>	四十二元	三十元